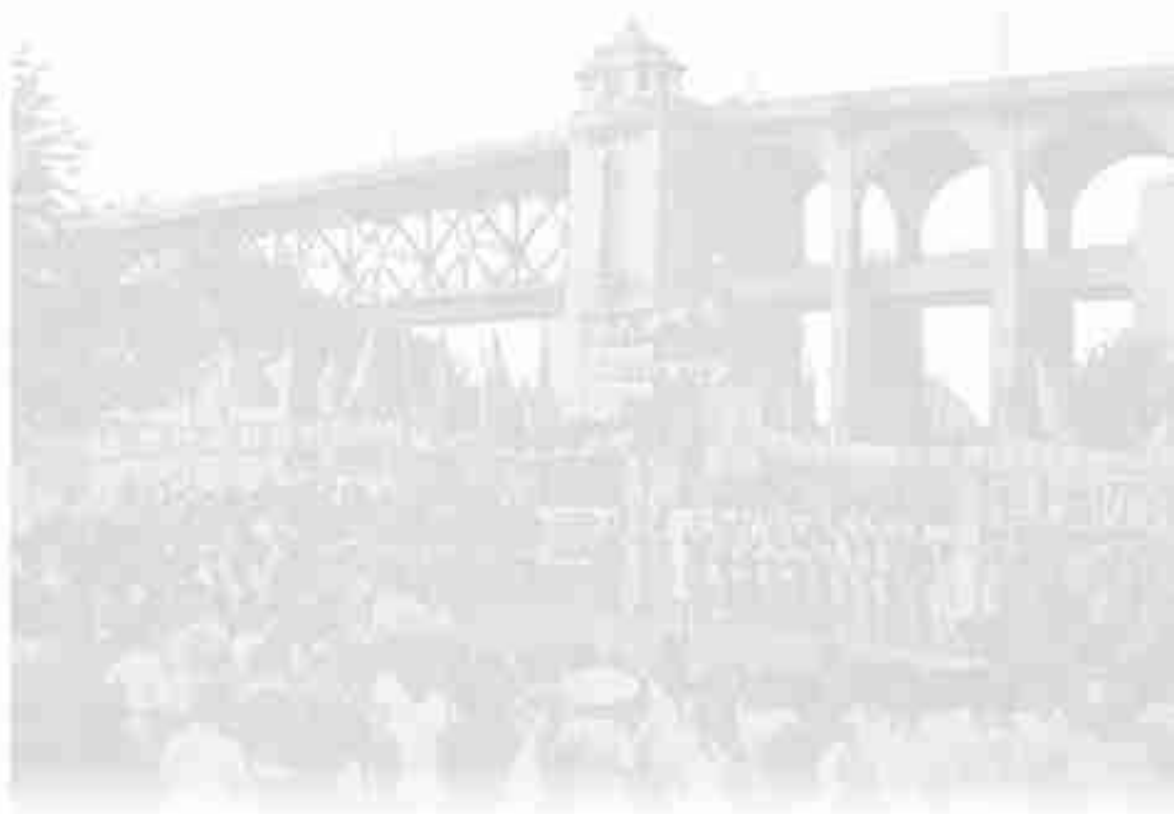


■ 本书编写组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上册）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 本书编写组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下册)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 本书编写组著

—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0.4

ISBN 978—988—77056—6—6

I. ①武… II. ②本… III. 文革—纪实—武汉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

本书编写组 著

责任编辑：钟 逸

封面设计：水 清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58.75

字数：926 千字

印数：2000

ISBN 978—988—77056—6—6

2020 年 4 月第一版

202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20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20

香港新世界粉岭安全街 33 号丰盈工贸中心 5 字楼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00852—39216033

Fax: 00852—25285333

定价：180.00 元（上下册）

目 录

引 子

走向文革：1962年—1966年5月的武汉

- 一、毛泽东和武汉这座城 / 1
- 二、武汉成为华中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 / 6
- 三、重提阶级斗争问题 / 8
- 四、学雷锋与批修 / 13
- 五、学习毛泽东著作 / 19
- 六、医疗卫生改革 / 24
- 七、教育改革 / 27
- 八、结语 / 31

第 一 编

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

(1966年4月—1967年1月)

第一章 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 34

第一节 批判“武大三家村” / 35

第二节 省、市委抛出批判对象 / 41

一、市委抛出“程云反革命黑帮” / 42

二、省委抛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惇、陈一新 / 43

第三节 “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整群众 / 44

- 第四节 整群众的事例 / 57
 - 一、湖北大学六二〇事件 / 57
 - 二、武汉重型机床厂“三家村” / 59
 - 三、武汉墨水湖中学六一六事件 / 61
 - 四、武钢庞玉来事件 / 64
- 第二章 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 / 67
 - 第一节 从工作组到文革委员会 / 67
 - 第二节 受压制的少数派开始聚集 / 75
- 第三章 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 82
 - 第一节 官方红卫兵与少数派红卫兵 / 83
 - 第二节 官方红卫兵的“破四旧” / 89
- 第四章 “揪南下一小撮” / 105
 - 第一节 “炮轰湖北省委” / 105
 - 第二节 “把他们赶出湖北” / 108
 - 第三节 王任重与“揪南下一小撮” / 118
 - 第四节 张体学承认“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 / 122
 - 第五节 王任重、湖北省委作检讨 / 130
- 第五章 武汉地区师生赴京串连 / 134
 - 第一节 少数派自发赴京串连 / 137
 - 第二节 有组织的高校师生集体赴京 / 142
- 第六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145
 - 第一节 少数派大举反击，省委开始检讨 / 145
 - 第二节 “抢黑材料” / 151
 - 第三节 “抢广播台” / 161
 - 第四节 平反“五十天”里的错案 / 165
 - 第五节 大专兵、三字兵消散 / 169
- 第七章 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 173
 - 第一节 少数派学生组织：从全校性到全市性 / 173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成立	/ 176
第三节	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成立	/ 179
第四节	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	/ 181
一、	新华工	/ 181
二、	新湖大	/ 187
三、	新华农	/ 190
第八章	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	/ 191
第一节	“我们要彻底改组湖北日报社”	/ 191
第二节	群众性大辩论	/ 197
第三节	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新生”	/ 200
第九章	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 205
第一节	得到学生少数派支持，突破中央规定	/ 205
第二节	工人总部成立	/ 210
一、	工人总部筹建	/ 210
二、	工人总部成立大会	/ 215
三、	工总人员在京“请愿”	/ 218
第三节	工造总司成立	/ 225
第四节	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	/ 229
第十章	职工联合会从成立到解散	/ 236
第一节	联合会的筹建及其人员构成、观点	/ 236
第二节	两次大行动均遭失败	/ 238
第三节	联合会消散	/ 245
第十一章	批斗王任重	/ 249

第二编

“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〇事件”

(1967年1月—7月)

第十二章 一月夺权 / 260

第一节 一·二六向省委夺权失败 / 261

第二节 夺武汉市委的权 / 272

第三节 基层夺权行动 / 276

第四节 造反派评说夺权失败 / 290

第十三章 “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 294

第一节 武汉军区介入文革运动 / 295

第二节 二八声明和武汉部队二一八声明 / 300

第三节 策动保守组织“重新组织起来” / 310

第四节 “三月黑风” / 313

第十四章 “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 323

第一节 造反派共同“反逆流” / 323

第二节 “揪出武汉的谭震林” / 329

第三节 新一中绝食事件 / 335

第四节 “营救夏邦银” / 344

第五节 新公校绝食事件 / 347

第六节 “百万雄师”成立 / 354

第十五章 血腥的6月 / 367

第一节 百万雄师和军区的“武化革命” / 367

第二节 独立师直接领导百万雄师 / 378

第三节 大规模武装围攻 / 381

一、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 / 383

二、围攻六渡桥 / 385

三、围攻铁四院和水运工程学院	/ 392
四、围攻工造总司大楼	/ 394
五、围攻汉阳轧钢厂	/ 395
第四节 造反派全面撤退	/ 397
第五节 “六二六来电”后军区调整策略	/ 399
第十六章 七二〇事件	/ 409
第一节 毛泽东决定就地处理武汉问题	/ 410
第二节 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	/ 411
一、毛泽东表明对武汉问题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做军区的工作	/ 412
二、谢富治、王力接触各群众组织	/ 415
三、独立师对立情绪发展	/ 422
四、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总结讲话	/ 424
五、周恩来讲话被提前传达，独立师率先上街	/ 427
第三节 七二〇事件爆发	/ 434
一、冲击东湖宾馆揪斗王力	/ 434
二、批斗王力，大规模抗议游行开始	/ 437
三、各组织表明立场，百万雄师重新使用武力	/ 441
四、中央应对武汉事件	/ 449
五、七二〇事件的持续	/ 453
六、局势急剧转折	/ 458
七、七二〇事件的关键事实及脉络	/ 465
第四节 “北京支持你们！”	/ 466

第三编

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

(1967年7月—1968年8月)

第十七章 七二〇事件后的武汉局势 / 474

第一节 百万雄师成员的活动及其处境 / 474

第二节 武汉造反派全国“支左” / 483

第三节 “武装左派” / 486

第十八章 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 491

第一节 造反派的大联合 / 491

一、周恩来指示武汉造反派大联合的道路 / 491

二、周恩来说：“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 / 495

三、大联合中的工总 / 501

四、大联合中的工总和九一三 / 506

五、大联合中的新派 / 508

六、大联合中的当权派 / 513

第二节 成立三代会 / 515

一、成立工代会 / 516

二、成立红代会、农代会 / 518

第三节 成立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 520

第四节 造反派掌权的基层革委会 / 529

第十九章 “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 / 536

第一节 钢新两派和军区提出不同斗争目标 / 536

第二节 钢新之争达到顶点 / 543

第三节 批判李迎希 / 547

第四编

从“清队”到“两清一批”

(1968年8月—1971年10月)

第二十章 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 552

第一节 工宣队进校，学生退出文革舞台 / 554

一、工宣队在大专院校 / 557

二、老五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 / 559

三、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 / 562

第二节 清理阶级队伍：清算造反派 / 565

第二十一章 “反复旧”——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 573

第一节 反复旧运动的兴起 / 573

第二节 中央五二七指示的形成 / 579

第三节 贯彻五二七指示 / 587

第二十二章 “两清一批” / 590

第一节 疑点重重的中央九二七指示 / 590

第二节 省革委会扩大会：造反派头头唯求自保 / 598

第三节 北京学习班：从“一清”到“两清” / 602

第四节 武汉地区的“两清一批” / 609

第五节 林彪事件后“两清一批”继续 / 623

第五编

批林批孔—全面治理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1年10月—1976年9月)

第二十三章 “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 / 632

第一节 曾、刘失势 / 632

第二节 从五不准学习班到座谈会 / 635

- 第三节 造反派开始又一次抗争 / 639
- 第四节 原百万雄师成员开始公开行动 / 644
- 第二十四章 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 646**
 - 第一节 “小人物”·“街头派” / 646
 - 第二节 1973年的“反潮流派” / 652
 - 第三节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反潮流派” / 660
 - 第四节 1975年至1976年的“反潮流派” / 667
- 第二十五章 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 680**
 - 第一节 省市委对待群众运动的新姿态 / 680
 - 第二节 “放、平、补、提、纳” / 689
 - 第三节 从省委“七条”到省委“六条” / 700
 - 第四节 “党委造反” / 706
 - 第五节 “攻三办，促省委” / 710
 - 第六节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写作组 / 720
 - 第七节 沿袭“百万雄师”而来的“工农兵” / 724
- 第二十六章 1975年的全面治理整顿 / 734**
 - 第一节 “同资产阶级派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 734
 - 第二节 安排造反派头头下放“挂职锻炼” / 737
 - 第三节 基层单位的“治理整顿” / 741
- 第二十七章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 745**
 - 第一节 造反派的“帮促班子” / 745
 - 第二节 “寒城牛”、“工农兵” / 761

第 六 编
文革被彻底否定
(1976年9月—)

- 第二十八章 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 770
- 第一节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武汉 / 770
 - 第二节 “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传到武汉 / 777
 - 第三节 “工农兵”先行出手抓人 / 787
- 第二十九章 “揭批查”运动 / 794
-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 / 794
 - 第二节 遍设“五不准”学习班 / 798
 - 第三节 改组湖北省委 / 812
 - 第四节 真理标准讨论 / 816
 - 第五节 平反“冤假错案” / 820
 - 第六节 为七二〇事件平反 / 824
- 第三十章 “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 836
- 第一节 审判“追随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分子” / 836
 - 第二节 “帮派骨干”在狱中 / 853
 - 第三节 处理未判刑的“帮派骨干” / 863
 - 第四节 “清理‘三种人’”和“记录在案” / 868
- 第三十一章 文革参加者的晚年 / 880
- 第一节 打击“在经济上搞破坏的帮派残余势力” / 880
 - 第二节 争取“生活费” / 884
 - 第三节 文革结束后的百万雄师成员 / 889
- 参考资料 / 896
- 后 记 / 909

引子 走向文革：1962年—1966年5月的武汉¹

一、毛泽东和武汉这座城

毛泽东把武汉这座城称为“白云黄鹤的地方”。

毛泽东不多的传世词作，写于武汉又写到武汉风物的就有两首——1927年春的《菩萨蛮·黄鹤楼》和1956年6月的《水调歌头·游泳》。两首词的写作时间相距近三十年，但都写到长江，写到夹江相峙的龟蛇二山。

毛泽东说过：“天下的水，只有武汉的好。”²

1956年至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游长江43次。

1960年到1974年的14年间，毛泽东44次到武汉，必定下榻武昌东湖之滨的东湖宾馆梅岭1号，少则十数日，多则半年。东湖宾馆成为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除中南海外居住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地方，由此被称为“湖北的中南海”。



毛泽东旧居——东湖宾馆梅岭1号（网络图片）

1974年7月18日，毛泽东最后一次来武汉。9月16日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时说：“我要是不在了，你们要谨慎、小心。还有一二年也不一定，阎王请我

¹ 本部分关于这一时段武汉历史的记述，参考了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九章贯彻八字方针 实行全面调整”，“第十章三年继续调整任务的完成与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发展”，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版。

² 海冰《老照片见证毛泽东的武汉岁月》，载2013年7月29日楚天金报。

喝烧酒。”¹10月12日离开武汉时毛泽东说：我还要再来，我喜欢武汉这个地方²……

国内通都大邑众多，毛泽东唯独钟情于武汉，评说者都以为，这与1927年2月至8月毛泽东在武昌的经历相关。毛泽东在那一段日子里，2月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6月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800名学员结业；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前，“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³；4月底5月初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⁴。在毛泽东千难万险的一生中，这一段经历并无特异之处，但毛泽东和杨开慧及三个儿子一起，在武昌生活半年，却是一家人唯一一次团聚。新中国成立后，湖南、湖北的党史工作者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于何处发生争执，有人托杨开智问毛泽东，毛泽东立即回答：“武昌都府堤41号。”⁵



毛泽东旧居——武昌都府堤41号（网络图片）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45—5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 黎笙《毛泽东在东湖客舍》，载1998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3 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自注。

4 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自注。

5 参见《毛泽东地理》，载2006年9月7日《三联生活周刊》。

进入1966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帷幕渐次拉开。

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人谈话说：“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¹

2月8日，毛泽东在东湖宾馆听取彭真等人汇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记载：

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问了彭真同志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同志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主席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时任中南局宣传部长的李尔重晚年回忆：“文革前，毛主席曾来武汉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找省市部分领导干部座谈四清，毛主席说：四清整了不少的基层干部，不能解决问题，要搞更大的运动。”¹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对这个“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作出了极其热烈的回应。

5月23日，武汉市委根据正在中南局开会的第一书记宋侃夫的意见，发出通知《高举文化革命大旗，深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通知要求各战线，各区、局党委和社教分团、工作队党委，都必须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密切注意文化革命的发展趋势，加强领导，组织干部群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随后各单位连日纷纷集会声讨“反党集团”。5月30日，武汉市委根据省委通知，要求各区、局、直属单位党委立即向18级以上党员干部传达五一六通知等五个文件²，要求做到“学习文件，认清形势，大鸣大放，清理思想，提高觉悟，投入战斗”。31日，市委又决定将传达范围扩大到车间党支部书记一级³。武汉钢铁公司职工彭绍鹏回忆：5月底左右五一六通知就向武钢工人传达了⁴。

全国有很多人是在1967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刊登于人民日报时，才读到它的全文。湖北省委、武汉市委迅速传达五一六通知的举动在全国不多见。

6月28日毛泽东从韶山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7月8日给江青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信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 参见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5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2 其他四个文件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3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2014年笔者访谈彭绍鹏的记录。

还是这两句老话。”¹

7月16日毛泽东游长江一小时许，近三十里。毛泽东在快艇上，身着睡衣，向江中呼喊“毛主席万岁”的渡江群众挥手致意，毛泽东身后是武汉长江大桥，这一瞬间被专职摄影师钱嗣杰摄入镜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畅游长江的消息和这张照片。从此，“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成为文革中时时响起的口号。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快艇上向武汉横渡长江的群众挥手致意（东湖宾馆馆藏资料）

1967年7月，武汉地区正在剧烈武斗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在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举行渡江活动一事上，破例接受了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协调：两派分别于15、16日渡江，渡江时互不攻击；强势的百万雄师高姿态地“把7月16日这一天让给了造反派”²。造反派渡过长江在汉口街道上游行时，水塔上的百万雄师广播站异乎寻常地高喊“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³。

从1967年至今，武汉市每年在7月16日这一天举办群众性的渡江活动。2014年，中国泳协宣布每年7月16日所在周为全民游泳健身周。2015年，武汉被确定为全民游泳健身周的永久主会场。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长江，第二天离汉回京。一年后毛泽东第一次离京外出，目的地又是武汉。这一次他坐镇武汉，与周恩来等直接处理武汉文革问题。毛泽东亲临一地亲自处置当地的文革运动问题，在他十年文革经历中唯此一例。

1966年7月后毛泽东五次来武汉，其中一次在东湖宾馆住了半年之久。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97—598页。

2 参见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4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

3 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32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版。

二、武汉成为华中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

1962年，武汉国民经济调整取得明显的成就，但困难局面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武汉市贯彻中央提出的三年继续调整的决策，至1965年，武汉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1962年增长76.9%、71.3%，三年调整时期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1.1%；“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的吃、穿、用有了很大改善，经济情况全面好转，各项建设事业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三年继续调整时期，武汉市以增产节约、扭亏增盈为中心，开展了技术改造、行业调整、归口管理、企业整顿等方面的工作。

1963年下半年，武汉市组织开展了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学上海、学襄棉活动。10月，省、市联合组织有关企业和单位赴上海，通过现场观摩、跟班劳动、听报告、开座谈会等方式，学习上海企业在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12月，市委召开学上海、学襄棉，深入开展比、学、赶、帮和“五好”竞赛动员大会，在全市掀起更大的学习和竞赛热潮。1965年底，武汉市委四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号召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以彻底革命精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964年6月，召开全市工交财贸系统“五好”和先进集体、“五好”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表彰了547个“五好”和先进集体，3460名五好职工。

1965年5月，召开全市首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市贫下中农协会，提出要把市郊建设成为稳产高产的副食品生产基地，力争郊区人民公社和农场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进入全省、全国的先进行列。

武汉市加强技术革新和改造。1963年提出今后三年工业一般不搞新建，基本建设主要内容就是搞技术改造。1965年12月，武汉地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展览会开幕。展出新技术、新工艺，各种专用设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机具，先进刀具、工具和新产品等2000多项，被认为是多年来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成就展览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

市委大力推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确认“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一项根本制度”，要求“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中心，建立一套群众监督制度”。

武汉市充分发扬做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共产党的传统优势。武汉地区这

百舸争流

——武汉地区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展览剪影



● 平谷设计生产队技术革新成果展览会上工人的决心。他决心在平谷区设计生产队技术革新成果展览会上，自力更生，生产新产品，为支援大跃进，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平谷设计生产队）



在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质量第一



● 武汉钢铁厂工人，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在武汉钢铁厂，工人们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 武汉钢铁厂工人，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在武汉钢铁厂，工人们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 武汉钢铁厂工人，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在武汉钢铁厂，工人们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 武汉钢铁厂工人，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在武汉钢铁厂，工人们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 武汉钢铁厂工人，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在武汉钢铁厂，工人们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 武汉钢铁厂工人，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在武汉钢铁厂，工人们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 武汉钢铁厂工人，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在武汉钢铁厂，工人们精心操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1965年12月3日《武汉晚报》第4版

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具有较鲜明的特色。1964年5月市工业交通各局工作会议纪要有这样一段话，可以概括武汉地区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把政治工作、技术工作结合起来，做好

人的思想工作，要关心每一个人，帮助每一个人；党员干部要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以助人为乐，把帮助别人的进步当作自己的责任；各级领导要亲自蹲点，培养和树立标兵；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的作用。文革后武汉官修党史对此总结说：“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对于安定人心，稳定秩序，鼓舞斗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

1965年末，武汉市人口总数460万，市区人口250万，工业职工总数达到30.2万，为1949年的6.7倍。至1966年，全市拥有科技人员3.2万人，为解放初期的四倍；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由1958年的66.79万人增加到102.61万人。1958年至1966年累计，高等院校毕业生6.37万人，中专毕业生2.86万人，分别比1950年至1958年增加162.1%和35.5%。据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1840—1985）·教育志（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载：1965年，武汉地区有普通中学165所，在校学生16.3万人；中专、技校、职校194所，在校学生4.8万人；高校22所，在校学生3.3万人。

1965年，武汉市工业总产值居全国大城市第五位，成为华中地区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武汉工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中部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是缺乏重工业的局面，改善了全国工业布局，起到了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

三、重提阶级斗争问题

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有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7日至28日，中共武汉市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认为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完全

符合武汉市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思想动态”。会议号召“团结全市人民群众，高举‘三面红旗’，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的指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把武汉市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而奋斗”。

1964年1月9日，武汉市委决定，经常性地对职工特别是对青年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市总工会成立了武汉市工人“三史”（老工人家史、工厂史、革命斗争史）报告团。1月28日，“三史”教育展览开始展出。5月8日，武汉市“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开展，至8月15日，展览会观众达52万余人次¹。各大中学校经常举行吃忆苦饭，请老工人、老贫农、老红军作报告等“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活动。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这就是说阶级斗争问题是党的路线的问题。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以传统的工作方式，在基层党组织、党员和群众中“抓阶级斗争”。1963年，武汉市组织部门调查，“估计全市党员中有10%—15%的党员不具备条件，其中有极少数人是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他各种坏分子；10%左右的支部问题很多，工作落后，没有真正成为党在群众中的战斗堡垒。”1963年3月开始的市郊农村四清，1964年5月进入组织处理阶段，“受党、团、政纪处分的干部共7819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3.56%”。

按照中央部署，武汉市委在农村开展四清，在城市开展“五反”（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五反”1963年3月开始试点，6月在第一批单位展开，“出现擅自搜查、体罚、逼供信等现象，互相猜忌，互相检举，人人自危”。“试点一个月，就发生14起自杀（死6人），12起逃跑事件。6月，又有15人自杀身亡。”²

1964年8月武汉市委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重新部署四清运动。“开展运动的单位，大体按六个步骤进行：宣读《双十条》³，串联发动群众，特别要把老工人发动起来，初步形成阶级队伍；反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铺张浪费，领导干部‘洗手洗澡’；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反对

1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1964年”条。

2 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1976）》第409—410页，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

3 双十条指中共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两个文件，又称前十条和后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市糖业烟酒公司武昌批发商店的领导向群众作自我检查（原载武汉市档案馆编《大武汉新影》，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斗争；划阶级，进行整治清理，重新登记工会会员；进行组织建设，整顿党、团、民兵组织，进行党员登记，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工。四清后期“重建阶级队伍”仍然是主要工作，“城区整顿重建工会、民兵、妇女组织，郊区则成立贫下中农协会”。

一冶职工方德纾回忆：省委派出的四清工作组“一进厂就摸底排队，把职工划分为三类，好的、比较好的、不好的。依照过去搞政治运动的规律，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所谓不好的，主要还是过去运动中的对象，什么摘了帽子的右派，历史有问题的，平时牢骚话多的，家庭出身不好又表现不好的；所谓好的，就是运动的依靠对象，将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培养对象，运动后期有希望提拔重用、入团入党的人，这一般占10%左右，后期还会扩大这一比例，说明运动有收获。我们在职职工是不会叫你事先知晓的，由工作组看过档案，找人谈话，神秘地摸底排队之后内定的。”¹

¹ 方德纾《倾诉》第87—8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版。

当时借调在武汉市人委工作、参加过四清的彭祖龙回忆：后十条下达后，武汉市委组织八千多名工作队员、近六百个工作组，开进武昌各单位“夺权”，称为“八千队员过长江”；各单位领导全部靠边站，审查后再作安排¹。

二十三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下达后，整群众的过火做法开始纠正，但二十三条强调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得到实施。

武汉锅炉厂的四清于1965年9月正式开始，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任工作队队长。此时二十三条已公布8个月，工作队仍然全面整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全厂车间副主任、党支部书记以上的成员，全都靠边站，上楼去‘洗澡’，交待，检查，接受职工的检举揭发。”“三〇一、三〇三车间硬是抓出了一个‘王竹定反革命集团’，它的成员都是从上海锅炉厂来援建武锅的老师傅。长期生活在‘冒险家的乐园’，在旧上海的机械行业摸爬滚打，无疑他们的思想有旧时代的烙印，生活上也多多少少有旧上海的习性。他们平时来往紧密，怪话、牢骚也不少，对三面红旗说三道四。在全厂批斗时，不外乎就是这些事。”王光照所在的机械动力科电气设备运行管理组，“这位被批判，那位做检查，在电气组就剩我一人跳独脚舞了”²。

四清运动遗留下来的干群之间、干部之间、群众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在1966年6月开始的文革运动中反映出来。彭祖龙回忆：**四清中被错整的干部，文革中大多同情或支持造反派；被错整的群众大多同情或参加造反派。**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所谓‘清思想、放包袱’的‘自我革命’阶段，需要人人向党组织交代自己不正确乃至错误、反动的思想和言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院党委和工作队党委在学生和教师群众中抓‘右派’时所用的黑材料，绝大多数出自在这些‘自我革命’中整出来的东西。”³

1964年3月至1966年初，湖北省委安排高校部分师生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华工动力系6227班一位同学2018年说：“黄陂社教使我认识了农民、

1 参见彭祖龙《闭门杀人的四清，开门杀人的文革》（未刊稿，2019年）。

2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5—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3 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3页。

农村、农业。我深刻地体会到没有中国农民的富裕休谈中国的富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休谈中国的现代化！”¹水院六一、六二、六三级学生先后参加了四清，“知道了农村的真实情况，知道了民众的疾苦，知道了黑暗面所在。”²很多学生认为参加四清是文革前的“热身”，使他们初步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学得一些接近群众的方法。

四清开始以来，在工人、农民中重新“形成阶级队伍”，在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贯彻“阶级路线”，强调、重视家庭出身。

扶助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上处于劣势的工农子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责。文革开始时，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有六一级至六五级学生（所谓“老五届”）3700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学生是平民子弟。从农村入学的大约占百分之七十”。“如果在解放前，按其家庭的经济条件而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不少人可能连上小学、中学的条件都没有”。在这五届学生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比例逐年下降³。武汉水院由于专业设置的原因，在农村招生的比例较大；而华中工学院多热门专业，老五届学生近六千人，同样是“来自农民和工人、城市贫民家庭的学生占了大多数”⁴。

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当时中央有一个关于阶级成分的政策——“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⁵，虽然人人皆知，但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贯彻。武汉大学六三级学生、贫农家庭出身的吴恒春回忆：“在当时的大学里，成分观念是深入人心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尽管他本人一天也没有剥削过别人，还是受到了无数的歧视和打击。他们在政治上和各种待遇上，就是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出身不好是会影响到升学、入党、提干的。”⁶中学的情况也是这样。武昌实验中学六六届高中生、工人家庭出身的柳英发回忆：他所在班一个同学出身工商业兼地主，“表现很好，关心集体，也很爱护他人”。从高一到高三一直申请入团，每次开班团支部会，“有的干部子弟老是说这个同学跟家庭没有划清界限，认

1 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一章山雨欲来。

2 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3页。

3 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4、5页。

4 参见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一章山雨欲来。

5 据马永顺编著《人民公仆周恩来》（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介绍，“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最早出自周恩来1955年的一个批示。

6 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

识不够，一直这样说”。班上演出活报剧《想起往日苦》，这个同学扮演贫农老头，有干部子弟对柳英发说“怎么能让他演这个角色？”还有干部子弟警告柳英发：“你可不要背叛了我们党的阶级路线。”¹

文革开始后不久的6月下旬，武汉市委决定高中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初中毕业生按执行得越来越偏颇的阶级路线完成了“推荐与选拔”。被“选拔”出来的学生后来虽然未能升入高中，但已经严重造成学生的对立。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中不久也分裂为两派，“推荐与选拔”是一个重要原因。

柳英发认为：

文革前，各级领导在执行阶级路线问题上有重大偏差，所谓“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并没有真正贯彻，以致文革初期发展为疯狂的“血统论”。那帮高干子弟搞出不伦不类的“红五类”概念，与文革前的走资派一样，分裂人民群众，制造群体歧视。更可笑的是，“红五类”内部也是分类别、分等级的，他们自居第一类、第一等，高居于另四类之上。

“改革”了，“开放”了，文革彻底否定了，但是那帮老红卫兵却不能否定。陈云说：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看看当下权贵资本主义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新中国肌体上的毒瘤——新的血统论流毒至今，愈演愈烈²。

四、学雷锋与批修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在武汉市委领导下，各级党委指导共青团组织开展宣传、学习活动。武汉歌舞剧院赶排歌剧《雷锋》连续演出30余场，美协武汉分会主办的雷锋画展接待近20万名观众，各级团委配合有关方面举行雷锋事迹报告会600余场、听众30多万人次，共青团武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把学习雷锋作为中心议题。到当年五四青年节，“向雷锋学习的群众运动形成高潮。雷锋精神在全市开花结果，良好的社会风气得到了发扬。”“不少青年说：‘前半截受的苦和雷锋不相上下，后半截做的事和雷锋是天壤之别’，决心要像雷锋那样，‘重写自己的历史’。青少年中关心集体、助人为乐、尊老爱幼、

1 柳英发《文革初期的“血统论”》（网文，2017年）。

2 柳英发《文革初期的“血统论”》（网文，2017年）。

勤俭节约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许多青年做好事不留名。有的地方长年堵塞的臭水沟通了，长年无人打扫的厕所整洁了，车间的机器一个晚上被擦得闪亮。一些工厂和机关还经常收到退回的新工作服和困难补助余钱，他们留下的是‘一个共青团员的心’、‘雷锋同年人’等署名。商店营业员学习雷锋干一行爱一行的品德，使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大为改观。青年学生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努力钻研科学技术知识。”“学雷锋活动还同学毛泽东著作结合起来，为青年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提高政治觉悟、焕发高昂的学习和工作热情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¹

武昌造船厂工人李承弘，1963年20岁。晚年回忆工厂学雷锋活动时写道：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学雷锋群众运动，一切舆论工具可谓铺天盖地，报纸广播书刊演出是一番接一番地连轴转，上至中央下至各个角落，都投入了学雷锋活动。我本人由不自觉到自觉，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先从形式外表照着学，抄《雷锋日记》，学写自己的日记，再由表及里最终‘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具体行动从勤俭节约开始。我们翻砂铸件后，经过清理，现场及废砂堆中有二三十厘米长的铁丝、一两寸长的铁钉，过去都当废品处理，现在学雷锋，我跟着组里的共青团员胡云生，伙同白友朋，每天上班前在现场和废砂堆扒铁丝铁钉，弯曲的铁钉集中起来下班后再锤直。这种活动我们坚持了很长时间，文革期间中断过，后军代表掌权时一些回城青工又继续了一段时间，我认为这点小事最能体现雷锋的精神。”“除此以外，要学雷锋助人为乐做好事，就得星期天在公共场所找好事做”，曾去轮船客运站打扫卫生，维持秩序²。

有华中工学院老五届学生回忆：“那时在华工学雷锋做好事真的是蔚然成风，同学间主动帮助洗衣被、缝被子、理发，抢着打扫卫生，互相做好事，多数不留名等等。华工广播台和院刊更是及时报道学雷锋的好人好事，许多同学把雷锋日记中的名言名句抄在个人日记本上，对照和鞭策自己，进行道德自律和人格修养。现在回忆起来，那时那种同学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优良风气，仍然历历在目，令人神往。不能说一点形式主义没有，但是发自内心的善良、真诚和青春热情，的确是大多数同学用实实

1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社会团体志》第18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24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学雷锋活动照片（载《大武汉新影》）

在在的行动所证明、所拥有的。”¹

学雷锋活动持续开展，社会上普遍认为学雷锋就是“做好事”，而“做好事”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雷锋真正理解毛泽东一直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质，“为人民服务”是科学命题，是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同时，一些投机分子跟上形势，利用“做

好事”来达到个人目的。

老五届学生岑颖义说：

当时开展学习雷锋活动，有人主张学精神实质、不同意庸俗化（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就是如此，他就鄙视故意天天倒痰盂争取入团的人）。绝大部分贫苦农民、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后代都怀着感恩的心，加上共产党长期宣传教育，他们中有很多人真诚地相信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党叫干啥就干啥，确实有很多人将学雷锋落实到行动中了。也有人把学雷锋简单化、形式主义化，这些人往往优先入团，文化大革命初期还被钦定为“左派”、“中左”。这也是五届大学生群体（在文革中）产生分歧、分成两派的一个具体原因²。

工人李承弘当时也认为学雷锋光做好事不行：

我学雷锋是学的皮毛，从宣传中又得知，光学做好人好事不行，更重要的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把学雷锋推向深层次。武汉大学哲学系为了配合运动，举行过一次普及哲学的讲座，主讲人是李达的门生、后来的武大校长陶德麟。武昌的讲座是在紫阳湖旁的七四三五工厂大礼堂召开

1 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一章山雨欲来。

2 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21页。

的，有一千多人参加，大都是工人，会场反映很强烈，认为主讲人水平高，把深奥的哲学通俗化了，听得懂启发又大。整个讲座深入浅出，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实际，确实感到了把哲学从神秘的殿堂解放出来了，从这以后，我对哲学产生了一点兴趣¹。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了中苏两党间自1956年以来的分歧。9月6日至次年7月14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

那时个人订报纸的很少，每一篇评论文章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时，满城静听。很多人特别是当时的大中学生，至今记得播音员夏青、齐越的打动人心的声音。人们从九评中了解到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特权阶层，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不抓阶级斗争劳动人民会吃二遍苦。

《喻家山风云》写道：在华工校园，九评每发表一篇，都会激起一阵波澜。尤其是第九篇评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被纳入政治学习内容，组织讨论。这篇评论中的两段话引起华工学子心灵震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如果不这样办，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第九篇评论中讲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很多同学抄在学习笔记或日记本中，决心好好学习领会，积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去锻炼自己，争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

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修正主义，开始于1963年5月，全国报刊

¹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25页。

将一系列小说、电影、戏剧批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毒草”。1963年底和1964年中，毛泽东先后对文学艺术工作写了两个批示，提出严厉批评，同时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964年夏，这种批判扩展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

1964年8月，继中央文化部、文艺界各协会及文化部直属文艺单位开展整风后，武汉市召开文艺整风会议，历时三月余，称为“百日整风”。会议对武汉文艺界的估价是：“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没有阶级斗争观点，没有写出好作品，个别人甚至写了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并对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等进行了批判。在“百日整风”过程中，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对中央报刊批判的文史哲作品和论点，也刊登了批判文章。1964年底开始对湖北的一些作家、作品开展批判，湖北日报、武汉晚报、长江文艺、江海学刊发表文章批判京剧《胭脂虎》（武汉市京剧团1961年演出）、禾得雨（本名马立杰，曾任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艺苑漫步》。1965年初，长江文艺、江汉学报发表文章批判姚雪垠的历史小说《草堂春秋》，武汉晚报发表文章批判艾寒松（1953年至1957年在武汉任中南局党校副教育长）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武克仁（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的历史小说《柳宗元》。



20世纪60年代武汉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焦裕禄》照（载《武汉文史资料》2003年第3期）

1963年以来，武汉市各剧团演出现代戏已成为风气。市属剧团以及省话剧团、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从1963年1月至1964年2月上演现代戏，观众共达140多万人次。1963年市属戏曲团体组织17个演出队到农村演出1300多场，观众达130万人次。1964年7月18日，武汉市人委全委（扩大）会议讨论戏曲工作时指出：“戏曲改革不仅是一个文化革命，而且是一个社会革命。这是戏曲工作重大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中，报刊上刊登了大量工农兵的文章。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朱鸿霞¹在武重工人报、武汉晚报发表多篇文章，批判“文艺黑线”，批判“坏电影《舞台姐妹》”，表示工农兵也要拿起笔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朱鸿霞在文革中成为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的一号头头。

党和国家管理的报纸、刊物、出版社放出这样多的“毒草”，人们感到震惊，开始具有对上级、对专家学者不迷信、不盲从的批判意识。大量出版物中的问题被群众主动发现和揭露，同时出现很多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现象。



1966年5月18日《武汉晚报》第3版

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确立新的意识形态，需要确立新的公私关系，需要一个人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与他人。文革前的这一轮思想批判运动，批判方法是由领导机关选定批判对象、划定批判口径，其他人跟风发表批评文章，相关批评对批评对象做不到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未能触及到真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确立新的意识形态，需要确立新的公私关系，需要一个人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自己与他人。文革前的这一轮思想批判运动，批判方法是由领导机关选定批判对象、划定批判口径，其他人跟风发表批评文章，相关批评对批评对象做不到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未能触及到真问题。

全国学习雷锋“公而忘私”、“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精神，对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从各个领域开展的批判，这两个运动文革前

1 朱鸿霞及夏邦银、李想玉，均为文革中武汉工人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文革至今很多文件和文章、书刊写作朱洪霞、夏帮银、李湘玉，皆误。

已经普遍开展数年。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指示“要斗私，批修”，可以看作是对这两个运动的概括和深化。同年10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一指示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概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要点”，要点共六点。第六点把“斗私，批修”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

五、学习毛泽东著作

1958年7月，武汉市委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理论队伍”，在工人中开展通俗理论宣传，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逐步开展起来。

1960年2月，中共武汉市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掀起全党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充分运用报刊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牢固树立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的坚强观念。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



汉口电池厂的工人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载《大武汉新影》）

这次会议后，学习毛著形成群众运动。各单位干部职工成立学习小组，举行学习报告会和学习成果展览，写学习体会，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

艺节目。武汉重型机床厂提出“处处有组织，人人都参加；层层有计划，个个订保证；边学边联系，学用结合好”，五千多工人组织了三百多个学习小组。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从1962年到1966年，学习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有的同学在晚自修后宿舍熄灯时，仍坐着小板凳在走廊灯下读毛主席著作，写读书心得。”¹

武汉城区新华书店从1960年1月到9月发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110多万册，《毛泽东选集》前三卷30多万册。1964年5月，市委批转的市委宣传部《关于1964年干部和职工政治理论学习等问题的报告》要求：对于目前正在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各级党委必须注意加强领导，使之更加广泛、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本年，全市在职干部政治理论学习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为主要内容，并继续学习有关“反修”的文章。职工则选学毛泽东著作的有关内容。当月，



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武汉发行（载《大武汉新影》）

1 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8页。

全国著名学毛著积极分子、解放军某部三连指导员廖初江应省委宣传部的邀请，向武汉地区机关干部、职工五千多人作学习报告。1965年3月，武汉军区政治部主办的《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在武汉展出，历时7个月，观众达50万人次。4月8日，《武汉晚报》开始逐日登载毛主席语录。1966年1月，武汉市委四届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全市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

《喻家山风云》回忆华工师生学毛著的情形：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学毛著的形式主要是政治课+党团支部或同学间自行组织的学毛著小组+个人自学。学习的主要内容，一是学习中国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史，学习毛主席决战决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高超指挥艺术，以及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历经千难万险创建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进一步加深对毛主席的由衷敬佩和热爱；二是学习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 and 艰苦奋斗等教导，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价值观，结合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培养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品质。三是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逻辑思维和工作方法等，指导教学改革；作为工科学生，有些同学还自学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用于指导专业学习，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这个时期的华工院刊，在华工党委有关领导同志的要求和支持下，以大量篇幅连续介绍电工基础教研室、化学教研室学习毛著指导教学改革经验，以及教师朱慧楠、徐辉碧，学生毕传泰等个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事迹；与此同时，院广播台也及时播报师生学雷锋、学毛著的好人好事，有力地推动学毛著活动不断开展。

就学毛著时间而言，华工领导在一次宣传会议上说：“要注意劳逸结合，精简干部的活动和其他会议，学毛著也不要再在午休、星期六晚上进行，一个星期搞一个钟头就行了”。

文革后武汉官修党史认为，本市学习毛著的特点是与技术革新活动、增产节约运动，与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相结合。武汉市的学习毛著运动“对于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社会主义政治觉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全市技术革新和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推

动经济建设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这场运动在1964年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且日益走向形式主义，并伴随着浓厚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负面影响。”

读书学习以带有强制性的运动方式来进行，产生应付敷衍、重形式不重效果、一些人借以谋取私利等现象，任何性质的群众运动都不可避免。老五届大学生和老三届中学生和当时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中，很多人是在认真学习，严肃思考。他们认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以至思维方式、处世准则就是在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形成，让他们终身受益；文化大革命在学习毛著高潮中来临之时，他们无权无势却敢于对强大的官僚阶层造反，凭借的就是已经学得并不断在学的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反右运动以后，一位支部书记甚至一位党员只要他愿意，就能够以“党的化身”自居，声称“反对我就是反党”；群众中出现不同意见，所遭遇的最猛烈的回击也是“反对党委（党支部）就是反党”，这种回击来自当事的领导，也来自群众中的积极分子。

1964年5月，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读毛泽东的书，一些人自然会思考：直接上司说话办事“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最终听谁的话？照谁的指示办事？省市委不是也一再号召“一切工作都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吗？武汉的一位老三届学生回顾六十年代学毛著时说：这有点像新教徒自己研读圣经，直接与上帝对话沟通，无须长老、牧师作中介，不承认神职人员对圣经具有唯一解释权。

文革前的学毛著运动中，敢于批评上级领导的人逐渐多了起来。笔者所知给中央、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批评信的就有好几位，有批评本单位一把手的，有批评王任重本人的，还有批评国家政策的。

1965年底，华工党委扩大会揭露院长朱九思说组织毛著学习小组、张贴毛主席语录、写学毛著心得笔记都是形式主义，“我们不靠这个”，“我就没有写笔记”。参加会议的动力系政治辅导员赵文成、胡成荫、林志雄三人，于1966年2月给王任重、陶铸、毛泽东写信，反映朱九思的上述问题¹。

1966年4月19日，王任重写了一篇文章《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

¹ 参见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一章山雨欲来。

“清理”自己写于1962年的两篇《资治通鉴》读书笔记中的错误，发表于同年5月14日《湖北通讯》。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杨家志当时在咸宁参加四清，看到这篇文章，6月8日给王任重写信，批评他的所谓“清理”“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依然在“散布历史唯心论”，不是“清理”而是“混关”。杨家志在信中说：我“学习主席著作仅仅是开始”，“我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青年，敢说，敢写，敢斗争，错了改嘛，怕什么？”王任重后来说：“他以满腔革命热情给我写了那封信，在信中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严格的要求，我当时应当虚心听取他的批评，和诚恳地感谢他，但是我由于个人主义的思想作怪，拒绝了他的批评，并且把信转下去要在咸宁参加四清的武大同学讨论一下，以便消毒，结果使杨家志同志和同他观点相同的张健同志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我的罪过。虽然当时曾经对地委书记交待过不要斗争，不要处分，但是既然把信转下去了，（对）杨家志同志的打击，我是不能辞其咎的。”咸宁地委把杨家志打成“反革命黑帮”，连续七天开大会批斗，会上宣布开除团籍，清除出四清工作队，回校后学校“把他作为右派分子对待”¹。

文革前，湖北宜昌地区发生“金科事件”，也是由群众批判王任重的“读书笔记”引发。金科是长阳县的一个干部，部队营教导员转业，当时在宜都县搞四清。他和另六人给中央写信批评王任重的“读书笔记”，据张体学揭发，王任重说“这个人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省委秘书长“张华就策划去搞”²。王任重后来说：“金科等同志的受打击迫害，我要负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的。我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对于向中央检举控告我的金科等同志采取打击报复的手段更是违法乱律的行为，我再一次向杨家志同志和金科等同志低头认罪，赔礼道歉。”³

王任重多次把群众写给他的批评性的信件转给来信者的单位。华工赵文成等人写给他的信不是批评他而是批评院长朱九思，王任重将信转给华工党委，同时给赵文成等回信说“你们的精神是好的，我们给你们撑腰”。

1 参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社工总部编《撕开王任重的画皮》（1966年12月1日）第24—29页；王任重《关于本人文革前错误的检查》，载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编《红武测》增刊第8期（1967年9月22日）

2 参见《杨春亭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3日）。

3 参见《杨春亭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3日）。

武钢职工彭绍鹏回忆：武钢修建部技术员段彦彬“在三年困难时期，对国家政策有一些看法。在党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传达后，一时冲动，把他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文章，寄给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王任重上面写了批语，转回单位。从此，他就成了内部监控对象。四清运动一开始，单位就把他抛了出来，作为重点批斗对象，进行多次批斗。”¹

王任重对待群众的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文革初期并有更大的发展。

六、医疗卫生改革

1965年1月21日，毛泽东审阅卫生部党组1月20日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和培训农村卫生人员的报告，批示：“同意照办。”稍后，在审阅卫生部党组1月19日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教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时，在报告中“医疗队应该首先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县，配合运动，为贫下中农服务”一句的“贫下中农”四个字后，加上“及一切病人”五个字。同年6月26日，毛泽东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²。

1965年3月，按照卫生部的要求，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卫生医疗单位组成首批6个巡回医疗队，共188人，分赴孝感、麻城、枝江、襄阳、江陵、建始6个县的农村，开展防病治病，为农村培养不脱产的卫生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8月，武汉地区第一批农村巡回医疗队归来，第二批随即下乡，同时举办了第一批医疗队的事迹展览会。此外，市卫生局所属单位还为农村培训了五百多名卫生员。

1965年9月，卫生部副部长贺彪率领的卫生部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来到麻城。工作队在开展治病、防病和培训三项工作的同时，注重帮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管理，为农民降低医疗费用。4个月来，由163名医务技术人员和卫生行政人员组成工作队在为农民送医送药的同时，以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出一批能做外科、眼科和五官科小手术的卫生技术人员；为14个公社培训了一批半农半医医生，使他们学会了治疗三十多种农村常见疾病和简易针灸；在5个大队树立了管水、管粪和改建烟囱灶的样板，

1 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第3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472、505—506页。

并新建和改建了71口水井。

卫生部工作队下到麻城的同时，湖北省和武汉市所属医疗单位组成多支巡回医疗队分赴恩施、郟阳等十多个县及武汉市郊区。在4个月里，建立简易病床4千多张，进行大小手术3万多例，组织开展饮水改良、粪便管理、改建烟囱灶等群众性卫生活动，培训了四千多名不脱产的卫生员和接生员。



1965年，巡回医疗队连夜抢救被雷管炸伤的麻城县堰头公社社员周本坚（载1965年7月24日《武汉晚报》）

1966年3月6日，武汉晚报刊载新华社武汉5日讯《我省5百多名医务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长期参加基层卫生建设》。报道说，这批医务人员一半以上是在专区和市以上医院工作的，其中有院长、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院校的教授和讲师。武汉医学院、湖北医学院的人员分别在郟阳、咸宁两个专区筹办分校，其他人都分配到缺医少药的地区，有的充实区、公社卫生院，有的到区、公社新建医院。

武汉医学院著名教授裘法祖担任省农村巡回医疗队枝江队副队长，1965年7月17日他在湖北日报发表《下乡巡回医疗札记》，文章分四节：“有了阶级感情”“打破框框的束缚”“要重视常见病的治疗与研究”“加速培养新型卫生队伍”。他写道：“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改变

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不是一次、两次下乡可以完成得了的。因此，我决不满足于这一次下乡，还争取有更多的机会到农村中去，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和提高自己。”



1965年巡回医疗期间，武汉医学院教授裘法祖为农村医护人员上课（载1965年7月24日《武汉晚报》）

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发端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1955年，到1962年，全国农村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达46%。此后调整国民经济，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¹。

卫生部湖北农村卫生工作队了解到，从1958年开始，麻城全县96个公社全部实行了让农民看得起病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坚持了七年。工作队初步总结了经验和存在的问题²。这个约在1966年初形成的重要的总结报告没有下文。

后来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并享誉海外的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还是起源于湖北。1966年8月10日，在距离麻城县四百公里的长阳县，“乐

1 参见曹普《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演变（1958—1984）》，载《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5期。

2 参见张自宽《亲历农村卫生六十年——张自宽农村卫生文选》第25—26页，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这个卫生室的运作方式，写在该卫生室卫生员覃祥官起草的《关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试行农民合作看病的草案》里。1968年11月30日，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拟发表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和《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及编者按，批示：“此件照办。”人民日报12月5日发表了这两份材料。覃祥官原是乐园公社卫生所医生，他深切感受到农民无钱治病的苦痛，主动辞职回村办合作医疗。后来他被称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

七、教育改革

武汉市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57年，一直“采取自愿报名、家长同意的办法”。高初中毕业生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报名下乡形成风气，这是学校坚持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人生观教育的结果。

1957年5月6日团市委开始动员，6月18日990人分三批下到农村。至1963年12月下乡知青达到七千余人，至1965年6月达到两万多人¹。1968年11月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运动开始，老三届学生16.3万人，至1969年2月，12.5万人上山下乡。至1980年，下乡知青达到42.48万人²。

截至1965年8月，武汉市有两千五百多名知青参加新疆建设兵团，1966年6月底八百多名知青赴新疆。1965年12月，一千二百名青年赴云南支援边疆建设。

1958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即在全日制学校的教育制度和工厂、机关八小时劳动制度之外，实行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1964年开始在全国贯彻。1964年10月，市人委召开半工（耕）半读工作会议，制订了试办这类新型学校的方案。12月，市委批转《试办半工（耕）半读工作会议纪要》，并成立领导小组。1965年1月，全市首批试办半工（耕）半读学校34所，并制订了两年发展规划。1965年半工半读的职业技术学校迅速发展，学生

¹ 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1840—1985）·社会团体志》第188—18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² 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1840—1985）·经济管理志》第454—456页。



20 世纪 60 年代初，知识青年在农村（载《大武汉新影》）

达到四万八千余人，高中阶段普高生与职高生之比为 0.42:1¹。

1966 年 3 月 17 日，武汉第一所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正式开学，学校设林学系、农学系、农业机械系、农业经济系，录取人数超过招生计划。录取的学生中，文化水平相当于初中或初中毕业的学生，入学后将读 2 年预科、3 年专科；相当于高中或高中毕业的学生，读 4 年专科。学生在学习期间，边读书，边劳动，边学习，边运用，所需膳宿费、医疗费、生产工具费、书籍簿本费、零用钱，都由勤工俭学、半工（农）半读的收入来供给，学校不能自给，由国家补贴。学生毕业后发给文凭，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可当干部、技术员也可当工人、农民。

新中国教育事业取得巨大成绩，而毛泽东认为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文革前他多次表示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强烈批判态度。

1964 年 2 月 13 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

¹ 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1840—1985）·教育志》第 16 页。

全改变。”

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阅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来信，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¹3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这一批示。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王海容谈话时说：对写“蒋介石万岁”的学生，“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在学习上不要什么五分，也不要搞什么二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五分累死人了。”²

1964年7—8月，毛泽东与毛远新作几次谈话。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教员应该把讲稿发给你们，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阅《北师大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批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315、322页。

2 《和王海容同志的谈话》（1964年6月24日），载武汉钢二司印《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

行。”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后来称为“七三指示”。

这些讲话、批示通过不同的渠道传达、流传到大中学校学生中，每一句话都引起巨大震动。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开始实行改革措施。

武汉市的中学取消了早自习和晚自习，提倡学生自己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原每天下午的第三、四节课改为自由活动，学生可以参加体育锻炼，也可以参加各种兴趣小组的活动。每学期安排学生到工厂、农村劳动两周左右。在武汉一中，动员学生给老师“提意见”，有老师听了学生尖锐的批评哭了起来；学校团委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跳级，帮助这些学生制定学习计划，给他们安排辅导老师。

文革前，全国高校中流传一句话：“学校像教堂，老师像牧师，学生像羔羊。”武汉水院六五级学生岑颖义说：“水院的一些（对学校现状）较激烈反抗者也是这样感受和评估的”，当时他们就有了“对教育体制彻底改革的向往”²。

在武汉水院，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和拥护，激化了同学们对教育体制不满的情绪”。“尤其是‘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这句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同学们对毛主席支持学生造教育制度的反没有任何怀疑，而是认定毛主席与青年学生的心完全是相通的。”

1964年秋，水院党委根据上级指示，“动员开展教育改革”。“老师纷纷到班级与同学‘三同’，共商教改方法，甚至试点让学生登上讲台。每个班推举几个同学和老师组成教改小组，结合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许多老师和学生应用唯物辩证法研讨专业教学，写哲学笔记，学生对理论力学、水力学、土力学这些基础技术课程，用对立统一观念阐述和概括。一些很有激情的教师，有的是部队转业的，有的来自工交战线，有的就是1958年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都对1961年以来学校沉闷的教学秩序、压制中青年教师不满，对‘师道尊严’不满。后来，他们都成为坚定的造反派。”“少数对‘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反感的同学，思想活跃，富于创新精神，最先拥护毛主席关于教育改革的讲话，也最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向了造反。”

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在1966年“五七指示”中说：“学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380—381、507页。

2 本节关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记述，均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一章 赤子——五届大学生群体”。

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中学校学生看到这句话，并不感到突然，因为这句话是毛泽东1964年至1965年关于教育多次谈话的总结。

八、结语

武汉这座城市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深刻印记，这些印记是普通的士兵、工人和市民主动刻下的：1911年10月放出翻天覆地手，武汉成为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首义之城；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江岸铁路工人付出重大牺牲，在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作出杰出贡献；1926年底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武汉，划三镇为京兆区，1927年1月在国内首次收回令国人受辱六十余年的租界，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武汉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被称为“赤都”；1938年成为民气高扬的全国抗战中心。

1966年，这座城市带着历史铸就的性格，走进文革。



毛泽东亲笔题词的二七烈士纪念碑（武汉二七纪念馆资料）

第一编

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

(1966年4月—1967年1月)

第一章 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这一概念，出自毛泽东 1966 年 8 月 5 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提到的“五十多天”，是指 1966 年 6 月上旬到 7 月下旬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单位的文革运动，都是由各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领导，其矛头所向，不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强调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一直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同时各省及地、市党委及时抛出非主流领导干部组成的“黑帮”，不久以后他们纷纷检讨说不经过群众运动急忙抛出“黑帮”是为了保自己。

这五十天的文革运动，被毛泽东痛斥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一般认为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发动的标志。而武汉地区文革的发端，可以追溯到 1966 年 4 月 18 日——湖北省委向武汉大学派出全国第一个教育革命工作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武大工作组组长李衍授 1966 年 7 月总结前一段运动时说：“（1966 年）四月中旬，王任重同志在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就点起了武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火焰。”这句话也出现在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1966 年 8 月 29 日印行的《武汉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介》中。这份小册子印了数十万份，向全国散发。

第一节 批判“武大三家村”¹

1966年4月10日，“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在广州开始举行。13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讲话中提出要在中南地区搞一个“有权威的、有影响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立面”来打，并点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和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刘节的名。其后，陶铸与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18日，以湖北省委名义派出的全国第一个教育革命工作组进驻武大。

这个工作组的首要任务就是整李达。李达虽是武大校长，但武大师生都清楚，他在武大并不“当权”。戚本禹1966年11月接见武汉造反派学生时说：“李达是不是当权派？不是吧？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吧！”²

4月21日至23日，王任重在武汉听取武大哲学系助教陆舒端关于业已收集到的李达等人材料的汇报，指示陆将汇报材料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语，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



1963年李达为哲学系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讲义（网络图片）

1 本节的编写，参考了如下资料：王炯华《李达评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炯华《李达在武汉大学的最后岁月》（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造反有理》报编辑部编印《武大“三家村”案——陶铸、王任重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大阴谋》（1967年6月）。

2 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谈话（1966.11.18），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陆舒端在奉命写成的这封信中，揭发李达 1956 年重建武大哲学系的目的是“以此为据点与主席思想唱对台戏”，“通过编书、学术讨论等方式”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幌子，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黑货”。“李达所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一所反毛泽东思想的据点，所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风，都是从哪里吹出来的”；武大哲学系的教师是“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打手”。

陆舒端的信还揭发李达与武大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党办主任牛永年之间的“黑组织关系”，说他们“狼狈为奸，组成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核心，李达是这个核心的王牌”，“朱、何、牛利用李作王牌与中央、省委相抗衡”。

25 日，王任重任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讲到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问题。王任重说：“这次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是知识分子”，要在知识分子中抓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

三天后（28 日），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是省委在文教界抓右派的“战斗动员令”；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随后，在陆舒端组织下，正式形成《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由陆舒端等三人署名。

5 月 9 日，王任重将这份材料上报中共中央时，附信给总书记邓小平说：“关于李达的揭发材料一份，我加了一点按语。请审阅。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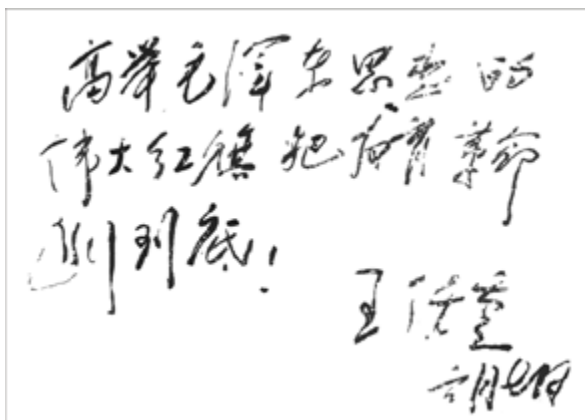
邓小平口头通知王任重并批复湖北省委“同意任重同志的意见”，指示批判李达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党内进行批判，第二步在学校进行批判，第三步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

5 月 12 日，陶铸在中南局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19 日，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陶铸对批判李达“三家村”作了部署，同时检讨自己 1962 年春的一次讲话：“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

12日，武大工作组召开全校动员大会，号召“彻底揭发李达的反党罪行”，再次强调要在武大抓右派。此后，武大连日召开此类大会小会。

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由数学系总支副书记、省委工作组党委成员崔建瑞传达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长篇报告，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

庄果在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武大三家村”：“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6月7日，王任重为武大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而五一六通知已经提出当前开展的这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6月10日，王任重任武大说：“上下左右一起烧。”此前李衍授说过：“不要限制群众，什么都可以搞，先来一个大暴露，再斗李达黑帮。”¹

13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向社会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湖北日报第一版头条刊登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下半版以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刊出报道。报道说：“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

¹ 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

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武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复地进行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激烈的斗争。”第二、三版则发表了武大师生批判武大“三家村”黑帮的大字报、文章。

14日至16日，省市报纸、电台集中报道全省、全市“人民以强大革命声威支持武大革命师生的斗争”、“坚决支持武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报纸在“愤怒谴责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滔天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一批大字报。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导：“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武汉锅炉厂职工王光照回忆当年去武大“声援”的情景时写道：

6月13日下午4时许，厂广播站广播了厂党委、工作队党委联署的紧急通知：全厂注意！全厂注意！全体职工立即以科室、车间为单位，到厂前广场紧急集合，参加重要的社会政治活动。各支部和各分工作队马上组织好职工参加，除特殊情况，一律不准缺席。这个通知就是冲锋号，全厂职工迅速地集合在广场，窃窃私议。王心学队长铿锵有力地简单动员后，工人的队伍像抗洪抢险般地步行奔向武大，声讨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三



1966年6月13日，声援武大揪出“三家村”现场（载《大武汉新影》）

反分子李达等黑帮。武大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李达等三人的名字倒着写，并且打上了红叉叉。漫画极尽丑化、夸张，工农兵三只硕大的拳头，紧紧抓住“三家村”成员的细脖子，恰似抓住张皇失措的小鸡，工农兵的孔武有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这些参加声讨的人不知道李达等人的胖瘦高矮，他们是如何“三反”也不晓得，只是随着巨大的人流，围着李校长住的小楼，有节奏地呼喊那年月的战斗口号。这些口号和领呼人，据说全是工作队严格安排的。我生平第一次见证并参与了“运动群众”的宏大现场。我厂示威游行的队伍蹒跚蠕动，后面武昌造船厂、六机部安装公司的队伍一个劲地催：武锅的走快点。天哪！这么多人往哪走啊？又如何走得快呢¹？

6月16日以后，报纸、电台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在持续中。24日的《武汉晚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署名为“武大数学系战斗小组”的文章《一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迫害——控诉武大的“三家村”黑帮一九六五年在数学系的罪行》和《湖北日报》社论《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延续到30日，李达被公开点名。当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在头版《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通栏标题之下，同时发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两篇署名文章和湖北日报的“编者按”。“编者按”说：“李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长期以来，他挂着‘老党员’、‘老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摆出‘名流’、‘学者’的架子，利用他窃取的领导权，一贯地、系统地、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和推行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阴谋把武汉大学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武汉大学有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李达是他们的大老板，保护人。武汉大学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束缚，李达是这个镣铐的制造者。武汉大学的‘三家村’黑帮阴谋篡夺学校的领导权，李达是这个黑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他们阴谋复辟和革命师生反复辟的斗争中，李达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反动的‘学阀’面孔，残酷地压制和打击革命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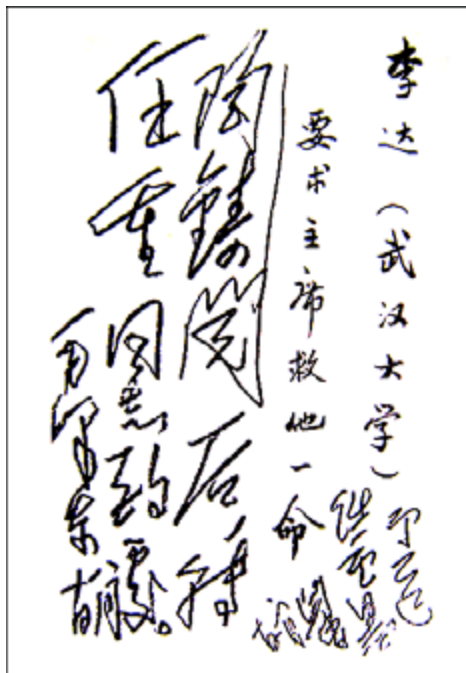
6月28日至7月17日，毛泽东在武汉。7月1日，王任重拟向已经

¹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0—11页。

来汉的毛泽东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这一段时间，王任重每天都能见到毛泽东，但并没有向毛泽东呈报、请示李达问题。17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离开武汉，当晚王任重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次日发出。7月19日得知毛泽东在汉游泳的李达写信请毛泽东救他一命，要求秘书将信送毛泽东处。秘书将信交给工作队，工作队10天以后改换信封以机要文件寄中央。

8月4日，邓小平拟定的批判李达“三步走”计划的“第三步”开始实施——“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当日，在陶铸的关注下，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的一面红旗——记武汉大学数学系半耕半读试验班同李达、朱劭天等黑帮作斗争中成长的经过》。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没有看到李达原信。毛泽东在这张条子上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批示：“即送任重同志。”这些批示没能救李达一命，重病的李达仍然无医无药，8月24日去世。



28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同时发表署名文章——《揭穿李达反共反人民的历史》，说李达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可耻的叛徒，反革命围剿的急先锋”、“反共媚日的民族败类”、“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帮凶”、“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地主分子”。

9月5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批判李达的一组文章。9月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一组工农兵学哲学文章，其中，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罗田县北丰公社四大队党支部书记丁凤英《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一文说：“李达指的是我的名，但骂的却不是我个人。他骂的是我们广大工农兵……李达这样疯狂，我们不怕！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一个李达，就是一千个李达，一万个李达，也不在话下！”

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所涉及的远远不止李达等几个人。

5月10日下午，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系教育革命工作组组长王师程宣称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党支部是“国民党支部”，是“反党活动的黑司令部”，立即解散。研究室人员除一两人外，都被打成“黑帮分子”，哲学系主任余志宏、副主任李其驹和系内一批教师被打成李达“三家村”的“黑干将”、“黑爪牙”。

武大党委15名常委，11名被打成黑帮；在武大1340名教职工中，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有214名，还有准“黑帮”即内定“黑帮”，也就是已经准备了材料或被抄家、减薪、批斗但还没有正式冠以“黑帮”之名的88名，共计302名，占教职工总人数的22.5%。还有一些学生也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分店”。

第二节 省、市委抛出批判对象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运动一开始省委抛出武大“三家村”和曾惇、陈一新，市委抛出程云“黑帮”，少数派批判说，这是阴谋，问题不在于这些人该不该打倒，问题在于省市委这样做是“运动群众”，一个一个的“三反分子”由当权派抛出来，还有什么必要发动群众投入文化革命？

当时各级党组织大多抛出非主流领导成员、政敌、圈外人、“死老虎”等让群众批判，表明自己是紧跟中央的，证明本部门、本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取得伟大胜利”。武汉医学院抛出的副院长殷传昭，是部队转业干部；华中师范学院抛出的教务长陶军，早就被定为“漏网右派”。武大“三家村”成员之一朱劭天，一年前已调离武大。湖北大学“三家村”的三人早已不在学校：原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光斗，1964年四清运动中被揭发批判，当年11月失踪；原校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兼人事处长辛永信，四清运动中下台，当时下放在咸宁；另一人两年前调离。8月28日湖北日报第一版

刊登报道：《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湖北大学揪出了李光斗、辛永信黑帮》。

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的顾建棠回忆：“6月中旬开始，长办党委先后把副总工程师周尚，宣传部副部长陈亮，留苏副博士、长办科学院工程师陈济生，组织部干部科汪镇国，勘测处副总工程师李元亮，政工科长冯志运，计划处冯明清等当作文革对象抛出来，在各自的办公室内外，用大字报揭发他们的‘罪恶’，以此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时任政治部副主任兼长办团委书记的黄世忠指示我，分批组织各单位的团员、青年去声讨、批判这些‘牛鬼蛇神’。”“7月23日至30日，我又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和副主任黄世忠指示我，把武装民兵连集中起来，用大字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田海燕。批判的材料由组织部和纪监委提供，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田海燕“是只‘死老虎’。林一山和长办党委此时把田海燕抛出来，是为了转移斗争方向保自己。”¹

一、市委抛出“程云反革命黑帮”

1966年6月17日，武汉市委召开全市文化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号召全市文化工作者“彻底搞掉以程云代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彻底粉碎以程云为首的反革命黑帮”。



1966年7月6日，武汉五千工人集会声讨“程云黑帮”（载次日湖北日报）

¹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8、29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14年版。

此时程云已经被“粉碎”近两年了。武汉市委1964年8月发动的武汉文艺界“百日整风”中，程云受到批判，并被撤销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职务，下放工厂劳动。

7月6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开始点名批判程云，认为这是继揪出“武大三家村”后“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重大胜利”。

同日，武汉市委召开文化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会上批判了以程云为首的“反革命黑帮”和市文联副主席、“右派分子”武克仁。程云“反革命黑帮”成员还有市文化局局长孙川四、市文联副主席于亚声、程云妻子莎莱，牵涉同为著名演员的武汉京剧团团长高百岁和武汉汉剧院副院长吴天保。1978年9月武汉市委作出《关于对程云等同志被定为“反革命黑帮”进行平反的决定》，讲到将程云等人定为“反革命黑帮”的原因，是“当时的市委没有识破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阴谋”。

综合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当时的报道，程云的“罪行”主要有三条：一是在政治上，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紧密配合，极力宣传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自由”，鼓吹阶级调和，抵制反帝、反修的斗争；二是在组织上，一面排挤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面与文化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狼狈勾结，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黑帮；三是在文艺上，竭力推行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的文艺路线，使文艺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二、省委抛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惇、陈一新

1966年6月初王任重就决定批判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惇。8月29日，曾惇被湖北日报点名批判。此前省委已召开省直机关声讨大会，说已查明“曾惇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狗，是武大‘三家村’黑帮的后台老板，是省、市文艺界程云黑帮的总指挥，是前中宣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线在湖北地区的总代表、总头目。”省委负责人在会上宣布撤销曾惇党内外一切职务。曾惇何许人，李达何许人，说曾惇是李达的“后台老板”，当时心存疑问、不以为然的有人在。

9月1日，武汉市召开“声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惇大会”。对曾惇的集会声讨、发表文章批判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

9月6日，省委常委、副省长、政法党组书记陈一新被公开点名批判，



1966年8月29日，数万群众走上街头声讨曾惇（载次日武汉晚报）

被指为“道道地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典型的新的贵族老爷”。8月19日省委已召开省直机关的声讨大会。省长张体学代表省委、省人委宣布罢陈一新的官，责令他彻底交代问题。

省委对曾惇、陈一新的公开批判，发生在少数派“炮轰省委”的高潮中。

文革前，湖北省的中高级干部主要有三种来源：以王任重为首的南下干部、以张体学为首的新四军五师干部、地下党干部。曾惇解放前夕任武汉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一新是王明（陈绍禹）的远房弟弟，抗战期间在延安当过王明的秘书。

第三节 “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整群众

武汉地区6月的文革运动，按照王任重及湖北省委的规划，“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省委于6月8日向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和省属文化机构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10日，武汉市委向30所完全中学、106所初级中学、武汉师范学院、市文联、市杂技团派驻工作组；随后，省市委向武汉地区的厂矿企业派出工作组。

6月初，省委集训即将派往各院校的工作组（队）组（队）长，6日至10日，王任重作了三次讲话。他说：“文化革命是全党的事，工人、农民的事，运动的打击锋芒主要是知识分子。”“学生中极其反动的要斗，猖狂的要交给农民管制。”“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诬蔑党的组织，丑化党员、

团员、积极分子和党的领导人”，就划为右派¹。

6月8日，王任重在全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将1957年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文化革命运动的指导精神。

王任重后来说：“在6月10日前后一次中央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分子’，这个想法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是用1957年反右斗争的老经验来指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的。”²

6月上旬，在学习五一六通知的武汉市委扩大会上，宋侃夫说：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化、教育部门和企业里的财会、技术、业务部门，是整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³。

6月18日武汉市委发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当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说：“以左派为骨干，把革命的阶级队伍组织起来。对群众队伍要进行阶级分析”。“首先把左派划出来，作为依靠力量。……然后把右派找出来，是孤立和打击的对象。剩下的就是中间派，是争取、团结、教育的对象。”⁴

6月23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在一个会议上说：“有些学校反击了，不要反击过早，反击过早，坏人就会跑掉。……先让他们放。今年牛鬼蛇神放得不多，教师放得不多。”⁵

26日至28日，省委集训将要派到高校参加工作组的工人。许道琦说：“学校的文化革命有两个阶段，头一大段就是反右派，夺取领导权；第二大段搞教学改革，彻底改革教育制度。”⁶

文革一开始，市委组织部长、武汉市四清工作总团文化分团团长沙辛甫

1 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刘记叭儿狗王任重简介》（1966年12月，铅印传单）。

2 王任重《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来——检查、交代、申辩材料之四》（1967年3月21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3 陆天虹《打倒王、宋反革命联盟——揭穿王任重、宋侃夫长期掩盖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真相的滔天罪行》，载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3页。

4 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1976）》第796页。

5 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6 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在所属各工作队队长会议上说：“这次全面鸣放，要‘引蛇出洞’，老右派有经验，不容易引出来，新的没有经验，好引，要尽量让大家放，越乱越好。”6月19日辛甫在市文艺界文化大革命代表会上，动员上下左右一起烧，挖程云黑帮的爪牙、黑线、黑根，要“斩草除根”，“文艺界可以不受比例限制”¹。

7月3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常委的信（后被称为“七三指示”）中说：“大暴露好得很，差不多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引蛇出洞好打，是还击的时候了”。“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这样才便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些人，有的是学校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这些人），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²王任重说这封信“毛主席看过了，没有意见”。对王任重的这一说法，张体学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他利用毛主席的崇高威信，欺骗干部，推行他的黑货”³。

王任重在这封长信里明确提出“反右斗争”这一概念，通篇都是围绕普通群众中的“左派”“中间派”“右派”展开对文革运动的部署。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8月25日，刘真在北京见到他，“他还念念不忘‘反右派’”。王任重还对刘真说：学生中右派控制在百分之以内⁴。

王任重在这封信里提出的“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和9月初在清华大学提出的“秋后算账”，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让武汉地区的少数派（后来称造反派）吃尽苦头。文革期间造反派可以谅解直接出面打压他们的张体学，但一直坚决要打倒王任重。

7月6日，省委常委开会讨论王任重7月3日的来信，王任重说：“作为右派分子斗争打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学生中搞百分之一。武汉市大专学院五万人，合起来才百分之一四，也许百分之二。中学生一般的不划

1《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0页。

2《王任重给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一封信》（1966年7月3日），载武汉大学长征公社农奴战斗队1966年10月25日油印传单。

3张体学《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载1968年4月24日湖北日报。

4省文革办公室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走访刘真同志》（1967年1月14日）。

右派，毕业班特别突出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当右派打。干部、大学中要反右派。……相当于高中的按高中办，高中三年级，少数特别反动的要反右派，其他的是反革命分子按反革命分子办，是流氓按流氓处理，该逮捕的逮捕，该开除的开除。工人里一般的不搞反右，是反革命按反革命办，是贪污盗窃按贪污盗窃办，还有一种坏分子。……按一九五七年反右的规格，是什么按什么处理。各学校、机关把左派组织起来，注意保卫工作，注意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行凶杀人，负责监视的要拿着棍子”¹。

按照王任重七三来信的精神，省委7月7日发出《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革命运动的意见》。王任重七三来信的重要段落，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这个省委文件中。文件指出，“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以后”，“转到以清思想为主”。因为“不仅中间派有错误，不少左派也有某些错误观点”。清思想“采取整风的方法”，即“领导带头，左派带头，洗手洗澡，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按照王任重和省委关于文化革命的部署，群众中的右派要反，群众中的中间派、左派也要整。

6月1日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发布，6月8日开始工作组陆续进驻各单位，首要工作就是召集“左派”开会，对本单位所有人按左中右“排队”。针对具体人和事的大字报开始代替表态性的大字报，有群众自发写的，更多的是工作组和党组织布置“左派”写的。自发写的大字报只要涉及主要领导干部，立即遭到各种形式的打压。“左派”的大字报一般是翻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老账，揭露“落后分子”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很多“左派”并不知道的材料，由党组织提供；当事人自己不说谁也不知道的事，出自他们“向党交心”²时的自我交待。

水院发生抛出“交心材料”而致人致命的事：

张廷英老师，1963年从苏联留学回国，曾经诚恳地向组织交心，承认自己对苏共有过模糊的认识，对修正主义有过幻想，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

1 《王任重、张体学在湖北省委会议上的讲话——湖北省委常委讨论王任重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的一封信》（1966年7月6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2 1958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4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引导群众，自觉交心》，这一运动随即在全国工商界、文教界普遍开展。此后的历次运动如1965年“学雷锋”运动中都开展过“向党交心”。个人“交心”材料被各单位党组织保存下来。

1966年6、7月，他的交心材料被院党委和工作队抛出来，把他作为“修正主义苗子”来批判。在有组织的整墙大字报的围攻下，他数次找工作队党委申诉遭拒，加上他的妻子无法承受高压而反戈一击，揭发他在家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于是他在绝望之中独自进入办公室，用刮脸刀片割开颈静脉自杀，血流满地，惨不忍睹。他成为水院最先的自杀者¹。

湖北大学法律系专案工作组8月15日公布《关于杨清桂问题的初步材料》（杨清桂为该校伙食科副科长），这份材料的“说明”第一条写道：“关于杨清桂的一系列反动思想的材料，均是杨在58年前后向党交心，或学习文件时思想检查的底稿，有些是‘四清’运动中自我交待的。”

市二十八中六七届高中生刘中秋也讲到“交心材料”：“舒先生和其他老师的一些所谓政治、思想问题，学生怎么会知道的呢？这是因为校方的提供或‘泄露’。校方如何掌握这些情况的呢？原来，当时有一种官方倡导的活动，就是‘向党交心’。本来，向党组织反映自己的一些想法，求得党组织的指点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未尝不是好事。党组织也是这么讲的。我校普通教师都把自己的各种想法写在材料纸上，交给了党总支。”²

可能是受到北京揪出邓拓三家村、湖北揪出李达三家村的启示，各单位工作组都热衷揪“三家村”，人数达四人就称“四家店”，再多就叫“反革命集团”。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系学生党支部的三个支委都是调干生，一向被系党委认为“不听话”，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三家村”。后来又整支部里另一个党员调干生，“就把他们一起称之为‘四家店’”³。

6月6日，王任重之子、武昌实验中学初三学生王三宝和另三个同学贴出该校第一张大字报《我们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指向教师，说武汉市的教职员中百分之四十出身于成分不好的家庭，各校学校主要领导人出身不好的达到百分之四十八。柳英发回忆：大字报说实验中学的三位青年教师高宏、廖起蜀、张庆圭是“三家村”，这三位教师当即被关进一个小房间，还强迫他们将头部伸出窗外“示众”⁴。

1 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84页。

2 刘中秋《1966年6月、8月批斗老师》（网文，2011年）。

3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4 2017年4月笔者访谈武昌实验中学六六届高中生柳英发的记录。

6月中旬，武汉一中校园里贴满了针对教职工的大字报，个人历史、个人生活上的“问题”“污点”被公之于众的老师们顿时在学生面前抬不起头。一天，英语教师李德辉原工作单位——市新华书店的几位“左派”，来一中贴出大字报，揭露李一些不检点的言论并上纲上线。当天工作组召集全体教师开会，没有通知李德辉，几个小时后李德辉跳楼身亡。一中工作组长、市教育局副局长刘建国当着围观师生的面，指着口吐血沫、尚未咽气的李德辉说：“现行反革命！”¹

武汉测绘学院六一级学生杨道远回忆：6月开始搞文化革命，四清工作队就在学生中排左中右，打“右派”、抓“小邓拓”。武测党委第二书记张肇翼保护学生，据理相争，被张体学定为“黑手”、“右派”，并对其进行批判。测绘专业在国民党时期归属军队，有点资历的教师都有军衔（在武测当时的教师中有国民党少校、中校，还有两个少将），这些有国民党军衔的教师都定成历史反革命，进驻武测的工作组矛头对着普通干部、教职工，抛历史档案材料，把一批老教师、教授打成“黑帮”、“牛鬼蛇神”，批斗28人，被逼自杀6人。

湖北大学六五级学生杨胜利回忆：文革一开始，“学校开始布置在学生中抓反动学生，政治辅导员们空前地忙碌了起来。……全校（或全系）召开了一次批斗大会，对一个姓龚的学生进行了批判，原因是这个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他企图为他的家庭出身翻案。这是一个信号，学校开始收集整理学生的材料，着手在学生中划分左派和右派。我的两位高中时的同学，一个是统654班的孙似虎，一个是计651班的龙诗易，出身都不错，从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学生干部或团干部，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分别都被他们的政治辅导员划为假左派真右派或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被悄悄地收集整理了材料。”²。

湖大工作组组长曹金祥在各班核心小组长会议上布置工作，核心就是“反右”：“根据当前的情况，要积极准备，很快转入全面的反右派的批判阶段……大致是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底为反右斗争，八月底基本结束。这一阶段，是集中力量，反击右派，这一点在思想上要明确。”“搞了李光斗的问题，紧接着就把各系的右派拿出来搞。学生中的右派，放到最后

1 武汉一中六八届高中生余德亨目睹。

2 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第二章 风雨初袭”。

搞。”“左派中还有不纯的现象，也还有的左派没有组织起来，要重新审查。对于右派，这次跳出来的就抓，没有跳出来的就挖，要挖得准，挖得深。”¹

武汉三中工作组组长陈某（市法院刑庭庭长）在大会上说：文革就是四清的继续，方法与四清一样，群众之间背靠背、面对面揭发“三反言行”²。

7月上旬，辛甫对市京剧团工作队说：“京剧团一九五七年在×××领导下反右派很不彻底！”“文艺队伍很复杂，要彻底清理”。京剧团工作队在群众中搞“追根”“翻箱倒柜”，搞得人人自危³。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在“左派”会议上多次强调：目前的形势是省委领导所说的“1957年加1958年”。水院党委对文革的理解，代表了文革初起时各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普遍思想。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赵抱一也说：“这次运动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继续。”⁴

水院党委副书记张蕪承在讲这句话时没有发挥，也未解释。水院团委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张建成当时的理解是：“右派分子将利用文革之机向党进攻，我们要有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所以要摸底排队、整材料，以备反击右派时使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后，第二年开展向党交心运动，人人过关，交待自己的思想活动，特别要说清在右派猖狂进攻时的思想与态度。这样估计形势是要告诉左派，要立场坚定，在运动中少说话，多观察动向，准备反右派。”

水院党委在工作队进驻前就布置“左派”抄录“有问题”的大字报，对所有学生进行摸底排队，划分“左中右”。“对有问题的人，要整材料。平时的言论、行动都要写入材料中，可以从‘四清’运动中‘割尾巴’时自己的交代材料中找有用的东西，以便下一步运动需要时用。”“在排队时，要分院重点对象、总支一级的对象。要控制人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学生每个班级在3个人左右，则全院在250人左右，大约占学生总数的8%。”

6月14日晚，水院党委、各系总支召开的一连串“左派”会议的情况传播开来，情绪激动的千余学生聚集，要求一系总支书记出来澄清，在

1 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23—24页。

2 参见夏家保《蝉鸣录——八十回眸》第263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夏家保文革时为武汉三中教师。

3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李之三》，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1页。

4 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4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场“左派”学生说写大字报揭露此事的同学是“造谣”。同日晚，“左派”学生抄大字报时谈论“反右”“秋后算账”一事，引起另一处学生聚集。随后，听到“左派”谈论抄大字报是为“反右”做准备并予以证实的蒋继清同学被“看管”起来，班核心小组（原班团支部）要他“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站出来证实院系“左派”会议情况的郭明正，本是班核心小组副组长、贫农子弟，与同系学生任乾健一起被打成“任一郭反革命集团”，而写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任乾健与郭明正素不相识。王任重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编《文化革命动态》上看到郭明正等的情况后批示：“此种人应拘留起来，几个最凶的右派还不打击一下吗？”“水电学院这些坏人已经出来了，这里应该反击了！把这些坏分子的真相公布出来，然后看管起来。”¹ 7月17日，水院工作队党委召开批判“任一郭反革命集团”暨公捕“杀人犯”郭明正大会，省公安厅当场逮捕了被诬为“杀人未遂”的郭明正（关押108天后释放）。

除了“任一郭反革命集团”，水院学生中还揪出一个“徐海亮—晏成禹反党集团”，党委副书记张蕪承在批判会上说“徐海亮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当时水院有三个系，这两个“集团”分属一、二系，三系的“反击”对象是学生李光文，罪名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极端自由主义”。这三个“反击”对象是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确定的，6月17日由工作组传达。

武汉水院党委认为文革是又一次1957年反右；6月11日进驻水院的工作组发动大揭大批，目的是让右派自己跳出来。7月9日，按照王任重的指示，省委副秘书长刘真率领工作队进驻水院，取代原工作组领导水院运动。刘真说：“我是带着‘反右’的任务来的。”一周内，全院公开点名批斗的师生达一百多人。五十多天“反右”的结果是：被迫自杀二人，逮捕一人，揪出学生中的“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各一个，点名批判一百多人；内定“右派”两百多人，被看管三百多人；郭明正所在班一半以上学生被打成“右派”。封了一批“左派”，斗了一批“右派”，此后势不两立、争斗多年的保守派、造反派就是这样开始形成²。

1 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一二·二六革命造反团《王任重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铁证——揭露王任重在〈文化革命动态〉上的一些黑批示》，载1967年2月21日湖北日报。

2 武汉水院文革初期的情况，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三章《“五十天”》；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文革篇·一、

6月11日,工作组进驻华中工学院。“进校不到十天,就内定了学院内有三百八十三人为右派”¹。

胡成荫当时在动力系任政治辅导员,2008年他回忆:

六月中旬,我按省委工作组的安排,到学校东边和西边的学生宿舍大字报栏,到各系实验楼的大字报集中地区,认真看大字报,并简单记录以利于分类归纳问题。我发现大字报的指向都是一般群众,一个30人的学生班揪出的小爬虫、小“三家村”有六七个人;警告×××孝子贤孙,要老实规矩夹起狗尾巴;一些平时敢于讲话、意见比较多的学生,就是什么“喻家山夜话”小集团,这是套用“燕山夜话”来扣在学生头上的大帽子。在实验楼的大字报中,除了上面这些当时的时新帽子外,更多的是教职工们不堪的历史和往事,例如三青团的忠实走狗、刮民党的奴才……。这里很多都是人家交代的材料,是解放后历次运动中对党和人民忠诚交代出来、已经做了历史结论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一般问题。我一面翻阅记录,一面翻报纸上刊登的中央首长讲话,周恩来总理说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指向那些反动的学术权威,使我们国家不变色。……这是当时湖北日报刊登得明明白白的。可我们学校内这大量的大字报的矛头,哪里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哪里是指向反动学术权威呢?

工作组组长王耀(襄阳地委副书记)曾交代胡成荫“发现问题随时反映”,于是胡成荫向王耀汇报说:“大字报很多,轰轰烈烈,每个学生班点名上大字报的学生有八九个,占学生班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教师中各教研室点名批判的人数和学生班的比例差不多。这种情况和……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的指示精神不符合”,王耀打断胡成荫说:“你懂什么!现在是反右的前哨战,华工的右派多得很”。

6月21日,王耀在师生代表会上说:“干部、教师、学生中都有右派,要揪出来反击。”“学生中为什么不整?五七年不是整了?读大学反党反社会主义要他做什么?”“再发展一周或三天,就和五七年一样了。”工作组整学生、学生斗学生就这样开始了。29日,赵文成、胡成荫等八人贴

文革初期”,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

¹王海峰《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一个老三届的回忆录》第3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王海峰为华工附中六七届高中生。

出大字报《对当前运动的几点不同意见》说：当前我院运动“矛头对向群众”，不符合二十三条及人民日报社论精神，不应该“把战斗小组一律取缔”。王耀对赵文成说：你是真共产党员，还是假共产党员？你们想要我们按你们的办法干革命办不到，你们想要我们抓住一个朱九思（院党委书记）而放走学生中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办不到。王耀对学生干部说：“对赵文成大字报的态度，是区别左中右的标志之一”。赵文成和赞成他的人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野心家”，遭到成千上万张大字报围攻，被盯梢、监视。赵文成和支持他的政治教研室教师张汉卿被撤掉院机关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职务。

华工的学生斗学生，从6月23日延续到7月26日。7月下旬，院工作组布置“落实材料，准备斗争”，被系统整理材料的有380多人。在三系，工作组提出口号：“上下一起扫，把水搅得浑浑的，胖头鱼、泥鳅、蛤蟆一起抓。”该系五年级191人，被“揭发”的有38人。工作组成立直接掌控的保卫小组，其职责就是监视一部分同学。据后来少数派抢出来的所谓“黑材料”显示：这些同学每天穿什么衣服、干了什么事、开会时是否鼓掌都有记录¹。

华工工作组在整学生的同时，对干部和教师实行“打击一大片”。红司（新华工）反修兵团调查小组《省委工作组在我院推行刘邓干部路线的调查报告》²记载：

工作组到处散布说我院是“两面政权”，说“学校党委有反革命集团”，“党委烂了，各级党组织也烂了”，“从院到处、系直到科室都有黑帮、黑线”。说×××系的党支部“除一两个人外，都坏透了”，“要是有什么情况，你们党员中有几个能跟党走？”说××教研室“找不到一个好人”，××科“是清一色的坏人”等等，甚至连过去受过表扬的积极分子都被说成是“朱九思的红人”，说“从前的红人模范都是今天的麻烦”。工作组故意耸人听闻，在群众中造成“干部都烂掉了”的印象以后，于是进而提出“上下左右一齐扫”，“大的小的一齐扫，先扫大的，后扫小的”

¹ 华中工学院文革初期的情况，参见东方红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华中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编印《湖北省三级干部必读材料》（1966年11月6日），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三章引入歧途。

² 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编辑部《新华工》报第21期（1967年5月18日）。

等口号，还说“当权派没有几个好家伙”，“要把总支书记以上的干部全部换掉”(当时省委也确实准备派几十名干部来我院实行领导干部大换班)，说“有的单位要全面夺权”等等。

工作组还把老师都下到学生中去，并向学生“交底”，挑动学生整教师。据动力系统统计，全系一般教师中被揭发47人，占22%。307教研室教师被揭发的达12人，占59%。303教研室教师被揭发10人，占34.4%。

武汉锅炉厂职工孟运通6月13日晚写出一张大字报，批评陶铸在广州的一次讲话是制造清规戒律，不准群众革命。第二天上午孟运通被厂保卫队关押，持枪看管。在厂工作队发动下，“空中的广播、地上的批判专栏、地面的标语组成了立体作战的强大火力网”。

同时，“工作队、厂党委出于十七年以来的思维惯性，根据省、市委抓右派的精神，把厂里职工划成左、中、右，调动可以信任的骨干分子，密切注视可能的捣乱者的一言一行，搜集挑战旧秩序、危及当权者利益的那些人的所谓材料，动员大家背靠背地检举，真是弄得满厂风声鹤唳。”三位普通工人因此自杀。机动科工人谭文元“因为家庭成分问题，被工作队找去谈话，要他挖思想根源，交待反动言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谭文元顶不住压力，上吊自杀。“阀门车间一位老工人……也是工作队找他谈话，要他交待历史问题和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行，声言要召开车间大会批判。他害怕了，……上吊自杀”。“不久，三一四车间一位上海籍老师傅因恐惧而自杀。”

工作队在机动科抓出一个“三家村”：一位是厂副总机械动力师，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位是出身不好的女技术员；一位是从事俄文资料翻译的技术员，一贯被认为“只专不红”。为找到证据，积极分子去俄文翻译的房间“撬抽屉、翻皮箱，从他的私人信件中找问题，凑成材料，断章取义，整理成‘黑话录’。这种非法的鸡鸣狗盗的行径干了两次。”¹

四机部中原机械厂是宋侃夫抓的点。早在1966年5月，宋侃夫指示驻厂工作队：“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是搞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中原机械厂技术队伍很复杂，排排队，准备几个尖子人物搞一下，把技术队伍好好整顿一下。”6月12日，该厂群众给

¹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1—16页。

工作队贴大字报，工作队组织围攻，宋侃夫说：“反击太早了，还应该让他们多暴露暴露才好”。7月，宋侃夫认为蛇已引出洞，指示工作队：“运动向纵、深、宽方向发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哪里有问题就扫到哪里，上下左右一起扫”。以对工作队党委的态度为标准，二十天左右“扫了”三百多人¹。

文革初期，所有人的所有举动，都必须按照党组织和工作组的统一部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否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6月11日，一冶第一子弟中学教工团支部书记管典芬和一位学生干部召集部分团支部书记开会，认为校领导捂盖子、定调子，阻挠学生写大字报，决定成立“行动小组”，自己组织起来投入运动，同时派代表到省委反映学校情况。这件事被校党支部汇报给一冶党委，一冶党委认定为“反革命事件”。第二天，一冶党委请示省委得到同意，向一冶一中派出近百人的工作组。工作组成员进入各教学班控制学生，教师集中学习，每个人的发言都被记录下来。工作组查阅教工档案，结合现实表现分出左中右。同时宣布管典芬等人是“现行反革命”，发动全校批判²。

1967年2月省直机关造反派揭发：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编《文化革命动态》反映一冶一中有师生自行成立“革命行动小组”，王任重批示：“这不是反革命吗？坏人暴露出来，好得很！”“明令宣布解散行动小组”³。

6月13日，武汉地区的报纸、电台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的消息，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人胡国基当天自发写大字报要求前去声援，厂里很多人在大字报上签名。厂工作组立即抄录大字报和签名者名单，找签名者一一谈话，说胡国基的大字报“有反党的倾向”。随后大多签名者将自己的名字划掉或撕去，其中有人贴出大字报声称自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工作组组长对胡国基说：“你这种自发行动是党所不允许的，你是在煽动闹事。”工作组开始审查胡国基，公布了他的档案，发动全厂职工批判他，厂里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反革命”、“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自发声援武大是政治扒手行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

1 参见中原机械厂东方红战斗总部《强烈控诉宋侃夫在我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载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五）》（1967年6月9日）第14—15页

2 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6—7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3 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一二·二六革命造反团《王任重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铁证——揭露王任重在〈文化革命动态〉上的一些黑批示》。

胡国基“蒙了”：党的报纸、电台都在报道各界群众积极声援武大，“怎么我写大字报要求声援就错了呢？”不久他明白了，响应党的号召也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去响应¹。

6月中旬，中学文革运动开展起来，一些中学特别是只设初中的中学出现过激行为。7月16日，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蔡刚电话传达王任重关于对待青年学生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谈到中学生问题，他说：“中学生右派分子，是指那些流氓学生打人、行凶、搞现行破坏活动，这样的人要逮捕法办。但这种人为数不多，而且其家庭大多数是五类分子。”宋侃夫在关于安静街中学、民权路中学等的“情况反映”上批示：“流氓活动这样猖獗，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从6月16日到7月27日，武汉市委以“打击流氓”的名义，在39所中等学校逮捕学生159人²，近千人按市委布置在校内进行批判斗争。王任重说：“捉一千也不多。”³宋侃夫还决定：“对那些年纪大、成绩差、有流氓习气，但又不够拘捕条件的学生，在家长同意下，送到东西湖农场去强制劳动。如果他们不去，可以派武装押送。”⁴逮捕“流氓学生”时各区开公捕大会，组织各中学被划为“右派”的学生、给领导写过大字报的学生前去“受教育”。

市三十六中工作组在校内关押了二三十名学生，7月18日、25日该校四名学生分别在公捕大会上被逮捕。章宏发，16岁，罪名四条：一、“反党反毛主席”（写大字报“十评工作组”，喊“炮轰工作组”）；二、“盗窃国家机密”（诬陷章偷一教师的工作手册）；三、“撕大字报”（一女生写一位男教师耍流氓，未写完被章撕掉）；四、“流氓成性”（章有打人骂人习惯）。章于8月18日释放。邹人杰，17岁，平时比较调皮，玩球无意打坏一支日光灯，被说成“有意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邹于10月31日释放。尹定波，平时比较调皮，于8月18日释放。罗先觉于8月25日左右释放⁵。

1 参见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年）。

2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员会《关于我们拘留、逮捕青少年学生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1966年12月17日）

3 张体学《坚决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王任重》，载1968年4月24日湖北日报。

4 参见《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6页。

5 参见武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刘记叭儿狗王任重简介》（1966年12月，铅印传单）。

6月以来，武汉大中学校以各种名义批判、斗争“右派”学生和教师。华中工学院抓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扫“歪风邪气”37天，383人被划为右派。一千四百余人的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反右”斗了两百余人。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62人，29人被定为右派。华中师范学院被斗学生三百余人。武汉邮电学院被斗23人。五百多学生的武汉建筑工人技校，逮捕了18人，三十多人被斗¹。

文革初期“五十天”里，武汉市以“反抗和破坏文革罪”逮捕了四百余人²，判刑、枪决的案件有的通过法院布告、公审会、新闻报道为人所知，但具体数字无法获取。

第四节 整群众的事例

发生在“五十天”里的下列几个事件，当时在武汉地区有很大影响。省市委通过对这几个事件的处置和宣传，告诉各级当权派和广大群众什么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应该怎样进行。

一、湖北大学六二〇事件³

武汉大学是王任重抓的点，湖北大学是张体学的点。工作组进驻湖大后，也抛出了湖大的“三家村”。“全校师生员工对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限定在子虚乌有的‘三家村’上普遍不满，认为这是谎报战绩，欺骗省委，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故意放过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认为这是工作组给运动划框框定调子，束缚了广大革命群众手脚。对工作组要求大字报按指定范围张贴的规定也不满意，认为这影响了系与系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这种蔓延开来不断积蓄的不满情绪，随时像地火要冲出地壳大爆发！”

6月20日上午，政治系一些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送到行政大楼前张贴。

1 参见二司武大总部《王任重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编《革命造反报》第二期（1966年11月9日）。

2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2页。

3 关于湖北大学六二〇事件的记述，参见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4—7页，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三、我校揪出‘三家村’与‘六二〇反革命事件’”，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彭勋、谢邦柱、龙铭鑫的记录，漆林等《我们对六月二十日事件的认识和几点建议》（1966年6月22日），张维荣《愤怒控诉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武装镇压湖北大学“六·二〇”革命事件的革命师生的滔天罪行》（1966年11月15日）。

大字报要求工作组解释为什么抛出那个子虚乌有的“三家村”，要求破除旧框框，允许群众彻底闹革命。有标语写道：“坚决夺取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有人提出：“要民主、自由，要游行示威。”下午一时许，政治系学生发现大字报被用水冲掉，前往行政大楼找校党委、工作组说理。学生们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提出改组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和文化革命办公室、严惩破坏大字报的人等四点要求，被以省财政厅副厅长曹金祥为组长的省委工作组拒绝，曹金祥说：“权不能夺，游行不允许。”政治系学生在学校中心地带搭起台子，向全校介绍情况，同时到各系呼吁同学们给予支持。校园内很快出现支持政治系学生的大字报，政治系张维荣等青年教师了解情况后，表示支持学生。

学生们要求到省委反映情况，工作组请示省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回复说可以派代表到省委去。校内很多学生兴奋地议论着，认为“这是属于打破常规的壮举啊！我们都渴望着代表们能给我们带回好消息，带回省委新指示，指导我校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代表们走后不久，校广播台突然播送“紧急通告”，称个别人到省委请愿是一起严重的反对工作组、反对湖北省委的反革命事件，要求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对这一小撮主动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进行有力反击。按工作组的部署，校园里顷刻贴满了反击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大标语；全校以班为单位，列队站在从校门到大礼堂的大路两旁，武装民兵把守大门，沿路巡逻，等待代表返回。

当天下午，被推选出来的张维荣等17名师生代表来到省文革接待室，向省文革接待站负责人汇报当天学校发生的情况以及对湖大文革的意见和看法，并向省委提出改组校党委、改组校文革、湖北大学校刊和广播站交由革命师生领导、省委派专案组调查这次政治事件等18条要求。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扶生和省委副秘书长曹建国答复：“（现任校党委书记）赵抱一同志是王任重相信他才调来的，你们要夺他的权，你们反赵抱一，这不是针对省委来的吗？”“你们要夺权、夺枪、夺电台，并向王任重同志发出最后通牒，限他半小时回答，不回答就要游行示威，这与57年汉阳一中事件有什么区别？”他们不许张维荣说话，命令同学们：“现在还来得及，你们赶快回去向大会作检讨，要彻底交待，要彻底揭发！”

代表们在校门口一下车，人群蜂拥而上，扭胳膊按头，民兵用枪托往

身上打，在一路口号声中被押上大会主席台。全校大会上，工作组号召全校师生对“反革命事件”进行反击。法律系三年级学生漆林挥拳发言一个小时之久，他说：红色江山是我们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你们这一小撮狗崽子乌龟王八蛋想变天想夺权，我们革命人民就要无情镇压，叫你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滋味。

会后，工作组一进校就贴出大字报《当前运动的关键是领导权的问题》的政治系团总支书记、教师张维荣被关押，由民兵持枪看守，直到同年8月1日释放。一个班的民兵监视政治系学生宿舍。

“一时间，学校师生人人自危，人人过关。所有人被要求对六二〇事件表态。写了支持大字报的同学纷纷检讨，唯恐被打成右派，一场刚刚燃起来的烈火被扑灭了。学校运动冷冷清清，再也没有人敢写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了。主要矛头对准了参与和支持政治系六二〇事件的同学。”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14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凡是给校党委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的都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湖北大学六二〇事件官方没有公开报道，但湖北大学地处三镇中心，交通便利，消息很快传开。不同立场、观点的人对此事件看法可能不同，受震动的程度却是相同的。

二、武汉重型机床厂“三家村”¹

20世纪60年代，武汉重型机床厂建立了群众性的职工业余活动队组，涉及体育运动、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文学创作各个方面。文革前夕，文学创作组有17名成员，多为车间工人，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一批受到好评的作品，有人成为省市作家协会会员。

武重“三家村”的李三省（文革初改名李向阳，1937年出生）、朱鸿霞（1934年出生）、刘传福（1940年出生）三人都是工人，都是厂文学创作组成员。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一贯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朱鸿霞不甘落后，在车间组织工人给厂工会和宣传部贴大字报。一天，二重大车间的工人给厂党委宣传部的一名干事贴了一张大字报，同时请求朱鸿霞等文学创作组的人给予支持，因为这位干事是文学创作组成员。朱鸿霞与刘传福等人商

¹关于武重“三家村”的记述，参见2015年杜先荣访谈朱爱华（朱鸿霞之妻）、刘传福的记录。

江城闯将

武汉钢工总 刘传福 李向阳 余从敏

卫东同志和我们并肩战斗十年了。他，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看上去好象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身体结实，两只大手捏拢来就象两个铁疙瘩；一双虎虎有神的眼睛，透露出坚定、沉着、智慧的光芒。

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子，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只要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都敢炮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正是以这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冲过了多少惊涛骇浪！

去年六月，在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的全国第一张黑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启发和鼓舞下，我们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点燃起来了。

一天清早，卫东在厂前通往食堂的大道旁，贴出了一张炮轰厂党委的大字报。上下班的工人川流不息地拥往那里，一边看一边议论。这是一张多么好的大字报啊！大字报上的字字句句都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支持卫东同志的革命行动，我和业余文学组的十几个同志也签上了名。不到半天功夫，后面的一张贴纸上都签满了名字。卫东的大字报，得到了全厂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那几天，几百几千张大字报从车间里、办公室里飞出来，贴遍了食堂大楼前几十米长的走廊。

熊熊的革命烈火，吓坏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等我们写出第二张大字报，厂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慌慌张张地派来了工作组。几天之后，工作组把各业余文艺队组的人都找去开会。会议开始，工作组就用煽动性的口气说：“文学组里有几个人写了大字报，搞得全厂乌烟瘴气。今天这个会，就是要大家揭开厂文学组阶级斗争的盖子……”

紧接着，有五六十个人按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接二连三地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

“卫东、周中林、刘红，是我们文学组的野心家。他们竟敢合伙写大字报攻击党委领导，这不是三家村是什么？”又有人说：“他们三人写的大字报，完全是大毒草！”

当时，对于这场突然袭击，我简直被弄糊涂了。只见卫东忽拉一下站起来，大声说：“你工作组有什么凭据把我们打成三家村？老实告诉你们：我是个工人，我是个贫农的儿子，我只有一个心眼，那就是紧跟毛主席闹革命！因为我们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所以才写大字报，炮打厂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一席义正辞严的话，说得全场鸦雀无声。等了好久没人发言，工作组只好自己出马吼道：“你打着红招牌反党！”

好不容易熬到了深夜十一点多，工作组才

• 23 •

《解放军文艺》1966年第12期刊载的以朱鸿霞为原型的文学作品

量，大家都同意支持二重大车间的工人。朱鸿霞执笔，写出了要揪那位宣传干事后台的大字报。很多工人在大字报后面签名表示支持。

朱鸿霞等人“揪后台”的大字报，矛头实际指向厂党委宣传部。6月25日，武重党委向文学创作组派出了工作组。几天后，工作组召开各业余活动队组大会，宣布：开这个会，就是要揭开文学创作组阶级斗争的盖子。

揭盖子的结果是三位工人业余作者李向阳、朱鸿霞、刘传福被打成“三家村”，并对他们开展批判：李向阳的一首诗被批为“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联系他的家庭出身进行批判；矛头指向宣传部的大字报被说成“一篇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三人因爱好相同交往较多，被说

成“成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活动”、“开黑会”。第一次批判会结束时工作组负责人说：从今以后你们三人不准联系，不准在一起。

一位文学创作组成员、车间技术员在会上说：他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我认为工作组是带框框来的，工作组方向错了。这位技术员被批判为“‘三家村’的新打手”、“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

随后对武重“三家村”的批判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火药味一次比一次浓。工作组将宽敞的职工游艺室，布置成为批判李向阳、朱鸿霞、刘传福三个人的专用场所。

李向阳等三人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又不容申辩。十六条发表、工作组撤走后，他们站出来申诉，厂内解决不了，他们就到社会上寻求支持。其时结识了少数派学生，参加了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的筹备工作。在工人总部中，朱鸿霞任一号头头，刘传福任宣传部长，李向阳任宣传部副部长。

三、武汉墨水湖中学六一六事件¹

6月16日下午，在地处汉阳的武汉墨水湖中学，初三学生徐苗等向工作组报告说，一个月前校运动会会有一个“民兵炸碉堡”的项目，用作道具的“炸药包”是教务主任蒋荣用旧报纸制作的，里面包有一张毛主席像。工作组领导表态说蒋荣这样做是不对的。在场的青年教师肖伯晏（21岁）证实有此事，并将此事告诉其他教师，激起教师们的愤怒。青年教师陈同光为首的一群师生殴打蒋荣，将他鼻骨打折。校长、书记躲起来，另一位教师也挨了打。五点左右，警车接走了两位伤者。

此事由工作组上报武汉市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教育分团，分团报给王任重。王任重批示：“这不是一般的打人事件，这是比一九五七年汉阳事件更为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要加强领导，彻底清查，进行处理”²。

1 关于墨水湖中学六一六事件的记述，参见杜先荣2015年访谈肖伯晏、徐苗、李显利（曾调查此事件的新华工成员）的记录，肖伯晏《王任重罪该万死——在斗争王任重大会上的发言》，载东方红红卫兵新华工总部《东方红战报》第九期（1967年1月16日）。

2 《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6页。王任重所谓“汉阳事件”即“汉阳一中事件”。1957年6月中旬，湖北省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第一中学部分学生为城乡升学率差别问题到县政府请愿，与机关干部发生冲突，被湖北省委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3名干部、教师被判死刑，9名教师、

宋侃夫批评市专政机关说：“专政工具到哪里去了？！工作队无能，为什么不把学生组织起来，对流氓学生为什么不能拿起棒子来？！”墨水湖中学打人事件“是反革命阶级报复事件，……比汉阳一中过去所发生的事件，要严重得多。”“那些流氓学生的行为十分严重，把受害、受骗（的人）组织控诉，处理一些坏人。”6月30日宋侃夫在市委常委会上说：“墨水湖中学等等闹了一下，已经查清了是坏人操纵，要组织控诉。”¹

武汉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邓垦说：“六一六事件是一个小匈牙利事件。”“如果公安机关不及时采取措施，我们的革命左派就会有人被他们打死。”

6月28日，工作组按照市委的指示，宣布六一六事件是“反革命骚乱”，将相关师生关押起来，派人看守，并组织对肖伯晏、徐苗等“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工作组对肖伯晏等人说：“把你们开的黑会，一些黑纲领，还有黑名单都交出来。”肖伯晏说：“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我不是反革命。”

7月11日，与六一六事件相关的教职工5人、学生3人被正式逮捕。肖伯晏说：“当天晚上九点钟，他们就审讯我们，逼着我们说，一直到十二点钟。（后来）他们对我们进行逼供，对我们审讯了六次，大多数都长达三、四个小时，每次大喊大叫，说：‘你们的事与五七年汉阳一中的事是一回事。’……又说我们的事件是匈牙利事件。他们还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

后来初三学生梁大成判刑5年，初三学生徐苗和初一学生龚汉成判3年；教师梁忠礼、鄢墩友分别判徒刑15、7年，教师陈同光判无期，教师肖伯晏判死缓，校医陈畴判死刑。四位教师当年都是21岁。

徐苗在六一六那天没有动手打人，但他最先向工作组反映蒋荣的事情，此前在学校很活跃，写过大字报。他父亲做过国民党军队的连长，提审时逼他承认出于“阶级报复”的目的而动手打人。在徐苗的记忆中，梁大成和龚汉成可能打了人。

1 名学生被判2—15年徒刑，3名教师送劳动教养，3名教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11名教职员和机关干部受党纪政纪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和勒令退学。1986年12月“汉阳一中事件”平反。

1 《宋侃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言论摘录》，载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四）》（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第5、6页。

陈畴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军医，在六一六事件中什么也没做，被定为六一六事件的“操纵者”。

6月11日工作组进校，校领导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引导学生斗老师，大会未结束，肖伯晏、陈同光、梁忠礼就贴出大字报，认为校领导这样动员学生是一个“阴谋”，在校内影响很大。工作组当时对三位教师表示支持。肖伯晏那天也没有打人，他认为自己判得比较重，就是因为起草这张最早批判学校当权派的大字报。另外，肖伯晏的父亲是“伪职员”（旧海关职员），梁忠礼的母亲是右派。陈同光也判得比较重，因为他是这张大字报的参与者，那天又带头去找蒋荣并打了他。

六一六事件通过“武汉墨水湖中学反革命暴乱罪行展览会”在武汉地区造成影响。这个展览抽调三中几位师生完成，副市长邓垦、市委组织部辛甫亲自督导。展览展出两周，万余人前往墨水湖中学参观。当时还被关押在校内的肖伯晏看了这个展览，他回忆说：“这个展览歪曲事实、大肆造谣、颠倒黑白，将我校当权派美化为革命左派、英雄人物，将我们污蔑成真右派、假左派，污蔑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法西斯暴徒。把我们对当权派的揭发污蔑为密谋暴乱、企图夺权，是反革命复辟。这个展览据说是邓垦亲自抓的，亲自检查的，他说要突出凶手的残忍。”

省市委决定召开两次大会分别对墨水湖中学、安静街中学被捕师生进行控诉并公开宣判，宋侃夫亲自部署。他指定市委副秘书长陆天虹起草武汉晚报社论；安排市法院印制大幅布告五万份；安排市检察院准备起诉书；安排市社教总团文教分团组织材料，用于大会控诉发言，会后编印成册，发给各学校学习；安排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熊飞做大会总结讲话。同时派市法院一庭院长火速进京，趁王任重在京的机会，请他催督最高院核准陈畴的死刑¹。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批示：“不宜杀，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宜杀。”²

1966年9月，徐苗等三位学生被释放；12月29日，除陈畴外四位教师被释放；1967年2月，陈畴被释放。

1 参见《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7页。

2 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李显利的记录。李显利文革中是新华工成员，调查过墨水湖中学六一六事件。

四、武钢庞玉来事件

庞玉来是武汉钢铁公司综合经营厂二级钳工，时年33岁。事件的起因是：1966年6月中旬，同一车间的黄连生写大字报揭发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引起庞的强烈不满。

1966年7月9日湖北日报报道了事件经过：

六月二十日下午一时四十分，他（庞玉来）在车间大字报前，威逼着在场的黄连生同志念揭发他大字报给他听，并破口大骂：“他妈的，写老子一千张一万张（大字报）老子都不怕，老子要和你们拼了！”随即从地上搬起二十多斤重的铁块，见拿不动，便又拾起石块，疯狂地向黄连生击去，幸黄连生及时避开。这时，蔡先梅见其行凶，上前制止，庞犯又拾起另一块约四斤重的石块向蔡先梅的头部猛击，蔡先梅当即被打昏在地，鲜血直流，当即送医院抢救。庞玉来当场被革命群众抓获。

7月5日，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在武钢四中运动场举行对庞玉来的宣判大会，武汉市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参会。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边征民、青山区副区长宋瑞林、武钢经理沈因洛等到会讲话。青山区法院副院长吴喜庆宣读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庞玉来的判决书。

判决书说：

庞玉来严重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革命积极分子蔡先梅进行疯狂的报复杀害，实属罪大恶极，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犯罪事实经本院查证属实，证据确凿，在事实面前，罪犯庞玉来不得不全部供认。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打击一切牛鬼蛇神的阴谋破坏活动，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庞玉来死刑，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核准，立即执行。

参加宣判会的武钢、一冶的一些老人至今记得，那一天本来是大晴天，宣布枪毙庞玉来时突然下起暴雨，刮风打雷，武汉人叫“走暴”。武钢修建部职工彭绍鹏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工人，就这样被剥夺了生命。就在被枪决的时候，顿时倾盆大雨，雷电交作。上天也为他抱不平。”¹一冶工程处职工曹承义写道：“这一天，本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

¹ 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0页。

大会宣布判处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老天爷也发怒了。一声声炸雷惊心动魄，敲打着每一个沉默人的心。我参加了在武钢四中广场举行的这场宣判大会，感觉非常奇怪，对当局的用意难以理解，一点也想不到。为什么这么快、这么轻易就枪毙了一个人？”¹

如判决书所言，“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必须“打击一切牛鬼蛇神的阴谋破坏活动”，省委和武钢党委枪毙庞玉来的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武钢运输部工人陈祖坤回忆：“宣判大会在武钢四中操场举行，武钢各单位将当权派不待见的工人带到现场‘受教育’，我在运输部八个人的‘陪同’下来到会场，炼钢厂的周岳来、运输部的高仕超都是以这种身份参会。枪毙庞玉来时，高仕超看见机管部工人李学昶被绑起来，跪在庞玉来旁边‘陪斩’。”²



1966年7月9日湖北日报刊登的受伤女工照片

7月9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同时发表报道《阶级斗争前线的勇士——记武钢女工蔡先梅同志同敌人搏斗的英勇事迹》。武钢党委组织党政工团干部和积极分子络绎不绝地去慰问“革命积极分子”、“阶级斗争前线的勇士”蔡先梅。

为了一件普通民事纠纷判人死刑，陈祖坤认为这是“一次‘枪打出头鸟’的警告，警告群众不要参与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不能反对整群众，否则就是庞玉来的下场！”³

“庞玉来事件”的后果和影响未能尽如湖北省委所愿。曹承义说：“这时湖北省委已经开始播下工人起来造反的种子，只是谁也没有意识到，此时以‘保卫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胜利进行’的面目出现的、以王任重为首的中共湖北省委，他们形左实右的实质是把文革运动的方向，引向镇

1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8页。

2 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41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版。

3 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42页。

压无辜的人民，当局对一个小工人大动干戈，是想转移文化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正是中共湖北省委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引发的这一声惊雷，惊醒了我们这些本来满足于搞好本职工作、对政治完全无知的小人物，我就这样关心起了文革运动。”不久以后，曹承义成为在武汉地区文革中颇有影响的造反组织“新一治”的一号头头，彭绍鹏、陈祖坤也当上本单位的造反派头头。

“庞玉来案”于1980年8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批复，认定原判错误，定为错杀，予以纠正。

第二章 工作组、三员、文革委员会与少数派

第一节 从工作组到文革委员会

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下令撤销工作组，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即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作了修改。28日，以北京市委名义公布《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决定》说，“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宣读北京市委7月28日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讲话。这个大会的录音在全国播放。

7月中旬左右，湖北省委集训六百名部队转业干部，准备充实、加强各校工作队。这批干部在洪山礼堂听了关于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的传达报告后，省委仍将这批干部派往各校工作队。后来这批干部中的部分人贴大字报说：“当时有很多人提反对意见，对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不应该把这些人派下去当工作队员了，但省委对群众的意见是置若罔闻，硬要把我们塞下去！”¹

8月9日，武汉市委决定：一、工作队要坚决地撤；二、要组织干部学习十六条，并对照检查；三、各单位要立即停止一切批判斗争，斗错了的要立即检讨；四、对全市以“破坏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罪而被捕的学生和群众要逐个进行甄别，捕错了的要放²。

被捕的学生并没有立即释放。宋侃夫指示市公安局局长李冷和市委宣传部分部长李春鑑赶快搞出被捕学生中“坏典型”的材料，免得“中央万一派人检查不好交代”，同时指示李冷：被捕的学生“一个也不能放”。10月9日至28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和江青就武汉逮捕青少

¹ 参见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铅印传单）。

²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3页。

年学生一事批评了宋侃夫，宋侃夫写了检讨。回到武汉，宋侃夫指示李冷将被捕学生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抓得不错”的，“继续关押判刑”；第二类“可以教育释放，不予平反”；第三类“可以给他们平反，但不赔礼道歉”；第四类“是完全错了的，应该平反，赔礼道歉”。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就湖北省委的文革路线问题批评了张体学，“说他哭了三次，哭也不解决问题”¹。

工作组撤离前，围绕对工作组的评价、要不要工作组作检讨的问题，少数派和多数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此前零星存在的少数派开始聚集起来。

8月19日，华工工作组副组长“黄焕运（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同志代表工作组作检查（五十分钟），检查中谈到了工作组的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有缺点，甚至是比较严重的，存在的错误和缺点是：①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够高；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帜举得不够高；③对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认识不够；④对工作组成员思想工作没有很好抓；⑤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事务主义；⑥关心群众生活不够。”“对于省委工作组的这个检查，有相当部分的同学没有通过，认为还不深刻。”²

20日，华工文革筹主席团在露天电影场召开全院大会欢送工作组离校，华工六五级学生鲁礼安回忆：

黄同学以院文革筹委会主任的身份，在台上代表全体师生致欢送辞。那天黄同学在高度评价了工作组进校以来在领导全校文化大革命运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后，用一种哭兮兮的腔调唱道，敬爱的工作组的同志们啊，我们是多么想挽留你们，不让你们走呀！然而你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还是要走了，我们也实在留不住你们。那你们就走吧，走吧。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我们的心永远是连在一起的……黄同学说到此处，已是泣不成声。然而台下已经骚动起来，只见聂年生率领了一支队伍突然冲上主席台，抢过黄手上的话筒，大声宣布刚才黄的讲话不能代表我们广大革命学生。聂转过身对坐在台上惊惶失措的工作组组长王耀说，莫看你今天溜走了，我们会有办法叫你有一天回来作检讨的。聂手下的人则一齐跺着脚，高举双

1 陆天虹《打倒王、宋反革命联盟——揭穿王任重、宋侃夫长期掩盖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真相的滔天罪行》，载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4页。

2 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革命到底战斗队《华中工学院文革大事记（1966.5.7—10.8）》。

臂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保工作组的一派人这时也冲上台来，扑向聂抢话筒。两支人马短兵相接，扭作一团，会场顿时大乱。王耀组长趁乱带着工作组的一千人马狼狈撤出，全没了半点昔日的威风¹。

聂年生当天还贴出一张大字报，内容与他在主席台上对王耀说的话相似：“王耀同志：您走了不要紧，我一定要想办法使您回来再做检讨！”²

当天，“院广播台对工作组一片歌颂，称‘王耀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毛主席的好学生’”。“院刊当天以触目标题刊登《我院革命师生员工热烈欢送工作组同志离校》文章，前头就是‘挥泪送别亲爱的同志’呀，文章最后讲到‘一张张带着热泪的脸，流露出多么难分难舍的感情。’”³

工作组撤销后，按照十六条规定，各单位的文革运动应该由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而文革委员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王任重十六条公布后，指示张体学向撤销了工作组的单位派驻“三员”⁴（观察员、巡视员、联络员）。省市市委在工作组撤离后迅速派出的“三员”，多是原工作组成员。武汉军区于7月28日抽调空军六百名干部分派到各院校任“三员”，派到湖大任观察员的陶某“给计六四1班李××五元钱，叫他别泄密，收集红八月造反队的材料，上报省委”⁵。

辛甫对教育系统的三员说：要“起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作用”，“以我们的观点去影响革委会”⁶。各单位的三员基本就是这样开展工作。

武汉地区各中学的三员，在8月底开始的省市市委部署的“抓南下一小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汉三中的少数派（包括两位校文革委员）认为三员是变相的工作组，9月12日写出大字报《炮轰“三员”》，揭露三员操纵校文革，继续在三中压制不同意见，“枪打出头鸟”，要求“三员

1 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第72—73页，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贺光宇《述评鲁礼安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中的聂年生和红反团》（网文，2007年）。

3 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革命到底战斗队《华中工学院文革大事记（1966.5.7—10.8）》。

4 参见《张体学同志的书面检查》（1968年1月18日）。

5 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6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2页。

滚出三中”。大字报贴出的第三天，三员按照市委书记宋侃夫的指示，直接出面组织了全校性的围攻¹。

在20日华工文革筹主席团召开的欢送工作组大会上少数派和多数派发生激烈冲突后，24日下午和晚上，两派又在工作组问题辩论会上激烈辩论，直至深夜。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副省长韩宁夫参加了辩论会。25日上午，省委派原华工工作组组长王耀等来华工任三员。王耀等进校时，多数派打着红旗、举着“欢迎王耀来当三员”的红纸标语去欢迎。少数派打着自制的白旗，白纸标语写着“欢迎王耀回来作深刻检查”“欢迎王耀回来做四员，先当检查员”。少数派受到围攻，多数派喊“打倒反革命”，撕毁少数派的标语。中午，韩宁夫来华工说：“谁想打什么旗谁就打什么旗，他可以打红旗，也可以打白旗，也可以打黑旗，他有他的自由，不要干涉。打黑旗，红旗更鲜艳。”在下午的华工师生万人辩论大会上，张体学讲话谈到两派关于工作组、三员问题的争论，他说：“现在你们是两个左派打架，是友军之间发生了误会。我不敢说你对，他不对，我只能说都对，都不对。我这样说，你们会说我观点不明确，同志们，问题是复杂的，你有错误，他也有错误。”张体学破例称少数派为“左派”，少数派仍然不满意，认为张体学搞“折中主义”是“害怕革命烈火烧到自己身上”。张体学说他参加华工的大会是“带着沉痛的心情来检查的”，第二天湖北日报的报道说华工集会会是“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久，省委又派原湖大工作组组长曹金祥等来华工任三员²。

9月，在“抓南下一小撮”高潮中，湖北大学的观察员指使学生打入财会系、计统系、法律系少数派组织“了解他们情况”³。宋侃夫要求分别召开各校三员会议，宣布对三员“松绑”，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讲“省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中学的三员直接参加对南下学生的围攻⁴。

1 参见杜良怀《武汉三中“炮轰三员”事件及“红岩战斗队”成立》（网文，2017年）。

2 参见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铅印传单）。

3 参见《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1966年11月上旬）。

4 参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2页；《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9页。

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武汉地区当时简称“文革”，少数派称为“伪文革”）大多在三员和因各种原因尚未撤离的工作组操控下成立，三员通过文革委员会继续贯彻省市市委的意图。

8月12日，张体学从北京给省委打电话，要求各大专院校在15日前选出文革委员会。武汉测绘学院从发下候选人材料到投票，只相隔一天¹。

至8月25日，全市23所大专院校和80%的中学先后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²。

湖北大学六五级学生彭明诚回忆：“按十六条规定，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但在我印象中，从群众充分酝酿到群众反复讨论再进行选举的程序，我校基本都省了。因为最后公布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竟然是六二〇事件那天登台大骂‘狗崽子’的漆林同学！如果经过酝酿和讨论及投票的完整程序，思想已经活跃些了的师生一定会因他而产生争议，他也不可能顺利当选为校文革主任。因此，对以漆林为首的校文革，不少师生不服气，认为这是即将滚出去的工作组无视民意暗中操纵的结果，后来干脆称之为‘伪文革’。”³

湖大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成立后，张体学在湖大说：“谁不听革委会的话，就批评，他们不能闹情绪，不服从领导的还可以斗，革委会是最高



1966年8月21日，湖北日报为张体学抓点的湖北大学成立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发表社论

1 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2 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47—24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诚言（彭明诚）《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四、我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

权力机关。”“相信文革(委员会),就是相信党。”¹

武汉测绘学院六一级学生杨道远回忆他所在班文革领导小组的选举过程说:

说是大民主,自由选举,整个活动由政治辅导员领导(后面还是工作组)。这个选举在我们班搞了五天,辅导员背着找人谈话,拉小圈子开小会,引导、操纵会议。第一天的会议,辅导员的真实意图我是全然不知的。会议一开始,不是讲如何投票,如何选举,一开始就辩论杨道远能不能当候选人,说杨道远不能当候选人的都是辅导员唆使的,是有准备的;多数人是不知情的,无准备的,认为是突然袭击。反对杨道远的人发言以后,班上就争论起来了,拥护杨道远的人即席发言,驳斥前面攻击杨道远的言论,不少同学发言为杨道远评功摆好,支持杨道远当选。这会是上午开了下午又开,开了一整天,辩论结果拥护杨道远的一方占绝对优势。晚上休会,辅导员加紧活动,开小会、个别谈话。第二天又开会辩论,一天下来形势没有多大变化,晚上辅导员又是开小会、个别做工作。第三天又辩论一天,辅导员计算着他拉的人反杨道远还没有必胜的把握。第四天又开了一天辩论会,晚上辅导员又加紧工作了一个晚上,肯定是觉得有把握了。第五天不辩论了,通知选举。拥护杨道远的人来做我的工作,要我自己投自己一票。我感到,自己就是当选了也无法工作,我放弃了这个权力,没有投自己的票。选举结果杨道远没能进入班文革领导小组²。

华中工学院的文革委员会一直没有正式成立,筹备阶段称为“革命师生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大会主席团”(简称“主席团”)。华中工学院六四级学生张建华回忆:主席团成员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事实上根本就没有选举这个过程。其次,其成员都是“多数派”,没有其他群体的代表参加,因此主席团也就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加之主席团唯省委领导是从,继续执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继续围攻、压制群众。因此,很多同学不满,纷纷找主席团成员辩论。这些同学辩论的武器就是十六条和两报一刊社论³。华工六四级学生、机械系学生会主席、分团委副书记郭保安回忆:“十六条规定学校的文革由选举的以学生为主组成的各级文化革命

1 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

2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3—24页。

3 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02、9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版。

委员会领导，学校一时选不出来。工作组就指定以院学生会主席黄仁传为主席，组成大会主席团，代行院文革委员会的职权。我也是成员之一。但它不是独立行使领导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文革机构，而是在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说是召开工作组和主席团联席会议，实际上就是工作组长和副组长布置工作。”

郭保安回忆：在工作组和文革主席团的联席会上，“我较系统的谈了我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看法”，“后来就不让我参加会议了”。有知情人告诉他：“是工作组决定不让你参会的。其原因就是你上次在会上批判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还派人到你的中学和家乡外调，准备搞你的黑材料对你进行批斗。只是因为外调的材料比你档案上的材料还好，批斗你没有炮弹，实在没办法，才只好作罢。”¹

8月22日，华工文革主席团未与群众协商，将65个院文革委员会候选人的材料发下，并决定23日上午进行选举。少数派坚决反对。23日上午，一千多人步行十余里到省委上访，要求推迟选举，省委文革接待站未予答复。下午主席团强行进行选举，各选区都发生争论，有的选区的选举未能进行，有的选区投票人数不足一半。25日，在全院大会上主席团宣布选举作废，参会的张体学表示支持²。

8月下旬成立的水院文革委员会，当选的学生委员全部是工作队党委指定为候选人的多数派（官办红卫兵），丁家显等少数派积极参选，在辩论会上宣示自己的观点，均遭落选。水院文革委员会一成立，继续按照工作队党委的原部署，批斗群众印象较好、“不当家”的副院长梁百朴，揪斗一批老知识分子和1957年的“老右派分子”，组织“破四旧”和抄家。对工作队内定的“右派”学生，准备进行“运动后期处理”，因为按张省长来水院时的讲话，“斗、批、改”在8、9月就要胜利结束了，要争取中秋、国庆“回家看妈妈”³。

王光照在他的回忆录里简要叙述了武汉锅炉厂文革委员会的产生和消亡：

厂里当政者眼瞅着红铁军渐渐溃不成军，立马接过中央新决定，打着

1 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2 东方红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华中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编印《湖北省三级干部必读材料》（1966年11月6日）

3 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06、119页。

红旗忽悠全厂职工。他们避开全面选举，从上而下圈定一些人拼凑成厂文化革命委员会。我们断定是伪“文革”，理由是这些人根本代表不了大多数职工投身文革的理念及意愿，如厂文革委员会的正、副主任谢超群、刘德权，无所作为，只知道始终站在厂里当权者一边，连一张像样的大字报也没写过，他们凭什么来领导厂里文化大革命呢？我们没有成见和积怨，他们确实不具备领导厂里文化大革命的素质和水平，也没有经过职工反复充分酝酿，至少程序不合法。这两位正副主任完全是傀儡，撑门面的仍然是红铁军的那些人，只是换了一块新招牌。少数派们纷纷发声明、提要求，不承认伪文革，不同意“运动群众”，强烈要求自下而上，按“十六条”所规定的那样公开选举厂文革。

伪文革是一出生就受到强烈质疑和抵制，四处碰壁，举步维艰，根本施展不开。仅有的两三次主持全厂大会，是十分的软弱、苍白、战战兢兢，夹在公婆和汉子中间，两边都得罪不起。面对雪片似的疑问、责难的纸条束手无策，要么答非所问，要么尽量回避，要么漏洞百出，引起更多的责难和质疑，只好突然宣布散会。

一天晚上在厂前广场召开大会，谢主任讲话：刘（少奇）主席讲了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运动怎么搞他也不清楚，这启发了我们，厂里运动怎么搞，我们照样不清楚。各车间、科室在学习讨论中，以刘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指导，把厂里运动搞起来……引起广场上一片哗然。第二天，大量的大字报集中要求解散厂文革，不能领导运动就靠边站！当时及多年后想起来，也为厂文革感到窝囊，真的是招架不住。厂文革存在了不长的时间，终于夭折了，在一片质疑和责难声中夭折了¹。

也有一些单位实行了选举，少数派很少能够选上。工作组、党组织在动员群众、推举候选人等方面做工作，既有丰富的资源又有熟练的技术。当时少数派在文革委员会选举中落选是大概率事件，因为少数派就是少数，大多数群众相信“造反有罪”，反对党组织“就是反党”。武昌铸钢厂的文革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给当权派贴过大字报的李承弘人缘较好，很有希望当选。就在这时，厂保卫干事贴出大字报，说李承弘父兄有历史问题，本人四清时交代有同情某个右派分子的思想活动。保卫干事端出的材料不

¹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3—24页。

由人不信，李承弘就这样落选¹。

文革委员会和几乎同时建立的红卫兵组织，成为贯彻省市运动部署的新工具。这时，文革中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开始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开始出现。

文革后，关于工作组问题，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可以“不存在”，刘少奇主持文革运动期间无数群众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被看管、批斗，被关进监狱，被工作组整死，被法院执行死刑，这些事实却是存在的。

第二节 受压制的少数派开始聚集

各单位的少数派的成员，各人成为少数派的原因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质疑、反对党组织、工作组违背二十三条、十六条的宗旨，把运动的矛头指向群众而不是指向走资派，在方法上搞运动群众，不准越过他们的规定半步。

杨道远是党员，运动一开始任班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他对工作队把学生党支部成员打成“三家村”“四家店”、整死六名教师有意见，他对系工作组说：“你们这样搞，仅仅能整群众，整学生干部，但如果要搞好文化革命运动，是不可能的。”工作组拒绝了他的意见，警告他“你是贫下中农子弟，要站稳立场，不要忘了本”²。

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工人吴焱金是复员军人，当时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他回忆：工作队“在工人中抓牛鬼蛇神。平时爱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不喜欢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劳动教养回厂的，都成了这次运动挨整的对象。工作队一边发动群众写他们的大字报，一边要求我将大字报揭发出来的事实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看看‘十六条’，我才看出我厂运动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工作队要我整理的材料矛头都是指向群众的。党中央的决定说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50页。

2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1—22页。

所以，在工作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提出这种搞法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而工作队的领导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以后工作队开会就不再通知我去参加了。我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工人们对工作队是一肚子意见。我当时血气方刚，九月下旬，我写了一篇《工作队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贴在食堂里，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工作队就开大会，公开点名批评我，说我丧失了阶级立场，充当了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炮手。我在厂里受了一段时间的压制。”³。

“五十天”里出现的少数派，大多数人自为战，势单力薄。

1966年8月底，在党组织、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行动的“左派”——多数派，随着形势变化，组织成群众性的文革委员会和红卫兵。中央以一系列举措纠正前一段运动的方向，党组织错了，工作组撤了，少数派激烈反击，过去多数派视为依靠的各级党组织现在需要他们来保卫了。他们在关于工作组的辩论中坚持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没有错，坚持在工人、学生中“抓右派”。湖北大学计统系六四三班文化革命小组9月22日散发一份铅印传单，标题就是“文化革命中必须划分左、中、右”。

8月初以来，少数派受到形势变化的鼓舞，同时感受到以新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多数派的巨大压力，于是也开始在本单位聚集、联合。

王光照回忆了武锅少数派联合的过程，并讲述了这些少数派当时的心态：

两军对垒相峙，而少数派还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锻炼，运动的核心已经形成，所以我们在十七栋单身宿舍召开了一次碰头会。老孟主持会议，大家统一了对厂里运动的认识，协调了斗争策略，选举了一个临时领导小组，公推老孟为召集人。……大家发挥各自的人脉和长处，分片继续发动职工站出来同当权派斗争，从此算是有了一个少数派领导班子的雏形。那时当权派没有指责我们这个无上级的领导小组为非法，尽管他们很清楚我们这个领导小组的存在。我们这时仍然没什么正式的旗号，也无规范的组织名称，更没有什么章程、宣言，连一个经常聚会的地点也没有。遇到有什么事需要商量就临时知照一声，在厂里临时挑个地方，这些都发生在十六条公布之前。对我们而言，形势仍然是很严峻的，风险自不待言。一些人指责造反派造反

³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4、5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版。

动机不纯，想入党、想当官。这种形势，这种风险，何来入党当官的可能性？我们这些人敢于冒险犯难挺立潮头，决定的因素是崇高的信仰及对党和领袖的一片赤诚。不要忘了，当年流行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我们从十七年的社会现实中看到的那些践踏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应当统统纠正过来。而要治疗这些社会的溃疡，只有站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上，同毛泽东一起，向修正主义、走资派作不调和的斗争才有可能。先辈留下箴言：民不可同官斗。毫无疑问，自古以来同官斗是有极大的凶险的。毛主席曾经号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身剐的凶险是放在第一位的，能否拉下皇帝倒不一定。君不见革命历程中不就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吗？那些牺牲了的先烈们何曾想到入党当官呢？我们自许就是那些先烈的继承者，让那些指责见鬼去吧，我们坚持走舍得一身剐的道路¹。

武汉水院的第一支少数派战斗队，出现在第一波打击“右派”学生的高潮中。针对学生自发集会、游行、贴大字报，反对整学生而呼吁把矛头指向当权派，6月17日武汉水院党委决定发动校内工人起来“反击”，“压一下右派的反动气焰”。18日清晨大字报栏贴满了《工人说话了》《我们有话说》一类大字报和“不准右派翻天”“彻底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向党猖狂进攻”一类大标语，原来的大字报都被撕毁。“左派”学生迅速跟进，贴出大量针对少数派和“内定右派”的大字报。各系领导、政治辅导员召集会议，批判“造谣生事”“破坏文革运动”的郭明正、徐海亮等人，逼迫给领导写了大字报的人作检查。这一次对“右派”的大反击，被称为“六一八事件”。18日晚，丁家显等十几个少数派学生成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小组”（几天后战斗小组改称战斗队），19日贴出运动开始以来第一张用战斗小组名义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里质疑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的前一段运动，提出一连串的“为什么”。这张大字报出现后，少数派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的，“造反有理”、“金箍棒”、“红山花”等战斗队陆续涌现。7月15日，水院工作队根据王任重7月3日“水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这一指示，发动了力度更大的又一波“反右”。7月下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的丁家显等三人、6381班李全德等三人分别以“三个贫农儿子”的名义给工作队队长

¹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2—23页。

刘真写公开信，质疑工作队在学生中抓右派是矛头向下，转移运动大方向，质疑“郭明正持刀行凶杀人案”是工作队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他们向省委、省公安厅递交为郭明正翻案的材料，多次到省委静坐请愿。8月28日，经交涉，省委文革办公室承认了跨年级跨系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此时这支少数派队伍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人。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水院众多少数派战斗队逐渐形成了八三一总队、井冈山兵团、红色联络部等联合体¹。

8月28日，湖北大学少数派的第一个组织“红八月造反队”成立，最初目标就是为六二〇事件翻案，控诉校党委、工作组对六二〇事件参与者的迫害。红八月造反队在该校相继成立的多个少数派组织中崭露头角，受到在该校抓点的省长张体学的特别关注。张体学1967年1月10日在《关于我们压制和打击红八月造反队的检讨》中说：“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红八月造反队一成立，就不但在舆论上受到围攻，在日常活动甚至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歧视、排斥和压制，而且受到了严重的组织压力。有的文革委员会成员和红卫兵，由于同情或参加红八月造反队，就被视为‘动摇分子’、‘叛徒’等等，而被罢免或开除出原有红卫兵组织。这不只是直接打击了这些革命同学，而且也是压制广大革命群众，使他们不敢接近红八月造反队”。“我们不但迟迟不愿承认红八月造反队的合法地位，而且总是想搞散它，搞垮它。对于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同学，做了许多分化工作，有的是直接动员退出，有的是通过其亲属动员退出，有的是双管齐下。”“为了做到‘知彼知己’，我们极力想了解红八月造反队的活动情况。为此简直达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不但通过公开渠道了解情况，甚至采取了秘密手段，例如争取其中的成员‘起义’，派人打进去，以暗中了解情况。”张省长承认：他们“把红八月造反队这个革命群众组织当成了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组织”，“大字报、传单或口头宣传中，给红八月造反队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加上了‘右派’、‘反革命分子’、‘政治扒手’等帽子。”张体学说到的“围攻”、“歧视、排斥和压制”发生了作用，少数派各战斗队都有人退出。

9月27日红八月造反队有一成员宣布“造反错了”，脱离红八月造反队，她所在法律系的文革委员会分会为她“回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校文

¹ 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65—68、126、123、148页。

革常委、法律系文革分会主任委员靳三秋在会上说：“今天我们开这个大会，欢迎王振业同学从红八月造反队回系参加运动，和我们并肩战斗。我代表系（文革分会）党组、系分会和全体革命师生向王振业同学表示亲切的问候和热烈的欢迎。对于她的革命行动表示最坚决的支持。”“王振业同学过去提出申请自动退出了红卫兵，今天她又重新申请加入红卫兵组织。现在通过红卫兵讨论，系红卫兵团批准，重新戴上红卫兵袖章，我们表示热烈的祝贺。”¹

经省委授意，湖大校文革给少数派家里写信，说他们的子女“参加了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造反队”，动员家长让子女退出。一些家长或写信或来校劝说其子女退出“红八月”“八三一”，否则“断绝关系”“跳江自杀”²。

湖北大学的红八月造反队成立后，八三一革命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等少数派组织纷纷成立。这些跨班级、跨年级、跨系的战斗队都宣布不接受校文革的领导，不参加校文革组织的活动。八三一革命队宣布：“不搞‘血统论’，本着‘革命不论先后，造反不分早晚’的精神，欢迎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踊跃参加！”这些战斗队都在南下学生住宿的31号楼设立“队部”，自行开展活动。31号楼被称为“造反楼”，在武汉三镇广为人知。9月14日，



湖大一些少数派战斗队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湖北大学分部”，红八月造反队的汪业勤、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杨闯等任“勤务员”。

彭明诚在其回忆录《我当文革造反派》里写道：

文革中，湖北大学31号楼被称为“造反楼”（网络图片）

1 《靳三秋同志在法律系全体革命师生欢迎王振业同学从红八月造反队回系参加运动大会上的讲话》（摘录）（1966年9月27日晚），载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33页。

2 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15页。

我校“少数派”首先抓住工作组炮制“假三家村”和镇压“六·二〇事件”革命师生的要害，要求校文革一是必须承认“红八月造反派”、“八·三一革命队”是合法的革命群众组织，要保障正常的办公用品供给，提供自制队旗、袖章的活动经费；二是承认工作组揪出“湖大三家村”完全是弄虚作假欺骗全校师生员工的行为；三是公开承认“六·二〇事件”是革命事件，校文革必须公开为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销毁被整师生的全部黑材料；四是交出策划镇压“六·二〇”革命群众运动的幕后黑手，要求工作组组长曹金祥回来向全校师生做检讨。

对于造反派的四条要求，校文革当然不会答应。因为答应这四点要求，等于否定了校文革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与它们“坚决维护省委正确领导”、“誓死保卫湖北省委”的宗旨相冲突。但在大势所趋之下，校文革虽然不承认对立派是“革命群众组织”，但也不敢再公开把对立面打成“反革命组织”了。对于少数派提出的供应办公用品如笔墨纸张、油印机、浆糊的要求，校文革也无法拒绝。过了一段时间，我校造反派正式更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新印发了袖章，制作了队旗，与校红卫兵从“革命”内容到标志形式都划清了界线。在造反派队伍有了新袖章新队旗后，影响更是迅速扩大，五个系九个专业不少班出现了一些班内的小造反派组织，这些新组织都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9月11日，华中工学院电机系少数派39人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选举张建华、徐正华为“联络员”（负责人）。13日，各系已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通过串连，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联络站，确定了联络站的负责人（聂年生、黄国成）和各系的联络员，同时决定筹备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9月27日，在省委组织的八大学院“左派”进驻华工围攻少数派的形势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成立。总部设九人主席团集体领导（刘玉满、李培俊、赵文成、聂年生、郭保安、张建华、左玉明、郭汉成、江重初），主席团下设组织组、宣传组、联络组、材料组和办公室，各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统称××大队，分别冠以“冲锋”、“前卫”、“延安”、“九一五”、“红旗”等不同名称¹。

9月13日，武汉测绘学院的少数派小组织八三一红卫战斗小组、毛

¹ 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27—130页。

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讨论联合组织的名称时，“据说毛主席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毛主席说还是叫思想好。据此，大家统一认识，把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杨道远回忆：“我们要求成立组织，向他（院文革副主任）宣传周总理指示：红卫兵你可以组织他也可以组织，只要执行《十六条》我们都支持。这他也可能听说过，因此没费多大劲他就同意了我们成立组织，并给了办公室，给印制了旗帜、袖章，供给运动必需物品（主要是写大字报的东西）。”¹

武汉地区少数派自行成立的红卫兵大多不约而同地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区别于官方组织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和中等学校红卫兵，并把对方称为“大专兵”和“三字兵”。

¹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1—32页。

第三章 红卫兵成立与“破四旧”

1966年8月，被武汉造反派称为“红八月”，因为在这一个月里发生了一系列令当时的少数派有死而复生之感的事件：

8月1日，纠正前一段文革方向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说：“很多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完全是错误的，不到百分之十的是好的。以后必须撤销，这一点要肯定。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运动的坏作用。”¹同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复信。

5日，毛泽东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写道：“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8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条）。

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8日、31日毛泽东接见赴京师生，18日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

19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赴京师生的消息，刘少奇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序中降到第八位。

22日，中共中央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杨胜利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武汉的造反派喜欢8月，习惯地称之为‘红八月’”，因为8月中央一系列举措，“造成了一种政治环境：即允许、提倡群众自由和独立的思考，提倡和鼓励群众发表不同意见，允许群众成立自己的组织，让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去辨别对与错，是与非，真理与谬误。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正如‘十六条’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可以说，这段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上最民主的一段时期（还有1957年反右斗争前大鸣大放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那段时间），而这段时间，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604—605页。

是比1957年实行民主的时间更长，深度更深，广度也更广的一段黄金时段。这种民主的宽容的政治环境，正是造反派得以纷纷站出来的重要的原因。”¹

多数派（不久后被称为“保守派”）也使用“红八月”这一名称，因为他们在8月组成了毛泽东表示支持的红卫兵，并开始实施令世人惊悚的“破四旧”运动，文革十年中他们一直以此自豪。

第一节 官方红卫兵与少数派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并戴上红卫兵袖章，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开始成立红卫兵组织。

武汉地区的红卫兵8月19日出现在公开场合。那一天，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文化革命小组分片举行有50万人参加的武汉地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集会和游行活动，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大中学校学生出现在大会会场，在会后举行的游行中走在最前列。



1966年8月19日，在武汉地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集会和游行中，武汉红卫兵首次亮相（载次日武汉晚报）

对清华附中红卫兵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和毛泽东的复信，少数派有自己的感受，他们感受到的是毛泽东号召对旧教育制度、对前一段运动的错误方向造反，“造反有理”；毛泽东支持自发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是支持群众自己成立组织，自己解放自己。他们了解到，毛泽东复信中表示热烈支持的“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是一篇批判北大工作队的发言，这说明毛泽东是支持少数派的。

组织红卫兵，使得在工作组问题上稍处下风的各级当权派和多数派精英
¹ 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第五章在‘红八月’的日子里”。

神大振，北京传来的红卫兵的“组织原则”——以“红五类”为主体、“革干子弟”居首为第一类，还有随后疯传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和谭力夫关于“对联”的讲话，让多数派在组建红卫兵时，自然地获得压倒性的优势。

1966年12月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到中南局翻印了谭立夫的讲话，他后来还作了检查¹。

省、市委，各单位的党组织、工作组和三员、文革委员会，立即把红卫兵的组建权掌控起来。各级当权派也接受并使用“红五类”“黑五类”等概念。张体学1966年9月8日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讲到“有组织有领导地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到武汉和下农村去，把农村的运动搞得正常一点”时，特别强调“黑五类不能下去，要下去也只能参加劳动”。

张体学在这次会上还讲到省委要直接领导红卫兵：“红卫兵成立总部，大学一个，中学一个。靠红卫兵维持治安。对红卫兵的工作，(省委)文化(革命)小组要当中心任务来抓。”²张体学在新形势下掌控新起的红卫兵组织，目的很明确，就是“靠红卫兵维持治安”——掌控局面，张体学后来说这是执行王任重的指示。张体学在1968年1月18日给中央的“书面检查”中说：1966年8月，王任重“在京遥控湖北省委，他电话通知说红卫兵有三项任务：‘站岗放哨，维持治安，保护档案’。妄图转移红卫兵小将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方向，我不仅没有抵制这一罪恶阴谋，反而欣然接受，积极贯彻”。

1967年2月，省委机关造反派揭发：王任重曾指示湖北省委，对各校文革委员会、红卫兵组织“要主动组织，加强领导，抓在省委手里”³。

湖北大学成立红卫兵由校文革主持。计统系统计专业654班，在政治辅导员领导下，以在六二〇事件中的表现划线，事先确定人选、做工作，然后由全班学生选举，有贫农出身的少数派学生没能选上。班里少数派认为这是一次被人操纵的“假选举”，12位同学开会商定：“我们自己成立红卫兵组织，不要他们承认。其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 参见《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1966年12月3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2（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摘要）（1966年9月9日晚），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3 参见毛泽东思想湖北省委机关险峰战斗兵团《王任重在南京是怎样指挥湖北省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的决定》（即十六条）讲，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他们选举了红卫兵就是包办代替。”¹

8月下旬，武汉水院红卫兵师成立，省委领导在成立大会上授旗。“水院红卫兵由清一色的‘左派’同学组成”，由院文革委员会领导²。

武汉大学六三级学生吴恒春回忆：“武汉大学党委发了一个武汉大学九一二³红卫兵组织章程，要通过选举成立武汉大学红卫兵组织。”他所在的化学系六八五三班，选举会“是一场早有准备的会议，发言人都事先经过了周密的安排”。贫农出身的吴恒春落选，他在会上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为了发动全国学生起来闹革命。革命不革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可不是选举能决定的。红卫兵是革命的群众组织，不是官办的什么代表大会，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的革命权利。这样的红卫兵组织不是革命的组织，我不参加这样的红卫兵。”

武大很多像吴恒春这样的学生再一次感受到被打成“右派”的威胁，吴恒春写道：

在校各级领导的心目中，恐怕这也像一场反右斗争一样，打算最后把一批学生划为右派了事。但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牺牲品，都无一例外地会拼命挣扎。这些人就是当权者制造出来的反对派。……为了不任人宰割，为了能求得不当反革命的一丝机会，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当然也得有所行动而不至于孤独，于是便有了各自成立的小红卫兵组织。对于我个人来说，这就是我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全部理由，并不是什么路线斗争的觉悟比别人高，因为不上梁山我是无路可走的。

九一二红卫兵师成立不久，化学系少数派学生自行成立了“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其后各系少数派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9月下旬，各系少数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分部”⁴。

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师由省市委、各校文革委员会主导成立后，“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一个半月后少数派学生的全市性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被称为“二司”，“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被称为“一司”，其成员被称为“大专兵”，

1 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10页。

2 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98页。

3 毛泽东1958年9月12日视察武汉大学。

4 参见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

以区别于少数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据9月12日湖北日报报道：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是由武大、湖大、武医、民院、华师等院校的文革委员会和红卫兵组织倡议，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二十所大专院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的负责人联席会议民主产生的。

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由崔建瑞任总指挥，漆林任政委。崔建瑞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总支副书记，王任重重整李达的过程中亲手培养起来的“坚定的革命左派”，省委派驻武大工作队党委成员，时为武大文革委员会主任，时年三十三岁。漆林是湖北大学法律系六三级学生，时年二十三岁，其父漆先庭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干部，其叔父漆少川是张体学的老战友、老部下，时任湖北省水利厅厅长。漆林时任湖大文革委员会主任，文革以来一直站在保卫校党委、保卫省委的第一线，是张体学在其所抓之点湖大的主要依靠对象。

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9月11日在武昌体育场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等省、市领导人在大会开始前乘敞篷吉普检阅万余名红卫兵。事后少数派肆意嘲笑、猛烈攻击张体学这一仿效毛泽东的举动。9月30日张体学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讲到这一举动：“红卫兵总部成立，我们坐了几部车去了。中南局文化小组提了意见，我们没有表态，可以坐可以不坐，当时的思想，你要压我，我就示威。”¹

崔建瑞在成立大会上讲话说：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在中共湖北省委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工作”²。

9月11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张体学心情大好。9月22日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讲到“个人的心情”，说自己“12号以前确实睡不着”，13号上午他对崔建瑞、漆林说“我昨天晚上睡得最好了”。“红卫兵司令部不战便罢”，对“南下一小撮”一战就“打了胜仗”，“战是两部曲”，“第一步是大字报，在（8月）25号前我们根本不理他（指南下学生），25号以后出大字报。第二以学校为单位开辩论会，一对一。首都红卫兵再找我，不见了，先礼后兵，谁来应战都不怕。”

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及各城区分部的建立，由武汉市委直接

1 《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摘要》（1966年9月3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2 参见1966年9月12日湖北日报。

武汉地区一万多名红卫兵庄严重集会 热烈庆祝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

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等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
和工农兵代表参加大会,视贺革命小将的伟大功勋

【本报讯】武汉地区各中等学校红卫兵大队于九日晚八时,在武昌区人民会堂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庆祝红卫兵总部成立。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等省市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工农兵代表参加大会,视贺革命小将的伟大功勋。

大会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开始。张体学同志首先讲话,他向红卫兵小将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勉励他们要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传统,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斗争。他号召红卫兵小将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红卫兵小将们表示,他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

大会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结束。红卫兵小将们表示,他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



1966年9月12日《湖北日报》第一版

掌控。8月22日,武汉“市委常委会传达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¹

8月25日,武汉市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的第三天,武汉市委在汉口人民剧院召开全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市委书记宋侃夫、市长刘惠农等出席大会。近两千名红卫兵代表举行“向党宣誓”仪式。宋侃夫讲话表示“支持和学习武汉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8月31日,武汉市十一所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集会,倡议建立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分部和纠察队。宋侃夫在集会上讲话,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组织起来,统一认识,统一行动²。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迟未能建立,1966年10月26日中学红卫兵举行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时,其总部仍称为“筹备总部”³。

武汉地区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各校三员、文革委员会主导下成立,

1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3页。

2 参见1966年9月1日武汉晚报。

3 参见1966年10月28日湖北日报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

负责人基本是干部子弟。他们拒绝持不同意见的学生，不管是不是“红五类”；拒绝非“红五类”的学生，不管其“政治表现”。华工附中红卫兵写了一篇文章，把共产党“重在表现”的政策，称作“资产阶级狗崽子的护身符”¹。红卫兵身着旧军装，佩戴红袖章，手执铜头武装带，满怀“彻底砸烂旧世界”的豪情。他们有意无意地置十六条等一系列文件指出的文革方向于不顾，把矛头指向校内的教师和“黑五类”同学，指向社会上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庭。他们被少数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称为“三字兵”。三字兵言行的暴烈程度，远远超过大专兵。

红卫兵在“维持治安”方面确是各级当权派得心应手的有力工具，这一点在9月“保卫省委”、10月抵制少数派“抢黑材料”的行动中充分体现出来。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厂的当权派不顾红卫兵本是青少年学生的组织这一事实，纷纷在本单位组织“干部红卫兵”、“工人红卫兵”，老百姓谑称“胡子红卫兵”。

顾建棠回忆：

1966年8月25日，“毛泽东思想长江工程大学八一阵线”的红卫兵在严常指挥下，由宋其波同学带领冲进长办大院，向长办党委和林一山造反。宋其波怒气冲天，把政治部办公桌上的玻璃板都敲破了。红卫兵小将的造反行动，确实吓坏了长办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当天晚上，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和副主任于亚农把我叫到老大楼一楼会议室。

丁、于两位主任都说，这是右派造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问题，我们一定要组织红卫兵反击。他们再来，我们就用红卫兵保卫大院，把他们顶回去。你赶快把团员和民兵中的骨干召集起来，今晚就把红卫兵组织起来。

我接受了任务，两位主任也应我的要求从保管室取来红布，交长办塑料厂缝制印字做袖章。第二天长办大院就出现了“干部红卫兵”，并分别把守大门和侧门。后来长江工大的红卫兵也来过，都被挡回去了。这恐怕是武汉市第一支、也可能是唯一的一支“干部保皇红卫兵”²。

李承弘回忆：武昌铸钢厂“成立了‘胡子红卫兵’，不限年龄，只讲

¹ 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撕毁资产阶级狗崽子的护身符——“重在表现”》（1966年10月）。

²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0页。

红五类。每人发一只红卫兵袖章，谁戴上了都身价百倍，神气十足。”¹

武钢修建部职工彭绍鹏回忆：“8月底，电修车间在工作组领导下，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成员，仍然是过去领导心中的红人，在宣布成立的会议上，下面的基层工人当场就哄起来，有几个转业军人也发出呛声，可工作组强行通过。当晚，这些红卫兵就神秘地参与了对公司的‘革命对象’抄家的‘革命行动’，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抄、抓的先例。”²

武汉味精厂保卫干部郭正仿回忆：厂党支部书记按照上级要求，“要我组织红卫兵，基本队伍是民兵。我任红卫兵头头，对那些不服管制的牛鬼蛇神，进行布控，避免破坏厂里安全生产，扰乱社会治安秩序”³。

在武汉地区，官方主导的主流红卫兵组织在8月的筹建过程中就为自己树立了对立面——少数派红卫兵，9月，他们直接把矛头指向少数派红卫兵——“一小撮”“阶级敌人”。

第二节 官方红卫兵的“破四旧”

武汉地区红卫兵8月中下旬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行动就是“破四旧”，“破四旧”结束于当年10月初，历时一个多月。

当时，各大中学校的少数派正在就工作组的方向路线问题与多数派激烈辩论，同时要求工作组在做检查、向错整的师生赔礼道歉后才能撤离。

8月20日，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22日新华社予以报道。报道说，红卫兵主要是宣传、帮助带有封、资、修色彩的商店字号更换名称，倡议改掉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向服务行业职工倡议，不理怪发型、不做奇装异服、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

8月22日，省委常委开会决定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⁴。武汉“市委常委会传达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重点讨论‘红卫兵’的建立问题。常委认为，‘对建立红卫兵组织要主动’；贯彻《十六条》不能怕乱，要准备乱它一、两个月。”⁵

1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59页。

2 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0页。

3 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三辑）》（2002年）第234页。

4 参见1966年8月24日武汉晚报。

5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3页。

22日、23日，张体学两次来到华农附中，“亲手将一面绣着‘红卫兵’三个大字的红旗，授给了‘红卫兵’。他亲切赞扬了小将们的革命首创精神和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¹。

武汉市的红卫兵“破四旧”是8月23日开始的。

就在这一天，华工少数派反对院文革委员会筹备大会主席团强行选举院文革临时委员会，退出会场，数百人徒步游行到省委抗议。

就在这一天，省委召开武汉地区红卫兵代表会，表示“省委对‘红卫兵’组织十分关怀”。一千八百名红卫兵代表“佩戴着鲜红的袖章，穿着当年父辈打江山的军装，英姿飒爽、气宇轩昂地进入会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文革小组组长许道琦主持会议，省委、省人委负责人张体学、李衍授、王树成、韩宁夫、史子荣、陈扶生等出席，他们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张体学讲话说“支持你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²。

1966年7月底以来中央一系列纠正文革方向的举措，使得各级当权派在与少数派的对峙中稍处下风，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各级当权派第一次在人民群众面前遭受挫折。建立红卫兵、由红卫兵去“破四旧”这一风潮，在中央报刊的大力宣介下突如其来，各级当权派大感兴奋，立即对此实施领导，大力支持。因为建立左派队伍，依靠左派矛头向下整群众，反复整社会上的“五类分子”，破除群众身上的“四旧”，是新中国建立十七年以来包括文革“五十天”中当权派的一贯行为模式。当下又得以通过多数派红卫兵来继续这一模式。王光照回忆：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传到武汉锅炉厂，多数派“做了一篇篇文章，竭力鼓吹，矛头指向少数派，顽固地维护工作队所推行的那套错误路线，耸人听闻地编造厂里‘五类分子的孝子贤孙们’乘运动之机反攻倒算，声称必须迎头痛击，呼吁人们警惕一小撮坏人闹事”³。

王力在他的回忆录里列举大量例子证实“破四旧不是毛主席的思想”⁴。戚本禹说：红卫兵刚上街“破四旧”时，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破四旧”演变为打人、杀人、抄家、没收私人财产、驱离“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是叶剑英领头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

1 参见1966年8月25日武汉晚报。

2 参见1966年8月24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

3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2页。

4 参见《王力反思录》第423—424页，北星出版社2008年版

任重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与中央文革无关，“毛主席更是不知道”¹。

少数派其时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他们不明白的是，在学校工作组撤离并被清算、少数派开始抬头并建立队伍、文革运动正在回到毛泽东既定方向之际，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破四旧”运动？工作组还要不要批判？

“右派”学生还要不要平反？那个被红卫兵当作思想武器的“血统论”，本身就是封建主义的“四旧”，连资产阶级都不会赞成，为什么得以大肆宣传？为什么很多当权派把谭力夫的讲话及他的大字报《从对联谈起》视同中央首长指示传达贯彻？

红卫兵热火朝天地“破四旧”，少数派依然在批判工作组，发展队伍。在武汉锅炉厂，当时就有少数派指出多数派热衷的“破四旧”是“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王光照回忆：“工作队、厂党委的一些铁血卫士们也没置身事外，他们也‘革命行动’了一回。在破四旧的高潮中，他们忙得满头大汗，把厂接待室的沙发、茶几、茶具、地毯搬到厂前广场示众了一番，煞有介事地严正指出：这是党委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表现，必须集中力量批判。这种小骂大帮忙的‘小儿科’，理所当然地遭到厂里少数派的讥评：放横炮，转移斗争大方向，是新花样的献媚。你们如果真的要革命，就认真揭一揭划左、中、右，整群众黑材料的内幕。少数派用大字报劝告李岩等宣传部的那些刀笔师爷：革命的欢迎，不革命的滚蛋！”²

改换带有“封、资、修”色彩的街道名、店铺名这一类“破四旧”活动，少数派也希望参加，但活动由三字兵、大专兵主导，带着“右派”帽子的、出身不好的学生是不允许参加的，被允许参加的也只能给红卫兵的行为助威壮声势。

武汉地区中学红卫兵得到北京传来的消息，23日清晨上街“破四旧”，主要是更换一些店铺名称。据湖北日报社《内部参考》1966年第471期报道：“红卫兵们在八月二十三日一清早出发，就在街上大扫‘四旧’，把一些商店的老招牌改掉，什么冠生园、老通城、汪玉霞、新香港……都重新改换了新招牌。到了下午一时许，武汉革命群众在裕华大厦（裕华大厦是解放前大资本家建的七层大楼，现在二楼以上为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租用，走侧门；一楼是公私合营的裕华纱厂用，正门被原几个资本家盘踞着。）

¹ 参见《戚本禹回忆录》第474—475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版。

²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8页。



1966年8月23日，武汉一中红卫兵先上街破四旧（载《大武汉新影》）

贴出了赶走资本家霸占裕华大厦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上写着打倒狗资本家，让省市党报走正门。”

这一段文字记述的是23日汉口“破四旧”的情况。汉口“破四旧”以武汉一中红卫兵为主，武昌和汉阳分别以省实验中学和武汉三中的红卫兵带头。

《内部参考》这篇报道还详细介绍了一中红卫兵带领数百学生到裕华大厦“破四旧”的过程。参与其事的一中学生目睹的一些情节，《内部参考》没有报道：裕华大厦正门外有一道网状钢筋门，被几十名红卫兵摇垮，冲进大厅后一顿乱砸，一盏巨大的豪华吊灯用木棍打得粉碎；几位裕华纱厂董事被戴上高帽，押到大门前台阶上批斗。当时传说是湖北日报社的人打电话请一中红卫兵去的。

当天一中红卫兵将裕华大厦改名“红旗大楼”，此后武汉文革中的很

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红旗大楼。

8月25日武汉晚报刊登报道《“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职工并肩战斗汇成锐不可挡的革命洪流 发扬革命造反精神 大破“四旧” 大立“四新”》。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武汉红卫兵首日“破四旧”的方式似乎一样，先是给店铺送大字报，再与职工商量易名，最后换上新的招牌。许多店铺易名都是单位职工自发进行的，“谦祥益绸布店”、“汪玉霞食品厂”就是本单位职工自己改名为“工农兵百货商店”和“向阳食品厂”的。

23日这一天，刚开始的“破四旧”中出现一件影响颇大的暴烈行动，不是出自红卫兵之手。长江航运管理局机关104名干部、群众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游街示众¹。长航职工沙云乐说：这个举动是长航党委书记贺崇陞、政治部主任李震宇为首的当权派亲自策划的。沙云乐认为，“破四旧”中武汉搞“牛鬼蛇神游街”，就是长航带头搞起来的²。

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人胡国基正好在六渡桥看到长航的这次游街：

见三民路铜人像那边过来一队人马，扯着白布黑字的横幅，上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群青年男女押着一些老头子、老太婆，中间也夹有俊男靓女，每人胸前挂一个大黑牌，黑牌上的名字都打上叉叉，其中还有不少挂的是用铁板做的大黑牌，这种铁制的大黑牌都是用铁丝串着的，挂在颈脖子上如同受斩刑一样。受虐者有的扮着白无常，有的扮着黑无常，有的拿着引路幡、招魂棒，有的反穿皮袄，有的颈脖子上还加挂着高跟皮鞋。大多数人，不分男女老少打着赤脚，手里拿着破锣破鼓，边敲打边高喊：我是牛鬼蛇神。受虐者们光着脚丫，艰难地走在下午两点钟左右被太阳晒得滚烫已近融化的柏油马路上³。

武汉市委对“破四旧”反应极快，大力支持。25日湖北日报报道，“中共武汉市委、市人委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表示最热烈、最坚决的支持”，决定“将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色彩的街道、学校、工厂和商店名称，更换为有政治意义、革命意义的名称”，包括一批街道，学校28所，工厂53个，一商业局所属商店118个。25日，正在进行的武汉市委全委扩大会“因为‘文革’运动的猛烈发展决定休会。市委负责人指出：‘这两天新高潮确实出现了’，‘要教育干部认识这是正常秩序’，‘根

1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4页。

2 参见2003年5月田力为访谈沙云乐的记录。

3 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年）。



1966年8月24日，汉口“盛锡福帽厂”换上“人民制帽厂”新招牌（载《大武汉新影》）本问题还是敢字当头，打破常规”¹。

25日武汉市委召开全市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宋侃夫在会上说：“武汉市剥削阶级留下来的‘四旧’，这几天都在烧，我们‘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这就是我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这个精神好得很。”²

据当时的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报道，“破四旧”开始后，省市领导人频繁地到大中学校“参加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集会、座谈等活动”，“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行动”，张体学23日一天内去了水院、湖北艺术学院、华农附中三所学校，武汉市委将正在举

1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4页。

2 1966年8月26日武汉晚报。

行的全委扩大会停了下来，这是文革开始以来没有的现象。

8月26日，省委发出《誓做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致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学生的一封信》。

改了店铺、学校、街道名后，红卫兵开始对街头行人“破四旧”。他们用体操棒、竹竿拦下穿着喇叭裤、瘦腿裤，发型为大背头、电烫头、长辫子的行人，将裤腿剪破，头发剪乱。王光照目睹：“有一天，我在汉口闹市区工艺大楼也看到一幕破四旧的活剧。走着走着，忽然一群英姿飒爽的红卫兵来了，男同学用长长的竹篙拦截路人，女学生手握剪刀，见过路的女同胞发型属‘资产阶级情调’，不容分说，上去一剪刀，保准让人家‘焕然一新’。女同胞的服装稍不合红卫兵小将的意，又是一剪刀，搞得你怪模怪样，只有赶紧逃之夭夭。”¹

街头“破四旧”的另一个成果是“红海洋”。当时在市委机关工作的魏绳武回忆：“宋侃夫亲自指示各区、各战线、各部门大搞‘红海洋’，……全市街头巷尾到处用红油漆涂墙，刷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大标语”²。9月29日武汉晚报以《我市面貌焕然一新喜迎国庆》为题报道：武汉“到处是红色海洋”，“横扫‘四旧’的烈火，燃遍了三镇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散发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臭气的招牌、字号、街道名称，统统都化成了灰烬。广大革命群众挥动红笔，写上了富有强烈时代精神的新招牌和新街名、革命标语和毛主席语录。”

武汉地区“破四旧”中，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打、砸、抢、抄、抓，这是从北京红卫兵那里学来的。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王任重，是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幕后推动者之一。“王任重还把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些通告、通令等宣传品寄回武汉来，要省市翻印张贴，但又嘱咐‘不要落下款’‘不要注明是怎样来的’”³

“破四旧”从街头随之进入市民家庭，除了红卫兵外，各单位的“左派”、“积极分子”也投入抄家活动，“查抄地、富、反、坏、右和所谓资产阶级分子及‘学术权威’的家，随后又把查抄的对象扩展到工商业者、

1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8页。

2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24页。

3 毛泽东思想市委办公厅红旗纵队《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侃夫镇压、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载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三）》（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第3页。

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文化艺术教育界知名人士”¹。抄家后，在其家门口开批斗会。抄家对象，有红卫兵自己知晓的，有通过派出所、街道办、居委会了解的，有派出所、街道办、居委会主动提供的，有“革命群众”向红卫兵举报的。

一中很多学生目睹：该校红卫兵根据户籍民警和居委会介绍，将学校附近永康里的一女性资本家拉出游街、批斗后殴打致死，并在其家门口开批判会，强迫其未成年的女儿发言批判刚被打死的母亲。二十中一位“女红卫兵，在批斗一位中年反革命家属时，其邻居揭发她想变天确凿证词后，义愤填膺，将火炉上一大锅她看起来温度不很高——因为天太热，其实是要开的烫水，当头倾泼，致其死亡。这是武汉市文革批斗中的第一死者，当晚，武汉市委管文教的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副市长来学校，在肯定红卫兵大方向的同时，示意我们就此打住，且尽量不传消息”²。武钢职工彭绍鹏回忆：“厂前肖家湾街上和记饭店的老板，在蒋家墩游街时，在烈日的暴晒下，死在青山新华书店门前的大马路上，尸首抛在铁路边无人敢收。修建部的罗工程师被批斗、抄家后，夜晚在蒋家墩火车站卧轨自杀，死后还扎一个标上他姓名的稻草人进行批斗。一些出身不好、跟随子女生活的老人，被勒令赶出家门。”³胡国基在他的回忆录《幸存者说》里记述了“破四旧”中三个人的自杀：胡国基的邻居、著名汉剧演员胡桂林在遭受批斗、抄家后，从江汉桥上跳入汉江身亡，不久其妻王霞君去世。胡国基在六渡桥百货公司三楼，亲眼看到一中年男子从工作组办公室冲出来跳楼自杀，在他的尸体旁，工作组的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胡国基的老师、市美术设计公司高级设计师陈冠真不能忍受批斗，深夜用剪刀剪断气管自杀，遗书说自己“没有反革命，是拥护革命的”⁴。一中六七届初中生冯世礼回忆：他的叔爷爷个人成分是“独立劳动者”，有人举报他家藏有大量银元，叔爷爷所在工厂和居委会一帮人前来抄家，撬开地板也没挖出来，却把楼上冯世礼家值钱的东西抄走，还将65岁的叔爷爷架到高凳上批斗。

胡国基在江汉区满春卫生院看到：一些医生胸前别着长方形黑色符号，

1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1978）》第501—502页。

2 黄启栋《忏悔的沉重——武汉二十中早期红卫兵的坦白》（网文，2014年）。黄为二十中六七届高中生，该校红卫兵副总指挥。

3 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0页。

4 参见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年）。

黑布上写着白字：我是牛鬼蛇神、地主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贪污犯）×××。从卫生院出来，沿途看到很多店铺里都有人戴着这种黑色符号。回到厂里，他发现也有人戴上了黑色符号¹。

武汉地区的宗教场所及宗教职业人员也遭受剧烈冲击：

武汉地区著名道教寺院长春观、始建于南齐的洪山宝通寺、被誉为全国佛教最高学府的莲花（溪）寺、国内闻名仿缅甸“阿难陀”的古德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卓刀泉大殿、上海路天主教堂、基督教荣光堂、汉口救世堂、武汉生命堂、汉阳显正街天主堂、武昌花园山天主堂等或遭破坏或被占用，各殿宇神像神龛被砸碎，古迹古址被损毁，经典古书被焚烧。宗教职业人员被当作“牛鬼蛇神”或勒令还俗，或集中“改造”；政府宗教工作机构被视为“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而撤销，全市七大宗教团体工作全部停顿，宗教活动全部停止。在这场灾难中，仅汉阳归元寺因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部队保护才得以幸免²。

吴恒春回忆：莲溪寺是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去砸的。武汉体育学院六三级学生赵子强回忆：黎元洪墓碑是体院红卫兵砸毁的。武汉大学九一二红卫兵“大闹武昌花园山天主堂”，“冲开铁门”，“把反动的经书等搬出来，丢在街头”；同时“还向反革命的‘宝通禅寺’发动猛攻，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³。首先冲进上海路天主教堂的是二十中红卫兵，黄启栋回忆：红卫兵“推倒神座，扯下帷幕，砸毁用于礼拜的器物。抓来神父修士，驱逐他们到烈日暴晒的广场下跪，在他们面前点起火堆，焚烧圣经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文案，其中还有新近加入教会的人员名单”。

在学校里，教师遭受了继文革“五十天”后的第二次冲击。这一次冲击，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痛苦。

在武汉一中，红卫兵将个人历史有污点的、出身特别不好的教师集中关押，手执操棒日夜看守。被关押的教师被勒令给自己改名字，如“刘有罪”“杨坏蛋”之类，很多人被剪成“阴阳头”。早上集合要唱“牛鬼蛇神歌”，然后监督劳动。一位叶姓女教师被揭发有“生活作风问题”，愤而撞电车自杀（未遂）。

武汉二十八中六七届高中生刘中秋回忆：

1 参见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年）。

2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1978）》第501页。

3 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串连部《武汉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介》（1966年8月29日）。

八月二十三号下午，……有些班的学生把那些被工作组判定有问题的老师押着在校内游走，边走边喊口号。……初三（三）班的一群学生拎着一个女老师的四肢，吆喝着把她抬进本班教室。我问那些师弟师妹，这个女的怎么了。师弟妹们气呼呼地七嘴八舌：“看样子，她是昏过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我看，她那是装死！”“等她醒了，再游！”

高二（二）班的学生把正在教室里做清洁的彭老师推出来，按着跪下，还把一个又破又脏的字纸篓扣在他头上。彭老师不声不响，高举双手做投降的样子。有几个本班和外班的学生冲上去就是一顿老拳，打头打背打胸脯。彭老师躲避不了，只能发出哼哼声。

我班是高二（一）班，自然“不甘落后”，准备把舒先生拉出去游街。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到齐了。八点钟左右，郑某把正在劳动的舒先生叫来，庄严地向他宣告：鉴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高二（一）班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把他拉到社会上进行批判。舒先生脸色惨白，浑身颤抖，看了看周围面若冰霜的学生，一言未发，就低下了头。有人拿来一个字纸篓扣在舒先生头上，又用一根麻绳系住字纸篓，接着把绳子两头交叉从面部到耳下绕到脑后，系了一个结，又绕到脖子前面，打了个结，绳子多余部分由押解的人牵着。

队伍出了校门，四个同学拿着木棒分走两旁。一路上，张某领喊口号，同学们尽力跟着喊，行人或看或跟着走，有人还询问游街的是什么人、犯了什么事，还有个别人冲进队伍里给舒先生一巴掌。押解的人有时制止，有时又没制止。

很快就到了舒先生的家。邻居们和其他人都来围观，指指点点、唧唧喳喳。舒先生站在一张条凳上。有同学向围观的人们揭发他的“罪行”。……郑某、张某带一些同学进到他家去，有人把他妈押解出来，也推到一张条凳上站着。他母子二人被勒令脱掉袜子，但不许抬头。他母子顺从地照办。有的同学把舒先生的一些有问题的书——线装书和页面发黄的书——搬出来堆在马路上，张某划着火柴把书烧掉。然后，赵某、张某带着队伍走了。

这时，已经是中午了。那天也真怪，热得出奇，太阳光像毒蛇信子一样狂舔着人们，舔得人皮肤阵阵生疼；空气滚烫，热得人汗流浹背，挥汗如雨；柏油地面被晒得几乎要冒火，穿着胶底凉鞋也能感觉得到那股难以忍受的灼热。舒先生光着脚板走路，却毫无感觉似的。我想他一定很疼，

因为他一直紧咬着下嘴唇。

在江汉路亨达利钟表店附近，马路边围观者当中有一个人递给郑某一件金黄色衣服。郑某抖开一看，原来是道士穿的长袍，大笑起来，又绷着脸叫舒先生穿上。舒先生犹豫了一下，但是看见周围的人们都在呵斥他，就顺从地接过道袍，急忙穿在身上。围观者笑声一片，郑某、张某和同学们都大笑不止。我笑得直拍手、直跺脚。

下午一、两点钟，这次“游街”才结束¹。

在武汉一中，有的班级的红卫兵挥舞着铜头皮带，强迫“黑五类”同学承认自己是“狗崽子”，要他们成立“家庭出身背叛小组”，集中学习，不准参加活动。

“破四旧”高潮时，大中学校学生中兴起“改名字”风。时任武汉一中文革委员会副主任的阎顺利2016年说：“现在六七十岁的人中，凡名为卫红、卫东、向红、向东、红兵、红卫、继红、爱军的，十有八九是那个时候改的名字。”改名是自愿的事，很多学生没有改。但红卫兵觉得“黑五类”同学的名字有“反动意义”，就会强迫他们改。一中一位同学名“传后”，一红卫兵头头对他说：你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你老子还想传给后代？那位同学只得改名。

大学红卫兵的“破四旧”基本在校内进行。

武汉医学院的红卫兵一成立，就“锐利迅速地投入捣毁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们的老巢的战斗中去”。所谓“老巢”，是指学院老教授们居住的“六区”。“全院一千余名红卫兵，对准目标，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别来到一些反动学术权威的家中”。抄家后，红卫兵“办起了‘横扫四旧’辉煌战绩展览馆，把从反动学术权威们家中抄出的部分实物展出示众”²。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红卫兵在院文革领导下，于8月27日至29日，在学校内“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家和揪斗活动”。红卫兵押着一位教授游街，强迫他一边打锣一边喊“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是草包黑帮教授”。给他的妻子身上泼浆糊，贴上标语，挂上“地主婆”牌子，一起游街。“抄来的物品，堆放在行政大楼三楼会议室办展览，组织参观，一方面让大家

¹ 刘中秋《1966年6月、8月批斗老师》（网文，2011年）。

² 参见武医通讯组《直捣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巢——武汉医学院红卫兵小将造反纪实》，载1966年9月11日湖北日报。

受教育，另一方面展示他们破四旧的成果。”¹

8月底开始直到9月，“破四旧”还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在北京南下武汉的学生发动下，武汉地区少数派喊着“炮轰省委”的口号，与省市市委直接交锋，就“血统论”、“怀疑一切”、“炮轰省委”等问题，与多数派展开了同样轰轰烈烈的辩论。

省市市委在遭到少数派猛烈“炮轰”、忙于应对的情势下，还不愿意停止“破四旧”。“9月20日武汉市中等以上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红卫兵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中共武汉市委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提出：‘各校革命师生，当前应把主要精力用于搞好本校的斗批改；社会上的破四旧，还要深入发展’”²。

9月25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发出《关于继续彻底横扫“四旧”的通令》。“通令”命令：“掀起横扫‘四旧’的新高潮，把‘四旧’坚决、彻底、全部横扫干净。”“把一切大大小小的寺院、教堂、庙宇、修女院重新来一个大扫荡，大清洗。”“一切牛鬼蛇神巢穴里的‘四旧’必须彻底清除干净。”“重新检查全市各街、各巷，把一切旧的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彻底清洗。”



“通令”还说：“不属于牛鬼蛇神之类的民主人士应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许抄国家机关、机密机关、军事机关、外国驻华机构、华侨机构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商店、餐馆。不干涉外宾、华侨的衣着、风俗习惯以及爱好。不许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家。”“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

1 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99页。

2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4页。

大专兵的这个“通令”表明其“破四旧”行动的暴烈程度有所收敛，这与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直接相关。社论说：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中学红卫兵汉口分部总指挥、一中六六届高中生李克明回忆：“那时我在德明饭店见到邓垦、谢滋群、辛甫等市领导，他们对我说，要讲政策。”

但这个“通令”没有说：“属于牛鬼蛇神之类”的人，他们的人身安全能不能保证，他们的家可不可以抄；不是外宾、华侨的民众，其“衣着、风俗习惯以及爱好”可不可以干涉。

8月底9月初，大专兵、三字兵在省市党委领导下，开始承担“抓南下一小撮”以“保卫省委”的重大任务，9月底，“破四旧”大潮已在消退。10月15日，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10月26日，在少数派学生的全市性组织二司成立的同一天，武汉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筹备总部所属三千多名红卫兵，在汉口合作路体育场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不整走资派整群众，“破四旧”的主力三字兵开始批判资反路线，说明矛头向下的“破四旧”运动正式终结。

1983年7月28日，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室、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武汉市有20100户被抄家或被迫交出财物，价值2200多万元（包括金银、存款、图书、文物、字画和珠宝等）。在此之前，根据中央处理查抄财物的有关规定，已清退价值2000多万元。本年底以前完成全部清退任务¹。

这个“通知”所言“完成全部清退任务”是一个至今没有完成的任务。据笔者收集到的材料，很多人的很多被抄财物至今未能清退，比如上文提到的冯世礼家的金耳环，二十八中舒老师被抄走的名贵字画，还有水院张如屏院长被抄走的猎枪，理由都是“找不到了”。

官方公布的武汉地区红卫兵抄家、揪斗“成果”如下：

据事后不完全统计，红卫兵在武汉共查抄21000家，抄出黄金1110斤，

¹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429页。

白银1800斤，银元267000余块，现金与存款440万元。乱查抄、乱揪斗中计发生自杀案件112起，死亡62人，游斗折磨致死的32人¹。

“破四旧”中被打死的人是否得到抚恤，公开的资料里查不到；打人致死的老红卫兵无一被追究，则是可以肯定的。

红卫兵“破四旧”还有一项为上述官方统计所遗漏的重大“成果”，就是大量居民私有的自用房、经租房被逼“交公”，致使文革后当局花费巨额人力财力来解决这个所谓“文革产”问题。官方资料显示，全市在文革期间无偿接管的私房达1.77万户²。

“破四旧”高潮中，武昌区房地局的职工“红卫兵”发出一个“通令”：

武昌房地红卫兵通令

我们是红卫兵，我们察觉你们——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反动政权的军政要员在土地、房产问题上采取各种手段，把土地、房产掠为己有，拒不交公。你们利用种种手段，占据大量房屋，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在旧社会骑在人民头上，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解放后，你们的反动气焰虽有收敛，但是你们的反动本质丝毫没有改变，朝思暮想复辟资本主义。

今天，我们全体红卫兵要造你们的反，要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为此，我们通令：

1. 城市所有的土地立即收归国有，限期3天内你们要老老实实向当地政府交出土地所有证。另外，凡不属于以上7类人员的土地所有者也应积极主动地将土地交归国有。

2. 私房改造业主：你们过去利用房产剥削人民，现在还继续拿定息剥削人民，这是人民的血汗，我们决不允许你们再继续剥削人民，限定你们在9月5日以前向当地房地部门交出领息证。

3. 私房改造业主的留用房和凡出租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私房应立即交还人民，你们这种剥削行为再不允许继续下去。

4. 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反动政权的军政要员，你们现在住的房子很宽，你们过去剥削、压迫人民享乐腐化，现在还想享受住宽房、住好房，我们要革你们的命，你们要老实地请求劳动人民去审查你们的住房，把多余的住房立即退出，听候我们处理，否则我们要强

1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4页。

2 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302页。

制执行。你们还有的自己住公房，非法把私房高价出租。限定在9月10日前退出公房，否则严加惩办。

以上4点通令，只准照办不准违抗。

我们呼吁全市红卫兵同志们和革命的人民配合我们向这些牛鬼蛇神进行无情的斗争，监督他们执行。让我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这些牛鬼蛇神统统埋葬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武昌房地红卫兵

1966年9月3日¹

曹承义家“在旧社会做了一栋私房用来自住和依赖房租为生”，他回忆：这个“通令”发出后，“武昌区武珞路房管所和所在的居民委员会的‘革命群众’开展联合行动，到我家将我母亲揪斗，站高条凳，戴高帽，挂黑牌，然后沿街游斗。我祖母受到惊吓、羞辱，当即中风瘫倒在地，从此就永远瘫痪在床。这年9月，我家房屋被武昌房地红卫兵抢占，挂上房管所的牌子。民房成了‘政府’办公楼。强占我家院内菜地，不准种菜，建成二层楼房，卖给市外一矿山。”²

市民拥有私房土地的所有权，获得经租房的月息，是当时法律赋予的权利。“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1982年宪法才有的规定。曹承义说：一个群众组织以自己的“通令”行使国家宪法才具有的权力，这才是真正的“无法无天”。

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武汉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2015年这样评价“破四旧”：

红卫兵“破四旧”之所以造成那么多社会悲剧的深层原因，还是得从当时的路线斗争中找。1966年7月下旬，文革派与反文革派斗争的这一个

¹ 载 www.difangwenge.org。

² 曹承义《武昌城外的小屋》（自印本，2015年）第27页。

回合，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刘邓承担派工作组责任而结束。接踵而至的红卫兵“破四旧”，正值学校工作组撤离并被清算、文革运动重回毛泽东矛头向上、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轨道的时候。如此巧合，绝非偶然。当年红卫兵“破四旧”，矛头向下，对准的是广大基层群众，这就完全背离了文革的方向。所以，我始终认为：红卫兵“破四旧”不是文革运动，而是对文革的反动¹。

¹ 2015年11月杜先荣访谈吴焱金的记录。

第四章 “揪南下一小撮”

“南下一小撮”指1966年8月底提出“炮轰湖北省委”的南下武汉串连的学生。这一提法在大专兵、三字兵、各单位文革委员会的宣传品中频繁出现，省委一般称为“南下串连学生中的极少数”。

第一节 “炮轰湖北省委”

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自发开始到全国各地串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全国各城市之间的学生串连也随之开始。虽然没有公开宣布，铁道部门已经允许学生无票乘车。

8月中旬开始，一批批以北京大学生为主的外地大中学校学生来到武汉，到各校串连。很多人感觉，与北京热火朝天的文革形势相比较，湖北省委领导下的文革运动“冷冷清清”，少数派仍然受到高压；“五十天”里被整的群众非但得不到平反，反而继续被整。外地学生在校园里只要发表一点不同意见，就会遭到围攻。

吴恒春回忆：8月下旬，五位外地学生被武大学生围住，辩论了一整天。武大学生换班去吃饭，外地学生不认输不准吃饭喝水，不准离开。“这一次对南下学生围攻事件，据事后所知，实际上是武汉大学工作组有意的安排，是旨在动用各系的所谓左派力量把南下学生逼走的一步棋。当时出面作为辩论主力的就是分配到我们几个班的政治辅导员们”¹。

北京学生不能容忍武汉的这种气氛，包括他们中间的一些多数派，比如不久后在湖北人人皆知的中国人民大学五年级学生赵桂林，他在自己学校是保党委书记郭影秋的。

南下学生于是提出“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杨闯回忆：“他们来（湖大）后，带来了北京的信息，并贴出大标语，‘架起24门大炮炮轰湖北省委’，并组织辩论会，辩论湖北省……镇压了革命政治运动，湖北大学六二〇事

¹ 参见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

件是镇压革命运动的典型事件。”¹

“炮轰省委”这一口号在武汉市乃至全省引起巨大震动，包括少数派。此前少数派去省委，即使聚众前往，都是反映情况，诉说本单位党组织、工作组违反中央精神整群众的行为，希望省委予以纠正。少数派知道高校工作组都是省委直接派出的，其作为都是执行省委指示，但没有将矛头指向省委。“炮轰省委”的口号引发他们积蓄已久的情绪，他们坚决和南下学生站在一起，与省委抗争。

湖北省委的反应迅速而激烈，省委频繁地召开常委会、各校左派会、群众大会，领导人全部出动，频繁地出入各高校，破例向全省发表广播讲话。在此期间，省委的行为方式多有不妥，如同张体学1968年1月在致中央的“书面检查”中所言：“当北京南下同学冲击湖北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恼羞成怒，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对他们进行刁难、分化、诬蔑、打击、围攻，同时大肆制造舆论，进行恶意中伤”。

南下学生没有想到，“炮轰省委”这个口号会遭到湖北省从省委到群众如此剧烈的反对。少数派“炮轰”某个省部级机构的情况在北京并不少见。毛主席号召“炮打司令部”，炮打一下湖北省委有什么不可以²？8月23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千余人在地质部请愿，要求工作队回校检讨，静坐绝食一昼夜获得满意的答复。25日，北航红旗战斗队对本校工作队的派出机构国防科委28昼夜的围困开始。这些行动仅受到中学红卫兵的干扰，有关当局并没有发动群众实行大规模的围攻。

“揪南下一小撮”从张体学抓的“点”湖北大学发动，张体学亲自部署。这与南下学生多聚集在市中心的湖大有关。叶传发回忆：“当时，我们北京的南下学生在武汉各大专院校都设有联络站。因为人数少，大家要求抱团对付省委，这就自然而然地以交通最为方便、又是湖北省委的联系点的湖北大学作为南下学生的联络中心。大约在8月25日，我们推举成立了以人大的学生赵桂林、傅军胜，北京大学的姓林的一位女生为牵头人的‘北京南下串连中心联络站’，地点就设在湖北大学31号楼。”³8月30日，住在湖大的外地学生达一千四百多人。有学生向湖大校文革提出“不受限

1 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10页。

2 参见2015年7月杜先荣访谈叶传发的记录。叶传发为北京航空学院六三级学生，北京南下串连中心联络站第二任负责人。

3 2015年7月杜先荣访谈叶传发的记录。

制地到同学中去自由串连”“设立自由讲坛”等要求，散布“运动的过程中不能划左派”“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本单位，就是狭隘的地方主义”“不要打死老虎，要收集省、部和中央的材料，要搞上面的大家伙”“文化革命委员会只能代表一部分人，……可以不要他们领导”“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是武汉地区的两面红旗，我们要坚决拔掉它”等观点，这是校文革和多数派绝对不能接受的¹。

8月底开始，湖大校园内，关于武汉地区前一段运动的评价、关于湖北省委的文革方向、关于阶级路线和“怀疑一切”口号，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大字报栏，到处都是围成一圈圈的人在激烈辩论。晚上，大字报栏前亮起电灯，贴大字报、看大字报、辩论夜以继日地进行。遍布三镇的“揪南下一小撮”宣传引得市民下班后一批批涌进湖大，看大字报，听辩论。与6月中旬的武大不同，湖大自发地成为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中心。很多工人在湖大下定造反的决心，他们后来把湖大称为“工人造反派的摇篮”。

胡国基当时被厂工作组定为“极右分子”，他的材料记入“敌情通报”上送市委，准备逮捕。他在回忆录中写下他对1966年9月的湖北大学的记忆：“在大字报的海洋里，我看了正反双方辩论的文章，如梅子惠、贾培培、张维荣、龙铭鑫、任重、张兵等等……我都一丝不苟地留意着”。“湖北大学使我在人生的十字街头看到了希望”，“湖北大学就像入了另册的边缘民众的心脏”，“在黑暗的恐怖中，她光芒四射，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清华大学毕业生、车间技术员、共产党员沈复礼后来成为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的常委，他是在湖大、在关于“南下一小撮”的大辩论中走上造反之路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9月4日发表广播讲话后几天，武汉锅炉厂沈复礼、李洪荣、杨逢春、王庆庭4人在湖大贴出大字报《我们的看法》说：湖北大学大部分同学所围攻的，绝非是南下串连队的一小撮，而是南下串连队的大部，请同学们深思；第二，炮轰省委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保卫省委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第三，张体学同志和王树成同志的讲话是“想堵住群众的嘴”。南下串连中心联络站把这张大字报称为“工人的声音”，予以转抄、印成传单。这张来自职工的支持“南下一小撮”的大字报影响很大，立即遭到来自湖大校内外的大学

¹ 参见湖北大学政治系革命师生李甫远等76人《呼吁书》（1966年8月30日）。

报批判。武汉锅炉厂40名职工写出传单《武汉锅炉厂工人的声音——驳沈复礼等人的错误言论》说：“决不允许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炮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湖北省委。”武锅办公大楼挂出巨幅标语：“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沈复礼”。

南下造反学生视高高在上的省市委如无物，毫不畏惧地与本地大人物对话，令本地少数派大开眼界。李承弘回忆：他去市委，看到北航红旗的徐鹏飞等几人正与宋侃夫争论，情急之下徐鹏飞随口带出一句“他妈的”。“市委工作人员一下炸了锅，自认为抓住了徐的命门，纷纷围着徐责问徐为什么骂人。开始徐也没话好说，但市委的人不依不饶，徐被逼急了，突然腾空而起，一下子跳在办公室桌上，大声喊道：我骂了他怎么样？我骂了‘他妈的’又怎么样？宋侃夫顿时脸上气得发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市委的人也一下给镇住了。武汉解放十几年了，谁见过听过有人敢在市委办公室跳在桌上大骂市委的第一书记？真是翻了天，所以空气一下凝住了。徐此刻还不见好就收，赶快找台阶下，反而继续斥骂：你十几年做官当老爷，运动中你执行资反路线整了多少人？关了多少学生？整了多少小将？你罪大恶极，我骂你几句‘他妈的’有什么了不起？徐鹏飞骂得好，这几句话说得太痛快了，到底是北京来的革命小将，造反精神就是足，天不怕地不怕，难怪各地省市委都怕他们三分呢。特别对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西军电（临委会）三家，当权派更如老鼠见了猫一样害怕。”“徐鹏飞的举动对我影响很大，起到了示范作用，我再也不是以惧怕心理对待省市领导，而是以真正主人翁、领导阶级的身份对待这些人民‘公仆’。”¹

第二节 “把他们赶出湖北”

8月26日，张体学在省委书记碰头会上说：湖北大学现在有好几个大学的学生来这里串联，……追“六·二〇”事件。我对漆林讲，准备革命委员会被推翻。武大、湖大可能重新搞翻的，内因外因在一起，准备它翻，告诉革命委员会，第一，准备下台；第二，热情接待；第三，要你办什么，满腔热情开会答复，要北上就北上，要南下就南下，兵对兵，将对将，……。武大再翻一下才好，哪个学校越闹得凶应该越高兴，有这个思想就好办了。从工学院的情况证明，我们完全有群众基础，证明学生完全相信我们省委

¹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65—166页。

是革命的。省委的同志都到各大专院校去开会讲话，我们高姿态，就不会失败的。

两天以后，张体学放下“高姿态”，决定把提出炮轰省委的南下学生“赶出湖北”。湖大六三级学生、校文革临委会委员龙铭鑫回忆：“8月28日上午，我们学校的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在东湖客舍召开全体委员会。张体学参加会议并接见了湖大的校文革委员。这个会议主要任务是布置在湖大召开的湖大师生和南下串联学生的辩论会。张体学说，今天晚上的辩论会很重要，要把他们（指提出炮轰省委的南下串连的学生）赶出湖北。正在参加省三级干部会的干部都参加这个辩论会，不能透露，否则开除党籍。”¹两个多月后湖大文革临委会副主任钱运录的大会讲话证实龙铭鑫所言：“大会前，我们是有准备的，我们不看南下串联同学的主流，抓住一点，否定全面，组织与他们辩论。想通过这次会给南下串联同学当头一棒，赶他们出校。这次大会的召开，省委是知道的，他们不但没有制止，而且当我们邀请当时正在省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出席大会时，省委负责同志立即答应了。”²

8月28日晚在湖大举行的辩论会由漆林主持，有准备的湖大左派轮番发言，临时接到通知的南下学生一发言，台下就起哄。南下学生不满辩论会变成单方面的声讨会，提前退出会场。

湖大毛泽东主义战斗队1966年9月14日的大字报《漆林为什么能青云直上？》写到八二八辩论会的影响：

这次会给今后的整个运动定了方向和调子，全部精力投入了对“一小撮”的斗争中，寂静的湖大沸腾了，到处可见我校同学围攻外校同学的场面，只要哪一个同学的观点和我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观点不同，马上就有人围上来了……只要看见哪一张大字报和我校文革的观点不同，围攻的大字报就像雪片似的飞了出来，什么“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狗崽子”、“乌龟王八蛋”、“混蛋”等等，弄得不可收拾，除此之外，大开宣传“机器”，大骂“一小撮混蛋”³！

湖北大学2153人31日发出《紧急呼吁》，谴责南下学生中“一小撮

1 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龙铭鑫的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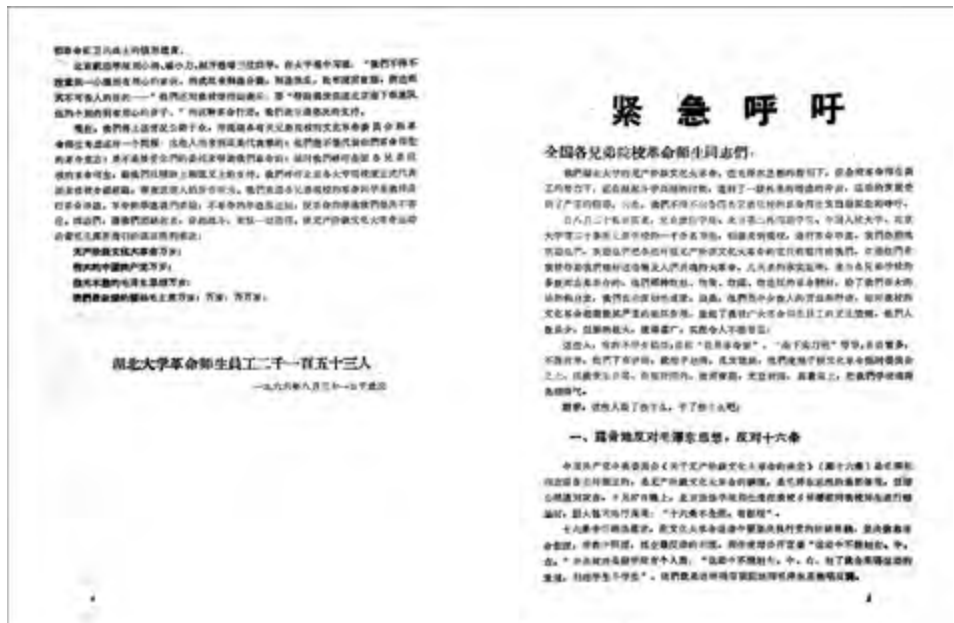
2 1966年11月上旬《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3 杨闻《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6—27页。

别有用心的家伙”。这个影响很大、成为“揪南下一小撮”先声的“呼吁”是张体学策划的。29日，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议说：“关于搞《呼吁书》的问题，我也给任重讲了，他同意。搞《呼吁书》的办法：一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现，二是以学生的名义搞，三是以个人名义搞。”

张体学讲话的第二天，30日，湖北大学政治系李甫远等76人（一一署名）发出《呼吁书》，指责南下的“这些少数人”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完全违反十六条的”，“骚乱了我校的文化革命运动”。

张体学讲话两天后发布的湖大2153人《紧急呼吁》，印刷50万份。《紧急呼吁》指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把斗争矛头引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竭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其署名用的是张体学提出的后两种办法的结合——多位“学生”“个人”一起署名。上述毛泽东主义战斗队的那张大字报嘲笑“呼吁”的署名过程：“谈到紧急呼吁，实在是个大的笑话，它上面标有‘二千一百五十三人’的字样，其实这个‘紧急呼吁’全国各地的人比我们先看到，这发出的第二天才有人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叫我们签名！而落款竟是精确到个位数的‘二千一百五十三人’。我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真有先见之明，真是伯温在世，孔明重生！”



钱运录在11月上旬的大会发言中说到：“八月三十一日在湖北省委抵制革命串连这个指导思想下，校文革以两千多名革命师生的名义写了一份《紧急呼吁》”，“很多地区、很多单位进行了翻印，流毒全国，起了动员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的作用”。

工矿企业按省委布置开展“揪南下一小撮”。彭绍鹏回忆：省委派驻武钢的文化革命工作团“大会、小会动员武钢职工辩论‘炮轰湖北省委’对不对，搞五七年整风反右、引蛇出洞那一套，凡是认为‘对’的、同意这一观点的，他们就记上名字，准备搞‘秋后算账’。后来，就大肆宣扬‘湖北省委是革命的司令部’，‘炮轰湖北省委是反革命行为’，‘南下学生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要‘大抓南下一小撮’。工作组在各厂矿组织先进人物，去慰问湖北省委，慰问张体学。明目张胆地压制职工，不准向湖北省委及各级领导提意见、揭问题，与五一六通知完全背道而驰，这引起了广大职工的不满。”“这个时期，在小组学习会上，让大家发言的议题也是‘炮轰湖北省委对不对’。我在发言时，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炮轰湖北省委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湖北省委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轰不倒；要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了应该。这是我发言的中心思想。后来工作组驻修建部的队长赤峰在钢材库召开大会，并邀请炼钢厂等单位的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参加，要大家发言进行辩论。我们电修机关学习小组要我发言，我就谈了我的看法。我发言后坐下来，发现凡是与我观点相同的人，都被工作组的人记了黑名单，而且还被那些邀来的人进行攻击，我感觉这里面大有文章。”“后来在小组学习会上，我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当时，从电机修理工提拔上来任团支部书记的王政林也同意我的看法。接着工作组组织厂里的红卫兵及‘选派’的工人代表，去湖北省委进行慰问，这更引起了群众的不满。电机修理工段干燥炉组工人、转业军人冷伏保，第一个贴出‘慰问何来’的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了指责。接着，我就将我的观点写成‘炮轰湖北省委有什么错——与工作组李明生同志商榷’的长篇大字报，贴在车间最显眼的试验站围栏上，引起了广大职工的注意和赞赏。”¹

8月31日，湖北大学文革委员会举行大会，名义是欢迎来汉串连的师生。张体学、许道琦等出席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杨锐、省文革小组副

¹ 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1—42页。

组长李衍授讲话。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湖大法律系党总支书记的儿子杨小力发言，赞扬湖北省委，指责南下学生中的“一小撮”“狗崽子”不是搞革命串连，而是进行反革命活动。李衍授赞扬“杨小力的发言很好，代表了亿万群众的心愿”，“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他“为之感动”。北京南下串连中心联络站的学生多次要求得以发言，傅军胜说“我们认为这个大会很多作法是不利于团结的”。台下起哄，李衍授说：“污蔑！我们宣布退场！”张体学临上车时嘱咐漆林等要同南下学生“坚决干到底”¹。9月1日湖北日报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称：“杨小力同志充满激情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鼓掌欢迎”。

湖大校文革多次要求南下学生撤出湖大31号楼，并组织人到31号楼强行拿走借给南下学生的被子。湖大和其他学校的少数派不断送来棉被。经常到湖大串连的工人李承弘买了一幅宣传画“从头越”，抱着自己盖的被子来到湖大。他回忆说：“当我在31号楼向赵桂林送上画和被子时，我被一群狂热的学生围了起来，欢声雷动，掌声、口号齐鸣”²。

9月2日开始，省委在省工业厅两次召开高校红卫兵代表会议。张体学在会上说“我是非常相信你们的……斗争艰苦的时候，不能当叛徒”。“老子革命革了几十年……他想打倒我，那不是笑话”。“将来把各地的右派送到湖北来劳改，我去当劳改队长”。杨锐说：“湖北省委是一贯紧跟主席思想的，是革命的坚强堡垒，谁也打不动。”省委候补书记姜一说：“你们湖北大学好比是上甘岭，好比是1211高地，我们好比板门店，你们这里情况顺利，我们那里就好办。你们这个地方，交通方便，来的人多，情况复杂，要顶住。”参加会议的钱运录后来说：“这里可以看出，省委负责人把南下学生当成了洪水猛兽，当成了敌人。两次工业厅会议，起了挑动群众斗争群众，学生斗争学生的作用，起了极坏的作用。”³张体学再次说：“我们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毛主席从六月初到七月十六日离开武汉，在武汉蹲了一个多月的点。”⁴1966年10月17日，

1 参见东方红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华中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编印《湖北省三级干部必读材料》（1966年11月6日）。

2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56页。

3 参见1966年11月上旬《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4 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接见湖大少数派时，听到学生反映张体学的这句话后说：“胡闹！这简直是胡闹！”¹

8月31日至9月2日，杨锐、姜一、张华等分别接见河南焦作矿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7校54名学生和1名教师，欢迎他们来支援湖北的文化大革命，听取他们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赵桂林、傅军胜等人的接见申请没有批准。

9月2日，赵桂林、傅军胜等在省文革办公室（省委11号楼）门前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要求张体学接见并对话，要求省委停止迫害。南下学生和当地少数派共数百人参加。张体学拒绝接见，学生举行静坐，继而绝食。张体学表示：“我支持左派，不支持右派”，“我不能去（见他们）”²。

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武昌实验中学等学校的少数派参加了静坐、绝食行动。各校大专兵出动，围着静坐、绝食的学生呼喊反对的口号，套用歌曲《人民公社好》的曲调，扭着秧歌唱“湖北省委好”：“一唱呀，湖北省委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一共五唱，每一唱结尾都是：“就是好，就是好，湖北省委就是好！”



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测总部编印《看湖北省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1月15日）

1 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铅印传单）。

2 东方红红卫兵华中工学院总部、华中工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编印《湖北省三级干部必读材料》（1966年11月6日）。

最强烈的联合抗议

全国广大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我们武汉地区六所高等院校中的少数人，伙同北大等三十多所院校中的少数人，在个别坏人的煽动下，跑到中共湖北省委无理取闹，他们搞什么“静坐示威”，“绝食斗争”。并涌上街头，游行集会，大肆声震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并喊出了“打倒湖北省委”等口号。事后，又翻脸黑白，歪曲事实真相，以四十余所大中专院校的名义向武汉市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发出《紧急呼吁》，企图混淆视听，欺騙广大革命群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我们六所院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主席团，代表我们院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一致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提出抗议。

他们的这种行为，是我们院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所不能容忍的。我们六所高等院校中的几十人，十几人，乃至几个人根本没有权利，没有理由，没有资格代表我们几千人乃至上万人组成的院校。他们这样滥用我们院校名义，是对我们院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极大侮辱，我们坚决不答应。他们必须立即取消这个“紧急呼吁”，并公开检讨。否则，后果自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华中农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
华中师范学院文化革命临时委员会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
武汉测绘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
华中工学院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主席团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

这一首《湖北省委好》当时全省传唱，还被大专兵唱到北京。省委派人往绝食现场送来面包、汽水和饭菜，绝食学生没人进食，大专兵则又吃又喝，装模作样气绝食学生。

9月4日省委仍然拒绝接见。少数派离开11号楼，游行到武昌火车站，乘火车上京反映情况。

9月4日，在武昌体育场举行的欢迎外地来汉串连师生大会上，张体学又一次说：“我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发动和开展起来的”¹。当晚，



1966年9月5日湖北日报报道4日在武昌体育场举行的欢迎外地师生来汉串连大会

1 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很多干部子弟吧？那些北京南下的大学生呀，最怕你们这些小萝卜头。一些南下串连同学闹事，要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那是打不倒的。“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南下学生说省委是黑帮，他们揪省委黑帮没揪到，倒揪出了一个红帮！此后，张体学出席群众集会，多次由水果湖中学红卫兵负责保卫。

9月8日，陶铸接见从武汉回京的赵桂林、傅军胜等九人，历时三个多小时。陶铸有三点指示：一、你们回去，要张省长接见你们，要张体学作检查，一次不行，两次嘛，只要有一点进步，我们就要欢迎；二、关于湖大的《紧急呼吁》书，由省委发出通知，宣布作废；三、针对9月4日王树成（广播）讲话，湖北日报要发社论，并要南下同学参与意见。

9月9日，湖大红卫兵师发出“第一号通令”：“来我校进行串连的学生中间的‘黑七类’的狗崽子们，在本月十日前滚蛋，不得有误，否则，后果自负；凡无介绍信的，一律回原校开介绍信来，逾期不走，则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不予接待；凡外单位，外校来我校进行革命串连或看大字报，凭介绍信入内，否则一律不予接待。”¹这个通令的作用有限。

10日赵桂林等回到武汉，11日在湖大召开大会传达陶铸的三点指示。

9月8日晚，陶铸和他的秘书给张体学打电话。据张体学11月2日在其“检讨”中所言，“陶铸同志鼓励了我们，也批评了我们，指示我们有错误应当检讨。”12日，张体学等与赵桂林等21人座谈，张体学承认了赵桂林传达的陶铸三点指示，“但是又拿出了陶铸同志谈话中对我们有利的话”“同他们争执不下”。赵桂林等要求张体学按陶铸指示开大会作检讨，而在座谈会前，由张体学提出，“经省委讨论，决定不检讨”。张体学认为省委在文革中“是搞得比较好的，没有必要作检讨，如果要讲，就要全面的介绍情况，总结检查工作，而且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检查缺点错误”²。双方约定9月15日开大会，张体学说：“我在这个会上检查，应该检查的我都检查，但有个水平问题。”

当天南下串连中心联络站发出通知：9月15日上午在湖大召开“武汉地区和南下学生革命串连大会”，会后游行去洪山礼堂，参加张体学检查大会。

¹ 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13页。

² 参见张体学《关于我在陶铸同志指示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检讨》（1966年11月2日）。

13日，省委通知15日召开“武汉地区文化革命情况介绍会”。

15日，赵桂林等人按原计划召开大会后，参加了省委召开的会议。赵桂林要求把“湖北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绍大会”改为“湖北省委检查大会”。会上，省委机要秘书万茂林宣读了另一个“陶铸同志三点指示”：一、我对湖北是比较了解的，湖北省委跟主席思想是跟得紧的，提出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的口号是不对的；二、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从总的看来是搞得好的，但是对当前运动在领导上是否估计过高？是否有自满情绪？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你们可以谈出你们的看法和意见；三、对待外地来武汉地区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应当欢迎，不欢迎是不对的。

省委这一举动激起赵桂林等人的强烈抗议。水院六四级学生周宏（周小舟之子）上台发言说：“要说我们保湖北省委的话，我们就是要保革命的湖北省委！我们就是要做党的好儿女，做张体学的好儿女！”水院六五级学生王真荣也发言说“要做张省长的好儿女”。周宏发言后把自己的红卫兵袖章献给张体学，说“我向大家宣布张体学同志是毛主席当然的红卫兵”，抱着张体学哭起来。张体学拉着周宏的手，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的家史和革命经历之后说：我代表我自己，代表湖北省委和全省三千二百万人民，控诉赵桂林，控诉赵桂林公然篡改陶铸同志的三点指示。在上次（9月12日）会议上，我根本没有答应做检查，你们单方面就发出了通知，我听到后没办法，所以就发出了通知（指开会邀请书）。我们不能承认开检查大会，因为我们的主流是好的，没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¹。

张体学讲家史是王任重建议的。此前王任重致信武大文革主任崔建瑞并让他转交张体学，信中说“建议张体学用家史教育那些不明真相的人”²。

会后，周宏的讲话录音到处播放，周宏本人到处作报告，赞颂湖北省委和张省长，控诉赵桂林等“南下一小撮”。9月22日周宏在华工作报告后，院主席团要求全院讨论周宏的报告；25日院广播台播送周宏报告的录音，主席团再次布置全院讨论。9月17日，张体学在水院大会上说“我是来感谢周宏的”，“九·一五会议是关键，周宏的讲话是革命的讲话”，并送

¹ 关于九一五大会议的情况，参见与会革命师生（六校周宏等17人）《赵桂林原形毕露——从九·一五湖北省委召开来汉串联师生代表会上看赵桂林等极少数坏蛋的反革命嘴脸》（1966年9月18日），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28页。

² 《王任重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载1967年1月30日湖北日报。

苹果、点心给周宏等人。同日，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对华师“左派”称赞周宏是“好孩子”，“我们取得了第一战役的胜利”。周宏等人被水院少数派称为“张省长的好儿女”。

九一五大会后，全市“揪南下一小撮”出现一波新高潮并波及全省城乡。省委10月21日的检查讲到当时的情况：“有的同学一上街散发传单和宣传，就被包围辩论；出现了许多抓所谓‘一小撮’的大字报和传单；北京南下串联中心联络站的宣传车一出去，就被贴上‘造谣车’的大字报；有的家庭在武汉的外来同学，他们的亲属都为他们提心吊胆，怕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十五日以后，给赵桂林等同学戴上‘反革命’、‘政治扒手’、‘大右派’等帽子的大字报和传单大量增加。这些都是我们的错误言行所造成的恶果，责任完全在省委。”

第三节 王任重与“揪南下一小撮”

1966年10月18日，王任重在北平写出《我的检讨》说：“对十六条公布以前那一段运动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没有及时彻底批判和纠正，这是十六条公布以后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省委在十六条公布以后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也仍然有责任。”王任重的意思是，“省委在十六条公布以后所犯的严重错误”，他没有直接责任。事实不是这样。仅在“揪南下一小撮”期间，王任重一直在指导湖北省委的行动。市委副秘书长陆天虹揭发：“省委‘抓南下一小撮’期间，王任重给省委写信说：湖北省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打。”¹8月29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张体学说：“我刚才给任重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的决心讲了一下，……任重讲：‘你们很主动，我知道。’……关于搞《呼吁书》的问题，我也给任重讲了，他同意。”张体学还讲到，王任重要省委“把（南下学生的）名字搞清楚”。9月6日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任重讲，湖大发的《呼吁书》效果好影响大”。9月22日张体学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任重同志说：一百万人辩论好得很，（九月十五日）大礼堂开的会好得很，没有大礼堂的会议，广大左派不能坚强起来，中间派不能过来，这次会是大成功，是大分化、大瓦解的会议。”“我

¹ 陆天虹《打倒王、宋反革命联盟——揭穿王任重、宋侃夫长期掩盖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真相的滔天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4页。

们的运动情况，在最紧张的时候，任重一天打四次电话。（九月）十五号的会，我们把情况告诉任重，他很高兴，他流泪了。”¹张体学1968年1月18日在他的“书面检查”中揭发：“王任重令省委整理南下同学黑材料，我积极照办，整理‘南下一小撮’的黑材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看了以后煽动说：‘你们的材料不如上海老工人写的短小、精悍、有感情’。”

王任重为帮助省委“揪南下一小撮”，还亲自出马做了一件影响很大的具体事。

9月6日，武汉街头到处张贴署名“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的《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一）（之二）》。《公开信》说：“我们严正警告那一小撮混进南下串联队伍中的混蛋、王八蛋们，你们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是饶不了你们的！你们把屁放了，想跑了，别他妈的妄想！你们在北京呆不下去了，就跑到武汉来捣乱，在武汉站不住脚，又想跑到北京去拉人来，这更是痴心妄想！”“通过在武汉这几天的调查研究，千言万语总归一句话：湖北省委领导强得很，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尤其是武汉大学非常非常的好！因此，我们向敬爱的党中央、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建议：在全国树起湖北省武汉大学这面红旗，让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

《公开信》印刷50万份，除张贴外，随人民日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投递给订户。

宋要武1967年1月4日写出《揭发王任重及湖北省委某些人的罪恶勾当》。宋要武说：她们的武汉之行是王任重要求的，王任重对她说，北京的“右派学生跑到武汉捣乱”，“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也是搞得很不错的”，要她“带上同学到武汉去，任务是辟谣”。（王任重同时让秘书打电话给湖北省委说：“让肖慧纳找她们谈一谈，把她们的住宿安排好。宋要武的讲话可以录音，也可以在报上发消息。”²）宋要武等下火车后就受到王任重的女儿和省委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安排去武大参观，张体学、许道琦接见，与王任重夫人肖慧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进行了交谈，肖说“现在的形势就像57年反右时”，“就像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

1 以上张体学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均见1966年“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记录（摘要）”，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2 参见毛泽东思想湖北省委机关险峰战斗兵团《王任重在北平是怎样指挥湖北省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文章竟被篡改了”，“总之，写南下同学的程度加深了，煽动性更大了。文章的调子更高了。”但陆说“只不过是帮你们顺了顺句子”。宋要武强调：“这篇公开信不能代表我们真正的观点，而是典型的肖慧纳、陆舒端观点”。此后，宋要武等又写了《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三）》，内容是炮轰省委。结果找肖慧纳印刷无果，找陆舒端也被推辞后，准备自己油印。这时肖通知说宋要武的父亲（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病重，她母亲来电话叫她回家。同时肖还告诉她：炮轰湖北省委的学生从北京回来后，竟然歪曲传达陶铸同志的指示。就这样，宋要武放弃了印“之三”的念头，匆忙离开武汉。回到北京，才知道母亲的电话是子虚乌有。后找王任重重复命，说明了情况。王任重说，“之三”写不写都没什么。宋要武还是将“之三”作了修改，“口气就缓和多了”，寄给武汉中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王三宝（王任重之子），“结果没有发表”。

宋要武的这个“揭发”，被“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共产主义红卫兵、共产主义战斗兵团”1967年1月9日翻印散发。

召见宋要武后，王任重又召见清华附中红卫兵骆小海和卜大华，说湖



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他们也去看看。卜大华回忆：在九一五大会上，“骆小海刚讲到我们认为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张体学同志是要革命的，张体学立刻站起来，特别激动，双手一边搂着小海，一边搂着我，说道：‘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红卫兵！这才是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湖北省的记者在旁边不断地照相。”卜大华等当晚离开武汉回北京向王任重汇报，讲到“省委几个同志对运动都很不理解，很被动，对群众主要是太害怕”，王任重说：“我们觉得张体学同志很不容易，刚才我们几个秘书同志都流眼泪了。我已经对张体学同志说了，你要挺住，要主动接受群众的批评。”卜大华等再次到武汉，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中南支队和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名义发表《访汉声明》：“真的混蛋是有的，在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中，一定要乘机捣乱，乘机作阶级报复的，同志们已有所发现，例如，涂仰豪这样的人。有那么一批混蛋在北京混不下去了，跑到外地捣乱。这些家伙滥竽充数，和真的革命者混在一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搅得人们眼花缭乱，看不清革命的主流。这是一个教训。我们一定要同他们划清界限，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革命左派不容混蛋右派来冒充。”¹

9月22日，王任重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接见武汉多数派代表。王任重说：“听说有的南下师生在武汉‘闹了事’，而且有一个多月了”，“这是件好事……全市上百万人参加大辩论……通过辩论可以发现左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右派分子”。“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就不怕别人攻击。你们应该向夏菊花学习。别人说她是一个‘保皇派’，她就说：‘我就是个保皇派，我是无产阶级的保皇派’”²。

第四节 张体学承认“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

9月15日后的半个月里，抓“南下一小撮”的铅印传单急剧增加。在笔者收集到的这一类传单中，8月底到9月14日，署名本地和外地学生的传单共9份；9月15日到9月30日，有本地学生、干部、工人署名的传单24份、外地学生的传单12份，共36份，本地24份传单中，9份出

¹ 参见卜大华《我的红卫兵经历》（网文，2011年）。

²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新华社工总部编《撕开王任重的画皮》（1966年12月1日）第18页。

自湖北大学。

1966年11月以前，社会上和各高校的印刷厂不可能印制少数派的宣传品，少数派也不能使用本单位的打字机、油印机。少数派只能用大字报和讲演开展宣传。省委曾经批准将湖大印刷厂交南下造反学生使用，钱运录后来说：“实际上是明交暗不交，他们的东西印的很少，阻力重重，我们的报纸、传单等仍然常翻印。”¹湖大毛泽东主义战斗队9月贴出大字报《二十二个为什么》，质问省委：“为什么这大个武汉市都没有一个地方给南下革命串联同学印发传单？”“为什么对那些污蔑南下革命串联的，污蔑北京地区文化革命队伍的毒草大翻印特翻印？”²叶传发介绍，“南下一小撮”少有的几份铅印传单，都是到长沙、郑州、北京等地印刷的。

“揪南下一小撮”时，张体学特别注重赞誉湖北省委和他本人的外地学生。宋要武、骆小海等人是王任重帮他拉来的，王丹凤是他自己发现的。

王丹凤是黑龙江机械中等技术学校学生，九一五大会后做了一次演讲，谴责赵桂林“破坏大会是反革命行为”，赞颂省委和张体学，引起张体学注意。王丹凤等给张体学送去贺信，祝贺他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时，张体学亲自接见，给她们赠送亲笔签名的省委编印的毛主席语录。省委组织王丹凤等人去张体学四清蹲点的随县洪山镇“考察”后，9月27日，黑龙江机械中等技术学校王丹凤、王滨英，河南省劳动厅第八半工半读学校宋德政，

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 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会上的发言

同志们：

我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厚大源、章建国、李诗刚、蔡三秋、张顺斌、赵运德、林荣忠、董洪昌、李前进、张仁杰、熊汉文、王文英、夏仲才、刘雨前、林志平、李金涛等同志联合发言，揭发批判湖北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是怎样推行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对于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于我们校文革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迟迟没有觉悟。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根本不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湖北省委不能检讨。甚至听到对湖北省委的一点批评，也感到很不顺耳。我们老是跟在革命群众的后面，埋怨他们把嗓子唱高了。当革命群众起来砸烂大鸣大放大字报，揭发了湖北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严重错误时，我们才勉强承认湖北省委有缺点，有错误，带有方向错误、路线错误。

好事当坏事，大会前，我们是有准备的，我们不看南下串连同学的主流，抓住一点，否定全面，组织与他们辩论。想通过这次会给南下串连同学当头一棒，赶他们出校。这次大会的召开，省委是知道的，他们不但没有制止，而且将我们邀请当时正在省里参加三镇干部会议的代表出席大会时，省委负责同志立即答应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省委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这不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什么呢？

2. 8月21日在我校举行的欢迎外地革命师生大会上，省委几个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大会。当会上有人发言赞扬省委和攻击南下同学时，省委立即表示支持，说他们“代表了亿万青年的心声”；当有的同学对大会提出批评时，省委负责同志就急忙忙地反驳说“这是污蔑”，并退出会场。事后湖北日报在第三版报导了这个消息，对大会出现的情况没有作全面的报导。

2. 9月2日以后省委两次在工业厅召开的会议，是省委执行党

1 《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1966年11月上旬）。

2 杨闻《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1—22页。

上海交通大学顾锦章等11人,大连十二中学张裕新等5人,联名发表《告全国革命师生书》。这份传单由省委宣传部修改定稿,湖北日报印刷厂印刷10万份。王丹凤在汉一月余,张体学多次接见,每见都送语录;王丹凤等要求发给军装,张体学指定专人赶制;请吃饭时张体学亲自“奉菜”,同看电影,合影留念;王往来于住地武汉体育学院和省委机关,经常有小车接送;王回家借给路费,张体学一再嘱咐一定来武汉过春节¹。



保湖北省委的外地学生成立了“全国各地来汉革命串连委员会”,其成员、宝鸡市长寿中学逯红军1967年1月撰文说:这个委员会是张体学与武大校文革负责人、厦门大学学生石沂东筹建的。这个委员会

干部子弟多,有杨小力,武汉市长刘惠农之女、北航学生刘小清,经常和他们一起写传单的北航学生赵立煌也是个高干子弟。张体学在接见我们时说“你们要什么给什么,我全力支持”,还“让记者照了十多张相,洗了几百张;设宴招待,请我们吃武昌鱼”。张体学给委员会安排一辆车,“随叫随到”;提供“大量活动经费”和物资;指定一名省委干部专门负责他本人与委员会的联系。武大校文革派专人(何其敏)参加委员会的活动,“每次开委员会她都参加,常常是何先分析形势,‘南下一小撮’如何如何,我会应如何对付,省委的意图等等。讲完后,大家发表意见,最后主任委员按何的发言来做决议。”武大校文革负责这个委员会开大会时的会场布置,“经常替我们印传单”,“供给我们需要的各种东西,纸、笔、墨、油印机,十几辆自行车等”²。

9月上旬,在周恩来指示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组织“新疆”、“南下”、“中南”等兵团分赴各地串连。“中南兵团”(又称“前

1 参见武汉体育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三一战斗团《张体学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罪魁祸首》(1966年11月8日)。

2 逯红军《全国各地来汉革命串连委员会是张体学镇压革命运动的“御林军”》，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编《革命造反报》第二十期(1967年2月7日)。

进兵团中南大队”）380人，9月中旬到武汉，分成若干中队，由省委安排住进各高校。经过调查，他们一致认为湖北省委是好的，在武昌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自己的观点。会后，张体学紧握刘克府（北航学生、一司副总指挥、上将朱良才之子）、陈南竹（农垦部副部长陈漫远之女）的手说：“你们是周总理派来的红卫兵，你们才是真正的红卫兵。”9月20日，中南大队在华工举行宣传阶级路线大会，宣传“自来红万岁”，华工、武大等校少数派与之展开辩论。9月末，中南大队在与武汉少数派的对抗中自觉呆不下去，全队继续南下，经井冈山、株洲，到广州后解散¹。

湖北省委在领导“揪南下一小撮”的过程中，确如张体学所说，“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

9月13日，在庆祝毛主席视察武钢八周年大会上，张体学请陈再道从湖北军区调10名干部，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到几所大学了解南下学生的动向²。

钱运录揭发：在省委派出的“观察员指使下，财会系、计统系、法律系都出现了打入他们组织内部了解他们情况的现象”，“竟然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对待各革命组织！”³

武测六一级学生龙扬芳打算脱离少数派，被省委书记处书记杨锐、省文革小组副组长沈以宏，通过武测院文革主任李景田确定为“内线”。9月4日少数派学生进京“告状”后，龙被派往北京收集少数派在京活动情况。其任务是：“一、把武汉所有在北京告状人的名单搞回来。二、把他们上告中央的材料尽可能原文寄回，如果搞不到原文，也要把大概意思总结回来。三、尽可能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并及时把接见的谈话记录寄回武汉。四、把住在人民大学的北京南下串联同学和武汉地区同学的联络组织形式，回汉后如何工作的计划搞回来。”武测院文革常委郑广飞向龙等交待了在京与“外线”联系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暗号，“外线”与院文革、省委的联系方式。郑广飞强调：工作很危险，“一定要注意”，“否则将给省委

1 参见方迪《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史末》（网文，2006年），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革命到底战斗队《华中工学院文革大事记（1966.5.7—10.8）》。

2 参见新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月造反派整理《揭发武汉军区党委“不介入、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载红八月造反派编辑部《红八月造反派》第二期（1967年2月2日）。

3 《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1966年11月上旬）。

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龙在京获得“十份向江青同志汇报的书面材料，并收集了各校领队同志和骨干分子的名单”¹。

武汉市的“揪南下一小撮”运动由宋侃夫亲自领导，攻击的突破口是涂仰豪。

涂仰豪是武汉籍的北京大学学生，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8月31日，涂仰豪和北大附中三位学生到武汉市人民中学串连，讲到省市委在工作组撤出后派驻三员是错误的，按十六条规定应该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红卫兵可以自己组织，红卫兵袖章自己去买、买不到可以自己做。他们还对被工作组打成牛鬼蛇神的青年教师表示支持。涂仰豪等人当即受到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围攻，被说成是“煽反革命的风，点反革命的火”。宋侃夫闻讯，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教分团团长李春鑑负责写成《紧急呼吁书》；命市委副秘书长陆天虹负责通知报社印刷厂连夜印刷20万份，9月3日晨随报纸一起送出。宋侃夫又派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去人民中学，辛甫召开该校文革委员会会议，部署反击。他组织人员调查涂仰豪等武汉籍学生的家庭历史（参加调查的有刘惠农之女刘小清），调查后对该校文革主任祝某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涂仰豪的家是资本家呢！”“今晚去抄涂仰豪的家。”辛甫亲自和该校三员写出文章《剥开涂仰豪的画皮》，让祝某以校文革名义发表。此后，校文革连续编印、散发了《一场反革命事件》《最坚决的回击》《真理驳倒了谬误》等十一份传单。同时辛甫动员武汉医学院等大中学校学生到人民中学与南下学生“辩论”。辛甫在多次会议上肯定人民中学的经验，并指派武汉晚报记者陈某予以报道，亲自修改后发表。

二十九中两位青年教师支持南下学生，辛甫依然采用调查其家庭历史、组织外校学生前去“辩论”等办法应对，致使两位老师被限制人身自由、遭打骂三个星期。武汉一中少数派同学贴出《轰！轰！轰！》《献给南下的战友们》《评王树成九月四日的广播讲话》等大字报，在汉口影响很大。宋侃夫得知其中一个学生家庭出身不好，亲自指使这个同学所在街道办事处给一中送去攻击该同学的大字报。

宋侃夫指示：凡南下学生去过的学校，都要设法搞清楚每一个人所在学校、姓名、观点、活动情况，所到之处与哪些人有联系，及时向省市委

¹ 参见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等《捣毁特务窝，揪出特务头！——愤怒控诉湖北省委所干特务勾当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7日）。

汇报；南下学生开会，各校三员通知学校文革委员会“不让学生参加”；对待南下同学要热情，但“观点必须批驳”，他们“放了毒的要及时消毒”；组织大中学校联防，确定湖大、武大、武医、华师、华农、民族学院六所大学专门协助各中学对付南下学生，分区包干；一有辩论会，中学马上打电话请大学来支援；街头贴有“炮轰省市委”的传单，立即组织学校、街道写东西覆盖；南下学生在街上宣传，立即弄到单位去辩论。宋侃夫下令组织市委附近中学的红卫兵集中住宿，任务是保卫市委，防止南下学生和本地少数派冲击，随叫随到，经费由教育局从助学金中解决。

张体学9月15日“控诉”赵桂林后，宋侃夫要求全市动员，围攻南下学生。市委分别召开各校三员会议，宣布对三员“松绑”，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讲“省市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宋侃夫和邓垦、辛甫等走到台前，到处作报告¹。

武汉一中文革委员会主任李克明回忆：当时市里派下来一个任务，要我们一中组织一个与赵桂林等人的辩论会。当时我担心我们中学生辩不过南下大学生。市里领导说，辩论由湖北大学的红卫兵来承担，你们只需要掌握好会场就行了。后来，我们按市里的要求，组织了这场大辩论。赵桂林发言时，我们在下面起哄。

九一五大会后，省委“自以为取得了‘胜利’，到处宣传”²，但认为在华工和武测，南下和本地两个“一小撮”活动依然猖狂。9月19日省委召开各高校运动情况汇报会。李衍授宣布各校派人到华工、武测“串联”：“搞革命串联要支持左派，孤立右派，帮助他们干革命，搞‘三同’（同吃、同睡、同参加运动）”，“每个学校至少去一百人”。

20日，武大、湖大等八所院校近千名学生带着行李进驻华工。湖大学生用汽车从本校运来写好的大字报贴满华工大字报栏，有大字报说“抓住赵桂林也是运动大方向”，同时找华工多数派同学谈话。华工少数派激烈反对，27日，当天成立的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举行游行，前往省委抗议省委组织武汉八大院校“左派”进驻华工压制少数派。奉命前去

1 武汉市委“揪南下一小撮”的情况，参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罪行录之三》，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42页；《彻底清算宋侃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第六期）》（1967年11月28日）第19页。

2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1966年10月21日）。

华工“串连”的学生七天后回到本校。

进驻武测“串连”的学生也遭到少数派的抵制。杨道远回忆：

省委觉得武测的“左派”力量不够强，……调动保守势力比较强的学校到我们学校串联，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参加运动。派到我院的主要是华中师范学院的学生……。院文革接待他们，把他们分配安排到各学生宿舍。他们这一愚蠢行动，不仅遭到少数派的激烈反对，同时遭到多数中间群众的坚决抵制。同学们质问华师来的学生：你们和我们是一样的生活标准，一样的生活条件，你们到我们这里能体验什么生活？你们为什么不去同工农群众搞“三同”呢？你们在华师搞运动，我们在武测搞运动，你们对武测的运动知道多少？你们参加我们的运动有发言权吗？你们到我们学校来，不是“串联”而是“并联”，我们不欢迎……华师学生无言以对，狼狽不堪。华师学生搬进武测学生宿舍的行李，被武测学生扔了出去。被御用了的华师保守派，悻悻而去。他们本来是被派来围攻少数派的，不料武测的广大师生“围攻”了御用工具，结果是少数派不但没有被压下去，反而使更多人觉醒，少数派的队伍更迅速壮大了¹。

外校左派进驻武测、华工两校效果不理想，24日和25日，省委在洪山宾馆分别召开两校左派会议。24日张体学对武测左派说：赵桂林在武汉比狗屎还臭，可是你们学院还贴欢迎赵桂林的大字报。南下的同学可能很多要到你们那里去，一场新的考验在等待着你们，省委相信你们一定能经受住任何考验。即使你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省委也坚决站在你们这一边。25日张体学对华工左派三百余人说：“赵桂林等人在别的院校已经没有市场了，但你们学校里还有市场，你们学校里贴出了欢迎赵桂林等来进行革命串联的标语，看来赵桂林会把工作重点移到你们院，你们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我们省委永远站在你们这边”。“走了赵桂林（赵25日离汉），注意郭桂林（指北大学生郭迎春）。”“黄仁传，有人要罢你的官，你知道吗？今后不准罢你的官，省委支持你们。”进驻华工的湖大、武大、华农等校学生表示：“要赖在华工不走”，“宁可不去北京，不去见毛主席，要在华工把运动搞好再走！”²

1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4页。

2 参见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武汉测绘学院）与会者钟为民、李治安《揭发九月二十四日晚红山宾馆会议实质》，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测绘学院总



在发动各界群众围攻“南下一小撮”的同时，省委组织一大批著名的劳动模范、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到学校作报告，赞扬“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炮打”，“张省长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各工厂、机关文革委员会组织职工络绎不绝地去省委“慰问”。

9月下旬省委一再宣称“取得胜利”，对其直接指挥下的多数派对少数派的围攻和对省委的称颂，张体学开始觉得过分了。9月30日他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

说：“原则不让步，方法让步。”“多数派也有偏激情绪，绝对否定，绝对肯定，对省委不能讲有一点意见，一讲他就干，多数派横蛮不讲理”。张体学接着提出了对两派的不同政策：对多数派“不能泼冷水，要坚决依靠，坚决支持，也要做耐心的工作”，对少数派“要保护，满腔热情做思想工作”。“本地少数派，人数不多，能量很大，一高压，二造谣，三赖。他们赖还有人同情的”。但他认为南下造反学生和本地少数派这“两小撮”“是绝对的少数，多数派是绝对的大多数”。张体学在这次会上还提出了中央都没有考虑的计划：“把党团生活抓起来，革命委员会把临时党委成立起来”（会后湖北大校文革、各系文革成立了党组）。省委秘书长张华的发言把少数派称作“他们”，把多数派归于“我们”：“少数派感觉压力很大，抬不起头，有个人去贴大字报都贴不上。他们很顽强。左派的精神很好，寸步不让，跟踪追击，走哪里跟哪里，他们放毒，我们消毒。”

部编印《看湖北省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1月）；华中工学院前卫战斗团汪定国《告密——记9·25洪山宾馆秘密会议》，华工东方红红卫兵战士黄杰转抄（1966年10月18日）。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发言体现了“方法让步”：“省委到学校活动，登报太多了，要注意一下。”

“怀疑一切”这个口号是“南下一小撮”带到武汉的，为武汉少数派所赞同。在省委抓“南下一小撮”期间，这个口号和“炮轰省委”一起成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大辩论的中心问题和两派的分界线。9月25日，湖北日报开始刊登文章批判“怀疑一切”，此前省委对这个口号一直没有表明态度。

杨道远回忆：

当时流行一个口号，叫“怀疑一切”，多数派和少数派为反对或赞成这个口号展开激烈辩论，反对造反派的人污蔑说，“怀疑一切”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纲领。当时我们航测系有一批本来就认识我的学生干部，想造反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特找来问我，“怀疑一切”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纲领？我明确告诉他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成立宣言、有组织章程，“怀疑一切”决不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纲领，但我们赞成这个口号，因为它是马克思的座右铭。接着我把毛主席的一段话告诉他们，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整顿党的作风》）我们赞成怀疑一切的口号，是把它当作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藐视权威、大胆造反的鼓动口号，就是对任何事情都要分析，不要人云亦云。多数派硬说“怀疑一切”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纲领，“怀疑一切”就是怀疑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真是乌云压顶，一片白色恐怖¹。

第五节 王任重、湖北省委作检讨

就在省委开会商量对少数派“寸步不让，跟踪追击”的第二天，10月1日，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由人民日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这篇社论号召批判“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少数派的衷心拥护。

声势浩大的“揪南下一小撮”运动逐渐冷却，王任重、张体学和湖北省委开始检讨。

10月18日，王任重在北京写出《我的检讨》，湖北省委印成传单，

¹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5页。

全省张贴。

10月19日，省农办主任孟某在洪山礼堂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读省委“关于陶铸同志指示问题的检查”（初稿），“检查”说：“陶铸同志接见九位代表后，陶铸和秘书给省委打了电话，省委张体学同志接了电话。陶铸同志指示我们，有错误应该检讨。……但是由于我们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认为没有必要作检讨，抵制了陶铸同志的指示，没有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相反地拿出陶铸同志讲话中对我们有利的话与他们顶牛。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极其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¹。

21日，省委作出《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检查”公布前已向各单位传达。

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10月20日编《情况简报》第77期，记述了各校多数派和“三员”对省委检查的反应。“初步检查”正式公布前省委已传达给各校文革委员会主任，各校向文革委员会委员和多数派骨干作了传达，比较普遍的反应是“想不通，甚至有埋怨情绪”。邮电学院文革委员会认为：“省委在文化革命运动中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未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钢院革委会今天上午有十四人听了省委检查报告的精神，都不大发言，灰溜溜的，有的说，省委要少数派，也应该要多数派。都说是方向、路线错误，那么什么叫严重的错误呢？”“（省委文革小组）对内接待组今天来访人数猛增，共接待212批，1109人，都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干部和工人，突出的反映了省委在对待保护少数问题上的意见。他们说：省委过去保护少数不够，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他们（指少数派）百依百顺，无原则迁就，把自己（指省委）说得不像个名堂。他们憋了一肚子气，无处说。他们很想展开辩论，又耽心省委受到责难……被说成是省委挑动工人斗学生”。市委宣传副部长李春鑑汇报说：“在三员中念了体学同志的检讨后，有以下几种反映：一、矫枉过正；二、让步太狠；三、策略性的，可以引蛇出洞；四、感到帽子大了，具体事实用不着戴这样大的帽子。不少人认为，这样下去，可能出现以下形势：少数人满意，多数人灰溜溜，冲散革委会，赶走工作人员，打倒省、市委，普遍作检讨，张体学呆不住，王任重再回来。”

这一期《情况简报》记述：一些学校的文革委员会转变了态度，“有

¹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些革委会准备做两件事：（1）明天开大会检查自己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例如写了批判赵桂林的大字报，放了周宏讲话录音，对少数派支持不够，对外出串联支持不够等等。（2）召开多数派各战斗组的骨干会，说明革委会对省委和本院前段运动的看法，要求大家跟上形势，批评省委和院文革在文化革命中犯的严重错误。”《情况简报》还记述：湖北艺术学院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院文革安排好办公室和办公用品，派人参加成立会；多数派开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也邀请少数派参加。

11月2日张体学作出《关于我在陶铸同志指示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检讨》。

多数派中的部分人坚持与两个“一小撮”斗争。

11月8日，一冶设备处第一个少数派组织“一一·八战斗队”贴出支持南下学生的大字报。当天下午处四清办公室干部对帮助抄这张大字报的李开键说：“党是信任你的，你为什么跟反革命跑？”李开键是处文革领导小组记录员，当天下午处文革领导小组开会就不让他参加了¹。

11月2日上午，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北航红旗战斗队、西安军电临委会赴汉学生在省委文革接待站门前张贴批判资反路线的标语，被多数派学生包围殴打，喊着把南下学生捆起来，用墨笔给南下学生抹黑脸。

湖北省委这一次不支持多数派了，第二天作出《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对十一月二日在红山路发生的围攻哈尔滨军工红色造反团和西安军电临委会来汉进行革命串连同学的严重政治事件的错误的检讨》，说这个事件“是我们省委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因此发生这一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省委，不能责怪受省委执行错误路线的影响和蒙蔽的群众”。“检讨”还说：“最近一段时期内，类似的事情还不断发生。例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革命组织进行批判湖北省委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活动时，也往往被围住辩论，甚至给他们的宣传车贴上‘造谣车’等大字报。这类事情的发生，都是省委前一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留下的恶果，是省委纠正这一错误很不得力的表现。”“省委希望曾经受到我们错误路线蒙蔽和影响的革命群众，觉悟起来，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革命组织团结起来，猛烈向我们的错误开火。”

“揪南下一小撮”事件对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影响，武昌实验中学

¹ 参见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56—257页。

六六届高中生柳英发评价说：“被称作‘南下一小撮’的那些同学，就像当年长征的红军一样，起到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华中工学院六三级学生贺光宇认为：“湖北省委揪‘南下一小撮’从反面教育了群众，使少数派联合起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促成10月26日武汉地区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11月10日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

第五章 武汉地区师生赴京串连

196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创举——毛主席先后检阅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中说：“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连，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北京学生南下武汉串连，对于武汉地区文革运动回到十六条指出的方向，对于少数派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武汉地区学生到北京串连，感受到北京的文革气氛，受到毛泽东接见，一些原来的多数派转变了观点，少数派则坚定了信心。大中学校少数派的很多战斗队是在从北京串连回来后成立的。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宣布大串连正式开始。这个通知下达后，武汉地区大批学生进京串连，是由省市委和各校文革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派基本排斥在外。少数派学生或个人或结伴，用各种办法自行上京。

同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并说毛泽东支持步行串连，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连，12月20日以前返回原地，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发文件，正式宣布学生大串连的开始与结束。但实际上的学生串连开始的时间要早得多，结束就更晚。

在9月5日中央关于开展大串连的通知发布前，8月16日，中央文

革小组召开“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他说：“你们这回到北京来，我想，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将会永远在你们的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将会使我们祖国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由你们——毛主席教育下的新一代，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把我们祖国进一步变成为世界先进的模范。”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其中就有外地学生。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举动，表明他们对于学生自发的串连是支持的，所以人民日报上述报道说大串连“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8月18日后，北京学生开始外出串连，各地学生随之大批赴京串连。

至少在1967年内，还存在着外地学生与北京学生的串连，大多是因为外地发生激烈的对抗性事件，造成部分群众极大不满后来北京，通过北京一些群众组织向中央反映，北京一些群众组织的学生也前往当地声援。

大串连中，曾经有过一段步行串连。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大连海运院长征红卫队徒步到北京串连的消息，同时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说：“大连海运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贺这些革命学生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林彪11月3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也号召步行串连。武汉地区不少学生进行了步行串连，目的地除北京外，还有延安、韶山、井冈山、瑞金等“革命圣地”。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

把文革运动控制在自己的部署之内，是湖北省委自文革开始以来的一贯态度，对待大串连也是这样。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有组织地分期分批去北京参观，不支持并且反对学生特别是少数派自行串连。9月6日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各大院校有组织有领导的到各学校、工厂、专、县去搞革命串联，派左派下去，这是先发制人。”8月27日韩宁夫在武汉工学院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出去串连去了，那不成了无产阶级大旅行了吗？”¹

¹ 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文革初期红卫兵步行串连（网络图片）

同年11月上旬，钱运录代表湖北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7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发言说：“省委抵制革命串联，一次布置工作会议上，当谈到各个学校都有很大一批同学要外出串联时，李衍授同志讲：‘都走了，家里的革命谁搞呢？第一，对他们要说服，一直说服到他们不去。第二，他们要去，看一看他出去目的是什么。第三，如果一定要去，也不阻挡。’”

1966年10月21日，湖北省委《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中说：省委“对革命大串联采取了错误的态度”。1968年1月18日，张体学在他致中央的“书面检查”中说：王任重指示他“‘要把学生留在学校里搞斗批改’。这迎合了我怕‘乱’的思想，以此借题发挥，

制造种种借口，阻拦革命小将串连”。

1966年10月之前的大串连，主要在学校师生中进行，目的地多为北京，有自行前往和官方组织两种方式。

工人串连一直不为中央明文允许。1966年11月武汉地区全市性的工人组织相继成立，工人赴京上访、告状，采取滞留火车站与当权者谈判的方式，然后集体登车去北京。也有少数人自费购票前往。很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当权派为“讨好群众”，违反中央规定，动用公款让干部、职工外出串连。

第一节 少数派自发赴京串连

杨道远是当时武汉最早自发上北京的大学生之一。他回忆：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我受到极大鼓舞。又传铁道部指示，串联学生不收火车票。此时，北京已经有学生到武汉来，长沙、湖南大学学生也有到武汉宣传“湖大事件”（湖南大学当权派镇压学生），串联已经开始。我们这些在学校受压制的同学遂产生了外出取经的思想。1966年8月下旬，学校当时还管着，不准外出串联，还要按照他们的部署搞。我和班上其他同学分头逃出学校来到武昌火车站。车站上已挤满了要乘车去北京的人群。

1966年8月25号晚，我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北京。……第二天一早，有人把我们带到一个中学，安排在一个空教室里住下，都给做了登记，发了卡（管吃、管住、乘车不要钱的卡）。同我们一起来到这个中学的还有我们学校另外五个同学，……我们十个人住在一起，是通铺，就是在地上铺上麦秆织的垫子，没席没被子，北京没有蚊子，天不冷就那么随便躺着胡乱睡，变天了冷了也没被子盖，航一同学带了一块大塑料布，我们十个人并排躺着，就把那个塑料布罩在上面。早晨起来接待站有早饭供应，稀饭馒头，每人一份。我们把中餐领了做干粮，一个馒头一块咸菜，各人带着去串联，到各处去走访，去看大字报，去了北大，去了清华。在清华大学看到蒯大富的大字报指明要打倒的领导人都画在其中，反蒯的人认为蒯丑化领导人，是反革命。在地院（北京地质学院）我看到了王大宾他们五十人签名的的大字报，有人签名后又划掉的，也有是大字报贴出去后又加

上去的，人们的思想斗争，思想变化，文化革命的激烈斗争一看便知。我还去过北航，去过北师大，还到北京工业大学听过谭立夫的讲演。谭立夫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影响很大。听说有人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问江青，江青改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刚到北京时是带着从武汉来的问题去走访的，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询问一些政策性问题。去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给他们讲受压制的情况，接待站给我们讲了周总理一次接见革命群众的讲话，讲话中说：红卫兵你可以组织，他也可以组织，只要执行《十六条》，我们都支持。鼓励我们自己闹革命。我们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定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给文革接待站写了申请，接待站给我们发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从此我们十个人就戴着这袖章活动。……

8月31日，这是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接待站把我们送到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这些朝思暮想要见毛主席的人们，见到了毛主席，个个热泪盈眶，跳着喊着，嗓子喊哑了，手都拍麻了，只觉得是无限幸福，别的什么都忘了。接见完毕，人们都离开了广场，我们不愿离去，到金水桥上走动，在广场上转悠，极度的兴奋难以平静……

1966年9月初，得到武汉测绘学院要组织大批学生进京的消息。我记起了列宁的教导：革命首先从统治薄弱的地方发生。于是决定带着我们转抄的大字报和收集到的中央首长讲话，满怀信心地立马回汉，决心大张旗鼓地干一场。

1966年9月上旬我们回到了武汉，学校里成建制的队伍都走了，每个班都有少数同学在活动（这些同学都是被当时的院文革排斥、“没资格”去北京的人），贴大字报，发表对文革对形势的看法。我和我那九个同伴，除了贴大字报外，主要精力就在于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志。仪制系五位同学（他们也是“八·三一”见到毛主席后刚从北京回汉的）发表声明，退出“官办红卫兵”，还把红卫兵袖章挂在大字报栏上，声明写着：我们要做毛主席的红卫兵，不做“官办”红卫兵。……我认为他们声明的观点与我们对运动的想法相同，我们就找他们串联，……大家都有联合成立组织的愿望，一拍即合。晚上我们全体（十个人）同他们全体（五个人）见面，交换意见，实际上就成了联合的第一次会议，统一认识，决定要尽快建立

组织，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我们航测的十个人和他们仪器制造系的五个人很快在工程测量系（简称工测系）、制图系、中专部等联系到了相同观点的同学何汉胜、张厚根、张旭、熊志伟、晏胜利、王爱武、张武轩、罗秀英等等。这些人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小组织，如八三一红卫战斗小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据说毛主席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毛主席说还是叫思想好。据此，大家统一认识，把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决定于1966年9月13日正式成立组织。为什么定在9月13号呢？因为1958年9月13号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有纪念意义。当时武测大队人马已经进京，留守的负责人是院文革副主任，我们要求成立组织，向他宣传周总理指示：红卫兵你可以组织他也可以组织，只要执行《十六条》我们都支持。这话他也可能听说过，因此没费多大劲他就同意了我们成立组织，并给了办公室，给印制了旗帜、袖章，供给运动必须物品（主要是写大字报的东西）。

1966年9月13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正式成立了¹！

彭明诚是湖北大学学生，他和班上十多人一商量，决定到北京去串联。他说：“我们班文革领导小组本来就缺乏足够的权威，再加上别的班已有人行动在先，我们也就没有请示，在8月26号成为我班大串联的先行者。”彭明诚一行也同杨道远他们一样，在北京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看大字报，二是见毛主席。目的达到，9月2日就“满怀急欲把北京的收获带回去的激情”返回学校。当时湖大校文革正在大张旗鼓地“掀南下一小撮”，彭明诚回忆说：“但串联回来的学生不一样。他们不仅原本胆子就大些，思想活跃些，而且在北京接受新观念后，对运动发展动向要更清楚一些。”经济系和财会系的六十多个同学串连起来，成立了少数派组织“八三一革命队”²。

湖大学生杨闯回忆：“1966年8月下旬，学校的少数派不满伪文革的领导，冲破阻力，到北京串联，看到北京的文革形势，并且在8月31号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备受鼓舞。于是回学校，纷纷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公开与伪文革对着干。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就是这时候

1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4—32页。

2 见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五、赴京串联归来首批加入造反派‘八·三一革命队’”。

成立的。”¹

武大学生吴恒春和另一同学自行去北京串连，亲耳听到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工作人员向杨道远传达的周恩来那次讲话，他是9月18日在清华大学的群众大会上听到的。吴恒春回忆：“这次讲话，可以说是真的彻底解决了我思想上的顾虑。因为周恩来说，革命不是要人指派的，革命是靠自觉自愿的，我就一贯支持自觉起来闹革命的群众组织。经常有学生组织请我去参加会议，凡是那些印有精美的请柬的组织请我，我是不去的。因为那肯定是官办的组织，越是用草纸手写的我越是要去，因为那是自发起来闹革命的。这些话当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再明白不过的表达了中央领导不同意官办的红卫兵组织。从这一点说，我反对选举产生红卫兵是没有错误的了。”

在北京，吴恒春到过高教部接待站、国务院接待站、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待站等。他的感觉是：“这各个接待站所做的工作明显地就是叫学生去闯去闹，颇有几分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不怕学生闹事，只怕学生胆小不敢干。去过这几个接待站后，我的想法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改变，不再那么害怕当反革命了。好像按照当时的形势也当不了反革命，这一次与反右不是一回事，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的引蛇出洞和秋后算账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吴恒春回到武大，“学校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汉大学的‘少数派’已经发展到了几十个人而且有了筹备组织的打算。我回到学校后，因与樊雪梅她们的九一二红卫兵先锋队早就有着联系，所以这次一回来就很快与他们联上了线。这是由武汉大学各系的被排除在外的人所组成的一个小团体。大家因为有了几次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勇气，也就不把武汉大学党委的态度当成一回事，而是一条心的‘跟着’毛主席干革命。”²

华中工学院六四级学生郭保安和两个同学自行去北京“取真经”。8月31日他在天安门东观礼台上见到了毛泽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多么的幸福啊！这次又是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前进方向不太清晰的时候看到了毛主席，使我豁然开朗。那就是，毛主席的指示记在心，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要说到做到，今后的革命路上一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唯一准则，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我们立

¹ 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9页。

² 参见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

即返回武汉。”¹

华中工学院六四级学生张建华独自一人自行去北京串连。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8月29日到9月6日，我在北京9天。通过这9天的所见所闻及分析思考，我对以下两个问题有了自己明确的看法，它直接影响到了我回武汉后的行动。

1. 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去北京前，我虽然对我们学校、对湖北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已有了一定的看法和判断，但当时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并不知道中央存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不知道也不敢想象中央有两个司令部。

通过北京九天的实地考察和分析，虽然我还不能明确中央存在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我开始相信中央在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两条路线的根本区别或说分水岭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如何对待群众运动。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充分相信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让群众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同时引导群众自始至终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与之对立的则是另一条错误路线（当时并未公开刘、邓是错误路线的代表）。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及各地的执行者们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他们沿用历届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的方法，即自上而下，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指导文化大革命，他们违背五一六通知及十六条的明确指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运动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和群众中“落后分子”。

在当时，凡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并“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保护群众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与此相反，凡不相信群众，压制甚至镇压群众，极力维护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的即是错误路线。我认为当时确实存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两者已经泾渭分明。

2. 关于“大民主”和“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我国几千年来都是封建制度、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在由此形成的文

¹ 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化氛围中，人们只知道“皇上”和“上级领导”，“不能犯上”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

为什么十六条要强调“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因为在大伙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的时候，必须进行民主的启蒙。正由于“民主”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新鲜的事物，在实行中就难免要犯错误，难免要走弯路，就像我们还不会游泳的时候去游泳一样，难免要被水呛。

……

十六条中强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这是实行大民主的保证。没有这一条，当时的“大民主”就是一句空话。

……工作组基本上就是站在旧的体制一边，极力压制群众，把起来向党委提意见的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工作组受到群众的批判是应该的。

从北京回到学校后，我首先在我们系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半月后，我们又和本院其他系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队联合起来，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的成立完全改变了我院文革两派力量对比的态势，通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我们这些原来的少数派很快变成了多数派，而原来的多数派——华工红卫兵师则成了少数派¹。

第二节 有组织的高校师生集体赴京

1966年9月8日武汉晚报报道：“武汉地区红卫兵赴京代表回到战斗岗位，传达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首都革命经验”，10月15日湖北日报报道：“武汉革命师生由京返汉受到热烈欢迎”，所报道的都是省市组织的武汉地区师生集体赴京串连。实际上此前学生自发的赴京串连已经开始。

按照中央9月5日通知精神，大专院校师生都可以“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武汉地区各大专院校师生赴京，由省委统一安排，各校文革委员会负责组织。各校文革在出发前一再强调组织纪律性，到北京后学生就失控了。

¹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18—121页。

时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团委副书记张建成回忆：

1966年9月，院文化革命委员会接到省委通知，着手从组织上、思想上、物质上做准备工作，决定以班、系、行政各处为单位成建制到北京。除少数审查不合格者（如认为右派学生、有反动思想的人、当权派等）外，基本上都可以去……

院文化革命委员会强调组织纪律性，到北京后，要以集体活动为主，特别是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看大字报，一定要集体去、集体回，到北京也是集体去、集体回。

……同学们到北京，受到了真正的群众运动的影响，与湖北、水院比对，感到湖北省委、水院党委、工作队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文化革命委员会则是省委执行资反路线的产物。有些学生在北京时就成立了战斗队，表示回汉后要积极战斗。

这次赴京参加国庆活动，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乃至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人们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湖北省委、水院党委、工作队党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向了王任重¹。

赴京前，丁家显与水院文革委员会反复交涉，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和八·三一战斗总队是跨班级、跨年级、跨系的组织，在北京要独立行动，获得同意。10月6日，水院少数派参加了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他们感受到“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文化革命运动的形势与北京比起来真有天壤之别”，“横扫”队的几个负责人当即决定设立水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京联络站²。

9月底，华中农学院师生集体进京前，院文革要求跨系跨班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回到各自班级参加活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坚持不同意，院文革后来同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院直属单位名义”去北京串连³。

9月29日，武大师生集体去北京。少数派由吴恒春带队，在北京单独活动，也不与学校师生住一起。30日，吴恒春的同班同学、武大九一二红卫兵师政委王焕耻“来做说客”，要“这些少数派同学回归大队伍，他

1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17—118页。

2 参见《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86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9年版。

3 参见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展简史》（1966年12月）。

们可以不咎既往”，被少数派拒绝¹。

文革运动由张体学亲自领导的湖北大学，忙于在第一线“揪南下一小撮”，迟至10月12日才全校出发到北京参观，张体学和漆林先期乘飞机赴京安排。14日，北师大举行向资反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在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鼓动下，部分多数派师生不顾校文革多方阻拦，前往参加大会，在全校师生里引起震动。在京期间，又一个少数派组织井冈山兵团酝酿成立，湖大师生住地总后北京后勤学院出现了“炮轰湖北省委，火烧张体学”“踢开校文革”的巨幅标语²。

15日，在少数派强烈要求下，湖大校文革在后勤学院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大会，漆林讲话赞扬省委和张体学。六二〇事件中被打成“反革命”的教师钟荣尧咬破食指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字，要求上台控诉工作组对他的迫害，并说如果不让发言请让他展示这五个字，被校文革坚决拒绝。校文革副主任钱运录请政治系教师彭勋去劝阻钟荣尧。彭勋事前知道钟荣尧有此举动并表示支持，于是问为什么不让钟荣尧发言，钱说他一发言会就开不下去了，彭说安排他最后发言就两全其美了，钱说这样很好，他去安排。后来未安排钟老师发言钱运录即宣布散会，六四级学生谢邦柱和六三级学生罗思凡上台抢过麦克风，谢说“钟老师发言理所当然”。彭勋跳上台说：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坚决站在革命小将一边。要革命的留下来，听我讲一讲伪文革出尔反尔的真相。三百多人留下了，决定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告校文革的状。在政协礼堂等待了两天，17日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了湖大师生和其他外地少数派，其间一百多人离开，青年教师拿钱给学生买饭。在北京期间，湖大少数派人数翻了一番，达到全校师生的百分之四十。11月上旬，各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新湖大红色造反委员会”，谢邦柱任一号头头³。

1 参见吴恒春《武汉文化革命中的三个谜团》“一、我经历的文化革命”，（网文，2009年）。

2 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17页。

3 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彭勋、谢邦柱的记录。

第六章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一节 少数派大举反击，省委开始检讨

10月1日发表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动了对不整走资派整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很多造反派成员至今对这篇社论念念不忘。社论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

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也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概念。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武汉锅炉厂职工王光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些厂内的少数派，捧读这篇社论，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主要是与红铁军大打笔墨官司。现在，我们直接主动地同厂党委、工作队短兵相接，找上门去，道长论短。”¹

10月3日毛泽东批评张体学“政治上落后了”²。10月4日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张体学坚持认为“整个讲湖北省委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是大前提”。“我们该检讨的检讨，把左派找来研究，向少数派检讨一万次也满足不了的。”杨锐说：“一、大方向是对的。过去在那种情况下开检讨大会确实不行，他跟着追就是检讨了，不见得有好结果，最大的问题脱离了广大的左派。二、对少数派的问题，没有强大的左派，少数派的工作很难做，那就更乱。对少数派也不是压服，确实是一个一个的在打通思想。

¹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25页。

² 参见《张体学同志的书面检查》（196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同年1月30日批示“同意张体学同志这一书面检查”。

三、……对赵桂林那样的弄法认为不行，指着鼻子骂，骂你是黑帮，你就是黑帮？……我们对林彪同志的讲话，并没有曲解，没有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姜一说：“方向性不方向性的问题，我们没有搞学生，没有斗争学生，不能马虎的检讨……。对少数派的工作没有做，只是让他去闹，他闹够了就算了，做他们的工作很费心。”宋侃夫说：“总的方向没搞错，……如果对这一点没有信心或动摇，那不行，要站住脚。”

省委这一态度，影响了各级党组织，他们迟迟不承认在前一段运动中执行了资反路线，从而引起各单位两派群众的激烈争论。

批判资反路线逐渐形成全国性的声势，在少数派的压力下，省市委开始检讨、承认错误。

10月14日，各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省委洪山礼堂集会，声援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求工作队队长曹金祥回校做检查的行动。省委张华出席。这是少数派第一次在省委礼堂举行大会。15日，曹金祥回到湖大。

15日，姜一、李衍授前往华工送去省委关于“九二七事件”（指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游行到省委抗议八所院校“左派”进驻华工“串连”）的书面检讨。

16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武昌体育场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杨道远和南下造反大队负责人叶传发共同主持。省委杨锐、张华出席。赵桂林、傅军胜参加大会。傅军胜在会上介绍在北京受中央首长接见的情况，接见时王任重说：如果说张体学同志是敢字当头的話，那就是敢于和你们作对。张华在会上宣布：赵桂林是革命同志，以前造谣中伤赵桂林的一切传单作废。关于陶铸与（赵桂林等）九位代表的谈话要点，待与赵、傅讨论后公布¹。

18日晚，李衍授在省委13号楼对华工、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说：9月20日左右大兵团进驻华工、武测是省委布置的，这种做法不好，是不对的。为什么要派大兵团到你们那里去呢？就是想压一压你们嘛²！

10月21日，湖北省委作出《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1 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2 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10月下旬，水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野战兵团与武汉大学少数派联合举行“揭发、批判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反路线大会”。据丁家显日记记载，大会发言有如下内容：“1. 湖北省委在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 检举揭发湖北省委当前搞的阴谋；3. 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树立个人威信，搞小王国（张体学想搞土皇帝）；4. 追根王任重的错误，提出问题；5. 从对南下学生的态度看湖北省委的问题”。第一个发言者是武大哲学系六三级学生杨家志，他1966年6月8日给王任重写信批评其《读书笔记》而遭受迫害。

10月下旬，湖北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刚刚成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向省委要求列席旁听。杨道远回忆：

我们认为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对湖北省委信不过，要到会监督省委贯彻中央指示，以便与三级干部接触、沟通，宣传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希望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各位领导，提高路线觉悟，从湖北省委打击学生、镇压群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把本地区、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然而，我们这一积极的合理的要求遭到湖北省委拒绝。无奈，于11月1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派出代表强行进入会场，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分发给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人员。正在进行中的三级干部会议被迫中断。干部们多数人是第一次见到这阵势，一脸惊愕。会场内到处都成了“小组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与三级干部们热烈交谈。我们向三级干部会议发出邀请，要三级干部参加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同我们一道揭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司计划于11月4日召开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未能如期举行，其原因据杨道远说是“省委个别人指示多数派红卫兵阻挠、捣乱破坏”¹。

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后，学生少数派已经形成全市性的力量并在社会上活动，全市性的工人少数派组织在学生的帮助下也开始酝酿。

10月底，正在筹建中的工人总部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地点（洪山礼堂）、海报、会场布置、扩音设备、会议保卫等事务，

¹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0—61页。

都由华工红反团聂年生、李定初等负责完成。千余人参会，武昌铸钢厂工人李承弘、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朱鸿霞、武汉第二机床厂和中原机械厂各一工人在会上发言，控诉“五十天”里遭受的迫害。这次大会后，市委工交政治部开始派人与工人总部筹备组联系¹。

11月6日武汉市委作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11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公告》发布。“公告”说：“在八月下旬至九月的一段时间，省委对于革命大串连的意义很不理解，错误地采取抵制的态度，把个别敢于大胆批评省委的革命师生，看成是‘别有用心’的人。由于省委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我们有一些错误言行，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作用。今年九月间，在武汉地区一些院校曾写了很多的大字报和印发了一些传单（有的流传范围较广），将北京来汉进行革命大串连的一些革命师生，说成是‘一小撮’、‘政治扒手’，

甚至给他们扣上了‘右派’、‘反革命’等帽子。这是十分错误的。”“在这里，特向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桂林、傅军胜，北京大学的郭迎春、杨伟仪，北京师范大学的汪桂芝、刁锦煌、袁秀珍、郑宗国、方锦扬，北大附中的孙南朝、张容娜、王代虹，和一切被打击、被压抑的各地来汉进行革命大串连的革命师生，诚恳地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有的学校，如果整理过他们的材料，应当根据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精神，经双方协商同意，

中共湖北省委公告

北京和各地革命师生来武汉地区进行革命大串连，他们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大大促进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应该热情欢迎，积极支持。可是，在八月下旬至九月的一段时间，省委对于革命大串连的意义很不理解，错误地采取抵制的态度，把个别敢于大胆批评省委的革命师生，看成是“别有用心”的人。由于省委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我们有一些错误言行，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作用。今年九月间，在武汉地区一些院校曾写了很多的大字报和印发了一些传单（有的流传范围较广），将北京来汉进行革命大串连的一些革命师生，说成是“一小撮”、“政治扒手”，甚至给他们扣上了“右派”、“反革命”等帽子。这是十分错误的。在此郑重宣布这些大字报应当予以作废。这个错误，给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错误的责任，完全不在写大字报和发传单的同学，而在省委。这是省委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在这里，特向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桂林、傅军胜，北京大学的郭迎春、杨伟仪，北京师范大学的汪桂芝、刁锦煌、袁秀珍、郑宗国、方锦扬，北大附中的孙南朝、张容娜、王代虹，和一切被打击、被压抑的各地来汉进行革命大串连的革命师生，诚恳地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有的学校，如果整理过他们的材料，应当根据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精神，经双方协商同意，当众销毁。前报定交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南下同学的材料，声明撤销作废。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湖北省委向“南下一小撮”赔礼道歉的公告

1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59—160页。

当众销毁。前段送交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南下同学的材料，声明撤销作废。”

11月11日，二司在武昌体育场召开向湖北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一万多人参加。



工厂里批判资反路线一般比学校开展得晚。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所属工业安装公司是在徐正全等人参加工总赴京“告状”，12月初回来后才开始大规模批判资反路线。6日一早他们把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公司大院。当天下班后公司文革筹委会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徐正全等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说既然是批判工作组大会，工作组成员“滚下台去”，在台下接受批判。他们要求由少数派来主持批判会，文革筹主任同意了。此后一连三天，少数派主持了批判会。“出娘胎以来”第一次“在这样大的场合”讲话的徐正全，第一天讲了两个小时，他回忆：“全场响起了持久而热烈的掌声，同观点的人自然出于兴奋、赞同和鼓励，我观察绝大多数人鼓掌并不是因为我讲得精彩，更不是因为讲到他们心里去了，更多的是对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势的惊喜，不由自主地认同竟然有人敢于指斥连公司当权派都十分畏惧的工作队。解放十七年来当官的第一次亲身领略了百姓对他们的当面指责，不是不疼不痒的批评而是痛快淋漓的批判，就像我们听到省长张体学被南下学生整得痛哭流涕一样过瘾，尽管那还是我们间接所闻的感受。如是者我讲了三个晚上，大家饿着肚子，劳累一天后坐在枕木上非常热情地和我一起度过了三个晚上。”“不是徐正全能讲或讲了什么真理之类，而是我代他们宣泄出积压很久的情绪，反映了老百姓有话要说，他们不是群氓，他们是人，是希望自己能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的一群工人。……文革的锋芒所指代表了人民的心声，文革就是人民的节日，革命就是人民的

盛大节日。”¹

10月下旬,武钢、一冶少数派开始在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青山联络站的宣传、组织下开始串连。11月19日少数派以“武钢工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的名义,在青山公园门前召开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两三百人参加。27日,少数派召开第二次批判大会,青山区文化馆礼堂坐满了工人。会前通知工作团团团长陈克东下午3点前来自回答问题,到6点未来。一千多工人前往省委要求张体学接见,解决问题。晚11点仍见不到张体学,工人列队前往武昌车站,静坐绝食三天三夜后,一百多名代表得以乘车去北京“告状”²。陈祖坤写道:“1966年11月27日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它是武钢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有利益诉求、有组织、有理、有序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这是武钢自建厂以来,第一次由工人自己组织召开的大会,意义十分重大。”³

12月4日,武钢工作团召开批判资反路线群众大会,武钢少数派冲上主席台,彭绍鹏抢过话筒说:“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不要上他们工作团的当,他们是假批判、真保皇,保王任重,保张体学。他们在武钢完完全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向群众检查,我们能相信他们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彭绍鹏回忆:“这时,会场已经大乱,有的指责我们破坏会场秩序;有的攻击我们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破坏文化大革命;有的单位领导人起来把队伍带走;有些群众则鼓掌大声喊着为我们鼓气,说我们冲得好;大多数人是站起来围着看热闹……(工作团副团长)刘广泉一时好像没了主意,在台上转了转才清醒过来,马上抢过话筒宣布散会。”⁴

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省委关于文革部署的文件如王任重的“七三指示”都揭露出来。少数派提出两个口号:“打倒王任重”和“抢救张体学”(或“火烧张体学”)⁵。当时传说毛泽东很赞赏这两个口号,说武汉造反派斗争讲策略,有水平。这个传说极大地鼓舞了少数派。张体学不像王任重,往往亲自上阵,与少数派正面冲突。他错了就检讨,不同于王任重

1 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47—4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

2 参见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3—46页。

3 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44、42页。

4 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第47页。

5 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新湖北大学总部材料组的一份油印传单印于1967年1月3日,传单上有两句口号:“王任重有罪,罪该万死!张体学有罪,回头是岸!”



的检讨遮遮掩掩，所以直到他 1973 年去世，一直与造反派保持着能够对话、交流的关系。

第二节 “抢黑材料”

少数派批判资反路线，舆论上控诉各级党组织、工作组整群众、压制少数派，而最主要的行动就是“抢黑材料”。

所谓“黑材料”，是少数派的说法，就是指文革开始后党组织、工作组收集整理的群众的“三反”言行；1966 年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的正式提法，是运动初期“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和“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后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也接受并使用“黑材料”这一说法。

《湖北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关于处理材料问题的几点意见》，原件无发表日期，大约写于 1966 年 11 月 6 日。这个“意见”言及的“材料”（即少数派所谓“黑材料”）有：“原校党委和工作组所整理的同学的材料”、“群众”“相互检举揭发的材料”、“各（文革委员会）分会自行整理的思想动态和对各种会议的意见”、“各时期同学们（的）思想反映”、“大

字报底稿”、“本人所写的检讨认识”、“保卫科放有(的)‘六·二〇’(事件)的照片”。

少数派为什么把“黑材料”看得很重，张建华解释道：

所谓“黑材料”，就是将你某一特定环境下的言行或道听途说来的事记录下来，经“上纲上线”地分析整理，给你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后放入你的档案。“黑材料”之所以可怕，是因为档案跟随你的一辈子，它不但关系到你的升迁、调动、荣辱，而且关系到你的家庭、子女的前途命运。这些材料之所以冠上一个“黑”字，是因为它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是见不得阳光的。因档案是党的组织编制和管理的，也只有能代表“组织”的人才能看到你的档案，而你自己是永远看不到你自己的档案的，所以你永远不知道这些“材料”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所以你永远不可能有申辩的机会。因此，档案中的“黑材料”就像如来佛用来制服孙悟空的“紧箍咒”，你纵有天大的本事，“组织上”也可以把你压在“五指山”下，永远不得翻身。

工作组用以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迫害少数派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整黑材料”。从北京到全国，所有院校的工作组都一样。而“抢黑材料”也是造反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¹。

按照当时中央的政策，这种材料应该由工作组和各级党组织“交还本人”或“当众销毁”，是用不着群众去抢的。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说：“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中央批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说：“（一）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

¹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04—105页。

料，……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二）除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他所有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四）在处理材料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发生争执的时候，……采取共同协商的方法解决。”

各单位的党组织、工作组绝大多数不执行这两个文件。他们“隐瞒”“黑材料”——不承认整过这样的材料；“转移”“黑材料”——单位将这类材料放进档案室、机要室、武装部，省市则将材料送到军区、市人武部、市公安局保存。这一招很奏效，此后历次整肃造反派，很多人的罪名是“抢夺档案”“抢夺公文”。

《新华工》报记载：1966年10月，陈再道以“保存机密文件为名”，“批准接收省委办公厅等五个单位的档案文件”，其中有“大批黑材料”。“湖北省机关党委的文件、档案、黑材料是陈再道的老婆张双琼（按：湖北省机关党委副书记）送到武汉军区的。”1967年1月20日造反派学生从“军区接管的省委办公厅的文件档案”中，“清出了廿九袋、两皮箱黑材料，王任重的四箱黑货也藏在其中。”湖北军区“为省直十八个单位保存了四百四十三件（箱、捆、包）文件、材料”，“其中有不少黑材料”，省直机关造反派1967年1月18日取走¹。

武汉市公安学校将黑材料和档案混在一起，转移到市局七处看守所的监号里。该校造反派头头、六五级学员王登富说：“如果没有鬼又何必将这批档案保存在看守所？当天晚上经（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宏源同意，我们拿回了这批档案。回校后找出整教师、学生的黑材料，其中就有一份诬陷我十四五岁参加流氓组织的材料。”²。

1967年1月8日，在北京开会的宋侃夫派人乘飞机回武汉，通知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王克文，市委副秘书长陆天虹转移销毁大量黑材料，并要求迅速处理他放在市公安局的一口皮箱。后来发现，这口皮箱里放着被截获复制的赵桂林发往北京的信件等³。宋侃夫还说：“武汉市公安局

1 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2 参见王登富《我和武汉新公校》第9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版。

3 毛泽东思想市委办公厅红旗纵队《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侃夫镇压、破坏革命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载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三）》（1967年5月23日）第5页。



载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宣传部《新华工》报第四期（1967年2月11日）
也不是一个可靠的单位了，我们存放在那里的一些东西，要很快地转移，
并且要清理一下，该处理的处理掉，慢慢就来不及了，会出事的。”¹

大专院校的少数派抢黑材料先于工厂的少数派。

军委、总政“紧急指示”公布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决定：“整理的右派材料绝对不能退！这是组织原则！”10月底的一天晚上，少数派

¹ 毛泽东思想中共武汉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宋侃夫问题专辑（之四）》（1967年5月25日）第9页。

发现行政大楼内有人在偷偷烧黑材料，于是要求交出还没有烧掉的黑材料，对方否认有这种材料。少数派打开文件柜，搜出很多各系总支上报的整群众的材料。这一事件在水院激起了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中间派、“左派”中的很多学生对院党委、工作队大规模整群众的行为极度不满，纷纷加入少数派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¹。

10月19日下午，华中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封存畜牧兽医系、植保系等处的“黑材料”，院文革发动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全院性围攻。20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少数派组织的代表就封存黑材料问题与校文革谈判，省委应少数派要求，派出四名干部参与谈判。校文革拒绝少数派代表与省委干部提出的“共同清理，共同保管，共同处理”方案，并私下转移黑材料，谈判两天未达成任何协议。22日下午三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到农机系一辅导员宿舍运黑材料，与闻讯赶来保卫“国家机密”、“档案”的院红卫兵纠察队发生冲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被围困至深夜²。

湖北大学的少数派要求校文革委员会将黑材料交出来销毁，校文革不承认整过群众的材料。有参与整材料的同学站出来揭发确有其事，并告诉材料存放地点，抢黑材料就这样在湖大发生了。财会系少数派抢出了系文革办公室内的黑材料并烧毁。11月5日下午，少数派抢出了法律系的黑材料。11月6日晚，校文革召开关于处理黑材料问题的协商会，副省长韩宁夫出席。校文革副主任钱运录与少数派代表发生争执，协商失败³。

11月10日，少数派游行庆祝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经过校文革办公楼，砸了校文革的牌子。多数派强烈抗议，挂上新做的牌子；少数派敲着破盆烂碗，送去纸糊的牌子，上写“湖北大学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委员会”⁴。

11日，发生了规模更大的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抢黑材料的事件。

第二天，校文革办公室主任厚大源等六人散发的一份“声明”记述了“双十一”事件的经过：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乘全校革命师生在礼堂参加批判湖北省委所犯方向

1 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43—146页。

2 参见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展简史》（1966年12月）。

3 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47—48页。

4 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20页。

路线错误大会之机，聚集数百人，于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五十分，冲进一号楼，用层层人群，封锁四面门窗、楼梯口和走廊，不准任何人通行。另一部分人冲进一一九房间抢材料。这个房间是校文革已向全校革命师生多次公布，集中待研究处理的材料的地方。他们搭着人梯砸窗户，谢邦柱带领二十余人冲进房内，就用哑铃砸铁柜，柜没砸开，就逼迫保管材料的吴家忠同志交出钥匙，当吴家忠同志不交时，他们又继续用哑铃将大铁柜砸开，抢走了整齐地存在柜内的全部材料，并将一个小铁柜子抢出去，用汽车拖走了。

他们内外互相配合，在外面他们用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为抢材料者鼓气，叫嚷：“抢‘黑材料’无罪。”全校大字报栏内，到处张贴着抢“黑材料”的声明¹。

“双十一”事件当日，校内工人赤卫队、赤旗革命战斗队、学游泳战斗队、《海燕》报、红一军团战斗队联合散发传单《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双十一”抢材料事件真相》，指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抢黑材料的行为，同时公布了所抢10种材料的清单。

11月14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湖北大学总部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贴出大字报《黑材料抢得好！抢得有理！——兼驳湖北大学文革办公室主任厚大源等六人与学游泳战斗队、工人赤卫队、《海燕》报等五个组织起草散发造谣中伤污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抢黑材料的两种传单》。大字报说：

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一个多月了，湖大校文革拒不执行。不公开烧毁黑材料，不给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师生平反。他们企图把黑材料保存下来，拖延下去，搞“秋后算账”就有了基础。湖大文革主任漆林几次恬不知耻地说：“湖大文革没有整理任何人的材料。”“过去整理了的材料都当众烧毁了。”我们湖大全体红色造反者对文革（办公室）死心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到底，毫无批判之意，公开抗拒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恶劣行为实在忍无可忍。

全校革命造反者胸中的怒火燃烧到了顶点，于十一月十一日上午8点50分冲进一号楼抢出了大批大批的黑材料。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赵桂林、傅军胜的，有北京政法学院的周仕凌等南下北上串连同学的材料，有武汉

¹ 厚大源、李诗刚、张顺斌、靳三秋、童世昌、王功任《关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抢走材料的声明》，1966年11月12日。

大学几位同学的，有我校六二〇革命事件较系统的材料，有我校光荣的“反革命”张维荣的材料，还有其他许多广大革命的师生员工们的材料。还有上千张偷摄的我们大字报等照片。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委指示发出后，他们也“贯彻”了，烧毁几十人的“材料”。并几次声明，关于这几个同志的材料都烧尽了。但在十一月十一号又抢出了很多，如彭木清、武笃芬等同志的材料，没有一个大型提包还装不下（因已打印多份）。

大字报还对多数派传单所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人、丢硫磺、抢档案、抢机密文件等问题进行了反驳。两派的对立情绪，因“双十一”事件而更加强烈。

武汉测绘学院文革委员会不承认整过群众的材料。院文革组织汽车暗中转移黑材料时，汽车队的工人告诉了少数派学生。少数派冲到现场，抢下了这批材料。杨道远回忆说：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抓紧写批判的大字报，“用活的教材教育群众，狠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形势越来越好。”¹

多数派坚决反对交出、销毁这类材料。10月15日，南下和本地的少数派在洪山礼堂举行“向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大会，提出“叫一切让运动后期酌情处理的材料当众销毁”。10月18日，华工“乌兰牧骑战斗兵团”的一份铅印传单说：“好大的口气！你有什么权力命令人家把一切让运动后期酌情处理的材料当众销毁？！老实告诉你们的某些人，材料该不该销毁，由群众讨论决定”。“我们提醒一下省委负责同志，你们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共产党人从来就不怕谩骂和攻击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才是应抱的态度”²。

湖北医学院发生了武汉地区规模最大的抢黑材料事件。军委、总政“紧急指示”公布后的一个月，该院少数派多次与院临时文革委员会协商、谈判，要求按中央指示处理黑材料，院临时文革一直否认有黑材料。11月8日下午，少数派数百人进入行政大楼搜寻黑材料，院临时文革立即调动多数派的学生和工人前来阻拦，双方发生推搡、拉扯，有人受伤。少数派从楼内院武装部的武器库内搜出大量黑材料后，双方达成协议：双方人员退出，各留少数人继续搜查并对材料进行甄别。第二天，院临时文革调动人马将少数派人员强行拖出大楼，并布置少数派抢夺枪支弹药、国家机密

¹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7页。

² 华中工学院乌兰牧骑战斗兵团646纵队评论员《“欢呼”〈张体学控诉赵桂林一周月纪念大会〉圆满成功——评10.15红山礼堂会》，湖北大学工人赤卫队1966年11月3日翻印。

部同意，开箱检查，发现黑材料。双方签字同意这批材料由二司接收。二司司令部抽调五名党员，将黑材料检出，发往各相关单位。其余材料原样放回封存，1967年3月由省军区取走，除了黑材料，一件不少。

1967年1月上旬，杨道远带队的二司学生在市委机要室发现正要运走的23个麻袋装的材料，在场两位机要员说是教育系统各单位送来的。当场由机要员任意打开一袋，发现内有某单位左中右排队名单。这批材料运到武测，经双方共同清理，二司留下黑材料作批判资反路线之用，其他材料原样封存。1967年3月机要员确认无误签字后取走材料。

1983年1月，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判决：杨道远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其中“抢夺公文罪”判刑三年。判决书里罗列的“犯罪事实”就是上述两件事¹。

武汉无线电元件厂的少数派“抢黑材料”，在武汉地区的企事业单位中比较早。11月初，以吴焱金为首的少数派工人，将整群众的材料抢出来，发给每个人看后当众销毁。吴焱金回忆：“这个行动受到了全厂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好的发动群众、对群众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的过程。全厂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为市委工作队自四清以来在我厂整了許多人，对工人群众像1957年反右那样进行拉网式的打击、迫害，所以文革刚刚开始不久，我厂造反派就占了全厂职工的绝大多数。90%的工人群众群情激昂地参加了造反派，并把盘踞在我厂两年多的市委工作队赶走了。我们厂工人还在厂门口挂上了‘解放区’的牌子。”“我厂造反派声威大震，附近很多工厂……都有工人来我厂取经，要我厂造反派去声援他们的斗争。我被请到各个工厂去作报告，进行造反发动工作，使这些厂里的少数派都成立了工人造反组织。我还把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低压锅炉厂等厂的工人发动起来了。”²

武锅少数派“把抢出来的材料用大字报公布了，什么这个要控制，那个要密切注意，谁不能重用，谁要加重处理，谁要调换岗位……这种下三滥的卑劣做派，让更多人觉醒了，促使更多人打消疑虑，站出来参加造反了”³。

1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9—71、341页。

2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6页。

3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30页。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办）的少数派组织“长办联司”，在大学少数派抢黑材料两个多月后，才着手解决“整群众的材料”问题。按当时的说法，长办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长办少数派处事比较温和。他们关于处理黑材料的提法也与其他单位的少数派不一样，叫做“讨要整群众的黑材料”。1967年1月3日他们找政治部主任丁福五“讨要”，丁欺骗他们说：整群众的材料大多没有收上来，收上来的都交给省委工作组了。长办联司又分别向九位党委成员“讨要”，“讨要”未成后抄这些人的家，仍然没有结果。直到1月24日长办联司夺权后，才找到好几麻袋“黑材料”¹。

12月22日，武汉一色织布厂女档案员林焕运在少数派工人抢黑材料后三天患病身亡，成立不足半月的保守派全市性组织职工联合会于12月25日举行大型集会，降半旗，会后举行大规模抬尸游行。造反派冲击联合会的游行队伍，并指责联合会在毛泽东生日前一天抬尸游行、降半旗是“反革命事件”，是干扰批判资反路线的大方向。职工联合会自觉理亏，基本没有反击。

职工联合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行动，使他们遭受了第一次大挫折，大行动和大挫折都是“抢黑材料”引起的。

12月3日，新华工红反团声援抢黑材料的武汉制革厂少数派，遭遇了当时少见的围攻殴打。2日晚十一点半，10月14日就进驻省一招11号楼的新华工红反团接到制革厂少数派的电话，说该厂工作组将于3日离厂，已将黑材料打包准备带走，少数派势单力薄，请求支援。聂年生带领红反团和中医学院少数派二十多人于3日凌晨一点左右到该厂，先派五人调查组进厂了解情况，被夜班工人手挽手组成的人墙阻挡，发生激烈辩论。红反团宣传中央关于处理黑材料的指示，工人说“半夜三更冲击工厂不是好人”“中央规定学生不准到工厂串连”。红反团冲进厂区，进入行政楼二楼的办公室，找不到厂领导和工作组。楼下围满了工人，高呼“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聂年生、李定初等为避免更大的冲突，决定暂时撤出。五时许出厂后清点人数，少了几人，红反团的旗帜也被抢走。红反团再次进入该厂，遭到围攻殴打直至上午十点，该厂及其上级机关市皮革工业公司、

¹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三章第18节“讨要黑材料为群众平反”。

市二轻局都有领导人在现场。红反团二人伤势严重，住院治疗¹。

工厂的抢黑材料行动延续到1967年1月。1月6日，武汉蛋厂当权派烧黑材料，造反派工人去抢，与保守派工人冲突，多人受伤。8日，国棉三厂造反派获悉黑材料将被转移，先行抢得，两派发生冲突，数人受伤²。

第三节 “抢广播台”

少数派在批判资反路线高潮中的另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抢广播台。文革中广播台是重要的宣传工具，当时掌握在各校文革委员会和红卫兵手中，少数派要求播送自己的稿件无一不被拒绝。时任水院团委副书记的张建成回忆：“院广播台被称为党委的喉舌，广播的内容除报刊社论等重要文章外，主要是广播保守派观点的稿子，造反派的稿子一律不予播出。原来广播台的工作人员，稍有不同意见，则被清除出广播台，如徐海亮、宋志荣、刘萍、伍必慧等先后均被清除。”³

杨道远回忆了武测少数派用纸喇叭宣传的情景：

白天到处想法弄纸写大字报，晚上各自为战，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用自己拿纸糊的喇叭筒对着窗外广播，宣传毛主席指示，宣传北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好形势，控诉院文革，控诉湖北省委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迫害。很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这种“单兵广播台”在武测遍地开花，“白云广播台”、“晚霞广播台”，还有自命为“冲锋号”、“独立之声”的，……晚饭一过，武测校院内到处都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声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得非常顽强，非常艰苦⁴。

水院的少数派则因陋就简，用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改装，用自制的电子管扩音机，用小功率扩音机，设立了三个微型广播台⁵。

张建华讲述了华工少数派为争得在广播台平等发声的权利所作的努力：“我们曾多次向大会主席团进行交涉，提出院广播台应实行民主，广

1 参见新华工红色造反团《血债定要用血还——记12.2—12.3在武汉发生的打人、杀人流血惨案纪实》（铅印传单，1966年12月），王海峰《红反团走麦城》（手稿，2018年）。

2 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1967年8月）。

3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22页。

4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6页。

5 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162页。

播台要播放不同的观点，要有不同的声音，要公平辩论的要求，但均遭到拒绝。”¹

各校少数派在夺取广播台前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过类似的交涉，交涉失败也几乎没有例外。

10月下旬，水院少数派要求改组院文革控制的院广播台，向院文革提出两个方案进行谈判：1. 改组院广播台，广播台负责人、编辑、机务、播音等人员两方对等派出，对等播出两方稿件。2. 广播台一分为二，所有的器材设备平分，一方原地，一方迁出，或双方都迁出。关于这两个方案的谈判均告失败。

水院、华工都发生了少数派抢广播台的大规模行动。所谓“抢”，当时双方只是推搡拉扯，主要是口舌交锋——辩论，广播台内辩论，广播台外则是两派群众大规模的辩论。

《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一书写道：

争夺广播台的行动是从10月21日晚十点开始的，郭保安、聂年生带人包围了广播台。郭保安指派刘玉民等人在图书馆二楼会议室与主席团交涉、谈判。主席团始终以“广播台是党的喉舌，不能交由群众组织管理”为由，拒绝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造反派组织提出的“共同使用、共同管理、时间对半”的正当要求。越来越多的师生聚集在南一楼东头，听取双方的情况介绍和辩论，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人数逐步增多，最终占到压倒优势。

10月22日下午，刘玉满、朱启贵等带人封锁了通往南一楼南楼六楼广播台的通道，一楼至四楼的楼梯上坐满了人，楼外马路上也被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南二舍西头马路上都坐满了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同学，与六楼广播台的守卫者形成对峙。为了应对可能出现女同学对峙的局面，由左玉明带着一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的女同学配合行动。晚上，在图书馆东头三楼谈判的刘玉民通过联络人员向总部报告了谈判僵持不下的消息。郭保安当即立断，指派聂年生、江林率领几名骨干越过四楼的人墙抵达广播台播音室门口。一名同学一拳击碎进广播台门上的玻璃，伸手拨开门闩，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拥而入，占领了机房及其他重要部位。

23日零点五十五分，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夺下了广播台，原广播

¹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8页。

台负责机房值守的李师傅很客气地向造反派的机务人员尹华林交了钥匙，并交接了备用的元器件、文艺组的唱片等。广播台到了造反派手中，当即播放《东方红》乐曲，播音员王能秀以“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台”的呼号，宏亮地播出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声音。

这几天几夜的行动，尽管在聂年生、江林等人进台的最后一两个小时里双方发生比较激烈的争辩，出现个别相互推搡的现象，总的局势都是坚持文斗、充分讲理的，自始至终没有发生打人、伤人和损毁广播台设备的现象。

为了巩固胜利，防止反复，数十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广播台周边坚守了三天三夜，进一步做好疏导工作。

一直在现场的郭保安回忆：“前后七天七夜！我们每天都谈判到很晚，（大楼）下面是大量的群众在辩论。这紧张的七天，是争取群众的过程，迅速壮大我们造反派队伍的过程，我们有力地争取了群众，后来大量群众都踊跃参加了革命造反派组织。”原广播台的大部分人员不久也相继加入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受新华工毛泽东红卫兵总部之命主持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台工作的张建华回忆：“我们的广播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正式开播后，我们大力宣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密切结合实际，及时播放《新华工》报和新华工广播台编辑部的有关文章，播放全院广大师生员工的来稿，内容丰富，形式生动，得到了学校和社会广泛的好评。”

11月16日，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台走向社会，在汉口闹市设立了汉口分台¹。

水院少数派与院文革谈判失败，井冈山兵团十几人冲到行政大楼四楼广播台门前，院文革主任祁万恒带人将他们一一拽到三楼，封锁了行政楼大门。少数派在三楼会议室坚守不去，用粗麻绳做成软梯从窗口上下。

在水院广播台外的操场上，辩论日以继夜地进行。大专兵说“他们抢广播台是五七年的右派行为，是反革命行动”，当时还是“左派”的张建成说：“他们不抢吃，不抢穿，为什么单抢广播台？是因为你们的广播台剥夺了他们的发言权！四大其中有三大要靠广播发声，你说叫他们去哪里

¹华中工学院少数派抢夺广播台的记述，参见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六章新华工广播台，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8—150页。

发声？又如何能发声？！这是你们逼迫的结果！”《中流击水》一书说：“院团委书记以雄辩之词，站出来公开支持造反派抢占院广播台的革命行动，这个影响非同一般，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抢攻广播台战士的士气，同时也从心理上攻破了许多三字兵的思想防线。”¹

双方相持约十天，10月31日，少数派大队人马冲进广播台，将工作人员推出。《红水院》一书写道：

祁万恒带着一队人马也赶到了行政大楼广播台外四楼的楼梯口。他向以丁家显为首的革命造反派进行恐吓和威胁，说这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宣传阵地，你们抢占广播台是一种极端错误行为，必须立即退出，否则，你们将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

丁家显当场给予祁万恒强等有力的驳斥。他义正词严地说，正因为广播台是党的喉舌，它就必须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可这个广播台在院党委、工作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充当了吹鼓手，而现在，又不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它已经沦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把它夺过来，使它真正成为党的喉舌，为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我们夺取广播台是真正的革命行动，我们敢于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丁家显等革命造反派的东风完全压倒了祁万恒“大学校”们的西风。他们无言以对。这时，造反派人多势众，“大学校”们一点都不敢有所举动。他们见大势已去，在造反派们一片欢呼声中悻悻离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夺取院广播台的当天就播放了公告，宣布院广播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所占²。

1966年11月，各大中学校的广播台都为造反派掌握，工厂的造反派也纷纷接管或强行夺取了广播台。12月下旬，武汉锅炉厂的造反派接管了拒绝播送造反派稿件的厂广播站，改名“毛泽东思想新武锅革命造反广播站”。

水院、华工的少数派夺取广播台后不久都控制了学校的印刷厂。11月4日，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主办的铅印的《新华工革命造反战报》

1 《中流击水——文革中的“红水院”》（电子版）第105页。

2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少数派抢夺广播台的记述，引自《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106—110页。

第一期出版。1967年1月3日，武测造反派接管了学校印刷厂。

1967年7月，华工造反派在百万雄师围攻最危急的时刻，建立“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电台”。张立国曾向武汉军区情报部和武汉空军情报部通报此事，回答是“我们知道了”。新华工头头认为这个回答就是默许。当时华工无线电系教师、该系教师造反组织“抗大纵队”头头黄载禄回忆：总部头头“还知道，在学校广播台的楼下是无线电发送设备课程的实验室，内有八台中等功率的无线电发射机，这是学生上课做实验用的设备，他们提出要利用这些设备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广播电台’，我也接受了，并安排实验室负责发射设备的教师卢怀香（后更名卢为民，‘文革’后调到广州）负责，维护设备。教师将多台机器并机，增大了输出功率，在南一楼楼顶架设了天线，铺设了天线地网，使‘新华工广播电台’的信号几乎可以覆盖湖北全省。新华工广播台原对校内的有线广播，现在同时通过无线向全省广播。”¹新华工广播电台于1967年7月22日正式开始播音，同年9月16日新华工委“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及武汉军区曾、刘首长的指示”，作出停止播音的决定²。

1968年9月，工军宣队进驻华工，随即派人控制广播台，广播呼号由“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电台”恢复为“华中工学院广播台”³。

第四节 平反“五十天”里的错案

批判资反路线高潮中，各单位工作组基本上都在检讨大会上宣布，运动初期所打的“右派”“反革命”等一律作废，并赔礼道歉。

早在8月15日武汉市委已作出决定：“对全市以破坏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罪而被捕的学生和群众要逐个进行甄别，捕错了的要放。”此后被捕的学生陆续释放。

因六一六事件被逮捕判刑的墨水湖中学三位学生9月被释放，五位教工仍在押。11月17日，新华工李显利等四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清华、北航的几位学生进入墨水湖中学，展开对六一六事件的调查。他们收集材料，其中包括武汉晚报为宣判大会（未举行）写好的报道和社论的清样。

¹ 黄载禄《我的文化大革命经历》（电子版，2009）。

² 参见武汉新华工委、红司（新华工）动态报编辑部《动态报》第74期（1967年9月16日）。

³ 参见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六章新华工广播台。

关于我们拘留、逮捕青少年学生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

中共武汉市委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今年六月，在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指引下，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一派大好革命形势。但是，由于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地认为：在打倒刘邓陶铸的同时，尚须保留一批青年学生，起了右倾作用。因此错误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保留了刘邓陶铸，结果在不少地区都造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事件。因此，我们已于今年九月和十月间，向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公开检查，承认错误，并发动群众揭发检举。斗争刘邓陶铸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十月五号，武汉地区中等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各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组织了武斗组织，进行了武斗活动。市委的右倾，错误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因此，我们向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提出了打倒刘邓陶铸，打倒了打人、打派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的严重罪行。市委的右倾，错误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因此，我们向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提出了打倒刘邓陶铸，打倒了打人、打派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的严重罪行。

十月八号，我们向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提出了打倒刘邓陶铸，打倒了打人、打派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的严重罪行。市委的右倾，错误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因此，我们向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提出了打倒刘邓陶铸，打倒了打人、打派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毒打打人的严重罪行。

这些材料交给新华社记者，记者据此给中央写了简报。新华社、二司等呼吁省市市委立即释放肖伯晏等五人。造反派的调查开展不久，市公检法的工作组也对墨水湖中学事件重新调查¹。12月29日，除陈畴外四位教师被释放；1967年2月，陈畴被释放。

一些突出的错案，平反改正颇费周折，阻力来自当权派和多数派。

最费周折的是平反水院郭明正“持刀杀人”案。六三级学生郭明正出身贫农，班团支部书记，文革初期为班文革核心小组副组长。他不同意“六一三”会议上系总支书记“封左派”，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同学，同时写出大字报《什么是革命左派》。院党委认为上千学生的抗议集会是他引起的，于是郭明正由“左派”变成“右派”，遭受批判、斗争。7月4日郭明正与同班同学张耀先等四人在食堂用餐，郭拿起饭桌上厨工遗忘的菜刀玩了一下，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十几天后，院保卫科整理的一份材料写道：“郭明正伸手拿起了那把刀，在桌子上拍了两下，流露出杀人的凶相，恶狠狠地叫道：我杀了你（指张耀先）。刀在脖子边（几乎碰到了）就要砍下去。张耀先毫无惧色，当时在场的同学极为愤慨，张怒视并冷笑，并准备拼个你死我活，郭才未敢下毒手。”张耀先后来对同学说：“我本来没有意识到郭明正想杀我，是领导帮助我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提高了觉悟，才逐步认识到的。”7月15日工作队党委开始反击右派，17日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湖北省公安厅宣布郭明正是“持刀行凶”

1 参见 2015 年 4 月杜先荣访谈李显利的记录。

王任重_{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又一滔天罪行

——对郭明正同志的政治大迫害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井冈山野战兵团
六三四四《赤潮》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元月于武昌

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法办。定案时只有当事人张耀先的证词而没有另三个在场同学的证词。

10月初，水院少数派提出“立即释放郭明正”、“为郭明正平反”，院党委说：“郭明正是省公安厅抓的，党委无能为力。”“你们可以向省公安厅反映。”少数派在省公安厅得到的答复是：“郭明正是学校报上来要求抓捕的，既然抓了，就要按司法程序进行调查、取证，哪能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有什么问题让学校来谈。”10月14日，工作队

党委书记刘真在全院大会上作检查，为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几个学生“平反”（口头），绝口不提郭明正问题。

10月24日，少数派代表团出发去北京上访，向中央文革及有关首长递交了郭明正案的材料，等待接见。水院党委与省委得知此事，于11月1日释放了郭明正，释放的理由是郭明正“出身贫农，在狱中表现好，可以教育、宽大处理”。省公安厅副厅长徐耕耘对郭明正说：“他们（指到北京上访的少数派）这些人是受过打击的，想出口气。你回去后要把握运动的大方向，不要搞这件事了，因为这是个人的事（指平反）。”“现在有些人在给你翻案，你要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运动反复是很大的。”

郭明正被释放后，少数派把他送到北京与上访团汇合。11月14日上午九时，谢富治与公安部、最高检察院的有关领导接见了上访团，谢富治听取上访团的汇报及郭明正的控诉后说：郭明正是好同志，应该平反。当即决定，由公安部向省公安厅打电话，最高检察院向省检察院打电话，明确告诉他们，要为郭明正平反。

省文革小组副组长李衍授得知公安部及最高检察院的指示后说：“他

关于撤消“关于开除现行反革命分子 郭明正团籍的决定”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經团委常委会討論，作出了“关于开除现行反革命分子郭明正团籍的决定”这是錯誤的，事实证明，郭明正同志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个好同志，現經团委常委会討論决定，撤消上述錯誤决定，郭明正同志仍担任6344班团支委书记，免去董兆花同志的6344班临时团支委书记的职务，即日生效。

共青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们坐在北京也不下来调查，听了片面之词就做决定。”水院党委立即组织反对为郭明正平反的上访团赴京。郭明正所在班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党员、多数派中坚董兆花，是拟定的上访团主要成员，当时正在徒步长征，学校即派出小车将其接回。院保卫科到省公安厅为上访团复制了郭明正案全部材料。上访团到北京后，公安部、最高检察院的接待员要他们正确对待，劝他们回学校参加运动。上访团“反平反”的行动失败¹。

湖大六二〇事件后，很多师生被打成“反革命”。11月5日，湖



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南院举行“‘六二〇’血泪控诉大会”，校内外四千余人到会。受害师生控诉省委、工作组、校党委、校文革对他们的迫害，很多参会者流泪。省委许道琦在会上说“‘六二〇’是革命事件”。9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校文革讨论处理黑材料问题，校文革否认“六二〇”后有师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15日，第二次“‘六二〇’血泪控诉大会”举行，六二〇事件“反革命头目”张维荣、“右派”学生李金枝等流着泪发言。湖大大专兵冲击会场，

¹ 郭明正平反经过，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97—98、103—104、124—126页。

许道琦未能回答完与会者提的问题。16日晚，省委派车将六二〇事件受害者接到省委，许道琦说代表省委发给“平反通知书”，材料或烧毁或交本人；并要求受害者得到“平反通知书”后帮助省委解决“六二〇”平反的后续问题。“平反通知书”里不提及“武装镇压‘六二〇’”，更重要的是省委不是公开批判在这一事件上反映出来的资反路线，而是“想在私下里偷偷平反”，“当场激起了受害者的无比愤慨”¹。

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波大规模整群众，以当权派承认错误作检查告终。

第五节 大专兵、三字兵消散

在10月21日省委作出《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前，10月17日，省委秘书长张华在武大召集高校“左派”开会时说：“不要再提湖北省委好，说湖北省委好帮了倒忙，要把批判旗帜举得高高的，（否则）省委的检查一出来，你们会失去群众的。”²崔建瑞在会上说：“我们要大胆批判，越批判越好，批判了侥幸还能保住校文革、省委，不批判还可能保不住。”³张华的这个讲话，实际是在批判资反路线的大环境下，省委向各校文革委员会及大专兵指示应对策略。

10月中旬开始，各校文革委员会和大专兵纷纷举起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正在北京串连的湖大校文革发回加急电报说，“湖北省委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强烈要求张体学同志代表湖北省委立即向广大革命师生作出深刻检讨。”武测文革主任李景田等十多人写出大字报，“最强烈抗议张体学欺上瞒下的恶劣行为，要求停职反省。”⁴

15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在此前后，各校文革和红卫兵师纷纷举行批判资反路线大会。10月19日，湖大校文革在北京召开师生大会，会上漆林说在一段时间内“省委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

1 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19—20页。

2 参见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3 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五三纵队长征战斗队《炮轰湖北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年10月20日，铅印传单）。

4 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1966年10月15日，大专院校红卫兵举行批判资反路线誓师大会（载《红卫兵战报》第7期）

跟毛主席跟得很紧的”¹。

武大革命造反红卫兵向北京战斗队揭露，武大九一二红卫兵师副师长李德华10月14日在师部会上说：“你们不要以为他们现在很猖狂，他们是搞不长的，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压下去”。“你们回去以后，要把会议精神，分别到干部中去传达，要积极行动起来，很好地做工作，把握可靠分子，组织我们的力量，到时候组织反击”。“从目前形势来看，我们的队伍很乱，只能分散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化整为零，单独作战。这样一方面能保存实力，另一方面能争取群众，以便组织反击”。“师部不再直接去领导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和师部联系，每系必须有一个政治工作同志随时到师部汇报情况，以便掌握动态”。“从目前全国来看，都在搞批判，我们也要搞，不过我们与他们不同，他们是想把省委、校文革搞垮，我们不同意”²。

省委和大专兵头头的这些应对举措，都没能挽回大专兵的颓势。大专兵举起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没能够“争取群众”，自己的队伍却逐渐瓦解。

张建华回忆：

1 参见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第18页。

2 参见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当时，由省委组织、控制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内部纷纷起来造反，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所属华农红卫兵师的部分红卫兵分离出来成立了“反清洗临时联络站”，武大部分“9·12”红卫兵在大街上贴出大标语，要“踢开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自己闹革命”。武汉师范学院部分红卫兵在本院《革命造反报》上发表他们的《造反公告》¹……

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武汉师范学院革命造反团在《造反公告》中说：

我们造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部的反，是因为它是湖北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它的干部和红卫兵纠察不是由下而上民主选举的，而是从上到下包办指定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长年以来，完全控制在省委的手中，是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湖北省委继续利用总部来为维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锋陷阵，直到现在仍然在湖北省委镇压学生运动的打手“三员”的直接控制下。它根本不能代表我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革命意志，它是我们革命的绊脚石。这样的总部我们坚决不要，一定要彻底造它的反，把它彻底反掉。现在不反，更待何时²？

张建成回忆：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从参加北京国庆活动返校到十二月底，经过三个月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院党委、工作队党委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及‘七一五’反右、抓捕郭明正等执行资反路线的事实，到黑材料的曝光、郭明正平反，反反复复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什么叫镇压群众运动，什么叫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叫两条路线的斗争。……从而教育了广大群众。”“保守派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从组织上、思想上都瓦解了，很多人转到了造反派一边。原来坚定的人，也开始怀疑省委、党委中一些人言论、行动的正确性，于是开始逍遥起来了。‘大学校’已经不攻自垮了，院文化革命委员会也在斗争中靠边站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孤立了，造反派队伍壮大了，……。造反派已经在政治上、组织上、宣传上都处于主导、主动的地位。”³

张建华回忆：10月底在华中工学院，“‘华工红卫兵师’中的一般

1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6—147页。

2 转引自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7页。

3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26—127页。

成员则纷纷脱离保守组织加入了造反派组织或成立自己的造反组织(如红旗红卫兵及战斗兵团、保卫毛主席红卫兵及战斗兵团等)。当时“我要造反”“我要起义”的公告、大字报随处可见。我们的《造反先锋战报》就登载了机二系潘某的一篇《我要造反,我要起义》的文章。”潘同学说自己在工作组大抓“右派”时“做了一个得力的打手”,保校党委,保省委,一是因为奴隶主义,二是因为个人主义。他的文章还表示了对大专兵的彻底失望:“在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一定认识后,我就想从大专院校红卫兵内部来改造,使它变得革命起来。但是事态的发展使我非常失望,继续这样下去,对革命是很不利的。”¹

1966年12月28日出版的新华工《造反先锋战报》报道:12月20日,由水院、华师、华工大专兵组成的“革命造反团”去省一招13号楼,对省委派驻大专兵总部的联络员陈永禄“造反”,迫使他交出了“黑材料”,并表示要“把陈永禄的后台揪出来示众”。华农红卫兵师部分成员“成立了‘反清洗临时联络站’,和师部清洗持有不同观点红卫兵的无理行径作坚决的斗争”。华工保卫毛主席红卫兵及战斗兵团认为华工红卫兵师“做了五件坏事:保工作组,抓南下‘一小撮’,对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保省委,保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中旬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大专兵和其他保守派组织一起,与造反派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抗,在这次对抗中大专兵已不是主要力量。此后“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这个名称就从武汉文革运动中消失了。

10月21日省委作出《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中等学校红卫兵有组织的“揪南下一小撮”活动停止,同时退出学校。此后一直到1968年底中学生上山下乡,中学红卫兵组织基本没有在各中学出现。

¹ 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3—146页。

第七章 全市性学生造反组织成立

第一节 少数派学生组织：从全校性到全市性

9月上旬，武汉地区高校最早去北京串连的少数派逐渐回到学校，随即组织了十几人至几十人不等的战斗队。这些战斗队跨班、跨系，打出旗号，有了集中活动的地点，都宣布不接受校文革委员会的领导，“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在校文革的打压和多数派的围攻下，这些战斗队迫切需要与校内其他少数派战斗队联合起来。

中央文革派驻武汉的记者姚克强，军人出身，文革后讲到他对这些造反派大学生的印象：

当年做记者的时候，接触了很多大学生造反派，那种精神也很让人感动，吃的穿的差得很，起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要冒着很大的风险，批判走资派，防止国家变修，那是真正的艰苦朴素，吃的穿的跟要饭的差不了多少，跟部队在战争年代差不多。这个印象也很深刻¹。

9月上旬开始，多所高校出现了全校性的少数派组织。9月7日，华中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不久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9月13日，武汉测绘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9月14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湖大分部成立。9月14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联络站成立，27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成立。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水院众多少数派战斗队逐渐形成了八三一总队、井冈山野战兵团、红色联络部等联合体。9月下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大学分部成立。

这些全校性的群众组织，不由各级党组织出面组织，不为各级党组织掌控，公开宣布不接受临时权力机构文革委员会领导。文革开始以来高校是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引起省委高度警觉。

9月2日晚张体学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右派以极左的面孔，抓住了领导权。9月24日，张体学召集测绘学院“左派”会议，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一小撮反革命右派”，要发动、组织“左派”打击“右派”。

¹ 老田《姚克强访谈录》（2014年11月3日）。

9月下旬，省高等教育厅决定给大专院校师生每人发一套《毛泽东选集》。武测院文革召开大会发毛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全体列队参加。院文革宣布不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毛选。杨道远上台发言表示抗议，院文革主任夺下话筒，不让杨发言。武测大专兵发动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围攻，说他们受“南下一小撮”操纵，反省委就是反革命。院文革断绝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物资供应，纸张、浆糊都不给。当年国庆节，省委召开庆祝大会，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着旗帜整队来到会场，会议组织者和武测大专兵头头试图阻止其参会¹。

省委认为华工、武测“左派”力量不够强，少数派红卫兵能量大，9月19日决定调动八个院校的“左派”进驻两校，搞“三同”，“支持左派，孤立右派”。

9月12日一司成立后，湖北大学红卫兵组织改称“红卫兵师”，校文革为此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彭明诚回忆：红卫兵师“漆司令发表中心讲话，充分肯定了我校及全省前阶段运动的成绩是辉煌的，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中央对湖北省委是高度信任的等等，要求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密团结在省委周围，团结在校文革周围。最后他还未忘记给‘上当受骗’的少数派指明出路，要求他们悬崖勒马，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否则运动结束后，按‘十六条’规定一定要严肃处理！湖大红卫兵师政委、计统系六三级钱运录同学接着也作了激情四射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大义凛然地说，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中，如果司令员倒下去了，政委会把旗帜接过来，带领全校革命队伍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血战到底！”“这个大会开过后，造反派队员的情绪明显受到了影响，造反派力量逐步上升的趋势也被遏止了。没多久，财会系六四级的徐清安同学贴出‘公开声明’，宣布退出‘八三一革命队’！徐清安原来是我系学生会主席，也是‘八三一革命队’成立时选出来的‘勤务员’，在全系享有较高的威信，他这一纸‘公开声明’给造反派的打击可想而知！也许受他的影响，没过两天，系门口突然又出现了马铜铃同学退出‘八三一革命队’的‘公开声明’。马铜铃是我们同班同学，我们一起赴京串联，一起参加造反派，他这份‘公开声明’，不啻给我们形成了更直接的压力，也使我们产生了动摇，不得不思考下一步怎么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¹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3—35页。

痛苦的徘徊彷徨之后，我班还留在造反派的七个同学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也退出‘八三一革命队’，但不写‘公开声明’，尽量减少对造反派的打击和不利影响。”被一位“在狂风恶浪袭来之时，镇定自若，心无旁骛地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和追求”的“文文静静”的女同学所感动，这七个同学改变了退出的想法¹。但外在的压力并没有改变。

杨道远这样记叙少数派当时的处境：“各个学校相继成立了校级组织。但少数派仍然是少数派，就算是成立了校级组织，也仍然是人家砧板上的肉，任由宰割。”“团结才有力量，少数派必须联合起来。”从武医成功抢出黑材料后，“各个学校的少数派负责人都有一种联合起来的愿望。”²

杨道远回忆：大约从9月下旬开始，“南下造反大队积极穿针引线，各学校少数派代表到一起协商，酝酿建立统一组织。协商会开过多次”³。

省委密切注视各校少数派的动向。9月23日，张体学在书记座谈会上说：“武汉地区少数人再成立总部的的问题，我们不表态，……斗争的焦点是：他们想搞一个少数派”。9月26日在书记处会议上，张体学说：“少数派是两种情况，百分之九十九是人民内部矛盾，个别的是敌我矛盾，但先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法是坚决做争取工作，说服、耐心等待。对少数派一个一个的进行调查研究的，从历史、成分上去分析。召集小型座谈会，听取双方的意见。他们人数不多，要成立红卫兵总部，我看不成立好。原则按十六条办事，一视同仁，大专院校自己讨论。另外，可以成立独立分队，但要在革委会领导下。”姜一说：“少数派总部能不能成立？最好不成立，成立就会对立起来。”

在1966年9月中下旬，省委不支持学生少数派成立全市性组织，只同意各校少数派成立全校性的组织，但必须置于校文革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之下。这是少数派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多数派红卫兵能够成立全市性的总部，少数派红卫兵为什么就不行？而且少数派在成立小型战斗队时大多宣布脱离校文革的领导，联合起来成立全校性组织后更不可能接受校文革的领导了。

经历了关于工作组问题、“炮轰省委”、“揪南下一小撮”、“怀疑一切”的大辩论，经历了北京串连，少数派信心增强，队伍逐渐扩大，省

1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六、我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及差点当‘逃兵’”。

2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44—45页。

3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46页。

委对少数派的控制力大幅削弱。尽管省委一再表示不同意成立全市性少数派学生组织，少数派仍然频繁地进行筹备。

10月初，批判资反路线运动开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10月4日，张体学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本地少数派要成立红卫兵总部，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要被动的。”

10月8日，省委许道琦、张华接见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表示承认其为革命组织，并加入了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随后武测文革委员会也予以承认。（11月8日，二司武测总部宣布将许、张二人开除。）¹

10月18日武汉晚报报道：

15日和16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和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别举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武汉地区的红卫兵和外地来汉进行革命串联的红卫兵代表在会上踊跃发言。

这是武汉市委机关报文革以来第一次正面报道少数派，且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前加上“武汉地区”字样，表明市委已不反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为全市性组织。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 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成立

武汉地区各校学生少数派（1966年11月左右开始称造反派）自行成立红卫兵时，大多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区别于多数派（1966年11月左右开始称保守派）的红卫兵。多数派红卫兵组织按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分设，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和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的红卫兵分别被称为“大专兵”和“三字兵”，或被统称为“三字兵”。其后武汉地区出现多个红卫兵造反组织，这些组织1967年2月后分为两派，但始终都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1966年9月下旬，武汉地区高校的少数派几乎都参加了这一个全市性组织的筹备工作。

杨道远回忆筹备过程说：

¹ 参见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第六版）。

在这段时间里，外地来汉串联学生成了“少数派”相互联系的中心，各个学校的少数派差不多都是在同“南下一小撮”的共同战斗中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各校有了自己的组织以后，相互通气，相互声援。在外人的眼里，少数派人少心齐，战斗力强。武汉医学院抢黑材料，其主力就是华工聂年生带的人，武汉三镇的少数派都参加了。少数派已经形成了“派”，迫切需要联合起来，统一行动，统一作战。南下造反大队积极穿针引线，各学校少数派代表到一起协商，酝酿建立统一组织。协商会开过多次，第一次在湖大召开，第二次到华工开，以后就都在武测开了。到会代表都自报家门，自我介绍。我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叫杨道远，是文化革命初期改的名字，原名叫杨书贵，是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五年级（航五）的学生，老家河南省镇平县，出身贫农，本人是中共预备党员。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情况讲得很清楚，以利于同志们去核查。其他代表都做了自我介绍。他们是：武汉大学（简称武大）樊雪梅，武汉邮电学院（简称武邮）张良栋，武汉师范学院（简称武师）温平，武汉机械学院（简称武机）刘光远、方保林，华中师范学院（简称华师）王彩珠、刘闯，武汉测绘学院（简称武测）杨道远、曹福泉（曹勇），武汉工学院（简称武工）黄亚亮、陈大川、彭宣龙，武汉体育学院（简称体院）胡兆英、赵子强，中央民族学院中南分院（简称民院）胡文汇，武汉外语专科学校（简称外专）李丹、周孔信，华中农学院（简称华农）王修斌、徐宏彩，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简称水运）王明生、蔡向东，湖北艺术学院（简称湖艺）彭水清，华中工学院（简称华工）郭保安、杨成江，湖北大学（简称湖大）陈春茂、谢邦柱，湖北省社教总团（简称总团）薛成明，武汉钢铁学院（简称钢院）李宏武，武汉医学院（简称武医）王明声、丁某，湖北医学院（简称湖医）朱德珍，湖北中医学院（简称中医）汤立子，武汉钢铁学校（简称钢校）张大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简称水院）彭水木、丁家显，由这些人组成了司令部筹委会。

经这些人反复讨论协商，确定了组织名称、组织章程、组织成立宣言、组织机构、人员分工。一切筹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井然有序的进行着。

组织名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

定名时决定，所有加入的红卫兵统一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在名字里为什么加了个“武汉地区”呢？大家认为，可能成立全国统

一组织，我们将成为统一组织的地方组织，所以就冠以地名“武汉地区”。

至于“革命造反司令部”，初定时只拟为“造反司令部”，“革命”两个字是在讨论时，南下造反大队提议加上的。我记得很清楚，他们强调说是“革命造反”。我们为什么叫“司令部”？是因为保守派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全市组织称“总部”，我们把全市统一组织称“司令部”，各个学校的校级组织称“总部”，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大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测总部……是想从名称的气势上就比大专兵傲，比大专兵高一筹，从心理上压对方。我们常说，我们同大专兵的最大区别就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他们没有¹。

省文革小组办公室同意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同意拨给经费，并要求该司令部办公地所在的武汉测绘学院为其解决办公室及办公设施等。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大会于1966年10月26日在武汉体育馆举行。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等出席，许道琦代表省委授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锐代表省委致贺词。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代表也到会祝贺并讲话。杨道远在讲话中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答是造反！造反！！再造反！！！”“我们的骨头硬得很！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撑腰！有七亿人民做靠山！”“我们有毛泽东思想做显微镜和望远镜，我们就能洞察一切，任何妖雾也挡不住我们的视线！我们有十六条做行动纲领，我们就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我们



二司成立大会会场

¹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46—47页。

要战斗！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我们最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准备坐牢，准备掉脑袋！”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武汉地区第一个全市性的少数派红卫兵组织，称为“二司”，同时一个多月前成立的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被称为“一司”。

27日，湖北日报报道了二司成立，并配发成立大会会场照片及社论。

二司司令部常委会有一个特点，即实行学校常委制，不设个人常委。司令部开常委会，常委学校派出的代表无论是什么职务都可以参加。二司成立时，常委学校共16所，高校12所，中学4所。

大部分大中学校的少数派参加了二司，二司成为武汉地区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但在文革初期影响最大的湖大少数派、人数最多的华工少数派最终没能参加二司。

第三节 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成立¹

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成立于1966年11月4日。

三司成员、武汉大学六三级学生杨家志²在1967年5月19日的一篇文章中，讲到三司的成立宗旨、政治主张、成员情况：

三司是1966年11月初成立的。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处于一个大溃败的时刻，由湖北黑省委一手扶植的保守组织处于一个土崩瓦解的状态，在这个大动荡的日子里，原来保守组织的许多受蒙蔽的群众醒悟过来，开始造湖北黑省委的反，造保守组织的反。但是，当他们反戈一击加入造反派的行列时，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艰苦奋斗的人们已经扛着大旗冲在前面了，所以他们不是革命造反派的旗手，而是革命造反派的延续和发展。这种来自保守组织营垒里的战士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反戈一击更能刺中敌人的要害。但是在这一部分同志中间，个别同志带有原营垒中的痕迹，与那些长期以来就浴血奋斗的同志的感情还有一定的距离，于是就会产生第三条路线，三司就是适应这种路线而成立的。所以，三司是两条路线斗

¹ 本节的撰写，参考了2015年7月杜先荣访谈方霞的记录。方霞为武汉大学六五级学生，三司的发起人之一。

² 杨家志1967年1月参加三司，数度进入三司司令部工作。

争的产物，但不是文化大革命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它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但它没有做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它没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斗争舞台。

当然上面所说的只是就一般的来说的，但就各总部、各战斗组织来说情况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特点。有些组织、有些战斗队，在他们本单位也是最先起来举起造反有理的大旗的，这是三司的光荣。所以，在三司的旗帜下，集聚了一些革命闯将，他们是中坚、是骨干。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存在来说，他们的思潮在三司内部是不能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在红三司举起的造反有理的大旗上总带有一种温和色彩。这样就发生了下面的一个问题：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发展，大专院校红卫兵名声更加狼藉，保守思想比较严重的同志，也预感这个组织的末日来临，于是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而三司的路线、三司的策略也比较适合自己的口味，比较便于他们接受，这样一来，在三司里，除了吸收已经回到革命路线的同志外，也吸收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充分认识的同志¹。

成立三司的筹备工作主要由武大六二级学生孙青、华工六二级学生吴穷负责。在筹备过程中，孙青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太激进了，我们要成立自己的司令部。”“一、二司太讲家庭出身了，不利于团结更多的同学，而三司发展组织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限制，出身一般劳动人民家庭的也可以参加，我们要团结更多的同学参加文化大革命。”

三司成立大会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省委、省人委张体学等和参加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参加会议。张体学代表省委授旗，张华代表省委致贺词，二司代表到会祝贺并讲话。11月6日湖北日报报道了三司成立大会



三司成立大会会场

1 杨家志《我为什么参加三司革联?》(1967年5月19日)，红司新华工夺取新的胜利战斗队翻印。

并配发社论。

三司总指挥是张富有，副总指挥有孙青（二号头头）、吴穷、武汉测绘学院六三级学生罗亨华。三司的红卫兵称“东方红红卫兵”。

三司成员主要是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湖北中医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测绘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和不少中学的组织，这些组织独立于大专兵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其中很多学生出身于“黑五类”家庭或既非“红五类”又非“黑五类”家庭，这些人不为一司、二司所接纳。

华中工学院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红卫兵不久脱离三司，参加了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三司所属的华工井冈山红卫兵于1967年4月宣布退出三司，参加了红司（新华工）。

二司成员在运动初期受打击较重，批判资反路线时言行较为激烈；没有纸张笔墨和广播器材等开展四大必需的物资，往往采取抢的方式，一些成员主要是中学生公开提出“不偷不抢是老蒋，不抢不偷是老修”的口号；迫于当时“血统论”盛行的政治环境，高压下害怕“抓辫子”，二司成立时吸收成员非常注重家庭出身。

不同意二司这些观点、行为，又想起来造反的学生很多参加三司，三司从成立时的两千人很快发展到三万人。三司成立后，直到1967年二八声明发表，一直与其他造反组织共同行动。这期间，社会上都认为三司是造反派，也熟知三司的特点——“同意二司的观点，不同意二司的做法”。三司发起人之一方霞说：三司的这一特点在它成立前就明显存在，可以说就是三司成立的主要思想基础。但方霞还认为：三司成立时其政治观点是反工作组、同情南下串连同学、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第四节 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

一、新华工

华中工学院在当时武汉地区高校中人数最多，师生员工万余人。华工少数派开始出现的时候人数也很多，华工六三级学生李显利说：“华工没有‘少数派’的说法，当时就是一大批人造反。”¹华工六四级学生张建华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到1966年10月底，我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已经从成立时的700多人迅速发展到两千多人，加上继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
1 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李显利的记录。



兵新华工总部后相继成立的‘东方红红卫兵’‘长征公社’‘井冈山兵团’‘教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总部’等造反组织，我院的造反派组织已发展到四千多人，几乎占了全院师生员工总数的40%以上。

如果加上因各种原因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但表示支持造反派的师生员工，我们造反派的人数已超过全院师生总人数的60%以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多数派。在此期间，我院的各级干部也纷纷起来参加造反派的队伍。其中168名干部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新华工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全院副科级以上干部136人（其中党员116人）90%以上都加入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¹

新华工参加了二司的筹备工作，杨道远回忆说第二次筹备会就是在华工开的。筹备过程中各校少数派代表一致推举新华工出任二司总指挥、杨道远任副总指挥。杨道远回忆：二司开成立大会时，“华工没有代表到会，我以代总指挥身份主持成立大会，总指挥的位置一直空着，等待华工来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后，我曾多次找过华工郭保安，要求华工来人任总指挥，一直等到华工单方成立了司令部——‘红司（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才放弃了邀请华工参加司令部的努力。”²

红司（新华工）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是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与校内东方红红卫兵总部、长征公社、教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总部等实现大联合后成立的（不久红工兵加入）。红司成立后，各组织成员按班、系、科、处、室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组织。

从红司（新华工）这个名称可以看出，红司打算成为全市性的组织。事实上红司成立前后，吸收了外校特别是中学的造反派。1967年七二〇事

1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43页。

2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52页。

件后，红司成立中学总部，与新湖大、新华农的中学总部合称“三新中总”。

新华工、新湖大特别是新华工未能参加二司，是武汉文革中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了全市、全省文革运动的走向。杨道远甚至不无偏颇地认为：“如果当初华工造反派参加了二司，武汉地区后来的钢新两派也许就不会出现了。”¹

新华工为什么未能参加二司，当时就流传着很多说法。

杨道远在其回忆录里说：“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原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发起人，但是，华工为什么不参加司令部了呢？一直没有公开说明过。据传出来的说法，有这么几种：一是认为华工造反派人多，力量大，不屑于别的弱小势力，有没有司令部无所谓；二是认为单位多了不好统一步调；三是认为单位多了队伍的“纯度”难控制，可靠性难掌握，易出问题，怕受牵连；第四种说法是，华工本校内造反派有几个组织，尚未联合起来，推不出能代表整个华中工学院的人物到司令部任职。”²杨道远提到的前三种说法与华工六五级学生、新华工总部头头之一张立国对此事的看法比较接近，而“第四种说法”不够准确。当时是华工最大的少数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出面筹备二司，它派出谁到二司司令部任职与华工其他少数派组织无关，就像杨道远去二司任职与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外的校内组织无关一样。但杨道远提到的人选问题，当时就有很多议论。议论涉及郭保安和聂年生，郭、聂二人分别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一、二号头头。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六三级学生、二司头头之一丁家显也认为新华工未参加二司是人选问题：“当时我们是想叫新华工当一把手，因为他们人多，块头大，造反也比较早。为什么新华工没参加二司，我认为是新华工内部为派谁当一把手没有统一意见。”³

贺光宇是华工六三级学生，红反团中所谓聂年生的“四大金刚”之一，他以知情人的身份详述二司总指挥人选问题，具体就是所谓“郭聂之争”：

当时各校的造反派几乎是一致认为，聂年生是最合适的人选。

而在华工造反派的司令部中，以郭保安为首的一批人则是持完全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聂年生不过是新华工司令部中的一个顾问而已，不能代

1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52页。

2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51页。

3 2013年10月杜先荣、田力为访谈丁家显的记录。

表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如果聂年生当司令，那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不参加这个司令部。当聂年生了解这个情况后，就主动提出同意让郭保安出任司令，可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却又不同意郭保安当司令。事情就这样僵下来了。可成立司令部的事又已迫在眉睫了，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暂由杨道远任代司令，司令之位仍对聂年生虚席以待，等待华工内部统一后再来出任¹。

贺光宇所言“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却又不同意郭保安当司令。事情就这样僵下来了”，最早不知出自何处的类似说法一直在社会上流传。杨道远说“没有这个事！”杨道远解释：二司司令部常委会实行学校常委制，不设个人常委，常委学校派出何人到司令部工作，由本校总部决定，司令部和和其他学校都不会干预。新华工派出何人任总指挥也是这样²。

新华工不参加二司不是因为难以决定总指挥人选。当时如果新华工决定参加二司并出任总指挥，郭保安是当然人选。郭保安、刘玉民（华工六四级学生、新华工头头之一）回忆：9月26日各系少数派代表商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的大会主席团主席人选时，就推举郭保安为执行主席（亦即总部一号头头），除聂年生本人外只有一人同意聂年生当主席。

聂年生后来当上新华工总部二号头头，但他很少参加总部会议。聂年生造反早，以他为首的红反团人数虽少，但敢想敢干，冲锋在前；经常去各校支持少数派，与各校少数派建立了很好的关系。红反团虽属新华工总部，但往往独立行动，在外影响很大，在校内少数派中缺乏基础。刘玉民说：“当时老聂为何吆喝不起人来？主要是老聂的口头禅‘小学不入队，中学不入团，大学不入党’，大家感到他的信誉度不高，大家对他不赞成，怕他把队伍带错了路。”聂年生不能代表整个新华工少数派，新华工就是派人就任二司总指挥也不会派聂年生。

新华工不参加二司的原因，郭保安这样解释：“杨道远通知我去商量成立二司，……我问他目的是什么？他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二司成立后，各个学校都参加了，二司就是武汉学校文革的中心。当时工总还没成立，意思是老子天下第一；司令员是要华工派出的，位置留给华工。他的思想与聂年生是一致的，也是聂年生串连的。”“当时搞不到一起，

1 贺光宇《悼念聂年生同志》（网文，2010年）。

2 杨道远2018年12月回答笔者提问所言。

没有别的分歧，核心那个观点是聂的思想。我们没有当核心的思想。对要当武汉文革的核心不赞成。……他们的指导思想我们不赞成。所以我们决定不参加。”“红反团在二司、工总成立上最早发动，是有功的。他的主导思想我不赞成，我参加了观点不同又不能打架。他们通知开会，我没去，他们的想法，我说我们回去研究研究，没答复。”¹郭保安2009年回忆录还写道：他对同去会见杨道远的李培俊、赵文成、刘玉满、刘玉民等说：“如果我们回答不参加，那末聂要参加怎么办？我想是不是我们不回话，给聂参加留条路。他不参加或人家不通知他参加，那就不是我们的事了。我们不参加，也不回话。这事回去都不要讲，免得大家议论纷纷，又要统一思想。”郭保安说他的这个意见“大家都同意”。

张立国的看法是：“当时没有参加二司，主要三点理由：第一，我认为我们这一批人是最忠于毛主席的，主要骨干原来在学校表现很好，品学兼优，思想单纯，比如郭保安。刘玉民、陈定方等一批人，自觉地信仰毛泽东思想，大家为了信仰结合在一起，不存在个人受迫害而造反，觉得我们比较正确，不愿与其他学校搞在一起。第二，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先进性，都是为了一个信仰在一起，我们不愿意被打扰，纯洁性才能体现新华工的战斗力。第三个，鉴于首都红卫兵三司内部出了问题，各个学校统一不起来，闹得一塌糊涂。主要是这三个原因。有人说，华工内部反对聂年生当二司司令。这不是事实。我们跟聂年生有一些分歧，但大方向是一致的。”²

联系文革中新华工的一贯行事风格，郭、张的解释有很高可信度。

直到1967年8月4日新华工革委会成立前，郭保安一直是新华工的一号头头。华工内外纷纷传说，筹备革委会时，为革委会主任人选，“郭派”和“聂派”激烈辩论，结果在新华工勤务组排名最后的张立国出任革委会主任。郭保安说“郭、聂之争导致张上台是伪命题”。“我要给聂年生正名。在武汉7·20后他的红反团有人在院内写了大字报说要聂当院革委会主任。但是在院图书馆召开全院各战斗队长大会讨论院革委会主任事宜时，红反团没有人发一言，作一个小动作。聂年生也没到场，他在南一楼外面等选举结果呢。怎么能说是他和我在争呢？会议结束后我回宿舍路

1 2016年11月杜先荣访谈郭保安、刘玉民的记录。

2 2016年11月杜先荣、田力为访谈张立国的记录。

过此地，他还问我是选的谁呢！如果说聂想当院革委会主任，我信。但说他要和我争，并说如果我当，聂要武装冲击会场，连成立大会都开不起来，我不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时，他公开争，要当一把手没有成功，他还是好好的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次他又没表明要出来争，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呢？这是有些人为了掩盖真相、推托责任找的借口。遗憾的是，谬种流传至今，还有人信以为真。至于我，如果选出聂，我也不会争。因为在成立总部时有人要我当一把手，我是再三推辞，怕带错路，怎么会和他争呢？连张当我都都不争，还能跟他争？”郭保安说是“聂派”以外的一些人对她使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并如愿以偿。关于他和聂年生的关系，郭保安在回忆录里讲了两件事：一是1967年1月华工各组织联合成立红司时，是他提出聂年生任红司第一副司令。二是华工革委会成立不久，“聂在（钢派）群众大会上作了完全钢派内容的发言，张立国自拟了撤消聂年生新华工革委会副主任、红司（新华工）副司令、开除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决定，召开革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在大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我不同意，并陈述了充分的理由。结果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

聂年生和红反团一直独立活动，甚至公开打出“聂派”旗号，但从未宣布脱离新华工。郭保安回忆：“九十年代，聂年生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其妻连夜给我打电话告诉噩耗，并说：‘聂年生前对我说过，有事找老郭，就是郭保安，他会帮你的。’我当时正在和外商谈判，除了痛惜外，我立即打电话给陈定方，告知此事，并请他帮忙。陈说：‘其妻就在我们学院，我正好能帮得上忙。你放心吧。’”

原红司宣传部长刘玉民回忆筹备院革委会过程说：

七·二〇事件之后，筹备成立华工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提上了日程。按照分工我负责有关文件的准备工作。当时我一边接待新闻单位的采访及解放军三总部文工团来院慰问演出，一边组织宣传部及《新华工》报编辑部起草文件，忙得不可开交。一天晚上，红司突然通知召开常委会。张汉卿提出有人反映郭保安的所谓作风问题，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而且男女双方矢口否认。这事十分蹊跷。空军支左的同志要求尽快确定革委会主任人选，以便向中央文革报告。在第二天的常委会上，张汉卿提出一个意见，由张立国任革委会主任，郭保安任第一副主任，聂年生任第二副主任，王富山任第三副主任……，多数人表示反对。会后，郭保安逐一做工作。他

对大家说：现在全国声援武汉，毛主席、党中央看着我们，全院的师生员工看着我们，这是大局。就这样，华中工学院革委会于8月4日诞生了¹。

张立国回忆：

郭聂相争时我不在学校，既没有跟郭、聂两派接触，也没有参与争论。是当时武汉军区空司派到我院支左的情报部长韩林，把我找回来要我担任主任一职。我当时不愿意，推荐郭保安任主任。理由是：一、郭是党员，系学生会主席，影响很大。二、郭造反早，领导能力强，拥护他的人很多，我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是郭发展的，要我任主任，怕压不住阵脚。三、新华工应该讲是郭创办的，我当一把手，下面会不服的……韩林说，要你当主任是我们支左办公室反复讨论而决定的。这是关系到紧不紧跟毛主席部署的大问题，这是政治任务，至于其他工作我们来做。我们支左解放军支持你²。

郭保安和聂年生“都表示以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以革命利益为重，支持张立国出任新华工革命委员会主任”³。

陈定方回忆：“七二〇事件后，新华工广大师生强烈希望早日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和复课闹革命。与这个目标相比，哪一位出任革委会主任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人选问题上有分歧时，大家担心耽误了革委会成立的时间，于是选择了张立国担任革委会主任。七二〇事件结束后十天，1967年8月4日，新华工革命委员会就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批准下成立，是中南地区第一个革命委员会。”⁴

张立国从此成为新华工一号头头，直至文革结束。

二、新湖大

湖北大学（现更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在的湖北大学，1966年校名为武汉师范学院）成为武汉文革初期的群众运动中心，它的地理位置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的湖大处在武昌闹市，与汉阳闹市钟家村只隔一座长江大桥，公交一两站路；与汉口闹市隔着相连的两座桥——长江大桥和汉

1 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十一章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诞生。

2 2019年9月张立国致陈定方信。

3 参见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十一章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诞生。

4 陈定方2020年1月致作者的微信。

水桥，公交三四站路。在武汉文革中影响同样很大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并入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名华中科技大学）离武汉三镇闹市较远，距湖大分别是6公里和12公里。南下造反学生绝大多数住在湖大，这首先还是因为湖大离武昌火车南站很近，坐公交到达湖大正门两站路，出南站沿紫阳路（现名张之洞路）步行到湖大后门，只需十几分钟。

还有一个原因：湖大六二〇事件后，少数派开始形成并颇有能量。如果湖大学生在工作组和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管理下一边倒，或不同的声音极其微弱，没有激烈的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辩论，就不会吸引校外的工人、学生潮水般地涌进校园，南下造反学生也不可能获得支持而在湖大站住脚。

第三，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发动武汉造反派作用甚大的南下造反学生以湖大为大本营。

第四，文革一开始，湖大就成为湖北省委的试点，张体学亲自蹲点，很多活动由省委直接指挥。比如影响很大的校文革与南下学生的辩论会，就是张体学指定召开的，时间也是他定的；撤销起来造反的龙铭鑫的校文革委员会委员、计统系文革分会主任并开大会宣布，也是省委直接指示的。湖大两派争斗异常激烈，武汉高校中较早的少数派组织出现在湖大，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设在湖大，漆林任总部政委。

9月14日，湖北大学红八月造反队、八三一兵团、长征造反团、毛泽东主义战斗队等主要少数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湖大分部，在武汉地区各高校少数派中力量比较强，在社会上影响也比较大。各战斗队特别是红八月造反队吸收了很多中学生。

10月初，同为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负责人的六四级学生谢邦柱和



六三级学生龙铭鑫等，邀请杨道远、华中师范学院学生王彩珠、水院丁家显、华工郭保安（也可能是王富山）等来湖大31号楼商量，是否全市各个学校少数派红卫兵，统一一个名称，都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比如湖大少数派还有毛主席路线红卫

兵、红旗红卫兵等，还是统一名称好。大家都赞成。谈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否成立全市性的司令部，杨道远认为应该成立，湖大方面主张以学校为单位成立总部，立足于本校搞好本单位的运动，必要时再串连起来一起投入社会上的行动¹。

谢邦柱、龙铭鑫等人的意见不被其他学校少数派代表所接受，新湖大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参加二司。

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夺取了校广播台。当“新湖大革命造反广播台，现在开始首次播音”的呼号声在校园内响起，各宿舍楼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各战斗队自发地举行了环绕校园的庆祝游行。

1966年12月22日，湖大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新湖大临委会”或“新湖大”），谢邦柱任主任，龙铭鑫、张维荣任副主任，常委有政治系学生柴玉本、经济系学生梅子惠、计统系学生黄牛、政治系教师彭勋等人²。

“临委会”发表《公告》：

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向全国广大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员工、红卫兵战友郑重宣告：

一、前湖北大学校文革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私生子，它自成立以来，一贯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它早已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早已迫切要求踢开校文革自己闹革命。为此，我们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21时宣判前湖大校文革以死刑。

二、从宣判前湖大校文革死刑时起，到新湖大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止，一切权力归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

三、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由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湖大总部、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湖大总部、红旗红卫兵湖大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工兵湖大总部、毛泽东思想红教工湖大分部等五个革命组织组成。

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

1966年12月22日21时于湖北大学³

1 参见2015年4月杜先荣访谈龙铭鑫、谢邦柱，2018年12月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2 参见杜先荣2019年9月采访谢邦柱的记录。

3 武汉新湖大革命委员会、武汉红代会（筹）新湖大总部《新湖大》编辑部编《新湖大》报（1967年12月25日）。

湖大是武汉地区第一个造反派夺权的单位。

三、新华农¹

华中农学院最早出现的少数派组织是1966年9月7日成立的新华农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改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参与发起二司，称二司新华农总部。华农的另一少数派组织东方红红卫兵成立时间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晚，人数较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多。新华农东方红红卫兵在三司成立时参加三司，不久认为“三司与大专兵没有多大区别”，于是退出三司，成为独立的“新华农东方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华农”。

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观点接近，经常联系，共同行动，被称为“三新”。

因二司华农总部的存在，新华农又称“新华农（东方红）”。新华农主要领导人高玉泽、谈志发、谢文照等。

1967年“一月夺权”期间，新华农（东方红）与二司华农总部联合成立了“新华农红色造反者联络总部”，于1月23日发布《夺权公告》，宣布“原华中农学院党政工团的一切权力，统统归红色造反者接管”²。

二八声明发表后，两个组织的联合破裂。在3月至7月与武汉军区和保守组织百万雄师的对抗中，两个组织重新联合为“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指挥部”。七二〇事件后随着“钢新之争”兴起，两个组织再次发生冲突，二司华农总部退出合办了27期的《新华农》报，宣布“因为观点分歧”，与三司革联新华农总部另办《新华农战报》³。

在筹备院革委会的过程中，两派为席位问题长时间争执，新华农革委会迟至1968年2月26日才成立，比新华工晚了半年。院革委会主任人选也没有像新华工、新湖大那样，由造反派学生头头担任，而是推出一位原院领导干部担任⁴。

1 本部分的撰写，参考了杜先荣2018年、2019年分别访谈杨道远、原新华农头头谢文照的记录。

2 新华农红色造反者联络总部宣传组主编《新华农》报第二期（1967年1月23日）。

3 参见武汉钢二司新华农总部、武汉三司革联新华农总部《新华农战报》第一期（1967年8月22日）。

4 参见《湖北日报》1968年2月27日报道《华中农学院革委会胜利诞生》。

第八章 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

第一节 “我们要彻底改组湖北日报社”

少数派对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的不满由来已久。在少数派“炮轰省委”时，湖北日报连篇累牍地颂扬性报道王任重直接操控的武大文革运动情况，报道张体学四清中蹲点的随县洪山区和文革中抓点的湖北大学，报道各路英模四出作报告，赞扬“湖北省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揪南下一小撮”成为运动中心时，大量报道各校学毛著、斗黑帮，“形势很好”，“取得新胜利”；报道少数派与多数派发生激烈辩论的多次大会，只出现多数派的姓名与发言。

1966年9月，“怀疑一切”这个口号和“炮轰省委”一起，成为武汉地区少数派和多数派大辩论的主题。9月25日，湖北日报发表两篇批判“怀疑一切”的文章——武昌运输红卫兵的《驳“怀疑一切”论》和华师中文系6203班七位同学的《马克思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驳“怀疑一切”论》。武昌运输红卫兵的文章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提出‘怀疑一切’的谬论，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理论’”。提出“怀疑一切”，就是“怀疑毛泽东思想”、“怀疑我们的党”、“怀疑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华师七位学生的文章说：1957年右派分子就曾宣扬“怀疑一切”；“马克思所说的‘怀疑’，是指对资本主义世界应抱批判的态度。”“‘怀疑一切’是有阶级立场的。”

在关于“怀疑一切”的辩论中，少数派本来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杨道远回忆：“多数派硬说‘怀疑一切’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纲领，‘怀疑一切’就是怀疑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真是黑云压顶，一片白色恐怖。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里一些没见过这阵势的、胆子小的，动摇了，害怕了，于是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¹湖北日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少数派认为这就是省

1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5页。



1966年9月25日《湖北日报》第2版

委公开表态，把同意“怀疑一切”的少数派打成“反革命”“右派”。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王树成就认为发表此类文章不妥，他在26日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报纸上报导斗争的方针，驳‘怀疑一切论’，只能驳一下，不能再搞了，报纸一出就（让人觉得是针）对南下人搞的，这样就抓住你了。”他的意思是，虽然批判少数派主张的“怀疑一切”是省委的“斗争的方针”，但“驳一下”就行了，再搞下去会让少数派抓住辫子。

后来发生的事证实王树成所言不虚。11月3日晚，北航红旗六名学生前往湖北日报社提出抗议。4日晚，武汉和外地少数派学生去报社找到总编辑刘江峰，刘不肯表态，学生们封了总编辑办公室。5日上午，刘承认学生“在报社的一切行动是革命的”。关于“怀疑一切”口号问题，双方达成协议，三天后继续“澄清”。8日上午，“刘江峰态度更加恶劣，拒不正面回答问题”。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刘与学生们一起去省委，没有结果。经少数派学生持续要求，两天后，张体学和少数派学生在洪山礼堂座谈，“同学列举了湖北日报大量的严重错误，提出了坚决改组湖北日报编辑部的革命要求”，张体学“不接受”。学生们提出先将湖北日报封了，张体学说下午开常委会研究。下午，张体学表示“支持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派三辆汽车送学生去报社。10日下午，新湖大、北航红旗等少数派进驻湖北日报社。原定当晚八点继续举行的座谈会因故取消，张体学“答

应另约时间”。十二点半，大专兵来到报社，撕去封条，撕毁少数派的大字报¹。

11月7日，新华工红色造反团发布铅印传单《一百个为什么——湖北省委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多次提到湖北日报的“严重问题”：华工“八月二十五日的省委检讨会，《湖北日报》为什么要报导成‘隆重的热烈庆祝会’”？“对‘怀疑一切’的口号，群众的争论还相当剧烈，《湖北日报》借刊登革命的大字报为名，大量攻击革命群众，胡说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这个革命的座右铭过时了，是反动的，这是谁的指示？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怀疑？”“鉴于《湖北日报》的很多严重问题，《湖北日报》到底是什么鬼在作怪？”

11月10日，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工总部、华工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散发一份铅印传单，题为《大造〈湖北日报〉的反》。传单说，湖北日报“多次歪曲报道武汉地区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为了打击南下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和压制具有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在省委指示下，于九月二十五日大登特登什么‘革命的大字报选’‘驳怀疑一切’”。“我们要彻底改组《湖北日报》社！”

十多天过去了，省委对少数派的要求——报社作检讨、改组编辑部，没有明确的回应。少数派多个组织协商，决定组织大规模进驻，封闭湖北日报。

11月16日，二司、三司、新华工、外地来汉学生一千三百余人，在洪山礼堂召开“坚决造湖北日报的反誓师大会”，大会通过《关于彻底改组〈湖北日报〉编辑部联合严正声明》，谴责“以总编辑刘江峰为首的《湖北日报》编辑部一伙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公然篡改毛主席语录和林彪同志的指示……挑动工人、群众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极力反对革命大串联，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吹捧张体学，为湖北省委唱高调，把张体学凌驾于毛主席之上，把湖北省委当成独立王国，充当了湖北省委镇压革命、镇压群众运动的凶恶打手，现已堕落为湖北省委少数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提出“湖北日报

¹ 参见北航红旗、哈军工红反团、西军电临委会驻汉联络站，湖北大学、武汉邮电学院、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农学院红十月红卫兵《事情的由来——我们为什么要封湖北日报编辑部》（1966年11月，铅印传单）。



当年湖北日报、武汉晚报所在地——红旗大楼

革命群众公开检讨”¹。这是少数派自11月3日开始陆续到湖北日报社“造反”以来，第一次向省委提出正式的书面要求。

大会进行中，二司杨道远、方保林派华农王修斌带人乘三辆卡车先行进入报社，控制排字房和印刷厂，等待大队人马到来。会后大队人马游行到湖北日报社所在地汉口红旗大楼，当天下午，“造反者顺利地占领了报社大楼，发表通告，勒令《湖北日报》停刊，要求撤社长雷行的职，罢总编刘江锋的官，要求改组《湖北日报》编辑部。”“武汉市各

造反组织闻讯，纷纷结队到《湖北日报》社声援。一时间各造反组织的红旗插满整个报社大楼”²。

同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给湖北省委发来特急电报并报中央，认为少数派“对湖北日报前个时期在报道上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很可贵的。湖北省委和湖北日报编委应该热忱欢迎和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同学们要求改组湖北日报编委的意见，可向湖北省委提出，有不同意见时，可以进行研究，但要保证报纸照常出刊”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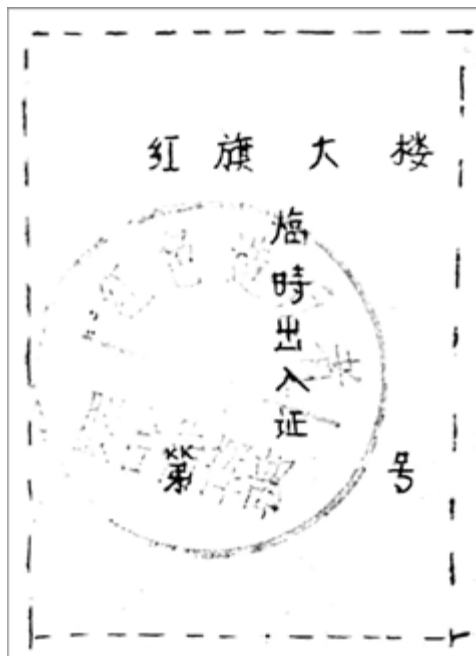
16日晚，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的红卫军（复退军人组织）、工人赤卫队、红卫兵、女红军（女职工组织）等数千人前来“保卫湖北日报”，打算将少数派赶走。杨道远回忆：“他们冲进报社大楼，把造反者往楼下拖，甚

1 载二司宣传部主编《革命造反报》第五期（1966年11月20日）。

2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2页。

3 《中南局来电》，载二司宣传部主编《革命造反报》第七期（1966年11月29日）。

至从窗口往外扔。保守派‘红卫军’还动手打造反派，造反派奋起抗争，把大专兵推出了大楼，在大楼门口发生激烈对抗。造反派占领门口平台和台阶，保省委的队伍围攻要抢占，强行把造反派往台下拉，撕烂造反派的衣服，打伤不少人。双方紧紧地挤在一起，推搡拉扯，后来台下围攻者突然撤离，台上的造反派失去平衡，纷纷坠落，几十人受伤。”大专兵等未能达到目的，于17日凌晨撤走。18日杨道远去医院探望伤员，“亲眼看到三十多位战友躺在医院里，他们有的头部受伤，有的手臂受伤，有的腿部受伤，都缠着绷带。我们的一些同志都哭了”。



进驻当晚成立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指挥部”，二司方保林任总指挥；新华工邱汉斌任第一副总指挥，负责内务与对外谈判；新湖大黄运武负责宣传、与报社内造反派联络；新华农夏知天负责后勤。

邱汉斌回忆：

在封闭湖北日报的日日夜夜里，我是坚守岗位的实权派，方保林很少再到红旗大楼问事。我拟定了大楼内严明的纪律，早晨听广播出操，晚上听号声熄灯睡觉，禁止上五楼电台室走动，禁止撬开图书室看“禁书”，保持办公室清洁，

不乱动办公室设备，各单位或战斗队，必须接受红旗大楼指挥部统一指导，统一发表宣传传单，统一安排大辩论主题与讲演，统一安排站岗守楼，统一选派人员与报社造反派联络。总之，一切秩序井然，没有任何负面反映。在那样混杂多单位的“造反”气氛中，难得有这么一个好的战斗集体，其功劳应属于参与封报的每一位成员¹。

17日，武汉晚报联合兵团、武汉晚报文革会发表公告，表示支持造湖北日报的反，“公告”说：“有人说，‘湖北日报、武汉晚报联合印刷厂’印报刊的机器被砸碎了，这纯粹是造谣！……造反的同志们未损害‘联厂’

¹ 参见邱汉斌《进驻红旗大楼与湖北日报新生》（未刊稿，2019年）。

机器的一根毫毛，排、印车间均完好无损。除《湖北日报》被勒令停印外，凡属在该厂印刷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武汉晚报和其他报刊完全可以照常印刷发行。他们并建议加印人民日报代替湖北日报，让湖北人民直接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革命同志绝对不要听信谣言！！！”同日，来湖北日报造反者临时指挥部、武汉晚报编辑部签订《协议书》：“来湖北日报造反的红色造反者声明：我们只是造湖北日报的反，对于其他报刊，尤其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不但要其照常印刷，而且望其扩大发行量。我们支持武汉晚报照常出版。武汉晚报声明：保证不把新华社电讯稿转交给湖北日报，如有违约，后果由武汉晚报负责。”¹

18日凌晨四时，张体学、赵修、张华到报社。张体学说：“你们揭发批判报社的错误、造报社的反、占报社大楼、封报社、停止发行是革命的行动。我不是虚伪，‘流血事件’我们没有制止，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由省委负责。”²

18日湖北日报停刊。

第二节 群众性大辩论

杨道远回忆：“红旗大楼事件成了武汉三镇争论的焦点，支持的、反对的，汇成了人海，把整个红旗大楼围得水泄不通，自发的辩论夜以继日”³。

同不同意封湖北日报，和“同不同意炮轰省委”“同不同意‘怀疑一切’口号”一起，成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界线。这场大辩论以红旗大楼为中心，遍及三镇街头和各个单位。

张建华当时是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负责人，分台离红旗大楼数百米。据他的日记记载：11月22日、24日和25日，少数派三次在红旗大楼前召开万人辩论大会。25日开会时正下着雨，气温很低，但人们都坚持站着听。汉口分台现场转播了这三次辩论会的实况。29日，他在新华工驻红旗大楼联络站的同学陪同下走进了红旗大楼。新华工驻红旗大楼负责人邱汉斌向他介绍情况，说到连日来保守派组织每天都有人来冲击红旗大楼。张建华

¹ 二司宣传部主编《革命造反报》第五期（1966年11月20日）。

² 东方红红卫兵新华工总部《“红旗大楼”消息》，载二司宣传部主编《革命造反报》第五期（1966年11月20日）。

³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3页。

当即写了两首诗送给他的同学：

(一)

滔滔扬子江，巍巍红旗楼。
英雄驱虎豹，为民争自由。

(二)

昔闻江汉报社楼，只见铁窗只见儒。
今日工农登大雅，红旗漫卷楚天舒¹。

二司宣传部副部长、《革命造反报》主编吴恒春在他的回忆录《人生传奇》里记述了他参与辩论大会的情况：

红旗大楼的正面一楼从侧面看实际是二楼，进门要上十几级台阶。这就刚好当了每天晚上大辩论的主席台所在地。那上面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有麦克风，沿江汉路直到中山大道都装有高音喇叭。这一段时间，这里就是武汉市文化革命的中心，封湖北日报也是全市的中心事件。……因此这里是各派力量就封湖北日报这一中心事件的大辩论会场。每到晚上，这里就人山人海，各派力量汇集，总数动辄以十万人计。

这天我到了红旗大楼，站在主席台边不远的地方听辩论。那时的辩论还是很文明的，主要是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没有暴力行为。只要觉得自己有理，谁都可以上台发言，而听众的反应就是辩论有理没理的最好说明。几天的辩论中，我们这一方把封报的理由说了很多，无非是说湖北日报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阳奉阴违。这一天晚上有一个人上到主席台，持反对封湖北日报的观点，发言中把《革命造反报》创刊号上校对的错误提了出来，并类比地说，如果说湖北日报犯了错误就要封，那么你们自己的《革命造反报》是不是也要封呢？这就使得我无从回避，只得上台应战。我上台后，第一句话就说，刚才有人提到了《革命造反报》该不该封的事，我是《革命造反报》的总编辑，来回答刚才那位同志的指责。于是我从形式逻辑到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从立场问题的主动紧跟到被动应付的区别，从革命行动的必要性到造成巨大影响的宣传意义作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发言。这一番发言的结果是全场欢声雷动，用当时的话说是“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保守派的威风”。这一天的辩论是在造反派的全胜中收场。

¹ 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160—161页。

由于第一次大辩论成功的鼓励，第二天晚上我又来到红旗大楼辩论会现场。我一到，围着主席台的人自动让开一条过道，我很轻松地直达主席台。本来这一天我并没有发言的打算，但总算成了离主席台最近的人。这一天的辩论仍然很激烈，真可谓是舌剑唇枪。在造反派明显不占上风时，主持辩论的人示意要我上台发言。主持人宣布下面由《革命造反报》主编吴恒春同志发言时，台下几万人的会场立时大乱，持两派观点的人当场就在下面发生了争辩。很明显，有一派非常欢迎我出现，而另一派则极力反对我上台。我当时心中是很明白的，对于反对派来说，我的出现，他们认为是一种威胁；而对于我们这一派来说，意味着是一支精兵。所以，群众队伍的混乱其实是对我前一天晚上辩论发言的最大肯定。但这一次的发言并不理想，远远地没有前一天的发言精彩。

大专兵等强攻红旗大楼不成，随即组织了“湖北日报复刊斗争指挥部”。指挥部“成立不到半天，省委就送来了大量的东西，一捆捆道林纸、新的油印机、新钢板、十来辆新自行车等等”¹。指挥部为省委同意湖北日报停刊一事向张体学“造反”时，张体学说：“我是理解你们的心情的，你们要对这个停刊问题独立思考。”²指挥部也在大楼门前召开批判会，“批判湖北省委执行了新的‘资反路线’，说湖北省委对造反派封党报的行为反击不力，是从极右跳到了极左。”³进驻红旗大楼的少数派人数众多，大楼周边从早到晚围满了群众，重新发动强攻很难奏效，加之省委不能全力支持，这个指挥部的“复刊斗争”毫无进展。

少数派封闭湖北日报行动以及这个行动引起的全市性大辩论，极大推动了武汉地区政治舆论氛围的转换，推动了多数派、少数派和省市委三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封闭湖北日报是少数派主动发起的进攻性行为并且获得成功，使得少数派增强了自信心，开始自称造反派了。

11月29日出版的二司《革命造反报》第7期，刊登了两篇工人的来稿。一篇是建筑工人吴敏之的《两个工人的对话》，记录了吴敏之和同队一位工友关于封湖北日报的辩论。那位工友反对封报，他提出很多问题：

1 毛泽东思想湖北省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反对经济主义小组《揭露张体学高价收买保皇分子和打手 拼凑御林军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载1967年2月11日长江日报。

2 刘真《省委还在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给张体学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67年1月11日），载武汉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编《向真理投降》（1967年1月21日）。

3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160页。

湖北日报即使有问题，“应该一棍子打死吗”？封报是“单独行动”，能够代表“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吗？“真应该停刊，也应该请示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决定”。吴敏之的回答没能说服工友，但两人都认为“这不过是我们工人之间的友好谈话”。第二篇是汉阳钢厂八位工人署名文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工人支持你》。文章说：“有一些不顾大方向、不顾主要矛盾的同志，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表示反对，并且大肆宣扬：‘湖北三千多万人要看报’，‘群众自己也可以批判’……因此放弃大方向而不顾，大道理不管，集中一切精力在封与不封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革命人民是敌我问题，是主要矛盾。封报社与不封报社的争论是内部问题，是非问题，相对的双方可求得协商，如果意见不统一，可各自保留，在这个问题上再不要互相引起冲突造成伤亡。”

第三节 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新生”

11月20日，湖北省委作出《省委关于湖北日报在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承认指使报社拍摄学生造反活动照片、突出报道省委负责同志的活动和工作成绩等是错误的。

24日，根据省委指示，湖北日报编辑部作出《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承认宣传报道中的一些错误。

12月15日，少数派封闭湖北日报近三十天后，省委发布《公告》决定“湖北日报暂时停刊”。《公告》说：“湖北日报编辑部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省委决定：湖北日报暂时停刊。在停刊期间，扩大人民日报发行量，满足原湖北日报订户的需要。”¹省委决定“湖北日报暂时停刊”，造反派依然驻守红旗大楼这个舆论中心。

1967年1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所加编者按，高度肯定了上海造反派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同时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14日下午四点二十五分，各造反派组织组成的湖北日报接管委员会宣布接管湖北日报。当晚十一点

1 载二司宣传部主编《革命造反报》第十二期（1967年1月2日）。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

高举我们革命的核心武器中国共产党
高举我们思想的红旗高举我们的社会主义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一月

高尔基主义的要害千变万化，但归根结底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高举这个道理，于是鼓反旗，鼓斗事，鼓
干社会主义。

《红旗》杂志编辑部

我们现在不要再等待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两
报一刊”应该承担起“以打促反革命宣传”、促进政治周报的
责任。

《红旗》杂志编辑部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
人从来认为想和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
对党外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
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
风格。

《红旗》杂志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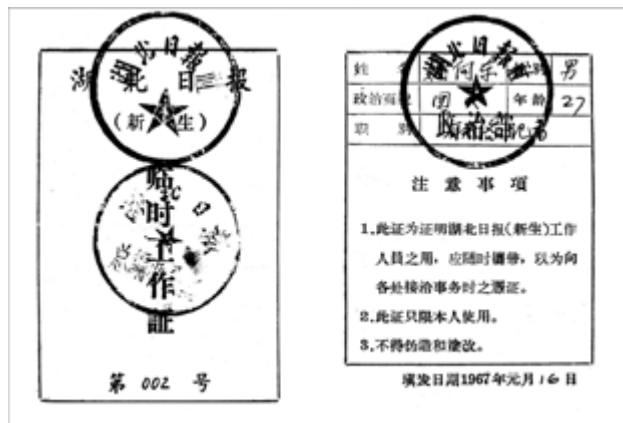
湖北日报

新 闻 号

今日共四版

湖北日报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

二十分，湖北日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通报湖北日报被造反派接管的消息，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人民日报总编辑室表示坚决支持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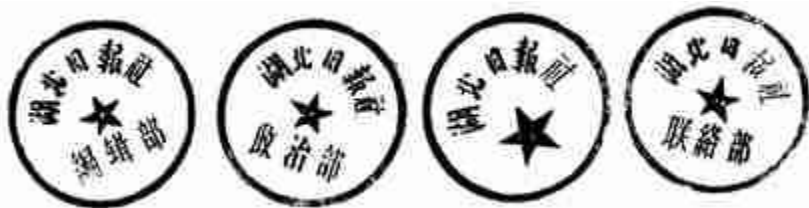


此证为原红工兵头头杜向东当时执有(杜向东提供)

工总派出的武重工人李向阳被推举为社长，工造派出的武汉胶管厂工人龙梅生被推举为总编辑，负责编辑工作的还有报社的造反派成员，二司和新华工、新湖大的学生。

1967年1月15日，

湖北日报新生号出版，报头由集鲁迅字改为集毛泽东字。新生号刊登“接管湖北日报红色造反者”写于1月14日的《告全省革命人民书》，宣布“湖北日报的夺权和新生”——造反派掌握的湖北日报重新出版，宣布“新生的湖北日报要由工农兵来办，要为工农兵服务，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统统滚蛋！”“新生的湖北日报是党的报纸，人民的报纸，革命造反派的报纸。”工总、二司、工造、三新等纷纷在湖北日报上发表文章，祝贺湖北日报“新生”。



未能启用的“新生”湖北日报社公章，后由杜向东保存(实物照片为杜向东提供)

一·二六向省委夺权失败后，工总、二司与工造、三新的矛盾加剧，在湖北日报的管理上经常意见分歧，发生纠纷，影响出报。于是两派协商后达成协议，决定各组织派往湖北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于2月3日起全部退出，湖北日报由报社造反组织“捍卫毛主席路线联合战斗总部”自行主

¹ 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1967年8月)。

办¹。捍卫毛主席路线总部的政治观点与工造、三新等组织一致，二八声明发表后，湖北日报成为所谓“毒草派”（1967年4、5月后称新派）的喉舌。

1966年11月中旬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封闭省委机关报的举动，在全国是第一次。造成全国性影响的上海“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在1966年12月1日，解放日报被造反派勒令停止发行。上海市委签字同意造反派的要求后，占领报社的造反派于9日撤出，解放日报恢复发行。

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1966年9月1日改报名为《红卫报》），12月13日被造反派封闭，比武汉造反派封闭湖北日报晚一个月。封闭羊城晚报的广东本地和外地的24个造反组织，以“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为首。封报后，中南局书记处书记金明首先书面表态：“我只代表我个人支持革命同学和红卫兵们封闭红卫报的革命行动。”15日中南局宣传部发出停刊通知。“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至为巨大”，广州地区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被封闭的羊城晚报没有像湖北日报、武汉晚报那样，获得由报社内外造反派主导的“新生”，15年后的1982年2月才复刊²。

湖北日报被造反派封闭一个多月后，12月27日，武汉晚报社造反组织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发表造反公告，批判武汉晚报“长期贩卖修正主义黑货，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通令武汉市委于次日上午八时前，作出武汉晚报停刊的书面答复。28日下午又发出“最后通牒”，市委均未答复。29日，该兵团强使晚报停刊。

1967年1月21日，该兵团将武汉晚报改名长江日报，出版长江日报“新生号”。“新生号”第一版刊出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暨革命职工《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致敬电”说：“反动的修正主义的《武汉晚报》完蛋了，大权被我们革命造反派夺过来了。一张崭新的革命的《长江日报》新生了！”

原长江日报于1949年5月23日创刊，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后改为中

1 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1967年8月）。

2 参见叶曙明《1966年封闭〈红卫报〉（原〈羊城晚报〉）事件》，载《读书文摘》2010年第8期。

南局)及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机关报,覆盖中南六省,报头为毛泽东题写。1952年12月31日,中南局决定停办机关报而将长江日报移交给武汉市委。困难时期纸张供应紧缺,1961年1月6日,湖北省委通知长江日报停刊,与湖北日报合并。

武汉晚报创刊于1961年5月1日,报头为董必武题写,四开版面。“新生”长江日报恢复原长江日报对开版面。

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的政治观点与工总、二司等组织一致,二八声明发表后,长江日报成为所谓“香花派”(1967年4、5月后称钢派)的喉舌。

长江日报后来作为武汉市委的机关报,存在至今。

第九章 工人造反组织成立

第一节 得到学生少数派支持，突破中央规定

在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工业十条》)发布前,工厂的文革运动一直按照1966年7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的规定进行。这个“通知”要求,这些单位的文革运动,“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11月16日,谷牧、余秋里主持的五部七市及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交座谈会召开,历时20天。参会者提出工交企业的文革运动应与文教部门、党政机关有所区别;应分期分批进行,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单位间进行串连。

17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首都工人代表,王力宣读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意见(草稿)》,向在场工人征求意见。“工业十二条意见”说:“要充分估计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高度责任,一切不信任职工群众的观点,必须纠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工人有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的权利”。“厂矿企业的工人组织,可以在业余时间到本市其他工矿、学校、机关参观学习、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革命的学生组织,可以派代表去厂矿企业串连、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¹

中央文革起草的“工业十二条意见(草稿)”迅速传遍全国,得到少数派工人的拥护,而在工交座谈会上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

在12月4—6日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否定了工交座谈会关于工厂文革运动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工业十

¹ “十二条意见(草稿)”见新华工1966年12月编《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三集。

条》)¹。《工业十条》与“十二条意见(草稿)”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12月9日以中发(66)603号文件发出。

《工业十条》发出前一个月,多地已经出现跨单位、跨行业的工人“联合造反组织”。《工业十条》发出近两个月前,武汉的少数派学生已开始进入工厂串连。

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成立于1966年11月10日,上海工总司成立于同年11月9日。此时中央是不允许成立跨单位、跨行业工人组织的,地方当局当然也不能允许。工总司为了得到上海市委承认,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安亭事件”;由于湖北省委在双方商定的组织名称上出尔反尔,工总数百人上京“告状”。

武汉地区三大工人造反组织,工总最早成立。工造总司(简称工造)成立于12月8日,成立前去市委申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克文当即批准;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成立于12月12日,他们没去省市委要求批准,在开成立大会前一天晚上去请省委派驻武钢工作团副团长刘广泉出席大会,刘广泉第二天到会并授旗。

1966年11—12月,在学校以外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都出现了造反组织,数量难以统计。工总、工造在事业单位、机关也有下属组织。

1967年1月18日武汉地区造反组织联合发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告全省人民书》(载当年1月19日湖北日报),17日新华社就报道了此事。在这个文告上签署的组织有49个,除本地和外地的12个学生组织,其余37个都是企事业单位、机关的组织,当时武汉地区全市性的主要职工造反组织除武钢九一三兵团都在其内。这37个组织大小不一,有全市性的,如工总、工造;有系统性的,如教育系统的红教工、交通系统的红色造反兵团、银行系统的红色造反指挥部;有群体性的,如海员、归侨、复退军人、临时工的组织;还有单位内的组织,如一冶的革命造反司令部、武重的红卫军。

1966年10月批判资反路线开始后,工人少数派在本单位大多仍然势单力薄,迫切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开始很多人希望参加已成气候的学生少数派组织,一般被以中央不允许学生、工人串连而婉拒。朱鸿霞要求加

¹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参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第113—11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3版。

入新华工红反团，聂年生对他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工人是不能加入红卫兵的，你们还是自己成立工人的组织吧！”李承弘在9月关于“炮轰省委”的大辩论中就与湖大红八月造反队多有接触，他回忆：“我经常去湖大31号楼，每次像回娘家一样亲切”。“我一再要求加入红八月，红八月负责人都婉转拒绝，理由是中央文件不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经过我再三要求，他们给了几个红八月袖章，我回厂戴着挺神气的。记得厂里黄芙蓉等人还问我她们能不能参加，也想弄个红卫兵袖章戴戴。我实际上并没有加入红八月红卫兵，哪能给别人发袖章？”李承弘意识到，“这种形势扑过来，逼着工人必须有自己的造反组织。”²

胡国基要求加入二司，倒是由杨道远亲自批准了。杨道远同意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武汉工艺雕刻厂分部”，并出具了刻公章的证明，还答应他派一个小分队去他们厂。武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进入该厂，“镇住了”厂工作组，也“镇住了”该厂上级市工艺美术公司党委和市二轻局党委，厂工作组被赶走了。武测学生撤走，胡国基的“日子又更难过了”，新来的厂支部书记向硚口公安分局上报了申请批捕胡国基的材料。胡国基不敢去上班，和武汉精细医疗器械厂丁喆生一起去湖大找赵桂林。在南下造反大队和湖大红八月的鼓动、支持下，胡国基等一批少数派工人开始筹建工人自己的组织。那个二司“武汉工艺雕刻厂分部”也就自然消失了。武汉机床附件厂彭国华、李文祥等人参加过湖大红八月战斗队，武汉精细医疗器械厂丁喆生、陈树森参加过二司，他们在工总成立后都脱离了学生组织³。

武汉地区工人造反组织从开始串连到成立，都得到造反派学生的极大支持。

少数派学生到厂矿企业串连，支持工人少数派，1966年10月就开始了，当时中央是不允许学生到工矿企业串连的。

郭保安、刘玉民回忆：1966年9月15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说工农兵“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和一切革命青少年”“要向工农兵学习”。受到林彪讲话的鼓舞，当年10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派遣人员组成多个纵队，分赴

1 参见贺光宇《忆聂年生》（网文，2009年）。

2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58页。

3 参见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

省内各地市、武汉市各区，到工厂、机关、事业单位办联络站，“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发动群众“起来造反”。“运动初期，在发动群众方面，新华工起了比较大的作用。”¹张建华回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早在10月中旬就曾发出号召：‘杀向社会！’此后，我们去全国各地、全省各专县建立联络站。到10月下旬，新华工的同学在北京、广州、成都、桂林、上海、长沙，湖北各专区甚至县都设立了‘新华工联络站’。仅在武汉市区，我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常驻省市、政府及大型厂矿企业的联络站人员已达四五百人。他们在那里印传单、设广播、收集文革动态信息，去街道、工厂宣传和发动群众，支持造反。我院后来之所以成为湖北、武汉钢新两派中新派的‘派首’，这些联络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²

新华工各联络站负责人经常向纵队、总部汇报，纵队、总部也经常有人到各单位联络站了解情况。新华工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有令即行的行动力，给其他学校的造反派留下很深的印象。

聂年生10月初领着一百多人组成的新华工驻省委战斗兵团（后改名新华工红反团），强行进驻省委一招11号楼，以此处为基地四出到各院校、工厂串连。曹承义回忆说：发动工人起来造反，聂年生在社会上的影响比郭保安大。

红反团支持过武汉地区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二机床厂的“八一七”，支持过后来当上省交通联司一号头头的傅廉。被打成武重“三家村”的朱鸿霞向聂年生寻求帮助，聂年生带领红反团，把要求为朱鸿霞平反、号召批判资反路线的标语、大字报贴满武重厂区。朱鸿霞要求加入红反团，聂年生劝说并全力支持朱鸿霞和二机床厂的余福生等人建立工人自己的造反组织。冶职工曹承义、武钢职工彭绍鹏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都谈到红反团驻青山联络站发动工人成立九一三兵团所起的重要作用。工造总司筹建时，聂年生派红反团黄东前去协助。工人少数派纷纷到红反团所在的省一招11号楼串连，工人总部筹备联络组从湖大迁到省一招后也得到聂年生的帮助³。

杨道远回忆：二司成立后，“即时号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总部组织

1 参见2016年11月杜先荣等访谈郭保安、刘玉民的记录。

2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153—154页。

3 参见贺光宇《忆聂年生》（网文，2009年）。

革命造反宣传队，进工厂、下专县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群众革命造反，组织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各大厂矿企业都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去串连、进驻；宜昌、荆州、襄樊、黄冈……都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联络站，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各地各单位、企业和农村基层的革命群众纷纷成立造反组织，武汉市、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轰轰烈烈、蓬勃发展。这些宣传队、联络站就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厂矿、与各地县结合的纽带，有效地促进了学生运动与工农运动的结合，形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阵线。”¹

二司人数众多，武汉地区几乎所有大型企业都有二司学生前去串连，如11月下旬二司水院井冈山兵团在武钢、铁路江岸机务段设立联络站，无数小单位也有二司学生前去支持力量单薄的工人少数派。

新华工红反团的聂年生、新潮大红八月的陈春茂等人在工人造反派中享有极高的威信，久久为造反派工人所怀念。一冶工人徐正全称赞陈春茂“确实是一个真正和工农结合的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²，聂年生甚至被称为“湖北地区文革群众运动的教父”³。

李承弘这样评价陈春茂和聂年生：

陈春茂早期在工总内起的作用很大，工总的决策讨论他都发表意见，往往起关键作用，同时他也参加一切活动，处处走在前，既是前锋又是教练。陈春茂与工总感情最深，他是一个农民子弟，为人朴实热情，与工人打成一片，谈得来，没有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酸腐味，这一点与聂年生的盛气凌人就有天渊之别了。陈春茂有时把棉衣给工人穿，饭票给工人吃，所以在普通工人中威望很高。有人称聂年生是武汉造反派教父式的人物，但他只得到人们崇敬；陈春茂虽是小人物，人们如今也忘记了，但他当时得到了工人造反派内心的喜爱⁴。

笔者手头只有零星的材料可以从侧面证明，第一个全市性的保守组织“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得到大专兵、三字兵的支持。百万雄师总站常委、参加过职工联合会的谢敏华说：华工乌兰牧骑头头周德武和几个大

1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7页。

2 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57页。

3 参见谢保安《武汉地区文革历史上一个无法磨灭的名字——忆聂年生》（网文，2009年）。

4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69页。

专兵（都是干部子弟），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长期吃住在我这里”（谢是武汉皮鞋材料厂副厂长）。1967年2月底职工联合会解散后，周德武等人向正在武汉地区支左的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推荐我，牛怀龙亲自“来到我厂，要我出来干”¹。1967年1月初职工联合会聚众万人在省委造反，李承弘在部分联合会成员聚集的洪山礼堂里看到“大多数是学生，工厂工人少见”，他被抓住后送到现场一个头头那里，这个头头是水院六二级学生²。

大专兵参与筹建职工联合会总部的资料很少见，反映出大专兵介入此事的力度很小或根本无人介入，这可能与职工联合会是宋侃夫亲自策划，利用工会组织系统自上而下、极为迅速地建立起来有关。很多当年去工厂串连的大中学生回忆，在工厂劳动、串连的学生包括一些三字兵、大专兵都是支持工人少数派的。

第二节 工人总部成立³

一、工人总部筹建

1966年10月，胡国基面临被公安机关抓捕，他和丁喆生一起到湖大向赵桂林求教。赵桂林对他们说：希望你们工人同志有一个联络交流的地方，对工作组、当权派搞白色恐怖要联合起来斗争，互相支持，要把个人的不幸遭遇与广大群众的不幸联系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个人自保是完全不行的。你们还要有更艰苦的思想准备。于是胡国基、丁喆生将与新湖大红八月有联系的各厂少数派工人串连起来。

胡国基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串连起来的工人：除胡、丁二人，有武汉机床附件厂红八月战斗队彭国华、叶胜亚、李文祥、李尚文、李长炳、涂家福，武汉第二机床厂八一七战斗队余平、余福生、刘超群，东西湖棉花公司战斗队马保瑞、钱蜀生、王红，武汉精细医疗器械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陈树森，汉阳毛巾厂梁国瑞，江岸瓦楞厂老汪，江汉印刷厂老刘，武汉市新华印刷厂老谢，群联鱼行刘汉木，中南水泥袋厂黄柏清，武汉餐具

¹ 参见2015年4月笔者访谈谢敏华的记录。

²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5页。

³ 本节的撰写参考了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相关部分，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三、工总的成立”。胡国基、李承弘都是工总发起人，李承弘在回忆录中说“见证工总全过程至今除李洪荣和我别无他人”。关于工人总部的筹建过程，两人的记述不符之处很多。本节以胡国基的叙述为主，同时列出李承弘和其他人的不同说法。

厂小龙。

赵桂林、陈春茂等人为他们在湖大30号楼安排了活动场所，协助他们组织了第一次控诉资反路线座谈会。座谈会后，这些少数派工人成立了“武汉地区少数派工人联络站”，推举彭国华为临时召集人。

从座谈会后第二天开始，他们在汉正街一带组织了声援工艺雕刻厂、餐具厂、精细医疗器械厂的少数派的活动，宣传十六条，控诉资反路线，邻近的汉口玻璃厂、武汉玉器厂、紫阳菜场、紫阳土产商店的少数派也参加进来。此时三十四中的二司学生占领工艺雕刻厂广播站，设立“大喊大叫广播台”，对外广播。少数派团结起来行动，胡国基说：“在汉正街造成很大的影响，大长了少数派群落的志气，大灭了当权派一手遮天、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威风。”

胡国基回忆：少数派工人联络站在湖大又组织了多次座谈会，南下造反大队、湖大红八月、华工红反团的同学每次都积极参加，听到工人们控诉资反路线，声泪俱下，同学们也和我们一起流泪。

胡国基写道：参加联络站活动的少数派工人越来越多，湖大红八月安排联络站搬到31号楼活动。我们在这里夜以继日地战斗，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用馒头充饥。在赵桂林、新湖大汪守贤和陈春茂、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姜允珍的支持、协助下，经过极为秘密的串连，我们决定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部”，不再使用“武汉地区少数派工人联络站”这个名称。在工人造反总部筹备小组的工作会议上，大家既你推我让，又敢于承担，我们自知是“玩命”的风险，最后推选了7人为总部“服务员”（后来改称为“勤务员”）：彭国华，武汉机床附件厂工人，志愿军军官转业，任总部总召集人；李文祥，武汉机床附件厂车间党支部书记，协助彭国华处理日常事务；丁喆生，武汉精细医疗器械厂干部，负责组织、财务兼会计；胡国基，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人，负责联络、动态、动员；余平，武汉第二机床厂南下干部，党员，老红军后代，负责政工；刘超群（后改名刘群），武汉第二机床厂团委书记，老红军后代，负责宣传鼓动；余福生，武汉第二机床厂工人，负责后勤。会议还推选陈春茂为顾问，可以参加总部服务员会议，对我们的工作进行帮助，提出建议，我们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

根据李承弘的说法，是新湖大红八月的汪业勤建议他们成立工人组织，

一开始筹建就在省委一招，所确定的领导班子设置及人选也与胡国基的记述不同：“大约在10月中旬，汪业勤等人对我说，现在也有几个工厂工人找他们，是否我们工厂的人一起坐起来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找个更好的办法。他告诉我有二机床厂的余福生、武汉机床附件厂的彭国华等人。这几个厂都离湖大较近”。因为“红八月大多数人认为工人不应成立自己的组织”，而“华工红反团全力支持成立工人组织，并认为学生走向工厂、与工农兵相结合是运动发展方向，于是，我们一群工人舍近求远，都跑到省委11号楼华工红反团驻省委大本营去了。由于11号楼是省委招待所，吃饭开会比湖大还方便，所以，武汉最早的工人组织开始在此筹建。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虽然中央文件没有说可以成立工人组织，但宪法明文规定每一个公民有结社自由，所以自发组织并不违法，完全有法可依。”“我们决定：最高决策机构是主席团，在它下面设一个执行机构叫勤务组。主席团人选由各单位推举，勤务组基本由筹建人员组成”。“我现记得主席团人员有：武汉二机床厂余柏林、武昌铸钢厂喻尊启、武汉机床附件厂李文祥、武汉锅炉厂张桂申、武汉重型机床厂胡崇元、华工附属工厂毛卫(?)国、武汉肉联厂谭光前、江岸制革厂李祥用，另外中原机械厂、应城盐矿、汉阳造纸厂各有一名，还有三人及其所在单位都忘记了，一共是十四人。”“勤务组由七人组成，我经过反复回忆并参考一些人的回忆，能够肯定的有六人：我、余福生、李洪荣、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最后一人是丁喆生还是鄂世纯不能肯定。”

胡国基回忆：随后工人造反总部（筹）发布了“造反宣言”、“组织条例”、“告全国同胞书”，“造反宣言”提出了“打倒王任重”的口号。这些文件印成传单寄到省委、省人委及各部委办，在市内公共汽车、电车上往外抛撒，送到开往外地的火车上。

工人造反总部（筹）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省委主动派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房肇义、省总工会主席张天林、武汉市委公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等人来湖大31号楼协商，工人造反总部（筹）彭国华、李文祥、余平、丁喆生等接待。

谈到组织名称，房肇义代表省委表示不同意用“造反总部”，只同意给予“联络站”名称，反复协商后定为“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我们又提出办公地点、办公经费和用品等问题，要求省委解决，并要求保

证单位对我们不得打击报复。

房肇义等请示省委后答复：一、安排在省委一招13号楼内作接待联络，在15号楼内办公。二、每月拨给经费三千元。三、省委开证明雕刻公章。四、拨给半新自行车十二辆。五、脱产人员工资照发，不得打击报复，由省委通知各单位。六、拨给红布十疋、手摇油印机一台，宣传用纸、笔墨、油墨等物随用随领。七、发给棉被若干。八、发给餐票，在省委食堂按桌就餐。

李承弘说关于工总成立有关事项与省市负责人的一次会谈，他和胡厚民参加了，“而且是主要谈判人”。省市负责人有张天林、刘振邦，李承弘没有提到房肇义。他说他们提出的组织名称是“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战斗总部”，省市负责人“死活不同意”“战斗”二字，他们“多次力争无效”。回来后“聂年生不满意，说我们丧失了原则，不该去掉‘战斗’二字”。“后来变通了一下，在旗帜和袖章及一些公告上，第一行写‘毛泽东思想’，中间三个大字写‘战斗队’，最下一行写‘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从湖北大学31号楼搬到省委一招后，工人总部（筹）公开活动，再不像前一段时时提防盯梢跟踪，开会要人把风放哨。

胡国基说：“人们如同潮水般涌向省委13号楼”的时候，负责政工的余平认为其中有不少“有问题的人”，如侯良正（武汉市第二面粉厂工人，劳教释放人员）、余克顺（武汉带钢厂工人，劳改释放人员）、王思宽（右派分子），这些人甚至提出断水断电断交通、控制广播电台来与省委对抗，于是余平退出服务员班子，同时声明不退出工总。与余平同厂的负责宣传的服务员刘超群也宣布退出。这时武汉锅炉厂李洪荣、武昌铸钢厂胡厚民前来要求加入工总，两人都是党员，工人总部（筹）的五位服务员一致同意两人进入服务员班子。

不久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胡崇元加入，也是党员的李文祥提出现在有四个党员了，我们可以成立党小组了。胡国基一人反对，他说：全国的基层党组织都瘫痪了，我们这个群众组织为什么又要搞一个婆婆来管束？党小组还是成立了，“老资格”的服务员李文祥任组长。经李洪荣提议，“服务员”的称呼改为“勤务员”，又称“常委”。胡国基认为，这个党小组成了常委班子这个核心的核心，总负责人彭国华成了只管执行党小组决定

的秘书长。这个党小组成员在1967年1月后，就没有以党小组名义活动了，其成员除李文祥外，一直担任工总勤务员。

总部决定丁喆生负责组建各分部的工作。武汉市各行政区的分部后来改称办事处，各系统分部有的后来改称兵团。丁喆生率先组建了硚口分部，自己兼任硚口分部一号勤务员。江汉分部由中南水泥袋厂黄柏清、武汉市新华印刷厂老谢负责组建，江岸分部由铁路江岸车辆段胡巍负责组建，武昌分部由武汉机床附件厂涂家福、刘汉文、李尚文负责组建，汉阳分部由红星帽檐厂刘万泰负责组建，铁路分部由铁路江岸机务段杨全顺负责组建，长航分部由长航武汉港务局汉阳作业区吴正斌负责组建，供电分部由武汉供电局邓汉臣、黄本祥、方先良负责组建，卫生分部由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张之桢负责组建，电信分部由武汉市电信局刘闯负责组建。

胡国基负责刻公章、印制旗帜袖章。他请书法家戚自如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分两行书写，老先生说“中间太空”，胡国基说那就加上一行，写“战斗队”三个字。就这样，随着大量袖章散发、佩戴，工总的全称“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为社会知晓，工总的基层组织称为“战斗队”，工总成员称为“战斗队员”。这些称呼在文革

中一直沿用。

李承弘回忆：10月底，工人总部筹备组在洪山礼堂召开了少数派工人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制作张贴海报、会场布置、广播音响、会议保卫，都由华工红反团负责，工总筹备组负责



工人总部最早的袖章

安排大会发言、组织人员参会。会上四人发言，李承弘讲他们厂少数派组织“红尖刀”所受迫害并进行批判；朱鸿霞控诉武重厂党委把他和李向阳、刘传福三人打成“三家村”；二机床厂一青工为余平被关押控诉本厂领导；还有一位发言者是中原机械厂的工人。“此次会开得基本上成功，参加大会的有千把人，楼下基本坐满了，中途没什么人退场也没人捣乱。这次会

议显示了工人力量，也增强了我的信心。”

聂年生带着红反团积极筹备工总成立大会，包揽了很多会务，包括请张体学等省委领导到会。会上宣读的“成立宣言”是朱鸿霞起草的，“组织章程”是李承弘起草的¹。“组织章程”规定：出身好、没受过任何处分的工人才能申请加入工总。

二、工人总部成立大会

1966年11月10日晚，“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大会在洪山大礼堂举行。外地和本地学生少数派组织送来大红贺信，礼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通道上也挤满了人。

八时许大会开始，省委张体学、赵修、李衍授坐在在主席台前排，工总全体勤务员、工总顾问陈春茂、来宾聂年生坐在后排。

大会由彭国华主持，他说：“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历程，经历了多少痛苦的不眠之夜，终于在不断的斗争中，我们走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工人自己的组织，一支代表武汉地区少数派工人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于1966年11月10日正式成立了！”全场不约而同起立，长时间鼓掌，很多人流下眼泪。

彭国华宣布“请张体学同志授旗”，张体学走到台前，丁喆生把工总的旗帜递给张体学，张体学把旗帜晃动了两下，双手交给接旗的胡国基、胡道平和武重工人鄂世纯。彭国华宣布请张体学同志讲话时，张体学说：我要请个假，我还有事，请赵修同志讲话。

张体学说完就走了。赵修说：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没有经过省委讨论，我只同意成立联络站。顿时会场大乱。有人说：你的名字要改，修字代表修正主义。赵修说我改名字要经过省委批准。工人们说不行，赵修问：那叫什么名字好？有人说：叫赵立公！赵修连连答应：好，叫赵立公，就叫赵立公。有人说：既然叫赵立公，那就应该办立党为公的事，我们工人总部的名字问题怎么解决？赵修说，等省委研究了再答复。会场再次大乱，赵修、李衍授乘乱离开会场。

工人们围住尚未走出洪山礼堂的张体学质问他，张体学说：赵修说的

¹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61页。柳英发说：华中工学院原红工兵成员周继云告诉他，工总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章程是参加工总筹备的华工工人夏耀龙起草的，并在华工印刷厂印好后送到工总成立大会会场。

话我不知道，他没有同我商量。人多天气热，张体学支持不住了，聂年生指挥红反团学生费尽气力才得以让张体学乘车离开。

聂年生从会场外到回到会场期间，一直劝工人们先冷静下来再从长计议，愤怒的工人们质问勤务组：组织名称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弄成这样？“为什么放掉张体学？”“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胡国基认为：“一旦工人总部得不到承认，少数派的日子就更惨了。我们不但没有了团结战斗的阵地，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保护自己的堡垒。走资派再整起我们来，就不会像工作组的样子了，他们会用更加血腥的手段。”他拿起麦克风大喊：“我们到北京去请愿。愿意去的马上到大门外整队跟我一起走，打着火把游行到南站，不愿去的可以回家。”

李承弘回忆：“赵修突然在会上宣布省委不承认工总，要我们改名联络站之类组织。这一下炸了锅，省委领导出尔反尔，事前不打招呼，会上突然袭击，所以会场一下就乱了，群众斥责声、口号声不断。赵修一生可能还没经历过有人敢在他发言时顶撞他，他也一下火了，把眼镜摘下一摔拒不认错，态度很蛮横。这时，我抓住赵的态度，拿过话筒，鼓动群众喊口号给赵修增加压力，赵这时也感到不对，开始承认他态度不好，但仍坚持要我们改名字。我们谈判时连‘战斗’二字都不愿取消，何况整个组织的名称？我又提议列队绕场一周示威表示强烈抗议，但赵修仍不松口，会场一下僵住了。我一时也骑虎难下，同时怒气冲天，我向主席台上的人说，现在只有上北京，找中央告状，让中央表态来压省委，我们才有台阶下，否则我们开局不利以后就很难开展工作了。此意见台上的人基本同意，尤以二胡——胡厚民、胡崇元反应最为强烈。于是，我向台下群众高呼：‘省委欺骗我们，说话不算数，我们上北京，找毛主席、找党中央告他们去！’当时，群众一呼百应，群情激愤，武重的鄂世纯把工总大旗一挥，领着我们冲出了洪山大礼堂。我们主席台上的人走在最前面，后面浩浩荡荡有几百人跟着，向武昌老车站奔去。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成立大会就这样结束了，刚成立就开始了北上赴京活动。”

胡国基回忆：人们七手八脚搞来棉纱、木棍、汽油，做成火把点起来，这条火把长龙直奔武昌火车南站。经过省委，我们高呼：打倒湖北省委走资派！打倒王任重！反迫害！还我自由！

数百人的队伍步行约五公里接近小东门铁路桥时下起小雨，有人骑自

行车来通知：武重工人会送来饭食，让大家在桥下边避雨边等候。武重工人用几辆卡车送来米饭、馒头、菜汤等食物，说是夜班工人闻讯后让出来的。

近两千人的队伍来到武昌南站，大门已经锁上。刘万泰用大锤砸开门锁，队伍越过候车大厅进入站台，凡北上列车进站就一拥而上，到次日晨，工人们挤上三列客车，但这三列客车都久停不开。

11日清晨，勤务组在车站开会。彭国华说：事已至此，我们没有退路了。退，大家很可能坐牢，或者有比坐牢更大的危险。只要同志们抱成一团，车站的人不离开，我们就不会有危险。勤务组一致同意作好进行更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由彭国华统一指挥；决定由胡国基组织“保卫班子”，注意站台周边的情况，防止当局抓人；由丁喆生负责将人员编成分队，指定分队临时负责人，便于管理。考虑到省委会来人，彭国华安排丁喆生、李文祥、李洪荣、胡厚民连他五人与省委谈判。

11日十点左右，房肇义、市总工会副主席崔秉亮、刘振邦到车站，传话要工人派代表去站长室见面。勤务组担心省委抓人，一再坚持就在站台上的休息室谈。房肇义等进入站台休息室时，胡国基带着保卫人员将其随行人员拦下，只允许带两名女秘书。胡国基说：“是省委先失信于我们，我们的做法是被迫的。”双方谈了四个小时，“没有任何结果”。

随后工人们发现，站台远处增派了不少军人、警察和铁路工作人员，直升机在上空盘旋，车站负责人说是“怕坏人破坏”。彭国华下令：勤务组一个也不准离开，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省委派人来宣布：不抓人，只同意建立联络站，迅速离开铁路，头头必须向房肇义检察长悔过自首，不服从者后果自负。彭国华“断然拒绝”。

省委来人走后，各单位领导纷纷来到车站，送食物，劝说“不要跟坏人跑”，“回到党的怀抱，党会既往不咎”，动员一批人离开了。各单位还动员来很多家属，又哭又闹，又一批人离开。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走了，勤务组召开紧急会议，彭国华说：省委会对我们剩下的人强攻了，只有到北京才有安全。今天必须全部撤离车站，分散走。他布置：管经费的余福生带十来人打前站，安排大部队食宿；李洪荣带一部分人从汉口车站上车；胡厚民带一部分人先往南再转乘北上；丁喆生、彭国华分别带一部分人乘不同车次的车北上；胡国基带一部分人殿后，最后乘车北上。

在李承弘的回忆录里，他和余福生、胡厚民、朱鸿霞四人一起上北京的经过是这样的：

工总主席团和勤务组成员共同做了个决定：无论如何，哪怕自己掏钱购票也要保证我、余福生、胡厚民、朱鸿霞四人上北京，火车上我们四个人要保证在一起不分开，因为工总成立前很多单位反映的材料、工总的大旗、工总的图章都由我们四人掌握。其他人能去多少算多少，确保我们四人到北京就行。其他人去北京方针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条条道路通北京，各自为战，人自为战，不搞集体行动，单独个别行动。这样一来，人就分散了，不再形成围堵聚众状况，轨道上也没人了，加上车上学生吵着开车，终于，11日晚上火车载着我们缓缓向北京开去，12日深夜列车到达北京。

当时，我们四人加上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的鄂世纯、姜诗存下了火车，也不知这趟火车有多少人到了北京。鄂世纯此时把工总大旗一举一吆喝，想不到竟有一百多人集合在旗帜下。

11月15日各路人马在北京会合，16日武重一百多人乘本厂汽车到达，工总赴京人员共三百多人，加上自行来的一百多人，武汉少数派工人当时在京共五百人，胡国基说这是全国之冠。经多次交涉，武汉工总赴京人员全部住进白石桥社会主义学院。

三、工总人员在京“请愿”

工总人员到北京后，勤务组开会布置：各厂人员分别向所属的中央各工业部反映受资反路线迫害情况，丁喆生负责组织整理材料，胡国基负责“向中央文革反映武汉地区执行资反路线、大搞白色恐怖的情况”。

在京期间，李文祥辞去党小组长，李洪荣接任；朱鸿霞进入勤务组，负责宣传。

11月11日傍晚，决心上京请愿的武汉工总的工人们聚集在武昌火车站已经一天一夜，此时上海工总司的潘国平签收了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来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

有部分工人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紧紧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我们，注视我们的活动，注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

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因为有些人一时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1966年11月11日12时陈伯达

11月20日左右，正在按照勤务组布置开展活动的武汉工总的工人们从传单上看到这个电报，“感觉受到当头棒喝”。他们不知道，11月13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已经在上海工总司的“五点要求”上签字，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及被迫上京控诉是革命行动”，11月8日曹荻秋对工总司成立大会定下并获陈丕显同意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实际上被张春桥否定；他们也不知道，11月1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手持宪法肯定了

张春桥的签字。

李承弘回忆：

因为我们的北上行动与上海工总司情况太相似了，都是省市委不准成立，都是拦了火车上北京，只是一个9号一个10号。现在中央文革组长表态说错了，我们岂不完了？怎么有脸回去？下一步怎么办？这时，头头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提出的第一条就是要澄清电报是否打了，电报内容是否篡改。……如果陈伯达确实打了电报，那我们就同他辩论，这是第二条，辩论的理论根据是：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成立工人组织是结社，言之有据，合理合法；再者陈的电报口口声声谈的是生产，这是典型的以生产压革命，而任何时候应当革命是第一位，生产是第二位，革命造反才是大道理大方向。

当天下午，李承弘、朱鸿霞、姜诗存、陈春茂带着朱光文的武重小分队（王光照说去了几百人，徐正全说去了四十人左右），来到中南海西门求见中央文革领导，在西门两边墙上贴出“陈伯达同志11月11日电报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强烈要求与陈伯达同志辩论”两条标语，几名代表前去交涉，其余人整队站在西门对面的人行道上。中南海里一干部对几位代表说，让他们去西边兵马司胡同的联合接待站。去接待站填写了“上访理由”，一夜不眠等到第二天上午，无人理会，“这次行动无果而终”。

徐正全回忆：到北京后，勤务组不能实行有效的领导，陈春茂召集几个大厂的工人开会，有武重朱鸿霞、一冶徐正全、肉联谭光前，还有两人



北京中南海西门（网络图片）

徐正全只记得武钢一人，另一人不记得其单位和姓名。陈春茂说：“你们都是武汉市几个大单位的代表，现在的情况你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人心一散，什么事都做不成。现在我们成立一个临时的六人小组，负责在北京这一段的工作。”去中南海找陈伯达辩论，是这个六人小组（其中只有朱鸿霞一人是勤务员）决定的。六人小组还有一个想法：只要中央首长接见，工总就合法了¹。

1967年武汉部队三二一通告的附件《“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中所说“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两次冲击中南海”，这是第一次，“通告”说这一次是“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扬言要‘揪陈伯达回白石桥辩论’”。王光照说这是“罔顾事实”“陷人入罪”。

为了造成更大的影响，引起中央重视全国各地少数派的诉求，武汉工总人员和山东来京少数派发起全国各地少数派代表座谈会，因工总在京人数众多，被推举主持座谈会。座谈会在全国总工会举行，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工人少数派代表参加。座谈会商定召开“全国在京革命职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商定了大会筹备处组成人员，湖北、山东、云南、贵州、辽宁、河南、北京各一人，七人中武汉工总彭国华为总召集人。筹备处下设各组，丁喆生为组织组成员，胡国基为联络组成员。

经过紧张繁重的筹备，大会于1966年11月23日下午两点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彭国华为大会执行主席，李洪荣为大会主席团主席，胡国基为大会总联络，武汉工总人员组成大会保卫组，武重工人姜诗存、鄂世纯负责。

会前大会秘书处里的清华、北航学生说他们请好了中央首长，会议开始了，中央首长没来，清华、北航学生说边开边等。各地代表发言完毕，中央首长还没有来，主席团派胡国基等三人去中央文革请，中央文革值班人员回答，首长都不在，已派穆欣同志参会了。胡国基回到会场，不见穆欣踪影，想到这样规模的大会中央首长不来参加，意味着不被中央认可，回去后“不更加挨整吗”？他拿起话筒号召大家去中南海请愿。主席团发生分歧，一部分人退出会场。武汉工总的人在挥动的工总旗帜下集合起来，胡国基领着工总和其他地区少数派的队伍来到中南海西门。

王光照说是他“跳上台去”，“大声呼喊：‘中央首长不来，我们自

¹ 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37—39页。

己去中南海求见!’”他的“动议得到强烈响应”¹。

徐正全说，六人小组对中央首长出席大会抱有很大希望，会前他们就考虑到，万一中央首长不来，就号召大家到中南海去请。天黑以后中央首长还没来，在徐正全示意下，一冶的张志能“冲上大会主席台，一把夺过发言人的话筒高声喊道：‘全国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中央首长答应参加今天的大会，到现在还没有来。我们现在一起去中南海请中央首长!’”话声尚未落地，全场像冷水泼进了滚油锅，一下炸开了，王光照、鄂世纯心有灵犀，即时舞动手中的工总大旗，全场响起了‘请中央首长’的喊声，一刹那，由武汉工总的大旗引导，后面跟了几百上千人，先绕会场走了半圈，从侧门一涌而出，直奔中南海”²。

李承弘回忆：北京学生多次说首长马上就到，但一直没到，很多人冲上主席团抢话筒发言，“当时上台发言最有煽动性和号召力的算王光照了，他的发言基本左右了会场”。

胡国基回忆：他指挥队伍在西门对面静坐，要求周总理接见，“静坐的同志很守规矩”，只有周光杰（硃口纸品厂工人）、侯良正、刘万泰三人在西门前“脱衣服、打赤膊”，喊着“要见周总理”。一干部出来向胡国基宣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陶铸同志的三点指示”：“一、誓死保卫党中央，二、誓死保卫毛主席，三、誓死保卫中南海。”然后向全体人员宣读，“大家听了后，默不作声”。清华、北航同学乘机劝工人们离开，调来交通车将他们送回白石桥住地。

1967年武汉部队三二一通告的附件《“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中所说“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两次冲击中南海”，这就是第二次，说他们“纠合二百多人，围住中南海大门，高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扬言要把衣服脱光，赤身睡在大门口，非要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不可。”胡国基说这是“编造故事”。他还指责一些当事人事后“添油加醋”，为“标榜和突出自己的所谓英雄行为”“越吹越离奇”。

来北京请愿的目的没有达到，全国性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不被中央首长认可，去中南海请愿又遭到陶铸批评，如果追究责任，武汉工总首当其冲，工人们回到白石桥后“情绪低落”，都有“危机感”。

¹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42页。

² 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41—42页。

工人们没想到，几个小时后，24日两点，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在他们23日下午开大会的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了各地来京的工人。武汉工总赴京工人全体参加，兴奋异常。工人们认为，虽然周恩来主要讲希望工人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并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他们“问好”，这就足以消除他们的危机感了。

陈毅在接见时讲“美国没有突出政治，卫星早就上天了”，“什么叫政治？几多钱一斤，我要买，给我称几斤”，在井冈山“那时林彪还是个小娃娃”。胡国基回忆：全场有时“不约而同发出嘘声”，有时“一片哗然”。工人们后来在北京街头以武汉工总名义贴出“陈老总在放毒”的大标语。

11月26日，工总赴京工人参加了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勤务组认为中央承认上海工总司表明工人组织已经合法，赴京任务已经完成，决定全体返汉，留下胡厚民负责建立工总驻京联络站，留下彭国华、胡国基、丁喆生处理誓师大会善后事宜，如清理各地控诉资反路线的材料等。

工总赴京工人们返汉时，在武昌火车站受到数千人夹道欢迎，聂年生带着红反团也来了。李承弘感叹：“想不到一月前我们还是被迫离汉，在一种悲壮凄凉的气氛中上京的，而这次返汉却是一种凯旋。”

工总勤务组成员都参加了这次赴京请愿，其他赴京工人很多后来成为工总各分部、兵团的头头。

一些赴京的工人后来谈到这次请愿大有“收获”，徐正全说：“最大收获是开阔了眼界，练大了胆子，第一次知道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内容，我们投入文革的愿望和行动由非法变成了合法，转折点是张春桥对安亭事件作了和陈伯达截然不同的结论。既然我们登上了文革这辆战车，那就只能有进无退。”徐正全等四人从北京回单位，立即在一片沉寂的一冶公安公司开始批判资反路线¹。

武汉锅炉厂工总赴京人员回到工厂后，12月上旬联合厂内其他造反组织成立了新武锅革命造反司令部，随即占领了厂广播站²。

12月中旬，省委安排工总总部从省一招11号楼迁至红楼（武昌起义时湖北军政府旧址），同时搬进红楼的还有二司、红教工、红工兵的总部。

关于工总领导班子的更迭，李承弘2010年说没人比他和李洪荣更清

¹ 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47—49页。

²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八、建立新武锅革命造反司令部”，“九、更上一层楼”。



工总总部所在地——武昌红楼（网络图片）

楚。他回忆：1967年1月6日工总武重分部砸联合会总部，抓了四五十人，李文祥、彭国华和李洪荣将他们放走。9日，工总召开基层头头会，朱鸿霞主持。朱鸿霞讲了放人经过，“批判李洪荣、李文祥、彭国华三人右了”，“会议矛头一下对准了他们三人”。于是“有人提议重选总部头头”，李文祥、胡国基、彭国华落选，选出朱鸿霞、李洪荣、姜诗存、周光杰、侯良正、余克顺、刘群（此前已顶替回厂的余福生）和时在北京的胡厚民、李承弘共九人为勤务员。

胡厚民、李承弘回汉，工总勤务组明确勤务组成员分工：朱鸿霞为勤务组组长，胡厚民、周光杰为副组长。“以下没排名，但有分工。政治部：李洪荣；作战部：姜诗存；宣传部：刘群；生产部：侯良正；组织部：我为正，余克顺为副。组织部因发展组织是当务之急，任务也重，故设了二人。此班子保持到了1967年3月中旬，就两个月寿命。”

1967年七二〇事件后，工总勤务组再次调整，“抗暴”期间（1967年4月至7月）工总联络站头头胡崇元、沈复礼、夏邦银、张耀忠（武汉列车站基地工人）、刘兴隆（武锅工人）、吴正斌（长航武汉港务局汉阳作业区工人）、郭洪斌（硚口区房地局工人）七人进入勤务组，加上原勤务组成员朱鸿霞、胡厚民、李洪荣、姜诗存，共十一人。勤务组内设五人核心小组，组长朱鸿霞，副组长胡厚民、夏邦银，成员胡崇元、沈复礼。这个班子一直延续到1968年10月左右工总“倒旗”。

第三节 工造总司成立¹

工造总司勤务员彭祖龙说过：“因为有了吴焱金这个人，才有了工造总司这个组织。”

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工人吴焱金时年22岁，贫农家庭出身，复员军人。他和朱鸿霞一样，是工人业余作者，从1964年起就开始在武汉晚报、湖北日报、武汉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上发表文章。

文革初期，他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工作队指定他当上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副主任。他在工作队召开的工作会上提出整群众不符合十六条，被工作队弃用。9月下旬他贴出大字报《工作队的大方向错了》，“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遭到工作队开大会批判。11月初，他带着少数派抢出工作队整群众的黑材料，“这个行动受到了全厂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90%的工人群众群情激昂地参加了造反派”。很多工厂的少数派来厂串连、求援，请吴焱金去作报告。

市邮政局工人胡重远建议吴焱金牵头成立全市性的组织以壮大工人造反派的力量，吴焱金11月上旬在汉口闹市水塔大字报墙贴出大字报《我来点一把火》，倡议成立“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并留下自己的姓名、单位、联系电话。

当时汉口与武昌之间的交通仅靠一座大桥和过江轮渡，不是很方便，找吴焱金串连的多是汉口这边的市属工厂工人。吴焱金和武汉市物资局人民仓库会计戴鹏、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王锦铭、武汉三轮摩托车厂党支部委员潘宏斌、武汉橡胶厂技术员彭祖龙（时借调在市人委人口办公室工作）最早开始商量成立组织，经常在戴鹏工作处秘密聚会，每人有一个代号，到戴鹏处开会都是分散进出。经商议，组织名称为“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造”（1967年“一月风暴”中经彭祖龙提议，改为“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袖章上名称写成上下两行，中间加上“红色造反者”五个字，以后工造成员也以此自称。

他们组织三千工人前往市委递交成立申请（因为所在工厂多为市属，且去市委比省委近）时，已经知道工总成立和北上“告状”之事。吴焱金说：

¹ 本节的撰写参考了吴焱金《四十二年 望中犹记》“牵头成立武汉工造总司”一节，2014年余德亨采访彭祖龙的记录。

“‘工人总部’下属的组织有些过激行为，所以我们不愿加入‘工总’。”

吴焱金回忆：去市委递交申请，“接待我们的一位市委女干部叫孙维理，她听了我的讲述，看了申请报告后，当即表示原则上同意成立工人群众组织，并同意每月拨给2000元的活动经费，但表示要经王克文书记批准。于是我们又找到王克文书记，王克文当即批准，并临时在市委机关大楼指定了几间房给我们办公，杨业龙当时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了‘工造办公室’字样贴在办公室的门上。”

工造成立时司令部在市委大楼办公，一个多月后搬到位于蔡锷路的市教育局。不到一个月，市委请他们搬到友益街十六号市文化局大楼，同时要求他们保护好存放在楼内的“破四旧”抄没物品。友益街十六号是大革命时期湖北省总工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吴焱金回忆工造成立大会是1966年12月8日在汉口沿江大道市人委礼堂召开，彭祖龙说这个成立大会是非正式的，因为工造成立还没有得到市委批准。这次大会前应允出席的宋侃夫没有到会，吴焱金在会上说：“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宋侃夫来不来授旗没有关系，我们的旗帜是毛主席授予的！”会后，吴焱金等要求宋侃夫对此事作出书面检讨，武汉市委铅印了五万份宋侃夫的检讨交工造散发。



汉口友益街十六号（网络图片）

织中最早问世的“红色工人造反报”。“红色工人造反报”创刊号1966年12月27日出版，铅印三万份。报纸编辑部有十人，其中有四位新华工同学。编辑部的记者配有当时少见的照相机。工人总部的报纸《工人战报》创刊于1967年1月10日。

吴焱金说1967年二八声明发表后，职工联合会成员纷纷参加工造，“工造总司由六七万人发展到十七八万人，街上出现‘工造总司是职工联合会变种’的大标语”。彭祖龙说到3月底，因职工联合会自行解散、工总被武汉军区解散，工造成员发展到37万。

二司、工总一些人从一月夺权开始，始终认为工造成员多是“卖烧饼油条的”。吴焱金认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有违常理”，“损害革命友谊”。他说：工造在汉阳造纸厂、国棉三厂、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中原机械厂等大中型工厂也有基层组织；而且，“卖烧饼油条的”就不是工人了？“就一定要比其他的工人组织低一等”？

工造在组织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特殊阶段。

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说：“在当前的斗争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来组织革命队伍呢？贵阳棉纺厂创造了大联合的好形式，自下而上地按部门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在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对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贵阳棉纺厂的经验好得很，值得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和研究。”

武汉地区一些造反派占优势的单位响应中央号召，纷纷成立不同组织联合起来的“革司”“联司”，如新一中革司、新汽配联司、新一冶革代会。这些“革司”“联司”在3月底开始的“反逆流”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新一中革司完成了驱赶第二个工作组的行动，新汽配联司在保守派力量强大的硚口古田地区被称为“解放区”，新一冶在抵抗百万雄师的暴力进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7年1月已经按这种形式实现了大联合的新华工，极力倡导“贵阳棉纺厂模式”即武汉的“革司、联司模式”。在新华工的影响下，汉阳造纸厂、武汉汽车配件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中原机械厂等工造分部脱离工造总司，联合厂内其他造反组织成立了各单位的联司。吴焱金等勤务员对此表示支持，少数勤务员不赞成，认为大大削弱了工造的实力，

3月21日，工总被武汉军区解散，二司也受到打压，很多工总、二司成员参加了本单位的革司、联司。多数革司、联司由毒草派也就是后来的新派主导。

工造总司的勤务组比较稳定。除戴鹏、王明扬1967年6月被百万雄师杀害，其他人一直任职到1968年底工造“倒旗”。

2009年吴焱金写回忆录时认为自己对工造未能充分发展负有责任“我当时年轻，也不是一个对群众组织的发展有计划、有研究的人，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自然形成的群众组织领导班子，当时并没有注意每一个群众组织头头所在单位的大小，实力的强弱，领导能力的高低和政治质量、人品的高下。几十年以后，彭祖龙批评我的组织路线。他说我当时应该争取让来自大单位和有能力的人组成工造的领导班子，如曹承义、顾建棠、张志发（汉阳造纸厂）、陈茂祥（中原机械厂）等，个别特别有能力的人可不计较单位大小，如龙梅生等人。”

第四节 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¹

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是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的两个大型企业，一冶负责武钢的建设，两家企业人员非常熟悉。所以，青山地区第一个跨系统的造反派组织由两个企业的少数派共同筹建，称作“毛泽东思想武钢、一冶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武钢职工人数较一冶为多，这个组织的勤务组也以武钢工人为主。

新华工驻青山联络站在少数派工人筹建九一三兵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承义回忆：联络站设在青山区委办公楼一楼左侧的区交通科，“他们有六七个人”，新华工红反团的李定初、罗红兵等同学“利用接待来访、写大字报和印发传单，向青山区的产业工人宣传文化大革命。我几乎每天下班都要来这里和他们交谈”。

¹ 本节的撰写，参考了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筹备成立青山地区工人群众组织”“从‘九一三’到‘一冶野战兵团’”两节、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文革与造反”一节、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我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第一次踏上洪山礼堂主席台”“武昌车站的三天三夜”“第一次上北京”四节。

李承弘回忆：“聂年生亲自策划”“在武钢、一冶的串联活动”。李承弘跟着聂年生参加过一次武钢、一冶工人的串连会，他说聂年生为组织这次串连会“花费了不少精力”。这次串连会“时间在1966年10月底左右，地点在青山区红钢城最热闹的地方——青山税务局楼下一间大房里，五十来人，会上聂年生讲了他与省委谈判及斗争情况。聂是武汉风云人物，社会影响极大，先造反的工人对他都是崇敬的，加上他口才好，说话很有煽动力，会上气氛很活跃，来的人发言也很踊跃。”李承弘记得周岳来、龙克发参加了这次串连会¹。

武钢修建部职工彭绍鹏回忆：10月下旬他和同事王柏林去过新华工联络站，向罗红兵等“讨教”。他每天下班后就去联络站，常来联络站串连的“有武钢机总厂的黄章忠、蔡锦洪、袁先和、郑汉深、龚国祺，焦化厂的刘耀元，修建部的李反修、王柏林、我，初轧厂的郑发兴，炼钢厂的周岳来，钢研所的肖诗雄、高光菊，大型厂的吴××，工程公司的李满行，动力部的田沙洲、×××”，还有一冶的曹承义等人。“互相串联了十多天后，大家都觉得应当造造声势，来发动武钢广大职工，起来造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彭绍鹏回忆：11月20日彭绍鹏、王柏林、刘耀元、黄章忠、蔡锦洪等人在青山公园门前，“以‘武钢工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的名义，召开一次批判工作组的大会。并明确我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按照毛主席对武钢的‘九一三’指示的精神，把武钢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进企业。”

这次大会后，他们以新华工联络站为基地，“分头到各个厂去做联络工作”；“通过这个大会，自行来联络的人也多得多了”，开会时联络站的一间房都挤满了。黄章忠、袁先和、李满行、冷伏保（修建部工人）、王柏林、彭绍鹏、白玉柱（机总厂工人）等人商量，决定11月27日下午两点在青山区文化馆礼堂再开一次更大规模的批判资反路线大会，“要求省委驻武钢、一冶文化大革命工作团团团长陈克东参加，接受批判，听取意见，回答问题”。

27日两点前会场就坐满了人，快六点了陈克东不见踪影。主持大会的白玉柱高喊：“同志们，6点钟陈克东不来，我们去洪山！”“下面呼

¹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79页。

声雷动”。晚九点，武钢少数派工人坐满了省委洪山礼堂，提出张体学十一点前不出来接见，我们的队伍就开往武昌南站，上北京告状。十点半王树成出面，被工人轰走。十一点，数千工人排着队冒着小雨来到武昌火车站，冲上站台。

从28日上午开始，省委派来干部一批批轮换着劝说工人回厂，工人与他们辩论。“29日的夜幕降临，车站站台上死一样的宁静，没有哭声，没有喊叫，坚持了两天两夜的武钢、一冶的工人兄弟们，一个个都有气无力地躺倒在站台上”。“省委送来的饭菜没有人去动，大家只有一个念头：斗争失败，谁也活不成！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都明白，我们失败了，全都是反革命，各级走资派决不会放过我们！”省委派来的干部有的“流下了泪来，哽咽着说：‘你们这是何苦！’”

30日上午十点，武钢经理沈因洛、一冶经理徐扬来到车站，与白玉柱、李满行等工人代表谈判，同意178名工人去北京（武钢100人，一冶50人，受害人家属28人）。

亲历武昌车站三天三夜的陈祖坤说：“多年来只要回忆起这一幕，我就会流泪，万分憎恨那些反动、顽固的当权派。”“1966年11月27日的事件演变成群众和领导强烈对抗的局面，完全是省委、公司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所致，各基层组织能正确对待群众，不至于闹到公司去，也不会青山文化馆召开会议；公司和省委若是做到这一点，也不会冲到武昌车站，导致双方都不好下台的局面，使武昌车站停运三天，武钢各单位均受到损失。就这件事而言，责任在谁？”“这些人只要出来见了群众，根本不会酿成一个事件。”

陈祖坤回忆：“在车上，白玉柱等人与大家议论着建立组织和组织名称，这一百七十八名代表都是为建设武钢走到一起，众人不约而同提出以1958年9月13日毛主席视察武钢这个日子为名称，以示对毛主席的敬意与热爱，只有这个名字对我们最为合适，无一反对。”白玉柱在北京印好“九一三”袖章发给大家。

在北京，冶金部给工人们发了“平反证”。

12月10日，武钢、一冶赴京工人应邀参加北京造反派举行的十万人大会并在会上发言。12月26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等在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工人代表，武钢、一冶赴京工人全体参加。



陈祖坤收藏的“毛泽东思想武汉钢九·一三”钢印

江青首先讲话，向在场的工人“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毛主席问你们好。

中央首长接见后，白玉柱带领工人们连夜返回武汉。陈祖坤说：“11月27日行动中聚集起来的人，特别是赴京的一百七十八人，都成了文革战友，后来也都成为各单位文革的头头和骨干。”

少数派11月27日的行动“震动了武钢、一冶，也震动了青山地区”，工作团于12月4日在武钢一中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留在武钢的彭绍鹏、王柏林、田沙洲、黄章忠等七人“决定将他们这次假批判、真保皇的批判大会给它冲垮”。他们冲上主席台，彭绍鹏夺过话筒大喊：“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不要上他们工作团的当，他们是假批判、真保皇，保王任重，保张体学。他们在武钢完完全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向群众检查，我们能相信他们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工作团召开的全公司大会就这样被这七个少数派工人冲散了。

彭绍鹏回忆他们这些没去北京的人也在筹建“九一三战斗兵团”：“这次大会后，我们继续每天下班后，在华工联络站联络，并总结前一段工作的成果，讨论下一步计划。根据这几次斗争所得的经验和广大群众的反映，大家一致认为，群众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我们应该成立一个组织，名正言顺地举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以毛主席1958年9月13日视察武钢所作的‘九一三’指示，作为我们组

织的纲领和行动指南，来搞好武钢、一冶的文化大革命，把武钢、一冶建设成为毛主席所期望的社会主义的先进企业；一致认为我们的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武钢、一冶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决定在12月12号，在青山剧院召开成立大会；一致认为为了扩大影响，决定邀请武汉当时已知名的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参加，计有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新华工、首都南下造反大队等；一致认为，为了名正言顺、师出有名，决定要求武钢领导或工作团领导前来参加大会，并授旗。同时决定由参加会议的人分头落实以上决定。”

12月12日，成立大会顺利召开。其组织名称中有“工人总部”字样，曹承义说与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没有关系。李承弘说九一三成立时隶属工总，成立后数天就要求独立：“12月初，工总从北京回汉后不久，杨玉珍就找我开介绍信，雕刻武汉工总九一三兵团的图章，随后他们就准备召开兵团成立大会。12月12号，九一三兵团在武钢剧院成立，我作为总部代表参加了大会。因九一三是工总下属单位，所以原来定的是我代表总部向九一三兵团授旗。但他们请到了张体学参加大会，并说通了由张体学授旗，胡启生为此向我解释”。“只过几天，胡启生、杨玉珍在红楼找到我，说他们九一三兵团的武钢、一冶单位大，离市区太远，交通又不方便，很多事不好办，希望让他们独立。我当时想，反正九一三好坏都是工总分出的，总部现在已有些矛盾（指同彭国华等人的矛盾），以后武钢肯定要进入总部，



九一三兵团总团所在地——武钢业余大学

进来也难搞，再说武钢、一冶内部也复杂，工总也管不了，加上交通不便，鞭长不及，我就同意了九一三独立。”¹

彭绍鹏回忆：成立大会“从筹备到召开，都由黄章忠、王柏林、曹承义、周岳来、×××（一冶职工，名字记不得）和我彭绍鹏等人完成。……当时，我们也没有选谁为头头，也没有成立组织机构，考虑到上北京告状的人还没有回来，有意等他们回来再商量决定。”“成立大会开过之后，我们正式在武钢业余大学一楼右侧的一间房子里设立了联络站，贴出了标识。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业余时间闹革命，白天上班，晚上串联。这一段时间，我们继续做组织群众、联络群众、与各厂矿造反派进行沟通等工作，并等待着北京的同志们回来，看他们在北京有什么见闻再作部署。”

白玉柱在11月27日行动开始的时候已经成为武钢、一冶造反派的实际一号头头，对他颇有微词的彭绍鹏也认为“白玉柱有他一定的魄力，为聚集人心，为九一三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白玉柱所在的机总厂，当时在武钢各厂矿中是造反派人数最多的。赴京的武钢一百人中，机总厂就有36人。

彭绍鹏回忆：“12月底，去北京的人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大肆宣扬江青接见了他们，叫他们回武钢来，把武钢的群众发动起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为错误的是以白玉柱为首的几个人，拉帮结伙，排斥在汉的一直坚持开展串联，组织发动群众，和工作团进行斗争，并成立了九一三战斗兵团的有功劳的同志，秘密在业大召开会议，选出了勤务组，将一些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人，选为勤务组成员，把持了重要岗位。如李想玉、曹佩贤、胡启生、杨玉珍这几个人，都是机总的人，从我们一开始在华工联络站串联起，到成立九一三战斗兵团止，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可他们却当上了二号头头和组织部长等要职”。

曹承义在回忆录里记下当时九一三勤务组的部分成员：白玉柱为勤务组组长，昌先栋（一冶机装公司技术员）为副组长，胡启生（武钢机总厂工人）为组织部长，周岳来为宣传部长，曹承义为宣传部副部长。勤务组成员还有郑发兴（初轧厂工人）、袁先和（机总厂工人）。

彭绍鹏认为：白玉柱等人的行为，“造成了除机总以外的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同志的分裂，好端端的毛泽东思想武钢一冶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

¹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0页。

团分裂为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武钢一冶工人总部、新动力、红旗造反司令部、一冶造反兵团、东方红等几个造反派组织。……这给以后造反派组织内部大打派仗也埋下了祸根。”

在九一三力量最强的武钢机总厂，成立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东方红战斗兵团。不久东方红战斗兵团与运输部的火车头战斗队联合，成立了武钢东方红公社。

1967年1月初，徐正全等人脱离工总，在一冶成立了野战兵团，决定与九一三接触，派出一人参与九一三的活动以了解情况。得到的消息是“留守派”与“赴京派”“争位子”“闹得很僵”，“结果大家一致决定还是在自己本单位搞”¹。

李承弘回忆：九一三脱离工总时，双方有个“君子协定”：“武钢、一冶两个单位工总不介入，但青山区其他单位仍属（工总）总部，461、471等大厂直属（工总）总部，小单位、区属企业归工总（青山）办事处，更谈不上允许九一三在市区其他单位发展。”后来“九一三也违反协议，在市内各区发展自己的组织，把一个单位的组织扩大为全市性组织。七二〇后，工总以牙还牙，在武钢、一冶也成立了工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这类‘钢工总’我清楚，除了几个头面人物是造反派外，下面基本是百万雄师转过来的。但李洪荣、郭洪斌等不听我的，所以工总、九一三联合不起来，这也是原因之一。”²

九一三的“全市性组织”称“总团”；各大企业的九一三下属组织称“分团”，如武钢分团、一冶分团；分团以下称“纵队”，如修建部纵队、初轧厂纵队；市内各区设办事处。七二〇事件后各造反组织迅速发展，九一三在全盛时期也没能发展到工总的规模，它的主要力量还是武钢分团即武钢各单位的纵队。

1967年夏，白玉柱因生活作风问题下台，李想玉任九一三一号头头，勤务组成员变动较大。此后直到1968年底倒旗，九一三总团勤务组基本稳定。

1 参见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45页。

2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0—181页。

第十章 职工联合会从成立到解散¹

第一节 联合会的筹建及其人员构成、观点

1966年10月底，武汉地区的保守组织大专兵、三字兵分别开大会宣布“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基本停止活动。11月，“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简称“职工联合会”、“联合会”）开始酝酿。

魏绳武在回忆录中写道：1968年市总工会副主席崔秉亮对他说：“市总工会出面组织保守派职工联合会，是宋侃夫亲自向市总工会副主席陈玉玺布置的，陈玉玺当即派市总工会大部分中层干部分别到各系统工会去具体协助。”这事魏绳武也听市总工会机关造反派头头张玉林、邓捷多次讲过²。

章迪杰说：“职工联合会是自上而下按组织程序建立，所以队伍发展迅速，很短的时间内，会员就发展到四五十万人。”后来当上百万雄师总站常委的章迪杰以自己为例：“当时我们硚口房地产公司修建二队的支部书记对我说：现在有个组织，你参加吧。我就参加了。”

国棉三厂职工联合会由厂工作队党委书记、厂党委书记和厂文革委员会主任亲自组织。他们在工作队党委一个委员家里开筹备会，对参会的工人说：“联合会的成员一定要在职工中有威信，这样才有号召力”，造反派是些“别有用心”的人，参加“职工联合会”这个“工人组织”，是为了保护党的机密，保护阶级兄弟：“职工联合会才是真正按十六条办事的”；“我们串连你们加入联合会，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³

“联合会”这一名称的来历，联合会硚口分会头头汪扬说，“当时报刊上曾指导成立群众组织起什么名，其中有‘职工联合会’。”汪扬所指报刊未能查到，但中央文革起草的“工业十二条意见（草稿）”1966年11

¹ 本节的撰写，参考了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的兴亡”一节、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三、两派初分”。

² 参见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25页。

³ 参见武汉第三棉纺织厂工人邓春莲、宋清芝、谢望春、孙少斌、符明臣《向真理投降》，载1967年1月28日长江日报。

月中下旬就在社会上流传，其中第9条说：“工人的组织最好用联合会、协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的形式”。

汪扬回忆：

1966年11月25日，崔景德、杨庭峰、张立华三位代表前往市委工交办申请成立“联合会”组织。一到市委，看见人山人海，都是工矿企业前来反映造反派抢档案，要“黑材料”，为非作歹之事。一听说要成立“职工联合会”，非常拥护。

当时接见的领导是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同志，他说：“中央有精神，工矿企业可以成立职工组织。”第二天，文祥、黎智、王克文和宋侃夫等领导接见，并达成了协议。由黎智批示，同意成立“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每月）拨款两千元，办公室设在市总工会内。审批手续一切就绪，于12月11日在武汉体育馆正式成立。参加大会数千人，气氛十分热烈。市委领导刘惠农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讲了话，授了旗。省总工会副主席国蒲也在会上讲了话。

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推选常委九人，名单如下：杨庭峰（武重技校电工）、崔景德（武重工人）、张立华（武汉内燃机厂一般干部）、何其华、冯正湖、冯根根、周德明、张鹏久、汪大榜。

各区分会名单如下：

硚口区：周德明、熊春武、黄肇鹏、汪扬（后为百万雄师硚口分站宣传部副部长）、刘长安（后为百万雄师、“工农兵”骨干）

江汉区：沈浩然（后为百万雄师江汉分站一号头头）、詹明才、江龙彪

江岸区：杨喜松、饶良家、喻洪斌

汉阳区：刘勇

武昌区：汪大榜

青山区：冯根根、周刚（武钢一般干部，后为保守组织“红武钢”头头）、李炎文（一冶职工，后为“一冶百万雄师联络部”一号头头）

汉桥区：李少安、邱水生、孙运东（汉桥区永丰公社党委秘书，后为百万雄师总站常委、贫下中农总部部长）

东西湖：罗明发（东西湖棉纺厂职工，后为百万雄师东西湖分站一号头头）、涂明治

当时社会上传说武重著名全国劳模马学礼是职工联合会头头，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也说联合会“以马学礼为首”，这不是事实。为马学礼写过传记的湖北省总工会干部彭维俊说，他连一般成员都不是，但他同意职工联合会的观点。

关于职工联合会和造反派的组织成员，汪扬2002年仍认为，联合会成员“基本是老工人、干部、党团员、家庭出身好、表现好、学毛著积极分子的人们”，造反派的“一些成员”“基本是出身不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受过处分，曾劳改、劳教人员或对领导有意见的”。李承弘认为：“参加联合会的基本是运动以来高唱湖北省委好、死保各级党委的一批人。从总体看，成分出身较好，党团员较多，但在内部起着作用、跳得高的，却是一些家庭或个人历史不干净、技术上又不行、靠打小报告整人和吹捧巴结领导来改变自己命运往上爬的一批人，我们铸钢厂几个联合会的头头和骨干大致也是如此。”¹

关于联合会的观点，汪扬说与造反派“正相反”：“认为：（1）湖北省委17年是好的；（2）封湖北日报是错误的”……；（3）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否定一切，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联合会是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来看干部，不能一棒子打死。”

第二节 两次大行动均遭失败

1966年12月，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一个焦点是工人造反派“抢黑材料”，联合会成员对此极为反对。在发生“抢黑材料”的工矿企业，往往有联合会成员或被动或主动地前去阻拦，“保护档案”，“保护党和国家的机密”。

12月19日，武汉一色织布厂工造“红色造反者”抢黑材料，与多数派对峙到深夜，厂职工联合会头头、女档案员林焕运长时间处于冲突中心。20日下中班时感觉不适；21日往市四医院，诊断为低血压，当晚呕吐腹泻；22日上午四医院门诊诊断为急性肠胃炎，留置观察；十一点病情转重，抢救无效于十一点半左右死亡。看病期间林焕运没有对医生说自己挨

¹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4页。

过打¹。1967年1月20日湖北日报上有文章说：“女工林××是十二月二十二日病死的，根本不是被打死的。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武汉市第四医院解剖尸体，证实林××是患‘孤立性心肌炎’而死的。”²

李承弘回忆，事后他与林焕运的亲姨侄、新潮大红八月成员汪业勤一起去林家，“林家在汉口老法院后面一条巷子里，汪极力劝说林家不要闹，因为当时同济医院已有结论，林是有心脏病在先，突遇特殊情况引发病情恶化而亡，不是打死的。我去时林家已认可了同济医院结论，汪业勤还叫家属写了认可字据。”³王光照回忆：“该厂当年保卫科干事也曾私下向我讲过，厂里当权派叫他执笔写的林焕运死亡真相的那份严正声明是假的，当权派为了逃避运动中整群众黑材料的罪责，故意拿林的去世来说事，把水搅浑，编造假事实，以达到压制造反派的效果。这位保卫干事现在参加了硚口区冬泳队，因为长期锻炼，身体很结实。他在冬泳队的绰号叫刘疯子。”⁴

汪扬回忆：24日晚，联合会总会头头在民众乐园开会，决定次日举行集会游行，抗议造反派打死“为保卫档案而英勇献身的英雄”。

25日上午，联合会举行大型集会，主会场设在汉口中山公园门前，数万人参加。会后游行，汉口的队伍抬尸游行到市委，在联合会人员要求下，市委降半旗。武昌的队伍从阅马场游行到省委，张体学出面接见。游行队伍“男的胸前挂白标带，女的头戴白花”，“把游行队伍中的所有旗帜下半旗”，“把一色织布厂升的国旗也下半旗”⁵。

造反派冲击联合会的游行队伍，并指责联合会在毛泽东生日前一天抬尸游行、降半旗是“反革命事件”，是干扰批判资反路线的大方向。27日，各造反组织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誓师大会”，认为25日联合会的游行“符合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的心意”，是“反

1 参见新华社东方红红卫兵驻国棉一厂革命串连队、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武汉共产主义战校指挥部《事实胜于雄辩——关于林焕运之死调查报告》（1966年12月23日晚），载东方红红卫兵新华社总部《东方红战报》编辑部《东方红战报》第八期（1967年1月7日）。接受调查的是武汉市第四医院院长办公室值班员段贤筠、接诊内科医生戴桂兰。

2 毛泽东思想造反军工人第三司令部武重总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派驻汉联络站《“革命职工联合会”的大方向错了》，载1967年1月20日湖北日报。

3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6页。

4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42页。

5 毛泽东思想造反军工人第三司令部武重总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派驻汉联络站《“革命职工联合会”的大方向错了》，载1967年1月20日湖北日报。



1966年12月25日职工联合会举行追悼林焕运的游行(李定初提供)

革命游行示威”，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对造反派咄咄逼人的舆论，职工联合会基本没有反击。

12月28日，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致信张体学说：“我知道武汉以马学礼为首的革命职工联合会是保守派（多数派）的组织，不但不应予以支持，应该说服解散，态度要坚决，但不应简单化，应耐心做群众工作。听说十二月二十五日，多数派开几万人大会追悼一个死去的工人（究竟是病死，还是被打死，据说还在调查），会后又抬着死人像与毛主席像并列游行，还戴白花，并到市委逼市委下了半旗。这是借死人做文章，并在主席生日前一天，这样做更是反动的行为。应查后处理。”¹

1《中共中央中南局李一清同志给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的一封信（1966年12月28日）》（油印传单），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新湖北大学总部材料组1967年1月3日翻印。

李一清的信迅速传开，同时纷传江青说武汉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联合会总会决定组织人马去省委“造反”，要求揪斗李一清，要求省委领导接见。1967年1月5日，联合会数万人从三镇各单位云集省委，洪山礼堂、一些会议室和食堂坐满了人，还有人停留在省委周边马路上。深夜突降大雪，6日上午雪止，数万人“饥寒交迫”，“不见（总会）头头踪影”，“惶恐不安”。6日上午各单位造反派纷纷前来辩论、劝归，将聚集的联合会



1967年1月6日，造反派在洪山礼堂前举行“控诉职工联合会罪行大会”（李定初提供）

成员冲散。在这样的情况下，数万联合会会员“不得不自动撤离”。后来他们才知道，一号头头崔景德带二百余人南下广州揪李一清，二号头头杨庭峰带百余人上京告状，“把群众丢在省委马路上不管，群众十分生气，因而大大丧失了人心。”联合会的第二次大行动又失败了。

章迪杰回忆录写道：“后来周总理责成李一清到武汉向职工联合会检讨，李一清在小范围内，向职工联合会张立华等二十多人作了不公开的检讨”。章迪杰说他和张立华是“几十年的战友”，这件事张立华多次对他讲过，不会错。省委副秘书长刘真在1967年1月11日给张体学的公开信中说：“我听说你请了陶铸，要李一清同志在革命职工联合会问题上来武汉作

检讨。我认为陶铸这一指示是错误的”¹。汪扬回忆录也写到“1月7日李一清来汉作检讨”。汪扬接着写道：“但是头头们又不向基层组织传达”，这句话和章迪杰所言“不公开的检讨”一样不好理解：李一清的检讨对联合会来说是大好事，为什么“不公开”、不传达？也许真应了汪扬对联合会头头的评价：“斗争水平不高”“斗争艺术不成熟”。

章迪杰说李一清的信“源自江青关于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的指示”，又说李一清向联合会检讨是周恩来“责成”，都没有资料证实。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很明确地表示了对武汉职工联合会的态度。参加这次接见的李承弘回忆：周恩来说：联合会抬尸游行“同云南阎红彦一样嘛，以死人压活人。”“有些人离开座位向总理递材料，献各造反派组织的袖章，其中一人拿着印有‘毛主席万岁’的联合会袖章给总理，说袖章是绸子做的，搞经济主义，印了‘毛主席万岁’几个字造反派就不敢抢了。总理接过袖章笑了笑，还幽默地说：这袖章不能和你们的放在一起，要分开放。”²周恩来还说：“前些时来了些保守派，一千多人卧轨，我打电报，让他们来几十个代表，结果宋侃夫批了一百多个，既然答应了，我就委托李副总理接见他们，他们要辩论，我说，去你的吧，别理他。”³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的陶铸1966年12月30日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有人问他对职工联合会12月25日“游行有什么看法”，陶铸说：“一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陶铸在讲话中把职工联合会称为“保守派”，他说：“湖北两千多保守派要来，我认为不能来。”⁴

职工联合会头头调动人马到省委造反的同时，另组织队伍赴京告状。1月2日至3日，数千联合会成员强入武昌火车站，拦截十六次列车十七小时，拦截六次国际列车七个半小时。这就是周恩来1月29日批评的武

1 刘真《省委还在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给张体学同志的一封信》(1967年1月11日)，载武汉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编《向真理投降》(1967年1月21日)。

2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7页。

3 《周恩来对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1月29日5:03—6:30)，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4 《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1966年12月3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汉“保守派”“一千多人卧轨”事件。4日，联合会在武昌桥头堵塞长江大桥交通两小时。

12月底，职工联合会两千多人乘汽车去北京告状。魏绳武回忆录记述：

由于天气不好，过了广水、鸡公山开始下雪，到了信阳，大雪封路，不能前进。呆在信阳也不方便。宋侃夫打算联系上北京的陶铸（当时是中央四号人物，与宋侃夫关系不错），请陶铸设法帮助他们。无奈与陶铸无法通话，只得再打通李先念的电话。李先念在电话中清楚地告诉宋侃夫，“陶铸也出了事，他是泥巴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叫宋侃夫赶快打道回府。宋侃夫就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许澍文、董正青秘密回汉，让职工联合会各单位的头头去信阳做上访人员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回汉。许澍文当时是宋侃夫的秘书，与董正青（原市建材系统干部，后调任市社教总团工作人员，文革开始后暂时安排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都在宋侃夫身边工作。许、董后来都参加了人勤，且都与我们人勤的杨精业关系非常好，多次对杨和人勤勤务组讲过上述情况¹。

1967年2月10日长江日报一篇报道说，这次联合会进京“告状”是由“湖北日报复刊斗争指挥部”发动的，省市委给予支持。“单在广水就花了八千元，还送去一千多套棉衣、棉裤和棉鞋。在河南省委借了六千元作为生活开支，甚至连牙膏牙刷毛巾也想到了”。

韩宁夫也参加了这次行动。有人说他和宋侃夫是领队，有人说他俩是被胁迫的。1976年12月谢望春在“揭发交待”材料中说：“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宋侃夫说：宁夫同志我跟你两个人是有错误的，我与你一生都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跟你（带）一批人上北京，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²谢望春写的这份材料是省委编发的，加括号的“带”字原件如此，想是文化程度低的谢望春笔误，整理材料者根据谢的意思加上这个字。

造反派认为职工联合会是“保皇派”，12月25日行动是“反革命游行”，提出“联合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口号。各单位造反派打砸联合会办公处的事情经常发生，1967年1月6日工总武重兵团砸联合会总部，抓走四五十人。王光照回忆：武锅造反派“强烈反感”“厂里保党委的群众组织职工联合会”“专门与整党内走资派的造反派过不去”，“一二百

1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75—76页。

2 “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九：《谢望春的揭发交待》（1976年12月11日）。

人就把厂里职工联合会设在福利区花房的办公地点给端了，其实就是小儿科般地把油墨纸张、旗帜、牌子搬到我们的窝里来了。”¹1月3日，武重的工总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封闭了该厂联合会办公室²。

当时武汉地区兴起一股风，造反派将联合会骨干分子和当权派一起戴高帽、挂黑牌游街。1月20日，联合会砸工总等组织的第二天，武汉地区各造反组织联合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控诉省、市委坚持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揭露在省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幕后操纵和指使下的‘职工联合会’所犯的种种罪行”。长江日报1月21日关于这次集会的报道说：“革命造反者愤怒地揪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铁杆、钢杆保皇派游街示众。这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在红色造反者的愤怒声讨面前，一个个低着头，颤抖在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显得十分渺小，十分可憎。”

抓联合会骨干游街这股风越刮越烈，1月21日，工人总部发布《最最紧急通知》制止戴高帽游街的现象。

职工联合会也有打砸造反派组织的举动。长江日报1月26日报道：1月7日晚七点左右，联合会肉联厂分会数百人“层层包围了革命造反派，拖、拉、搯、撞，拳打脚踢，把造反派强行关进屋内，并威胁说：‘你们造老子们的反，老子的刀光杀猪？未必不能杀人？’”造反派二十多人被殴打。

汪扬回忆：1月18日，联合会头头张立华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决定根据“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19日去砸工总总部。19日深夜，联合会东西湖分会头头罗明发带队到红楼，砸了工总总部。

职工联合会在红楼顺便砸了也设在红楼的二司、红工兵、大学红教工、中学红教工四家总部，抢走文件、宣传器材、自行车等，绑架11人，一些工作人员被殴打。18、19日，联合会还砸了工总汉阳分部和国棉一厂等处的工人战斗队办公室，造反派学生的一些联络站、广播台³。杨道远回忆：19日深夜联合会来砸红楼时，张体学派来的张华、吕汉荣（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正在与工总、二司等组织负责人商谈夺权和联合办公问题，联合会的人来去匆匆，没有发现上了顶楼的张华等人。“二司司令部被抓走的

1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54—55页。

2 钢二司反复辟联络站《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大事记》（1967年3月）。

3 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工作人员被联合会拖到东西湖，给扔到了野地里，第二天下午才回来，造反派有十一人遭绑架。”¹

汪扬说“这次行动为我们出了一口怨气，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联合会“一口怨气”是出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突袭成功而扭转。

第三节 联合会消散

崔景德、杨庭峰分别从广州、北京回汉，即被市公安局拘留。随后张立华也被拘留。其原因，汪扬说是江青点名武汉联合会是保守组织，彭祖龙说是杨庭峰在北京代表武汉职工联合会参加了“全国职工联合会”，而这个全国性组织随即被中央取缔。

联合会主要头头被拘留，其基层组织更加人心涣散。1月下旬，武汉街头到处张贴着退出联合会的声明。

1月23日，湖北日报刊登青山综合五金厂、青山食品厂、青山干鲜果、武汉市拖拉机附件厂、青山灯具厂等五家工厂的职工联合会分会的文章《我们不再受骗了》，宣布退出联合会。文章说：走资派“利用了我们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胡说什么‘保卫’省、市委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把我们骗进被他们一手操纵的御用工具——职工联合会”，“组织联合会的人马去保他们自己”，不惜“挑起武斗，制造流血事件”，“煽动‘联合会’中受蒙蔽的群众停工闹事”。

同日，长江日报刊登水院红卫兵师副师长薛建枫致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的《请罪书》，其中提到“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彻底砸碎‘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职工联合会’等一切保皇组织”：

我是带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向你们请罪的。

从北京回来仅仅一个星期，我这个钢杆保皇分子的花岗岩脑袋开始有些动了。原来我带着“挨斗”的思想，准备“当大专院校红卫兵就算剩下一个也当到底”的决心回校，然而，出乎意料，我接到的却是又严肃又诚恳的“通令”以及使我触动灵魂的大标语。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为了挽救一个中毒极深将走向“死亡”的同志，给我充足的时间回顾，触及灵魂。同时，

¹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82页。

我原来是保字号“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副师长，又是系文革委员和班文革小组长，长期中毒，加上主观世界改造得很不够，因而，忠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七个月来，真是天天干坏事。我极其沉痛地回顾、归纳有五大罪状：一、搞监视、盯梢等活动。我原来是院武装基干民兵二连指导员，直接受院保卫科蒙蔽利用，整理黑材料，把革命的同学打成“右派”，充当了我院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打手。二、大抓“南下一小撮”，压制革命大串连，企图扑灭革命烈火。三、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污蔑革命的“少数派”，诽谤革命左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对抗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四、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不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同志平反，并私自处理一些黑材料。五、执迷不悟，不向真理投降，特别是《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后，仍然死“保皇”，与革命造反派相对抗，拒不触及灵魂，低头认罪。

……在我所犯的罪中，也包括了到你们报社“造反”所犯下的罪行。……我感到极其沉痛，但又为同志们严肃、诚恳的帮助而万分激动。

……我于十五日郑重声明，坚决退出大专院校红卫兵。若这种保字号的组织多存在一天，就会给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线反革命复辟的希望，也给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彻底贯彻多增加一份阻力，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我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彻底砸碎“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革命职工联合会”等一切保皇组织。我也不怕当“叛徒”，也一定会为此作出我一切的努力。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薛建枫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九日夜

1月28日，长江日报刊登武汉第三棉纺织厂工人邓春莲、宋清芝、谢望春、孙少斌、符明臣的文章《向真理投降》：

“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现在算是看透了！

我们武棉三厂，在厂文革主任提出成立“职工联合会”时，立即得到了厂工作队党委书记的极力支持。厂党委书记也积极出谋献策，和他们一起开会研究。他们开始打算在政治处会议室开会，但怕被别人看见，便偷偷地到工作队的一个队委委员家里去开。他们在会上密谋策划说：“领导

干部最好不要参加”，“联合会的成员一定要在职工中有威信，这样才有号召力”，等等。……他们诬蔑革命造反派是些“别有用心”的人，要我们参加“职工联合会”这个“工人组织”，保护党的机密，保护阶级兄弟。说什么“职工联合会才是真正按十六条办事的”。他们还无耻地说：“我们串连你们加入联合会，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我们这些普通工人，抱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一心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听信了他们的鬼话，参加了“职工联合会”。

他们名义上要我们“保卫党和国家机密”，实际上是保卫黑材料，好让他们“秋后算账”，反攻倒算，他们所说的“阶级弟兄”，实际上是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看清了“职工联合会”的反革命本质，决心退出这个保皇组织；我们理解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动，我们加入了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决心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斗到最后胜利。

这个谢望春是老工人、劳动模范、党员，退出联合会后参加了工造，后来成为九大、十大候补中央委员。

崔景德、杨庭峰、张立华 1967 年春节后被公安部门释放。彭祖龙说释放是以必须解散联合会为条件¹。

2月20日，联合会在武汉体育馆召开“砸烂联合会，自己闹革命”大会，杨庭峰当场烧毁公章，宣布职工联合会解散。

彭祖龙回忆：联合会解散后，以刘某、王某为首的一批人转到市郊东西湖额头湾继续活动。工造总司闻讯，彭祖龙带着“铁军”于2月28日去额头湾抓住联合会成员63人，抢走新制的公章、队旗，将刘某、王某等13人游街示众²。

章迪杰写道：“毕竟武汉工总不是上海工总司，职工联合会也不是上海工人赤卫队。上海工人赤卫队被工总司打垮后，再也没有起来过。与造反派对立的一方，在职工联合会解散后，成立了四五十个名称不同但观点一致的群众组织”，其中最大的是以全市武装基干民兵为主的“红武兵”（成立时一号头头为武汉啤酒厂工人申耿生）。

¹ 2014年4月余德亨采访彭祖龙的记录。

² 2019年4月余德亨访谈彭祖龙的记录。

第十一章 批斗王任重

1966年12月5日，新湖大、二司、三司、新华工等成立了“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打算将王任重带回武汉批斗。造反团由新湖大张维荣负责，成员有武大杨家志，华工刘俭，湖大龚彪、胡振南、彭宣仁、孙似虎，二司华勤堂（水院）、王明生（水运工程学院）、刘汉武（机械学院）等。曹承义说一冶野战兵团的黄家祥、于湛东等也参加了这个造反团。

《新湖大》报记载：这个造反团由新湖大长征造反团、井冈山战斗团发起，共有175人，其中新湖大成员近八十人¹。

要求王任重回汉检查得到中央同意，12月25日王任重被造反团从广州带回武汉。

12月30日陶铸在中南海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讲到王任重回汉接受批判的经过：“后来我发觉王任重的问题严重，责成中南局常委李尔重和湖北省委副秘书长带了大字报和材料去海南，王任重看了心里很紧张，和我通了一次电话，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要检查，问题是很严重的。他问是否马上回广州，半天时间作检查，半天休养。我把他的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也同意了。我又给中南局打了电报，告诉他们，王任重要回来作检查。他们后来派了飞机，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把王任重接回广州，开始和湖北的革命同学见面，听取批判，二十五日，王任重和湖北革命同学一起回到武汉。我们说，你先回武汉，因为主要问题在武汉，武汉同学对你意见这么大，应回武汉受批判，中央同意。”²

1967年1月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陶铸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情况，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³

12月27日，工总、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等十九个组织联合组成“斗

1 参见《新湖大》报第59期（1967年12月25日）。

2 《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1966年12月3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28—29页。

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至31日连续召开会议，商讨斗争王任重大会有关事宜¹。

王任重回到武汉，军区同意先由新湖大批斗。当新湖大、新华工、二司近万人聚集在湖大南院操场准备开会时，得知三司经军区批准，正在湖大附近的武昌体育场开大会批斗王任重。谢邦柱等带队游行到武昌体育场，抢出了王任重。第二天在湖大礼堂举行了批斗王任重大会²。

郭保安回忆，1966年12月底，王任重在华工被批斗：“在华工东边操场批斗中南局书记王任重，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陪斗。头天晚上我去看他们，见他们躺在稻草上。得知他们还没吃晚饭，我即叫人到食堂给他们每人打了一份饭，并让人给每人送一床棉被。他们表示感谢。第二天批斗时，我在主席台上，见他们弯腰站得久了，就示意边上人让其坐下一会儿。群众呼口号，他们又站起来，反复多次。”³

1967年1月1日，武汉地区造反派斗争王任重大会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数万人参会。

吴焱金说“大会的总指挥是彭国华，我是大会的副总指挥”。曹承义说桂大庆代表一冶野战兵团参加了斗争王任重大会指挥部的工作，并担任大会秘书组组长。谢邦柱说他担任大会执行主席，郭保安作主题发言。

吴焱金回忆：

据当时负责照看王任重的小将说，王任重在上台挨批斗前，还跷起二郎腿哼哼京戏，故作轻松的样子。其间还和小将有段意味深长的对白。小将：



1967年1月，批判王任重大会会场（载1月15日二司《革命造反报》）

1 参见钢二司反复辟联络站《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大事记》（1967年3月）。

2 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3 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你不是主张‘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吗？我们今天就批斗你这个出头鸟，你秋后还会和我们算账吗？”王任重：“‘秋后算账’可不是我的发明，你们认真看过‘十六条’吗？‘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是什么意思，好好琢磨琢磨吧！至于‘枪打出头鸟’，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也不是我王任重的发明创造。”

李承弘回忆：“批斗王任重大会省委及武汉军区都支持，记得大会地点是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武昌的人去参加很不方便。头一天工总作战部的杨逢春已经与军区联系，安排军区来的军车停在武昌红楼前，负责接送武昌的造反派去汉口。由于军区的协助，当天新华路体育场人山人海，四周看台坐满了人，运动场也挤满了人，广播器材也是官方准备的，音响效果很好。”“在斗王任重之前，有人交给我一封王任重的亲笔信，信是写给造反派的，内容有三点：一是过去工作中有很多错误，欢迎批判；二是群众对他现在的批判他诚恳接受绝没反感；三是他历史上绝不是CC特务。……后来我把原件交给了工总宣传部，在工总报导批斗王任重大会特刊上，此信原文影印刊登过，另外还写了一篇配合文章，说此信是王的猖



1967年1月1日王任重在斗争大会上（李定初提供）

狂反扑。”¹

“会场上群情激昂，个个怒火填膺，与会者见了王任重分外眼红，个个咬牙切齿，不断高呼‘打倒王任重’，‘斗倒斗臭王任重’。”²

会上，第二机床厂“八一七”袁玉珍、湖北大学张维荣、华工聂年生等九人发言。

杨道远回忆：主持这次批判大会的是武大六五级学生、二司成员樊雪梅。“当大会宣布把王任重押上台时，全场鸦雀无声，王任重从体育场休息室走上舞台，披着军大衣，举起右手向主席台中央走去，摆出中央首长接见群众的架势，梦想接受群众欢呼，不料迎接他的却是‘打到王任重！’的口号声。批斗会主持人员立即令人剥掉王任重的军大衣，给王任重挂上黑牌子（牌子上写的是：黑帮分子王任重），戴上高帽子。王任重不肯挂牌子，把牌子取下扔掉。造反派立即又给他挂上，为防止他再扔牌子，两位造反派前去把王任重架住。王任重的军大衣被脱了，怕他冷，一个造反派工人姜诗存（工人总部勤务员、武重工人）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给王任重穿上。张体学、赵修等省委要员陪斗，这些人没挂牌子，没戴高帽子。”

杨道远回忆：批判大会后我送王任重回住地。“在车上我问王任重：‘毛主席如此重视你，你为什么还反毛主席？！’王任重说：‘我不反毛主席，我拥护毛主席。’我说：‘那为什么你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王任重多时不语，最后说：‘认识没有跟上。’”³

1月4日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第二次斗争王任重大会召开，中心会场设在新华路体育场，中山公园为分会场，参加人数达四五十万。会上发言的有墨水湖中学教师肖伯晏、水院学生郭明正、因同意造反派观点被打成“老右派”的华工附小学生钟学敏以及蒲圻工人造反派代表、王任重四清蹲点的孝感县金星大队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大会的还有市郊及省内其他地区的工农群众。王光照说那位被打成“老右派”的小学生姓刘，“上世纪80年代在武汉仪表工业公司所属仪表成套厂工作”⁴。

1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1—182页。

2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1967年8月）。

3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76—77页。

4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59页。



1967年1月4日，工人代表在斗争王任重大会上发言（李定初提供）

新潮大杨闯当时在大会主席台上，他回忆：

看到批斗王任重时，两个同学架了王任重的飞机，并且王任重是站在一个不足三尺宽的水泥条凳上，万一王任重仆倒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就喊孙似虎和我一起换下了那两个同学，把王任重扶着，怕其跌下去了。当时王任重是穿的军棉大衣，揪上台后，给他换了一件黑色的棉大衣，接

着有人拿了一个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在王任重三个字上面打了个叉)的牌子,往王任重的脖子上挂,王任重不愿意,一挂他的头一低,王任重的个子比较高大,几次都没有挂上,我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挂就挂吧,王任重听了我的劝告,让挂在脖子上了。我问王任重:“你有什么病没有?”王答:“有高血压。”我就对他说:“你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扶着,实在不行了,就对我说,好下去休息。”王任重说了声“谢谢”就不再说话了,一直到批斗会开完。说句心里话,我嘴里喊打倒王任重,主要是因为他镇压了我校的学生和老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对于他个人,是个老革命我还是尊重他的。所以将他扶着,保证他的安全,不跌下去¹。



1967年1月4日王任重在斗争大会上(网络图片)

¹ 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31页。

肖伯晏代表墨水湖中学被判刑的师生发言说：“王任重这个狗杂种，本来是要八月五号在这个地方开我们的公审大会的，想不到今天我们来整他！”“我们的行动完全是革命行动，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只不过是王任重所害的一部分，被他害的何止我们这几个人？！他就是这样恨我们革命的青少年对毛主席的热爱。王任重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我恨不得吃你的肺，喝你的血！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要不是他老人家的十六条，要不是他老人家的正确路线，我们这些革命的青少年都要葬送在王任重这个狗崽子的手中！”¹

此后，各单位造反派召开多次批判王任重大会。

1月7日，经长办联司对外联络部联系，王任重被送到长办大院接受批斗。顾建棠回忆：

我们在新大楼专门为他找了一间小办公室，从招待所搞来新被子，还生了火炉。他的伙食我当面征求他的意见，并按他的要求，提供了肉丝面条和鸡蛋黄花木耳汤。临走时王任重含笑道谢。

第二天，在长江职工俱乐部召开了全办职工批斗王任重大会。在会上，王任重与林一山两人亲口交待了策划保林的详细过程。

王任重说：“9月间，林一山写信给我和陶铸，要求得到保护，信中说只要能保留党籍就行。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陶铸与我商定‘保林’措施：先通知中南局主持工作的金明书记，不要批湖北省委关于林一山停职检查的报告；然后通知湖北省委赶快把工作组撤离长办，并要张体学与林一山修好。林一山给我写信，是我们决定采取措施保林的原因之一。”对此林一山点头称是。

林一山说：“1966年10月下旬，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主动打电话给我，要我出来继续主持长办工作。我说你把我搞成这样，怎么工作？省委要有个明确态度嘛，否则无法工作。张体学说彼此彼此，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他说可以考虑我的意见。后来省委在11月16日给长办党委发来了这个信件。”

这个省委致“中共长办党委并林一山同志”的信件说：“现决定长办党委在林一山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长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要在长办

¹ 肖伯晏《王任重罪该万死——在斗争王任重大会上的发言》，载东方红红卫兵新华工总部《东方红战报》第九期（1967年1月16日）。

红卫造反报

第四版

1967年1月11日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记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

【本报讯】六七年是阶级斗争的一年，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我们武汉地区的红色造反派决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猛烈反击。于元月1日和元月四日在汉口新华体育场，连续召开了两次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手王任重大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

王任重是刘家王朝的看门狗，他在湖北制定了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了湖北地区的学生运动和革命群众运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现在我们斗争王任重是他应得的下场。

听说斗争王任重，革命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唯怕天翻地覆，唯怕翻风倒雨。武汉地区的红色造反派组织举着红旗，迈着矫健的步伐，整齐

地进入会场，来自外地的革命师生和工人、农民，干部也很早从四面八方来到新华体育场。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五十多万革命群众只有一个心愿：坚决打倒王任重，誓死保卫毛主席，新华体育场排得水泄不通，附近的街道也人山人海。每个人手里举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开会前，每个人那专心学习最高指示，大会开始，万人齐唱《东方红》。接着就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

当把罪魁祸首王任重拖到台前示众时，个个义愤填膺，顿首高呼：“打倒王任重！”“王任重有罪，罪该万死！”“打倒黑手王

任重！”……

王任重被斗了，这是我们红色造反派六七年的首次开斗。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应特别勇敢斗争，不可姑息养奸。”我们要发扬敢斗敢打敢水狗的精神，誓把王任重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心中是红彤彤的紅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图为斗争王任重大会会场



王任重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秋后算账’的总头目，被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揪出来示众了。斗争了。斗得好！斗了王任重，革命造反派没有一个不欢欣鼓舞，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这个革命行动，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敲了重重的一拳，灭了洗杆保皇派的威风，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焰。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

斗得好！

本报评论员

王任重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秋后算账’的总头目，被武汉地区的革命造反派揪出来示众了。斗争了。斗得好！斗了王任重，革命造反派没有一个不欢欣鼓舞，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这个革命行动，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敲了重重的一拳，灭了洗杆保皇派的威风，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焰。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胜利！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这帮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色造反派者。为了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使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我们就是要斗王任重！王任重我们斗定了，斗下去，斗到底，斗到底，此志不渝，不达目的，决不休！

上街闹事，黄重出成流血事件。告诉你们，如果闹这样下去，决没有好下场。我们衷心希望，那些暂时受蒙蔽的工人同志赶快觉悟过来，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和我们一道战斗！



↑ 革命军、黑手王任重可耻下场

党委和林一山同志领导下团结起来，搞好抓革命促生产。”¹

王任重在水院被批斗两次。第一次是2月8日，农历除夕夜，天降小雪，万人批斗大会在水院大操场举行，王任重、张体学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他们都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张银德、侯建华、杨宏烈等控诉了王任重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白色恐怖，破坏文化大革命，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的罪行；王任重的汽车司机彭文杰也在大会上发言控诉王任重对他的迫害。还有王任重家的‘保姆’占仲廉以她六年来亲身所受的虐待和她亲眼所见的王任重一家腐化堕落的生活，对王任重进行控诉。占仲廉同志在讲到自己所受的欺凌时，悲愤交集，泣不成声。”王任重的“秘书吕乃强发言，揭露王任重盗用毛主席的名义，推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私货的问题时，王任重抬起头来高喊‘撒谎’！”第二次是在水院行政大楼三楼会议室举行的小型批斗会，李衍授主持。参加者主要是集中安置在水院的省市领导干部，他们大多在会上发了言，张华“言辞最为犀利，上纲上线最高，甚至还喊起了口号。会上张体学也发了言，但他的批判有些不痛不痒，革命造反派总是希望张体学能与王任重划清界限，但张体学就是划不清界限，他说他与王任重穿一条裤子，王任重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最后王任重作了检查”²。

中央文革派驻武汉的记者姚克强、俞文海应邀参加了水院批斗王任重的大会。姚克强回忆：“批斗会开得不错，省里面几个书记都到了场，很文明。会快结束的时候见到王任重，他要我们给中央传递信件”³。

2月8日，新湖大批斗漆林，王任重、张体学陪斗。《红八月造反报》第五期（1967年2月21日）报道：“会场四周贴满了‘漆林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急先锋’，‘漆林是张体学的好儿子’，‘绞死漆林’，‘枪毙漆林’……大幅标语。到会的红色造反者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愤怒声讨、控诉王任重、张体学以及他们的忠实走狗漆林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滔天罪行。”湖大红八月造反队一成员控诉：王任重、张体学及其走卒漆林“为了扼杀这革命造反组织，不择手段，耍尽卑鄙伎俩，干尽特务勾当，致使这些革命闯将走到哪里，就在哪里遭到围攻，甚至有的家庭与之脱离关系，

1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52、42页。

2 参见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168—169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9年版。

3 老田《姚克强访谈录》（2014年11月3日）。

断绝经济往来，写血书等”。“大会主席团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立即宣布撤销漆林的党员预备期，并当场烧毁了党证。顿时，全场一片欢呼。”

经各造反派组织协商，1月上旬至2月中旬，将王任重等三十多位省市委领导干部集中安置在水院。杨道远在回忆录中举了很多例子，证实“革命造反派对当时的批斗对象，政治上是严厉的，生活上却是很关照”。

水院二司学生余杰华当时负责照看王任重等人。1983年清理三种人，余杰华所在的葛洲坝工程局通过中央办公厅向王任重调查，王任重回信说：小余同志在我们滞留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期间，对我们的照顾很好，没有任何不当行为。如果张体学同志在世，他也可以证明这一点¹。

1967年1月29日，萧慧纳给毛泽东写信说，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2月2日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3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说：“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²

2月11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姚喆带着王任重的一位秘书到水院，传达周恩来接王任重去治病的指示，王任重就此离开水院。此后王任重依然过问湖北的文革运动，比如1967年3月2日、5日、11日，他接连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写了三封信，信中为自己申诉，也对湖北的文革运动提出很多建议。

批斗王任重，张体学和省委都没有公开表态。刘真在11月11日致张体学的公开信中说：“我了解到你和省委至今还坚持王任重是内部问题的错误意见。十二月三十一日，刘乔荫同志（杨锐同志的秘书）告诉我说省委仍坚持王任重是内部问题。元旦以后，批判王任重的大会正在进行，也未见到省委对这个重大问题表示正确态度。”

1 参见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177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4—45页。

第二编

“一月革命”与“二月逆流”、“七二〇事件”

(1967年1月—7月)

第十二章 一月夺权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篇幅很长，讲到“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面前的政治任务”主要有四条：“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革命师生、革命知识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

元旦社论没有提到夺权问题。八天以后，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各造反组织1月4日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号召造反派面对走资派煽动的停工停产，“紧急行动起来”，“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人民日报所加编者按语说这个文件“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对造反派接管文汇报、解放日报，这个编者按语说：“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段话是根据1月8日毛泽东的谈话写成的，毛泽东谈到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纸时还说：“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¹

1月9日，上海各造反组织发表《紧急通告》（人民日报1月12日刊载），坚决反对“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经济主义。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

面对全国普遍出现的停工停产、经济主义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解决方案是全国全面的夺权。

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29—30页。

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说：“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第一节 一·二六向省委夺权失败¹

在与杨道远等二司成员一起学习1月16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和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时，丁家显对夺权“提出了他的看法：与上海一月革命夺权的大好形势比较，我们湖北武汉地区的联合夺权斗争有两大先天不足：一是武汉数十支革命造反派队伍‘大联合’的基础尚未具备，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还需要统一认识；二是真正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革命领导干部队伍还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是缺位。所以，他认为：武汉地区大夺权的条件还不成熟，需要我们创造夺权的条件。”

吴焱金说：“我在文革中起来造反，主要是出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迫害无辜群众的愤怒，脑子里没有一点点夺权的概念。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没有思想准备，武汉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也是仓促上阵。”

郭保安谈到湖北一·二六夺权时说：我对夺权一向不积极，武汉造反

1 本节的撰写，参考了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五章‘一月革命’——向走资派夺权”，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四、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进攻”之“9.一·二六夺权及二八声明”，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一·二六夺权和分歧的由来”“一·二六夺权失败的反思”，钢二司反复辟联络站《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大事记》（1967年3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1967年8月），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夺权前后》（载1967年2月24日《红色造反者》报），吴焱金《夺权真相和我的看法——“某些人”说话了》（写于1967年2月11日，载1967年2月24日《红色工人造反报》），彭祖龙《夺市委、市人委权闹剧始末》（未刊稿，2018年）。

派各组织商谈夺权是派王富山去的，“因为我们觉得当时夺权的条件还不成熟”。1966年9月底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学校一个老干部、“老红军田忠贵把学校的公章都送到我们办公室，我不要。当时还是大串连时期，到学校来串连的人要吃饭、睡觉，要接待，写大字报的人要纸笔。我们还要去管他吃饭、睡觉。那时当权派也不行了，我们要公章干嘛？让他们去管吧”¹。

武钢运输部造反组织火车头战斗队“对‘夺权’问题经过了认真的讨论和学习”，决定不参加夺权。他们认为：“我们参加这次运动是为了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是为了很好地学习和锻炼自己，我们无心去夺权，我们也不具备夺权的条件。这次运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向谁夺权？轻易夺权是会犯错误的。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自封的，再说那个章子夺在自己手上有什么用？我对大家说，那是一块死木头，你想去刻多少都可以，有什么用？谁肯听你的？我们都是工人，根本不具备掌权的能力和管理的经验。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只会使自己背包袱，使自己十分的被动。以后的事实一再证明，有哪位认为将大印抢在手上就可以夺得权力，结果只能给他带来杀身大祸！东汉时期的孙坚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所以，元月5日工人剧院的夺权活动我们未派人参加，省、市和武钢及运输部的一切夺权活动，我们也不参加。记得我们当时对夺权问题还写过一张大字报，表明我们的观点。”²

上海造反派发起夺权的背景是一些当权派煽动保守派工人停工停产，一些当权派或躺倒不干或把文革运动引向“经济主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号召打垮走资派以破坏生产来达到破坏文化革命目的的阴谋，人民日报所加编者按语说这是“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在中央号召夺权前，从1966年底开始，武汉地区各级当权派很多人撒手不工作，对群众自发的经济要求有求必应甚至应过于求，联合会会员大量离岗外出，停工停产现象普遍出现。丁家显等人认为“武汉地区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肆虐比之上海更为严重！”

¹ 2016年11月杜先荣访谈郭保安、刘玉民的记录。

² 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51页。

尽管造反派对于夺权没有思想准备，在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在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逼迫下，还是全力投入各级夺权。

1月4日得知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纸后，武汉地区造反派立即着手被封闭一个多月的湖北日报的复刊工作。14日，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组成的湖北日报接管委员会宣布接管湖北日报。1月15日，湖北日报新生号出版。新生号刊登署名“接管湖北日报红色造反者”的《告全省革命人民书》，宣布“新生的湖北日报是党的报纸，人民的报纸，革命造反派的报纸”。

1月21日，武汉晚报社造反组织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将武汉晚报改名长江日报，出版长江日报“新生号”。

1967年1月14日，工总发起，九一三、二司、工造、红工兵、红教工、新湖大、新华工、南下造反大队、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西军电临委驻汉联络站等十三个组织负责人在红楼开会，讨论工总“为了配合当前斗争形势”起草的《告武汉人民书》。讨论了三次得以通过，“来开会的人一次比一次多，最后竟有四十多个组织”。商讨为夺省市的权做准备的具体行动，会议提出造反组织联合起来。“会上有三个方案：（1）成立联合总司令部；（2）成立联络站；（3）各搞各的。最后大会通过了成立一个联络站”。工总认为“它的作用不大，事实证明联络站也没有起什么作用，这样第一次大联合就失败了”。吴焱金也认为武汉市这一次大联合失败。

1月18日，《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告全省人民书》（载当年1月19日湖北日报）由武汉地区四十九个造反组织联合署名发布，没有用联络站的名义。《告全省人民书》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把党权、政权、财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统统夺回来，紧紧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手里！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新秩序”。“我们郑重宣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17日新华社就对此作了报道。《告全省人民书》没有九一三署名，原因不明。

1月20日晚，工总邀请二司、工造、红工兵、红教工、新湖大、新华工、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西军电临委会驻汉联络站等十四个组织负责人在红楼再次开会，商讨大联合问题。

21日下午，各组织负责人继续开会，增加了首都南下造反大队、

11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在会下听到一些组织对工总、二司的意见，吴焱金认为“同我想的是一致的，这些问题不解决要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是不可能的”。当天下午，他在会上讲：“工人总部有大国沙文主义”，“独霸省、市委负责人，同张体学等关系不正常，自己不斗不批，也不给别人斗、批”，“对待职工联合会问题上形‘左’实右，把大量受蒙蔽的群众打成‘保皇派’，戴高帽游街，这是方向性错误”。二司周孔信对吴提出抗议并退出会场。工总武昌分部“揭发了一些问题”，其他一些组织也给工总“提了一些意见”。吴焱金说：“整整一下午，会议是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一致认为会开得很好，工人总部的代表胡厚民同志也表示了态度，希望各组织送‘宝’上门，很好地改进工作。”

25日，总司令部会议确定：以“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名义夺省委的权；夺权时间为1月26日下午三时；新潮大起草“夺权公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新华工起草夺权“第一号通令”；二司、三司负责了解省委机关造反组织情况。会议还讨论了夺权大会的具体事宜。会议决定夺权筹备委员会由九名常委组成，选出工总、工造、九一三、红工兵、二司、新华工、新潮大各一人，工总为召集人。在确定另两个名额时，又发生争吵。吴焱金说工总任常委、召集人都是他提名的。

吴焱金在上述文章中讲到确定夺权时间的经过：有人说“今天晚上夺”，有人说“明天下午夺”，聂年生说“最好迟两天夺”，武汉财贸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王怀亮代表汉口那边的“总司令部”说“现在时机不成熟，我们不同意马上夺”。朱鸿霞“站到凳子上激动地说：‘早夺比迟夺好，三千二百万人民看着我们啦！游泳中学会游泳，夺了再说！’多数同志同意这个意见，我们也只好同意……就这样，决定了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夺回省市委一切大权”。

杨道远回忆：25日会议前，工造等组织已在汉口另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殷德才在25日会议上散发这个“总司令部”的“成立公告”。“这种分裂行为受到其他组织的批评。殷德才认了错，收回了散发的《公告》”。

吴焱金在上述文章中说，在1月20日工总邀请工造去武昌开会商量联合夺权前，工造等十个造反组织就在汉口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25日晚常委开会，二司周孔信问吴焱金，汉

口那个总司令部的其他九个组织是否到这边来？吴焱金说：“可以参加这个联合，（武昌这边）常委不变。”常委决定大联合组织的名称改为“毛泽东思想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吴焱金表示同意。周孔信提出汉口那个总司令部要属武昌这边领导，吴焱金说不成问题。周孔信说：“既然参加了湖北总司令部，就意味着武汉总司令部解散了。”吴焱金说：“什么时候实行了真正的大联合，我就解散，现在还需要保留一个时期。”吴焱金写道：“就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小周硬要把观点强加于我，我很生气，其他九个单位的同志也很生气，认为像这样搞，夺了权也联合不好。当场我发表了口头声明：‘我们退出常委和湖北总司令部，对于你们的夺权，只要是革命的，坚决支持。’就这样，我们十个单位的代表分头回家了。”

26日上午总司令部会议的内容是商讨下午夺权的具体事宜，通过“夺权公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等。

在这次会议上，矛盾激烈爆发，由具体问题的争论变成势不两立的互相攻击。

杨道远说，又是殷德才首先发难：

殷德才提出：办公室应该是总司令部最高权力机构，本机构人员相当于“常委”，争主要领导权，还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二司我们信不过”，“……”二司代表庞道铭、周孔信攻击工造是卖烧饼、油条的，不是产业工人，不能当主要领导。吴焱金火了，说：“我们不能与二司联合，有二司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二司，我们是水火不相容的。”在一番争论之后，工造代表又提出：“二司不能当常委，如果二司当常委，我们就不参加这个联合。”三司代表发言支持工造，说二司排斥小组织。……搞大国沙文主义。会议期间又来了一些不知名的组织，有四十多个，什么“红烂漫”、什么“挺进纵队”、什么“二七造反军”……这些没名声的小组织为能在总指挥部机构设置时争席位，争领导权，闹得特别的凶，他们关心的不是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他们只想自己的席位，不惜挑拨离间，攻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联合指挥部里都应该有同等的权利，都应该有席位。新华工代表王富山发言支持了攻击工总、二司的发言，那些无名的小组织以为有人撑腰，都把矛头指向工总、二司，说什么工总、二司组织不纯、头头修了、

不可靠……有个叫吴春泉¹的人，他原是职工联合会的头头（组织部长），此时成了某工人组织的代表，攻击工总、二司等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他原来的对手），他大喊大叫：“我们就是反对工总、二司参加联合！”并威胁说：“二司参加我们就退出。”会议召集人、工总的朱鸿霞急于夺权，就劝说二司，要二司顾全大局，暂时不参加常委（后来工总组织就此事作了检讨）。二司代表声明保留权利，退出了会场。

1月26日上午，吴焱金本来没有去武昌参加会议的打算。他在上述文章中写道：

湖北总司令部派车到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来找我，要我去，大家都不同意。最后我说服了其他同志，他们要我坚持一个意见：“只参加联合，不参加夺权。”这样我又回到了会场，当场就表示了这个态度，但同志们不同意我退出常委，要我参加。我就说：“我们参加二司就退出，有二司在常委我就不参加，二司太欺侮人了。”当时同志们也认为三个学生组织太多，就动员二司退出，二司的同学也同意了，他们表示：“暂时退出，保留意见。”湖大的同学说：“支持二司同学的革命行动。”这样又吵起来。工人总部朱鸿霞发脾气说：“三点钟就要夺权了，还吵什么！这个问题夺权以后再说！”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去夺权了。

关于1月26日那天发生的事，多年后吴焱金在回忆录中写道：

1967年元月26日上午，彭勋派车接我去湖北大学行政楼二楼开夺权筹备会议。跟我同去的还有工造总司的丁及（武汉电镀厂技术员）。我到会时在场的人有工人总部的胡厚民，“九一三”的李想玉、杨连成，二司的周孔信、庞道铭，新华工的王富山，新华农的谈志发，红三司的头头，还有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李金春、张立三、叶传发及一些小的造反组织的头头，共有四五十人，会场坐得满满的。

会议由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朱鸿霞主持。彭勋在会议上讲，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为了联合夺湖北省委的权。新湖大拟定了一个9人的筹委会，起草了《告全省人民书》和《夺权公告》两个文件，起草者分别是杨定发（湖

1 杨道远所言吴春泉是“某工人组织的代表”，这个“某工人组织”是指工造。工造总部1967年2月19日发表《所谓“联合会”头头吴春泉简介》一文（载1967年2月《红色工人造反报》）说：吴春泉是江汉五金社工人，1966年9月造反被打成“黑帮”。职工联合会筹备期间参与筹备数天，发现其为保守组织后退出，没有担任过联合会任何一级头头。后参加工总，成为本单位工人战斗队头头之一。1967年元月退出工总参加工造，为工造司令部一般工作人员。

北大学政治系学生）和罗思凡（湖北大学计统系学生），请大家讨论审议。朱鸿霞宣布了由夺权秘书处草拟的夺权方案：湖北省的夺权筹备委员会由9名常委组成，具体分配名额是工人总部2名、九一三1名、二司1名、新华工1名、新湖大1名、新华农1名，还有两个名额打算留给工造总司和省直机关的造反派组织省直红司。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就炸了锅，与会者吵成一团。

方案宣布后，周孔信第一个发言。周孔信说：“你们‘三新’三个学校3个名额，我们二司这么大的组织才1个名额。新华工、新湖大各一人我们没意见，二司是跨校际的全市性组织，我们才1个名额，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个学校3个名额，不公平。二司应该增加一个名额。工造总司干嘛要参加这次省里的夺权，他们可以到市里去搞，工造总司是小手工业者、小摊小贩，有的是卖烧饼油条的。”彭勋解释说：“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虽然只是三所大学，但在发动湖北、武汉的文革运动中贡献很大。……”接着由庞道铭发言，庞道铭重复周孔信的讲话，再次要求二司增加一个名额。

杨连成在会上发言，支持二司代表的意见。杨连成说：工造总司来干什么？都是卖烧饼、油条的，工造没有必要参加省里夺权。你们“三新”中的新华工、新湖大在文革初期有贡献还情有可原，那新华农呢？二司和九一三是反对这个筹委会分配方案的。

在一·二六夺权的会议上，一连三个人发言都是这个基调，鄙视工造总司，二司“铁嘴”周孔信几次三番说工造总司只能参加武汉市夺权，又说工造总司不是产业工人，是卖烧饼油条的，是来摘桃子的等等，激起了我的愤怒，一气之下说出“我和你水火不容的，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这句话，引起轩然大波。似乎他怎样说我都可以，我回敬他一句都不行。偏偏我是个脾气很犟、吃软不吃硬的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争论很激烈。这完全是我和周孔信个人的争执，很大程度带有个人感情因素。这时我非常气愤，站起来发言。我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要正确对待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摘桃子。席位问题是可以商量的。我们工造总司不是你们说的小摊小贩，我们也有产业工人，有肉联、长办、汉纸、汽配等大厂、大单位，我们有七八万人。讨论省里夺权的大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不要搞组织之间的互相攻击，如果二司坚持这个意见，

那就有你无我，有我无你，我们就退出夺权。我是支持“三新”的观点的。我说：“三新”在文革初期起的作用很大，按单位、按学校实行大联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司只有一个名额，是少了一点。其他的小组织也应该有一个名额。

朱鸿霞说：夺权是头等大事，大家不要争吵，9名常委是现在的意见，将来夺权以后还可以扩大常委名额。

周孔信一下子毛了，工总的人也很有意见，说“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组织来了，都来摘桃子来了”。正当大家争吵不休时，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张立三起来发言，他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他的依据有三条，第一，你们在内部排除异己，把老工总的发起人统统排斥在工总领导班子以外，甚至还打这些老工总的发起人；第二，工总的组织严重不纯。他举了周光杰、侯良正、余克顺等人的例子；第三，工总成立后，在武昌红楼的领导班子拿公款吃吃喝喝。

胡厚民发言说：“刚才大家对我们工总提了意见，你们说工总有缺点、有错误，我们正在关门整风，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开门整风。请您家们上门提意见，帮助我们整风。”

这时，一些造反派工人组织的人都发言同意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观点。他们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你们工总是老子天下第一！”与工总的人在会上吵了起来。

周孔信指责我说：“你完全是机会主义托派的观点！”庞道铭激动地说：“同志们哪，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今天的会议，使我想起了布加勒斯特会议，我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不在乎席位，我们二司退出夺权。”会议没能就夺权达成一致意见。

这时二司陆续有人退出会场，朱鸿霞说：常委的名额暂时这样定了，夺权以后再增加，夺权计划不变。下午两点到洪山礼堂开大会。

杨道远没有参加26日的会议，他回忆：

我听了庞道铭、周孔信的汇报，非常气愤，真是岂有此理！我觉得这些组织在文革运动中是游行队伍没有兵，大批判会上没有声，争权夺权打冲锋，我认为他们是来抢桃子的，他们受走资派操纵，破坏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我当即决定召开二司司令部紧急会议，到会的有：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张良栋、蔡向东、徐宏彩、赵子强、陈大川、彭宣龙、樊雪梅、

赵日萍、张向阳、庞道铭、周孔信等二十多人。会议上，庞道铭、周孔信把大联合会议情况详细作了介绍，参加二司司令部会议的代表都很生气，会议决定，决不能让这伙人夺了权。遂派了几个总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包围省委，在他们召开夺权大会之时抢先夺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印，并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发出“告示”：我们不是夺权，我们是保护“权”不让别人夺走（我们的这一行动其他组织当时都不知道，以后也没人提及过）。

1月26日下午三四点钟，出师省委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完成任务回到二司司令部。武测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赵日萍提着一个大麻袋，跟着两个女同志（说是省委机要员）进了我的办公室，说是省委的大印拿来了，接着他从麻袋里取出了大印。我看了，省委是个铜印，省政府是个钢印。我认为事关重大，大印不能放在二司司令部，决定找解放军帮忙。我和赵日萍带着机要员（那两个女同志）一起来到省军区，军区司令部贾云超副主任接待了我们。经请示部队领导同意接收大印。军区指定一个专门的保险柜，把大印单独放里边，由二司、机要员和军区共同贴封条，规定任何一方不能单独启封。

二司抢先夺走省委、省人委印鉴，并没有影响向省委、省人委夺权的大会如期召开。

吴焱金回忆：26日下午，约三千人参加的夺权大会在洪山礼堂门前广场召开，除二司外，上午参会的所有组织的头头都参加了夺权大会。朱鸿霞主持大会并宣读“夺权公告”，彭勋宣读“告全省人民书”，有人宣读了“第一号通令”和“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张体学、宋侃夫被戴上高帽，押上洪山礼堂二楼阳台“示众”。

当天张体学打电话给各市、专区、县，要求各地承认这一夺权。

吴焱金在上述文章中写道：1月26日晚，参加夺权大会的三十二个组织最后通过了将要送报社、广播电台发布的“夺权公告”等文件，散会时已过九点。十一点左右，工造派往湖北日报任总编辑的龙梅生给吴焱金打来电话，说工总、二司向湖北日报发出《通令》，不准刊登“夺权公告”等，同时去了很多人辩论。吴焱金给二司打电话，对方回答：“现在有人想摘桃子，权没有夺到真正的造反派手里，这样的夺权不能算数。”“三司是修字号的。”电话打到工总，接电话的红教工成员说：“明天我们将要采

取联合行动，你是革命的就站过来。”吴焱金在电话里一再对他们说：“如果不登报，就是夺权流产，这是整个造反派的失败，不能拿三千二百万湖北省人民开玩笑。如果认为有不纯分子，立即清除，而且报上不登具体单位情况，只落湖北总司令部的款。”吴焱金的意见没有发生作用，湖北日报没有刊登一·二六夺权的任何文件和消息。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于26日晚22点15分报道了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夺省委权的消息，并播发了“夺权公告”。

27日晨，工总、二司向湖北日报和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发出《通令》，不准刊登、广播“夺权公告”等1月26日向省委夺权的消息。同时，工总、二司、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一·二六夺权无效，立即解散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

12天以后，工总、二司等十二个组织发表“二八声明”，把工总发起并出任总负责人的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说成“一个乌七八糟的大杂烩”，把工总发起联合夺权并主持一·二六夺权大会说成“策划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假夺权”。

吴焱金在上述文章中写道：27日上午，湖北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还是举行了一次会议。二司代表宣读了工总、二司等五个组织的《联合声明》，“当场遭到多数同志的反对。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同学气愤地说：‘这是分裂主义声明！’他还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冲中南海，揪陈伯达辩论是反革命行为，工人总部队伍严重不纯，地、富、反、坏、右都有，战斗队员应该起来造反……’最后，他激动地喊道：‘砸烂工人总部！’二司的同学接着喊道：‘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谁砸烂工人总部就砸烂谁的狗头！’当场又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次会议是1967年3月底前武汉地区各造反组织头头最后一次聚集在一起，此后以工总、二司等为一方，以工造、三新等为一方，双方展开争斗，势同水火。

当时中央号召全国的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双方也不再联合行动，各自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机构，各自开大会，各自发通告，到车站、码头抢运积压物资等实际行动都是各干各的。

2月初，工总、九一三、二司等13个组织成立“毛泽东思想湖北省

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2月4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告》；工造、工三司、红三司、三新等44个组织成立“湖北省红色造反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2月6日在湖北日报发表《紧急通告》，这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告”不忘指责“革命造反派中的某些人和某些组织中所存在的风头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等等非无产阶级意识”被走资派利用。

第二节 夺武汉市委的权

以工造总司为首的一些组织夺武汉市委、市人委的权，吴焱金、彭祖龙和魏绳武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述。

吴焱金回忆：

元月27日（按：吴焱金记忆有误，应为26日），武汉市有十几个小的造反工人群众组织一起来到位于汉口友益街的工造总司司令部，要求我们和他们一起到市委、市人委夺权。我不赞成工造总司和这些组织一起单方面到市里去夺权。我认为，到市里去夺权，如果撇开了工人总部等组织是不行的。王锦铭当时是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他通过魏绳武把市委的公章装了一帆布书包回来。我批评王锦铭说：“你要那些章子有什么用？赶快把它送回去！”王锦铭抢市委公章一事使二司、工总等组织疑心更大，认为我们是单方面夺权，加剧了矛盾，使一·二六夺权会议发生的争执误会加深。我原来设想，武汉市的夺权要等到省里夺权有模式了就可以照着省里夺权的方式去办。省里夺权暂时流产了，市里的夺权暂时不搞。但王锦铭个人的做法对工总、二司、九一三等发表《二八声明》，指责工造总司等组织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派，武汉各群众组织以支持或反对《二八声明》为线分为“香花派”和“毒草派”，并由此形成造反派中后来的“钢派”、“新派”两大阵营，是有一定影响的。

魏绳武当时在市委机关造反组织和市直机关造反组织里都担任一号头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说句实在话，造反开始，自己未曾有过夺权的想法。直到上海一月风暴后，才有夺权这个概念，但仍无夺权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¹他被动地参与了工造主持的夺市委的权。他回忆：

大约是那天的深夜（准确的讲，过了1月26日24时，已是27日凌晨），

¹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86页。

有人在我家门前急促地呼喊我的名字。我从床上起身开门，看到一辆交通车停在门口，车头插“工造铁军”的旗帜，车上有二三十人。“铁军”属工造总司，当时在武汉是较有名气的造反队伍。车上下来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子，他向我自我介绍：“我叫王锦铭，工造的三号勤务员。朱（鸿霞）吴（焱金）他们还在洪山礼堂负责省里的夺权。市里夺权由我们负责，现在都集合在友谊路我们总部开会（按：工造向市委夺权大会是在友谊路中学礼堂举行的），伍能光早已到会了，市人委的大印，郑峰他们已交到大会主席团，现在只等市委这边的大印。”这个行动虽很突然，但有早上李梅青的信息，也不感到特别意外。不过还是感到有些轻率。“夺印就是夺权？”心里有这种想法，也不便轻易说出口。铁军压境，只得听他们的。“夺印”必须先找到“管印”的。我带着王锦铭等人最先找到市委办公厅秘书科长杨朝志。我把杨朝志喊起来后，转告了王锦铭的来意。杨朝志说：“这事要先向办公厅秘书张孟林主任请示。”杨朝志就带我们一行匆匆忙忙找张孟林。张孟林告知：“所有公章都在市委机要科。”然后，我们又一起随张孟林到了市委机要科。当夜是机要科副科长汪宗全值班。汪宗全看到张主任、杨科长都亲自出面，毫不犹豫把办公厅和各个部委的公章（全部是木制的，没有铜制的），用一个布袋装好，交给了王锦铭。王锦铭如获至宝，也未当场验看印章的真伪和数量，兴冲冲地拎着那一布袋的公章返回交通车，并让我随他们一同前往，参加所谓的“夺权大会”。

到了工造总部，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在我左顾右盼之际，王锦铭忽然不见了。大礼堂也没多少人，……找不到王锦铭，心里越来越不踏实，越觉得“夺印”的荒唐。正在我发愁之际，看到郑峰、余昌禄（郑、余二人是市人委直属机关造反组织头头）等人也在找王锦铭。人勤（市委机关造反组织“人民勤务员”）的梁家发等人，早晨起来听到铁军昨夜在市委大楼“夺印”之事，也急忙赶来找我。幸好，郑峰等人对王锦铭比较熟悉，很快找到了王锦铭。我们一起将所有的公章全部送到了市人武部，交他们暂时保存。所谓一·二六夺权在武汉市的闹剧落幕了¹！

魏绳武所说情况在彭祖龙的回忆里大多得到印证。但魏绳武说市委、市人委的印鉴当天就交到市人武部保存一事，彭祖龙不认可，他说这些印鉴在工造王锦铭手里一直保管到当年3月。

¹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87—88页。

彭祖龙参加了市里夺权的全过程，他回忆：

26日下午或晚上，吴焱金从武昌回到工造总部，向勤务组汇报情况。当谈到二司周孔信在会上说工造只是一些卖油条、烧饼的人组成，不同意我们参加省委夺权时，第一个发火的是潘洪斌，他是工造总部内唯一的一个共产党员，他跳起来大骂。吴焱金叫他莫发火，说不管怎样，朱鸿霞并未否定我们，对我们很尊重。新华工有两位青年教师在总部协助我们工作，其中一位黄老师说，二司现在有人在汉口活动，估计是组织市委夺权，这一下我们都紧张了。吴焱金说，不管谁夺权，都少不了我们，我们不要争。大家讨论了一会，新华工张立国来电话，要吴焱金马上到华工去一下，说彭勋等都在那里，有要事商量，于是吴和龙梅生、欧阳万勇几人先走了。临走还说，我们不要去市里夺权，反正少不了我们。

吴走后，潘洪斌主持会议，又谈到“卖油条烧饼”，大家火还没消。新华工沈老师（女）说二司不按规则办事，他们只知道章子是权力的标志，所以先抢到省委公章，夺公章也很重要。王锦铭一听觉得有理，说小吴这人胆子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全国都在夺权，我们不能等，在汉口这边我们比工总力量大，我们工厂和队员都比工总多，我们要赶快下手夺公章。最后决定立即发起夺市里的权。当晚，新华工驻工造联络站写好了“夺权公告”和“告全市人民书”。

潘洪斌、阎志斌、蔡大祥负责组织夺权大会。按省里夺权的先例，开夺权大会要批斗走资派，他们没有找到市委书记宋侃夫、市长刘惠农，只找来副市长伍能光。参加夺权的其他组织，通知到的有红教工、红侨兵、红艺兵、政法系统的政法尖兵、公安系统的公安军、工总省柴油机厂分部和首都南下造反大队、新北大驻汉联络站、哈军工驻汉联络站等。会场原定设在长办的长江电影院，因布置会场时间不够，改在友谊路中学礼堂。

王锦铭与胡重远、我分别到市委、市人委“收公章”，各带一辆交通车、一辆吉普和二十名“铁军”。市委公章不多，都在机要室，王锦铭找到魏绳武配合，收得比较顺利。市人委的公章分散各处，虽有市人委直属机关造反派头头郑峰和余昌禄帮助，还是费了很长时间。临开车时，又有一个工作人员送来一枚。胡重远、我及郑峰、余昌禄一起回到会场，会已经开完了。

事后工总、二司攻击工造“单独夺权”。我认为，武汉市是湖北省的下级，

下级夺权不需要上级同意；当时武汉市各区也在夺权，我们也没有干涉。

夺权后三天就出现问题，工造司令部所在的友益街上挤满了车和人，各区、局、企事业单位办事要盖公章，经市里工作人员指点找到工造司令部上来。工造的人搞不清该不该盖章，往往和来人吵成一团。保管公章的王锦铭只好把公章全部从书包里倒在办公桌上，说你们自己盖吧！一时间桌子上翻得大乱，盖好章都离去，来晚的叫明天再来。

一天晚上又出一件事，有个单位急着盖章，因为市内居民用煤只够三天，要赶快调运，而汽车运输公司不配合，需要出具市里公函下命令。王锦铭马上给盖了章。没想到汽运公司还是不同意调车，那个单位要我们想办法。

当时省市领导很难找，有的被保守派保护起来，有的被造反派看管，有的自己找地方躲起来。当时工造将副市长王克文秘密关在武昌粮道街的武汉胶管厂，于是我们决定到武昌找王克文求助。王说：在一般情况下居民用煤要保证十天储量。他马上写了三张条子，告诉我们找到这三个人中一人就行。我们满以为这下可以解决问题，没想到这三个人是大官，一个都找不到，都跑了。我们只好拿王克文的条子到汉口球场街汽运二站，去找管调车的。找到后，他说他只属某领导管，其他人都不行。我们急了，两个铁军上前将他两手反剪，抓住头发将头在桌子上连碰几下，他马上大声求饶，答应照办。此时附近办公室的人闻声过来解劝，了解情况后连连指责他，说工作不能和派性搞在一起。原来这个调度员是职工联合会成员。我们问来人这里有没有造反派，夺权没有，他们说他们就是，又说市交通局已经夺了权，但局党委书记跑了，不知去向，下面工作不好开展。他们单位领导不但人跑了，连公章也拿走了，这权没法夺。在该单位造反派支持下，派车的事总算解决了。

王锦铭成天背着装着公章的书包，忙得不可开交，公章成了累赘，丢又丢不掉。运煤的事过了两天，更大的麻烦来了。市法院来了两个人，带着市政法系统造反组织“政法尖兵”的介绍信和政法尖兵头头罗思栋写的条子，要求在法院关于两个死刑犯的执行书上盖市委印鉴。吴焱金不在司令部，我们打电话请示他，吴焱金不同意盖章，说杀人的事我们负不起责。我们只好对来说你们明天来吧，我们商量一下。这时王锦铭说是不是去问一下王克文，我说，这不是又去请示走资派？王锦铭说没有别的办法只

好这样。王克文对我们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这公章你们不要盖。反正犯人关在监狱里跑不了，晚一点不要紧，原来有些杀头案市委就拖过。盖章是有责任的，现在没事，将来若有人找你们麻烦，你们负不起这个责任。”看得出来王克文是真心诚意为我们好，尽管我们工造各单位将王克文批斗了十数次，但王克文还是惟愿我们好。回来后我们明确拒绝盖章。

王克文这次谈话对我和王锦铭有很大警示，夺权对不对还没定论，盖章比不盖章责任更大，我们何必每天忙着盖章呢？再说，这些来要求盖章的人中，有不少是当权派、保守派故意来找茬的。我们把章子夺过来，市委、市人委当权派反而轻松了，难怪他们这么积极交章子的，我们上当了。王锦铭和我商量，从今天起，一个章都不盖，对外就说找不到王锦铭。

1967年3月6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我们马上将全部公章交给“抓办”。

二司从省委、省人委夺得一麻袋的印鉴，当即送到省军区封存。杨道远回忆录说：“此行动表明，我们对人民解放军是无限信赖的；更表明，我们对政权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并不想单方面夺权，更没有因为夺到了大印就宣布自己夺了权，我们认为还是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

而以工造为首的武汉总司令部就是“单方面夺权”，“夺到了大印就宣布自己夺了权”，而且在一个多月内用市委、市人委“大印”，多多少少行使了权力。对工造的这种行为，工总、二司没有采取针对性的行动，他们的头头面对南下造反大队发起的“砸烂工人总部”的呼喊，正在准备对“托洛茨基派”即“以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某些人为首”的“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展开“全线反击、迎头拼杀”。

第三节 基层夺权行动

武汉地区造反派在向省市夺权时，在各单位都开展了夺权。一·二六夺省委的权因造反派自身原因失败，基层夺权并没有停止。

基层造反派夺权前后，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职工联合会成员大批离岗、当权派躺倒不干，生产、工作受影响甚至停顿；二是当时盛行的所谓“经济主义妖风”。

第一个问题出现，与造反派对待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过激行为有关。造

反派中很多人在文革前和运动初期挨整，批判资反路线时不顾政策地发泄怒气和怨气。在一些造反派的意识里，当权派几乎与走资派等同，开批判会、游行时，将单位主要领导人“揪出来示众”，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强使被斗人弯腰、低头、两手向后上扬）。职工联合会头头和骨干分子被称为“保皇派”，批斗当权派时往往让他们陪斗，他们的办公室很多被砸，发表与造反派不同的观点时往往被强迫当场低头弯腰“请罪”、“消毒”。面对造反派夺权，当权派和保守派已经不能组织起如同一二·二五大游行、一·五聚集省委那样的正面对抗，于是采取躺倒不干、停工停产等消极方式，把生产、工作受损失的责任甩给文革运动，甩给造反派。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姚克强回忆：当时“各地党委都瘫痪了，不工作了，交通秩序比较乱。造反派就组织起来抓生产，中央也担心生产方面的问题，我们也要反映这个方面的情况。有次湖北罗田县有个报告给中央，说农民搞文革都不生产了，把牛都杀了，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站里面就指示我们去现场调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冒着大雨下去罗田，找了当地的武装部同志陪同，到了报告所说的地方一看，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农民照样劳动，牛也都是好好的，我们写了稿子签上名发了快报。我们还去过孝感、应城等地，那时有大量那种情况很紧急很严重的虚假报告上去。”¹

1966年12月25日，武汉制氨厂整个操作系统中的关键部位合成塔发生故障，全厂生产瘫痪，党委第一书记舒学功带着一百四十多名联合会会员上京告状，其中绝大多数是工长、生产组长和老工人。“‘告状团’离开厂门口的时候，有人洋洋得意地说：‘我们都去了，你们（指造反派）还干个屁！’”²

12月29日，当时武汉市最大的商场武汉商场造反派接管广播室，保守派要求退出未果，正在上班的二百余人离岗，说去市委“造反”。造反派九十余人佩戴工人总部的袖章，坚持开门营业³。

“新华社北京（1967年1月）十七日电”报道：15日，青山地区九一三兵团等二十个造反组织召开“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全面总攻击誓师大会”，会上发言说，走资派“拼命把矛盾上交，煽动一批

1 老田《姚克强访谈录》（2014年11月3日）。

2 毛泽东思想新武氨革命造反司令部、湖北日报记者《一曲“抓革命，促生产”的赞歌》，载1967年2月8日湖北日报。

3 参见1967年1月29日长江日报。

受蒙蔽的工人上京‘告状’，借以破坏生产，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你们走吧，生产停下来，我看热闹，管你什么国家损失不损失，我还是拿我那一堆工资。’”

造反派宣布夺权，一些保守派群众更加反感。1月19日汉口卷烟总厂造反派宣布完成夺权，20日晚班就有一百多人请假不上班¹。电信局汉阳分局夺权后，保守派消极怠工，造反派职工上了夜班上白班，有的话务员三天三夜守在机台旁，邮电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前来支援²。



1967年1月，武汉邮电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市电信局造反派一起坚守工作岗位（载1967年1月30日长江日报）

所谓“经济主义”，人民日报当时刊登《名词解释·经济主义》说：“经济主义迎合部分群众的落后心理，用经济收买的手段，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把群众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的道路。就是说，它要无产阶级只为增加一点工资福利而斗争，只顾个人的暂时利益不顾整个无产阶级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不去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政治斗争。”

¹ 参见长江日报1967年1月24日报道《汉口卷烟总厂革命造反派识破和粉碎敌人的阴谋和反扑，把革命和生产大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

² 参见1967年1月29日长江日报报道。



1967年1月20日，武汉地区各造反组织50多万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表示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粉碎资反路线新反扑（载次日长江日报）

武汉地区“经济主义”这股风，是以张体学为首的湖北省委首先刮起来的。

1966年12月18日张体学在厅局长会上说：“接待站负责人在经济问题上要大胆处理……多花点钱，以后不批评，矛盾不要上交，我们受不了，要批评你们。”张体学问副省长张旺午：“原来预计的五千万（元）打不

打得住？”张旺午说“打不住”，张体学说：“拿它一个亿！”12月24日，红色华工乌兰牧骑的总部被砸，省委拨给粮票三千斤，现金二千元。不久送去两吨纸、一辆卡车。1967年1月20日，省委给乌兰牧骑每人发15元钱、10斤粮票¹。郭保安说，“乌兰牧骑人很少，总共大约三十来人，多半是调干生，主要在社会上活动，在学校没有与造反派发生过剧烈冲突。”²乌兰牧骑能量很大，很为保守派群众所推崇，同时也为省委看重。

1966年10月在全省专员、市长会上，张体学决定发放已取消的奖金，分三个等级，平均每人28元，全省共发八百四十多万元。1967年1月3日，张体学在省文革办公室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物资问题可以签字，涉及政治问题，不要随便签字。”³

1月26日湖北日报文章《揭露湖北省委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行》（湖北省委机关大字报选登，本报记者整理）说：1966年10月底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湖北省委负责人更是变本加厉”，“随意滥发各种经费和物资。每当同志们对这种错误作法提出意见时，省委‘要员’就不知羞耻地说：‘多花几百万块钱不要紧，反正是国家的钱。’十一月上旬某晚在洪山宾馆南三楼会议室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省委某主要负责人大力宣扬要在物资上‘支持’群众革命，并向管物资供应的×××大发雷霆，批评他们‘不识大体’，‘在小问题上抠’，并质问具体工作人员说：‘你们知道吗？我们批的条子因为你们不照办，让我们挨了多少整？’省委某主要负责人最后命令：‘以后我们批的东西，你们必须办到。’”张体学一次给一个组织报销二万多元，赵修一次批出四万多元，许道琦一次批出二十多万元（湖北日报2月11日载文说是批给半工半读学校教师的串连费）。省委领导随意提高他们经常出入的东湖客舍职工的生活福利。

各级干部以省委领导人为榜样。省戏剧学校给留校搞运动的应届毕业生二百二十余人，发放1966年7月至12月工资共两万七千六百多元。省商业学校给留校搞运动的应届毕业生三百余人，发放工资五万多元。省人民银行将勤杂人员的工资附加费增加一倍，并发给原来没有的烤火费，还

1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夺取新的胜利战斗队《打倒湖北黑省委的反革命经济主义》，载1967年2月11日湖北日报。

2 2016年11月杜先荣采访郭保安的记录。

3 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湖北省直财贸司令部《看！张体学等实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滔天罪行》，载1967年2月11日湖北日报。

准备补发 1957 年以来的烤火费。省粮食厅给所属科研所全部职工 46 人发串连费 14700 元，每人 320 元。（当时政府规定武汉城区职工家庭最低生活费标准保证人均十元。）省外贸局及下属公司，打开劳保用品仓库，让职工自行去取；批准九十多名临时工转为正式工，并补发工资差额¹。

1 月 21 日长江日报报道：武钢造反派揭露，“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武钢领导人）近两个月来大肆贩卖经济主义，竟花费了一百多万元。”

长江日报 2 月 10 日报道，“湖北省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举行大会，“揭发控诉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黑省委的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行”。工总武重兵团代表发言说：武重当权派“几天之内，就给一百七十多人补发工资一万七千二百元，最高的一人领到了四百八十多元。在十天之内，把库存的皮鞋、工作服等劳保用品发了个一干二净。这还不够，他们又拿出六万一千多元到市场上四出抢购物资”。二司省戏曲学校总部代表说，省委给文艺界发串连费、生活补助费十七万元，给戏校毕业留校搞运动的学生发“补助工资”，每人 140 多元。他当场代表六个造反派成员把不应得的钱退出。工总东西湖辛安渡农场战斗兵团代表当场宣布把不该分得的钱退给国家。

武汉地区的一月夺权，覆盖驻军以外的所有单位。据湖北日报 1 月 21 日报道，实现夺权的除工矿企业外，政府所属部门有省公安厅、省科委、市公安局、市邮局、市电信局、市教育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一轻工业局、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事业单位有市银行系统、长办、湖北人民出版社、江汉学报社，人民团体有市团委、市总工会。新华社湖北分社、人民日报湖北记者站的造反组织八三一革命造反兵团于 1 月 20 日接管了这两个机构。

李承弘记述了工总去省里各厅局夺权的情况：“到各厅局，就是市里各造反派组织的争夺目标。一般是各造反派组织一起进驻某单位，在本单位造反派配合下夺得公章，然后开一个批当权派大会，宣布夺权公告，组成一个新的夺权班子。一般情况下，工总都处于老大地位，故工总代表往往是一号头，掌管公章。这样一来，有的派往各单位的代表，因情况不熟悉，水平也不够，往往把夺来了的公章往总部一交了事。交上来的一大挎包，

¹ 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湖北省直财贸司令部《看！张体学等实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滔天罪行》，载 1967 年 2 月 11 日湖北日报。

每天时刻不离挎在勤务组工作人员余金香肩上，害得她成天提心吊胆，害怕有人抢了公章。”“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选派到各单位参加夺权的代表。一般朱、胡等人看中了某单位和某人，就要我到基层单位审查并找候选人谈话，做此事我忙了半月之多。记得我派往省团委的代表，是省新华印刷厂一个姓张的学徒，只十七岁，个子不高，初看是个初中生，由于代表工总，他一去就当省团委一号头。”¹

一月夺权开始前，武汉地区已有一些单位由造反派掌权，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权派躺倒不干。

1967年2月8日湖北日报报道：在中央号召向走资派夺权前，武汉制氨厂的造反派已经在工厂掌权。这个权不是造反派夺过来的，是该厂领导自己放弃的。1966年12月25日，整个操作系统中的关键部位合成塔发生故障，全厂生产瘫痪，党委第一书记舒学功带着一百四十多名联合会会员上京告状，其中绝大多数是生产骨干。造反派工人“起早摸黑，勇敢地挑起了抢修合成塔的重担”。“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整个工厂的抢修工作还不能有秩序地进行”，“人们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新生的坚强领导班子来指挥调度抢修工作”。1月4日，厂内四个造反组织经协商，召开了全厂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成立以造反派老工人为主体的生产临时指挥部，各车间、班组也建立了相应的生产指挥班子。他们克服人手少、天气恶劣等困难，在其他工厂造反派的支持下，半个月完成了抢修任务。随后，外出联合会会员的岗位，造反派工人连轴转，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来厂串连的学生顶岗，“当职工联合会会员回厂时，工厂的生产秩序已走上了正轨”。“而那些受蒙蔽的联合会会员，在铁的事实面前，也逐步开始觉醒过来。”²

1月5日左右，武重联合会八百人上京告状，有一个车间三百多人，走得只剩下十八人³。此时“厂内部分当权派躺倒不干”，1月6日，工总武重战斗兵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统一战线”，安排全厂生产。10日，武重战斗兵团发出紧急呼吁，呼吁全体职工停止上京告状，制止闹工资、福利等经济主义歪风，呼吁职工联合会会员回厂抓革命，促

1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92页。

2 参见毛泽东思想新武氨革命造反司令部、湖北日报记者《一曲“抓革命，促生产”的赞歌》，载1967年2月8日湖北日报。

3 参见长江日报1967年2月10日报道。

生产¹。

一治造反派夺权后，生产全由造反派指挥。曹承义回忆：“一治野战兵团的机关分团也在元月份夺了一治党政大权。一治设计处的一名造反派头头将一治党政机关的公章全部收集到一起，收集的过程很顺利，根本没有人对抗。一治的党政大权被我们夺了以后，生产、施工的指挥系统也全部在造反派的领导下进行，我们既抓革命，也抓生产，工程施工并未因造反派夺权受到任何影响。”²

湖北日报1月21日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戳穿阶级敌人在夺权斗争中的阴谋》说，“有的（当权派）把一切行政事务工作推给革命造反派组织，……使革命造反派陷于事务性工作之中，整天忙忙碌碌，分散了进行政治斗争的精力”。武钢造反派夺权后，就采取了监督各级干部的方式。1967年1月29日长江日报报道：1月28日，九一三、红卫军等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武钢总指挥部”，宣布夺权。此前武钢六十多个二级单位已夺权。武钢的夺权，对原各级领导班子采取监管的办法来行使权力。总指挥部夺权公告说：“原各级领导行使的权利必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控制，一切重大问题和决议，由总指挥部决定；一切在职人员，必须照常安排工作，坚守岗位”。

一些单位的保守派也重新成立组织，起来夺权。由于造反派坚决反对，都没有成功。

武汉化工原料厂的保守派在中央号召夺权后，退出职工联合会成立新的组织，宣称“我厂各个组织都是革命的”，“各战斗队共掌全厂大权，广大群众都有参与掌管全厂领导权的权利”。该厂工造红色造反战斗兵团等三个造反组织于1月17日召开大会，宣布接管“全厂的一切权力”，19日晚八时又宣布20日开全厂大会，接收厂党政印章。保守派于20日凌晨抢先夺走财务科和党总支公章³。

市医药工业公司工总分部成立“接收委员会”，于1月18日夺了公司党政的权。夺权后，供销办公室不同观点的职工成立“反到底造反派”“硬

1 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1967年8月）。

2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4页。

3 参见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化工原料厂红色造反战斗兵团《假夺权真保皇的阴谋必然破产》，载1967年1月21日湖北日报。

骨头造反队”，造反派宣布其为“非法组织”。政治部等部门不同观点的职工成立“红尖兵造反队”，造反派砸了他们的队部。汽车队工人成立“轻骑兵造反队”，造反派冲击其成立会的会场，并准备将汽车队的车辆、人员分到公司下属各厂。1月31日，这些保守组织联合成立红药工革命造反司令部，红药工三个月后成为百万雄师的发起单位¹。

1月16日，长办保守组织“造反委员会”贴出公告，宣布长办造委“已夺取了长办的党政财文大权，即日起由造委启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公章，行使权力”。长办联司成员“纷纷予以谴责”：“那是林一山操纵的假夺权。”“哪有保皇的夺皇上的权？”“造委是保林一山的，权在造委手里等于在林一山手里。”“这不过是防止我们联司夺权，先下手为强而已。”“面对造委的假夺权，联司群众自发起来抵制：电话不通了，门卫传达不传了，食堂只为联司人开饭，汽车没人开了，财务不办报销了，器材科不发材料了，修配厂停工了，规划设计停摆了……长办的日常工作几乎停顿。”“后来知道，这场短命闹剧确实是在林一山、丁福五授意下上演的”。1月24日，造反组织长办联司夺了长办的权。28日，造委抢走长办联司广播站的设备，送到与长办一墙之隔的一五二部队封存²。

各单位造反派夺权后，对当权派搞“经济主义”的种种举措予以制止。

1967年2月1日长江日报报道：市十医院当权派“对群众的要求是有求必应，使医院的开支一片混乱”。造反派1月17日接管财务室，建立了“造反派掌握的审批制度”，带头退还夺权前当权派发放的烤火费。造反派“积极与银行联系”，“共同讨论反对经济主义的具体措施”，“严格监督开支”。

1月24日长江日报报道：市人民银行系统当权派“过去他们不关心工人同志的生活福利，最近却大发‘善心’，对全行绝大部分公务员、炊事员同志，补发了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的烤火费。在银行业务工作上，则是放任自流，助长经济主义泛滥。如硚口区有个集体经济单位，要分掉五万元的积累，银行革命群众不同意付款，但是银行的领导却悍然批付了。洪山区有一个工厂，从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元月八日，支付赴京串连旅费达五万七千元；买皮鞋三千双，花去四万四千元。由于这类严重情况

¹ 参见百万雄师红药工《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1967年7月16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2000年7月）。

²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67—71页。

一再出现，造成了现金支付陡然猛增，给现金调拨造成了很大困难。看到以上情况，银行系统的革命造反派都非常气愤。他们贴出了质问和揭发的大字报。”上海一月革命开展，造反派于1月17日下午接管了市银行及所属机构，立即“召开工商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的座谈会，依靠兄弟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的革命群众一起动手，顶住了歪风邪气，使一度泛滥成灾的经济主义歪风及时刹车，坚决顶死。如工农办事处几天以来，就堵住了不合理的现金支付十七笔，计六千三百零五元。银行内部的革命群众，也纷纷起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玩弄的新阴谋，有的同志自动地把补发的烤火费退出来，有的同志把自己提出的探亲假与旅费的问题，自愿改放在运动后期解决，并对某些人支持这种经济主义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揭发。”

造反派制止“经济主义”行为，在一些单位遭到保守派和一般群众的反对。东西湖农管局辛安渡农场（当时改名东方红农场）的“一·二〇事件”就是一例。

该农场当权派在1966年年终结算时，“分配给职工的‘奖金’，比正常的计算方式成倍的增加，不但增产队发奖金，平产队发奖金，连减产队也发奖金，甚至比增产队还要高。总之，几乎人人都有奖金。有些职工所得奖金，最高的相当一年的工资收入。按照这个决算方案，明显不合理和不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精神的开支，就达三十万元左右。同时，他们以‘关心’职工生活，‘改正执行上级规定不坚决的缺点’为借口，破建场以来的惯例，大发农工烤火费、加班夜餐费、以农代干的奖金等等。”工总东方红农场战斗兵团等于1月19日发出反对农场当权派搞经济主义的《最最紧急呼吁》。农场职工联合会分会通过有线广播等，向全场职工宣传《最最紧急呼吁》是“反对贫下中农搞决算”“诬蔑社会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传单”。20日晚，数千农工“有的拿着扁担镰刀”，围攻造反派七小时，致使造反派9人受伤，2人重伤，有人被抄家，有人挨斗，有人被抓去游街，战斗兵团办公室被封。有人提出对造反组织不准发工资，是党团员的开除党籍、团籍。事后几天，他们不准广播站广播反对经济主义的稿件，撕掉反经济主义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农场造反派认为，此前市委秘书长王家吉说“东西湖（农场）钱不够，可以拨几十万”，东西湖农管局党委决定“拿出几百万顶着”，“这就是

‘一·二〇’事件的祸根”¹。

武钢运输部领导违规发补助，火车头战斗队坚决反对并采取行动，引起部分领到补助的工人罢工。陈祖坤回忆：

（走资派）将国民党反动派、官僚资产阶级对待工人阶级的一套拿来对付我们，突然冒出了一股“经济主义妖风”。为了祖国的建设，职工福利紧缩多少年了，怎么一下子对工人在经济上如此大方？一夜之间给运输部三班倒的野外工作工人补助每人每月四十元，相当一名三级工一月的工资。这一招来得可谓高明，一方面，他们迎合了许多多年未涨工资的低级别工人的心愿，把人们注意力吸引到经济方面，转移工人关心国家大事的大方向，将文革运动引入歧途；另一方面，给造反派的队伍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我们要是大张旗鼓反对经济主义，就会遭到许多人、甚至包括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的反对，因为这样直接违背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这就会被走资派利用，以维护工人切身利益的名义对火车头进行攻击，这样一来不但会影响我们组织的发展，还会影响我们队伍中的人退出火车头。请看走资派为了搞垮我们，这一手下得有多么的毒！我们若是像运输部的红卫军和九一三纵队那样，对走资派搞经济主义视而不见，放任自流，那么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搞下去？我们必须立即作出抉择，绝不能只顾自身利益，坐视不理，而是应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为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挺身而出，以实际行动迎头回击走资派这一猖狂进攻。我们几个人简单商量了一下，说干就干起来了。首先是我们火车头的七名负责人，我和张振华、梁启汉、叶芳馥、李仕儒、高仕超、杨征琪，用红纸写成喜报，敲锣打鼓经过几个车站和机务段，大张旗鼓地将四十元补助退回运输部财务科，然后动员火车头的一些积极分子，如吴正照、田泽润等几名火车司机，主动向财务科退补助，并勒令运输部财务科将未发的钱一律封存起来，另将一夜之间发放的五万多元如数从工资中扣回。运输部财务科黄科长不敢接受这一要求，他害怕被扣工资的工人起来造反。财务科的主管会计朱德华、林雪枝和周××试着扣了几个人的工资，果然出现了机务段有的工人停产罢工的情况，如火车司机罗晓兰、张成烈、陈松岭、赵成新、张润等人在运转室拒不出车。铁水罐不拉走，直接影响高炉出铁，我们知道这

¹ 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东方红农场战斗兵团、东方红农场机关毛泽东思想卫东战斗队《强烈的控诉》，载1967年2月11日长江日报。

一情况后，首先由勤务组的人带头上车顶班，一定要保住高炉和平炉的生产。运输部所谓第一次停产，被我们有力地打了下去。机务段的黑帮势力仍不死心，继续由以上这些人消极怠工，使生产无端受损¹。

陈祖坤提到的运输部会计林雪枝，1967年1月18日在湖北日报撰文，叙述了她拒绝在取款支票上盖章受到围攻、运输部领导袖手旁观的情形：

元月五号，一部分革命群众对一些规章制度提出了意见，其中提到运输部各单位按实际情况不应该有伙食费补助。可是运输部领导人，为了拉拢群众，转移斗争矛头，就责令财务科，在三、四天内把伙食费补助发完。公司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知道这是错误的，却同意了 this 错误决定。财务科领导人更是忠实积极执行这个黑指示。当群众指出这不应发时，他胆大包天地说：“错了检讨！”就这样，在一天多的时间内，发出了伙食费补助五万八千六百五十元，也就是每人发四十元。……在发钱过程中，我们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和东方红战斗队等六个革命组织曾经到公司财务处，找当权派谈判，他们同意不再发。但事后他们又散布流言说，不是他们不发，而是我不让发，这样挑动不明真相的工人来围攻我。我被连拉带拖的绑架上汽车，开往招待所。到了招待所，有很多人说要和我开辩论会，实际上是进行围攻和斗争。他们说什么主任和科长都同意发，就是我们这些小会计搞鬼，造工人的反。当时，运输部领导人就在我的旁边，他们坐山望虎斗，看着不明真相和受蒙蔽的工人斗争我。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听领导的话？”我当即回答：“毛主席教导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他们见没有办法就由财务科领导人硬把我用汽车拖到办公室，要我交出支票，他亲自开出了二万六千多元的支票，因我坚持不盖图章，才未拿到钱²。

有一些单位，造反派实际上已经“挑起了革命、生产两副担子”，但始终没有夺取党政印鉴，也没有宣布夺权。工总武锅兵团是工人总部所谓“四大金刚”之一，力量很强。1月23日，以它为首的厂内六个组织实现了大联合，成立新“毛泽东思想新武锅革命造反司令部”，对外称工总武锅兵团。联合当晚，他们“马上又与厂长郭长倬、书记赵秀岳长时间讨论问题。与郭、赵的谈话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造反司令部主动去管全厂

1 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第52页。

2 武钢林雪枝《控诉经济主义的罪行》，载1967年1月18日湖北日报。

的事务，而厂里当权派又迫切需要我们参与管理，生怕不慎又惹出麻烦不好收拾。更主要的是，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的任何决定都很难推行。”从王光照当时所作谈话记录“可以看出当时武锅造反派事实已经参与了厂务管理，既不忘批判资反路线的头等大事，也有促生产方面‘开门红’的具体安排，还有小到家属工厂的经济事项。可以说，造反派已经开始在厂里掌权了”。而“要不要公开宣布全面夺权”，造反派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派认为不要自己主动背上一些事务上的包袱，否则原来厂里那些当权的人和职能部门的人可以正正当当地躲到一边去图舒服、享清闲；宣布夺权还会引起造反派各组织间的一些纷争。沈复礼同志是这种意见的主要代表人物”。“另外一种意见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毛主席号召夺党内走资派的权，我们应当雷厉风行，果敢、无畏地夺了再说。造反本身就是冒险犯难的事，……敢于夺权就是最大的策略，没有中间道路可走，骑墙更是行不通的”。沈复礼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¹。

长办联司夺权，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周密，得到一批中层干部支持，通过“谈心”得到党委全体成员“拥护”，因而“夺权后日常工作正常运转”。顾建棠回忆：

1967年1月23日午后，长办联司所属的家属造反派“半边天”负责人罗家惠到联司办公室谈工作，正走在老大楼（长办红楼）二楼的楼梯上，造委的几个人突然挥拳猛击，致罗家惠从二楼楼梯上滚落受伤。……

闻讯赶到现场的联司群众越来越多，群情激愤，有的要求以牙还牙，有的要开控诉大会，有的提出乘势夺权……。下午四点多钟，我召开了长办联司勤务组扩大会议，除勤务组全体成员外，还特邀了缪盛桂（秘书处）、丘碧谨（机电处长）、张振奇（组织部组织科长）、王志珍（水利工会办公室主任）、徐秀庭（长办团委副书记）、高永华（科学院政治处组织科长）、阎清武（行政处房管科长，武装民兵连连长）、李纯钊（《人民长江报》副主编）等中层领导干部参加。

我在会上提出：现在群众情绪十分激动，有人要求以牙还牙；也有人提出现就在夺权，不赞成以牙还牙。要是夺权的话我们毫无准备，到底怎么办？要不要现在夺权？如何夺权？夺权中应注意哪些问题？会不会成为包袱？我请大家来商量一下。

¹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79—81页。

经商议，认为造委制造事端，从反面帮我们发动了群众，为我们夺权创造了条件；夺权不会成为包袱，行政管理和规划设计方面足以控制。遂决定当晚夺权，并成立了由顾建棠、张振奇、缪盛桂、王志珍、阎清武、戚务华等组成的夺权临时指挥部。长办联司的真夺权开始了。

我随即宣布：对领导干部不准打骂，由民兵连副指导员葛仲余和团委黄炳乾把党委委员全部集中在修建队小楼里，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由保卫处陈林海和组织部赵国兴、张贤良、谢宜曙负责保护干部档案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由保卫处王宜久、团委杨立人和技术资料档案室的张××保护好技术资料档案室；沪玉琪和财务处杜其国、蒋文海负责保护财务档案；保卫处江超伦和民兵连副连长谢从勤负责收集保管长办的各种印鉴，并对干部档案室、技术档案室和财务档案室巡回保卫。

晚上七点多钟夺权开始，首先打开了政治部的大门和林一山、李庭序、丁福五的办公室，再就是各处、室、部、委、院、校的办公室，夺取公章，但就是找不到“中国共产党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委员会”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大印。后来在政治部机要室内发现两个铁柜，但没有钥匙，谢从勤同志把修建队锁匠韩大燕叫来打开柜门，果然两颗大印安放其中。到凌晨四点多钟，夺权成功。此后，长办日常工作有序进行。这次夺权活动后被称为“一·二四夺权”。

长办联司夺权当晚，我到修建队楼上与党委成员谈心，想听听他们对夺权的看法，除李庭序有点勉强外，都表示拥护。我一心想争取这位老红军支持，第二天又到他家里，……他最后说：我不是反对你们夺权，让我再想想，我也相信你是个好同志。

……

夺权后日常工作正常运转，规划设计工作有序进行，档案资料完整无损。从夺权那天起，中经长办联司1967年6月26日被迫撤离大院，到1968年12月8日向进驻长办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理移交止，所有干部档案、科技数据文件、财务账册、票据、钱物，无一缺失。对此，据说上至李庭序、丁福五等领导，下至原档案室负责人蔡世英等，都深为惊叹¹。

一月夺权中，不管是否宣布夺权，各单位造反派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

¹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69—71页。

单位事务管理。武汉军区从1967年2月底开始公开压制造反派，先拿香花派开刀，后来毒草派也逃不掉，造反派生存困难，掌权或参与掌权当然谈不上了。

此时，造反派掌权的单位都是造反派占绝对优势，如长办、华工、湖大、水院等。

第四节 造反派评说夺权失败

2009年以来武汉市陆续出现的二十多本造反派回忆录，大多讲到自身亲历和当时耳闻的一·二六夺权，讲到一·二六夺权失败的原因。

杨道远认为：“造成一·二六夺权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走资派的破坏，二是造反派本身不够成熟。”

关于“走资派的破坏”，杨道远只举出一个李守宪：“新华工聂年生，在李守宪（李曾任湖北省民委主任，其人在一月夺权期间上蹿下跳，纠合一些人组织‘省委班子’，被造反派称为‘地下黑省委’）策划下，单方面抢走了省公安厅的大印，宣布夺了省公安厅的权。”李守宪“在第二机床厂贴出大字报，说：‘我认为工人总部问题更严重了，必须彻底改组’”。

李承弘也说“省市两级夺权都没搞成，武汉开始出现钢新两派的分歧，我认为李守宪起了不少作用”。二机床厂八一七的刘汉文对李承弘说过，“他们大小事都会与李商讨，有事汇报，做事得听李指示”。刘汉文先于南下造反大队喊出“工总头头修了”，提出总部要整风，后来当上工总整风小组组长，致使八一七退出工总，武昌分部、硚口分部闹分裂，李承弘认为这些事都出于李守宪的策划，目的是从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手中夺回工总领导权，让刘汉文、彭国华等重新上位。当时还没有脱离工总的八一七背着总部去夺省公安厅的权，刘汉文亲口对李承弘说，是李守宪直接指示的，李守宪说：“夺权首先要夺专政之权，这是权中之权。”李承弘还认为：“张体学在1968年的多次会议上，不少场合公开讲湖北省有个地下黑省委，政委就是李守宪，省长是王海山，此话绝不是空穴来风，起码事出有因。”

郭保安说省公安厅夺权是李守宪鼓动新华工干的：一·二六夺权前，李守宪通过赵文成找到他谈夺权，说应该先夺省公安厅、电台。郭保安就派人去省公安厅“夺权”，“就是把十来个章子拿回来了，公安厅还有两

个警察跟着。还有去港澳的介绍信”。“章子在学校放了一两天”，“夺权以后没有搞任何活动”。后来就传说李守宪、杨光华、王盛荣、卜盛光这些人是“地下黑省委”，“讲得最多的是张体学”¹。

王光照不认同杨道远、李承弘的说法，他说：一·二六夺权失败，“长期以来流行说法是走资派背后破坏，这个论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李守宪破坏一月革命的论点也是成立不了的。依他的资历、职务、能耐、身份，他不是旧省委有相当分量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尽管他鼓吹了一些邪门歪道，干了一些偷鸡摸狗的行径，但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可以破坏我省的一月革命。”

很多造反派认为，当时没有事实、现在没有资料证明王任重、张体学等在夺权期间有过“破坏行为”。王任重当时在中央，他干预湖北的夺权必须假张体学之手，而张体学在1月18日派张华等去红楼与工总、二司商谈交权及联合办公，一·二六夺权大会后打电话要求全省各地承认造反派的夺权。

李守宪1927年入党，不过是十级干部，当时已从省科委副主任位置退下来，无权无势。他不甘寂寞，心很大口气也很大，能够唬住一些年轻幼稚的造反派，但能量只有那么大。1月10日，顾建棠“请李老向工人总部讲一下，把他们（保守组织长办造委）清除出工人总部”。李守宪满口答应：“没问题，这好办。”1月中旬李守宪主动向顾建棠提出：你们夺权的时候“我还可以请陈再道司令员派解放军协助你们”。这两件事他一件也没有办到。

杨道远所说造成一·二六夺权失败的第二个原因——“造反派本身不够成熟”，很多人在回忆录中也着重谈到。

张建华说：“参与夺权的造反派头头们缺乏政治经验。”“他们此前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直接接触政治博弈还是第一次，而且历练的时间也还太短，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经验。工人中的头头从站出来造反到夺权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学生造反派的头头虽然造反经历要长一些，但从1966年8月算起，也只不过半年时间而已。”“没有形成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内讧在所难免。”

王光照说：“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也刚刚在游泳中学游泳，

¹ 参见2016年11月杜先荣等访谈郭保安、刘玉民的记录。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左派幼稚病四处流行，讲资格、争席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老子天下第一、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盛行。没有听从中央的指示，在夺权斗争中，也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也要不断地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革命也要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这些道理，我们那些参加夺权的造反派头头们又认真地践行了多少呢？”

吴焱金说：“仓促上阵，群众组织头头之间没有进行充分的沟通。”“湖北、武汉并不缺少有能力的造反派负责人，但缺少一个有远见和胸怀、能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领军人物。‘一·二六’夺权的失败和造反派在二月逆流前夕的公开分裂，表现了造反派领袖们的不成熟。我们造反派领导层虎气有余，猴气不足；唇枪舌剑有余，耐心沟通不足；挑剔他人有余，自我反思不足。由于投入文革运动的时间短（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1月，总共只有不到90天），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办法和经验。特别是处理从未经历过的夺省、市委大权的重大问题。”“造反派没有形成有像上海工总司那样统一的群众组织。当时山头林立，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

一些人在回忆录中提到夺权时未能结合领导干部这一问题。实际上在造反派酝酿夺权前，省市委已有一些领导干部公开表示站在造反派一边。1966年10月初，省委农村政治工作部主任任爱生在社教总团实习队大会上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革命的少数派，你们参加九·二一九·四事件和九·一五游行是革命的行动”。1967年1月，任爱生在省委领导干部中第一个贴大字报揭发、批判王任重¹。省委副秘书长刘真1月11日发表《省委还在沿着错误路线走下去——给张体学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4日他对省委机关造反派说：“我这个人要就不下决心，下决心后就难动摇，我现在跟革命派一起革命”，“决心跟大家一起干到底”²。省政协副主席许金彪1967年1月写大字报对政协机关造反派表示支持³。

造反派在商讨联合夺权过程中，从来没有人提出要请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参与。

王光照说：“临时权力机构中的革命干部在哪里呢？黑龙江有潘复生，

1 参见武汉钢工总政宣部《省市革命三结合干部简介（二）》第5—6页。

2 省文革办公室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走访刘真同志》（1967年11月14日夜），载武汉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编《向真理投降》（1967年11月21日）。

3 参见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干部简报》第14期（1968年1月17日）。

山西有刘格平，山东青岛有王效禹，上海更有当年的中央文革的成员。执政党的干部长期养成的定式思维，宁犯政治错误，绝不犯组织错误。他们在文革中也抱着这一条信念不放，程度不同地执行了那一条资反路线，就是这种信念带来的恶果。对涌现出来的革命造反派，横挑眉毛竖挑眼，哪里又会同造反派坐到一起呢？更何况刚刚诞生的造反派一时间也没有顾得上认真地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为干部亮相、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创造必要的条件。有的人甚至对推行资反路线的各级干部仍然耿耿于怀，批都没批够，怎么会去解放他们呢？”

吴焱金说：“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领导干部支持。造反派争取革命领导干部工作做得不够，对站出来支持文革的革命领导干部不能达成统一认识。如当时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有省委正、副秘书长张华、刘真，副省长孟夫唐¹，黄石市委书记孙德枢等，造反派对他们没有给以统一的强有力的支援。”

张建华说：“事实上当时中央文革和毛主席（对夺权）也还没有既定的方式和方法，两个‘三结合’即革命干部、解放军、群众代表三结合和‘老、中、青’三结合是当年3月后才逐渐明确的”。

¹ 孟夫唐（1896—1980）：河北邯郸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南行署主任、冀鲁豫行署主任。1955至1968年任湖北省副省长。其长子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二子牺牲于抗美援朝战场。

第十三章 “二月逆流”引发的“三月黑风”

武汉地区造反派基层头头徐正全认为：正是有了全国全面的一月夺权，才有了从北京蔓延全国的所谓“二月逆流”；正是有了一·二六夺权，武汉地区才有了与“二月逆流”相呼应的“三月黑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由于造反派夺权触及了当权者容忍的底线，……这样一来，死死认定“打江山、坐江山”的当权者们注定要开始下真马（武汉方言：来真的）地反击了。造反派在准备投票，走资派却在暗暗磨刀。幼稚的造反派为了水中月镜中花般的名额争得势不两立，一股寒流却悄然而至。2月，北京高层撕破脸，文革反对者绝不是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做法发泄不满，更不仅仅是为当权派受到批斗冲击而不平，在他们看来，造反派大哄大嗡，说这个是走资派、那个也是走资派不足为虑，顶多是触及一下皮肉。批斗不是根本事，夺权才是真问题。2月份的摊牌真正的引爆点在于夺权。其实多数造反派因为幼稚，视夺权如儿戏，抢几个章子、发几篇声明就算是夺权了，走资派却不这样看。过去他们视造反派为一群乌合之众，也就是运动中的“勇敢分子”，闹腾不了几天，现在则视为心腹大患。你要玩真的，别人就陪你玩真的。2月的摊牌紧接着造反派全国夺权而发生，决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从此造反派成了别人决不宽恕、务必赶尽杀绝的对象，用十年后报上流行的话说叫“除恶务尽”。从此，造反派的噩梦就真正开始了。此后十多年的反复整肃，不再用文革初期那种整整黑材料、批一批、划个右派之类的小儿科，而是直接动用专政工具，不整则已，整就往死里整。“十年浩劫”，要凭良心说，就是造反派的浩劫，皆源自1967年的2月摊牌，以后的种种手法不过是其派生和延续罢了¹。

周恩来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二一八”、“三二一”，由

¹ 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58—59页。

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一·二六”、“二八”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三二一”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¹……

周恩来这段话，列举了以日期为名称的几个大事件。这几个大事件足以勾勒武汉地区1967年1月至3月的文革历史，概括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根由：“一·二六”夺权时造反派内两派发生矛盾，于是有了“二八”声明；“一·二六”夺权是夺省委的权，与湖北省委同一立场的武汉军区得北京怀仁堂“二月抗争”风气，把矛头指向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工总，于是有了否定“二八”声明的“二一八”声明、有了解散武汉地区最大工人造反组织的“三二一”通告；于是造反派“反逆流”，军区操纵百万雄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有了“七二〇”事件。

第一节 武汉军区介入文革运动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是日，武汉军区成立支左指挥部，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任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²，军区动员部部长信俊杰、军训部副部长李良等为副主任。

陈再道自1966年9月结束休养回到武汉，作为湖北省委常委，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武汉的文革运动，“就是从右的方面参加的，一参加就站到省委一边去了”³。1966年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血统论，陈再道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说陈伯达的讲话是“不要贫下中农子女”，赞扬谭力夫“真有一天才”⁴。曾任孝感军分区政委、时任长办政治部副主任的黄世忠，在七二〇事件后揭发：1967年1月24日长办联司夺了长办的权后，因他与陈再道熟悉，长办副主任李庭序要他带自己去见陈再道。李庭序向陈再道汇报说，长办有两派，一派叫“捍卫”，是反林一山的；另一派叫“红

1 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38页。

2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26页。

3 《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载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461页。

4 《千刀万剐陈再道——杨成荣同志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载武汉市委机关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编辑部印《七月风暴》第6期（1967年11月28日）第31页。杨成荣1964—1967年担任陈再道秘书。

本报讯 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从广播里听到《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之后，受到极大鼓舞，纷纷进行学习 and 座谈。他们说：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是毛泽东思想新的伟大胜利，我们一千个拥护，一万个赞成。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某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副教导员刘雄毅说：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夺权的斗

最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

武汉部队广大指战员誓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

争。这个夺权，是为无产阶级夺权，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夺权，这是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命运的大事，我们最坚决地支持。

连续五年荣获国防部荣誉称号的某部喷火连的指战员们说：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是热烈的欢呼；好得很！我们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我们坚决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忠实保卫者，天塌下

来，我们顶，地陷下去，我们填，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铁打的江山。

炮兵某部的指战员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主席领导我们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但能否巩固，关键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权掌握在谁人的手里。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苏联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政权必须掌

握在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人的手里。在当前的夺权斗争中，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大联合，但大联合绝不是大杂烩，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守其在长江大桥的某部二连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涂福盛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这样，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上敌人的当，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大联合起来，把革命大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我们只许左派夺权，不准右派翻天。我们要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小联合。（武汉）

1967年1月24日湖北日报刊载武汉部队的表态：“最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

旗”，是保林一山的，我们该站在哪一边？陈再道说：“你们应站在‘红旗’这一边。”¹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再道“实在憋不住了”，“放了一炮”：“什么造反派，都他妈的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狗杂种不投降台湾才见鬼呢！”²

军区支左指挥部刚一成立，对武汉地区业已形成的两大派，“军区领导和‘支左指挥部’多次作了分析，多数人是支持、同情‘工人联合会’（按：应为“职工联合会”）的”³。但职工联合会在军区支左指挥部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即2月20日，自行宣布解散了。

1月28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军委命令》（时称“军委八条”）发布，毛泽东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周恩来后来说八条命令是一个“保护军队”的命令。武汉军区在执行过程中把军委八条变成让军队放开手脚整造反派的命令。这个命令实际上赋予军队认定“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右派”的权力，一旦认定，就可以按照这个命令对其“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被采取了“专政措施”的造反派还不能找上门去开展四大，因为这很容易被认定为“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而“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是军委八条严令“今后一律不许”的。

同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策划的群众组织“红武兵”正式成立。该组

1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70页。

2 黎虹《中顾委九位老革命家的片断故事》，载《党史文汇》2013年第4期。

3 屈德骞、郑珠滨《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0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织成员为各单位基干民兵（基干民兵中有相当数量的复员退伍军人），多数参加者原来就是已瓦解的职工联合会成员，或思想观点与联合会一致。到5月，这一组织成为武汉军区、市人武部控制的保守派大联合的“百万雄师”的核心。市人武部这一举动得到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指导和支持。

红武兵头头、后来的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回忆：“到六七年，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拿了些文件给我，要我组织‘红武兵’（也就是你们造反派说的‘黑乌龟’）。他们就这样逼我走上了这条路，并从军区派了人员（便衣）跟随我，名为帮助我协助我，实为逼我走上前台。”“‘红武兵’这个组织就是民兵组织，是基干民兵”¹。2007年武汉两派头头聚会时，吴焱金说：“你们百万雄师是傀儡。”“武汉公检法”头头汪仕奇回应说：“我们是‘皮影戏’（意思是被人操纵），用完了就算了。”²

1月26日，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接见了即将宣布成立的红武兵代表五十多人，“谈到经费、派给顾问及上北京请示汇报问题等等”。韩东山“对于经费和派顾问的问题说今后好协商，关于去北京的事却畅口支持”。韩东山最后说：“成立群众组织，你们自己决定。”红武兵代表“另一方面找到市委，受到积极的支持，写出介绍信做旗子、刻章子、给经费。此时市人武部部长傅兆才、政委巴方廷，又亲自出面接见交谈”³。韩东山接见后，红武兵司令部发出“特号新闻”说：“元月二十六日上午和武汉（军区）韩副司令达成协议，同意派十名民兵代表赴京，向军委汇报并请示工作。”⁴

1967年1月至2月，武汉军区机关的文革运动呈现混乱状态。

1月4日，在中央首长接见军事院校、部队文艺团体群众的大会上，江青说在军内贯彻资反路线的就是以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在会上作检讨。此后，军内开展四大的单位开始批判上级机关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武汉军区对执行资反路线问题不表态，激起军区所属院校、文艺团体及军区机关造反派的猛烈冲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办主任吕炳安一直建议军区党委承认执行了资反路线，在军区主要领导不表态的情况下，他首当其冲，不堪忍受，于1月21日上午服下过量安眠药自杀。

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土匪”，企图搞“二月兵变”。

¹ 2006年6月5日笔者采访俞文斌的记录。

²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25页。

³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⁴ 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1月20日，陈、钟打电话回武汉说：军委在查贺龙的问题，我们军区也要查有没有贺龙分子，开常委会查这个问题。曾为贺龙部下的副司令员唐金龙在20日当晚军区常委会后数小时（1月21日凌晨）开枪自杀。

21日，李迎希给陈、钟发去电话稿（发出方念给接收方，接收方作记录），并请陈、钟转呈军委和中央文革，一是报告唐、吕之死后军区机关基本瘫痪，二是建议陈、钟同意军区党委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是鉴于情况严重，建议陈、钟回武汉主持工作。陈、钟的秘书代首长答复：李迎希的电话稿陈、钟不代转，让李自己送军委和中央文革。

陈再道第二天给李迎希电话，说“绝对不能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李“顶住”。李迎希随后将自己的意见发电报（与给陈、钟的电话稿内容大体相同）给军委并林彪。

此后，陈打电话给姚喆等副司令员，说“你们中间有敌人，姚、孔、杨、韩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陈再道这个电话被机关造反派得知，将其内容写成大字报贴到军区大院的大字报栏。至此，陈、李矛盾公开。此后，有造反派追问资反路线问题时，李迎希表示：“我个人认为军区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常委，也有责任”。造反派要求见军区领导，领导们无法答复，纷纷走避。临时主持党委工作的叶明的秘书王书正后来说，叶当时不敢到机关，“到处躲”。而李迎希每天坚持到机关上班。

2月6日下午，应机关造反派要求，军区党委（陈再道、钟汉华时在北京）召开机关工作人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批判军区党委为贯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而制定的“七条决定”。李迎希曾对叶明表示，不要开这个会，“传达八条命令以来，稳定的趋势很明显，不宜再搞什么大批判”。叶说他和群众达成协议了，不开不行。军区党委“七条决定”主要内容是：解散军区机关群众组织，停止开展四大，由党委负责唐金龙、吕炳安之死的调查，军区所属单位的群众组织到军区造反要派代表并经允许等。会上有机关干部要求副司令员姚喆将分管的作战工作（有调动部队之权）交给副司令员李迎希，因不久前姚曾调兵进入军区大院与前来开展四大的群众发生冲突，有关负责人找不到姚和其他领导，只找到李迎希而向他请示，李决定先撤兵，找到姚再定夺。这些干部认为李迎希不会调兵压制群众。李迎希对这一要求当场表示拒绝，说：“我不能接这个作战工作，这是党委分工的问题。”

当晚，军区文化部干事、职工数人来到李家，再次要求李同意接管作战工作，并指责李不接受群众意见。李仍然拒绝。这次谈话被这些干部偷录下来。这个录音带后来成为李迎希“夺军权”的罪证。

军区副政委张广才2月初从养病的咸宁回汉，到李迎希家说：“军区搞成这样，我们怎么向军委交代？我听说只有你一个人在机关顶着，我回来帮助你”。李迎希说：你合理合法在咸宁休息，不像我，我要躲就是逃兵，你就不要进来趟这个混水了。张坚持陪李顶。所谓顶，只是坚持在机关上班。

2月8日，李、张联名给林彪并军委发电报，指出武汉军区的问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

2月6日大会的情况，副政委叶明当晚报告给在北京的陈、钟，陈、钟当即向徐向前报告，徐表态说李是“抢班夺权”。

李迎希、张广才按军委指示于2月11日到京。17日，继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召集陈、钟、李、张开会，徐不听李迎希解释，指责李、张“抢班夺权”。军委办公室宣布军委决定，对李、张进行审查，实行“三不准”：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对外联系。

李迎希、张广才作了检查后，军委文革副组长徐立清命令二人回去，“在党委内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4月8日李迎希、张广才一下飞机，军区保卫部长田文就向他们宣布了军区党委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陈再道、钟汉华在党委常委会上主张组织批斗，有常委表示“内部矛盾不要扩大”，陈再道说“不打倒李迎希就打倒我”。此后军区党委组织多场批斗会，并对李张进行武斗，领头者是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宋新安、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宋乐山（他是闻名军内外的武汉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们按下李迎希的头，让李迎希“坐飞机”，不从就拳打脚踢，致其手臂、身上多处受伤；在一张桌子上面放一把椅子，要张广才站上去弯腰低头。当年李65岁，张67岁。李在受批斗间隙给徐立清写一信反映情况，说自己回汉后的情形怎么与徐立清所说的完全不同¹。

¹ 以上关于1967年1—2月武汉军区机关文革情况，参考了史维真《从李迎希子女状告孔庆德说开——也谈武汉军区的历史纠葛》，载《华夏文摘》增刊第五〇〇期（2006年5月15日），并参考了武汉军区某领导人之子的回忆文章。关于李迎希“夺军权”一事，1967年9月周恩来指示：李、张结束学习班返回武汉。回到武汉军区后，新任司令员曾思玉一直不给李、张安排工作。1973年1月6日武汉军委党委给总政治部的《关于李迎希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又将李的问题定为“反党夺权”。1981年5月8日，武汉军区党委作出《关于为李迎希同志平反的决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1981]8号文件），否定了李的“夺权”问题。

陈再道七二〇事件后在作检查时说：当时“借口李迎希是抓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

第二节 二八声明和武汉部队二一八声明

武汉造反派各组织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分歧，形成造反派的两大派。2月8日，工总、二司、九一三等12个组织在他们控制的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时称“二八声明”）。

二八声明发表，引起造反派内本来就有不同意见的两派公开分裂互斗，引起刚刚介入文革的武汉军区公开表明压制一部分造反派的态度，继而给予业已解散的保守派再度集结的机会。

二八声明认为：工造总司等组织在夺权过程中把矛头对准工总、二司，就是“充当了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起到了‘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的作用。”“这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扑”。工造、三新等认为，



二八声明刊载于1967年2月8日长江日报第一版

这个声明把夺权过程中造反派内部的不同意见公开化，大动干戈，把兄弟组织说成“托派”“机会主义”，是完全错误的；当前省委已经无所作为，保守组织已经垮台，正是造反派联合夺权的大好时机，此时发动内战，违背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二八声明四次把工造总司等组织称为“托派”。1967年8月中央首长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头头，谈到二八声明时说到“反托派”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这些口号不是武汉的特产，是从北京传去的”。关于二八声明的大辩论开始后，长江日报2月14日转载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编辑部文章《清除托派》，这篇文章和二八声明一样，认为这种托派“曾经是革命造反派”，“当革命取得一些胜利的时候，托派就跳出来向左派争权夺利了”。

围绕二八声明，造反派分成“香花派”和“毒草派”，展开广泛、激烈的辩论。不同规模的辩论会到处举行，晚上街头到处都是一团团的辩论人群。新湖大宣传部长彭勋能言善辩，在大型辩论会上往往占得上风，被称为“彭油嘴”。

二八声明发表两天后，2月10日凌晨，武汉展览馆事件爆发，这是造反派内两派第一次公开的、规模较大的冲突。1966年11月底，各学生造反派组织在武汉展览馆筹办“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工作人员以二司成员为主。1967年一·二六夺权流产后，布展工作就绪，二司司令部决定成立二司武展总部，宣布展览归二司所有。按照二司司令部指示“我们革命派举办的展览，不能为机会主义分子张目”，涉及另一派的展品、文字一律除掉。2月3日开始预展三天，8日新华工派人前往交涉遭拒绝。10日凌晨两点左右，新华工、新华农、三司等千余人彻底捣毁了这个展览。当时独立师一个连驻在展览馆，任务是保卫这个展览，展馆被砸时他们没有阻止¹。二司武汉机械学校总部闻讯立即砸了新华工广播台汉口分台。

二八声明发表后，“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要以‘罢工’对此表示愤懑。这些干部找到副政委叶明说：‘军区再不（对二八声明）表态，我们不干了。’”²二八声明发表不到三天，武汉部队批判“二八声明”的“严正声明”草稿，已经在军区内讨论，同时流传到社会上。此时陈再

¹ 参见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吴恒春时为武汉大学六三级学生，二司宣传部副部长，筹办此展览的二号负责人。

²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第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道对二八声明“连看也没有看”，他说：“批判二八声明是大方向，没有二八声明我们还没有把（柄）呢！”¹

二司勤务员杨道远对军区联络员表示，军区有权发表声明，但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军区负责。二司司令部按“军委八条”精神同时向全体成员发出“关于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命令²。

军区“严正声明”发表前曾征求过新华社的意见。郭保安回忆：2月中旬，军区三办通知我们到大军区，说首长要见我们。我和张立国等前往。见到了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韩东山、叶明和副参谋长王步青、动员部长信俊杰。他们说，二八声明是大毒草，问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们表示同意。他们说：“军区准备公开表明立场，发个公告，主要是说军区是不支持二八声明，是反对二八声明的。你们看好不好？”我说：“军区对于湖北武汉的文革大事发个声明，表明立场，这是军区的权利，我们没权利说

三道四。我们主要看是不是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如果只是反对二八声明我想我们也不会持反对意见。”当时并没有给我们说具体内容。对于2月18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二一八声明）虽然我们感到有点不妥，但是基本上还是认可的³。

武汉部队“严正声明”2月18日正式发表。2月16日，汉口高级步兵学校“红旗造反团”等五个组织发表《武汉部队“严正声明”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对武汉部队〈严正声明〉的郑重声明》⁴。

“郑重声明”说：“我们早在二月



1 《千刀万剐陈再道——杨成荣同志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载《七月风暴》第6期（1967年11月28日）第33页。

2 钢二司新武大“八·三一”红旗战斗队编《武汉军区支保压左大事记》（1967年8月）。

3 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4 1967年2月24日《红色造反者》报转载。

十一日下午偶而得悉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后，就立即赴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表示坚决反对，并警告他们，发表这个《声明》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他们负责。”“郑重声明”“强烈要求”“武汉部队党委必须对此事作出公开检讨，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必须把炮制《严正声明》的罪魁祸首交出来，由革命群众严加惩办”。

2月13日，工总武昌分部宣布脱离总部，另成立“2·13司令部”。此时，工总硚口分部也宣布脱离总部。武昌分部所属22个基层组织14日发表《联合声明》（刊于2月15日长江日报）说，部分头头声明脱离工人总部“不能代表我们武昌分部全体战斗员的意志”；武昌分部所属31个基层组织15日发表《严正声明》（发表于2月16日长江日报），宣布工总新武昌分部成立。2·13司令部和工造总司等一起成为毒草派，在批判二八声明的文章联署时，有时也用工人总部武昌分部的名称。

13日，毒草派控制的湖北日报发表社论《打倒分裂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两派关于二八声明的大辩论正式展开。社论说：二八声明“是一株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毒草”，必须“坚决彻底批判”。社论同时认为二八声明之争是“革命造反派内部”的问题，二八声明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内部存在着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在14日湖北日报上，工造总司、新华工、新湖大、九一三武钢修建部纵队分别发表文章，支持二一三社论，新华工文章的题目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清华井冈山、北京矿院东方红、北京地院东方红、新北大校文革等驻汉联络站及首都南下造反大队等发表了《“二·八声明”是破坏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大毒草》一文。

一冶野战兵团是毒草派，其所属工安公司分部头头徐正全2月中旬在分部会上说：“其实香花、毒草纯粹是扯淡，这又不是造反派与保守派，这两派无法调和是因为对文革的态度、对走资派的态度，有根本不同的意见，一个要造反，一个要保走资派，保守派还要整造反派，你想调和都难得调和。现在的香花派和毒草派我看不出有哪些根本的立场、观点不一样，就像工总和二司，好像和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再分个香花、毒草是不是无事找事？不管它，总部是毒草派我们就是毒草派。否则，一冶野战兵团

就会分裂，这才是大道理。”徐正全回忆：“大家都一致赞成。然后我又跟大家说，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香花派跟毒草派各自的根本立场和观点是些什么内容，又有哪些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辩论起来也是扯淡，干脆通知兵团战士一律不参加这类扯淡的辩论。”¹

至25日，湖北日报共发表4篇评二八声明的社论，“三评”的标题是“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



二司不认为二八声明之争是造反派内部的矛盾。3月14日长江日报发表署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二司）的文章《寸权必夺，寸土必争》说：“我们就是要和你们这些家伙搞分裂，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决不会同机会主义者和乌七八糟的大杂烩坐到一条板凳上同流合污搞政治交易。”

武汉部队“严正声明”发布前曾向全军文革小组汇报，组长徐向前“同意军区这个表态性的声明”²。

“严正声明”指出：二八声明“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与《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策划的，是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宣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1 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57页。
2 参见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第32页。

军区派出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大量散发二一八声明，同时出动军用卡车进行武装示威游行，呼喊“二八声明大毒草”等口号。

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责令二司整风，“闭门思过”。

2月16日上午，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员姚喆等要求军区机关造反组织“古田”战斗队等交出李迎希、张广才揭发陈再道的录音带，后抄走了录音带。

2月16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以师党委名义致信中央军委（送在京开会的陈再道、钟汉华转呈），说武汉地区局势紧张，有一个地下黑省委，控制部分造反组织；军区情况复杂，唐、吕自杀身死，李迎希副司令等有接管两级军区的计划；张体学幕后指挥搞假夺权，造反派组织互相打砸抢。据说武汉军区将29师（8199部队）调市内，却未与独立师通气。“社会上流传‘血染武汉’的谣言，说有兵变的危险”。“这些迹象表明，可能有一个大的阴谋”。

牛怀龙、蔡炳臣在陈、钟进京开会时，在部队内散布：“李、张想夺军权”，“两级军区都有问题，不能信任，时刻有兵变的可能”。“武汉市有民兵武器四万多支，落到了不可靠人手里”。“武汉军区调了部队，他们岗哨森严，雷达学校领导烂掉，高级步校领导指挥失灵，军内造反派已到连队串联，情况复杂，可能发生兵变，在两级军区瘫痪的情况下，我们师的担子很重，不能按常规走路，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反革命暴乱和兵变”¹。

牛怀龙、蔡炳臣绕过两级军区直接给中央军委写信这一举动极不正常。但2月22日陈再道、钟汉华在京接见独立师送致军委信的人，表扬他们，并表示军区姚、孔、杨、叶领导是可信的，李迎希、张广才是来交代问题的，徐帅已找他们谈话，他们已承认脑子发热，起来夺权，再一次分裂了军区常委。湖北省军区对8201的领导要拿过来。很快，军区就任命牛怀龙、蔡炳臣为武汉警备区司令、政委，将省市公检法和其他要害部门军管任务全部交8201部队，将军事院校的警卫部队也交给8201统一领导；要求加强社会调查，摸清各组织头头是谁，大方向对不对，对二司的情况搞材料送军区党委办公室，不要报支左办公室²。

¹ 钢二司新水运宣传部、市红司市委人民勤务员总部《七月风暴》联合编印编辑部《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20—21页。

² 参见《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5页。

19日上午，武汉军区召开机关人员大会，宣布军区机关“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等组织为反革命组织，逮捕、扣留数人。当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反革命逆流》说：“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阶级敌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这绝不是偶然的”。

19日，武汉军区发布内部通知。通知说：军区2月18日《严正声明》发表以后，发现我军队内部某些单位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对严正声明公开反对，甚至散发传单，上街进行反宣传，这种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凡我军队内部人员，对《严正声明》有不同意见，应按组织系统提出，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反宣传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指向我军。否则，就是破坏我军声誉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严加追究¹。

20日，军区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指出：凡是军事机关、部队或实行军事管制、守护的目标，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围攻或冲击；对于已经封存的民兵武器、弹药，不准抢夺、窃用。同时警告军事院校造反派：“制造谣言，煽动群众，假冒人民解放军，招摇撞骗，破坏我军声誉，妄图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这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21日，由孔庆德、韩东山带队，武装解散汉口高级步校、后勤学校（后字248部队）、通讯学院（总字423部队）、军区卫生学校（武字202部队）、空军护士学校等军事院校的造反组织，派出武装工作组进行整风；拘捕武汉地区军事院校、军内文艺团体等10个单位一百九十多人，行政看管56人，批斗七百余人，监督检查二百多人。在二八声明上签字的后字248部队造反组织红色野战军，被迫在武汉三镇街头“向群众请罪”。

孔庆德压制军内造反派，是2月10日左右在北京得到陈、钟的指示，并经军委领导同意。孔返回军区后在党委会上传达，而后开始行动。

武汉军区的这些举动引起地方造反派对军区领导极大的怀疑和不满。

2月21日，成立不久的红武兵在湖北日报上，以“毛泽东思想红武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文章《彻底把“二·八声明”批倒、批臭》。文章说：“我们革命造反派对‘二·八声明’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给予迎头痛击”。2月14日以来，湖北日报连日发表“毒草

¹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决不是‘二·八声明’挑起来的‘分裂混战’。”

20日至22日，二司在武汉水院召开了第一届红代会。杨道远回忆：会议要求牢牢把握大方向，始终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会上揭露了陈再道等人勾结省市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一派，打一派，企图搞垮工人总部、二司的行径，明确了斗争方向和任务，确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司令部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了两套班子，一套班子在一线，一旦第一套班子被抓，第二套班子立刻顶上来。同时二司司令部决定整风，成立了整风办公室¹。

23日下午，军区出动七十余辆军车，乘载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指战员示威游行，高呼“二八声明大毒草”等口号，直升机同时散发“二一八声明”、“二一九通知”、“二二〇公告”等传单，巡江炮艇停泊在香花派聚集的红旗大楼附近江边，并把大量指战员派上大街，宣传军区文告，参加辩论。大批军人与群众在街头辩论，成为武汉文革期间的奇异景象。独立师有人说解放军在街头辩论不好，蔡炳臣说：人家是革命小将，我们的战士也是革命小将嘛。他还说：我们的老战士有水平，讲的条条是道，水泼不进²。

25日，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等数十万人游行，高唱《国际歌》，呼喊“我们想念毛主席”等口号。军区向游行队伍散发印有解放军报社论《粉碎反革命逆流》的传单。

陈再道指示红武兵等组织：“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把二司打成比工人总部更坏的组织”、“先由群众造舆论，再抓他们的人”³。

杨道远回忆：“鉴于部队不断派出宣传车、解放军小分队到造反派聚集的地方发传单、贴传单、找造反派辩论二八声明等情况，二司司令部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出命令：我们认为派战士上街，把战士推到第一线这是个阴谋，他们企图造成广大战士与广大造反派对立，激化矛盾，扩大事态。司令部命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解放军战士的行动，不围观，不辩论，对战士要友善，不能和战士搞对立，一旦发生矛盾立即撤离。我们的口号

1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94—95页。

2 独立师支左办公室成员七二〇事件后揭发，见《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6页。

3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94页。

是：‘向解放军致敬’，‘向解放军学习’。”¹

23日，独立师政治部发出内部密件“怎样识别左派”，指出“右派”的标志是“搞假夺权”、“有个人野心”、“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冲击军事机关”，对待干部和党团员的态度等是区分左派和右派的标准。文件确认工人总部等为右派组织²。

27日，武重工三司夺取了该厂工总控制的厂广播台。牛怀龙、蔡炳臣根据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指示，派出一个排由副师长陈福明带领前往该厂，支持工三司完成这一行动³。

27日，二司驻京联络站传回中央文革办事人员阎长贵的谈话：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用社论对照二八声明，有错误就改正，不要坚持错误，反托派是错的⁴。二司司令部立即召集各总部开会，传达了这一意见，决定认错。消息传出，工人总部头头前往军区请罪⁵，承认二八声明的错误。香花派阵脚大乱。

同日，武汉军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成立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省、市此机构均简称“抓办”），陈再道在会上讲话说：“要解放一批干部，为了搞好春耕生产，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镇压反革命，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孔庆德说：“现在有人喊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这是反革命。”

李承弘在回忆录里记述了工总总部决定向军区“请罪”及总部“人去楼空”的情况：

“2月下旬，在湖北剧场内一个房间，总部开了一个会，决定认不认罪。开始双方争论不休，我、李洪荣、姜诗存等人主张认错，朱鸿霞、胡厚民、胡崇元等反对。”“但感情代替不了理智，下面基层纷纷倒旗的不少，宣布脱离总部的也有，动不动造头头反的事例层出不穷，从下面来的压力最大”。“会上，田国汉是主张向军区请罪的，田主要从全国形势讲，典型

1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94页。

2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3 《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1967年10月）第11页。

4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95页。

5 1967年4月6日发布的“军委十条命令”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之语，为毛泽东加写。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是湖南湘江风雷、河南二七公社、四川等情况。主要观点归纳为一句话，笔杆子搞不过枪杆子，还引用林彪政变经的事例以为佐证。田在会上发言很有说服力，谁斗得过枪杆子？胡崇元、朱鸿霞开始转变态度，最后胡厚民也无奈点头同意。”

第二天，工总总部及下属组织头头二三百人排着队从红楼前往武汉军区“请罪”，一位普通军官接见。“朱（鸿霞）递上请罪书并表示要见军区首长。此人不接请罪书，严厉斥责我们：赶快回去，回到原单位劳动，等候审查。”

“我们热脸挨冷脸，自讨没趣，灰溜溜地散了。我认为这是工总最丢人的一件事，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为此事应承担一定责任。”

“3月中旬后，总部的人都相继离开了红楼，朱鸿霞回了武重，我和胡厚民没有回厂，回家休息了。”“3月17日晚被抓的前几天，工总实际上已停止正常工作，在红楼的总部已人去楼空。”¹

第三节 策动保守组织“重新组织起来”

三新、工造等毒草派与军区有一个短暂的“蜜月期”，不到一个月。毒草派对军区的态度从怀疑、不满走向对立，开始于军区力图恢复已自行解散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同时策动原职工联合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

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1966年12月28日致信张体学，说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社会上风传江青讲话说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联合会自行开大会宣布解散。但其成员对工总基层战斗队到处打砸联合会办公室、将一般成员抓起来游街一直心怀怨恨，批判二八声明给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的机会。以原名称恢复组织有诸多不便，于是在军队、地方各级当权派的策划、鼓动下，另打旗号成立各种组织，并开始串连。以俞文斌为首的红武兵是在军方积极支持下成立的，武汉市医药工业公司系统的红药工是公司武装部长出面组织的²，谢敏华组织捍卫毛主席路线造反大军是牛怀龙亲自动员的³。这些组织也加入毒草派行列批判二八声明，而三新、工

¹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95—197页。

² 陈世清《回顾文革十年》，载湖北武汉纪念“七二〇”三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主编《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一辑》（1997年）第307页。

³ 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

造等认为围绕二八声明的争斗是造反派内部的事情，因而从不与这些重新开始活动的保守派组织联系。在广泛而激烈的关于二八声明的大辩论中，这些保守组织的声音显得极其微弱。

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在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反路线后就逐渐停止活动，其成员一部分参加造反派，一部分成为“逍遥派”。至1967年3月，两个总部及各高校红卫兵师、中学红卫兵各区分部虽然已不存在，但都没有发表文告或开大会正式宣布解散，而当时中央文革对“老红卫兵”的“破四旧”还是肯定的。在这样的情势下，与暗中策划成立工人的保守组织不同，军区支左指挥部以极大的力度，公开进行恢复大专兵、三字兵组织的工作。正如陈再道在七二〇事件后所说：“大专院校三字兵，中等学校的三字兵，都是保旧省委的。已经几个月的斗争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我们就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又把保守派势力扶植了起来。过去他保省委，以后又扶植起来保我们。……看他们保军区，保我们，所以就很亲热，就扶植，把它重新组织起来。说他干部子弟多。”¹

3月8日上午，武汉军区支左办的信俊杰部长、省军区张竞副政委与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政法尖兵等七个组织（均为毒草派）的代表座谈，主题是大专院校红卫兵问题。

此前，各高校原大专兵已经重新成立组织，武测、华师有“一月风暴”，水院有“一月革命”，华工有“春雷”，湖大一些大专兵打出原旗号。3月4日，华工二系学生王某等就大专兵问题走访军区支左办公室，支左办公室人员答复说大专兵可以“组织起来”，“大专院校红卫兵在运动初期是有成绩的，后来犯了错误”。这些同学回校后立即成立了“换新天”²。

在二司的主要院校，大专兵活跃起来。3月8日左右，水院共产主义红卫兵（三司）和“一月革命”（大专兵）举办“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览”，展出时间二十多天，每天接纳数千观众。16日晚上，武测三司、大专兵“一月风暴”联合砸了二司司令部，并扬言要把二司司令部赶出武测；3月下旬，夺取了二司红武测总部控制的广播台。在此前后，二司各院校的广播台大都被三司和大专兵夺走。红水院同学首创“穷棒子广播台”——用马粪纸做成喇叭进行宣传，这一创举很快推广到二司各院校。

1 《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2 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282页。



1967年2月11日《新华工》报刊载的文章

在这个座谈会上，张竞对大专院校红卫兵问题发表了正式讲话(五条)，明确提出允许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同学们起来革命，“但这个组织不宜再恢复，因为恢复不利于当前的大联合”，中学红卫兵则应当按中央的指示“复课闹革命”（意思是更不存在恢复组织的问题）¹。毒草派对张竞讲的这五条表示满意。

3月9日，三司负责人拿着起草好的不同意恢复大专兵的声明去军区请示。军区负责人说：“三司当心走到自己反面去了！”又说：“三司一向是最讲策略的，最能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我们是信得过的。”三司负责人立即道歉，并保证类似事情再不会发生²。

11日下午，军区支左指挥部召集新华工郭保安、聂年生开会，宣布撤销张竞8日所讲“五条”，表示军区决定支持大专院校红卫兵并恢复其基层组织。同一天，武汉军区发表“声明”说：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是两头好，中间有错误（“两头”即文革初“扫四旧”、斗黑帮，近期批二八声明、支持武汉部队的二一八严正声明；“中间”指保工作组、保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支持其恢复基层组织³。15、16日信俊杰、张竞来华工召开规模较大的座谈会，16日陈再道召见杨道远，都重申了支持大专兵的决定。华工各造反派组织已于1月底实现联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红司成员占全院师生员工百分之八十以上，当时正在考虑解放干部、成立院革委会的问题。军区一再鼓动早已自行解散的大专兵恢复组织，红司成员认为这就是“复辟”，绝不接受。

1 详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275—276页。

2 《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见《七月风暴（增刊之三）》（1967年10月）第11页。

3 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198页。

中学红卫兵（三字兵）在1966年10月后基本退出学校，在社会上也基本没有活动。1967年2月下旬，市人武部提出对三字兵的十六字方针：“肯定成绩，指出错误，承认组织，鼓励革命”¹。1967年3月28日，武汉市人武部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3月6日成立）派工作组（两天后改称支左小组）进驻武汉一中，被较早质疑武汉军区支左方向且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的一中造反派称为“第二个文革工作组”。当时一中各造反组织已联合起来成立“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工作组决定筹备小组内必须增加两名三字兵代表。三字兵没人在学校，工作组就去他们家里把人找来，在筹备小组会上对他们说：“我们是来给你们撑腰的。”²在此期间，武汉的三字兵逐渐活跃起来，并成立“特别行动委员会”（时称“特动”）。他们的活动多是打砸造反派的联络站、广播站，在街头袭击造反派成员，对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实行恐吓、绑架、抄家。3月底，新一中开始“反逆流”，三字兵就经常来一中寻衅闹事。在武昌，三字兵把矛头对准实验中学（当时改名“红旗中学”）“红十月造反公社”，经常深夜闯进学校打、砸、抢、偷，一次在白天砍伤“红十月公社”负责人。5月3日，他们绑架了支持造反派的省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任爱生，几经转移，最后关押在与实验中学一墙之隔的二十二中。5月18日，任爱生不堪凌辱跳楼致重伤，被造反派救出送往医院抢救十一小时后苏醒。三字兵还抄了孟夫唐、刘真等人的家。5月27日，二中特动成员在街头打死二十中二司学生张昌森。

第四节 “三月黑风”

进入3月，武汉军区在对香花派进行了强大的舆论批判后，开始了实质性的打压举措。镇压的工具，与文革初“五十天”主要使用“反革命”“右派”的帽子不同，而是大规模动用军队、警察和监狱。同时也敲打毒草派，警告他们不要重蹈工总、二司的覆辙。

造反派在3月底发动“反逆流”时，认为武汉军区在3月份里的作为，

1 见《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同志给市武装部并军区的一封公开信》（1967年5月23日），载武汉工造总司宣传部编《红色工人造反报》1967年第十四期。实际上十六字方针是武汉军区提出的。据《陈、钟叛乱集团的内幕——一个军代表的笔记摘抄》[载市委机关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七》（1967年8月18日）]:“3月9日，巴方廷向市人武部支左人员传达武汉军区的意见：第一，对‘三字兵’的看法：肯定成绩，指出缺点，承认错误，鼓励革命”。

2 钟逸《孔庆德副司令员《答新一中革命小将（革司）》手迹由来》（网文，2004年）。

是呼应发端于北京的“二月逆流”，于是把1967年3月对造反派的打压称之为“三月黑风”。

3月1日，武汉部队军事接管市电信局，独立师出动六个连加一个排共961人，宣传车7部¹，对工总电信分部头头和各战斗队头头以及部分一般成员实行“军事看管”。13日，电信局军管会发布第三号通令，正式宣布工总电信分部为“反革命组织”，勒令分部各级头头到军管会登记。同时没收电信分部的旗帜、袖章、印章及文件资料，解散电信局另一造反派组织“红卫军电信纵队”。18日，军管会召开“批判、斗争电信分部反革命滔天罪行大会”，会上正式逮捕工总王安能等4人²。电信局军管后，造反派与北京及外地的联系被切断，群众组织发往北京的电报需经电信局军管会审查。

1日军区发表“给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开信”，谴责一部分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号召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同少数头头划清界限。当晚，武汉军区对前往请罪的香花派各组织负责人表示：对二一八声明不准在公开场合发表反对意见，要清除掉所有与二一八声明观点不同的大字报、大标语，不准挑动群众把矛头对准解放军；不同意见可在内部辩论。当晚，有二司成员对二司头头产生怀疑，分赴红楼和红旗大楼造他们的反³。

3月1日，武汉军区对长江日报、武汉广播电台实行军管。

3月4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说，关于二八声明的“十分激烈的大辩论”，“一般的仍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总部和二司的广大战斗员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他们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形形色色的‘秋后算账’派斗争很坚强、很勇敢。他们是我们亲密的阶级兄弟。”“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曾经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批臭了的保皇组织和铁杆保皇分子”“一起跳出来，串通一气”，“抓住革命派内部矛盾，煽阴风，点鬼火，颠倒是非，制造混乱，扩大革命派内部分歧，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中混水摸鱼，进行阶级报复。无产阶级革命

1《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11页。

2参见《钢工总电信兵团大事记》，原载1967年12月23日《电信战报》。下文关于市电信局文革运动的记述，也参考了这个“大事记”。

3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派的同志们对此必须百倍警惕。”

这篇社论表达了毒草派的意愿，也受到香花派的欢迎。军区支左指挥部当即表态说“三四社论是大毒草”，“比二八声明更毒”。5日，湖北日报编辑部发表《重要声明》说，“本报昨日社论”“有严重的原则性政治错误，最主要是大方向错了，特此声明撤销”。9日，湖北日报编辑部发表《沉痛检讨我们在三月四日社论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一文。军区随即发动批判“三四社论”，压制毒草派。

3月5日陈再道在家接见省委机关保守组织“省司”负责人，说原省委秘书长张华等人以极左面貌出现，要注意，二八声明肯定错了。次日，省军区召开省直机关“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陈再道说：“为了实现大联合，必须彻底批判二八声明，把二八声明的幕后策划者和炮制者揪出来。在二八声明上签名的组织，支持二八声明的组织，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必须作公开检查。”¹

军区发动的对二八声明的批判，不仅在社会上而且在各单位展开。批判活动一般由军管会、军训团、军代表主持，保守派人员积极参加，香花派的一般群众也要检讨、请罪。3月8日，以独立师副政委武方侗为首的军管会进驻省公安厅。省公安厅批判二八声明历时四十余天，四五十名造反派成员（全厅造反派一百七十余人）在大会小会上做检查，并受到批斗；有4名造反派头头被整材料，其中2人拟拘留，厅机关造反组织红司下属11个战斗队只剩下两个²。

1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2 参见（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四十六：武方侗在公安厅所犯罪行》（1967年10月4日）。

3月6日，武汉市人武部组建“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作为“领导权力机构”，21日改名为“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3月上旬，军区对九一三控制的武钢广播台实行军事管制。3月1日，孔庆德在省军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说红旗大楼“像一个土匪窝子一样”¹。3日凌晨，市人武部驱离进驻红旗大楼已数月的造反派学生（次日由29师一个连接管）。学生撤出后举行游行，呼喊“我们想念毛主席”“革命无罪”“武汉二司，战旗不倒”等口号。同时，军区派部队进驻设有造反派广播站、联络站的井冈山大楼、中南旅社、民众乐园，设有工总、二司总部的红楼等地，将造反派一律驱离。

3月16日，陈再道、钟汉华找杨道远谈话。钟说原大专院校红卫兵守纪律，听话，讲政策；二司不讲政策、不守纪律，毛泽东思想太少。钟还指责二司“要夺军权”。对此，杨道远一一予以反驳。陈要杨道远“整顿组织，通过整风把队伍整好”²。

当日，二司整风办公室召开大会，宣布司令部开门整风。

3月17日深夜，独立师部队逮捕工人总部各级负责人483人，加上随后抓的共594人³。这次行动由牛怀龙、蔡炳臣指挥，动用十八个连加一个排（其中8199部队六个连，15军两个连）共两千二百余人⁴，公安人员配合行动，由逮捕对象所在单位派人带领至其家中实施抓捕。此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求抓捕数百人的名单及材料，“一批又一批地报来”，独立师准备实施第二次大抓捕，因4月6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而搁置⁵。

3月18日，工造总司、三司等组织为纪念二一八声明发表一周月在武测运动场召开“控诉工人总部滔天罪行大会”，近两万人参会。部队也有人参加了会议，并派出武装巡逻队维持会场秩序。发言者控诉了井冈山

1《揭穿孔庆德的反动嘴脸——二揭陈再道的死党》，载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主办《新湖大》报第37期（1967年9月2日）。

2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98页。

3参见赵振杰1967年8月在汉口高级步校“革命造反派控诉揭发陈再道大会”上的发言，载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1967年9月）第57页。

4参见《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11页。

5参见《赵学芳同志揭发牛、蔡疯狂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第26页。赵学芳1967年2月初至6月中旬在独立师支左办公室工作。

大楼指挥部和工总武锅分部的罪行。

是日，在工总“四大金刚”之一的武汉锅炉厂，原职工联合会成员宣布成立“三一八兵团”。兵团头头、老工人王道义后来参与百万雄师筹建，兵团也加入了百万雄师。

21日，武汉军区对武汉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抓办）撤销，成立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简称抓指，社会上仍习惯称抓办）。傅兆才（市人武部部长）任指挥长，刘惠农、伍能光等任副指挥长，巴方廷（市人武部政委）任政委，王德清（市人武部副政委）、辛甫等任副政委。抓指仍由市人武部党委直接领导，作为全市“领导权力机构”负责指挥各条战线工作，各区局也建立相应机构。原抓办中造反派观点的工作人员，基本被清除。6月4日发布的军区公告提到：“在建立这个机构时，有的没有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对有的干部出来抓生产，同革命群众组织充分商量不够，有的则没有商量。”而3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指出：建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要实行“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三结合”。

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时称“三二一通告”）发布，“通告”说：

特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现将有关问题通告如下：

一、对这个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后台，采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立功赎罪的政策，区别对待，彻底查处。

二、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头目，凡自动投案，彻底坦白认罪者，允许他们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给予从宽处理。抗拒、破坏和畏罪潜逃者，予以严惩。

三、参加这个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牛鬼蛇神，一律不准改换姓名，伪造历史，再混入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如有破坏行为者，要依法严办。

四、这个组织中的群众是受蒙蔽的，是要革命的，一律不予追究。他们应当迅速醒悟过来，自觉地与其反革命头目严格划清界限，积极揭发和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

众帮助捉，如果不捉的话怕就要跑。”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下，有的单位材料还没有报上来，带回的材料当时只有二三十份。蔡政委和牛师长说：“不要材料啦，算了，算了，我们有多少算多少。我们有个名单。”8201也不知道在哪里搞了个名单，工人总部的常委；四大金刚就是武锅、武重、武船、武车等主要分部；各个大的分部如江岸等区分部，全部主要头头都在名单上。在公安机关来讲，1950年镇反时也不像这样，起码还有个年龄、籍贯、参加那个组织、什么职务或者主要罪恶等。而8201提供的名单，有的只有个姓名，连个年龄都搞不清楚，其他就更不用谈了。当时我们在思想上是通不过的，我们觉得办案不能这样搞，什么也没有，只有个名单就抓人，我们还从来没有这样抓过。蔡炳臣和牛怀龙还说：“军区首长有指示要逮捕”。

按当时的法律规定，逮捕就是掌握了确凿的犯罪证据，抓进来以后，就由检察院起诉，法院判刑。拘留就是掌握你有犯罪活动，为了控制你，不使你犯罪继续扩大，或者说不使你进一步犯罪，把你抓到公安局来，进行审查。够条件就转逮捕，再由检察院起诉，法院判刑；不够就教育释放。

8201和军区就根本没提拘留，都要逮捕。当时我们看到只有名单，思想上已经让了一步。就提出是不是都改拘留算了？要是逮捕，抓了几百人，将来都能判刑吗？牛怀龙说：“这个意见倒也对，改成拘留。”这样才确定改为拘留，这个拘留证就是我们市公安局开的。对只有名字，没有年龄、籍贯，职务都搞不清的人，我们还是不主张抓。8201参加这项工作的政治部主任、保卫科干部等，说你们这个思想要跟上呀。我们当时说好吧，念一个名字我们一点头，或一摆手就过去了。

3月17日晚上，从一点钟开始行动，到天亮为止，抓了483人，还有一些要追捕的。电台架在市公安局三楼，一个分局分几个连队，带着报话机、步谈机跟我们一块去干，仓促上阵根本不叫办案。这就叫抓人，叫镇压。出了很多笑话，因为只有名字、没有年龄、单位，也找不到地址，有抓错人的。我们对工人总部陆陆续续一共拘留了594人。拘留后就牵扯到办案问题，马上组成班子进行预审。

办案时不是先落实这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有什么人能证明这个人犯了罪、有什么证据、有什么旁证材料，再去抓这个人。而抓工人总部的人只有一份名单。武汉军区印出十大罪状，总得有点什么根据吧？可是根本

不是那么回事，要我们拿这十大罪状去对照，一拍桌子向人家去要你把打游击的底交出来，人家没有打游击，怎么交待呢？不是有根据再抓人，而是对照十大罪状叫人家承认。这十大罪状是军区抛出来的，我们原来以为是有根据的，实际上没有根据，而是我们按这十大罪状去追根据。当然越追就越追不出根据来，许多罪状根本找不到头绪。军区搞这么一手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¹。

对造反派各级头头的抓捕扩展到省内各专县。20日，孔庆德在荆沙地区万人大会上宣称：“搞造反夺了权的，一律无效，由军队一律夺回来。他们打砸抢是土匪行为，夺权，是想当官嘛！破坏生产，冲击军事机关，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他们既然出了笼，就不能让他们回去。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已经宣布解散了，他们破坏生产，头头都抓了，你们晓得吧！？”

4月6日，在军区与三新、三司的座谈会上信俊杰说：“工人总部、二司的处理是征求过你们的意见的。”“对于二司的问题，你们说二司是犯了错误的革命组织，你们要求改组二司司令部，我们同意了，现二司在整风，我们觉得他们整得还不深刻。”听到红司主要负责人关于信俊杰这次讲话的传达，红司司令部成员、宣传部副部长张建华的感觉是：“我当时还蒙在鼓里，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军区在工总、二司问题上曾和三新等主要头头通过气。”²独立师参谋长郝文德在1967年7月11日至14日举行的师党委扩大会上说：“工总的材料是新华工调查的，武汉军区‘三二一通告’是新华工同意的。”³

对于信俊杰、郝文德的上述讲话，郭保安的回忆录里有不同的说法。郭保安回忆：三二一通告出来前，军区又请郭保安等去座谈。“在场的有陈再道、叶明等。叶明说，据他们调查，工总中确实混进了坏人。我说，工总中有无坏人我不知道，我们也管不了这个事。二八声明是大毒草，但我们认为，虽然他们搞以我为核心是错误的，他们分裂革命队伍，但他们和我们都还是革命组织。我们也不认为工总是坏人操纵的组织，不能说组

1 赵振杰 1967年8月在汉口高级步校“革命造反派控诉揭发陈再道大会”上的发言，载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1967年9月）第55—57页。

2 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18—219页。

3 《看！郝文德的丑恶嘴脸》，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30页。

织坏了。”“工总的情况我不了解，你们说有坏人，我也没有看见，哪个群众组织的领导敢说他们组织没有一个坏人呢？我也不敢说红司（新华工）内没有一个坏人！”“我去了军区二三次，总觉得不是平等商谈，而是变相地接受命令似的，使人很不舒服。再通知我们去，我就借故让张立国和其他的副司令等人去。这就是历史真相。七二〇前军区首长确实接见过我们，对二八声明是大毒草，观点一致，武汉军区二一八声明虽说事先没有看到文本，我们也能接受。但是三二一通告我们一开始就是不同意的，说什么三二一通告是我们同意的，甚至于还说我们派人和军区一起整理工总的十大罪状，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就是无稽之谈了。”郭保安还说：“从大军区三二一通告中我们完全看清了他们和我们反对二八声明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说二八声明是大毒草，是让香花派的造反派提高认识，不要再分裂革命阵营，干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团结一致与走资派斗争。而军区的目的则是要把工总、二司等香花派打成反革命组织。他们对我们说工总内混进了坏人，在三二一通告却说该组织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要解散、要取缔。用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欺骗我们。难道说毛主席、党中央文件中讲军队内混进了坏人，军队也要解散、要取缔吗？”¹

新潮大红八月公社“怒海轻骑”1967年8月在一篇文章中说：彭勋等人参与“炮制《二·一八严正声明》”，“参加起草并通过《三·二一》通告”²，但是没有举出证据。

工总早期负责人彭国华也曾向军区提供整工总的材料³。毒草派在社会上公布的关于工总问题的材料很多，有一份标题为《撕开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画皮》的铅印小册子影响较大，1967年3月7日印行，署名的组织有十七个，除本地的工三司以外，其余十六个都是外地高校驻汉联络站，其中有北京矿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大校文革、北京地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的驻汉联络站。

进入3月，武汉军区对造反派特别是工总在“一月夺权”时建立的各级临时权力机构不予承认，重建机构取而代之。1967年8月《新华工》报

1 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2 参见新潮大红八月公社“怒海轻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各派政治势力及其活动的阶级分析》，载《红八月公社》报、《钢九一三》报合刊（1967年9月）。

3 《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11页。李承弘回忆：“彭国华老年时要求向工总赔罪，他承认向陈再道之流提供过材料”。（见《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41页）。

发表文章，将武汉军区的这一举动称为“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夺权”，将新建的机构成为“二凑合伪政权”，并列出一一些实例：

2月初工总、九一三、二司等成立的“湖北省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在高压下已经停止活动。武汉军区于2月27日组建“湖北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名义上“合并”了工造、三司、三新等于2月初成立的“湖北省红色造反者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很快就以各种理由，将造反派的工人、学生、各厅局干部的代表排斥出去。军区不顾造反派激烈反对，发文将姜一、夏世厚、张旺午、韩宁夫任命为副主任，文件注明群众组织代表暂缺。

3月6日，武汉市银行系统军管，当即宣布造反组织红尖兵1月17日的夺权“是反革命夺权”。

28日，国棉三厂造反派头头被保守派逼着“跪下”，“用盘子托着大印交了权”。

同日，毒草派的二机床厂八一七也“被迫交权”。军代表李盛丰在会上宣布：“八一七非法夺权无效，一切权力归捍总（该厂保守组织）”¹。

¹ 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第十四章 “揪‘武老谭’”与“牛鬼蛇神一扫光”

谭震林是“二月逆流”中冲在前面的代表人物。在全国造反派高喊“打倒谭震林”之际，武汉造反派把陈再道视为武汉地区的“谭氏人物”，认为他和谭震林一样仇视文化大革命，仇视造反派，一定要揪出来。

5月16日，武汉地区保守派的联合体“百万雄师”成立，它的核心口号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它所谓的“牛鬼蛇神”就是指造反派，或者说是“接纳了大量牛鬼蛇神的造反派”。

第一节 造反派共同“反逆流”

杨道远回忆：

3月10日下午，新湖大“红八月”战士在二司最困苦的日子，首先向二司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集体前往二司所在的武测、华师等校进行串联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我们想念二司战友”，“坚决支持二司战友起来革命”……给了二司战士很大鼓舞。当晚，武测二司战士一千多人游行到湖大，对他们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新湖大战友高呼：“新湖大与二司战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激动热情的情景，非亲临其境难以想见¹。

3月22日，水院学生邓子政写出大字报为刘少奇鸣不平，并与同班同学辩论，认为毛泽东是搞宗派斗争，引起水院造反派愤怒，把他拉出来在校内批斗。同时在三镇街头展开宣传，提出邓子政这一举动是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一个反映。各校二司学生纷纷游行到水院，声讨邓子政为刘、邓翻案的行为。新华工、新湖大也到水院游行，公开喊出“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口号。

4月2日，红司（新华工）首届红代会开幕。郭保安致开幕词说：目前武汉市“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向革命造反派实行白色恐怖，

¹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31页。

把武汉地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他们扶植已经垮台的保字号组织如大专兵、乌兰牧骑等，使之死灰复燃，他们镇压、勒令解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二机床厂的八一七和毛泽东思想红色革命敢死队等；他们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红司（新华工）、新湖大；他们妄图把二司广大战士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趁革命造反派整风的机会大搞反攻倒算、秋后算账，……凡此种种，这就是武汉地区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¹

张建华回忆：3月24、25日，新华工司令部举行会议，“针对同学们对武汉军区支左的强烈不满情绪”，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经过激烈辩论，得出一致意见：

1. 武汉军区从支左以来扶植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2. 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向党內走资派夺权的关键时刻，“二月逆流”的流毒及“带枪的刘邓路线”是当前最大的危险；
3. 重新杀向社会搞调查和发动群众，宣传反复辟逆流，号召工人起来革命，调查各工矿企业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调查工人总部的问题，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4. 考虑到必须维护解放军的崇高威信，在具体做法上不点陈再道、钟汉华等军队领导人的名，宣传中暂不提军区支左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问题，但我们要用行动支持工人总部和二司，支持他们顶住打压，尽快振作精神，坚决起来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²。

这时军区也不信任毒草派了。“红司司令部25日的会议后来被武汉军区看成是红司‘左’和‘右’的分水岭。他们认为3月25日以前红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左派的革命组织，而3月25日以后就是右派组织了。”³28日陈再道在军区与三新负责人座谈时说：“你们（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的组织就那么好？人人都是左派？”⁴三个多月后，蔡炳臣说：“三新二司应有区别，三新前段和后段应有区别，如能很快回头正视自己的错误，还应一如既往。我们过去和新华工、新湖大都是有感情的，当时他们不打砸抢，不搞经济主义，对军队合作。三月二十六日正式决定杀向社会，

1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编辑部《新华工》报13期（1967年4月12日）。

2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06页。

3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09页。

4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10页。

起了促使二司、钢八司、工总起来的不好作用。”牛怀龙说：4月初开始揪武老谭，“三新，特别是新华工，起到了主要作用。”¹

30日，三新负责人在湖大开会，作出决定：

1. 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并把它作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2. 为公开我们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决心，5日毒草派举行全市大游行，8日在武测召开批判刘、邓、陶的誓师大会。
3. 组织群众做社会调查。既要调查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也要调查工人总部和二司领导层的情况，特别要核实武汉军区公布的所谓《“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片集的真伪。
4. 关于二司，为了有利于目前的斗争（不让军区找借口），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了解二司头头们对二八声明问题的认识，决定在没有看到他们公开的文字检讨前，暂不和他们以组织的名义一起搞活动²。

25日红司司令部会议还决定：27日召开纪念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41周年大会，会后进行大游行，向社会公开新华工“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主张。游行一定要经过二司司令部所在的武测和工总朱鸿霞等头头所在的武重，表示对二司、工总的支持。支左指挥部得知此消息后表示不同意开会、游行，27日早七点来华工发表广播讲话，重申这一态度。纪念大会按计划召开，七千人参加。会后，数千人到武测、湖医、武大、水院等院校进行串连游行。游行队伍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乌拉稀（即华工“乌兰牧骑”，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中坚组织）入另册”“打倒刘邓陶王”“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向二司战友学习”“向二司战友致敬”等，受到这些院校二司学生的热情欢迎。郭保安是这次游行的总指挥，他看到“处于高压下正在向军区请罪的二司战友和新华工的战士抱头痛哭，热泪盈眶。一些二司的战友主动加入我们的游行队伍”³。

毒草派的“反逆流”宣传小分队与二司“向江城人民请罪”、“消毒”小分队在街头相遇，不再发生激烈的辩论，而是互致问候。两个月来因一·二六夺权、二八声明而起的对立情绪开始纾解。

1 蔡炳臣、牛怀龙1967年7月11日在师党委扩大会上的讲话，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4、12页。

2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11页。

3 参见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陈再道3月28日说：“二司以前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是有成绩的。但以后干了很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工人总部没干的他也干了。但二司广大群众是好的，头头也有好的，他们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¹二一八声明发布以来，军区一直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二司，给二司造成巨大压力。

就陈再道所谓二司头头“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这一问题，有二司成员前往司令部造反，要求头头们当面澄清。14日下午，在湖北商校运动场召开二司司令部负责人交待、揭发大会，类似的会这一段时间多次多处召开。3月下旬，二司基层成员自行成立的司令部整风办公室在水院召开“二司头头对质会”，当面质疑，让头头们当面把问题讲清楚。参加会的人很多，二司各校都来了人，矛头主要对着负责联系军内造反派的丁家显。这次会后二司司令部头头进行“开门整风”，头头和司令部主要工作人员上街“向群众请罪”。在此前后各总部也成立了整风小组，二司两级指挥系统基本瘫痪²。

柳英发回忆：3月16日陈、钟与杨道远谈话后不久，二司即进行“开门整风”。3月17日大逮捕后，二司司令部一些头头和工作人员及一些总部头头约二十多人，由方保林带队到省军区“登记”，写下姓名、所在学校、职务等，然后听训话，要我们开展整风，检讨错误。我也去了。二司成员上街“请罪”我没去。我在一个极小范围的会上（记得有方保林、张良栋参加）说：现在不宜整风。上海等地造反派整风是在夺权以后，我们这里谈不上夺权；现在整风只会予人口实。

4月1日，吴焱金的打油诗在工造司令部大门外贴出：“造反大旗举到今，今朝为何脚步停！且看老保嚣张样，忍让战友狱中吟？反动逆流掀巨浪，这样才好考验人。奋起反击莫彷徨，紧跟主席向前进。”汉口火车站工总头头石楚铭和诗写道：“黑云红笔在交锋，江城又是烈火熊。”³

毒草派的学生此时提出“为战斗队员平反”的口号，意思是工人总部确有“坏头头”，二司和九一三等香花派则提出“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

1《陈再道接见湖北“三新”“三司”代表的讲话》，载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1967年9月）。

2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3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37页。

翻案”，但毒草派、香花派都认为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打击造反派、扶植保守派，支左工作的方向完全错误，这是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必须起来反击。

3月28日，原市长刘惠农（时为市“抓办”第一副指挥长）在有关干部会议上说：你们前一段挨了整，受了委屈，不要紧。现在牛鬼蛇神都跳出来了，要一网打尽¹。29日，支左指挥部负责人在华师作报告称：“凡是与反革命组织工人总部穿一条裤子的都是保皇派组织”“谁死保二八声明，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三司和三字兵成员将这两句话写成大标语张贴²。

也就在28日，属于毒草派的新一中毛主席路线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在汉口水塔大字报墙贴出《把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重新点起来——致广大革命的原战斗队队员的公开信》。公开信说：广大战斗队员在某些问题上犯错误，那是“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问题，决不允许走资派对他们进行“反攻倒算”，“重新骑在工人头上”。广大战斗队员“是革命的闯将”，“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走资派“最害怕你们”。“广大的革命的战斗队员们，起来吧！起来战斗吧！起来击退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公开信的空白处写满了战斗队员的留言，很多战斗队员到一中串连，看大字报，索取材料。

3月29日，武汉军区编制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集在武汉街头广为张贴。关于这个图集，周恩来后来说：“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³。

3月下旬到7月中旬，武汉造反派的大字报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现大量诗歌。1968年1月钢九·一三武钢分团《武钢战报》、钢二司红武测总部、钢工总青印（青山印刷厂）兵团编《狂飙曲》一书，收入这一时期出现的诗歌84首，一些当时流传甚广的街头诗没有收入，比如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创作员白桦的诗。白桦这一时段的18首诗，被钢工总宣传部、红司（新华工）宣传部、新湖大红八月公社1967年8月编成诗集《迎着铁矛散发

1 毛泽东思想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市委总部办公厅革命造反派团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惠农罪行大事记（从二月黑风至七二〇严重政治事件）》（1968年3月10日）第3页。

2 《武汉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2—6）》，载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赴沪战团等编《向陈再道讨还血债》（武汉专刊）。

3 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38、39页。

的传单》。同时编成的还有新华工抗暴艺术作品专辑《火炬颂》，收录40首诗和一个独幕话剧《虎口逢亲人》。钢二司红水院、钢工总新人印（人民印刷厂）1967年10月编《江城壮歌》收录诗歌78首，三司革联宣传部1967年10月编《骨硬心红——武汉三司革联艺术作品选》收录诗歌25首、文章6篇。



在血泊中高歌！
流血牺牲呵，
为粉碎身上的枷锁，
为毛泽东思想照遍中国！

工人阶级的硬骨头，
革命路上打先锋。
我们无产者呵，
不能忘掉光荣的斗争传统！

下面的两首诗选自《狂飙曲》，大概写于1967年3月底至4月。

战斗吧，工人战斗队
钢二司新民院一兵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
战斗吧，
工人战斗队！

熊熊的烈火，
在焚烧着旧世界的枷锁。
不屈的战斗队呵，
英勇的工人弟兄！
起来吧，
战斗吧！

在烈火中前进，

工人战斗队，
英雄的弟兄！
起来吧，
战斗吧！
我们宁可站着死，
不能跪着生！
对着死，
我们放声大笑！
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战斗，
我们冲锋！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
战斗吧，
工人战斗队！

赠武汉造反派战友

梁上泉

阳光空气水，诚然是宝贝；
还有大民主，比命还宝贵。
舍得一身剐，才能大无畏；
左派不夺权，无罪也有罪¹。

第二节 “揪出武汉的谭震林”

解散工人总部后，武汉军区多次公开表示二司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4月1日，军区邀请新华工、新湖大、三司负责人座谈，研究帮助二司整风。新华工、新湖大后来决定不派人参加二司整风，相信二司自己能够整顿思想作风。当天上午，二司整风办公室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三万余人

¹《狂飙曲》原注：梁上泉——青年诗人，曾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打成反革命。此诗是他从北京回重庆路过武汉写给武汉革命造反派的。

大会，庆祝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等大字报十周年，会后举行示威游行，一路呼喊“高举造反有理大旗，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打倒谭震林”“打倒武汉的谭震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等口号。

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文革后官方所著武汉党史说：这篇社论是“由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和‘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提供的材料写成的，经王力修改的”¹。

社论说：“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这篇社论立论基于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对造反派学生的压制，特别注意到武汉的情势。社论给武汉造反派以很大精神鼓舞。陈再道文革后也讲到这篇社论的影响：“三月中旬，我和钟汉华又奉命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开始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矛头直接指向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意在反对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随后，林彪、关锋、戚本禹等人，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炮制出‘军委十条命令’。这样一来，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都放了出来。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他们违反中央规定搞‘串连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直接对准武汉军区。”²

造反派开始“反逆流”时，口号是“揪武老谭”，不久就直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在批判陈压制造反派、否认武汉前一段文革成果的同时，也揭露他生活腐化的事实。保守派的舆论坚决拥护陈再道，他们主要用大标语宣示陈司令员脸上没有麻子，陈司令是老革命，是长征

1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1978）》第511页。

2 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载《革命史资料》第1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6月版。

途中“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之一”¹。长征时在红四方面军的陈再道参加中央红军的“强渡大渡河”，使得熟读长征历史的大中学生啼笑皆非，写大字报说“保保（造反派对保守派的谑称）真好玩”。至于陈再道的生活腐化，他本人在1967年11月30日作检讨时承认自己“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²

人民日报四二社论发表当天，武汉地区各校造反派纷纷集会、游行。水院二司同学在串校游行途中，议论在二司名称前加一个字，表示“整不垮”的决心。提出“硬”“铁”等字眼后，“钢二司”被大家认可³。4月18日召开的二司第二届红代会确认了这一名称，随后工总、九一三也自称钢工总、钢九一三。造反派内原来的香花派、毒草派改称钢派、新派。

4月3日，三新、三司和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在湖大25号楼开会，商讨4日共同召开批判刘、邓大会并举行游行事宜。双方在主席团成员、参会组织、大会口号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军区不同意二司进入主席团，三新认为二司是武汉主要的造反派组织之一，必须有代表进入主席团。三新主张二司打各总部旗帜、戴二司袖章入场，三字兵和大专兵只能以个人名义参会，不打旗帜不戴袖章。信俊杰说：二司的性质正在转化，问题还没有定案。他们的错误与大专院校红卫兵、中学红卫兵不同，二司的错误更大。大专兵是不是保守组织还需讨论，你们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如让二司参加，就必须也让大专兵和三字兵参加。在大会口号问题上，军区不同意喊“打倒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三新认为武汉存在谭氏人物，应该喊这个口号。在这些问题上，三新和三司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协议：“打倒谭震林”这一口号大会上不喊，游行时喊不喊由各组织自行决定；大专兵、三字兵不打旗号、不戴袖章可以进场，否则不准进场；二司不以司令部的名义参加，可打各总部的旗帜进场，二司代表不参加大会主席团。

4日中午1点40分大会开始，中学红卫兵打着旗子进场，负责维护

1 1967年4月武汉市人武部副部长陈志发在市工商局说陈再道是“强渡铁索桥的十八勇士之一”，见市工商局反戈战士《愤怒声讨市武装部巴方廷等一小撮坏蛋的反革命罪行》，载武汉新华农（东方红）《新华农》报第1期（1967年9月5日）。经常自称百万雄师主要“笔杆子”的汪扬，在1993年陈再道去世发给其妻的唁电中，还说陈“是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99页。

2 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463页。

3 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58页。

秩序的新湖大学生阻拦无效，被解放军战士大量放入，一些人冲上了主席台。新华工要求表态，三司负责人吴穷抢过话筒拍桌子大骂，会场十分混乱。三新、二司等退出会场，会议在三司和军区的主持下继续进行，参会人员除解放军外，群众组织只剩下三司和三字兵、大专兵。吴穷发言说“为了维护解放军的声誉，会议不要给坏人破坏了”。这一天，三司和造反派正式决裂；部分三司成员也退出会场，三司革联从这一天开始酝酿。

三新、二司等退出会场后到湖大重新集会，会后游行，队伍长达几公里。这天，三新等提出了两个口号：“揪出武汉的谭震林”“还我新生湖北日报。”¹一度因二八声明尖锐对立的造反派内部的两派，在“反逆流”运动中重新走到一起，“香花派”“毒草派”的称谓成为历史。

4月6日，《中央军委命令》（时称“军委十条”）发出。毛泽东曾对送审稿作了多处修改，并批示“此件很好”。陈再道后来说军委十条是林彪等人“炮制”的，违背他清楚知道的事实。陈、钟当时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意识到武汉军区的作为偏离了中央精神，所以独立师准备就绪的抓捕工人造反派及红教工、红工兵等组织头头的第二份抓捕名单，被搁置下来。军委十条指出“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量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2、3月受到压制的武汉造反派有利。

4月初，水院、武大、华工、湖大等校造反派贴出“提着脑袋质问陈再道”“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全错了”“炮轰陈再道”等大标语和大字报。红武兵、三字兵、三司等四处张贴“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全然没有错”等大标语。

4月6日，以华工六五级学生鲁礼安为首的新华工敢死队，贴出大字报《敢死队向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挑战》，历数武汉部队支左办公室“支保不支左”、“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事实，指其“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打支左之名、行支保之实”“为武汉谭震林张目”。鲁礼安文革后写回忆录，像当年痛骂抵制文革的支左办公室那样痛骂文革，但写到这张大字报的影响，极为得意：“‘挑战书’极大地宣泄了久被压抑的造反派学生的郁闷不平的心情，呼出了大家想喊而不敢喊出的声音，所以反响极大，一时‘挑战书’不胫而走，迅即传遍武汉三镇。在汉口最热

¹ 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16—218页。

闹的六渡桥江汉路一带，甚至出现了每间隔三五步，就贴有一份‘挑战书’的‘盛况’。可以说武汉地区自文革以来，还没有一张大字报像‘挑战书’这样广泛地被辗转传抄的。”¹

从1967年3月18日开始，鲁礼安写了多篇文章，有《巴黎公社的启示》《论二司的功与过》《三司在十字街头》《从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谈起——论必须为工总翻案》《从阿基米德的一句话继续谈——二论必须为工总翻案》《钢八司是工总翻案不彻底的畸形产物——三论必须为工总翻案》等，在武汉市影响颇大，为造反派所称道。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被公认是造反派的代言人，甚至被人戴上了‘鲁克思’的桂冠”²。鲁礼安写文章喜好引用马恩列斯语录，其实一些造反派称他“鲁克思”就是调侃他，至于“被公认是造反派的代言人”云云，则完全是他的自我感觉。钟逸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新一中绝食时，鲁礼安自告奋勇要求参加与孔庆德的谈判，为新一中“代言”，“把事情都交给我来处理”，被一中同学婉拒。他的偏激和极左，后来给武汉群众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祸害³。

4月8日，二司、三新和不认同司令部立场的三司成员共数万人集会，庆祝十六条发表8周年。会后举行游行，二司队伍走在前面。沿途群众自发地喊出“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等口号，游行队伍高呼“坚决执行十六条”“打倒谭震林，揪出武汉的谭震林”“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三司与部队另行召开庆祝会。原多数派红卫兵也集会庆祝，游行时呼喊的口号是“坚决拥护武汉部队公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当日，工人总部武汉锅炉厂分部三百多名战斗队员打着用四十多个工总袖章拼成的旗帜，举行长途游行，队伍经过水院、武测、武大、省委、湖大等处。次日，武锅工总五百多人在武昌闹市司门口举行工总武锅分部重新树旗大会。此后，工总各兵团、分部纷纷重新树旗。保守派将工总基层组织重新树旗和树旗后的组织称为“复活工总”⁴。

8日晚，武汉柴油机厂数十名工总战斗队员戴上工总袖章，举着火把游行，呼喊“战斗队员要革命，就是要革命；战斗队员要造反，就是要造

1 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第156页。

2 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第162页。

3 参见钟逸《从新一中革司到中学红联》（网文，2009年）。

4 参见1967年7月13日《百万雄师》报第4版。

反”。“四八火把游行”在全市产生很大影响。

二司三中红岩战斗队头头谢保安回忆：

三中红岩这个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汉阳地区工总的基层单位重新组织人马，重新树旗。当时工总的各级头头基本上被抓入狱，基层组织全面瘫痪。我们去帮他们重新树旗，其实也就是借助当时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去帮助战斗队员重新组织起来。因为那时工总已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任何活动都被视为非法。记得那时我们制作了一批工总“战斗队”的旗帜（有的是他们自己准备的），按照事前的约定逐一地送到各个工厂的工人手里。虽然这些单位工总的头头已被抓，但战斗队队员还在，我们给他们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旗帜一插也就意味着他们又重新组织起来了。汉阳的枕木防腐厂、冷冻机厂、水泵厂，带钢厂、锻压设备厂、农机船厂、客车制配厂等，我们都去过¹。

工总被解散后的一段时间，战斗队员部分参加工造，部分人不参加任何组织，业余时间上街，参与辩论，交流观点，支持工造、九一三、三新、二司的行动，保护在街头讲演、贴大字报的造反派学生。这些人当时自称“钢八司”（意为八小时工作以外参加运动）。一些支持造反派的市民群众也自称“钢八司”。“钢八司”成为武汉1967年4—7月街头运动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9日，驻华工、湖大、武大等高校的军训团撤离。

8日，二司整风办公室发表《严正声明》说，根据调查，确认二司头头“一个也没有修”，决定全部回到原岗位，领导二司投入粉碎复辟逆流的战斗。10日，整风办公室宣布解散。

10日，二司武测总部夺回广播台。在此前后，水院、武大、华师等校二司先后从三司、大专兵手里夺回广播台。

1967年4月，军区派员到工造、三新做工作，要求工造、三新到军区开会，商谈筹备成立省、市革委会事宜，遭到拒绝。工造、三新明确表示：三结合必须有工总参加，军区必须为工总平反，释放工总没有问题的头头，换掉“修”了的头头。军区派员到工造司令部时，彭祖龙在场，他的态度比较松动，一号头头吴焱金断然拒绝²。

1 《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2 2019年4月余德亨访谈彭祖龙的记录。

第三节 新一中绝食事件

军区介入武汉地区文革以来，打压中等学校造反派的措施之一，就是不顾中学三字兵比大专兵消失得更彻底的现实，扶植三字兵恢复组织、恢复活动，在中学引起很大反弹。被“结合”进市抓办任副主任的原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1967年5月23日给市人武部部长傅兆才、政委巴方廷并转军区首长的辞职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初期，三字红卫兵由于受原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蒙蔽和欺骗，确实是一个保守组织。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特别是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个组织的成员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活动。在二八声明问题后，你们对三字红卫兵提出十六字方针，即肯定成绩，指出错误，承认组织，鼓励革命”。“在支左工作一开始，就过早地承认一个保守组织，而把它扶植起来是不适当的。而且据我了解，你们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全面贯彻上述十六字方针，而是肯定成绩多，指出错误少”。“你们帮助三字红卫兵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是很不够的。特别是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指出他们过去认错了人、站错了队、上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帮助他们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更为不够，很不得力。再加上在批判二八声明问题上，你们又主张依靠三字红卫兵，去批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就更造成了学生之间的对立”¹。

3月28日，市抓办向一中派出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当天就宣布：“对三个字红卫兵不能排挤，要重视他们，支持他们。二司的同学不认错，依他们搞下去，国家会变色。个别的坏家伙，还可以抓。”“三字兵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常委会（指一中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的复课闹革命领导小组常委会）。”30日，一中各造反派组织联合向工作组发出“驱逐令”，并在校内游行示威。4月5日，一中所有造反派组织（包括香花、毒草两派）大联合的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此前军区、市人武部、工作组极力反对，主要理由是这个联合排斥了三字兵。4月10日上午，新一中革司向市抓办提出4项要求：立即撤出工作组；交出工作组的幕后指挥者，交待工作组的“罪恶活动”；交出黑材料；工作组撤出前向新一中作检查。中午，新一中封闭工作组办公室，防止工作组转移材料；

¹《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同志给市武装部并军区的一封公开信》，载工造总司《红色工人造反报》1967年第14期，由武汉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供稿。

派出20名代表前往武汉市委大楼与市抓办协商，市抓办答应次日中午答复。晚上，工作组组长带领解放军战士以及外校三字兵来到一中取走全部材料。11日上午，市抓办拒绝了4项要求，同时责令革司负责人作检查。新一中学生多次与市抓办交涉无果，12日，数十人打着新一中革司的旗帜游行到市委，所提要求又被拒绝，于是开始在市委大楼前台阶上静坐，在校同学百余人闻讯迅速赶来参加。晚9时，新一中敢死队宣布绝食，直到市抓办作出满意的答复。

一所中学的文革运动问题，发展成为1967年2月以来武汉造反派对当权者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直接抗争。

13日起，新一中与新华工学生在洪山宾馆与支左指挥部交涉，军区党委也在研究对策和解决办法。“新一中绝食”的消息迅速传开，各学校、机关、工厂的造反派纷纷赶到市委声援，不少单位造反派的宣传队来到现场轮番在雨中为绝食人员演出，不断有学生、工人加入绝食行动，最多时有三千多人，前来声援、围观的约有数万人。三新、二司，清华井冈山、北京矿院东方红、新北大校文革、北京地院东方红、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驻汉联络站共22个组织发表声援书，表示“坚决支持新一中（革司）绝食战士的革命行动”。14日凌晨，孔庆德接见新一中、新华工学生，承认在一中的支左工作犯有错误；晚11点30分，经反复协商，孔庆德在洪山宾馆小礼堂写下给新一中革司的答复：

答新一中革命小将（革司）

- 一、派去的支左小组（工作组）决定立即彻（撤）出。
- 二、是谁叫派去的于四月十六日下午五时查明后告新一中革命小将。
- 三、工作组搞的黑材料和照片于四月十五日下午五时交新一中革命小将。
- 四、工作组犯有缺点和错误，要深刻检查。以上几点由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认真处理落实。

此复经军区党委研究通过

孔庆德 四月十四日

15日凌晨，孔庆德来到新一中绝食现场，宣布代表军区党委接受新一中的4点要求，要求学生尽快结束绝食，说中央文革也知道这件事了，希望你们爱惜身体，好好干革命。



事后工作组撤离，分两次交出5张照片，其他答复均未落实¹。此后造反派与军区的对立情绪持续增长，对军区支左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的抗争越来越多。

1967年3月26日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在黄石八万人大会上说：“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到处乱搞乱喊，搞得乱七八糟。”“你造反，造个卵子，造到老子头上来了。”从4月16日开始，黄石中学生“揪韩敢死队”和闻讯赶来的新华工敢死队一起，

在洪山宾馆与韩东山辩论了十天。韩终于承认在黄石的讲话有错误，并写下一张字条。武汉军区党委立即发表声明，称韩东山的表态未经党委同意，是无效的。

军区处理群众运动问题，多次进退失措，言而无信，在市民中威信急剧下降。

4月13日，外地高校赴汉造反派发表“关于强烈要求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同志的联合声明”，要求为工总平反。后来他们组成武汉工总五湖四海兵团，推动为工总平反和各分部重新树旗的活动。

14日，工总的一些基层骨干宣布工人总部联络站成立。5月14日夏邦银出狱，17日李承弘出狱，沈复礼、李洪荣于李承弘出狱前数日出狱。李承弘回忆：1967年5月中旬成立的工总临时领导小组，组长为胡崇元，副组长为沈复礼、夏邦银，成员有李洪荣、李承弘²。

工总联络站成立当天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当前武汉地区出

1 新一中绝食事件，参见钟逸《孔庆德副司令员《答新一中革命小将（革司）》手迹由来》（网文，2014年）。

2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03页。

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工人总部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坚定的革命造反组织，广大的战斗队员不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人总部不是反革命组织，就是要自己起来为工人总部翻案，决不能让文化革命半途而废；对无辜被捕的人，必须立即释放，彻底平反；呼吁广大战斗队员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支左指挥部表示不承认工人总部联络站。

15日，新华工、新湖大、新一中、新东中（东湖中学）及其他中学的二司学生再次进驻红旗大楼。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¹。

4月19日，陈再道、钟汉华在京向周恩来和江青等汇报武汉文革运动情况。当晚，钟汉华给武汉军区打电话传达“中央首长指示”：

“今天总理、伯达、江青等首长接见了陈、钟，中央除戚本禹同志外，都到了。我们向中央文革检讨了，工人总部的材料全部上报了，但中央没有批下来，我们就宣布解散了，从组织观点讲是有错误的。中央文革讲：这不算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说等中央批了以后再宣布解散。现在有这个规定，以后按这个规定办。工人总部肯定不能恢复！关于‘三字兵’问题，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解散。”“新一中问题向中央文革汇报了。江青同志说：我收到了一个假情况，说有三万人绝食。经军区调查只有300人绝食，连支持他们的在内只有3000多人绝食。陈、钟首长讲：我们可能抓多了些。江青同志说：人抓多了些，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真正的反革命不能放，从整个来讲，我们武汉地区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三司是左派，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²这个“中央首长指示”迅速传开，保守派受到极大鼓舞。

参加19日汇报会的陈再道秘书杨成荣后来证实：“江青同志根本没有讲话，总理的讲话也不是他们讲的那个意思。”³

1 周良宵、顾菊英编著《十年文革前期（65.11—69.4）系年录》（修订本）中册第988页。

2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1967年9月翻印。

3 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员1967年7月底在军区的揭发，载河南二七公社、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编印《武汉事件资料汇编》（1967年8月）。

穆欣在《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解放军报记者通过《情况反映》，连夜报到北京，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刊载这篇报道的《快报》送给陈再道并在这篇《情况反映》上指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七二〇事件后，陈再道证实所谓4月19日“中央首长指示”系钟汉华编造：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了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¹。

编造“中央首长指示”一事被称为“电话事件”。“电话事件”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影响到武汉地区文革运动的走向。

穆欣在《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4月21日凌晨两点，总政治部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4月19日参加汇报会时作的记录；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造反派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

“电话事件”的另一后果是，武汉造反派和相当数量的市民对武汉军区所有的文告、讲话都不予相信。

4月18日至20日，二司第二届红代会在洪山礼堂召开，会议主题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杨道远致开幕词说：刘、邓路线对革命路线疯狂反扑，“勒令解散武汉地区最早最大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残酷打击我二司和其他革命造反派，要尽各种手段，妄图置我于死地

¹ 《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载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469页。

而后快”；号召“揪出武汉大大小小的谭震林。把这帮坏蛋颠倒过去的历史再翻过来”。二司工总问题调查团在会上作专题报告，驳斥军区公布的工总“十大罪状”，说工人总部绝不是反革命组织，坚决要为工人总部翻案。

武汉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军区支左指挥部成员刘海江代表武汉军区讲话，对二司的态度有变化，他肯定二司是革命造反组织，希望二司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建立新功勋。他说：“革命小将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受到社会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正如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曾经在谈话中指出：你们这个组织所存在的缺点、错误一定能够通过整风，求得解决”。“我们支持你们，跟你们撑腰，作你们的后盾”。

18日，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致信陈、钟并军区党委，指出军区对待群众组织态度的错误，提出三条建议。而军区党委在此之前已将孟视为操纵造反派对抗军区的“黑手”。

同日，工总电信分部吴怀勉、王南平、刘闯、胡熙文、汤玉莲等与邮电学院二司成员在人民文化园开会，列举事实说明“武汉市电信局军管会执行了新的刘邓路线，陈、钟之流将电信分部打成反革命的所谓‘罪状’，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表示要为电信分部彻底翻案。

19日，三司近万人在武大召开三司革联成立大会，宣布脱离三司司令部。三新、二司等派代表出席大会，表示支持。

23日，工人总部联络站和九一三兵团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二司、三新等组织的代表在会上发言，一致认为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坚决为工人总部翻案。外地来汉的数十名学生申请加入工人总部得到批准，当场给他们戴上工总袖章。会后游行，队伍中出现工人总部的旗帜，得到围观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

24日，武汉部队自介入地方文革以来第一次在武汉街头张贴大标语：“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等。同日，支左指挥部指示各厂的军代表召开保守派紧急会议，要求全部驱离在工厂办联络站的学生。当晚，到处出现了驱赶新华工、二司学生，砸学生联络站的现象。

新一中绝食事件，是由一所中学的造反派独立发起并完成的，在中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造反派中引起很大反响。

当时，中学造反派一般参加大学生主导的全市性组织如二司、三司；也有参加三新的，人数相对较少。此外，还有大量造反派中学生没有参加这些全市性组织，在革司成立前，一中这类学生占全校造反派一半以上，比参加二司、新华工、新湖大的人数要多。当年3月7日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发布，新一中绝食行动成功举行又显示了一个学校的造反派不分“香花派”“毒草派”联合起来的力量，于是很多中学的造反派纷纷成立了大联合的革司。

文革前武汉市的十来所省市重点中学，比起其他完全中学特别是只设初中的学校，文革运动开展得比较深入，在社会上影响较大。此时除二司占绝对优势的武昌实验中学、三中外，二中、华师一附中及十六中、十九中、市实验学校等都成立了革司。这些学校的革司，都不属于任何全市性组织，迫切需要联合起来，很多中学造反派到一中串连，新一中也派人到各校就此问题进行交流，一致认为要向北京中等学校红代会学习，改变那种不顾中等学校自身特点，“盲目跟在大学生屁股后面跑的状况”，应该立即实现“中等学校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彻底改变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分散性和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于是，4月24日，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中学红联”）正式宣告成立，新一中革司负责人陈德胜出任



中学红联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一号勤务员。当时武汉地区普通中学共有165所，中学红联的成员单位有六十余个¹。

当时武汉地区有中等学校（普通中学和中专、技校、职校）三百多所，学生二十多万人。比起集聚在武昌高校区、大多为外地人的高校造反学生，中学生更广泛地贴近武汉的社会生活，对于越来越深入的文革运动中市民的遭遇和感受有着更感性的体验，所以他们比大学生更积极、忘我地投入1967年4—7月的全社会运动。

4月25日，武汉部队两万人武装游行，呼喊“镇压反革命”、“粉碎反革命逆流”口号。有三字兵登上军车参加游行，造反派硬把他们拉下车，与战士发生冲突。三字兵宣传造反派殴打解放军，冲击解放军游行。

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军委通知陈再道、钟汉华“可以回去了”，但其他大军区领导全都留在北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陈再道认为这是“电话事件”得罪了江青所致²。实际上，军队领导干部五一节在京活动安排是由周恩来、杨成武和萧华议定的。

4月29日，经二八声明执笔者雷志茂等赴京二司学生反复联系，得以在京西宾馆与陈再道辩论，二司、三新、工总、九一三、新一冶约三十人参加。

二司学生提出的辩论主题是：军区二一八声明中说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策划的”，军区多次说刘真是二八声明的“黑后台”，请拿出证据来。陈再道说：刘真看过二八声明。雷说：刘真事先根本没有看过，你陈再道也看过，都是在公开发表之后看的。起草过程我非常清楚，就是2月7日下午我在红楼写成的，当天晚上就上了报纸。雷又说：你们说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请你们把炮制者交出来。陈再道说：我现在不讲，没有足够的材料，我们正在核实材料。雷说：二八声明不是什么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而是革命造反派内一种思潮的反映，而你们偏偏再三说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现在，我这个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就在这里。这个问题关系到支左的方向，一定要追。一位二司学生说：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刘文治亲自对我说过，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就是刘真。2月底刘文治还说过，

1 参见钟逸《从新一中革司到中学红联》（网文，2009年）。

2 参见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第44—45页。

过三天就把刘真拉出来斗。而今天你们说从来没这样讲，这不是前言不对后语？你们说的话、做的事不认账还行？你们还有人说二八声明的炮制者是王任重。在场的二司学生说：炮制者你们要是交不出来，就说明你们过去是搞政治迫害。你们的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把他们关进监狱。你们的监狱关的是谁？你们不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一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小将，还戴上脚镣手铐，这是大方向？工总的工人情绪激动地讲述了工总战斗队员被压制的情况。

陈再道最后说：“我是有缺点，有错误，抓革命促生产、支工、支农、支左、军训、军管，一下子几万人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是新的，理解不够嘛！犯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和革命群众商量不够，有些地方包办代替，现在要改嘛！回到武汉以后召回干部好好再搞，接受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学习毛著活学活用。并衷心希望你们提意见，我们一定接受，并在实际工作中去改”。“二八声明有错误，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批判一下，责任不在革命小将，归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他们搞的，至于我们揪不揪，由我们决定。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真正有错误我们也改。对运动中缺点错误，你们提意见，批判，都可以，我们诚恳地听取、接受，而且在行动上改正，犯错误，我们要负责。”

历时六小时的辩论就这样结束。事后二司武汉工学院总部的陈大川将录音带回武汉到处播放，市民大多觉得这次辩论陈再道处于下风¹。

辩论涉及“四一九电话事件”，钟汉华说：那两条不是江青讲的，是我讲的，电话不是陈司令打的，是我打的……家里同志可能听错了，也可能传错了，我们可以向江青同志道歉，你们怎么看，可以批评我。

4月下旬，以红武兵为主的多个保守派工人组织开始在社会上活动，基本上没有大字报，有少数大标语，一些大标语直接写在造反派的大字报上。

29日这一天，保守组织与造反派发生多起武力冲突。武汉棉织厂红武兵数十人围攻贴大字报的华师二司学生，打伤二十余人，重伤9人。中南汽车制造厂工人战斗队召开重新树旗大会，红武兵前去冲击，打伤数人。汉口电池厂、省粮食学校、武汉机械学院都有造反派被打伤。在汉桥区武装部的指挥下，江堤、红光、永丰等四个公社约六千名农民进城游行，首

¹与陈再道辩论的情况，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271—276页。

先冲击为“营救夏邦银”在汉阳公安分局前静坐的造反派学生，又游行汉口民众乐园一带，打伤围观起哄的群众多人。

30日，《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发布，其中第四点是：“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不能作为革命和保守的分水岭。把一·二六事件和二·七事件看得太严重了，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而被逮捕的人，都应当立即释放，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处理除外。一切因此而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都应当立即平反。”中央提出的这一对待群众组织的原则，鼓舞了武汉造反派，他们要求军区按照这一原则解决工总问题。

第四节 “营救夏邦银”¹

1967年4月中旬，新华工聂年生、杨成江找到武汉三中二司头头谢保安商量，在汉阳选择一个被捕的基层工总头头开展营救，打开一个为工总翻案的突破口。谢保安回忆：“我与汉阳各厂的工总头头都比较熟悉，于是我向他们介绍了汉阳各厂被抓捕的工总头头们的基本情况，有汉阳枕木防腐厂吴元么、武汉冶金机械厂杜子美、武汉水泵厂周松柏和汉阳轧钢厂夏邦银。最后选择夏邦银，一是考虑到他入狱前在保守派中‘民愤不大’，二是夏邦银自身条件较好，本人是共产党员、真正的产业工人，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个人生活作风过得硬，没有任何把柄可抓。以他为突破口阻力相对要小一些。”

4月20日，新华工司令部听取驻汉阳联络站的报告后，决定以要求释放夏邦银为突破口，最后解决工总问题。

22日，新华工、二司、新湖大数百人集结在汉阳公安分局门前，杨成江、谢保安等组成的“临时火线指挥部”递交了《致汉阳公安局军管小组公开信》。军管小组几个军人出来，态度十分强硬，推说这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事；同时警告学生不要受坏人利用，不要冲击公安机关，如果越过警戒线就要开枪。造反派学生争辩说：逮捕夏邦银，又不敢公布他的罪行，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不得把群众打

¹ 本节的撰写，参考了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年）第十章血染江城、《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营救夏邦银”一节、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233—236页。

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的精神，违背军委“十条命令”中“不准随意捕人”的精神，我们就要干涉。附近的保守派闻讯赶来，围攻学生，谈话进行不下去。不久信俊杰来了，只说要向上级请示汇报就走了。

此后分局大门紧闭，对学生不理不睬。造反派学生持续二十二天的静坐示威开始。

学生们在分局门前搭起帐篷，挂起“营救夏邦银静坐示威火线指挥部”的横幅，架起喇叭，向围观群众开展宣传。独立师开来14辆宣传车，35个高音喇叭宣读军区解散工总的三二一公告，宣传陈再道、钟汉华、孔庆德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学生的“两个低音喇叭简直就像没有声音一样”。

谢保安回忆：

静坐开始后很快就得到社会舆论广泛的同情。首先是新华工的学生从关山游行几十公里，到汉阳来声援我们，上千人的队伍不仅声势浩大，而且组织良好，沿途的口号声打破了沉寂多时的局面。随后湖大、水院、武大的学生纷纷来汉阳声援，武汉三镇的中学生也不断有人加入静坐的行列，我记得军队著名的诗人白桦也到静坐现场表示声援，还有许多市民带着慰问品前来慰问声援。一时引发了全市性的声援高潮，汉阳公安局前的静坐现场成了当时反击二月逆流的一个前沿阵地。这个期间杨道远和水院的丁家显也来过静坐现场，水院的雷志茂、王文忠等人更是长住在附近的二十三中，他们和该校“红十月”的同学朝夕相处，在营救夏邦银的那段日子里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

除了汉阳的营救现场，我们还到市委去绝食静坐，要求释放夏邦银，持续了三天。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扩大声势和社会影响。

4月29日，由汉桥区武装部指挥，江堤、红光、永丰等四个公社千余名农民进城游行。游行队伍到达汉阳公安分局门前的静坐场地，农民用木制标语牌驱赶学生，拉倒帐篷，撕毁标语。

约在5月2日，汉阳公安分局军管小组同意与“火线指挥部”谈判。

谈判在公安分局一楼会议室进行。军代表说：你们冲击军事机关和执法部门，是一种犯法行为，必须马上撤离，否则严重的后果要由你们负责。学生代表反驳道：我们没有冲击军事机关、执法部门，我们是来跟你们讲道理的，是来要求公正执法的。你们把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关进监狱，凭什么？如果是因为他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你们抓



载 1967 年 4 月 17 日《新华工》报第 14 期

他，你们就是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如果是他本人有问题，你们抓他，我们要求公布他的罪状。否则就是你们违法，你们要承担严重的后果。军代表说，既然抓了人就肯定有问题，但不能给你们说。学生代表声明：你们不说清楚，我们就不撤离。

谈判十天没有结果，“火线指挥部”决定去找负责全市公检法军管的独立师首长。5月13日下午，牛怀龙师长和蔡炳臣政委接见了学生代表，态度友好。学生代表表达意见后，牛、蔡说：红卫兵小将静坐那么多天，辛苦了，我们关心不够，对不起。代表们放心，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当天，牛师长还招待代表们吃了肉丝面。”

5月14日晚上十时，汉阳公检法军管小组释放关押近两个月的夏邦银。汉阳轧钢厂的工人们簇拥着夏邦银来到静坐示威现场，“夏邦银站在用方桌搭成的台子上，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地呼口号。”

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发表，4月6日“军委十条”公布，武汉地区数万人参与的“新公校绝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夏邦银是在这种形势下被释放的。

谢保安说：营救夏邦银成功，是武汉造反派在与“二月逆流”抗争中难得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鼓舞了正在进行的新公校绝食斗争，坚定了造反派为工总翻案的决心。

第五节 新公校绝食事件

5月1日，三新、二司、工造总司、工人总部联络站、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16个组织组成的联合指挥部，组织了数十万人游行，庆祝国际劳动节，表示“誓死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任爱生参加了这次游行。游行队伍中同时出现“钢二司”、“钢工总”、“钢九一三”三面幅面很大的旗帜，此后就有了“三钢”的称谓。

5月3日，中央军委根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发出两个文件：《关于捕人权限的规定》《关于处理军内错拘捕和取缔、解散组织问题的通知》，着力解决前段运动发生的错误拘捕群众、解散群众组织的问题。武汉军区基本没有执行这两个文件。

3日，“把电信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在电信大楼前召开，会上宣布工总电信分部重新树旗。电信分部成员讲述电信局造反派所遭受的打压，邮电学院二司成员代表电信局问题调查组发言，一一否定电信局军管会公布的“电信分部的反革命罪状”。会上北航红旗驻汉联络站、工总联络站、新华工、中学红联等代表也发了言。电信局军管会当天发表“严正声明”、“致电信局职工一封公开信”，指出工总电信分部“非法”，“不予承认”。

5日下午各学生造反组织在湖大开会，讨论大联合的问题，决定成立“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负责人有新湖大张维荣、新华工聂年生、二司杨道远等。联合指挥部认为武汉地区正在出现的武斗呈现蔓延发展的趋势，呼吁公、检、法专政机构立即行动起来，制止武斗。6日，联合指挥部宣布成立。

6日，孟夫唐写出大字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武汉地区工人运动》，并就此问题致信陈伯达和中央文革。

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发布，文件第二条说：“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这个文件说到的成都军区在支左中出现的问题，和武汉的情况极其相似，而对武汉军区几乎没有触动。武汉地区造反派则增强了反对陈再道的决心。

5月8日，工造总司、工总、九一三等所有职工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武汉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

5月10日下午，工人总部联络站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工人总部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工总及各造反组织六万余人参加。各组织代表在发言中一致表示：工总是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革命造反组织，是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广大工人战斗队员是革命闯将，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为受迫害的战斗队员平反。会后游行，一路上有大量市民夹道欢呼、鼓掌。



1967年5月10日，纪念武汉工总成立半周年大会会场（载5月18日二司《革命造反报》）

工人总部被取缔及翻案的问题成为当时运动中心问题。这时，武汉市公安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公安军”（5月下旬改组为“公安联司”）在公安系统被军管的情况下，开始从自身职业的角度为工总翻案。公安联司成员赵振杰七二〇事件后回忆：

我们对照了军委十条命令，对照了中央对四川、青海、安徽、内蒙古等问题的处理，不管从哪方面对照，都认准了工人总部案件是有假的，武汉军区经不起检查。我们找了一些旁证，从预审的笔录、口供里收集一些

资料，陆陆续续从各方面收集了大量材料。我们在5月17日第一次带着为工人总部翻案的材料到北京向中央首长反映，在6月17日第二次带着为工人总部翻案的材料到北京向中央首长反映。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党中央，来到了毛主席身边，我们汇报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用我们的党性和生命向毛主席保证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向中央首长保证，五百多个案例，有已经放人的，还有没放人的，不管那个案例，抽查一下，随便拿出一个来，交给公安部办案的同志看看这个案能不能立案？这个人算不算犯罪分子？如果能够算，那这个案就不该平反，武汉军区就搞对了，如果不能够算，那就赶快给人家平反，不能再搞下去了。

到了4月初《中央军委十条命令》颁布以后，他们在内部很保密，根本不给我们讲。后来我星期六晚上回家，在前进五路看到用红布抄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我的心凉了半截子，想到工人总部这个案子整错了。管工人总部案子的8201的一个姓车的科长给我们穷打气说：“十条命令中央本来是内部传达的，二司瞎搞，搞出去了。”牛怀龙师长连夜就来到我们这个预审班子召开紧急会议，牛师长说：“工人总部的案子是经过中央批的嘛，要错嘛就错在我们身上，我们负责，大不了我师长不当嘛。责任不在你们那里。”因为市公安局已有前车之鉴，去年八、九月份大抓南下一小撮时，市公安局抓了159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典型、很具体的表现。这次再抓个594人，心里确实很虚，这时就很泄气。可是牛师长又来打气，说什么工人总部的案子经过中央批了，中央点了头的，你们想这抓人的事不向中央报告行吗？他说了这样一些骗人的话，当时我们觉得这个事不对头，就找了市公安局军管会提出，第一工人总部问题面抓的宽了，有些可抓可不抓的抓进来了。另外一个意见，应该很快释放人，错了赶快放。当时公安局的号子很拥挤，尤其是江汉分局，在花楼街的一间小房子关二、三十人，腿都伸不开，天又热，虽然是4月份，那几天还是叫劲的。军管会对我们阴一套阳一套，说放人我们是积极去放，你们赶快搞，问题在你们嘛，抓紧时间赶快搞，该放就放嘛。只字不提平反，不提搞错了的问题¹。

5月，按中央的要求，武汉军区组织的专案小组重新审查工人总部案件，

¹ 赵振杰 1967年8月在汉口高级步校“革命造反派控诉揭发陈再道大会”上的发言，载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1967年9月）第55—57页。

两个月后，形成了三大卷维持原结论的材料，准备向中央报告。

5月10日，市公安系统保守派二百余人（以江汉分局人员为主）整队来到市公安学校，要“教训一下”在公安系统比较活跃的新公校红司，行动前曾与该校保守派商议。他们覆盖、撕毁红司的大字报，与红司学生冲突，当时红司学生多不在校，被打伤十余人。次日，红司学生前往市公安局军管会，提出肇事者承认错误、军管会严惩凶手等七点要求，交涉无果。当晚，红司负责人开会商定，12日再去交涉，得不到答复就静坐，静坐不行就绝食。13日下午，因静坐无果开始绝食。最先来声援的是新一中¹。中学红联负责人陈德胜带领新一中数十人前往市公安局，在市局楼外张贴大量大字报、大标语，宣布新一中参加绝食，并将绝食现场由市公安局楼内移到楼外。

14日，新公校红司发布“绝食公告”，提出七项条件，要求市公安局军管会答复：

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

江汉分局出动了大批警察开汽车到武汉市公安学校毒打我新公校红色造反司令部的战士。我新公校红司的战士大多数受伤，现在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在流血事件发生的前后，我们将此事向武汉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汇报数次，但是武汉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置之不理，直到现在仍不表态。在此情况下，我们新公校红色造反司令部采取了革命行动，宣布从5月13日下午6时30分在市公安局开始绝食。

武汉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不答复如下条件我们死不罢休：

1. 承认我们绝食斗争是革命行动。
2. 必须立即交出并坚决严惩打人凶手。
3. 在15日内交出并严惩五·十流血事件的幕后指挥者。
4. 要求将五·十流血事件交革命造反组织及军管会严肃处理。
5. 将受伤的革命同志立即送进医院治疗和住院。
6. 保证我新公校红司战士和全市革命造反派的人身绝对安全。
7. 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

望全市革命同志密切注意事态发展，大力协助和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

¹ 2018年5月14日余德亨采访原新公校一号头头王登富的记录。

新公校红色造反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¹

14日，中学红联总部决定：除继续派人协同新公校坚守市公安局现场，新一中革司在汉口中山大道民众乐园段、新汉阳铁中革司在汉阳大道钟家村段、新华师一附中革司在武昌武珞路阅马场段，阻断车辆通行，设置绝食场地。17日，二司司令部发布“紧急命令”，号召二司成员投入绝食斗争。中学红联、二司等和工人、市民数万人参加绝食，青山红钢城、解放大道武胜路口、洪山宾馆门前、武汉军区门前也设立了绝食现场，三镇交通要道为之断绝。新湖大张维荣、工造总司吴焱金、二司杨道远、公安联司田学勤和新公校张兴旺组成“五·十事件火线指挥部”。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及首都红代会各学校也发来电报声援，正在武汉访问的巴中友协（马列）秘书长果索伊女士来到现场表示支持。

造反派的这次行动，事后被称为“新公校绝食”。

新公校绝食期间，红武兵、百万雄师多次冲击三镇的绝食现场，以5月17日发生在汉阳钟家村的一次最为严重。16日深夜，百万雄师汉阳分站头头彭开发向汉阳公安分局军管小组组长（独立师某团参谋长）和独立师参谋长郝文德请示，计划第二天夜里将在钟家村绝食的造反派学生“连锅端”。郝文德说：“你们要我们表态，你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如果我们公开支持你们，那三新二司又说是武老谭搞的。”当晚，独立师在汉阳的宣传车、宣传队、执勤部队全部撤出。17日凌晨一点左右，五百多名武装人员突然冲击绝食现场，造反派二百多人被打，数十人受伤，14人重伤。造反派两次打电话给独立师师部作战值班室求救，牛、蔡指示按兵不动。汉阳公安分局军代表请示是否前去制止一下，牛、蔡指示他们关紧大门，切断楼内外电源²（造成汉阳分局无人的假象）。

谢邦柱回忆：19日，绝食现场晕倒的学生越来越多，有学生开始绝水、拒绝输液。当日晚，在军区门前静坐、绝食的造反派将近万人。指挥部与军区钟汉华、杨秀山的谈判久久没有结果，新一中敢死队越过军区门前的警戒线，率先冲进军区，包围了谈判会场。钟汉华为了“不致使事态扩大”，

¹ 钢二司新华师总部新华师报编辑部《新华师战报》第25期（支持新公校红司绝食斗争专号，1967年5月18日）。

² 参见（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四十：梁明、郝文德在“五·一七”大血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1967年9月22日）。

于20日凌晨五点同意了新公校提出的七项条件，并与张维荣共同签署了七项协议。谢邦柱等请钟汉华到新湖大宣传车上向军区门前的造反派宣读了协议后，担心钟汉华反悔，将他和几位警卫战士带到湖大。谢邦柱等立即乘车来到市公安局绝食现场，宣布了七项协议，指挥部吴焱金随之宣布“绝食斗争胜利结束”¹。

七项协议全文如下：

关于新公校“五·十”事件的七项严正声明的协议

一、新公校和广大革命派两万多人，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得不采取了绝食斗争。斗争结束后，武汉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必须保证不对参加绝食斗争的革命群众进行任何政治迫害。

二、5月10日发生在新公校的流血事件，是江汉分局和江汉公安联合总部出动大批民警殴打革命小将的、严重践踏《十六条》的政治迫害事件。对此，武汉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必须立即严惩打人凶手。

三、由新公校、公安战士、公安军协助军管会马上组织调查组，查清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按其情节进行处理。

四、将受伤的革命同志和在绝食斗争中身体受到摧残的革命小将，在斗争胜利后送进医院治疗和住院。

五、坚决执行《十六条》，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保证新公校（红司）战士和全市革命造反派人身绝对安全。今后发生武斗时，必须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保护革命造反派。

六、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由军管会立即发出内部通报，教育全体公安干警。

七、新公校等革命组织在绝食斗争过程中，身体所受的摧残，应由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负完全责任。

武汉军区政委

“五·十”事件火线指挥部代表

钟汉华（签字）

张维荣（签字）

67.5.19.晨 5:05²

钟汉华被造反派送回军区后，陈再道立即推翻钟汉华与造反派达成的协议，他说：“这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这

¹ 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² 新湖大临委会宣传部主办《新湖大》报第17期（1967年5月22日）。“协议”签字日期有误，应为20日。

个签字无效，（签字）必须经过党委。”¹21日以军区支左指挥部名义发表的《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指责造反派冲击军区，打伤副司令员杨秀山，绑架政委钟汉华²。同日钟汉华致信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张维荣，说他在协议上签字是为事态所迫，“宣布作废”。

钟汉华致张维荣信全文如下：

张维荣：

关于新公校“五·十”事件的七项要求，其中三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目前已知的事件的事实不能说是“出动大批民警殴打革命小将的严重的践踏《十六条》的政治迫害事件”。你们错误地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广大革命群众是通不过的。你们在“五·十”事件上采取绝食行动，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吃好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你们对中央文革办事组传来复食的电话指示，不执行，不宣布，这是错误的。更为严重的是，你们不但不立即复食，而且又动员更多的不明真相的人参加绝食，并数次冲击军事机关，包围、冲击谈判会场，隔离、围攻谈判代表，打伤杨秀山副司令员。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中，当时，我考虑到应使参加绝食的同学迅速复食，不致使身体健康受影响，不致使事态扩大，被迫在你们事前写好的七项要求上签了字，将此宣布作废。

为了妥善解决“五·十”事件，我认为必须按照中央文革办事组“有问题通过商量的办法解决”的指示精神，由新公校、江汉分局联合总部各指定一、二名代表，协同市公安局军管会进行调查，然后协商处理。

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钟汉华 67.5.21³

军区负责人在与群众组织的博弈中，三番五次地事态紧急则敷衍，事态缓和马上推翻，两派群众对这样如同儿戏的执政方式都极度不满。

此时保守派攻击造反派“绑架、殴打钟政委”，新湖大将彭勋等人于钟汉华谈话、钟汉华和警卫员在湖大教工宿舍吃面的照片公布在宣传橱窗

1《陈再道在武汉军区的讲话》，载《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1967年9月）。

2参见《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载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471页。

3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红武测》报增刊第九期（1967年9月27日）。

里，还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钟汉华，你忘记了新湖大的鸡蛋面吗？”¹

新公校绝食事件中，造反派群众的广泛参与，使得1967年3月底开始的“反逆流”运动达到了高潮。

5月15日，二司司令部发出《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翻案紧急动员令》，指出工人总部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为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广大战斗队员是革命闯将。为工人总部翻案关系到如何对待几个月来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问题，关系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关系到能否击退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问题。

同日，王力、戚本禹在京接见湖北造反派代表。戚本禹说：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有意见可以说，方式要适当。应当坚决执行军委十条命令、中央对安徽问题五条命令、五条指示。凡是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立即释放。各群众组织应当整风，着重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许摆事实，讲道理，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²。

第六节 “百万雄师”成立

周恩来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百万雄师’是4月16日开始酝酿，5月16日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周恩来明确指出，百万雄师从酝酿到正式成立都是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

5月16日，武汉地区绝大多数保守组织的联合体——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宣告成立。

从1967年2月20日职工联合会解散到5月上旬，除红武兵外，保守派没有公开的全市性组织，也没有全市性的活动。其间军区希望得到造反

¹ 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² 1967年5月15日《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外贸部井冈山公社资料组翻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派支持而恢复大专兵、中学三字兵，这一努力基本失败，而不知会造反派、重新组织工人保守派的工作获得极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1978）》写道：“进入（1967年）5月后，随着武汉造反派联盟的形成，以红武兵为主的拥军组织积极谋求联合。”

造反派形成“联盟”，是为了全力对抗武汉军区，他们不重视甚至不知道工人保守派正在以不可想象的规模集结。在他们心目中，职工联合会已经与大专兵、三字兵一样溃不成军，零星的骚扰不足为患。当百万雄师这个庞大的组织横空出世，造反派没有思想准备。造反派各组织有那么多“动态组”“情报组”，都不知道百万雄师如何组织起来，它的头头姓甚名谁。

正如徐正全在回忆录中写到的那样：

大约从5月中下旬开始，形势急转直下。此前我们还认为这一次武汉军区恐怕顶不住了，再要像3月份那样动用专政工具来镇压肯定不行了。

“军委十条”已公布，再动用专政工具镇压群众，中央会出面干预，看来造反派胜利在望。殊不知，走资派多的是办法。这次，军队当权派直接启动组织程序，利用他们掌握的现成的武装基干民兵组织，按各单位组织系统，由县团级以下的小当权派牵头，轻而易举地就组建了“百万雄师”杀人队。因为是按组织系统组建的，组织自然严密，上面意图的贯彻自然流畅，且极具隐蔽性¹……

百万雄师常委、作战部长谢敏华回忆：“1967年2月底职工联合会垮台后，8201师长牛怀龙来到我厂，要我出来干。当时华工乌兰牧骑的头头周德武，还有几个大专院校红卫兵（都是干部子弟）长期吃住在我这里，可能是他们向牛怀龙推荐我的。”“百万雄师是五六十个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真正的组织者是我。开始时红星军、我的造反大军等组织头头在一起商讨、学习，建立联络点”²。

七二〇后独立师师部干部揭发：百万雄师筹建时，牛怀龙、蔡炳臣派五团参谋长方正去“掌握情况”，派三团参谋长王相荣率“调查组”去“帮

1 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61—62页。

2 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

汉仓储公司保卫干事，宣传部部长）、陈德松（后勤部部长）、蔡俊善（武汉列车电站基地工会主席，政参部部长）。百万雄师在武汉市除洪山区外的七个区加上东西湖农管局都设立了分站，分别任命了分站长和政委¹。

红武兵成立时，一号头头是武汉啤酒厂工人申耿生。他说：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成立，“人武部的杨参谋两次找我谈话，要我退出联络站回（红武兵）司令部把俞文斌换去，说我是工人，能力有限，‘百万雄师’组织庞大，担子重，负责联络站的工作有困难等等。我也觉得自己缺乏能力，搞不了，同意回司令部。后来因为我回去晚了几天，俞文斌等人还开会指责我不执行司令部决定，有野心，想搞第二个百万雄师等等。”²

在军区二一八声明发表、保守派再次投入社会运动之际，1966年9月至12月间的那种景象——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大小辩论会、街头自发的辩论小圈子如火如荼、日以继夜，大字报贴满街墙，传单满天飞，再也看不到了，保守派对造反派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用棍棒、铁矛说话。百万雄师总站最重要的一个部是作战部，有三名常委在该部任职。

组成百万雄师的主要组织，如俞文斌为首的红武兵、谢敏华为首的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大军等，都是在军区、独立师、各级人武部的动员、支持下成立的。

百万雄师成立前，武汉市机电局武装部干事俞文斌“把中央所有在汉大单位及武汉市各区、局的武装部长都找来开了个会”。俞文斌回忆：百万雄师成立后，“市人武部派了127部队两名军人跟着我，一个叫杨爱忠，河南人，是武装干事；另一个是科长，叫张有富。他们的任务，一是联络，将我们的情况上传下达，我们组织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联系都是通过他们两人。二是对我进行重点保卫。他们不穿军装，穿便衣，与我同吃同住，24小时形影不离。”³章迪杰2015年在回忆录中写到此事，仍然感到自豪：“这种亲密无间的军民关系，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⁴

独立师牛怀龙、蔡炳臣指派师支左办公室负责与百万雄师总站联络，向武昌、汉阳、硚口、江汉等区分站派出专门联络员⁵。市人武部政委巴方

1 参见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30—33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3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4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66页。

5 七二〇事件后独立师整训期间支左办公室成员的揭发，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2页。

廷、副政委崔执中经常找百万雄师头头到汉口饭店开会，用军车接送¹。

关于红武兵的成立和发展，武汉官方党史记载：

1月底，以武汉各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和学校的武装基干民兵（绝大多数成员是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组织成立“红武兵”，并发表《造反宣言》，决心“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经过几个月发展的“红武兵”，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并形成了一个准军事性的组织，按行政区划分，一个行政区为一个兵团；按行业分，一个行政局下属单位组成一个纵队，到5月中旬，共有10个兵团、25个纵队，24万余人。在“红武兵”快速发展的同时，原来的联合会和红卫兵成员也成立了几十个新的组织²。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筹备期间，新华路中学教师刘涛、华工乌兰牧骑头头周德武等就以“红卫兵”（包括三字兵、大专兵）的名义参与活动。但他们都没能进入百万雄师高层，他们所代表的百万雄师组成单位之一、号称二十三万五千之众的“红卫兵”（分为“红卫兵武汉地区司令部”和“红卫兵武汉地区中等学校司令部”两个部分），也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百万雄师的一些下属组织中，有大专兵、三字兵以个人名义参与活动。如百万雄师二七分站所属七五四兵团有三个大专兵参与，水院的马小保（化名马军）、何德富（化名何军）开始负责宣传，后去北京办联络站；某校沙东雄（化名杨炼）开始任联络部长，后任副部长³。七二〇事件中，湖大校文革副主任、红卫兵师政委钱运录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随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人员行动，在被抓的新湖大师生中一一指认他们的身份⁴。

百万雄师的组织结构，从成立到消亡始终称“联络站”。其间关于是否改组为更权威的司令部，内部是有争论的。造反军准备另立山头；工三司在学生三司的支持下打算拉出去搞工代会；总站政参部曾计划撤销各组织的司令部，按系统建立统一的组织，造反大军头头罗伟泉等表示反对，他向独立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反映：“我们‘造反大军’与‘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意见有分歧，我们只同意‘百万雄师’搞联络机构，不

1 《“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18页。

2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1978）》第513—514页。

3 武汉市二七区革命组织联合调查办公室铁路片编《武汉百万雄师754兵团罪行录》（原件未标明印发时间，估计在1967年8—9月间）。

4 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同意搞权力机构。”¹。6月17日牛怀龙对前来师部“反映情况”的申耿生、罗伟泉等人说：“联络总站搞权力机构好，还是不搞权力机构好，我意见不搞权力机构好。到底怎样搞我们还要看一看，还要和大家研究。”²最终没有完成改组，市人武部的意见可能起了很大作用。6月初，市人武部副部长陈志发对俞文斌说：“你们联络总站不要把各司令部统死了，要让各司令部存在，如果都统死了，将来选革命委员会，你一百万人也只一个席位，让各司令部存在，你下属几十个组织就有几十个席位。……统死了你们将来会吃亏的。”³

百万雄师成立后制定的计划是：“抢占宣传阵地，舆论压到对方”，同时“横扫牛鬼蛇神”；然后组织领导干部集体亮相，在造反派组织被“一扫光”的情况下，“进行全省全市的夺权”⁴。

七二〇事件后中央点名否定的武汉地区保守组织只有两个——“百万雄师”和“公检法”。“公检法”是“武汉公检法联络站”的简称，它不隶属于“百万雄师”，组织的规模和影响远不能与百万雄师相比较，但观点一致，联系紧密。“武汉公检法联络站”是独立师对公检法系统实行军管后，直接支持成立的。4月21日，市公安局军代表参与策划的以市公安局干部李树春为头头的“红公安”成立，牛怀龙立即表态说“红公安是革命左派组织”。李树春从此经常出入独立师师部和市局军管会。红公安仅是市局五处（文保处）的组织，于是李树春和军代表策划成立包含全局28个单位保守派的“武汉公安”，多次召开筹备会。牛怀龙指示：“情况这样紧张，还不把班子搞起来？”李树春等拿出成立“毛泽东思想公检法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的计划，牛怀龙指示：“让他们（指市局各系统）各自按系统成立总部，然后搞联络站。”“武汉公安系统联络站”于5月20日左右成立。联络站成立后，市局军管会指派军代表到联络站作具体指示，参加活动。6月5日，公检法系统保守派联合举行拥护军区六四公告

1《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操纵“百万雄师”的一些反革命罪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3页。

2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3参见市机关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曾庆裕在斗争辛甫、林立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9月6日），另见《百万雄师内幕之九：革联与百万雄师关系点滴（四续）》（1967年8月21日）。

4参见《“庞然大物”现原形，纸船明烛照天烧——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载《七月风暴（第四期）》（1967年10月28日）第23页。

的游行，游行后，以“武汉公安系统联络站”为核心的“武汉公检法联络站”成立。6月8日，“武汉公安系统联络站”更名为“武汉公安总部”。武汉公检法联络站和武汉公安总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号头头李树春、二号头头汪仕奇都是市公安局五处的干部。

“公检法”除在社会上举行过两次游行外，其活动不为市民所知。“公检法”的活动，都与其职业特点和掌握的资源相关联。它派出王玉宝等三人长驻百万雄师总站，为其提供情报，参与决策和武斗现场指挥，审查总站人员（常委谢敏华、刘敬胜、汤忠云曾被审查）。“公检法”利用职务便利，并动用侦查手段，收集造反派组织和造反派的材料，侦查造反派组织及其据点的行动方案。百万雄师抓来造反派成员，“公检法”往往派人前去审讯¹。

“公检法”于七二〇事件后骤得大名，广为人知，是因为在七二〇事件中有突出表现而被中央点名。

和百万雄师同一阵线的组织还有三司、省直联司、市委机关革联、红旗联委、红武钢等。红武钢是武钢保守派的联合体，人数众多，有人长驻百万雄师总站和省直联司司令部以协调行动。这些组织建立了“勤务员联席会”和“联络员联席会”。前者由省直联司、市委机关革联主持。后者由省直联司主持，每周碰头两次。“公检法”、武空支左办、省军区支左办也参加了这两个联席会。从6月11日到7月26日，市委机关革联23次参加两个联席会的活动²。

16日，百万雄师在成立大会后举行游行。在汉口利济路，有围观市民向游行队伍起哄，被手持洋镐柄的红武兵殴打。下午三时，新华印刷厂工总举行树旗大会，该厂红武兵打伤参会的新华工、二司学生十余人，重伤9人。

百万雄师在成立的第一天以武力亮相，显示出这个组织最大的特点。章迪杰对此特点的解释是：“百万雄师从职工联合会的‘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规定中走出来，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

1 参见《“武汉公安”——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2 参见市机关红司人民勤务员总部、钢二司驻市委联络站《市委革联与百万雄师》（1967年10月26日）。

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口号。”¹谢敏华的解释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武装自己，不然就要挨打”²。

从百万雄师成立那一天起，直到文革结束后很多年，武汉市民对这个组织的印象就是：大街上呼啸而过的卡车车队，车上整齐地站立着头戴柳



百万雄师的武斗人员和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

条帽、身着崭新工作服、手执铁矛的武斗人员，车队末尾一般会有满载汽水、面包的后勤车；对造反派的围攻进退有序、令行禁止；无处不在的一个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百万雄师成立后，市委一批高干直接参与百万雄师的活动。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将市委组织部长辛甫等人介绍给百万雄师当参谋，“加强领导”。辛甫回答：“坚决站在百万雄师一边”。5月下旬，俞文斌等7人与辛甫、林立（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等在汉口饭店开会。主持会议的俞文斌说：“现在主要是反逆流，准备在5月底6月初大干一场。需要解决如下问题：1. 大造舆论需要人员，要求省、市委帮忙解决；2. 人员组织，现在力量很分散，有些大单位调不动，像武钢、武锅、造船厂等单位；3. 需要运输工具，到郊区接农民；4. 要求解决物资供应问题。”此后，经市抓办刘惠农同意，辛甫回市委立即向田吉品（市委组织部干部、市委机关抓办副主任、市委机关保守组织红造头头）等人作了具体布置。巴方廷派市人武部崔执中、王德清两个副政委和科长刘春学等人常驻市委大楼，配合田吉品等人工作。俞文斌对田吉品说：“你们的组织部、宣传部，干脆和我们合并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田吉品说：“马上这样办，恐怕不好，难以得到

1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41页。

2 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

中间派的支持。还是现在这样办好，你们在外面大干，我们在内部竭力相助。”¹

19日，“武汉地区高等院校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简称“高干联”）成立，17所高校的干部参加，其中有武测党委书记毛远耀（任一号勤务员）和副书记张肇翼、水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张如屏和副院长梁百朴、华工党委副书记熊小村、武大副校长刘宿贤、水运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乔英怀、武医党委副书记尹传亭、华农副院长徐志伟、外语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刘昂等。高干联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为工人总部翻案，打倒武老谭。张如屏向参加新公校绝食的学生捐献了钱款和粮票。

这一阶段，湖北省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孟夫唐任一号勤务员，其成员有省委秘书长张华、省委副秘书长刘真、宜昌地委第一书记杨春亭、省委农村政治工作部主任任爱生等；武汉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薛朴若任一号勤务员，其成员有市文化局副局长屠公博、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李长根等。参加革干联的干部，受到来自军区的压力，陈再道5月20日说：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这是逆流，要公开批判²；21日军区支左指挥部发表《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说：“孟夫唐之流赤膊上阵，幕前幕后煽阴风、点鬼火，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拼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极力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解放军，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达到保护自己，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³保守派除了用舆论围攻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还对他们进行信件恐吓、抄家、绑架。

新公校绝食事件结束，造反派“反逆流”的声势越来越大，参加的群众和干部越来越多，已被军区明令解散的工总基层组织纷纷重新树旗，21日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文告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发布的。

20日，自来水公司等单位的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手持木棒铁棍冲进江汉路新华书店砸东湖中学东方红广播站，抢走广播器材，打伤学生11人，其中重伤3人，打伤职工5人，其中重伤2人。学生向支左指挥部和江汉

1 参见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06—107页，另见市机关红司人民勤务员总部、钢二司驻市委联络站《市委革联与百万雄师》（1967年10月26日）。

2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3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公安分局打电话报案无果。

同日，工总运输公司分部在井冈山大楼前举行树旗大会，七百多名百万雄师人员前往冲击，打伤5人。晚10时，皮联、肉联、江岸区建筑公司等单位数百名百万雄师成员冲进市二医院，要抢走被他们打伤的造反派，上前阻止的群众被打伤九十余人。

总字127部队散发“周总理四点指示”传单，说三新、二司大方向完全错了；孟夫唐、刘真、张华操纵了反革命逆流；三新、二司停止活动，一律回校搞本校的斗批改；武汉部队全部出动宣传¹。伪造中央领导指示，成为部队一些单位、也成为百万雄师的一种习惯，钟汉华在4月19日的“电话事件”中为他们作过示范。七二〇事件中，汪仕奇为鼓舞正在衰落的士气，编造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百万雄师大、好、纯，要爱护它。”，被称为造谣者的最大胆量和造谣的最高水平。

5月21日凌晨，百万雄师成员冲进造反派“毛泽东思想广播战士”控制的省市广播电台，抢走大批广播器材。

5月22日，铁道部第四设计院保守派头头联系国棉二厂等单位的百万雄师武装人员五六百人，打伤该院造反派三十余人。同日，武汉制漆厂造反派集会庆祝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百万雄师成员冲击会场，打伤工总、二司、新华工各一人。

同日，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百万雄师成员、红岩中学三字兵与长办保守派造委，两次冲击二司驻长办修配厂联络站，打伤长办联司多人，两人受重伤。同日，肉联等工厂的百万雄师成员两次攻击市建筑工人学校，打伤13人、其中重伤9人，抢走广播器材。

23日，百万雄师汉阳分站进攻汉阳造反派据点之一的武汉三中，打伤二司红岩战斗队学生及群众数十人。

24日中午，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及红光公社的农民数百人，砸新华工汉阳广播台，打伤学生近十人；包围汉阳区委党校，打伤群众多人；六次冲击汉阳区委大楼，砸“五一七事件火线指挥部”，打伤造反派近百人。同时江堤公社一千多名农民在公社书记、主任带领下，由江堤派出所所长指挥，包围三中，二十多名学生被打成重伤。

26日晚，百万雄师攻击肉联厂工总战斗队，重伤13人、轻伤数十人。

¹ 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27日凌晨，三字兵因覆盖造反派的大字报与二十中二司学生发生冲突，二十中学生张昌森被打死。



造反派为张昌森举行葬礼（载《大武汉新影》）

27日中午，武汉机床厂百万雄师人员撕毁、覆盖该厂造反派大字报，打伤9人，1人重伤。当日，百万雄师人员殴打、在武汉电线厂门前宣传的新华工学生，抢走宣传品及器材，绑走新华工学生一名。晚上，三字兵捣毁新华工驻地地质学校联络站，打伤两名新华工学生。

据1967年8月印行的《武汉事件》一书所载：从5月下旬起，百万雄师开始在江岸区解放公园、江汉区江汉公园、汉阳公园和汉阳铁中、东西湖、东湖磨山等地，集结训练六万五千名武装人员，其中汉口三万人，汉阳二万人，武昌一万五千人。到6月中旬，百万雄师装备了木棒三万余根，长矛、钢叉六万五千余支，短刀、匕首万余把，安全帽六万余顶，军用钢盔五千余顶，改装的装甲车8辆，水上舰艇2艘，消防车十余辆，卡车千余辆。市抓办成为百万雄师的后勤部¹。百万雄师硚口分站宣传部副部长汪扬回忆：5月的一天，40辆崭新的汽车开进硚口分站设在育红中

¹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第34页。

学的武斗据点，停在操场里，随时调用¹。

5月28日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申耿生（武汉啤酒厂工人，红武兵头头）、蔡俊善在东湖长天楼研究行动方略：一、认清形势，整顿组织，由于武斗不力，指挥不灵，决定抽调各组织一号头头组成权力机构。二、今后任务分三个阶段：1. 集中全力扫平障碍，全面打垮造反派；2. 打垮造反派之后，搞大联合；3. 进行夺权。6月1—15日为第一阶段，16日—6月底为第二阶段，7月1—15日夺权完毕。

29日，工总数万战斗队员在中山公园门前集会，工人总部联络站负责人宣布恢复“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名称。30日晚，工总多个分部在井冈山大楼前举行树旗大会。

30日，省、市厅局级干部64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看法》，提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此前的23日，省军区政委周志刚对省直联司头头说：现在两个阵线比较明朗了，肯定地说三新、二司的大方向错了，现在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王（任重）、孟（夫唐）一边，革命的干部要表示明朗的态度。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罗明在省直联司头头动员下起草了这个“亮相”性质的“几点看法”，纪辉（省监委书记、省抓办副主任）、吕汉荣（省委财贸政治部主任）、饶兴礼（省贫协副主席）等签名。6月1日，省人委副秘书长麻佩三等22名干部发表声明，第二批“亮相”。4日，省直机关第三批169名干部集体签名“亮相”（第二天14人补签）。5日副省长王海山等10人、10日副省长夏世厚等10人分别“亮相”²。

31日上午，三司、工三司、省直联司、红卫兵、红武兵等十八个组织二万人在武昌体育场召开斗争孟夫唐（缺席）大会，批判孟夫唐“拉一派，打一派”，“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同日，武昌造船厂数百名百万雄师人员打伤该厂造反派百余人。重伤5人。百万雄师人员打伤武钢工校二司学生数十人。

至5月底，百万雄师的武力行动大多局限于某一单位内，规模也不大。

¹ 参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338页。

² 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第十五章 血腥的6月

第一节 百万雄师和军区的“武化革命”

1967年6月，是武汉文革中暴力和血腥的一个月。一直支持并一度直接指挥百万雄师的独立师在7月中旬也认为百万雄师“六月份搞武斗有些过火”¹。这个月里百万雄师发动数次大规模的围攻，给出的理由都是“制止武斗”，谢敏华、章迪杰文革后还是坚持这样说法。采访者问：几乎每次武斗都发生在造反派的“地盘”上，本来没有武斗，你们去了就发生武斗，这能叫“制止武斗”吗？他们回答：六一七是因为造反派包围了我们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人，六二三打水运工程学院是他们抓了蔡俊善，其他武斗我们总站不知道，是下面自己搞的²。

造反派头头杨道远、吴焱金、曹承义、彭勋等至今不认可“武斗”这一说法，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两派武斗，就是一派对另一派镇压、血洗。在1967年春夏，两手空空的造反派根本没有能力与整个官僚体系支持的百万雄师以武力相斗。他们说：如果搞文斗，大字报、大辩论，那就像周总理说的：“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³

百万雄师从上到下都迷信武力，他们认为职工联合会垮台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对工总冲击联合会的游行队伍、打砸其办公室、强迫其成员游街请罪没有还以颜色，而愚蠢地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联合会因此被打垮，所以百万雄师不能重蹈联合会的覆辙。6月上旬，在百万雄师总站和各分站头头会上，辛甫说：军区是爱护你们的，中央已经打了多次电话来，你们应当把集中在总站、分站的人分散。头头们不接受，说：“如果这样搞我们就又要走联合会的路，联合会就是听你们领导的意见听垮了。”⁴武昌铸钢厂职工、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张涛，1972年还对1967

1 独立师参谋长郝文德在1967年7月11—14日独立师党委扩大大会上的发言，见《看！郝文德的丑恶嘴脸》，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30页。

2 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

3 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24页。

4 市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年1月初联合会在省委静坐“被冲散打垮印象太深”，他对同厂的工总组织部长李承弘说：过去太老实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吃了大亏。所以1967年吸取教训，大刀长矛对付造反派毫不手软¹。

吴恒春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百万雄师的这一特点：“从百万雄师出现，一直到文化革命结束，我就没有记得和他们开展辩论或者说看到过他们任何一张大字报的事。除了一系列的武斗事件、死人事件，没有半点他们是用‘文化’的手段来搞这场运动的记忆。这个组织的特点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张建华不认识吴恒春，也没有读过吴的回忆录，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与吴恒春相同的表述：“百万雄师从不搞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人们只见过百万雄师的大标语，从来没有见过它发表过任何文章，极少看到它的大字报、传单。他们根本不理睬文革十六条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规定，而是一味地搞武斗。”“百万雄师最大的特点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

6月里，对百万雄师频频发动围攻，他们的高参辛甫看不下去了。辛甫对市委机关革联的头头说：百万雄师“不要搞武斗的东西，要抓大方向”；对百万雄师头头说：“你们不要再主动出击，要冷静，不能性急，急躁会出问题的，你们可以自卫嘛！等他们打你们的时候，你们打他一顿多好哩？要注意策略，要注意影响，要争取群众。”“不要公开杀得太多，注意影响。”²6月上旬，军区宣传部长夏夔对辛甫说：“百万雄师宣传工作、材料工作太差”³。

6月间发生的规模不等的暴力事件，《1967年2月—6月武汉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赴沪战团等编，1967年8月）记载19起，《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1967年8月）记载45起，《武汉地区武斗及反革命暴乱大事记》（武汉钢二司编，1967年8月）记载44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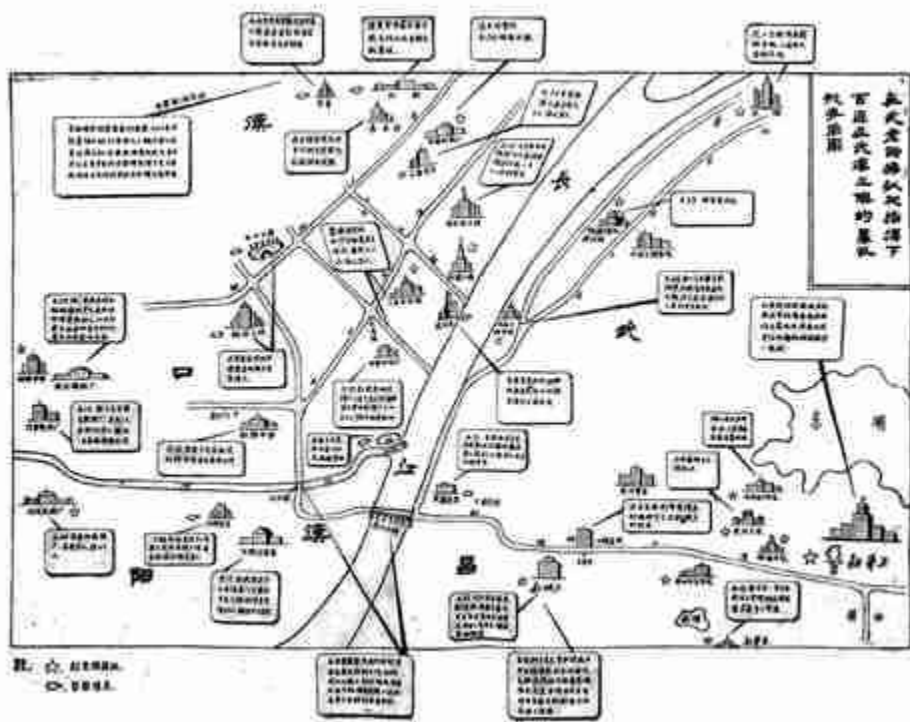
1日，造反派在汉口体育场集会庆祝北京大学大字报发表一周年。

当日，任爱生发出给陈再道的公开信，认为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叙述自己受三字兵迫害的情况，要求陈再道承认错误，为工总平反，

1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8页。

2 《妖为鬼蜮必成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0—13页。

3 市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1967年7月9日《新华工》报载《在武老谭操纵和指挥下百匪在武汉三镇的暴乱形势简图》

支持三新、二司、三司革联。

当日，市电信局军管会发布第六号通令，宣布摘掉电信分部“反革命组织”帽子，不提为工总电信分部平反。工总成员表示不满，军管会陈副主任喊口号“打倒无政府主义”，工总成员喊“打倒奴隶主义”。会后，电信分部举行示威游行。

6月初，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军区副政委叶明，副司令杨秀山、姚喆、孔庆德以及宣传部部长夏夔、动员部部长信俊杰、军训部副部长李良、政治部青年部部长马明、独立师政委蔡炳臣等。到中午12点，叶明说，蔡政委要请大家吃饭。当百万雄师头头进入师部食堂，正在就餐的军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¹。

2日，铁道部武昌车辆厂工总战斗队召开树旗大会，百万雄师人员冲击会场，打伤工总和新华工、二司22人。当日下午，农业水泵厂百万雄师联合外厂人员围攻本厂造反派一天一夜，打伤二十多人，重伤4人。

¹ 参见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67页。

2日晚，造反派各学生组织联合组建的“星火燎原”宣传队前往武汉邮电器材厂，为纪念北大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演出，数千名百万雄师人员包围该厂，打伤造反派三十余人、其中重伤十余人，抢走乐器和道具。当晚，百万雄师冲击青山武东地区工总树旗大会，打伤工总、二司、新华工成员二十余人。

3日，刘惠农、市纺织工业局武装部长项康福、市二轻局武装部长黄保楠、市一商业局武装部长黄廷与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潘某在市抓办举行会议，决定像河南、广州用武力一举踏平造反派一样，集中十几万人消灭武汉造反派。具体措施是：各系统、各单位集结人员，组织联防；积极解决广播器材和笔杆子，大造舆论；调集交通工具，特别要解决农民进城的车辆问题；做好武斗的物资准备。下午，刘惠农委托市抓办两位副政委辛甫、林立召集工交各局抓办领导人开会，项康福、黄保楠、黄廷和潘某在会上传达了上午会议决定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大力支持百万雄师¹。

4日，武汉军区在征求百万雄师头头的意见²后，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时称“六四公告”），自我肯定“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成绩是主要的”；重申批判二八声明“是必要的，正确的”，“工人总部不能恢复！”公告检查了在批判二八声明、解散工总过程中打击面过宽等问题，同意工总“重新建立基层组织”。对于群众普遍担忧的正在愈演愈烈的武斗问题，公告把它归结为“孟夫唐之流”的“离间”、“挑动”和“破坏”：“孟夫唐之流把自己打扮成‘革命领导干部’，赤膊上阵，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煽阴风、点鬼火，拼命夸大，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离间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制造革命组织间的纠纷，挑动武斗，极力转移斗争大方向，公然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革命干部，指向人民解放军，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为他们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权’。”

造反派群众把“六四公告”称为“牛屎公告”，他们用大字报、传单表明态度：武汉军区的支左大方向根本就是错误的，武斗的根本原因，就

1 参见毛泽东思想武汉市机关红司市市委总部办公厅革命造反派团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惠农罪行大事记（从二月黑风至七·二〇严重政治事件）》（1968年3月10日）第7页。
2 参见《“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16页。

是军区扶植以暴力武斗为参加文革唯一方式的百万雄师。

百万雄师总站当天发表《紧急声明》，表示坚决拥护六四公告，“谁敢为工总翻案……我们坚决给予回击，彻底消灭一小撮反动分子的反动气焰！”“向孟夫唐、刘真、张华、薛朴若之流发动总攻击！”《紧急声明》宣示了“发动总攻击”要达到的目标：“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的召开，为建立革命委员会……而斗争。”¹

百万雄师支持公告强调的“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但认为对工总的表态还是“太软弱”，尤其不能容忍同意工总“重新建立基层组织”。他们的意见没有公开表露，而是直接向军区提出。当日，牛怀龙、蔡炳臣在师部作战室召集百万雄师头头开会，蔡俊善、纪登清等批评军区公告力度还不够，要造反。军区某副政委说：“这个公告不出，将来军区要被动，其实你们想想，公告已经肯定了支左的大方向。焦点是个工总问题，公告除了说工总不能翻案外，还写着它的五条罪状嘛！有这五条他们就翻不了。”牛怀龙说：“我是坚决支持你们的”²。

陈再道在文革后回忆：“这个《公告》发表之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造反派们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因而他们闹得更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了，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意。”³

4日下午三时，十余辆交通车载着五六百名百万雄师人员进驻市委大院，赶走新华工、二司等驻市委联络站。市委大楼成为百万雄师总站所在地，几天内进驻人数增加到一千八百余人。

6日，百万雄师头头在市抓指各办公室负责人会上宣布：站出来“亮相”的干部的安全，由百万雄师负责保护；同时宣布“参谋顾问组”成立，组长辛甫，副组长林立，成员有：肖律（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申子谦（市经委副主任）、张子由（市经委副主任）、张文斗（市委城建政治部主任）、李赐恭（市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栗栖（市总工会主席）、高珣（市委政法办公室主任）、王鸿业（市文化局党委书记）、陈玉玺（市总工会副主席）。这个参谋顾问组不仅仅参与指挥、出谋划策，其成员还分别担负实质性的工作，如高珣负责市委大楼内外的治安，张子由负责百万雄师行

1 《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2 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288页。

3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第49页。



6月6日，百万雄师的武斗车队通过长江大桥（刘俭提供）

动所需装备（如柳条帽、洋镐柄）的供应，王鸿业负责百万雄师人员的文化娱乐、医疗卫生（包括武斗用的杀虫药品六六六粉等及救护车），李赐恭负责百万雄师行动时的饮食和各据点的粮食肉菜、蚊帐凉席等生活物资。辛甫组织38名市委宣传干部进入百万雄师宣传部，起草文件、编报纸、写传单；组织60名市委干部成立调查团，分若干小组，为百万雄师准备上京汇报材料。革联头头、市委机关抓办宣传组负责人周德猷说：“百万雄师不会造舆论，赶不上三新二司，必须大力加强，占领一切宣传阵地”。林立打过仗，在总站“拿着作战地图亲自指挥”，又管工交，于是负责调人调车、安排工厂制造武器。百万雄师总站内还有一个由市委机关革联成员（多是市抓指成员）组成的参谋组，都是科处级干部，被称为“低参组”，辛甫为组长的参谋顾问组则被称为“高参组”¹。

得到官方全方位的全力支持，百万雄师的财力也极为雄厚。红武兵头头申耿生（6月3日退出总站）6月17日向牛怀龙反映：“联络站在6月3日以来花去经费两三万元，战士武斗回来吃面包、喝汽水，我担心要犯经济主义错误。”²

¹ 参见《把“百万雄师”的一小撮坏头头揪出来示众》，载《七月风暴（第一期）》（1967年9月3日）第12、14、15、29页。

²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7日，127名区局级以上干部的“亮相”声明《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发表。这次“亮相”，是辛甫与市委机关革联头头、百万雄师头头5月下旬就开始商议，经巴方廷、傅兆才审定的¹。林立在革联的会上说：“百万雄师对这些干部的表态，心满意足，并提出保证他们的安全。”²这次市直干部亮相，与5月30日至6月4日大批省直干部亮相，都是百万雄师“三结合”夺权计划的一部分。

4日，百万雄师人员绑架不愿意就六四公告表态的市电信局局长杨有山。9日，市电信局军管会逮捕了重新成立的工总电信分部头头吴怀勉。

6月5日凌晨，国棉二厂抓办负责人带领数百名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打砸该厂工总等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办公室，抢走室内物品，造反派头头赵某被打成重伤。当日，武汉第二、第三砖瓦厂百万雄师人员及红卫村中学三字兵共五百人，攻击设在建材学校的二司、新湖大反逆流联络站，打伤造反派二十多人。当日，汉阳轧钢厂百万雄师头头刘某等带领百余名武装人员围攻汉轧工总分部，数十人受重伤。当日，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抢走三司革联在文化印刷厂印刷的报纸，打伤并绑架三司革联学生。

张建华回忆：

6月5日晚，我们红司（新华工）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动态组负责人赵廷昌通报了近半月来百万雄师在武汉围剿造反派的情况及下一步可能的发展趋势。郭保安作了激昂的发言，表示要坚决进行自卫，并作了具体布置。与会者对百万雄师的暴行义愤填膺，一致表示：在红武兵的暴行合法化、凶手受保护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决实行自卫，以革命的暴力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今后若有人敢攻击我们新华工，我们的回答是：打！

6月7日凌晨4点30分，我院举行了第一次自卫演习³。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严禁武斗的通令（中发〔67〕178号），时称“六六通令”。百万雄师高参组组

1 《“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25、26页。

2 市机关红司人民勤务员总部、钢二司驻市委联络站《市委革联与百万雄师（市委革联罪行之一）》（1967年10月26日）。

3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48—249页。

长辛甫说“要不是六六通令，早就把他们踏平了”。5月下旬百万雄师总站有一个“三五天踏平造反派的计划”，辛甫参与制定。俞文斌对辛甫说：“六六通令晚几天下来就好了，这样一切计划都打乱了。”¹

六六通令发布当日，汉阳发生血案。一周前，百万雄师就在汉阳铁中集训人员，扬言血洗汉阳。6日中午，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截断钟家村周边的交通，包围了设有工总、二司、新华工、三司革联联络站的汉阳区委大楼，殴打造反派学生，数十人受伤，其中十余人重伤。围观群众上前保护学生，不少人被打。一些学生被押进区手管局大楼拷打审讯。同日百万雄师人员攻打三中红岩设在汉阳百货大楼的广播站，三中、水院学生被迫撤出。当日三中红岩撤到水院，造反派在汉阳的“据点”只剩下汉阳轧钢厂。

百万雄师成立以来，载有武装人员的车队经常在三镇街道上驰过，路边市民有对其扔石块、喊口号表示不满和鄙视，他们就会下车追打，打伤人（包括老幼）的事经常发生。武装人员如有落单者，也会被市民殴打。

6月7日晨6时，空字659部队指战员着便衣乘一辆卡车往武昌卓刀泉支援夏收，路经汉阳工人文化宫，被数十名百万雄师人员误认为九一三人员，被打伤三十多人。事后百万雄师去认错，有人说“自己人打错就算了”。

是日，肉联厂数百名百万雄师人员围攻武汉低压锅炉厂、汉口化工厂、江岸汽车改装厂，造反派轻伤数十人、重伤二十余人，被抓走多人。

是日下午，造反派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大会，欢呼六六通令发表。参会人员在路上遭到百万雄师袭击，多人受伤。下午4时，百万雄师人员冲击机械学院二司学生拥护六六通令的游行队伍，打伤二十余人，重伤9人。

8日，百万雄师头头在辛甫、林立的指导下，制定了《反逆流紧急动员令》，宣称：“从即日起，立即展开全面反击，狠狠打击来犯的阶级敌人，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敌人”。“动员令”要求各级组织建立作战参谋部，把有作战经验的转业军人集中到指挥岗位上去。“动员令”经辛甫最后审查，由田吉品交市委印刷厂印刷。辛甫指示：“这个材料不要对外发，作为一个内部文件发。”²

1《妖为鬼蜮必成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6、9页。

2参见《“庞然大物”现原形，纸船明烛照天烧——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载《七月风暴（第四期）》（1967年10月28日）第23页；《妖为鬼蜮必成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9页。

当时百万雄师公开的口号是：“百万雄师站起来，牛鬼蛇神全垮台”“百万雄师一声吼，牛鬼蛇神齐发抖”“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围剿钢八司，踏平九一三”“百万雄师威震江城”等。

8日上午8时，数千名百万雄师成员分几路围攻驻在汉口民众乐园的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等联络站，多次冲击，打伤造反派二百多人，重伤14人，打死6人。独立师的宣传车在现场呼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上午9时，百万雄师下属红城公社的中老年妇女三百多人，声称要在武昌区委开会，要求新华工、新华农联络站撤离，双方展开辩论。随后武昌公安分局曙光派出所十几名警察进入武昌区委大楼，控制各门，一卡车武昌造船厂百万雄师武装人员用木棒打散马路两旁的市民，冲入区委大楼，殴打联络站的学生，重伤5人，另5人被绑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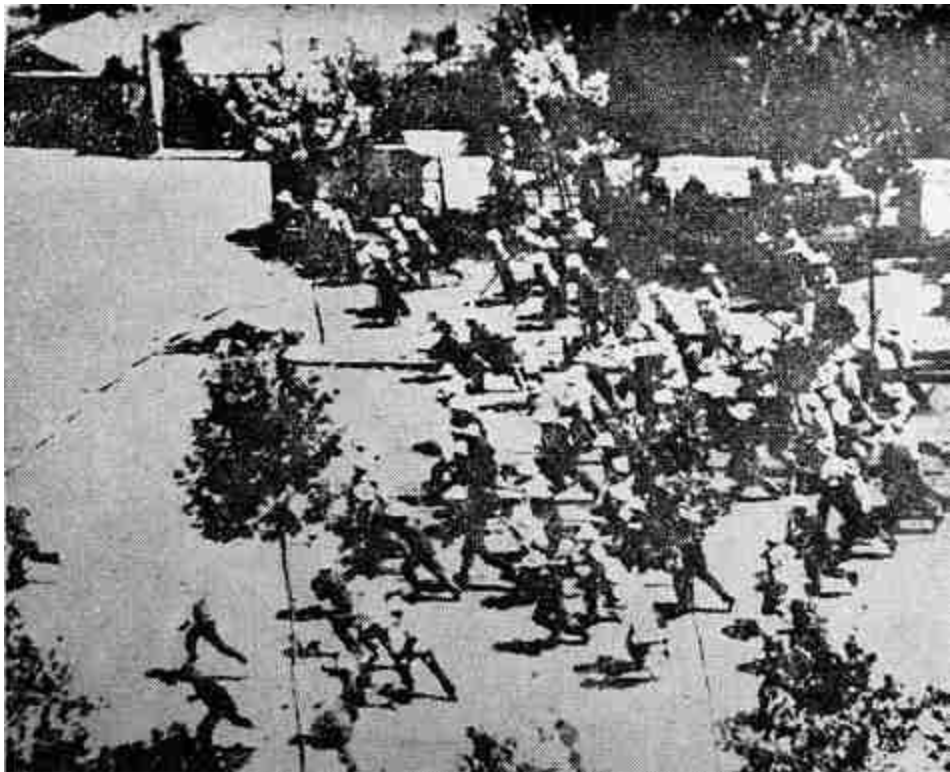
上午11时，武昌公安分局“武汉公安”5人到二机床厂，声称要与该厂造反派组织八一七辩论，铐了一个八一七成员。12时，武船一千多名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围攻厂办公大楼，独立师护桥炮艇张排长、公安分局丁科长亲自指挥，打伤九十多人，其中13人重伤，被逼跳楼4人，绑架14人。闻讯前往了解情况的新湖大临委会成员柴玉本也被绑架。

8日，红卫兵武汉地区中等学校司令部重新成立，会后游行有大量百万雄师人员参加，独立师上千人戴“红卫兵”袖章一起游行。游行队伍一路高喊“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对喊“打倒黑巫兵（即红武兵）”的围观市民用木棒殴打，跟随游行队伍的独立师宣传车呼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游行队伍经过湖大时，向校园内投掷石块，抢走广播喇叭。正逢湖大两百多名下乡支援夏收的学生乘车返校，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拦住攻击，轻伤一百二十余人、重伤五十余人，新湖大临委会三名常委被绑架。

6月9日，百万雄师为了清除其广播站对面的设在居仁门中学（当时改名红锋中学）的新华工广播站，派出两千武装人员从早上五点攻打到下午四点，断水断电，将该校的新华工中学部成员逼到顶楼。后由一军人和新华社一记者主持谈判，学生同意退出学校，百万雄师队伍才收兵。

武汉军区此日发布关于制止武斗的“通知”，没得到任何反响。

6月10日，三千农民武力袭击华农校区。晚12时，三千农民袭击二司华师总部，3名学生被打伤。



1967年6月9日，百万雄师围攻汉口居仁门中学（载钢九一三兵团1968年编《战地黄花》）

10日左右，中央文革来电，传达陈伯达在百万雄师关于武斗的“动员令”上的批示：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陈再道秘书提出提交军区常委讨论，陈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不同意开常委会研究¹。

当日，武钢九一三战斗兵团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支左指挥部“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立即执行六六通令”，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否则我们将武装自卫和反击”。10日左右，九一三举行抗暴自卫誓师大会，表示“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保卫革命小将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

6月11日，军区支左办公室信俊杰与二司负责人座谈有关制止武斗问题，要求二司放下武器。6月中旬某日，经支左办公室刘海江联系，钟汉华等人在军区接见二司杨道远等人。杨道远回忆：“我见到钟汉华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停止武斗？’钟汉华感到突然，辩解道：

¹ 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290页。

‘是你们武斗，怎么说我们武斗？’我说：‘你们组织训练，操纵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是按照你们的旨意，踏平造反派，终日武斗、横扫。请看看，武斗发生的地点，都是在造反派的地盘上，哪一次不是百万雄师攻打造反派造成的？’钟汉华拿出武大、华工印发的‘新式武器’制造成功的《号外》，说：‘武器是不准制造的，私造武器是犯法的。’我说：‘我支持制造武器（实际上我什么也没参与），别人手里拿着刀，我们也要学着拿起刀来。我们制造武器，不是为了打别人，而是准备别人打到家门口，甚至打进家里来时，不被强盗打死，进行自卫。我们制造武器，是为了保命的，完全是防御的。’”“钟汉华还说：‘我们出个什么你们就批什么，难道我们就没有一条对的吗？难道我们就全是错的了？’钟汉华不懂得路线错了，一切都错了的道理，你站在正确路线的对立面上，你做的一切都是和正确路线相对立的，你还能有对的吗！……接见不欢而散了。”¹

11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武斗黑风》，社论说：“那些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人，坏事做得越多，罪恶越陷越深。欠债是要还的，深重的罪恶决不能用‘受蒙蔽’三个字一笔勾销。如果死不回头，就必将变成人民的敌人，那是死路一条。”

钟汉华所指责的造反派学生“私造武器”是事实。新华工成功试制了手榴弹、炸药、无线遥控地雷，启用了院武装部、特种仓库守卫连的枪支，用卡车改装了一辆装甲车。在院内各条道路上安放了无线遥控的地雷，在东西两个操场安放了可用地雷引爆的氧气瓶。他们还架设了电台，用于监听百万雄师与部队的联系和紧急情况下与外界联络。红水院计划在情况紧急时，点燃泼洒在水面的汽油以封锁东湖近岸，在入口道路设置路障，在教学大楼外架设高压水泵和高压电网，化学教研室制成了土地雷和燃烧弹。

12日，百万雄师江岸分站成员绑架32岁的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戴鹏，殴打至死，由汤忠云等埋在市委大院的树林里²。8月10日，公安人员在雄师支队副队长陈昌文指认下找到戴鹏埋尸处。百万雄师总站驻市委大院的33天里，约有三四百人被抓来殴打、审讯，深夜楼内经常传出被殴打者的嚎叫声³。陈昌文“七二〇”后承认：有一天他们出动三次抓了六十

1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65—166页。

2 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

3 参见《百万雄师大本营 血泪斑斑“渣滓洞”——百匪在市委的滔天罪行》，载《七月风暴（第三期）》（1967年9月25日）第28页。

多人，全部关在市委大楼地下室进行拷打审问¹。

6月12日凌晨，百万雄师两百多人冲进硚口公园，抢砸新华工广播站。

第二节 独立师直接领导百万雄师

6月中旬，武汉军区党委决定，将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从市人武部交8201部队掌握。

文革中军队支左期间，一个群众组织和部队直接发生领导权、管理权问题，全国罕见。在武汉地区，七二〇事件以前，这事除了百万雄师少数头头，两派群众没人知道。

市人武部直接领导百万雄师，周恩来很清楚。巴方廷1978年回忆：1967年7月17日，“总理问我，他说：我问你一件事，听说人武部下了道命令，每个工厂抽20人集中起来训练？”巴方廷不承认有此事。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周恩来发问：“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有人回答：“抓办搞的。”周恩来说：“抓办里坏得很。”²七二〇事件期间，巴方廷对辛甫说，周总理单独找他谈了百万雄师问题。周总理拿出一份百万雄师某分站的书面通知，内容是讲抓办与分站开了一个保证供应的会，周总理还批评武装部为百万雄师训练人。这两件事巴方廷都不承认，只承认武装部和百万雄师有感情³。

实际上，由市人武部党委组建并直接领导的市抓办经常研究支持百万雄师的问题。6月初，在抓办的一次会议上，刘惠农说，百万雄师打算调几万农民进城专门对付几所大学，刘与巴方廷商量，巴以中央有命令为由没有同意。高珣说，黄廷等要高召开各区、局领导干部会，布置为百万雄师集中人员和交通运输提供支持。高珣派人向各区领导干部作了传达，林立（市抓办副政委）派肖律（或市抓办副指挥长申子谦）召开了各局局长会⁴。百万雄师总站进驻市委后，市人武部崔执中、王德清两个副政委和科长刘春学等人常驻市委大楼，为百万雄师头头“出主意”，“亲自检查

1 参见《“庞然大物”现原形，纸船明烛照天烧——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载《七月风暴（第四期）》（1967年10月28日）第23页。

2 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34、327、466页。

3 市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4 参见《“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了百万雄师的防御工事，按高标准提出了批评和加强工事的意见”¹。

市委革联派驻百万雄师总站联络员曾庆裕“七二〇”后揭发：“市武装部为了加强对百万雄师的控制与指挥，特指示一商、二轻、纺织、机电等局武装部长作为百万雄师的幕后指挥。百万雄师进市委大楼后，一商业局武装部长黄廷住在市委随时指挥。其他几个局的武装部长也经常来和百万雄师头头商量策划。百万雄师撤出市委到（三五〇六厂）五一俱乐部后，这几个人也经常到五一俱乐部去出谋策划。”²

关于独立师从市人武部接过对百万雄师的领导权一事，有多份材料证实。在7月中旬的师党委扩大会上，牛怀龙说：“百万雄师我们搞了一周，六月十五日到二十三日，搞不了，写了个报告给军区交给军区管了。”蔡炳臣说：“六月十五日师正式与百万雄师联系，六月二十三日交出”³。辛甫七二〇事件后交待：“六月十几号以后，百万雄师直接与8201挂了钩，开会从来不叫我们参加了。”⁴七二〇事件后独立师整训期间师支左办公室成员揭发：“到了六月份勾结的更加紧密，来往更加频繁，百万雄师的大小头头经常出入八二〇一，百万雄师的电话不断地摇来，百万雄师的传单和材料像雪片飞来。陈、钟……在六月初索性把百万雄师交给他俩（指牛、蔡）管理。……接手一个星期以后，办公室感到担子重，工作量大，压得喘不过气来，多次提出意见，要求把百万雄师交给军区管理。……百万雄师虽然交出去了，但其组织和思想联系仍是连绵不断，往来仍很频繁，实际上是明交暗接。交出后百万雄师的头头到军区开会，蔡炳臣给我打电话要准备饭菜，散会后，蔡引着他们到食堂吃饭”⁵。

接管百万雄师第二天，6月16日，牛怀龙、蔡炳臣在独立师三团会议室召集百万雄师总站及分站头头二十余人开会。会上牛、蔡宣布：五团参谋长方正、三团参谋长王相荣负责百万雄师总站、江岸分站、江汉分站，师后勤部副部长张龙海负责硚口分站，管理科长郭春富负责武昌分站，副

1 参见《“百万雄师”内幕之一：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1967年8月10日）。

2 《百万雄师内幕之十：曾庆裕在斗争辛甫、林立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9月6日）。

3 1967年7月11日—14日独立师党委扩大会议参会人员的记录，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3、8页。

4 市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5 七二〇事件后独立师整训期间支左办公室成员的揭发，《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2—13页。

教导员杜成义负责汉阳分站。谈及百万雄师撤除据点和疏散集结的人员，百万雄师方面表示，如果撤出，军队必须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否则不撤。牛、蔡说：你们在撤除据点、疏散人员时，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究策略。比如你们撤除江汉公园集结点，可以把主力撤到财贸大楼，把老弱留在那里。同时要向军区和对方提出双方对等撤除的方法，你们撤除一处，就要求对方同时撤除一处。你们可以要求军区、你们、三新二司三方派人监督检查。牛、蔡还具体举出四对对应的据点⁶。

百万雄师集训武斗人员，独立师就派干部、战士穿便衣去充当教官；汉阳电话总机被造反派控制，就专为百万雄师汉阳分站安装自动话机；百万雄师寄材料，就用军邮密送；为保证百万雄师头头出行安全，就拨给军用中吉普一辆；百万雄师整上京告状材料，要找一个安全、保密的地方，就将他们几十人接到师后勤招待所，住了二十多天，并负责警卫⁷；百万雄师组织渡江活动要借步话机，有人说不好借，蔡炳臣说“有什么不好”，立即借给，并指示借给装有电台的炮艇。



百万雄师武斗人员与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对峙（载《战地黄花》）

⁶ 参见《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操纵“百万雄师”的一些反革命罪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3页。

⁷ 《“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17页。

第三节 大规模武装围攻

独立师直接领导百万雄师的6月15—23日，正是武汉地区文革中最暴力最血腥的一段时间。六一七打财贸大楼，六二三打铁道部第四设计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六二四打工造总司、汉阳轧钢厂，是百万雄师两个多月的历史中规模最大、致造反派死伤最多的五次围攻。

文革后俞文斌、谢敏华、章迪杰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对打铁四院、工造总司、汉轧这三次武斗事前毫不知情，总站从未研究过。章迪杰的回忆录对这三次武斗一字不提，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一点都不了解。在2015年4月的一次访谈中，谢敏华说：“六二四打工造，跟总站任何关系都没得，总站完全不知道，是江岸（分站）的张文搞的。这一天打汉轧、铁四院，总站都不知道。工造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为什么要打它？”章迪杰说：“打工造我都感到奇怪。”

现在能看到的1967年6月的武汉文革资料，涉及独立师师部参与围攻财贸大楼、水运的比较，涉及师部参与围攻铁四院、工造总司、汉轧的几乎没有。市委革联曾庆裕作为驻百万雄师总站联络员，熟悉总站情况，在他长达万字的揭发发言里，讲到围攻财贸大楼、水运，讲到因中央六二六来电未得实施的总站攻打新湖大的计划，就是没有讲围攻铁四院、工造总司、汉轧的情况。

一些武汉文革历史研究者认为，不排除独立师下属支左机构，百万雄师各分站、所属各组织和总站作战部个人（如刘敬胜）撇开师部、总站而直接行动的可能。刘敬胜和各分站不经总站同意自行发动围攻，六二四前也有先例：刘敬胜、硚口分站作战部长张彬和硚口区武装部长指挥数千人攻打武汉汽车配件厂，12日下午开始包围，第二天凌晨两点，驻市委大院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集合前去汽配厂支援，二号头头杨道安听到汽车发动声、集合口哨声，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¹。百万雄师一些头头文革后谈起刘敬胜仍有微词，俞文斌说：“好斗的是刘敬胜，他只会搞武斗，六一二打汽配，他自己跑去”。章迪杰说：工造总司“可能是刘敬胜带人去打的。……刘敬胜没有组织观念，他到哪里并没有通过常委会。揪王力总站没有派他去，不知他怎么钻进去的，他是自由行动者。”²

1 参见《“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三：第一次审讯辛甫记录》（1967年9月14日）。

2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始终是联络站性质，参加百万雄师的各组织依然保留着原旗号、原领导机构。6月17日下午申耿生向牛怀龙反映：“‘百万雄师’内部现在很乱。……各搞各的，谁也指挥不了，意见不一致，思想不统一。现在实际上是各霸一方，条条与块块，总站与分站各自为政的状态，这个矛盾如不解决有分裂的危险。”¹

资料显示，独立师参与指挥对财贸大楼和水运工程学院的围攻。

据独立师整训时的揭发材料，“6月17日晚上，蔡炳臣彻夜未眠，连续三次亲自给在现场的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打电话。在电话中蔡炳臣指示：‘你们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斗争上要讲究策略，要提高警惕，不受损失，不失战机。’蔡炳臣问：‘你们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纪登清答：‘很顺利，没有什么问题。’蔡炳臣问：‘你们周围情况怎样？指挥所安不安全？如果不安全，就转移。’纪登清答：‘我们的安全没有问题。’蔡炳臣还问：‘财贸大楼的人都撤出来了没有？’在最后一次电话中还说：‘我对你们安全胜利撤出来表示祝贺，并向你们的负伤人员表示慰问。’”整训办公室的资料还显示，独立师副政委武方侗、五团参谋长方正亲临现场参与指挥，现场设有电台，与牛、蔡保持联系。18日凌晨2时，百万雄师打算撤退，独立师在现场的人不同意，要求他们“一定要打到天亮再说！”²

6月23日晚，五团参谋长方正带着一辆载着军人、架着机枪的卡车来到市委，将俞文斌、纪登清、朱德明（总站办公室副主任，东风造纸厂职工）和革联头头田吉品接到独立师。军区指示要保证百万雄师头头安全，所以蔡炳臣派方正带领两个排负责接送。会议在师部三楼会议室举行，部队方面参加的有军区宣传部长夏夔、29师（8199部队）师长张绪、蔡炳臣。百万雄师方面汇报了攻打水运学院的理由和计划，并说：“我们调了四千人把水运学院包围住了，如果不交人，我们要把水运踏平。”“既然他们打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要准备全市一起干，把他们所有据点拔掉。”会议中，火线指挥部报告攻打开始，伤亡很大。蔡说：“老纪，你们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执行？为什么提前了？”又说：“老纪，就打这次就行了。”百万雄师头头不同意：“要全市全面开花。”夏夔说：“他们是武斗挑起者，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2 参见（独立）师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二十三：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1967年9月9日）。

同志们采取这个行动，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张绪说：“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但要有理、有利、有节，是不是？我们采取政治攻势。”开始攻打后，师作战室就成为临时指挥部，用作战室的通讯设备与火线指挥部联系，指挥对水运的围攻。蔡炳臣下令用守卫长江大桥的五〇五炮艇从江上调动队伍、运送伤员¹。

一、围攻武汉汽车配件厂

武汉汽车配件厂是国家定点生产汽车活塞、活塞环的四大厂家之一，当时有职工近四千人。

汽配联司头头陈大华回忆：“进入4月，造反派内香花、毒草两派联合成立‘新汽配联司’，全厂职工百分之八十参加联司，厂里运动、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百万雄师鼓吹‘上有古田，下有肉联’，说这两处他们力量最强，我们厂就在硚口古田地区，被称为‘解放区’，这就成了百万雄师的眼中钉。他们造舆论说联司头头是牛鬼蛇神，实际上我们五个头头，三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团支书。6月初，百万雄师就在与我们厂一墙之隔的国棉三厂集结武斗队，准备围攻汽配厂。”

6月12日下午，百万雄师七千多人在硚口区分站一号头头张彬和硚口区武装部长指挥下（有不明身份的军人参与指挥），以新汽配联司绑架驻该厂三名军代表为借口，包围汽配厂，同时断水断电。留在厂内的二百多人除几个造反派负责人外，都是上夜班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其中女工六十多人。晚8点进攻开始，用大卡车撞开工厂大门，三辆消防车和一辆吊车进入。消防车喷射六六六粉水、氨水，吊车把进攻人员吊上办公楼楼顶，揭开屋顶进入三楼。驻厂军代表喊话：“我们没有被绑架，你们上当了，我们都是阶级兄弟，不要打。”市劳动模范、中共党员、工人工程师杨正超喊话：“我是共产党员，不是牛鬼蛇神，都是阶级兄弟。”杨正超被长矛刺穿咽喉，当场身死。凌晨3点半，汽配厂全部被占领。据七二〇事件后公安联司调查，这次围攻，汽配厂死9人，重伤65人。107人被押到附

¹ 参见《百万雄师大本营 血泪斑斑“渣滓洞”——百匪在市委的滔天罪行》，载《七月风暴（第三期）》（1967年9月25日）第28页；《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是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揭发牛、蔡勾结百万雄师坏头头密谋攻打水运学院的真相》（独立师作战科揭发），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22—23页；（独立师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七：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是疯狂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1967年8月21日）。

近的国棉三厂（百万雄师火线指挥部设在该厂），次日上午八点转到东西湖东山农场拷打审问，途中将重伤的6人扔在古田三路省财贸医院门口，被该院医护人员收治。下午四点101人被送回厂。百万雄师占据汽配厂后，在这里修筑工事，设立武斗据点。汽配厂停产一个多月，直到七二〇事件结束¹。

13日，百万雄师的一张传单公布了围攻汽配厂的“战绩”，辛甫对杨道安说：“你们连舆论都不会造，把打伤的和俘虏他们的人数都公布出去，太不策略了，本来你们去打人家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三新、二司就是想造你们的谣，抓不到材料，你们这么一宣传，岂不是不打自招，叫人家抓辫子！”辛甫看到百万雄师的一条标语“用革命的武斗制止反革命的武斗”，对百万雄师头头说：“你们写这样的标语，很不策略，你们是自卫，根本不是武斗，按你们的标语不是自己承认自己搞武斗吗？”²

6月13日，军区就武汉局势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紧急呼吁》，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是日，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和持械农民在华农附近伏击华农二司学生，重伤28人，轻伤多人。22岁的园艺系学生王体圣伤重不治，于次日死亡。

6月14日，中央文革给陈再道打电话，敦促军区制止暴力。同日，陈再道、钟汉华约见新华工聂年生，动员新华工主动制止械斗。钟汉华指责造反派要夺军权，聂予以反驳。

6月15日晚十时，四十余辆无牌照的新解放牌汽车载着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沿江汉路向北行驶，一路呼喊“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围观市民中有小孩喊“打倒黑武兵，镇压反革命”。在循礼门铁道口，百万雄师人员用车上的砖头、石块、石灰包砸向人群，然后下车用长矛往人群中乱刺，市民伤数十人，死2人。

16日，造反派分别在洪山宾馆门前和民众乐园前举行追悼会，追悼王体圣和循礼门死难者。

1 参见《“庞然大物”现原形，纸船明烛照天烧——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载《七月风暴（第四期）》（1967年10月28日）第25页；2019年3月余德亨访谈原新汽配联司头头陈大华的记录。

2 《妖为鬼域必成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9页。

二、围攻六渡桥

1967年6月百万雄师对造反派频频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中，造反派死伤最多的一次发生在17日，地点在六渡桥。六渡桥是汉口也是全市最繁华的闹市区，造反派在这里有三个据点：财贸大楼（内有江汉区商业局、手管局、供销合作社、轻工局等机关）、民众乐园（武汉市最大的游艺场所）、南洋大楼（武汉卷烟厂职工宿舍），这三处据点的作用是设广播站。这里的广播站影响很大，入夜后听广播的市民站满街头。为保卫广播站，民众乐园设有火线指挥部，九一三汉口办事处头头张鹏程任指挥长，副指挥长有武钢红旗总部头头叶美堂、新一冶头头曹承义、二司体院学生赵子强、新华工头头张立国、新潮大头头谢邦柱，指挥部以下常驻人员约百人，更多的人是时来时去。这些据点中人员的吃饭问题，靠募捐和周边居民送饭解决，武器只有木棍和少量铁矛。

一位独立师一团直属队战士、公安局军代表，6月17日晚被钢八司扭送民众乐园扣押11小时。他在一篇当年7月印行的控诉文章里，记述了民众乐园里造反派的心态：

有的情绪低落的说：“我屋里总要我回去，我不想回去，运动后期我们这些人不打成反革命就是好的。”

水上分局“公安联司”成员说：“我原来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不是文化大革命早入了党，运动以后也不知落个什么下场。”

一战斗队员（黑黑的，西式头）说：“我原是工厂人保干部，因爱提意见被当权派撤职了，这次我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本单位呆不下去了，被赶出来没路可走了才到民众乐园来的，我们打了一晚上的交道，出去可别歪我们的嘴巴（告密）啊！”。

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说：“现在武汉死的人比青海都要多，陈大麻子，自己不开枪，指挥百万雄师杀我们，人死得越多，陈大麻子就越滑越远，我们就越接近胜利。”¹

曹承义回忆说：“民众乐园和六渡桥一带成为造反派的革命根据地。但那是一个专搞文斗，非武装的和平根据地。”²

¹《只身入虎穴，舌战土匪窝》，载百万雄师四分部二纵队编、针锋相对战斗队翻印《武汉“六·一七”大血案的事实真相》（1967年7月）第8—9页。

²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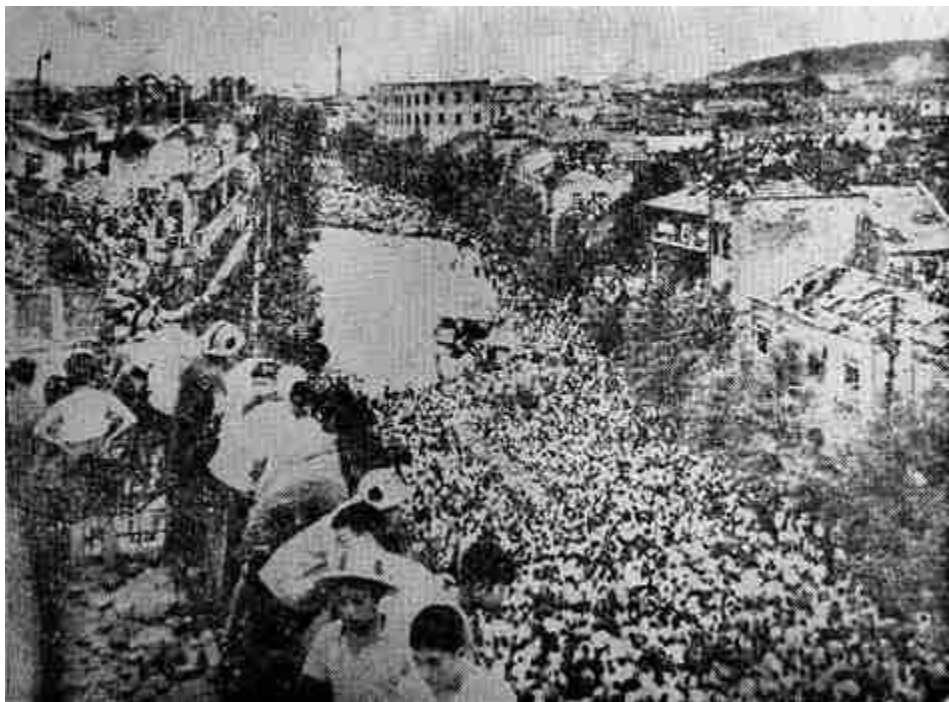
17日下午1点，卡车载来两百多名百万雄师人员，手执铁矛、木棒进入财贸大楼。百万雄师江汉分站在一份印行于7月中旬的小册子里说，这些人是江汉区财贸系统的职工，是“驻江汉公园、长航武汉分公司、水上办事处三处的自卫人员，回本单位搞斗、批、改”的¹。章迪杰、谢敏华近年对采访者也一再坚持说这些人是江汉区财贸系统职工，是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不提这二百人是常驻据点的武斗人员，也不提回单位上班为什么要带武器。

1968年6月17日出版的《“六·一七”战报》载文记述了百万雄师六一七围攻前的策划经过：6月11日，百万雄师江汉分站举行会议，江汉区委书记赵永生提出逐步清除以民众乐园为中心的造反派多个据点的方案，首先以“回系统、回单位搞斗、批、改”的名义占领财贸大楼。方案得到分站头头赞许。15日，纪登清向江汉分站长传达了蔡炳臣的指示：“我们在政治上要争取主动，要研究策略，要提高警惕，不失时机，大撤小集中。江汉公园的百万雄师可以撤到财贸大楼。”16日上午，牛、蔡指定负责江汉分站的五团参谋长方正听取了江汉分站一号头头沈浩然汇报围攻方案后说：“快一点好，越快越主动。”当天，江汉分站召开会议，就攻击前侦查、人员配备、物资供应、指挥部设置等问题作了部署²。

围攻开始，财贸大楼内广播站的造反派被百万雄师人员逼上屋顶，掀起屋瓦抵抗，周边的市民（所谓“钢八司”）立即包围了大楼，高喊“打倒陈再道”“打倒百匪”，百万雄师人员转而从屋顶的瓦片和楼内的桌椅、炊具砸向楼下的市民。此时，从民众乐园前来增援的数十名敢死队员进入大楼，将百万雄师人员逼到四楼。设在财贸大楼对面新华书店里的百万雄师指挥部由作战部长谢敏华负责，为了阻断造反派的援兵，他命令硚口分站作战部副部长林正双带人从中山大道西面压过来，堵住三民路口；命令江岸分站一号头头张文带人堵住中山大道以东的八元里，不让援兵到六渡桥；又从汉阳调来两辆消防车，用高压水枪把围住大楼的人冲散。此后江汉分站的大批武装人员开到，把被围在楼内人员接应出来。这时还有造反派被困在楼内，于是一辆卡车载着民众乐园敢死队人员前去救援，中途上

1 百万雄师四分部二纵队编、针锋相对战斗队翻印《武汉“六·一七”大血案的事实真相》（1967年7月）第1页。

2 参见“本报编辑部”《江城碧血——震惊全国的武汉六·一七大血案》，载武汉钢工总江汉集训指挥部、武汉钢二司二轻职校总部《“六·一七”战报》（1968年6月17日出版）。



六一七事件现场（载《战地黄花》）

去一些钢八司的年轻人，车上共二三十人。车后步行的敢死队和钢八司的百余人中途被前来制止武斗的军人截住。卡车进入三民路，敢死队员来不及下车，就遭到百万雄师大队人马的攻击，车上的人多被杀死。百万雄师乘势追杀路旁大喊“打倒百匪”的市民，市民死伤无法统计。那辆卡车及车厢里的死伤者一起被百万雄师夺走。这场围攻一直进行到18日晨七点。

在现场的武钢工人陈祖坤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当天下午6时左右，百万雄师的武斗车队又从江汉公园出发要去攻打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从民权路直抵三民路口，就再也寸步难行，因为从这里到中山大道，中山大道从六渡桥到民众乐园，马路上挤满了阻拦的老百姓，这是人心的屏障，这是无声的洪流。直到晚上9点多，百万雄师的车队也难以突破。他们只得爬上路旁的房顶，用砖瓦砸向马路上的人群。有人头被打破，人们立即让出一条路让伤者离去。从民众乐园和南洋大楼开出造反派的车辆，人群中就会爆发出欢呼声，高喊‘向英雄致敬！’我在人海中只是渺小的一分子，却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振奋。这一夜十分闷热，人潮直到天明才逐渐散去。我和英雄的武汉市民共同度过了历史上伟大的一夜。”

这一天造反派死亡人数，没有准确的数字。七二〇事件后各组织都进行过调查，二司说34人，工造说27人，工总说二十余人，公安联司说98人。

那辆冲进三民路的卡车上的造反派被杀死多少人，《红水院》报1967年第9期说“三十七勇士除三人重伤逃出外，全部壮烈牺牲”；工造总司头头彭祖龙2007年回忆：“当场死亡12人，后经抢救无效死5人，共17人”；1967年8—10月负责追查百万雄师杀人凶手的胡国基2006年回忆说“当场杀死工人、学生二十余人”。曹承义在回忆录中说一治的胡双全、余望生被杀死。1967年10月三司革联宣传部编《骨硬心红——武汉三司革联文艺作品选》载：三司革联新医校（武汉市卫生学校，文革中改名白求恩医校）头头、三司革联汉口指挥部武工队长刘荣德被杀死，时年20岁。

原赤卫军头头文行礼说：六一七武斗中，赤卫军成员乔长远（汉阳枕木防腐厂合同工）、杨广学（硃口房地局工人）死亡¹。

抢回民众乐园的尸体，很多材料上说有11具，民众乐园抗暴副总指挥曹承义说他看到9具，陈祖坤说他看到6具，武测二司学生李庆祥参与收尸点过数，他说有17具。

6月19日，江汉分站阮友安向牛怀龙、蔡炳臣汇报说：“我们用一辆空车挡住了他们的车子，我们冲上去了几十人，大概那个车子上死了十来个人……除三人跑了以外，其他都是重伤，个别轻伤，有的是被硫酸烧坏了。这个车我们已经拖回去了”²。

2015年谢敏华坚持说：“六一七那天没死一个人。说什么百匪杀了多少人，纯属造谣，因为我一直在现场，一直到18号早晨6点多钟才离开”。

“七二〇”后百万雄师江岸分站作战部长熊兆湘供认，他亲手杀死6人，当天深夜将尸体运至青山，沉入八大家和武东之间的长江中³。江汉分站的那份小册子所载那位独立师一团直属队战士的文章，记叙了17日夜晚在民众乐园所见：“进侧门向左拐的院子里，露天停放着约20具尸体”，其中有一名汉口高级步校的军人，一名妇女，两个十五六岁的小孩。他还

1 2014年8月杜先荣采访文行礼的记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3 关于六一七事件的记述，参见2015年4月余德亨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42—43页，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44—51页，武汉钢九·一三《钢九·一三》编辑部、钢九·一三武钢分团《武钢战报》编辑部《战地黄花》（1967年12月）第37—88页，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57—58页，《七月风暴（第四期）》第25页。

看到二三百个“唉声叹气，东歪西倒”的伤员¹。

水院教师蒋兆庆（当时同情造反派）回忆：6月17日晚七点左右，他和两个同事在六渡桥铜人像附近亲眼看到：数百名持长矛、戴柳条帽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正在集结，现场并没有造反派的队伍。突然口哨声、呐喊声大作，百万雄师队伍向路两边围观的人群冲杀过来，人们纷纷躲避，蒋兆庆的一个同事被长矛刺中头顶。在附近的宝善卫生院包扎时，他们看到市民用门板抬进来一人，称其在六渡桥被百万雄师刺中背部，医生检查后确认已死亡。蒋兆庆在死者衣袋里发现汉口高级步校的出入证，确定死者是一名军人（两年后其家属去水院找过蒋）。其间又有四五名被百万雄师刺伤的市民前来包扎，一名伤者大骂：他妈的瞎了眼，老子是汽运五站（按：百万雄师据点）的²。

曾庆裕“七二〇”后揭发：六一七事件结束，“据他们回来讲：‘这仗打得好，把九一三敢死队一汽车三十多人除几个人跑掉外，其余全部打平，睡在地上’。这天中午他们还用救护车拖回两个人，一个被杀死，一个被杀伤。据说这两人先是一个小三马车子拖到球场街附近放着，百万雄师以为是自已人，用救护车拖到市委大楼的，后来知道两个人都是三司革联的，伤的一个是学生，以后放走了，死的一个年约三十多岁，当晚百万雄师保卫部和作战部副部长汤忠云用救护车把尸体拖走了。”³

1968年6月17日，“六一七抗暴”一周年之际，工总总部追授曾庆华（中南轧钢厂工人）、李远源（江汉汽车修配厂工人）、周修启（公共汽车公司一队工人）、张幼青（建汉化工厂工人）为“钢工总优秀战斗队员、抗暴英雄”，说他们在六一七抗暴斗争中“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杀害，壮烈牺牲。”⁴实际上张幼青死于6月19日。

江汉分站那份小册子说：造反派“将解放军打成重伤八十余人，打死十五人，轻伤无法统计”。部队遭受这样重大的伤亡，事后没有看到军区和独立师的任何反应。六一七事件中百万雄师方面的主力江汉分站，在这份小册子中言及己方伤亡仅有一句：造反派“使用毒气弹（硫化安纳）（按：

1 参见《只身入虎穴，舌战土匪窝》，载《武汉“六·一七”大血案的事实真相》（1967年7月）第5—9页。

2 参见蒋兆庆《红水院文革杂忆》（自印本，2010年）第2、4页。

3 《百万雄师内幕之十：曾庆裕在斗争辛甫、林立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9月6日）。

4 参见钢工总保卫组《江城前哨》编辑部主编《江城前哨》报第9期（1968年6月19日）。

不知此物为何种化合物）”，“当即财贸革命职工八人中毒晕倒”。回顾六一七战况，小册子写道：“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我们要全部、彻底、干净消灭敌人是完全可能的，完全是有力量的。”具有这样压倒性的优势，己方几乎没有伤亡不是没有可能。

6月18日，三民路上遍地砖瓦、石块、血迹，路两旁房瓦几乎全部揭去，不少民房、商店被破坏，六渡桥一带的商店停业。市民自发地为民众乐园等处的造反派捐钱捐粮票，送饭菜、茶水、冰棒、西瓜，护理伤病员。上午，武汉大雨，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在民众乐园门前，为六一七死难者举行追悼大会。

熊兆湘抛入长江的6具尸体，其中一死者叫张幼青。18日清晨，百万雄师江汉分站在六渡桥附近“挨门逐户地进行搜捕”造反派，在清芬一路一居民家里，将建汉化工厂实习生、工总成员张幼青等数人抓进江汉分站，19日张幼青被殴打致死。熊兆湘在将张幼青和另五位造反派的尸体抛入长江时说：“这才是响噹噹、硬梆梆的造反派！武汉的反你们造不成了，请到上海去造反吧！”¹

6月19日，牛怀龙、蔡炳臣在师部会议室召集百万雄师总站四人，江汉分站、二七分站四人开会，听取关于六一七武斗过程、伤亡情况和下一步打算的汇报。在三个半小时的会议中，对六一七事件，只有蔡炳臣说了一句“像前天武斗那个样，我们要痛快，枪一响多痛快”。牛、蔡都没有讲制止武斗，只是一再要百万雄师撤出据点，特别是市委大楼等影响大的据点，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牛怀龙说：“百万雄师的成长我们很关心，军区也更关心”。“要是新华工、二司撤在你们前面，你们就不好办了”。蔡炳臣说：“如果对方一撤，你们还得撤，这样你们被动，你一撤，我们军队就好说话了”。牛、蔡还指示了撤出据点的具体办法：从占据的机关、公共场所撤到“实力雄厚的大厂”，回不去的外厂人员就在这些厂里做工，工资原单位出；总站也要这样，“等将来缓和下来再适当安个地点”；“在你们力量强的地方，……给他们（按：指不敢回厂的造反派）把薪金送上门，没有米、菜，给他们送”²。

¹ 参见“张幼青烈士父亲、钢工总红交联兵团战士张洪元”《一定要讨还血债》，《碧血垂青史，丹心向阳开——张幼青烈士殉难经过》，载武汉钢工总江汉集训指挥部、武汉钢二司二轻职校总部《“六·一七”战报》（1968年6月17日出版）。

²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六一七事件后，新华工延安大队（三系）七十余人进驻人民文化园（刘俭提供）

17日下午，就如何面对百万雄师越来越猛烈的暴力围攻，造反派在水院体育馆举行辩论会。绝大部分发言者反对撤退，认为那就是逃跑，造反派撤离几所大学这最后的“根据地”，造反组织在武汉就不存在了，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会上提出了“文攻武守”这一口号。

文革后清算造反派，说“文攻武守”是“秉承江青的旨意”。《红水院》一书说：“江青同河南造反派讲文攻武卫是在1967年7月22日，武汉提文攻武卫是在1967年6月中旬，面对‘百万雄师’对造反派的武装镇压，造反派研究对策，经过辩论，从三个口号——文攻武守、文攻武卫、文攻武攻中选出一个，就是文攻武卫。当时武汉根本没听说过江青有此说法。”¹

18日，二司政宣部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二司战士紧急行动起来，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猛烈的政治攻势，坚决粉碎走资派武力消灭造反派的反革命阴谋。九一三、新一冶、工总青山分部等七个组织向支左指挥部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停止屠杀，否则青山地区革命造反派将采取火

¹ 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8页。

速行动，不惜一切牺牲，突破重重封锁，杀过大江，全力抢救革命战友”。

工人总部发表《关于武汉目前局势的几点声明》，指出当前出现的打、砸、抢、绑架、暗杀及武斗是反革命暴乱，是成都五六事件在武汉重演，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将用革命的两手坚决打击武老谭反革命的两手，迅速组织起来，杀回工厂去，就地闹革命。武重的工总战斗兵团、九一五兵团等十多个造反组织向厂支左办公室发出紧急照会，呼吁“执行六六通令，立即制止武斗，解散百万雄师武斗集团，勒令参加武斗人员立即回厂”。“如若对一再照会、呼吁置如罔闻，武重四千多名造反派工人将武装自卫，杀向社会，展开全面反击”。洪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防指挥部所属新武重革联、武锅联司、新华工、新湖大、二司等六十五个组织发表《严正声明》说：“武老谭当前所制造的大血案，完全是一种阶级报复，是反革命暴乱”，“强烈呼吁武汉部队支左指挥部立即制止武斗，解除百万雄师的武装，严惩杀人凶手及幕后指挥”；号召造反派“实行文攻武守，在实行积极防御，狠狠打击一切来犯者的同时，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

6月17日冲突事件发生后，独立师还自作主张加强控制公检法。20日，在独立师党委会上，蔡炳臣说：市公检法军管会工作不力，“要下决心进行调整”。初步决定，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田文（武汉军区保卫部长）调回去，由牛怀龙任主任；军区派往市公检法军管会的王、高二位科长调到电信局。“把武汉公检法抓好了，武汉地区的支左工作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郝文德说：“军区的人在市公检法不管事”¹。此后独立师完全控制了公检法系统。整训时揭发者质问：军区个别领导为何给蔡炳臣那么大的权力？

三、围攻铁四院和水运工程学院

6月23日晨七时许，三十多辆卡车的百万雄师两千多武装人员围困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将铁四院一百多名造反派逼至四层办公楼的顶楼。下午五时许，二十多车百万雄师人员前来增援，其中有一辆消防车，一辆吊车。消防车用高压水枪喷射，同时浇汽油放火，施放化学气体。六时攻占办公楼，造反派一百多人均被殴打，后绑架到附近的船舶工业学校，致3

¹ 参见（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四十五：牛蔡之流在师党委会议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1967年10月3日）。

人重伤，1人死亡。10人被押到青山区支左办公室，随后关进公安局看守所，七二〇事件后才释放。铁四院造反派负责人徐志雄、徐承华等被押解到百万雄师据点红卫纱厂（原名为武昌第一纱厂）关押。

23日上午十时，百万雄师政参部长蔡俊善、武昌分站一号头头刘喜春和另一头头潘志祥、《百万雄师》报陈秀华等七人乘吉普车去铁四院现场督战，途中被水运工程学院二司学生扣押。水运二司提出百万雄师撤除对险峰大楼和铁四院的围攻，他们就放人。百万雄师总站从下午二时开始，数次发出通牒要求水运二司下午三时半前无条件放人，水运二司未予理睬。“武汉公安”出动船只封锁了长江江面后，深夜，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攻入水运工程学院，冲进教工、学生宿舍和长航设计院打人、抢劫财物，重点围攻造反派聚集的八号楼。24日中午，双方谈判达成四点协议，水运二司放出被扣押的人，百万雄师的进攻仍不停止，他们用推土机在八号楼墙壁上撞开两个洞，占领一楼，把一楼里面的物品扔在八号楼四周，浇上汽油放火烧楼，造反派有人被迫跳楼。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攻入楼内，逼着造反派举手投降，否则就用铁矛刺，当场杀死造反派工人2人。



1967年6月24日百万雄师围攻水运工程学院后的现场（载《战地黄花》）

四、围攻工造总司大楼

6月24日凌晨三时左右，百万雄师七千多人，在汤忠云和江岸分站一号头头张文指挥下，封锁工造总司大楼周边各主要交通要道，占领周围的房顶，完成了对工造总司大楼的包围，楼内有造反派二百余人。早上六时，百万雄师用广播敦促工造总司交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抓进去施行酷刑百万雄师群众”、“卖淫妇女”和“抓进去强奸的少女”。八时，数辆消防车用高压水枪将院内人员全部压制到楼内，双方互掷石块砖头。工造总司及各造反派组织不断打电话给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市人武部，答复是派出的部队进不去，“你们最好举着白旗撤出来，他们不会杀你们的”。十一时，百万雄师用卡车将院门撞开，至十二时仍未攻进楼内。此时，百万雄师武装人员进入与工造总司大楼一墙之隔的武汉无线电厂（当时已军管），从楼后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举着红旗，呼喊“毛主席万岁”，从三楼跳下身亡。这次围攻造反派死28人，重伤六十余人。七二〇事件后，送往火葬场的28具尸体，23具有亲属认领，其余5具无人认领，估计是外地人。

死者中有一位生于1951年12月的小女孩朱庆芳，她是八中初中六八届学生、二司成员。朱庆芳家住友益街工造大楼附近，和比她大三岁的表姐去楼内玩，被百万雄师围在楼内，临时充当广播员。百万雄师攻入后，朱庆芳拒绝举手投降被杀死。邻居冒着危险将朱庆芳抬回家时她还有呼吸，家人看到她大腿静脉被割断，身上也有几处伤口¹。

百万雄师撤出现场半小时后，军区支左办宣传车开到，高叫“要文斗不要武斗”。市民用石块砸车，又将车推翻。随后百万雄师人员再次进入大楼，将尸体运走²。事后去查看现场的百万雄师头头章迪杰回忆说：气窗平台上有将近一尺厚的血³。百万雄师返回“打扫战场”，是高参辛甫的意见：“这些人，打仗以后连打扫战场都不懂，这件事影响很不好！”⁴

参与这次围攻的武汉橡胶厂百万雄师头头董际斗2008年对吴焱金说：“打工造总司前，8201部队以检查消防为名，详细察看了工造总司的防守

1 参见原华中工学院六〇级学生舒晓采访朱庆芳家人的电话录音。

2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57—61页。

3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4 《妖为鬼蜮必成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2页。



造反派“悼念六二四死难烈士殉难两周年”（载1967年9月3日《工造总司》报）

情况，绘制了进攻图形，并在武汉市三十中向待命进攻的百万雄师作了讲解和部署，攻打的每一步骤都讲得很详细具体。当时，武汉肉联厂的百万雄师提出要在消防车水柜内放六六六药粉，我和汽运二站的人坚决不同意，认为太没人性。双方争执不下，差点打起来，还是军代表调停，决定不放六六六药粉。”¹

五、围攻汉阳轧钢厂

6月中旬，三中红岩已经撤到武昌水院，造反派在汉阳的据点只剩下汉轧。23日下午，在市冶金工业公司政治部主任马某、汉轧党委书记冯某和厂长董某参与指挥下，百万雄师武装人员撞破数处围墙进入汉轧厂，包围了三百多名工人和学生据守的七层办公楼。随即广播“致上当受骗学生书”，要求学生与厂内牛鬼蛇神划清界限，退出者“保证不打不抓不杀”。还找来学生家长点着名哀求儿女回家。同时切断水电，控制了食堂。24日清晨开始进攻，从巨型吊车上向造反派投掷硫酸瓶、钢锭、石块。百万雄师很快把造反派逼到楼顶。抗暴指挥部宣告：百万雄师如果冲上楼顶，立即引爆浇上汽油的8个氧气瓶。百万雄师停止了进攻。在场者回忆：“不知过了多久（在极端紧张的氛围中很难判断时间），传来了指挥部的最后通告，为了保存学生们的年青生命，汉轧的工人们决定放弃引爆。这个抉

¹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62页。

择对工人来说很艰难，当时百万雄师对待造反派中的工人和学生有‘政策’上的区别，以上当受骗定义，对学生比较宽容，对工人的惩办严酷无情。对那些铁了心的造反派工人来说，他们宁死也不愿意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无尽折磨。这是当时的我无法体会的。”¹ 武装人员喝令放弃抵抗的造反派举手投降，不举手的用铁棒劈头打去。被俘的工人、学生分开关押，殴打审讯后陆续释放。

百万雄师在攻打汉阳轧钢厂这天，杀死5人，其中工人3人，学生2人；重伤25人，三百多人都遭硫酸瓶、六六六粉、石块、铁棒、铁矛攻击而致伤。死亡的学生是武大二司的刘朝明、古立盛，二司武大总部在校园内为他们立了纪念碑，工军宣队进校后于1969年1月26日将纪念碑炸毁。死亡的工人是汉轧的工总分部负责人钟菊轩和战斗队员陈佐良、杜志远。支持造反派的汉轧厂副厂长吴允恭被关押至7月26日才释放²。

24日晚，陈伯达再次打电话给陈再道，敦促他进一步制止发生在武汉的暴力行为。



1967年7月14日，造反派在武汉大学悼念汉轧事件中百万雄师杀害的刘朝明、古立盛

¹ 杜良怀《武汉“六·二四”大屠杀回忆》（网文，2006年）。

² 汉轧六二四事件，参见武汉大学东方红战斗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1967年8月），杜良怀《武汉“六·二四”大屠杀回忆》（2006年），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462—463页。

第四节 造反派全面撤退

6月22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它的前身是5月16日成立的“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大联指”是由5月5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和5月8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合并而成。总指挥部设在湖北大学，总指挥是新湖大的张维荣，副总指挥是工总的夏邦银、九一三的李想玉、工造总司的吴焱金、二司的杨道远、新一冶的曹承义。

这个总指挥部，人们还是习惯称为大联指。大联指在“揪陈抗暴”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它作为造反派各方认可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互交流、消除分歧的功能，如影响颇大的民众乐园抗暴指挥部就是由大联指直接领导，再如组织大规模游行、统一口号等。但直到七二〇前，大联指并没能统一指挥全市造反派，各组织基本各行其是。其原由有历史宿怨，也有现实的分歧，最大的现实分歧就是工总问题。三钢是主张彻底为工总翻案的；以新华工为首的新派各组织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工总的一些头头和过去的一些做法是有问题的，所以只提“为工总平反”或“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还有如何看待当时普遍出现的造反派按系统、按单位联合成立“革司”“联司”的问题。只是因为来自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压力太大，这些分歧一直存在而没有公开爆发。大联指决定的共同整理上京汇报材料也未能实现，三钢和三新分别组织了材料班子。

25日，高校区二司学生手持长矛举行武装游行，呼喊“抗暴无罪，自卫有理”。是日上午，新湖大决定撤出校园。下午4时，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围攻新湖大，一辆车冲进校园，用长矛挑坏宣传画和大字报，抢走探照灯、喇叭，抓走三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在湖大校园内外看大字报的市民遭到殴打。

六二四后，几乎所有工人造反派组织的总部都搬到华工和水院这两块“解放区”，两校一旦失守，武汉造反派就真的被“一扫光”了。

6月以来，无家可归的造反派工人和学生纷纷涌入水院避难，最多时达一万多人。张建成回忆：这些人“跑到红水院，有如到了解放区，有些人激动得流泪。他们到红水院后，由他们的领导组织他们学习与战斗，我

们不干预，只在后勤方面给予保障。”¹中旬以后，工总、九一三的总部也搬到水院。

新华工则是另一个武汉造反派聚集的“解放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王克文（市委常委）、黎智（常务副市长）等也在这里避难，同时筹备成立市革干联。魏绳武回忆：“新华工当时是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最后一块根据地。涌到这里的人真是不计其数，但校内的秩序还挺不错，吃住还有保障，一个学校陡然增加几万人，能管吃管住，实在不容易。”²

工造总司被百万雄师打下后，造反派在汉口只剩下民众乐园、新中原和长办联司等宣传阵地。25日下午五点左右，民众乐园指挥部撤退，新中原头头陈茂祥与该厂支持造反派的党委书记李长根等退入长办大院³。

25日下午，百万雄师武装人员相继攻占设有造反派广播站的汉口工艺大楼、中南旅社及武昌险峰大楼。当晚，百万雄师在汉口、武昌两个火车站和大轮码头设卡，进入客轮、火车搜查，绑架造反派学生数百人。



刊载于1967年6月1日《新湖大》报的宣传画

1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163页。

2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16页。

3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03—104页。

央文革办事组、军委文革办公室向武汉军区发出电报指示（时称“中央六二六来电”）。电报由杨成武和戚本禹共同草拟，周恩来、陈伯达知悉。电文说：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26日上午，二司一万余人在武测运动场举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杨道远、丁家显及九一三、工总、三司革联、红旗二中敢死队等组织的代表先后在会上发言，表示“不怕牺牲，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后沿华师、武工、军区、省委进行武装游行。游行途中传来中央六二六来电，引起阵阵欢呼。

六二六来电对百万雄师和支持他们的武汉军区极为不利，引起保守派成员和支左部队指战员极大的震动。27日，百万雄师一个头头给军区领导打电话，“要求马上派人来谈谈，否则百万雄师可能垮台”。军区派人与百万雄师头头座谈¹，逐句解读六二六来电，他说：来电说“大规模武斗”“极不正常”，不正常在“十八世纪的武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来电说“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这是对军区绝大的信任”；来电说“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中央并未指责不对，而是要立即停止”；来电说“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凶手“并未肯定是百万雄师”；来电点了百万雄师的名，“反映中央承认百万雄师”，“告诉我们谈判已挂了号”，“这是爱护你们”，“这样我们放心了，以前我们担心中央不要你们去反映情况”²。百万雄师对六二六来电，就是以这样的口径，用宣传车、广播站、大标语来回应，说“中央六二六来电是对百万雄师最大的关怀”。

中央六二六来电后，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随即发表了致百万雄师的公开信，说百万雄师一些人连续对几个工厂、院校进行围攻是严重违反中央六六通令的，向百万雄师提出立即撤出据点、收缴凶器、解散集中人员、

1 《“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18页。

2 参见《武汉军区陈再道之流与“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座谈时讲话（摘要）》，载《七月风暴（第一期）》（1967年9月3日）第8—9页。

释放所抓的人、交出杀人凶手等五项要求。还是那位解读六二六来电的军区人员对百万雄师头头说：“我们的信并不是完全针对你们的，完全没有搞垮百万雄师的想法。……有的军区支左指挥部的东西，不一定都经过军区党委，军区内的意见也有不统一的”¹。叶明对百万雄师的撤退作出指示：“既不要丧失战斗力，又要保持政治上的警惕。”²6月27日，蔡炳臣代表军区来到百万雄师总站解释军区信中的五条通知（五项要求），总站头头对军区没有同时向三新、二司提出类似要求极端不满，蔡炳臣说：“你们不要怕，通知上说你们交杀人凶手，你们有凶手就交，没有凶手就不交嘛！怕什么呢？你们对中央六二六电话表态很好嘛，你们要冷静，不要急躁。”蔡炳臣还说：中央来电要你们停止围攻，“你们对‘停止’这两个字都受不了啦？”而对他们（指造反派）静坐绝食，冲军区绑架钟政委、打伤杨副司令，中央都来电话“说是错误的”。“最近一个时期，你们干革命的劲头足，但是对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很不够注意的。”“你们搞什么战报，报导‘举手投降’的消息，生怕人家不知道，这样好吗？”³刘惠农6月27日在市抓办会议上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力支持百万雄师，支持百万雄师的决心不能变，要接受联合会被砸垮的沉痛教训，联合会被砸垮，就是没有领导支持他们。”⁴

26日晚，百万雄师人员绑架武汉京剧团造反派赴京告状团成员二十余人，在青山绑架九一三工人三十余人。

六二六来电后，省军区处长张才良动员百万雄师总站撤离市委大院。百万雄师头头表示想不通，张才良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我要不是穿黄衣服，早就棒子和你们一样拿了。”“撤了以后，不要解除武装，一样可以自卫”。“大集结不行，可以小分散”⁵。辛甫向俞文斌、杨道安献策：“中央的通知还是要执行，你们可以灵活一些嘛！可以把大据点的人撤到大厂去，大据点醒目的地方撤掉，不能回厂回家的就集中到一个地方，化

1 《武汉军区陈再道之流与“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座谈时讲话（摘要）》，载《七月风暴（第一期）》（1967年9月3日）第9页。

2 《十个为什么》，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三）》（1967年10月）第26页。

3 《百万雄师内幕之十：曾庆裕在斗争辛甫、林立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9月6日）。

4 参见毛泽东思想武汉市机关红司市人委总部办公厅革命造反兵团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惠农三反言论二百例》（1968年3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1967年9月1日）。

5 《“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与武汉军区一小撮走资派关系一瞥》，载《七月风暴（创刊号）》（1967年8月）第18页。

整为零，名义上撤了，实际上人还在，这样既执行了六二六通知精神，又利于你们集中，别人又不容易抓你们的辫子。”¹

27日，百万雄师总站迁至三五〇六工厂，作战部改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部长刘敬胜、政委谢敏华、副部长汤忠云）和斗批改办公室（主任孙德洲，副主任余均才）。很明显，这是对六二六来电作出的回应。辛甫也建议改组或撤销作战部，他给出的是另外两条理由：作战部“闹独立王国”，“谁也管不了”；“作战部头头被造反派抓住过，几进几出不放心。”²辛甫的担心表明他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当时并不知道几天前的6月23日，被水运二司学生抓去的陈秀华等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被公安联司发展为“逆用特勤”³。

中央六二六来电后，百万雄师的暴力行动有所收敛。6月下旬到7月上旬，两派偶有零星冲突。六二六来电说到“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两派均抓紧准备汇报材料。

27日，“汉阳公检法联合指挥部”给毛泽东、林彪写信说：“六·二六一纸电文给百万人民泼了一瓢冷水，大长了资产阶级威风，大灭了无产阶级志气”，“中央文革办事组对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了解很不全面”，“六·二六来电是支持了一方，打击压制了另一方，把被反革命操纵的组织——工人总部和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二司的罪名强加在百万雄师革命群众头上”，“起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给革命群众迎头一棒，压制革命群众的积极性”⁴。

26日，刘惠农召集工交各局抓办负责人开会。市冶金工业公司抓办负责人和汉轧百万雄师头头汇报围攻汉轧经过，市仪表工业局抓办负责人汇报攻打打工造总司经过。刘惠农说：“现在形势很好，阶级阵线分明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要组织起来，你大打，我也大打，你小打，我也小打，把工厂、机关的干部也组织起来护厂，组织街道居民巡逻，控制牛

1《妖为鬼域必成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3页。

2《妖为鬼域必成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4页。

3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铁路公安分处军管组关于汤忠云一案的调查报告》（1971年9月1日）。

4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鬼蛇神。”¹

27日下午，武汉工学院二司宣传车在汉口水塔附近宣传六二六来电，受到市民欢迎。驻水塔的百余名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刺伤司机和十多名学生，其中重伤8人。

6月一个月内，独立师战士以某分队、某排、三个战士的名义三次给百万雄师写信，百万雄师印成传单广为散发。牛、蔡说：“战士写信是他的自由，他喜欢给那个组织写就给那个组织写。”²

28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发出《通告》，检讨右倾、逃跑的错误，宣布回到新湖大，于28日上午八时起开始办公。湖北大学重新出现大字报贴满校内外、观者如堵的景象。

30日下午一时，百万雄师围攻设在汉口工艺大楼的红水院广播站，殴打工总五湖四海兵团（外地学生来汉调查组）和二司水院的学生，刺伤三十多人，水院教师钟光超、学生严菊明被长矛、匕首刺伤（七二〇事件后，刺伤严的老工人到医院看望他并道歉），绑架五十多人。

30日上午十时，四十多名百万雄师成员来到湖大门口，在刚贴出的大字报上写大标语，受到在场市民斥责。百万雄师成员拔出匕首刺伤多人，市民抓住一人送进湖大。百万雄师立即派出数千武装人员围攻新湖大。路过的体院二司学生姚正国叫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当即被刺死，拍摄百万雄师装甲车的一武测学生被刺伤，围观的中南电力设计院一职工和一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均被刺中腹部。下午，百万雄师出动二十多辆卡车和八辆改装装甲车，再次围攻新湖大，用装甲车撞倒围墙三处，冲进湖大校园，见学生就打。中央文革办事组再次来电，要他们撤离并释放被抓去的人，围攻还是持续到当晚九时，打死体育系统造反派“红体兵”成员3人，打伤新湖大等组织的数十人，抓走一批工人、学生和市民。8199部队赶到制止，事态没有继续扩大。

事后辛甫在市委组织部说：“这次百万雄师打新湖大，很讲究策略，首先把学校围起来，再通过各方面向中央文革打电话。因此，中央连续打来两次电话给新湖大，这样在政治上主动。上次百万雄师打水运就很被动。

1《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惠农罪行大事记（从二月黑风至七·二〇严重政治事件）》（1968年3月10日）第9页。

2《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罪责难逃》，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14页。

百万雄师从围攻水运一直到打垮水运都没有给中央文革打电话，结果中央不了解情况，点了百万雄师的名。”¹

7月1日上午，造反派在湖大运动场举行纪念七一大会，工总和九一三负责人担任执行主席，任爱生为名誉主席。会后三万余人举行游行，经由长江大桥、江汉桥来到汉口，有大量市民夹道鼓掌欢呼，送茶水、冰棒、酸梅汤、面包、草帽。

2日，钟汉华接见省直机关保守组织“省司”、“省人司”时讲话，系统表达了对造反派各组织的看法及今后的策略与政策：“牛鬼蛇神要抓，但重点是对一小撮。问题要在后期处理，王任重的秋后算账不对，但有人的账，还是要算的。”“对‘三新’、‘二司’同意你们的看法，原来是革命造反派。现在大方向错了，特别是二司滑得更远，时间更长。他们内部分化很厉害。”“‘百万雄师’如能再克制一下，对他们的分化更有好处。”“对‘百万雄师’写信，不是那个情况（指单方面写信）。我们也给‘三新’、‘二司’写过很多信，有时一个小时一封信，这次给‘百万雄师’写信是提希望，说希望你方把凶手交出来，不是勒令。既是提你方，也有另一方。”“‘百万雄师’开始是批判刘、邓、陶、王联络站，六月四号后，我们开始作他们的工作。对‘百万雄师’的错误，我们及时的指出来了。如六月六号‘百万雄师’发出紧急动员令，我们就提出了批评，伯达同志看了，批‘请陈再道同志设法制止武斗’。”“对‘三新’、‘二司’的错误，我们是要进行斗争的，但要讲究策略。如把真相公布于众，把他们搞垮了好不好？他们自己垮了是另一回事。”“‘三新’、二司、工总加起来七、八万人，不能说都是牛鬼蛇神，多数要争取，要团结他们中的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思潮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有流氓无产阶级，据说新华工、新湖大也不承认钢八司。阶级斗争会有反复，会有动摇分化，要作少数派的工作。你们批评我们‘和稀泥’，有时候不可能不和稀泥。说我们措施不力，他们都不听话，你说怎么办？对‘三新’、‘二司’，部队也有一肚子气。真正坏人是要抓的，但武斗时抓不住，不管怎样，这些问题，将来还是要处理的。”“你们要从最坏处着想，万一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也要在政治上站得住脚，即使有人动摇分化，也不要怕。”“你们是

1《妖为鬼域必成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3页。

司令部负责人，精神状况很重要，要三相信三依靠，对我们对的就照办，不对的不办，按照江青同志指示办事。”“我们还是‘六四公告’的观点，谁是敌人、朋友，必须弄清楚，这就不会犯错误。”“当前形势特点：一、分化；二、对立。一对立就有一方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再就是武斗。根源是阶级敌人，无政府主义思潮，工作缺点错误。”“以后不要提什么工总复活分子，工总中群众要起来革命，还是要欢迎的。”¹

7月3日，武汉机床附件厂部分百万雄师成员成立新机附百万雄师革联，发出“造反公告”说：百万雄师对抗中央指示，脱产搞杀人凶器，围攻若干院校，敌视革命造反派，实际上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三钢、三新大方向是正确的；工人总部一定要平反，彻底翻案。4日，武昌造船厂百万雄师主要头头代某宣布造百万雄师的反。5日，武钢九一三农业分场百万雄师成员宣布退出，加入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络总站。6日，洪山区东风公社毛泽东思想星火造反团七百余人退出百万雄师，表示决心为工总翻案。中央“六二六来电”后百万雄师内部的这些分裂行为，影响不大。

7月10日，驻汉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根据陈再道的指示，“统一了三条口径：一是‘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对他们不能糊里糊涂地支持，他们如果坚持错误，垮了自己负责；二是‘百万雄师’是客观存在，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对他们要帮助、教育、提高，我们赞成这个组织，支持这个组织；三是三、五天内，各单位要把对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看法的材料准备好”²。陈再道在会上说：“三新、二司我们以前支持他们，现在天天搞我们部队，这算什么鸡巴革命派？”³这次会议确定坚持军区支左工作的方向，以此为原则向即将来汉的中央领导汇报。7月15日至18日，军区领导在周恩来面前坚持的就是这一认识。陈再道后来在口头检查中提到：“七月九日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

1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1967年9月）。

2 《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4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陆海空三军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8·4”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纪实》（1967年8月5日）。

反派嘛，是个很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¹。

11日，牛怀龙在师党委扩大会上说：百万雄师“应该说是革命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在全国来说是独创（产业军才八十万），不可低估，（干部亮相在这边，牛鬼蛇神不敢靠，群众拥护它）做了些过头事，最近恢复生产搞得很好，斗争王任重，防汛等。”²

7月7日凌晨，八十多名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围攻实验师范学校，打砸广播台，用汽油点燃课桌椅等物品火攻，致二司学生3人重伤，十多人轻伤。

9日，四卡车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冲进四十四中，绑架71名二司学生。

10日凌晨，武钢耐火材料厂工人、九一三成员吴炳华在青山公园公共汽车站被百万雄师杀死。

13日，百万雄师武装人员绑架新一冶负责人徐彪等7人。

7月，新华工在遭受重大牺牲、百万雄师随时可能向华工校园发动进攻之时，毛泽东塑像建设工程也没有停止。

新华工成员、六四级学生陈定方回忆：

1967年4月，新华工正全力投入“反逆流”，新华工发起的“营救夏邦银”静坐示威正在进行，28日，冲锋大队（机二系）贴出一张大字报：

“强烈要求红司司令部在我院建造一座毛主席巨型塑像！”得到全体新华工战士响应，红司司令部很快作出建造毛主席塑像的决议。

斗争艰苦，造反派想念毛主席。6月1日，主席塑像建造动工誓师大会有举行，武汉各造反组织和首都红代会的战友送来了热情的贺信。

新华工自卫武装292部队组建了毛主席塑像建筑工程队，负责施工建设，新美校（武汉工艺美术学校）鲁迅兵团和新美院（湖北美术学院）红旗战斗队负责设计，美校教师朱达诚为主要设计者。7月工程进入最紧张

1《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载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474页。

2（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十七：揭开一次策划对抗中央的黑会内幕》（1967年9月5日）。



1967年10月落成的毛泽东塑像（刘俭摄影）

阶段，正值酷夏，百万雄师天天扬言血洗新华工，参加建造的同志没有一个动摇。8月底，塑像的泥塑部分完工。新安装（市工业安装公司）红色革命敢死队、市房地局住宅修缮公司第三施工队工人战斗队的师傅们，日夜在工地进行灌浆工作。砌大理石基座，他们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为解决塑像右臂强度不够问题，新城建（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狂飙战斗兵团的同志应邀到现场参与意见。华工附属工厂焊接车间的工人完成了塑像壳体中钢筋焊接工作。工

程历时四个月，一个多月的工期处于白色恐怖中。

10月7日毛主席塑像建成，基座正面的汉白玉石上，镌刻林彪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背面镌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新华工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敬建”。经2020年1月陈定方、谷曼等用激光测距仪测量，基座上毛主席像连同手臂高度为8.846米，毛主席塑像连同基座总高度为16.006米。

1967年10月9日，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由康生等陪同，访问新华工，瞻仰了新建的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塑像所在的广场被命名为“中阿友谊广场”。这座塑像至今矗立在华中科技大学正门后面¹。

7月12日，二司《革命造反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坚决打倒陈再道》。文章说：陈再道是王任重倒台后湖北、河南的反革命势力总代表，要警惕出现反革命暴乱。文章还说：自6月下旬以来，全国有一百六十多个单位

¹ 陈定方《华中工学院建立毛主席塑像》（2020年1月）。

和组织发来声援电，支持武汉造反派的抗暴斗争。

7月6日、7日、9日，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10日，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¹。

¹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76）》【1967年7月6日、7日、9日】。

第十六章 七二〇事件¹

1967年7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讲述中央解决问题的精神，发表指导性意见。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主要领导挑动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公检法”，抵制中共中央处理武汉文革运动问题的精神，武装冲击武汉军区和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代表团下榻的东湖宾馆，揪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并以暴力压制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造成在文化革命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七二〇事件”。18日离汉返京的周恩来，20日自京再赴汉指挥平息事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该事件做出严肃处理，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指出：“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称此事件为“叛逆行为”“严重政治事件”，同时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

此后，文革司令部内部出现系列重大人事变动，文革的阶段性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1972年5月，一度受到批判、赋闲近5年的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治委员钟汉华被重新起用，但是直到文革结束，中共中央对于“武汉事件”的定性一直没有改变。在中共历史上，“七二〇事件”是罕见的，陈、钟的“叛逆行为”也是罕见的，但毛泽东与周恩来对陈、钟及牛、蔡、巴始终是宽容、宽大的——当他们在北京被保护起来“学习”，为他们所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的头头都蹲在监狱里。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同意为该事件平反昭雪。该报告无视毛泽东、周恩来亲身经历、亲自处理这一事件的基本历史事实，称：“‘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

¹ 本章内引自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一书的部分材料，为避免繁琐，未一一注明出处。

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为该事件平反昭雪，成为当时彻底否定文革的关键突破口之一。

第一节 毛泽东决定就地处理武汉问题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京全体成员开会，谈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并对全国各地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要到长沙、武汉去看看，准备在武汉游泳。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周恩来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又电话指示正在重庆的谢富治，让他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谢请示要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空军政委余立金和随行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同去武汉，获得同意。周恩来当晚即飞武汉打前站，安排毛泽东住处¹。王力回忆：毛泽东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²

此时，中央并没有讨论武汉文革运动的问题。在1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没有具体谈武汉问题，也没有对武汉问题做结论，毛泽东只说去武汉做调查研究。此前，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从来没有对武汉问题进行过正式研究。但是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武汉问题是有预案的，即支持武汉造反派，工总翻案，武汉军区、百万雄师转变立场，通过谈判、协商，达到团结。中央六二六来电一方面批评百万雄师围攻学校、工厂，一方面指出“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各革命群众组织”是包括百万雄师的。周恩来7月18日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上详细阐述解决武汉问题方针时说：“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揪走王力后的7月21日，孔庆德对百万雄师“专揪王力指挥部”成员说：“周总理说，武汉问题要到北京解决，每个大组织派五十至一百名代表，周总理亲自带队，周总理还说他同百万雄师的代表坐一个飞机去北京。”

¹ 参见《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68—26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第170—17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

²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第39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对于武汉军区和陈再道，毛泽东没有打算像解决四川问题那样直接改组军区，他在离京赴汉前说“到武汉保陈再道去”；后来与陈再道等人谈话，依然强调检讨之后不打倒，“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

毛泽东、周恩来也考虑到局势发展的另一种可能并作了安排。

7月14日谢富治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来到武汉，除了他身为副总理、公安部长外，也由于驻武汉地区的空降兵15军，老班底是解放战争期间陈（赓）谢（富治）兵团九纵。这支部队一周后在应对武汉非常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原中央警卫团陈长江回忆：“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出……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了准备的。”¹

第二节 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

毛泽东和周恩来抵汉之前，根据从多个渠道获得的的大量信息，基于全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武汉问题已经有了基本倾向和态度。

姚克强回忆他为周恩来赴武汉准备材料的情况说：

（1967年5月从武汉）回去学习一段之后，就开始编写武汉运动的资料，为中央召集两派谈判做准备。因为我在武汉呆过一段，了解情况，也信任我，就要我担任材料编写组的组长，总理的联络员吴斌（是一个司长）担任副组长，还有两个国家信访局的同志一起，住在西安宾馆，编写湖北的资料。内容包括各派的头头，思想倾向、观点，组织情况，把造反派和百万雄师两个方面的情況都包括进去，准备为总理主持的谈判做参考。这个时期忙了一个多月，编得差不多了，印出来²。

14日凌晨，周恩来和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离京，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

¹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50—5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² 老田《姚克强访谈录》（2014年11月3日）。

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萧前前往机场迎接。周恩来抵武空司令部后，让刘丰通知陈再道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心里纳闷可以想见。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钟汉华，就告知他们中央对于武汉问题的态度。钟汉华七二〇事件后作检查时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陈再道也证实了这一事实。

周恩来不是让武汉军区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毛主席安全；又把东湖宾馆内警卫梅岭一、二、三号和附近树林、道路的独立师人员，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但整个宾馆大院仍由独立师警卫。这一举措本属中央保卫制度的惯例，但蔡炳臣认为这是不相信他们。15日，军区保卫科王振英和孔庆德建议调8199部队（29师）加强宾馆警卫，钟汉华没有采纳。

14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自重庆飞汉口，一行人到达东湖客舍，周恩来立即接见他们。下午，周恩来召集宾馆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两派负责人开会，提出：1. 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 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 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调整宾馆工作人员，把参加百万雄师的工作人员换成参加工总的。晚上，周恩来与三军领导及谢、王一行在百花一号开会。随毛泽东同行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前来报告毛泽东已经到达，周恩来立即赶赴毛泽东的住处梅岭一号。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按中央军委工作程序，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当夜，王力、谢富治一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在场群众激动得流下眼泪。消息迅速传开，湖大附近的湖北中医学院三司学生也贴出标语表示欢迎，各学校广播台不约而同地播放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周恩来听说消息业已传出，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将中央代表团来汉的消息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一、毛泽东表明对武汉问题的基本态度，周恩来做军区的工作

7月15日上午，毛泽东开始听取关于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

并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先从部队解决。下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和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¹。北京来人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

16日，毛泽东明确指示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百万雄师可以继续保持组织名称。1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²

据杨成武回忆，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湖北有可能要先进些。‘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对于武汉军区，毛泽东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指造反派、保守派和三司）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³

连日的汇报会议上，陈再道对于周恩来的基本意向和劝导想不通。周恩来在17日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此时陈再道不知周恩来的讲话正是毛泽东的指示，也不知道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陈再道不满周恩来的讲话，对要

1 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据俞文斌《“七·二〇”事件是一个大冤案》（1978年10月）（载湖北武汉纪念“七·二〇”三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主编《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一辑）》）：“当时，武汉军区曾经给‘百万雄师’概括了‘十大’优点：1.大方向始终正确，矛头指向一小撮；2.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贯彻‘十六条’；3.对解放军始终信赖，用生命保卫解放军的安全；4.能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5.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6.有无产阶级的纪律性；7.坚持抓革命、促生产；8.反对武斗，被迫自卫；9.成员多是老工人、老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0.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14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 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第173—174页。

他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劝说陈再道：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陈再道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恩来，还说让周恩来自己去调查。周恩来让陈再道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陈再道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拍着桌子说：“周胡子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18日，陈再道指着周恩来的讲稿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恩来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¹。

军区支左办公室成员事后揭发：“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继续坚持错误……可是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原来我们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谢副总理、王力来了三天就决定武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了。不是那样子……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人家清楚得很”²。

陈再道本人在1967年11月30日作检查时也谈到：“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

1 参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199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陈再道的生活副官陈某证实陈再道的确因对总理意见想不通而拍桌子。此事当时在场的人都已私下传开，也很快传回北京，邱会作就听说了陈对周恩来拍桌子。七二〇事件后，中央办的湖北省军队干部学习班在11月23日上午批判陈再道，军区机关领导和干部曾经揭发陈顶撞总理、拍桌子。15军军长方铭后来对群众组织代表回忆：陈再道说怕群众不依，军队和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周恩来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另见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第25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2 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员1967年7月底在军区机关批判会上的发言，载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33—34页。。

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陈再道文革后写文章说：“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¹。对周恩来的劝说，武汉军区主要领导报以消极对立的态度。

18日晚总结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带陈、钟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讲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毛泽东接见有关人员，宣布中央对武汉的态度，对周、谢、王、余、李作鹏、汪东兴、陈再道、钟汉华等谈到：为什么工人阶级分为两大派？我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也谈到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他夸奖工总在水利学院修筑的自卫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

会议明确了关于军区支左、造反派、百万雄师问题的三条基本方针。陈、钟在毛泽东亲自指示和安抚下，接受了批评，当面表示要释放被抓捕的造反派工人，做部队的转弯工作。周恩来在毛泽东接见陈、钟之后，连夜赶回北京。陈、钟立即亲自释放了朱鸿霞和胡厚民等人，并让军区有关领导按中央指示精神修改、印刷检查公告。

二、谢富治、王力接触各群众组织

7月15日，大联指组织数万人游行，抗议百万雄师绑架新一冶负责人徐彪等七人的行为，队伍里同时打出“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等标语。新华工三千人为游行队伍殿后，下午四点多钟经汉口武胜路返回武昌时，已游行七个多小时，疲惫不堪。驻扎在武胜路上百万雄师据点电车公司内的专业武斗队“闪电兵”出动，和其他据点调来的数百名武装人员一起向游行队伍冲杀，当场杀死新华工李长亮、黄以礼、杜向东、王兴汉、张兴荣、朱纯钢等六位师生。百万雄师武装人员随即在电车公司附近挨家挨户搜查，

¹ 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载《革命史资料》第1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6月版。

把搜出来的新华工学生全部用汽车拉走。

新华工头头王富山回忆：7月19日上午，即“七一五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武汉空军支左办公室通知我们新华工派勤务员同他们一起，去市郊东西湖认领七一五被百万雄师杀死的四名新华工战士的尸体。勤务组要我与几名同志去处理这件事情。我带着有关人员首先来到武汉空军司令部，廖冠贤副政委接见了我们，要我们正确对待和正确处理这件事，并且派武空副参谋长张以诚带领一个连全副武装保护我们前去。战士分乘三辆大卡车，还有一辆军用卡车上装有从武汉殡仪馆拉来的四副内衬铁皮的棺材。来到东山农场，对方已有不少人在那里等候。战士们按照对方的指点，在三个土坑里挖出我们新华工四位师生的遗体，遗体已经腐烂。从第一个土坑中挖出两具叠放的遗体，上面就是王兴汉老师，一拉手臂，整个皮都脱落了，其惨状目不忍睹。接着，又从紧挨着的两个土坑中挖出两名同学的遗体。遗体直接拉到湖医附二院尸检，每具遗体上都有七八处至十来处伤口，当时医院都做了记载。尸检以后，将遗体送到武昌殡仪馆冷藏，家属到来后才火化。七一五新华工六位师生遇难，给新华工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们的亲属更是悲痛万分。他们的骨灰被埋在喻家山南麓的松树林中¹。

参加认领遗体的一位与张建华同系的学生告诉张建华：“死者的舌头都伸出好长，是被活埋的确定无疑。”²

游行时留守学校的红司（新华工）司令部委员张建华回忆：“当我们的游行队伍返回快到武胜路时，监听电台里突然传出了独立师给百万雄师的指示：“新华工游行队伍很快就要到达武胜路，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迅速向武胜路口集中。”当我们的游行队伍到达武胜路时，独立师立即向百万雄师发出了具体的命令：‘×××厂向××路口集中’‘×××厂向××路口集中’……。不一会又发出命令：‘新华工游行队伍已接近武胜路口，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命令声和接受命令的回答声在监听电台中此起彼伏。”“‘七二〇’后，当时的录音带已上交给中央”³。

当晚，谢富治、王力到华中工学院。在电影场群众大会上，谢富治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上缴武器，他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1 王富山《我的简历》（2016年，未刊稿）。

2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57页。

3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258页。



1967年7月15日，谢富治、王力在新华工群众大会上（载7月18日《新华工》报）

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王力接着讲话：“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对于中央来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百万雄师总站存在两种应对方案：有人主张按原来准备的材料汇报，希望扭转中央对于武汉形势的看法；另

有人主张武力解决问题，他们分析了全国形势，对于中央是否会倾听百万雄师的意见毫不乐观。7月17日零点三十分左右，谢富治、王力前往设在硚口区3506工厂的百万雄师总站，百万雄师在场人员态度十分冷淡。谢劝诫他们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权利。谢富治要俞文斌开出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俞文斌照办了。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俞文斌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 立即停止武斗；2. 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 撤除所有的工事；4. 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 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 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 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权利。”这次会见历时二十多分钟，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对谢、王的态度十分不满。会见情况次日百万雄师总站即传达到基层组织¹。

俞文斌回忆：“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后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²俞文斌的意思是，谢、王失去了缓和百万雄师群众愤激情绪、与百万雄师认真沟通的唯一机会。此时百万雄师群众还不知道周恩来15、16日批评军区的讲话，但他们根据14日中央来人后的种种迹象判断，中央代表团绝不会倾向自己这一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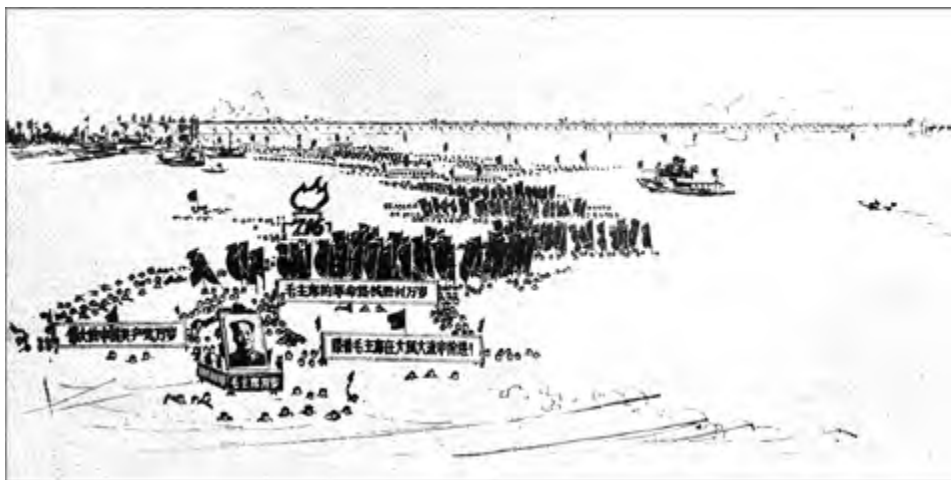
7月16日，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为举行庆祝活动，两派难得地

¹ 参见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22—23页，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52—53页。

² 2005年11月29日徐海亮采访俞文斌的记录。

协商一致，分别举行渡江，百万雄师一方高姿态地把“正日子”让给造反派，自己15日渡江。16日，造反派数万人在军区拒绝提供救生船等安全保障设施的情况下，顺利渡过长江，并在汉口游行。汉口市民夹道欢迎，见烈日下游行者赤着脚走在发烫的柏油马路上，市民脱下鞋，像雨点一样投向游行队伍，往路面上泼水降温，给游行者送冰棒、西瓜、凉茶。这一天百万雄师没有发动冲击，沿途广播站一反常态地呼喊“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口号。正要返回武昌的水院等校二司学生风闻江汉桥被百万雄师截断，傍晚时分近两千人来到一中暂避。一中食堂毫无准备，只得用广播动员附近居民送饭。顿时，稀饭、绿豆汤、米饭、馒头还有普通人家一个月难得吃一两次的排骨汤、红烧肉，源源不断地送到一中校园。事后《新一中》报的报道写道：“不到半个小时，近两千人的吃饭、喝水问题就超额完成了！到后来我们的广播台不得不再呼吁大家不要再送了，东西太多，吃不下了！但是，送茶送水送瓜的仍是源源不断，动员革命群众把抱来的东西拿回去，成了我们战士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七月十五日新华工的战友突围转移到我新一中，就是他们，给战士、伤员们送来了两百多个鸡蛋，三十多斤红糖，数不清的瓜果、点心”¹。16日夜和次日晨，华师、水院二司学生分别从一中返回学校，沿途没有受到百万雄师的拦截。

毛泽东、周恩来的意图是：中央代表团先打通部队的思想，同时充分



1967年7月16日造反派横渡长江速写（载7月21日湖北日报）

¹ 新一中革司六三〇三部队《革命群众是我们的贴心人》，载《新一中》报第22期（1967年7月）。

听取各派意见，调查研究，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17日凌晨与百万雄师头头初次会见，问题变得僵持。19日谢、王计划次日再对百万雄师做疏导工作，但形势已经急遽恶化。

17日凌晨一点二十分左右，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到设在武测的二司司令部，与工总沈复礼等4人、九一三陈涤、二司方保林等6人、三司许谦等2人座谈，历时一小时。谢富治说：1. 立即终止武斗，制造谈判气氛，为解决武汉问题创造条件。你们二司是很有影响的革命造反组织，要有风格，要站得高看得远。2. 希望你们坐下来学习，学习中央文件和社论，特别是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坚决按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王力说：武汉的问题依靠你们和人民解放军，你们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主席派谢副总理和我们来，是来帮忙的，主要依靠你们，我们起的作用很小。你们不要乱提口号，主席有个最新指示，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组织，也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谢富治说：要坚决按主席教导，团结大多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三司许谦提出，三司明天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请首长到会作指示，谢、王表示：开大会我们不能去，我们刚到武汉，还不了解情况，现在是在学习，大会最好不要开¹。7月25日，谢富治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一位二司成员谈到三司问题：“在‘二司’司令部召集‘三钢’开会，为了想把‘三司’从陈再道那边拉过来，我找了两个‘三司’代表来，结果他们对总理的四点指示很生气，但又不反对总理，却把四点指示说成是王力的黑指示，要打倒王力，还发表声明要打倒我，这是他们硬要往陈再道那边倒。”²

17日，工总、九一三、二司联合发表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严正声明》，表示誓作执行毛主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指示和中央六六通令的模范，立即查封一切武器，拆除防御工事，停止一切武器的试验和制造；坚决贯彻执行六二六通知，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期间不搞大型集会；凡能回厂的造反派工人立即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关于制止武斗问题愿与百万雄师交换意见，呼吁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革命同志立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¹ 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² 《中央首长关心武汉造反派（1967年7月25日天安门城楼上对“钢二司”一女战士的讲话）》，载周良宵、顾菊英《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下册）第1670页。

来；强烈要求武汉军区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和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这天，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也发表了类似声明。

19日凌晨，谢、王前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体育馆对六七千工人、学生造反派发表讲话。谢、王再次强调停止武斗，坐下来学习。王力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能对持不同意见的群众采取压制、打击报复的做法，“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就是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王力还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随谢、王前往的武汉空军政委萧前与副司令员刘丰也在集会上表态，



1967年7月19日，谢富治在红水院群众大会上（载高群编著《红水院》）

要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支持革命左派。刘丰激动得流出眼泪。

三、独立师对立情绪发展

在毛泽东、周恩来来到武汉前，百万雄师、独立师对中央特别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不满情绪已在酝酿。

陈再道后来在检讨中承认：“7月9日（军区）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〇’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

工人总部是不是反革命组织，该不该翻案，是当时武汉文革运动的一个关键。造反派提出一个口号：“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军区主要领导、百万雄师的头头几个月的言行表明，在工总翻案问题上他们绝不退让。因为工总一旦翻案，就是他们政治上的彻底失败。

独立师作为武汉地区支左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深深卷入文革运动。他们对于压制造反派、大力支持并直接指挥百万雄师的暴力行为，负有具体责任，独立师领导对于即将到来的“摊牌”——决定自己支左工作的路线是非和政治命运，思想上十分紧张。他们分析了全国各地的情况，对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最终意见并不乐观。在7月9日至14日举行的独立师党委扩大会上，11日牛、蔡详细传达了9日军区常委会精神，并讨论了三天。14日蔡炳臣在作总结时说：“武汉军区支左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暂时性的”，指示各团根据党委扩大会所统一的口径，组织讨论，统一认识。

16日，武汉三镇街头开始出现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

到工农群众中去”“强烈要求王、谢首长下连当兵”。

17日，省劳改局军代表翁某说：“王力是知识分子，是相信知识分子的，是执行臭知识分子路线”。“这次王力这样搞下去，我看他回不回得去成问题，百万雄师不把他搞死才怪呢。那时候部队才不管的”。

17日，驻扎在独立师内线指挥部的某连连长在军人大会上讲：“中央将四川问题处理错了，毛主席最近指示：‘要给产业军平反’。不平反不行嘛！产业军七、八十万人，不平反他工人不做工，农民不卖给国家粮食，车子不开，菜不卖，看你怎么办？！开玩笑！同志们想想，武汉百万雄师一百七十来万人，要是中央表态到三新二司那边去了，我看一切都完蛋，那还了得。”¹

19日上午，汉口某单位军代表张某对百万雄师头头说：“中央最近有个别人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有：河南省军区支左方向错了；‘二七公社’是左派组织。毛主席看后，将这两条划掉了。”“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由中央文革直接管，现在，中央把全权交给了武汉军区，因为武汉军区政策水平高，中央信得过，运动至今还没有开枪打死过人。”“江西军区指战员被迫转入农村。”“关于成都问题，中央做出决定后，部队不通，其中8个战士徒步上北京，要将材料亲手交给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表示不信任。”²。



百万雄师的标语（载《大武汉新影》）

1 独立师战士陈志鹏《8201在“七·二〇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1967年8月7日晚于汉口高级步校），载毛泽东思想红工兵湖北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市总工会红色造反团合编《红工兵 红色造反团》报第八期（1967年8月27日）。

2 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四、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总结讲话

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从15日至18日开了四次，前三次主要听取军区、独立师的汇报。他们精心准备多时的汇报材料（如工总“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没有获得预期效果。按照蔡炳臣19日传达周恩来指示时的说法，汇报时“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表示态度”。“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的看法时，王力很反感”¹。牛怀龙对会上汇报时的不同意见同样“很反感”，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七二〇后对杨道远谈到，他在会上的汇报与军区看法不同，牛怀龙朝他直瞪眼，阻止他发言，王步青说你瞪什么眼，我讲了你也可以讲嘛！王步青还说，陈再道心里不服，在下面埋怨信俊杰没有汇报好，没有把军区整的材料交给周总理，总理不了解情况。信俊杰说，总理不收军区的材料。陈再道说，你塞也要塞给他²。

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完整地体现于周恩来7月18日的讲话。这是四天会议的总结性讲话，讲话稿由周恩来在东湖宾馆亲自拟订，毛泽东在17日看过。

周恩来讲：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³，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

1《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6页。

2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91页。

3“有反复”是指较早夺权、已经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邻近的省”指四川、河南。

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二十多个省的前面。……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是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二·一八”，“三·二一”，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一·二六”，“二·八”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三·二一”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¹。

“百万雄师”是四·一六开始酝酿，五·一六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²！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

1 周恩来在这里批评任意解散群众组织是“无组织无纪律”，意思是事前应当向中央请示。不过中央认为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一种思潮”，改了就好。

2 武汉军区一直给工人总部及造反派加上“保王任重”的罪名，钟汉华7月10日在师以上干部会上还说“王任重在新湖大整了一本陈再道的材料，所以他们抓陈”（《七月风暴[增刊之三]》第10页）。在向周恩来汇报时，军区以此罪名为主要理由反对为工人总部翻案。军区这种匪夷所思的做法，使周恩来“感到惊讶”。

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¹？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指“二·八”、“二·一八”、“三·二一”、“六·四”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²，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³。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

1 对周恩来这句问话，有参会者回答：（百万雄师是）抓办搞的。陈再道1967年11月30日作检查时提到，周恩来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2 周恩来对市人武部、独立师的这个批评是准确的。市人武部、独立师以至武汉军区介入武汉文革运动半年之久，对运动情况包括群众组织情况依然隔膜。例如，7月2日钟汉华说“三新、二司、工总加起来七、八万人”；7月15日独立师党委拟定的向周恩来汇报的提纲说到“在中等学校的学生中，他们（中等学校红卫兵）占绝大部分”（《七月风暴[增刊之二]》第17页）。这些说法与实际情况相距太远。

3 “指名”可能是指中央对湖南湘江风雷的处理。当晚在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和陈、钟开会时，王力说到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周恩来在解散工总问题上承担责任，是给陈、钟台阶下，也是给他们树立一个做自我批评的榜样。

行为要澄清¹。

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²。

武汉军区和独立师主要领导以及百万雄师头头极其抵触、不愿意面对的，正是周恩来的这一席讲话，特别是前四条。他们不敢把矛头对着周恩来，只得自欺欺人地把这四条说成“王力的四点指示”。周恩来再次回到武汉，21日在东湖边对北航红卫兵井岗山、吴介之讲：“王力同志和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嘛，他们的讲话是主席和我同意的嘛！‘百万雄师’是对着中央来的。主席很生气，他老人家没有料到会这样，我们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这种情况。”³7月25日，周恩来对河南省军队干部讲：“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⁴。

18日晚，毛泽东接见陈、钟，谈及武汉问题的处理意见与周恩来当日所讲完全一致，指示陈、钟首先要把部队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群众组织的工作做好了，思想工作做通了，再来开会协商，解决问题。毛又对陈、钟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⁵。七二〇事件后在作检查时，陈再道承认对毛泽东的指示“也未传达，也未去做”，钟汉华承认他“是拒不执行，也不传达”。

在毛泽东住处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于晚十一时半飞回北京。

五、周恩来讲话被提前传达，独立师率先上街

18日的军区会议宣布了纪律：不录音，不要上大字报，不要传达；周恩来也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

当晚，周恩来离开武汉不久，钟汉华同意独立师政委蔡炳臣在师机关

1 这一条是批评造反派对军队的态度有不妥当的地方。

2 《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7月1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3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4 《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1967年7月25日），载河南二七公社赴京汇报代表团编《中央首长关于河南问题的指示及赴京汇报纪要汇编》（1967年8月16日）。

5 参见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传达。钟汉华1967年12月1日作检查时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¹。

军区会议决定不向下传达的周恩来讲，蔡炳臣于18日晚传达到独立师部分党委成员和机关正副科长，于19日上午传达到师直单位排以上干部、全师营以上干部、各军管会军代表。此后军代表又向各单位的群众组织传达。从向部分党委委员传达，到百万雄师群众听说所谓“四点指示”，不到一天时间。

蔡炳臣在传达时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指王力在会议上“将军区整理的‘百万雄师’十大优点逐条驳斥”）。牛怀龙说：“我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思想上也是不通的，杨代总长还因此和我谈了话，我表示思想不通组织通，个人意见保留”。“我们不是不代表大家的意见，而是中央政策已定，首长们根本听不进去了”。牛、蔡的情绪激起在场干部对周恩来指示极大的不满。牛、蔡还反复强调“对外不要提是周总理讲的”²。一天以后，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在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中，把矛头集中对准王力，始终把中央、周恩来的指示说成“王力的四点指示”。

19日下午师机关进行讨论，师后勤部政委李子君说：“中央代表不走群众路线，不深入群众，不听部队汇报，来了四天就作出结论，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种结论不可能正确。”³

19日下午，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郝文德召见“武汉公安”一号头头李树春，向他透露了周恩来18日的讲话内容。“武汉公安”总部、各

1 钟汉华1967年12月1日的检查，载《中央举办的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河南省军区干部集训班资料汇编》。

2 《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6—7页。

3（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之三十八：揭露李子君在“七·二〇”反革命事件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9月22日）。

分部随即接连开会传达¹。

19日晚饭时，独立师某团宣传队员朱学诗在团部篮球场地面写了一条标语：“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下部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有人在“中央首长”几个字旁加上“周恩来”三个字。在场的干部战士都表示支持²。

19日下午四点半，驻扎在独立师内线指挥部的某连得知所谓“四点指示”，“全连大哄，连长首先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章，有的还穿上了护具，戴上钢盔，拿着枪，跑到外面去找三新二司的战士杀！夜12点，全连还在哄，当时指导员就对大家讲：‘同志们，我和你们心情一样想不通！不说别的，你中央首长来汉五、六天的时间，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进行调查，就乱发言，乱表态！这是什么作风！我相信中央会重新解决武汉问题的’”³。

19日傍晚，独立师一团政委周德芳、团长员恩良召开排以上干部会，传达了蔡炳臣传达的“周总理指示”。员恩良说：“今天（师部）开会，就是（说）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为工总彻底翻案。”周德芳说：“周总理不愿听下面汇报”，“周总理把钟汉华问得答不出话来，钟就表了态”。会议还在进行，团机关大院就出现了“强烈要求中央首长下连听取战士的呼声”“打倒高高在上的周滑来”等大标语。周、员看到“默不表态，毫不制止”，并听任宣传车上街⁴。

文革后，俞文斌说：“当时造反派学生把王力在水院讲话播放出来，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⁵陈再道说：“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

1 参见《武汉公安——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2 参见朱学诗《武汉“7·20”事件起因——冲入东湖“第一车”上士兵广播员回忆》（网文，2012年2月21日），朱在此文中说：“作为‘7·20’武汉军民大游行车队的‘领头车’、开进东湖客舍‘第一车’——解放军8201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车载广播台的广播员，我是720事件的亲历者；作为当年一名有文化的士兵，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后来复员做湖北日报记者时也断断续续访问过一些720事件当事人。”

3 独立师战士陈志鹏《8201在“七·二〇反革命暴乱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1967年8月7日晚于汉口高级步校）。

4 参见一团司令部张轻兴等15名战士《一团黑党委在‘七·二〇’反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武汉红八月造反司令部《武汉红八月》编辑部编《武汉红八月》报第13期（1967年10月2日）。

5 2005年11月、2006年6月徐海亮采访俞文斌的记录。

已成为爆发‘七二〇事件’的导火索。”¹主流舆论和众多的“文革研究”也一致指责王力在水院提前泄露了“四点指示”、造反派大力宣传了“四点指示”，激怒了对立面，酿成七二〇事件。

实际上，19日凌晨，谢富治、王力在水院讲话，并没有提到所谓“四点指示”的任何一点。但王力的讲话锋芒毕露地表示对武汉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也会激怒思想准备不足的独立师指战员和百万雄师群众。戚本禹回忆：“就在王力还是英雄的时候，总理就给我们说过，王力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闯了大祸。本来是要先作陈再道的工作，再到群众中去，结果王力不听总理的，去群众中讲话了。”²毛泽东后来也认为王力处置不当，他说：“（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³

19日上午，造反派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院讲话录音，并没有宣传“四点指示”，两派群众实际上都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具体指示。最先提及“四点指示”的是独立师，独立师全部宣传车率先上街“造王力的反”，实质上是反对蔡炳臣传达的“总理指示”⁴。

军区秘书科七二〇事件后揭发：“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按：此时谢富治、王力正在宣讲中央精神），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⁵。但19日下午，百万雄师的广播、标语、游行口号等并未涉及“四点指示”。

19日下午军区会议上，王力讲话时牛怀龙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蔡、牛气愤地相继离开会场。牛怀龙回到师作战部，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

1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第75页。

2 2007年3月徐海亮采访戚本禹的记录。

3 毛泽东1967年9月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与曾思玉、刘丰谈话，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传（1893—1949）》第1498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4 参见朱学诗《武汉“7·20”事件起因——冲入东湖“第一车”上士兵广播员回忆》（网文，2012年2月21日）。

5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1967年9月）。

椅子，大叫“拼了”。下午四点左右，独立师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作战士的工作。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去军区大院，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晚七点，独立师49人冲进军区，要求谢富治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机关人员：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晚十点，各团宣传车陆续集中到师部，蔡炳臣对宣传人员进行动员，还未讲完，大院里就起哄了，要去冲军区¹。

七二〇事件究竟如何爆发，章迪杰回忆：“‘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百万雄师成员王××文革后说：“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百万雄师）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²

19日晚，省直联司一号头头杨以才告诉俞文斌：毛泽东在武汉。听说毛有个交代，要和百万雄师的同志一起照个相，吃个饭。两派一起去。两个房，由总理陪百万雄师的头头在一桌，造反派和毛在另外一桌。杨以才是奉命接俞文斌一起去见毛泽东的，“没有弄成，主要怪8201部队”³。20日，牛怀龙和师部办公室主任杜宪章对谢敏华说：东湖（宾馆）你们就不要去了，一号在那个地方。谢接着就告诉了东湖管理处职工、百万雄师下属园艺军一号头头雷荣华⁴。百万雄师头头、一些基层头头如雷荣华在冲击东湖宾馆揪斗王力之前，业已知道毛泽东就在东湖宾馆。文革后有研究说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时不知道毛泽东在东湖宾馆⁵，显然不是事实。

独立师和百万雄师主要领导人不会想不到，周恩来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一定是毛泽东同意的。俞文斌后来说得很清楚：“我们反对中央文革、

1《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第33页。

2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3参见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42007年9月百万雄师总站某头头回忆，见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年修订版）》第65页。

5如《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967年7月20日”条：“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部分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部队战士，在不知道毛泽东住在那里的情况下，冲击东湖客舍”。

‘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¹。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后，在百万雄师、独立师和支持他们的干部中，对毛泽东的不满已有所表现。市监委张姓副处长说：“毛主席受了蒙蔽，现在有人怀疑林彪和周总理有问题。”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泊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乱成这个样子？把一些老同志都整死了，我的思想就是不通。”组织部韩姓处长接着说：“他（指毛泽东）还在稳坐钓鱼台哩！”市农委书记冀某说：“中央现在已被几个笔杆子控制了。”²7月20日，在支左办公室门前，一百万雄师成员对旁人说：“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³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20日上午被独立师战士抓上车，扯去帽徽领章游街。车上军人指责说：“中央文革都干了些什么事？把80万人的产业军打成反革命，在内蒙、河南干了些什么？把解放军打成保皇派！”下午三点左右，张根成被抓进独立师师部。他听到有人问：“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师部一科长回答：“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一个调！”蔡炳臣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师政治部主任进来问“那个人呢？怎么样了？”蔡忙眨眼示意不要问，那人还是追问：“那个人呢！？”蔡问：“哪个人？”那人说：“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问那老头子那地方。”蔡说：“那谁知道呀！”张根成当时的感觉是：“这不是造反了吗？”独立师作战科长和干部科长对张根成说：“你们中央带着框框下来，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来到武汉就到知识分子窝里钻。你们中央（文革）就是只要知识分子，不要工农兵……你们中央夺军权！”⁴

19日晚十一点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结完毕，准备上街，蔡炳臣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独立师六辆宣传车率先上街，呼喊“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王力支一派压一派，绝没有好下场”“解放军战士坚决支持百万雄师革命群众”之类的口号，“武汉七二〇事件”就此揭开序幕。

与此同时，已有二百多名独立师指战员持枪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随后，“‘百万雄师’的群众和部队的一些战士手执棍棒长矛枪械、头戴安全帽，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几百辆大卡车一起拥进了军区大院，门

1 2005年11月、2006年6月徐海亮访谈俞文斌的记录。

2 市机关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一：反动言论集》（1967年9月9日）。

3 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4 2004年徐海亮访谈张根成的记录。

卫无法阻挡。从军区大院的北门到东门全被卡车包围，院内楼与楼之间全被卡车堵塞。高音喇叭里不断传出愤愤不平地质问军区的声音：‘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强烈要求王力、谢富治回答我们的提问！’军区机关的干部和家属们，认为他们问得有理，纷纷前来送茶送水，以表示对他们的慰问，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¹

独立师不是开展“四大”的单位，19日夜十二时许，六团团长征某当面向蔡炳臣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生气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²（20日就有许多上街游行示威的独立师战士对天鸣枪）。

19日晚，独立师所属370医院听说军区表态要为工总翻案，打电话给师部得到证实，医院大批工作人员冲向军区，声称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省军区后勤部政委于某在十二点带领3人到医院传达武汉军区指示，遭到病员和工作人员围攻殴打。许多人叫喊：老子死也和百万雄师死在一起，把三新、二司杀光，上山打游击³。

19日凌晨一时许，王力在水院群众大会上说“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处理武汉问题的一个基本方针。当晚，王力修改19日上午军区常委会通过的检讨稿大样，检讨稿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王力说：“哪里有这么严重，陷入‘不可自拔’呀。”⁴

20日凌晨，陈再道、钟汉华从军区赶到曹家花园军区第三招待所，释放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还给他们送了毛泽东著作，并且做了自我批评。”⁵20日上午，“武汉公安”一号头头李树春闻讯后带领两车人从独立师师部取回全部工总材料，拍照复制。又觉得“光有材料还不行，还必须把人搞到手”，于是策划再次抓朱鸿霞等人。李树春带人到军区，将

1 郑珠滨、屈德骞《一代将星孔庆德》第424页。

2 参见《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7页。

3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1967年9月）。

4 2004年徐海亮采访张根成的记录。

5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第79页。

经手释放朱鸿霞等一事的军区宣传部长夏夔骗到“武汉公安”总部扣押了两天，威逼夏交出朱鸿霞等的下落；又派负责情报的陈汉章到百万雄师总站找汤忠云，要求百万雄师严格控制全市各交通要道，特别是军区第三招待所，发现朱鸿霞等立即逮捕。李树春说：“人在我手里，材料在我手里，任何人要为工总翻案，都要抱着我们的脑袋摇。”¹

第三节 七二〇事件爆发

一、冲击东湖宾馆揪斗王力

20日凌晨，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独立师孙科长召集会议，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由百万雄师谢敏华任指挥长，省直联司杨以才任副指挥长，“武汉公安”等组织的头头为常委，办公地点设在武汉铁路局大楼七楼。指挥部布置百万雄师所属园艺军控制东湖宾馆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

武汉公安联司在七二〇事件后披露了“专揪王力指挥部计划”手稿，“手稿”记载：

一、派代表去军区谈判，其内容：1. 王力留在武汉解决问题，未解决问题以前，王力不能上交，谁交谁负责，工总不能翻案；2. 王力的安全由武汉军区负责；3. 不上北京，在武汉解决武汉的问题，要中央首长来武汉。

二、各交通要道，如飞机、轮船、火车……严加控制，以免王力开溜。

三、组织批斗王力指挥部。

四、发出通电：为什么要揪王力告全国人民书。

五、通告各革命组织暂不派队伍来军区，关于斗王力的问题，均由专揪王力指挥部负责。

“手稿”还载有指挥部成员名额分配：百万雄师五人，“公检法”、红旗联委、省直联司各一人²。

回忆事发经过，章迪杰说：“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百万雄师’

1 参见《武汉公安——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2 《“庞然大物”原形现，纸船明烛照天烧——公安联司谈百万雄师》，载《七月风暴（创刊号）》第26—27页。

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〇’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¹

20日,牛怀龙与杜宪章、师部作战科长马鸣前往“专揪王力指挥部”,商量揪王力行动,并示意“一号”在东湖宾馆。谢即将此事告诉雷荣华,并布置雷带人从北门冲进东湖宾馆。

19日深夜,独立师的一位连指导员在军区值班室找到孙德洲,称要送情况,将一字条交给他,上写“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8201部队是叛军”²。意思是这是中央对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定性。

俞文斌回忆说:“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〇’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³

20日零点三十分,“武汉公安”武昌分部头头何文琪等14人,内有熟悉东湖宾馆情况的东湖派出所干警肖、刘二人,分乘一辆轿车、两辆吉普车冲击东湖宾馆北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率军区警卫战士赶到北门阻拦。何某拿出武昌区公安分局军代表(独立师干部)开具的介绍信,说:“今天晚上来了14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你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你不传达,我们就冲!”双方在北门内100米处对峙。

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通知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张根成

1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2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54页。

3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赶到北门。王振英又打电话向钟汉华报告，钟已入睡，在王强烈要求下秘书才答应去传达，但没有回音。王又向军区值班首长报告，要他报告军区领导，立即调8199部队来。

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20号下午中央首长将接见你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你们先回去。来人坚持要冲进去，相持到凌晨三点左右，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奉军区之命带一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你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你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又对8201部队警卫战士说：“他们不相信你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雷荣华带领一卡车园艺军成员来到北门，会同先期来此的“武汉公安”人员一起冲入宾馆大院。他们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王力，由宾馆工作人员带领，冲入百花院落。此时，又有一卡车百万雄师人员会同武昌公安分局人员封锁北门，四辆卡车冲进西门，不理睬哨兵警告，包围哨兵并控制电话，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围住谢、王的住房。在谢、王指责下，有人说：“我们不是来揪你的，是请首长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有人叫喊“谢富治、王力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扬言要揪王力去军区，要与谢、王拼到底。

四时许，谢富治让军区曾秘书叫陈、钟来百花二号。陈进门就说：“这回可要靠你们做工作啰，我们无能为力呀！”¹谢穿好军装，提出接见群众，独立师宾馆警卫部队教导员张守本带领警卫人员将群众组织好坐在草坪上。谢出来和群众交谈、解答问题后，气氛变得较为融洽。王力也换上军装向草坪走去，坐在谢身边。

大家正在谈话，五点四十分，从西门又冲来一群百万雄师人员，接着，又冲进来8卡车的8201、8199军人和军事院校学员，还有人是从东湖水面乘船或泅渡进来的。有独立师军人将冲锋枪枪口指向谢、王。有人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有人在草坪上殴打陈再道，陈被打倒在地。此时王力跑回房间，钟汉华躲进地下室。独立师战士将王力抓出来，军人和群众殴打王力，张根成、北航学生上前阻拦，遭到殴打。独立师宾馆警卫队长秦堂春、师作战科参谋吕宗贵、师保卫干事蒋建隆分别打电话向牛、蔡紧急报告，找不到牛、蔡，又向师部值勤室报告，要求找牛、蔡到东湖宾馆处理问题。

¹ 参见北航红旗成员井岗山1967年7月25日在首都百万军民大会上的讲话。

零时三十分开始，牛怀龙就不断接到东湖宾馆发生事变的报告，“直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牛到时，暴徒们正在围攻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并不采取果断措施营救中央首长，只向执行警卫任务的人员说：‘我们的宣传车和部队马上就到’。不到十分钟果然到了。到后，就伙同其他部队和‘百万雄师’、‘武汉公安’的人员去围攻、绑架王力同志。当一些暴徒将王力同志绑架上车时，我师警卫人员竭力营救，而牛却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这时，警卫人员向牛说：‘王力同志被绑架走了怎么办？’牛回答说：‘我自有安排’。”¹

王力被架上汽车向军区大院开去，身穿军装的张根成紧跟大喊：“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有军人把张也拉上车，北航学生尹聚平、胡慧娟也被带走。

谢富治赶去搭救王力，路过消防队门口，消防队的“武汉公安”人员说：“谢富治来了，谢富治是个大坏蛋，抓住他，揍死他，赶快拿刀子”²。另有一人说：“把谢富治拖出来，老子一矛子捅死他。”³

二、批斗王力，大规模抗议游行开始

20日上午，上千辆军车、卡车、消防车载着独立师（及其他驻汉部队）、百万雄师人员，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反复播放歌曲《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毛泽东诗中有“百万雄师过大江”一句），也播放语录歌“造反有理”。

军区大院早已失去控制，军人、群众、车辆随意进出。大门口一卫兵对旁人说：“我们的人打电话给‘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派了一千多人到东湖疗养院，包围了，捉到了王力，送到军区，现在在四栋三楼。”有人在军区大门外议论：“谢富治算老几？能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吗？”“揪出谢富治！”口腔医院门口，两个军队干部说：“谢富治想跑，老子海陆空都控制了，你跑得脱？”武汉测绘学院三司写出一条标语：“毛主席不

1《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8页。

2参见1967年7月2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3《武汉公安——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要受王力的蒙蔽”¹。

八时许，牛怀龙来到军区大院。百万雄师广播车反复播送捏造的“中央来电”，王力对牛说：“根本没有的事，叫他们不要再广播了。”牛怀龙离开片时，拿来一张写有“王力四点指示”的纸条，要求王力“或签字承认，或声明辟谣”，被王力拒绝。牛又数次要王力去看望被新湖大、二司打伤的“武汉公安”成员，并说：“只要去看看那几个被打伤的人，‘武汉公安’马上可以撤走，这样（你）也可以立即转移”²。

此时，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到处是“打倒王力”的口号声。十一时左右，独立师军务科副科长熊兆明和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在军区四号楼看到王力被揪斗，熊说：情况十分紧急，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周说：没有关系，死不了的³。

十一时左右，以谢敏华为首的“联合代表团”（主要是“揪王力指挥部”成员）来到军区四号楼四楼会议室，把关押在二楼的王力拉来回答问题⁴。王力说没有什么四点指示，武汉问题“没有你们百万雄师的同志的同意，不能够达成协议，就不能解决”。针对代表的提问，王力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正面地、委婉地作了解释，并否认在水院讲过“为工总翻案大方向是正确的”，说自己只是“笼统地讲，被压抑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案应该翻过来”。有代表提出“请王力同志把这个四点意见，一个一个地回答”，王力说：“你们这样子的，能够解决武汉问题吗？”现场秩序乱起来，章迪杰回忆：“这时牛怀龙问谢敏华怎么办，并说要把人弄走，王力已经表态，这些人不走怎么办？你把这些弄走，后面的事就好办了。牛怀龙又对谢敏华说：只要把你们的人弄走。我把部队的人弄走。谢敏华就对百万雄师基层头头吴明长说：你把你们来的人和洪山来的人都弄走。这样群众和战士都退出去了。牛怀龙对谢敏华说：你们再不要到东湖客舍去了，去了就不好办了。谢回答知道了。”⁵

1 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2 《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9页。

3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33页。

4 现场有录音，俞文斌处存有根据这个录音整理的打印稿，章迪杰将其抄录于自己的《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一书中（第58—62页）。

5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62页。

钟汉华在东湖宾馆销毁军区业已印刷好的检查公告后，赶到军区大院，和叶明、孔庆德等一起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钟汉华向众人作揖、磕头，叫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有人说“你也太不像话了”。钟汉华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叫“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心脏病发作，被人背走。

在军区其他领导指挥下，8199 部队政委张昭剑、副师长赵奋带部队与军区警卫营、保卫科人员赶到，控制了四号楼所有楼道、大门侧门通道。警卫营与 8199 侦察连、六连、四连战士将百万雄师群众、独立师军人与王力隔开。百万雄师一次次向四号楼冲击，骂战士是“保皇狗”“保皇兵”，战士用身体阻挡拳头、棍棒、长矛和枪托。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庆祥用胸膛顶住独立师战士的冲锋枪，卡住扣扳机的手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

张昭剑奉军区之命，劝说群众不要纠缠王力，总理让他们派代表去北京谈判，在场的一人拍桌子大喊：“武汉问题就在武汉解决，毛主席就在武汉！”张昭剑不知情，吓了一跳，去问躺在办公室的钟汉华，钟急得说不出话来，流下了眼泪。

孔庆德指挥军区警卫营将王力从人群里救出。三点左右，孔与百万雄师头头达成协议，让王力吃饭、休息后再说。独立师一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 8201 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王力被两个战士架进屋里，随后通过已被控制的通道，转移出军区大院，进入 8199 部队驻地。四号楼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人员发现王力脱身，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立即四处搜寻¹。

20 日上午，百万雄师计划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王力大会，因王力缺席未开成，总站负责人于是出面指挥全市示威游行。这天出动各种车辆 396 辆，其中消防车 27 辆，空军军车 15 辆，打 8201 部队旗帜的车 83 辆，用载重卡车改装的装甲车十余辆。百万雄师人员头戴柳条帽，

¹ 王力被转移出军区大院的过程，参见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 年 8 月）。



武汉“公检法”和百万雄师的成员在军区支左指挥部外示威（载《大武汉新影》）

手持长矛，嘴衔匕首；独立师军人荷枪实弹上刺刀，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有的不戴军帽或歪戴军帽，敞开风纪扣，有的站在车门边或坐在驾驶室顶上，车头架着轻重机枪，子弹带耷拉在车上。有军人拿着长矛，百万雄师成员举着枪。章迪杰回忆：“最为感人的还是8201部队的战士。他们被王力所谓四点指示激怒，许多战士脱下军装，说‘老子不干了’，要求参加百万雄师。七二〇当天，就有三五成群的战士来到百万雄师联络站，要百万雄师的袖章。后来人越来越多，袖章一时缝制不及，只好将后勤部印好字样、未裁开的绸布，整匹整匹发给他们。”¹七二〇事件后，武汉军区调查落实参加七二〇事件的干部战士共计二千余人。

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一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一小撮混蛋”“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三司有人贴出大字报“质问陈伯达”，说陈是王力的后台。军区支左办公室门前，哨兵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

¹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67页。

能由我们广大工农兵来鉴别、决定，不能由‘钦差大臣’来封。”“我们已经作好牺牲一切的准备，不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死不瞑目”¹。

百万雄师贴出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是鬼？》说：“王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所主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是反革命纲领‘二月汇报提纲’的起草人，是推行苏修教育路线的旧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以前是刘少奇重用的红人，是孟夫唐的学生，是王任重的好朋友……他混入中央文革后，摇身一变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他在哪儿插手，哪儿就出现武斗”。

上午，最先冲进东湖宾馆的园艺军头头雷荣华，从军区大院回到集结地，得意地宣称：“总说‘百万雄师’没有‘造劲’，这次就要在王力身上造反”。

百万雄师头头应该清楚，他们赌上这个庞大组织的政治命运来反对的所谓“王力四点指示”，其实是毛泽东、周恩来决定的方针；接受这个方针，就意味着他们继职工联合会之后的再一次失败。他们追随独立师，希望以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迫使中央改变决策，能不能达到目的，他们没有把握，所以事件高潮时就有了失败的准备。20日晚当谢敏华问俞文斌怎么办时，俞文斌说：“组织二线班子，我们承担前期责任。”²

惶乱之中，为了“稳定军心”，百万雄师伪造了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这些全国罕见的谣言，20日开始一条一条地发布出来（参见钢二司红武测《江城风暴》）：

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风暴；四、百万雄师。

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百万雄师大、好、纯，要爱护它”。

特大号外：周总理来电：王力的四点指示，不能代表中央，不能代表毛主席，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红三司[武测] 7.20）

十九日深夜中央文革来电：一、关于四点指示，中央不知道，是王力自己搞的；二、不久陈伯达、周总理要到武汉来；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武汉处理武汉问题的。（百万雄师指挥部第六分部[五湖四海兵团翻印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

1 载钢二司红武测《江城风暴》（1967年8月）。

2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56页。

今晨四时，中央军委来电：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正确；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抵制、造反；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武汉地区红旗联委红旗二中井冈山 七月二十日）

消息报道：湖北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海陆空军、公检法、贫下中农、红卫兵、百万雄师组成一个专揪王力指挥部。王力要在湖北斗。全国已有十个军区给武汉来电，坚决支持武汉军区的一切革命行动。（红卫兵武汉地区中等学校司令部）

谣言造到还在武汉的谢富治和王力身上：

特大消息：七月二十日，王力被我百万雄师以及其他革命组织找到了，答复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完全正确；二、所谓周总理“四点指示”是我自己搞的，没有通过周总理、谢副总理；三、百万雄师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四、武汉的问题由武汉人民解决。（百万雄师（红武兵）雷达站江南印刷厂联合兵团翻印 七月二十日）

谢副总理在省直联司的讲话：打倒陈再道是错误的，更不能说打倒陈大麻子；工总不能翻案，广大战斗队员要教育；百万雄师不能解散要帮助；三新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但是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实事求是战斗队）

章迪杰后来说：“‘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仕奇（“武汉公检法”、“武汉公安”头头）。……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¹。独立师参谋长郝文德奉蔡炳臣之命，通知各团向部队传达百万雄师捏造的“中央文革来电”²。

至于百万雄师总站、各分站、各基层组织编造的“谢副总理几点意见”、“王力几点答复”、“特大消息”等更是数不胜数。有一份“特大消息”的传单说：某中央首长说工总的案不能翻，武汉部队支左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百万雄师是左派组织，中央同意把王力交给武汉人民斗争³。

20日12时，三司发布《造反公告》：

七月十九日，王力同志的所谓四点指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严

1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年）。

2 《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7页。

3 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重脱离武汉地区现实的，是不调查、不研究的官僚主义的产物，是在湖北三千万人民中通不过的。

所谓召开谈判会议代表名额（按：三司革联、三司各四名）的确定，更是极端错误的，是对我红三司几万革命小将的极大污辱和无情打击。我们坚决不答应。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红三司郑重宣布，不参加今天的会议。

既然王力同志对武汉问题已作定论，因此，在王力同志没有收回四点指示以前，我红三司概不参加由王力召开的解决武汉问题的一切会议。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三司想念毛主席！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武汉地区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十二时¹

7月20日下午七时，百万雄师联络站、红武钢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红一冶革命派联络部、红船工、三一八、红武锅革命造反军、红卫军武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造反军工人三司、武东工业区造反派联合指挥部、武汉贫下中农汉桥地区革命联合总部、武汉地区农业战线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武汉地区红旗联委、红卫兵武汉地区中等学校司令部、红卫兵武汉地区司令部、省直联司、“公检法”、市委机关革联、市人委机关联合指挥部等在武昌造船厂成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联络站”，意图造成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局面，为夺省市的权做准备。

连日和百万雄师一起游行的独立师士兵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谁为工总翻案，老子枪口对准谁！”²

从20日开始，百万雄师在持续大规模游行的同时，大规模地攻打造反派据点如湖北艺术学院、武汉医学院、一冶一中、武汉一中、二中、二十中、二十九中、三十四中、华师一附中等，见人就抓到水塔、江汉公园、国棉六厂、汽运五站、汽运六站等处关押刑讯。20日凌晨二时百万雄师围攻武钢、一冶，冲击九一三总团办公处武钢业大和新一冶办公楼，杀死一名一冶工人，抓走一百多人。20日上午八时许，数十辆卡车停在湖北大学前，武装人员殴打看大字报的市民，打死一卖冰棍的小孩，刺伤湖大学生黄河

¹ 载钢二司红武测《江城风暴》（1967年8月）。

² 参见钢二司红武测《江城风暴》（1967年8月）。

等数人。几个军官不断开枪向湖大校园射击¹。有军人开枪将一号楼楼顶上的高音喇叭打穿几个洞，在三号楼开会的红八月敢死队梅子惠、杨胜利等人听见枪声从大门跑出来，险些被一排子弹击中²。21日上午十点半，数百辆卡车停在湖大周边的马路上，包围了湖大。军人首先用机枪向校园扫射，将一号楼顶正在广播的四个高音喇叭打坏。百万雄师武装人员呐喊着冲进湖大，逐楼逐屋搜捕，抓走学生、教师二百余人³。

谢邦柱回忆：20日上午十点左右，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成员用卡车改装的装甲车撞开湖大院墙，抓走新潮大头号谢邦柱、彭勋、黄河、叶天放等二十余人，扯下他们的上衣一一蒙住眼睛，十二时许关押到汽运五站。



钱运录头戴柳条帽、手执铁矛，逐一指认新潮大各人身份。他指着我说这人是新潮大一号头头，独立师几个歪戴军帽的战士马上扯下蒙在我眼睛的汗衫，说“你就是杀害解放军的凶手”。我说“没有的事，造反派和解放军心连心”，一战士说“谁和你们心连心”。下午三时许，他们给我分别挂上“新潮大一号头头”“杀解放军凶手”的牌子，“武汉公安”的人给我照了两张相。七二〇后公安联司田学群把这两张照片送给我，我撕掉了挂着“杀解放军凶手”牌子的那一张，保存了另一张。照完相开打，

打得我三次晕过去，用凉水泼醒再打。醒过来我高喊：“我是新潮大一号头头，一切冲我来，放掉其他人。”彭勋也喊：“我是他们的老师，一切由我负责，放掉他们。”其他同学果然先放了。21日上午十时许，我二人被转到红卫纱厂地下室，继续折磨殴打，有人说要把我们丢到江里去。我的肾脏被打坏了，后来发展为尿毒症。23号清晨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下午六时许，29师（8199部队）政委张昭剑、副师长赵奋、

1 参见新潮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主办《新潮大》报第28期（1967年7月28日）。

2 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第五章在红八月的日子里·七、乱枪阵阵——我所经历的‘720’事件”。

3 参见新潮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主办《新潮大》报第28期（1967年7月28日）。

参谋长解立根带一个连来到纱厂，说要提审谢、彭二人。战士们把我们扔上卡车，眼睛仍被蒙着。我的手碰到枪托，以为要枪毙我们，我紧紧握住彭勋的手说：“看来要处决我们了，处决时我们要慷慨激昂，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彭勋立刻回答说“行”。军车开往小洪山武汉空军司令部途中，赵副师长等解开蒙住我们眼睛的汗衫，自我介绍后说：“你们受苦了。我们按照周总理指示，总算顺利地把你们营救出来了。”我们两人紧紧相拥，眼泪刷刷地流。赵副师长让我们换上军衣，当天深夜派车把我们送到新华社¹。

20日，二司发布《武汉告急！告急！告急——告全国人民书》，“最最紧急呼吁北京和全国各革命造反派组织设法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报告七·二〇事变情况，并立即行动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注意事态的发展。”

三钢、长江日报毛主席路线战斗兵团、上海支汉联络站赴汉战斗团等联合发表《关于7·20武汉发生反革命政变事件的严正声明》说，陈再道之流调动军队残酷迫害中央首长，疯狂镇压我革命造反派，是地地道道的严重的反革命政变事件；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谁把矛头指向他们，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军委，炮打党中央、毛主席；历史将宣判陈再道死刑；8201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武汉三司中的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要革命的，我们一如既往团结大多数，这些组织中的一小撮反动头头充当了陈再道之流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三司革联发表《关于7·20反革命暴乱的严正声明》说：7·20事件完全是陈再道之流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反革命暴乱；混进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混蛋和百万雄师中少数反革命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敌；谢副总理、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完全有权处理武汉问题，他们的讲话好得很；工总的案就是翻定了；三司完全倾向了百万雄师一边，叛徒、保皇嘴脸已暴露无遗，所谓的《造反公告》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它的出笼，宣判了三司的死刑；三司革联坚决和三钢、三新团结、战斗在一起，誓与陈大麻子及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血战到底，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

¹ 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战地黄花》一书刊载的版画

央、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及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王力同志，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全体指战员”于20日下午发表《严正声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部队，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谢副总理、王力、余立金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军党论，是2月兵变计划企图在武汉继续的罪恶目的的大暴露，必须彻底识破，并开展斗争；东海舰队过境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反革命暴乱。

22日，8199部队（29师）党委作出《关于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定》。“决定”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和挑拨不明真相的群众，公开提出‘打倒王力’的错误口号，冲进中央首长住所围攻、殴打，并抓走王力同志，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亲人，公开与中央对抗，这是极端严重的政治事件。目前事态正在扩大，情况十分危急。”“决



独立师、百万雄师、“公检法”成员连日游行示威（左图载《大武汉新影》）

定”要求：“全体指战员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派来的谢副总理、王力同志、余立金同志等，必须坚决尊重和爱护”，“一切反对和侮辱他们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极端错误的，必须坚决抵制，坚决保卫他们的安全”；“最坚决地支持‘三钢’、‘三新’等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绝不擅离职守，绝不上街游行”¹。

20日至23日，满街都是百万雄师川流不息的游行车队，街墙上都是百万雄师的大标语，百万雄师游行所经之处，路边只要有人被指为造反派，即被当街殴打后抓上车带走。造反派在三镇街头基本无法活动，冒险贴出的大字报一出现，就被覆盖或直接用长矛挑破。百万雄师扬言要“过大江”，将聚集在武昌几所高校的造反派“一扫光”。

造反派头头们非常清楚，以百万雄师眼前的气势，加上失去控制的独立师军人，水院、华工等最后几块据点根本守不住。21日，二司红水院总部决定疏散人员，无处可去的学生、教职工及家属上珞珈山躲避，留下二百人护校。武大、华师、武测也于同日疏散。

22日从上午九点开始，满载武斗人员的卡车一批一批开进华工大门对面的百万雄师关山地区据点。当晚，新华工除武卫队外，数千师生撤到喻家山北麓和磨山一带。武卫队荷枪实弹，把守进入学校的各路口和校内制高点。如果百万雄师进攻华工，会遭遇火力阻击，攻入校内会遭遇无线电引爆的地雷和氧气瓶。

由于百万雄师经常进入民居抓造反派，造反派在家不出也不安全。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7月23日报告：“现在，八二〇一部队、‘百万雄师’、‘三字兵’挨家挨户查户口。武汉‘三司’领到革命派的家里抓人，由于‘三

1 《新华工》报第三十七期（1976年7月24日）。

司’告密，许多革命派组织的成员被八二〇一部队、‘百万雄师’及‘三字兵’打死、打伤。二十二日，‘九·一三’有几百人被抓。”¹于是大批造反派乘车船离开武汉。百万雄师在火车站设卡，重点盘查去北京的旅客，使得去北京的造反派往往向南绕道。同车同船逃往外地的造反派即使相识也不敢交谈。

四、中央应对武汉事件

东湖宾馆里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非常紧张。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说：群众在宾馆闹事，把中央警卫团紧张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解放军战士也上街闹事，而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他们与“百万雄师”群众处在一种心态失衡状况下，谁的话也不相信，也听不进去。中队长把仅能组织起来的数十名8341战士进行战斗部署，重新编组，实施有效的火器配置，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决心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安全²。时为中央机要员的谢静宜回忆：从北京跟主席出差负责保卫毛主席的丁钧几人躲在大门内小竹林里边，透过竹林探望外面的动静。当时上级有命令，只要他们不冲进来，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动。还听说夜里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啣着小刀游过来了。为了保密，汪东兴正式对我和樊一民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摄影师舒世俊、老贾、钱嗣杰（新影、新华社）手中均拿一个木棒。在这种形式势下，大家最担心的还是毛主席³。

毛泽东得知消息，表示“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是真的反对我”，“即使人冲到这边来了，你们也绝不能开枪，无论如何不能开枪！你们要相信群众大多数，有人冲上来了也不要紧，我自有办法。”⁴并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军区负责把王力找回来。

谢富治要北航红旗的井岗山给各造反派组织打电话，嘱咐大家保持冷静沉着，不要向军区冲击，不要上街和受蒙蔽的百万雄师群众发生冲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妥善安排处理事情。造反派各总部传达此精神，要求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66号快报，1967年7月23日4时。

2 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第50—51页。

3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第57—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4 《戚本禹回忆录》第652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年版。

坚信党中央，不得启动已于17日封存的长矛等武器。

在北京，20日上午传来武汉消息，中央文革召开紧急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一致要求毛泽东立即转移。林、江写信给毛泽东说，武汉形势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周总理决定立即赶回武汉。林彪给毛泽东的信，经陈伯达、戚本禹、关锋等修改，江青也签了名，由邱会作飞抵武汉交毛泽东。邱会作回忆，林彪对他说：“你到武汉去一趟很好。我先说一下你的任务：一、向主席报告全国的形势；二、建议主席转移一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的安全就是全党的安全。’你就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三、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陈再道又不听指挥，围困了主席，就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对邱会作说，如你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附近的29师和空降军已经做了战斗准备。林彪说：“你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¹。

得知周恩来重返武汉的消息，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广播站、大标语大力宣传：“周总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好消息，好消息，中央同意斗王力！”下午两点，百余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的卡车开进王家墩机场，呼喊“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机场工作人员说“总理不在这里”，独立师战士说：“我们知道，周总理下午要来，中央文革来电话，三点钟从北京起飞。”机场人员说：“我们没有接到总理要来的预报，谁要你们来的？”独立师战士回答：“我们蔡政委要我们来的，政委还在电话旁边等我们的情况呢！”经机场人员做工作，人群五点撤走²。

陈再道得知周总理要来，说：“周总理来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与王力一样。”³

周恩来于四时前起飞离开北京，四十多分钟后，机长报告王家墩机场跑道停有载人卡车，无法着陆，只好改降条件较差、距武汉市区60公里

1 《邱会作回忆录》第533—534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2 参见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3 1967年7月27日粟裕在中央军委传达武汉事件情况。载《武汉钢二司》报、荆沙革司《东方红》报联合版，1967年8月15日。

的山坡机场。到达山坡机场后，周恩来首先要通刘丰电话询问情况。刘从王家墩机场赶来，商量进城办法。周恩来再飞王家墩机场，天黑后换上便服，戴上墨镜，仅带两名警卫人员，由武汉空司作战科长带路进城。

周恩来抵达东湖宾馆后，立即安排毛泽东转移。

空 15 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到汉口¹。深夜 2 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空小车转移到汉口王家墩机场，毛泽东和随行人员暂时在机场附近的专列上休息。21 日晨，经杨成武带领，邱会作登上专列，将林彪和江青署名信件呈交毛泽东。上午九点后，毛泽东一行乘飞机离开武汉飞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对从北京赶来的张春桥说：假如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都去卖酒。他出了一个题目——文化大革命能不能搞下去？会不会成功？让张春桥和汪东兴、余立金讨论。后来张春桥回答说：会成功，因为群众拥护文化大革命²。

21 日，周恩来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后，部署平息事端，通过军区孔庆德、叶明等领导控制武汉局势，并要求军区找回王力。孔表示已经救出王力，但天黑后不见踪影。周恩来说：“不行！你们设法把他找回来。”又对孔说：“你立即通知‘百万雄师’派 100 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也派出代表和他们乘飞机前往，具体时间，明天再定。让他们先作好准备。”³周恩来同时安排李作鹏、余立金分别做驻汉海、空军部队的工作。李作鹏回忆：周恩来要求陈再道找到王力，陈表示无能为力。周恩来生气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不要以为你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得什么？如果把你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你们。你看是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你‘百万雄师’力量大。你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你离开这里到北京去！”陈再道低着头走了⁴。

21 日上午九时许，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刘海江一行三人，到钢二司司令部，对政治部的樊信成说：“中央来电称：根据武汉形势很乱，没有

1 2005 年 5 月访谈王精忠的记录。王时为 15 军某部文化干事，七二〇事件后任 15 军军长方铭的秘书。

2 参见张聂尔《中国 1971——风云“九·一三”》第 135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版。

3 郑珠滨、屈德骞《一代将星孔庆德》第 434 页。

4 参见《李作鹏回忆录》第 431 页，香港北星出版社 2011 年版。

解决问题的气氛，还是要上北京汇报，代表不超过一百人。两派意见不同的代表原则上相等。”并指定：“‘钢二司’代表八人，‘工总’六人，‘九·一三’三人，‘三司革联’二人。”¹

造反派在街头贴出毛泽东语录：“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武汉市民议论纷纷：“这不是兵变吗？”独立师有机关干部也公开认为部队部分指战员的举动就是兵变。

周恩来三次要求军区设法找到王力，21日黎明前仍无消息。早上，周恩来派刘丰去找王力，刘丰在29师找到了王力，29师师长张绪率七连护送王力到达武汉空军司令部。周恩来决定，东湖宾馆和武汉空司的北京来人，深夜分两个车队到山坡机场汇合。

周恩来和中央代表团成员从东湖宾馆出发，一律穿上空军军服，打着百万雄师的旗帜，车身贴着“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的标语，喊着“百万雄师必胜”的口号，一路受到百万雄师游行队伍的鼓掌欢呼。顺利到达山坡机场后，与从空司出发的王力等人汇合，再一起于22日凌晨5点飞抵王家墩机场²。在山坡机场，周恩来见到王力，拥抱亲吻，连声说“支持王力同志”³。

八时许，周恩来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杨成武，说他正在同林彪商量部署，商定后再请示毛泽东。并说武汉发生的事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还建议自己回北京后把陈再道等四人保护起来，以免受到伤害。毛泽东同意将陈再道等四个人保护起来。毛泽东对杨成武说：“陈、钟认错就算了。”“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们也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⁴。

周恩来在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开会，明确孔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孔等转告陈、钟：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同时决定派15军进驻水院、武测、华工、湖大、武大等学校和武钢，保护革命群众。

22日下午两点多，周恩来与谢、王、李（作鹏）等分别登机回京。周恩来临行前督促军区落实释放被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抓走的中央文革记者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66号快报，1967年7月23日4时。

2 参见戴维堤《逝者如斯》（网文，2007年）“51. 武汉7·20事件及其他”。

3 驻山坡机场7333部队一干部的回忆，载1967年8月《武汉钢二司》报。

4 参见《杨成武将军自述》第286—28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站记者高天棠等三人。周恩来先行降落北京，在机场主持欢迎中央代表胜利回到北京的仪式。

当晚，空15军部队迅速抵达预定位置，开始控制市内制高点。留守学校的学生、工人见到前来保护造反派的解放军，无不惊喜异常，泪流满面。



8199、7252部队战士徒手阻止百万雄师对学校的围攻（载《战地黄花》）

20日周恩来再赴武汉前夕，又亲命中央文革记者站增派5名记者赶赴武汉调查，张春亭等去军区，郭昌琪、张广友于21日到水院和武大，紧急反映造反派的处境与要求。

五、七二〇事件的持续

20日当晚，省抓办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头头会议，拟出行动纲领：“一、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二、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三、全面夺省市的权，造成

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¹。

21日上午，百万雄师总站在3506工厂召开关于夺省市市委权的会议，省直联司、市委革联等十余个组织的头头参加，由“武汉公安”派驻百万雄师的王玉宝主持。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市委的权”。会议认为目前夺权条件已基本成熟，“百万雄师已联合了大多数群众”，“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站在百万雄师一边”，“军区参加三结合班子更不成问题”²。

晚上，百万雄师头头纪登清打电话到蔡炳臣办公室，“找蔡政委商量‘三结合’夺权问题”。“蔡接这个电话时把灯关了，讲话声音很小”³。

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谢、王一行回到北京的消息，这个夺权计划随之终止。

21日晚，蔡炳臣对师机关干部说：“王力老婆是新华工副教授，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怀龙说：“王力是国民党员，这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⁴。关于王力的老婆、儿子的身份，蔡炳臣是造谣，但王力参加过国民党确有其事⁵。为了打倒王力，蔡炳臣等冒着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风险，下了很大功夫。

21日，百万雄师总站研究起草“通电全国揪王力书”，市委革联头头胡红兵参加⁶。曾庆裕则在这一天参与了“揪王力指挥部”的活动。七二〇事件后他揭发：21日中午，专揪王力指挥部召开会议，商议再次到

1 参见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

2 参见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红水院宣传部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武汉公安——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3 参见《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牛怀龙、蔡炳臣操纵“百万雄师”的一些反革命罪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4页。

4 参见《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1967年9月）第5—8页。

5 《戚本禹回忆录》第323页：“康生在王力受审查的时候，曾提出过王力有一个参加国民党的历史问题。王力解释说，那是他在东北军工作的时候，受地下党组织的指派而参加的。王力还说，当时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是谷牧。后来谷牧专门写了个证明材料，说有这事，当初是组织上为了工作需要，叫他加入国民党的。”

6 参见市机关红司人民勤务员总部、钢二司驻市委联络站《市委革联与百万雄师（市委革联罪行之一）》（1967年10月26日）。

军区“揪王力”，会议由指挥长谢敏华主持，包括黄石、沙市、襄阳、宜昌等外地保守组织在内的三十多个组织参加。五点多钟，指挥部到军区与孔庆德谈判，要求孔把王力“交出辩论”。孔庆德说：“周总理说，武汉问题要到北京解决，每个大组织派五十至一百名代表，周总理亲自带队，周总理还说他同百万雄师的代表坐一个飞机去北京。毛主席、党中央给周总理的任务是要保证王力的安全，王力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能揪，你们说王力有四点指示，不管有没有，有你们也不要追查，没有我们也不辟谣。你们代表到北京不能揪王力，贴王力大字报，你们要贴孟夫唐的大字报，揪孟夫唐。你们‘揪王力指挥部’自己成立自己撤销，这样才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解放军和你们在一起拿着枪游行，别人会抓我们辫子的，说我们拿着枪打他们。你们回去要好好准备材料。”百万雄师头头说：“王力只来三、四天，没有找哪个组织谈谈就随便下结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四点指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求与王力辩论。”谈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就被独立师、“公检法”、百万雄师的人冲散了，孔庆德挨了几下打¹。曾庆裕说，此后指挥部再也没有开过会了。

这次谈判，百万雄师头头提出以下要求：1. 武汉问题就地解决，王力不能走。2. 工总不能翻案，谁翻谁负责。3. 王力安全由军区负责。4. 王力不能由哪一个组织自己斗，由指挥部统一安排。5. 王力的全部讲话录音都交指挥部处理。6. 车站、码头和机场都要加强检查，不准王力溜走。7. 起草通电，通告全国人民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揪王力²。

22日上午，市人武部副政委崔执中找来市委革联头头李德焜、王显林等商量市直机关上京代表人选。李、王表示：我们不去北京谈判，北京形势对我们不利，我们要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李、王提出五个条件，希望崔执中向上反映：“（一）首先王力要宣布四条作废，作出检讨，印成传单，散发全国。（二）不同意工总的代表参加，如有工总的代表，我们就退出会场。（三）除武汉地区代表外，其他单位的代表，如北京红代会等不得参加。（四）现在京的三新、二司二、三千人必须全部返汉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以免冲击会场。（五）要保证我们代表的人身安全和材料的

¹ 市机关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之十：曾庆裕在斗争辛甫、林立大会上的发言》（1967年9月6日）。

² 参见钢二司红武测《江城风暴》（1967年8月）。

安全。”结果，“因为第一条太露骨，武装部也不敢反映”¹。

22日，周忠在宣传队人员会议上说：你们的行动我感到高兴和害怕。高兴的是顶住了陈、钟的检讨，推迟了军区公告的发表，创造了到北京谈判的条件。害怕的是我们部队要集训。当日周忠和蔡炳臣来到六团某连，有战士问周：我们上街开枪可不可以？周说：少打几枪可以，不要多打。周对六团副政委张枫说：这次起了带头作用，现在急刹车也要起带头作用，这样三结合还是以我们8201为核心²。

21日上午，蔡炳臣询问机关干部对当前事件的看法，有干部说其性质是兵变，很可能造成部队到指定地点集训的后果，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根据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我对党的干部政策的理解，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当夜，独立师党委下发了六条决定，“只字不提‘七·二〇’叛变事件的性质，却强调提出‘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武汉问题，要求部队有意见可用口头和书面逐级向上反映’”。22日上午，蔡炳臣、周忠召集六台宣传车的五十余人到师部开会，蔡对宣传队人员的“点火”行动“倍加赞扬”，同时“作了新布置”：“（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中央已经通知，军队和“百万雄师”为一方，“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去北京谈判；（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到北京谈判没有材料是不行的……（3）你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处处都要起好作用，今后大家搞什么事，最好先告诉我一下，我不会领着同志们去犯错误的，你们应当相信我的话”。周忠说：“要跟他们干到底，要好也好到一起，要坏也坏到一起”³。

21日，“武汉公安”总部发表《特急声明》和《关于黑工总问题的严正声明》说：王力“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无视湖

1 参见市机关红司人民勤务员总部、钢二司驻市委联络站《市委革联与百万雄师（市委革联罪行之一）》（1967年10月26日）。

2 《反革命分子牛怀龙、蔡炳臣的忠实爪牙周忠的部分反动言行》，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二）》（1967年9月）第33页。

3 《看！牛怀龙、蔡炳臣在七·二〇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载《七月风暴（增刊之一）》（1967年9月）第8—10页。

北省三千二百万人民的意志，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左右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谁要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就要把他们打得粉身碎骨”。“黑工总的案一千个翻不了，一万个翻不了”。

22日，“武汉公检法”总部决定所有人员出动参加抗议游行。一号头头李树春事前请示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独立师参谋长郝文德，郝表示赞同，并指示军管会也派人参加。“武汉公检法”取出封存的枪支、马刀、匕首，开出几乎所有的卡车、消防车、摩托车，喊着“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等口号，游遍武汉三镇。

连日来，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持续在全市游行，22日百万雄师出动车辆约1500辆，其中消防车四十多辆。多年后，章迪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7月20日大游行开始，“三镇凡能通行汽车的街道，都流动着见首不见尾的车辆长龙，如同血液在人体的每一根血管里流动。”“这四天的示威大游行”“车流滚滚，红旗如海，长矛如林，呼声如雷，喊声如吼。”



“武汉公检法”成员上街游行示威（许东杰提供）

六、局势急剧转折

22日夜，“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听取谢富治的汇报。谢富治汇报后，林彪决定：把‘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〇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进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不敢来，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且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¹

23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五点二十分起，整天反复播送谢、王一行22日“光荣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急剧震荡，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市民奔走相告，欢呼“天亮了，解放了，武汉的公鸡下蛋了”；百万雄师的汽车游行还在继续，数量逐渐减少，不少百万雄师成员产生怀疑情绪，开始退出街头的“造反”行动。

7月20日临时受命飞往武汉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郭昌琪回忆：

（23日凌晨）两点多钟，战斗气氛笼罩着武测，大家都准备着为革命而献身。突然，从武测大门外驶进来一辆军车，原来是8199部队首长派侦察科长来与钢二司小将取得联系的，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只听见这位侦察科长说：“根据你们和我们的情报，都证实今晚上‘百万雄师’是要攻打武大、武测这块‘根据地’的。根据这一紧急情况，我们师首长的意见是：一、钢二司和其他革命组织在这里的头头，迅速换上军装，到我们部队去；二、其他同学立即疏散；三、天明后，我们立即发表声明，支持你们。”钢二司的负责人听转达的意见后，表示不同意这些做法。他们认为：一、头头不能离开群众，我们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生，生在一



1967年7月22日，周恩来在机场迎接中央代表回到北京（网络图片）

¹ 参见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1967年7月23日，武汉造反派举行庆祝游行（载《大武汉新影》）

起，死，死在一块。如果我们在这紧急关头走了，一旦武测被攻破，我们有什么脸面见群众呢？个人的安危事小，集体的安危事大，对我们个人的

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二、我们这里是最后的一块‘根据地’了，同学们要疏散，还能疏散到哪里去呢？还不是出去一个被抓一个吗？至于发表声明支持的事，远水救不了近火，同学们所希望的，是马上拿出实际行动来，防止‘百万雄师’的进攻。……钢二司已确定派两名代表与侦察科长一起，到8199部队去见首长。

四点十五分，空军驻武汉某部一个连，全副武装开进武测院内，明确表态支持“三钢”、“三新”。钢二司的革命小将们听了，都非常高兴，信心百倍地说：“毛主席派空军来支持我们，有亲人解放军保护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他们把空军的支持，作为特好消息，立即在广播里响亮地播出去。消息传出后，给革命派极大鼓舞。据说，原准备攻打武大、武测的“百万雄师”，迫于这一形势的变化，就不得不撤退了。

二十三日清晨，一则振奋人心的重要消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出来了。“百万雄师”被取缔，武器被收缴，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奔向武测的广场，放声高呼：“天亮了！”“公鸡下蛋了！”“武汉解放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我和小张、小李也忘记了疲劳，和同学们一起手挽着手，喊啊，跳啊，分享着这胜利的喜悦¹。

23日傍晚，军区支左办徐处长通知郭保安，说钟汉华要来新华工，代表军区检查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考虑到八天前新华工死六人所激起的愤怒情绪，郭保安费尽心机才使得钟汉华在全院大会上做完检查后安全离开²。

24日深夜至次日凌晨五点，百万雄师出动38辆卡车、3辆消防车、一辆改制装甲车共一万多人攻打体育学院，为百万雄师带路的体院大专兵头头徐腊生被小口径步枪打死，体院二司学生被刺伤十余人，重伤3人。25日，应体院造反派请求，8199部队派出两个连进驻体院。

24日，数十辆卡车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包围测绘学院，25日上午11时周恩来亲自来电制止，车队撤离。按周恩来指示，孔庆德坐镇测绘学院，组织部队保护学校。

23日晚上，辛甫说：“该杀头就杀头，不杀头，就带毛选去坐牢。”同时催促市委革联上北京告状。下午，辛甫让革联派人去百万雄师总站传

1 郭昌琪《颗颗都是纯真滚烫的心》，载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镞——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第219—220页。

2 参见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1967年7月24日，百万雄师围攻二司司令部所在的武汉测绘学院

他的话：“要从一百多万人着想，姿态放高点，赶快发个声明，承认错误，可以提出口号打倒陈再道，支持三钢三新”。24日，市化工局党委书记王瑞杰问辛甫：“就这样算了？中央这样做是不了解情况，得想个办法向中央反映情况”。辛甫支持王瑞杰和孙荣章等上京“反映情况”¹。

23日，“武汉公安”头头在群众中说：中央电台的广播“不是毛主席的声音”，“北京隆重欢迎谢副总理（和王力）是进行国际辟谣，因为有人造谣说王力在武汉被百万雄师打死了”，“这是出于对百万雄师的爱护”。24日，“武汉公安”一部分成员要求解散“武汉公安”，其头头说：“组织不能解散，公安联司要杀回来夺权，我们就和他们拼到底！”²

中央文革办事组编印的快报记载：

二十四日上午，七六六、四二三部队进行游行，支持武汉地区革命派。当部队行至江汉路与解放路（按：应为解放大道）交口时，“百万雄师”

1《妖为鬼蜮必成灾——反革命修正义分子辛甫的罪行录之一》，载《七月风暴（第五期）》（1967年11月14日）第17—18页。

2《武汉公安——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载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政法批判专号》（1968年5月）。

用汽车在前面拦路，九辆汽车装满手持长矛的暴徒，在后面追赶。途中遇到欢迎解放军的群众，“百万雄师”便下车行凶。抓走了“新华工”一个女同学（她给解放军献了袖章），打伤了一个小孩。群众被打散以后，他们又继续开车追赶，游行的部队为了避免冲突，进入长江饭店。“百万雄师”行凶才未得逞。

八一九九部队向“百万雄师”提出意见，要他们保证《人民日报》正常印刷。经过部队和革命群众的努力，“百万雄师”被迫接受要求，二十四日早四点已恢复印报。

“百万雄师”在肉联和汽运二站开会，对下一步行动的打算是：（一）继续揪王力；（二）不要反对别人打倒陈再道；（三）稳定内部，反对“内战”；（四）抓革命，促生产¹。

同日另一号快报记载：

二十三日，广播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返京的消息后，“百万雄师”的广播站，除了叫喊几声：“打倒王力”的口号外，几乎沉默了一天。“百万雄师”汉阳联络站的广播站每天惯例的那次播音，也都没有按时进行。

二十四日，“百万雄师”召开了一次会议，晚上，武汉三镇的“百万雄师”统一行动，都喊：“打倒陈再道。”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陈再道！”“打倒孟夫唐！”“‘百万雄师’永立江城！”“‘百万雄师’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打倒‘工总’，镇压反革命！”在武昌，“百万雄师”的一些广播站，也喊：“打倒‘三反’分子陈再道！”“打倒两面三刀的陈再道！”“打倒欺上瞒下的陈再道！”等口号²。

王绍光在他研究武汉文革的一本书中写道：

“百万雄师”对陈再道个人的命运并不大关心，但他们不能理解，北京当局为什么要如此严厉地对待由大多数“纯洁”、“可靠”的人民组成的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他们能够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毛和林受到了蒙骗。……但大多数人现在痛苦地相信，新的事态发展是得到毛本人批准的。

下面是“百万雄师”一个分部开会的会议记录摘要，它反映了保守派们的情感在那些日子是多么的矛盾：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335号快报，1967年7月25日2时。

2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355号快报，1967年7月25日20时。

有人说：我始终不相信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就是刘邓的人，他们所谓造反派就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看如果表了态，我们也有罪，不表态也跑不脱。……另一个人说，如果我们参加了明天的会议，我们就是承认了7月19日是反革命行动。我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就是砍脑袋，我们也不表态¹。

22日下午四时许，北京通讯兵部队给总字423部队（通讯兵学校）来电，传达了周恩来给各军区关于武汉问题的六点指示。获悉这一消息，三司司令部当晚在司令部所在地武测四号楼召开会议，有头头说：过去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对的，成绩是大的，不可否认。以后我们还要坚持这条政治路线，东方红红卫兵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现在我们的政治力量与政治路线不相称，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我们炮轰王力是对的，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这与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有本质区别，但被阶级敌人利用了，以后我们还要与王力辩论，他的表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跟二司的矛盾是很深的，以后再解决。当前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一致对敌，可能我们一改变态度二司要压，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顶得住，要向二司学习，二八声明期间他们受压，都不垮嘛！我们也要这样，不散伙。有人搞7·16串连会这是错误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会上布置了如下任务：（一）转入地下，化整为零，单线联系，保存实力。（二）武装自卫，不管那方，如果要打，就坚决拼。（三）重要资料、重要机关转到农村。（四）上街宣传，刷大标语“红三司永远跟毛主席闹革命”“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²。

中央文革办事组23日的一份快报记载了三司的动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返京的消息后，‘三司’内部极为混乱。在‘三司’司令部大楼中，有很多人低头深思，默默不语。”³23日，三司革联发表《夺权公告》说：三司在陈再道之流和右倾头头的操纵下完全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他们在机会主义道路上开始走向反动，成了炮打中央文革的急先锋，成了八二〇一和百万雄师一小撮暴徒进行江城暴乱的帮凶，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夺权公告》宣布：1.

1 王绍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第143—144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参见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总部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1—7）》（1967年8月）。

3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第3275号快报，1967年7月23日17时。

22日晚会议决定的事项基本没有实施，三司就此从武汉文革运动中消失。

22日开始，空15军开进武汉市，接管独立师的防务，独立师按命令于8月1日留下武器，离开市区集中整训。警卫东湖宾馆的独立师战士，离开岗位时痛哭失声。两支部队的交接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25日全天，武汉部队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乘坐数百辆军车在武汉三镇举行游行，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向热情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高呼“向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学习”“向三钢、三新、三司革联致敬”“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打倒陈再道”等口号。

26日，市委机关造反派头头魏绳武参加全市造反派庆祝游行，他“在长江大桥汉阳桥头，看到许多原百万雄师成员和8201的一些官兵，聚集在马路一侧，泪流满面，有的泣不成声，低头请罪：‘我们受了蒙蔽，参加围攻了东湖宾馆的错误行动，对不起毛主席。’”“这些人都是自动集合在这里的。”¹

七、七二〇事件的关键事实及脉络

1. 引发七二〇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理方针，而这一方针是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制定并组织实施的。1978年9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²说：“‘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结论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逻辑方法。

2. 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违背周恩来的规定，得到钟汉华认可，不做任何思想工作，将周恩来讲话要点迅速传达到部队基层，导致独立师部分指战员上街抗议，形成七二〇事件的先声。而这一违犯党纪、军纪、国法的行动，是在独立师蔡炳臣等领导蓄意鼓动、支持、纵容下出现的。

3. 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极力反对的所谓“四点指示”，是周恩来在军

¹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22页。

² 1978年11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8]71号)同意了这个报告，表示“‘七·二〇事件’应予平反、昭雪”。

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精神的一部分（陈、钟、牛、蔡最不能接受的部分）。周恩来他们不敢碰，谢富治也不敢碰，于是选中王力这个“软柿子”。牛、蔡在传达周恩来讲话时反复强调“对外不要提是周总理讲的”，而王力在汉期间在公众场合从来没有讲过什么“四点指示”，没有讲过“四点指示”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四点”的提法。根本不存在的“王力四点指示”这一说法最早出自独立师。

4. 激发规模空前、持续数日抗议游行的，不是百万雄师群众，而是独立师部分指战员。最先冲击东湖宾馆的是独立师指战员和“武汉公安”成员，百万雄师群众是“跟进”的。

5. 独立师领导或明或暗多次告诉百万雄师头头：毛泽东、周恩来就在东湖宾馆。百万雄师头头期望找到毛泽东、周恩来说理，挽回不利局面，故而组织冲击东湖宾馆。

6. 陈再道、钟汉华放纵部下肇事，自己躺倒不干，希望大规模群众抗议能够对毛泽东、周恩来形成巨大压力，迫使中央收回成命，毫不顾全中央安全和中央威信的大局。

第四节 “北京支持你们！”

23日，陈再道、钟汉华等15人遵照中央电令进京，次日凌晨抵达。

25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欢迎谢、王回到北京，支持武汉革命派，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成员等出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说：这件事一定会使右派更快地分化。武汉问题不只是武汉问题，武汉问题是全国的问题。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做大文章，把坏事变成好事。陈再道的这个部队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是徐向前领导的。谢富治也是四方面军的，谢富治还是他们的首长。现在他们连谢富治的话都不听了，那一定是有比谢富治还高的人在背后支持¹。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大会的蒯大富马上找到王力探询林彪所言“大做文章”的底细，一点一点着军队领导人的名字看王力态度，最后认定是徐向前有问题。周恩来对他熟悉的湖北日报社造反派头头、记者刘素珍说：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从外面调了部队，把武汉包围住了，陈再道他们想翻也翻不了浪。武汉是安

¹ 《戚本禹回忆录》第655页。

全的，是万无一失的¹。会后，叶群去中央文革办事组，指挥北航红旗等组织到徐向前、徐海东的家附近游行示威²。蒯大富连夜召开清华井冈山总部会议，传达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及王力态度，对形势的发展作出分析，提出“打倒徐向前”口号，发表声明说徐向前是操纵武汉事件的“黑手”，并抄了徐向前的家³。

26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复电。周恩来说七二〇事件是“叛逆行为”，陈再道、钟汉华几乎当场瘫倒在地。谢富治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会上，吴法宪打陈再道耳光。

同日，毛泽东主席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泽东主席代拟的复电称：“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作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北京支持你们！》、《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同日，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表《武汉军区公告》，检讨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表示坚决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

27日，林彪主持会议，作出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

1 2007年3月徐海亮访谈刘素珍的记录。

2 参见《戚本禹回忆录》第666页。

3 2003、2004年徐海亮访谈蒯大富的记录。

王任重可在全国点名。军区的公告，可在全国张贴，但不登大报，中央复电发到县团级，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公告”¹。

28日，武汉军民五十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呼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地光荣地回到毛主席身边，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武汉的支持”，并发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与会全体指战员《给谢副总理、王力同志的慰问电》、《给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感谢信》，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给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致敬信》。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北京地区海陆空三军召开批斗陈再道等人的大会。

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红旗杂志发表1967年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30日晨，周恩来打电话给曾思玉：“我已经派飞机去沈阳接你，你立即乘机来北京，调你去武汉军区工作。”九时，周恩来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传达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会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对曾思



1967年8月，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和海陆空三军驻京机关、文体单位慰问团在汉演出（载8月24日湖北日报）

¹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141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玉、刘丰的任命¹。

当日，康生接见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和河南两派代表。康生斥责百万雄师，并称陈再道是“反革命分子”。周恩来说：不要说百万雄师是“百匪”，中央没有这样说，只是说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因它还是群众组织。对犯过错误的百万雄师群众，要允许和欢迎他们回到生产岗位，用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的具体行动来改正错误²。

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武汉军区26日报请审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新的考验》、《再论受蒙蔽无罪 反戈一击有功》。

23日后，外出躲避的造反派大批回到武汉。31日，因人流拥挤，武汉港18码头栈桥断裂，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

8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为我们撑腰 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8月6日，三军驻京机关慰问团到汉，26日离汉。



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电影广海报

1 参见康永保《亲切教诲终生不忘——曾思玉面谒毛主席纪实》第86—87页，大连出版社2003年版。

2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76）》【1967年7月30日】。

8月9日至10日，周恩来中央首长两次接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负责人，就武汉地区文革运动作出一系列指示，形成《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即《八八纪要》）。

8月9日，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首长接见曾思玉、刘丰等几个大军区领导人。听取曾、刘汇报时，林彪说：“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部队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应该请地方左派来当教员，要借这个东风。……内蒙请保守派作报告，所以把部队引到邪路上去了。”¹这次接见林彪作了长篇讲话，后来称为“八九讲话”。

8月17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纪录片《北京支持你们》和纪录片《坚决和武汉革命派战斗在一起》在武汉上映。

8月2日至22日，湖北省各级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和武汉军区负责人先后调往北京集训，有武汉造反派成员参与。

文革中，中央以这样巨大的声势处理一个地方的事件，空前绝后。

¹《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1967年8月9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第三编

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的一年

(1967年7月—1968年8月)

第十七章 七二〇事件后的武汉局势

第一节 百万雄师成员的活动及其处境^①

7月25日围攻武汉测绘学院受阻后，百万雄师公开的活动停止了。

7月26日下午，百万雄师总站用六辆大客车装载着工作人员及物资，由一辆吉普车带路，准备转移到市郊东西湖额头湾。因未联系上，又转到古田三路武汉市公安学校和姑嫂树东风中学，当即商量决定：几位头头仍回总站观察了解情况，新组建的第二套临时领导班子在此留守。

26日晚，留守东风中学的人员将卸下的物资作了处理，上百斤一捆的袖章堆在教室里，武器全部丢进一个大水塘，人员转移到附近湖中央的养鸡场。三天后，二套班子的李清绍与陈秀华没有得到总站头头的消息，判断可能被抓，决定去额头湾找总站常委、政参部长蔡俊善。他们认为蔡俊善是最有水平的领导，在常委中受排挤，他反对武斗，讲究策略，对总站的蛮干是有意见的，只有他才能带领百万雄师应付目前的局势。29日下午，李清绍等人步行十几个小时到额头湾，听说蔡俊善已经带人去了东西湖柏泉农场，又赶到柏泉农场，和蔡俊善等上百人会合。李清绍带来百万雄师总站公章，王××带来六百余元的活期存折。8月上旬，蔡俊善等转移到沔阳县（现仙桃市）长埡口，打算以这里为根据地，于是招来一大批骨干办学习班，研究形势，决定组织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8月14日，百万雄师成员、“逆用特情”朱长春和陈秀华带领公安联司人员乘卡车来到长埡口，将百万雄师最后的一个据点拔除。

7月26日深夜，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俞文斌、杨道安、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到武汉军区，与军区领导联系处理善后事宜。其余常委帮助指导群众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亲靠友，尽量避免遭受重大打击。

27日上午，百万雄师总站一行五人从三五〇六工厂出来，乘一辆苏

^①本节关于七二〇事件后百万雄师活动的记述，参考了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及本书撰稿者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谢敏华、章迪杰、刘敬胜等人的多次访谈。

式吉普，由杨道安开车来到武昌洪山宾馆内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当晚军区叶明、夏夔等在洪山宾馆二楼会议室接见了俞文斌等五人。

军区领导问：中央已经表态，你们怎么办？俞文斌答：既然中央表态，我们服从。百万雄师的责任，我们总站全体常委承担，听候处理。但是，我们要求对我们的广大成员，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要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让他们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夏夔又问：你们具体有哪些打算？俞文斌答：我们想发表一个上述态度的声明。但是现在我们的组织已经解散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我们要求军区给我们印刷声明，以便散发。夏夔说：我们研究一下。接见结束后宿洪山宾馆，由章迪杰起草了一个声明。后来军区没能帮助他们印刷这份声明。

第二天俞文斌等五人从洪山宾馆开车去华工，找新华工司令郭保安。他们认为新华工理解中央政策要好一些，同时也希望新华工帮他们印发声明。一行人先到武汉空军司令部接待室说明去向，留下各人的姓名、单位。同时决定孙德洲、李本富两人留下，以便向其他人告知俞文斌等人的去向。

俞文斌、杨道安、章迪杰三人在新华工受到冷遇。7月30日晚，公安联司负责人田学群带着解放军战士将三人从华工住地押到市公安局，8月6日转到湖北省第二监狱。

武昌实验中学二司成员李乾因持枪打死两个“流氓”学生，当时也转押到二监狱。他看到：这些百万雄师头头“出现在外劳的队伍中。外劳是待处理的在押人员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首先远离了饥饿，其次家人可以见面，送吃的送喝的只要家里有。仅这两样，同在里面忍饥挨饿，饱受思念亲人之苦，还随时可能镣铐上身相比，是从地狱进了天堂。从百万雄师总部的头头到基层单位杀死造反派的凶手，他们全部从地狱到了天堂，看守所没事也要找些事给他们混，实在没事干，就在外面坐着晒太阳，这当然不是看守所所能决定的事，只是落实上面的指示而已”^①。

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联络站的9位负责人（俞文斌、杨道安、谢敏华、孙德洲、纪登清、刘敬胜、章迪杰和李树春、汪仕奇）于1967年7月底、8月初先后被捕，1972年3月解除监禁。纪登清（约生于1935年）因患重病，1969年下半年回家治病，1970年3月去世。蔡俊善当时也被捕，一两个月后就被单位要回去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百万雄师常委说：

^① 李乾《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自印本，2007年）第117页。

“蔡俊善可能是反戈一击有功。有一次我们八人被押出去批斗，批斗会上看见蔡俊善坐在台下，手里还拿着毛主席语录本。1978年七二〇事件平反，市里的文件上没有他的名字。他的平反通知书是市公安局出的。1972年3月我们出狱后，他要求参加原百万雄师成员的一些活动，老俞叫他不要参加。”

七二〇事件后，中央多次要求武汉造反派对百万雄师成员不要“乘机报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7月31日发布《紧急通告》说：“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一般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讽刺谩骂、打击报复的态度，更不能抓人，要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武器，对他们进行耐心、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地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8月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紧急通告》。

所有的造反派组织也都分别公开表明类似的态度。绝大多数造反派成员没有“乘机报复”。



省直文艺界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毛泽东思想文艺兵创作的宣传画（载8月27日湖北日报）

武汉锅炉厂工总负责人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了七二〇后如何对待保守派：

阀门车间的复员军人、厂百万雄师头头邢好林师傅，我们就热情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促其转化，小有进步，大力表扬。军品生产的关键工序，仍然安排他上机操作。邢师傅很快甩掉了思想包袱，并且带动一些人转变过来了，根据他们的愿望，吸收他们参加了工人战斗队。检查科的老工人王道义，是厂百万雄师一号头头。我主动找他谈心、交心，要他放下沉重的思想负担，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继续革命的理论，提高认识，转变立场。在交心谈心时，不以势压人，不强加于人，展开思想交锋，立足以理服人。我向他郑重承诺：绝对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茗事，绝对保证人身安全，决不违背政策。请他转告逃到厂外的同志们，让他们尽快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全厂开会斗争王道义，会前我对他讲：思想批判是应该的，不搞人身攻击和伤害，你大可放心。会议是我主持的，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安全的。会议中，有年轻人上台要打他，我一边制止，一边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他。他倒是安全了，我却很挨了几下。事后，当然责令这个年轻人所在车间的战斗队负责人狠狠批评了他一通。我及造反司令部的勤务员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对不同观点的工人，一律以诚相待，立足思想交锋，各摆各的理由。记得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过：武器的批判代替不了批判的武器。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只能用思想意识上的道理解决，仗势压人是压不服的。我的这种信念贯穿文革全过程，是我持之以恒的处事原则。厂里职工，不分派别，都是了解这一点的。所以王道义后来与我成了朋友。叶圣华先生文革后任《武汉晚报》副总编，当年他是厂里对立派的笔杆子。七二〇后，他转变很快，愿意尽早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同张桂申、孟运通达成共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安排他参加《新武锅》厂报的编辑工作，发挥他的专长。那时他经常拿着报纸的清样征询我的意见，我总是热情地讲：相信你的能力和水平。你觉得怎么妥当，就大胆地搞，只要不出大纰漏就行。

全市各个造反派组织以及基层组织，就我所知，至今仍然找不到哪一家做出伤人、打人、迫害对立派人员的决议、决定。我厂二车间发生打人的事，我与沈复礼知道后急忙赶去制止，向被打的人员赔礼道歉，当面承认了我们的工作没做好，负有领导责任。其后狠狠批评了二车间战斗队的

负责人，警告他不得继续违犯政策。对这次事件必须在全车间公开进行深刻检讨、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如果再犯，坚决开除出战斗队。请二车间战斗队一把手、老工人熊时运监督执行，并把结果报上来^①。

新一冶负责人曹承义在回忆录中写道：

七二〇事件后，我主持对百万雄师坏头头的分化、瓦解工作。按照毛主席“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的指示，我下令造反派一律不准揪斗百万雄师的坏头头、不准贴百万雄师坏头头的大字报、不准指名道姓地说谁是百万雄师的坏头头，我们不仅没有去伤害过他们，而且连我都一直不知道百万雄师一冶的头头是谁。和百万雄师始终把矛头对准造反派不同，我们在整个文革运动中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当权派身上，从来没有把保守派当作自己的政治对手。1976年八九月间，一冶机关工会工人宋恩厚找过我一次，想和我谈百万雄师和我们造反派联合的事，我才知道他是百万雄师的一位头头。也就是在同一时间，一冶党委一位领导在讨论落实造反派头头进入一冶革委会和党委领导班子时，曾试探性地问我能否将一冶企业公司技术员李彦文也同时进行安排补台。我愣了一下，问李彦文是谁，这位领导说，就是你们的对立面、一冶百万雄师的头头。他说如果造反派和保守派头头同时补台，阻力会小得多，领导层容易通过。此人今生与我仅一面之交，那就是1976年10月底，李彦文组织了对我的非法揪斗、殴打和监禁，将我打伤，此是后话。

七二〇事件中央表态后，遭受屠杀的一冶造反派立即从北京等外地和武汉的几所避难的大学回到生产、施工岗位。以新一冶为首的造反派组织联合本单位七二〇以后迅速膨胀起来的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工造总司等其他小组织，召开了批斗一冶走资派的大会。造反派声势浩大，组织大发展。一冶造反派人数约占职工总数的60%，达170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90%都参加造反派，干部中的保守派主要是原来的政工干部。……

七二〇事件发生前，一冶百万雄师中有人拿过长矛，参加过屠杀造反派的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备受欺压的造反派翻身后，确实有少数人有报复打人的过激行为。7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当天，一冶小车班司机姚登生开车到新华工来接我回一冶，有人说姚登生是老保，要打姚登生，我立即用身体阻挡打他的人们，我趴在姚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16—117页。

登生的身上，大声加以制止。姚登生被我保护后回到一冶，到处对人讲我救了他，造反派执行政策很好。这事很快在一冶传播开来。后来，我们团结受蒙蔽群众工作做得很好。多年以来，姚登生一直是我很好的朋友。

8月初，我在回家路上遇到一冶负责抓生产的保守派观点的领导干部亓道科，他向我反映说：“最近，施工处有个造反派头头凶狠地威胁我，说我不老实，小心挨打！”我很真诚地对他说：“你放心，回工地好好抓生产，我立即给施工处打招呼，绝不允许发生殴打干部的事情。”这位工人出身的老干部很受感动，从此一直坚持在施工一线指挥生产。一冶革委会成立时，我还提议让他当上一冶革委会副主任，专门负责抓生产。施工科科长王明焕（后来提拔为一冶副经理）也是偏保守派观点的干部，是我文革前的老上级。他向我反映，施工处有个姓丁的技术员要打人，他很害怕，希望我出面制止。我立即通知机关造反派头头刘本孝（一冶施工处技术员），制止了施工处可能发生的两起打人事件。

我通知亓道科、王明焕这两人，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干扰你们生产指挥，如果有人来找麻烦，你叫他来找我。这两人后来长期主持领导一冶的生产、施工工作，使一冶的“抓革命，促生产”始终健康地向前发展。

我和桂大庆等新一冶勤务组成员，十分注意做好一冶站错队干部的思想转化工作，团结他们一道革命。七二〇事件后，我们连续组织了几次科级以上干部的座谈会，让参加“革命干部联络站”组织的干部与他们一起座谈，让他们“站过来”，并大胆解放他们，在工作中加以使用，团结干部工作做得卓有成效。我们还根据亓道科、王明焕这两人反映的情况，召集了多次各级造反组织头头的会议，严令一律不许打人，一冶绝大多数单位都严格执行了这一纪律。这成为以后我们与省、市当权派作斗争时能在一冶一呼百应、遇到阻力较小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我们按党的政策做好了团结广大干部和工人的工作，我们才在一冶深得人心^①。

百万雄师骨干特别是武斗参与者被通缉、关押、批斗、殴打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也有被殴打致死的。在一冶，工安公司的百万雄师成员、武斗骨干王荣炎被打死。

支持百万雄师的各级当权派都被批斗，没有见到被打死的记载，当时也很少听说。这种情况与当权派武斗时一般不直接上阵有关。

^①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86—88页。



1967年8月，九一三武钢分团批斗支持百万雄师的武钢经理沈因洛等（载8月28日《钢九一三》报）

陈再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载《革命史资料》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6月版；又载《中国老年》杂志总1-5期，第1期1983年10月出版）一文中说：“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七二〇事件’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十八万四千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六百多人。”1989年7月出版的陈再道著《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一书，再次写下这一段文字。

陈再道所言“湖北省委统计”的确切出处没能查到，所查到的数字，不同时间不同当政者有不尽相同的说法，甚至同一当政者的说法也前后不一。1970年3月曾思玉在湖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说：“八（个地）区（按：不包括武汉市、黄石市）被打死打伤18万多人，打死逼死的4千3百人。”^①1970年6月曾思玉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全省挨打18万多人”，“打残一万多人，打死四千多人”。同一会上刘丰说：“根据八个地区和黄石市（按：不包括武汉市）统计……遭到毒打的有十六万多人，打伤约有八万多人，打残的有一万四千多人，打死的有四千多人。”^②1971年1月17日曾思玉在省“两代会”（湖北省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首届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

^① 马学礼1970年3月20日听传达曾思玉在湖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所做的记录，载彭维俊《马学礼：永远的劳动模范》（未刊稿，2019年）。

^② 刘德光《回眸——我经历的宜昌文化大革命》（自印本，2015年）第210页。

会)上说:“全省被打死打伤的人真是无法统计。”1978年9月18日武汉市委“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情况报告”说:“据统计,在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中,全省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无辜群众总计18.4万余人(主要是武汉的干部群众),其中被打成重伤的6.5万余人,被打成残废的1.1万余人,被打死的4000余人。”^①

这些数字互相矛盾,同一会上曾刘二人竟然说法不一,所有不同说法都有明显的夸大。1973年10月湖北省委在省二招举办造反派头头座谈会,会上强烈要求澄清1970年曾思玉的那一段讲话,武汉军区原支左办公室主任、时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信俊杰1974年2月17日在座谈会上说:哪有什么十八万四千,零头都没有^②。朱鸿霞1974年3月说:“说什么打死十八万七千人,我最近问了一下信俊杰,信俊杰说零头也没有。”^③

徐正全(一治工安公司造反派头头,因百万雄师成员王荣炎被打致死一案被判死缓)的反驳比较能代表武汉造反派的看法:

七二〇后武汉造反派确实报复打死了百万雄师成员,但绝对没有六百多人。当权派绝不会放过一件造反派打死百万雄师成员的案子,以我们一治打死王荣炎一案为例,打死一人判了四人,全市岂不是要判两千多人?这两千多人都在哪儿呢?我二十一年内蹲过四处监狱,所知因报复打死百万雄师成员而判刑的除了我们四人,只有五个人:湖北柴油机厂的陈汉寿、武汉铁路技校的董恒松、国棉一厂的董光清、省戏校的李希安、武汉轻工业机械厂的一造反派。

我或许是坐井观天,这个算不得证据。还有一件事,作为佐证应该是可信的。几年前,经过无数次的奔波交涉,省政府同意给两案(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人员发放生活补助,武汉市共有九十人左右,其中犯人命案的十余人(除打死百万雄师成员判刑的,还包括钢新两派矛盾致死人命、非派性致死人命的)。就算这十余人全是打死百万雄师成员判刑的,就算这类人百分之九十因去世或其他缘故未能接受补助,离陈再道所说的“被打死六百多人”也差得太远。旧社会讲良心,新社会讲道德,这样良

^①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52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② 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2条。

^③ 《朱鸿霞同志在长航反潮流战士召开座谈会的讲话(记录稿,1974年3月18日)》,武汉市纺织品公司批林批孔座谈会翻印,1974年3月23日,油印传单。

心丧尽、道德全无的谎言竟敢堂而皇之地大讲，目的无非是往造反派身上泼污水，在群众中散布仇恨，同时掩盖自己的罪恶。

曾思玉要弄清楚七二〇后到底有多少百万雄师成员被打死非常容易。他讲那番话的时候，打死百万雄师成员的造反派早已被判刑，一个都不会少，到公检法机关一查就知道了。其实他心里是有数的。……造反派当时的大字报、传单报道过信俊杰的这句话，至今健在的多位会议参加者也可以作证。信俊杰都知道的事，曾思玉会不知道？只有一个解释：别有用心。

那么百万雄师杀人的有没有被判刑呢？据我了解，勉强有一个。我们一队有个叫朱启发的，据别的犯人讲他是百万雄师成员，杀过人，据说百万雄师六二四血洗工造总司，他杀死了十五岁的小女孩朱庆芳，那位广播员。朱启发被判刑十五年，但是1977年上半年就被突然释放了，就算他是1967年底被判刑，服刑不到十年，而且据说还平反了^①。

李乾回忆：

同监号有一个江汉区汽车油箱厂的党支部书记，伙同保卫科长和几个凶手把他们单位的一个造反派抓起来活活打死，几天前被军管会喊出去谈了一回话，回来后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告诉我，他的问题可能快了。几天后被叫出去外劳，再过了不到一个月就没见他的人了，据说放了。外劳的队伍清一色的百万雄师，并且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阴放一个明放一个，不动声色的已放得差不多了^②。

1967年8月底，对百万雄师骨干成员的报复行为逐渐停止，此时王力倒台，百万雄师的一些骨干开始串连，举行小型聚会。1968年春节期间，百万雄师江岸分站李务金（江岸起重站职工）等人在李家聚会，决定写材料为七二〇事件、为百万雄师翻案，要求平反，同时在全市串连。1968年初春，夏少卿（东风纺织厂工人）、余少卿（武汉市粮食系统职工）、徐金荣（硚口区汉水桥街办事处编外人员）等组织“上京翻案联络网”，开展为百万雄师翻案活动，被百万雄师成员称为“翻案中心”“翻案司令”。9月1日，黄传耀、汪扬、刘长安、刘天喜等写出巨幅标语，“坚决为七二〇事件翻案”“坚决为百万雄师翻案”“彻底砸烂省、市派委会”“强烈要求立即释放百万雄师领导人”，从硚口百货大楼四楼垂到

^① 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回忆》第172—173页。

^② 李乾《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自印本，2007年）第117—118页。

一楼，并在汉口闹市张贴同类标语。夜晚将传单塞进居民家门缝，在大街小巷张贴^①。

同时，刘长安、刘天喜、汪洋、彭爱洲、王金木等8人组成为百万雄师翻案的“独立大队”，他们暗中散发的传单中有这样一张口号报：

1. 彻底为“百万雄师”翻案！
2. 彻底砸烂省市革委会！
3. 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4. 彻底为“七二〇”平反翻案！
- 5 “七二〇”革命精神万岁^②！

1972年3月百万雄师头头释放，重新聚集人马，1974年批林批孔中公开打出“工农兵”旗号，1976年批邓中除“工农兵”外出现“寒城牛”旗号，专与造反派对着干。

第二节 武汉造反派全国“支左”

七二〇事件平息后，在中央级的报刊、电台、电影的鼓动下，武汉造反派获得极高荣耀。全国各地连日举行盛大游行集会，声援武汉造反派。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纷纷邀请武汉造反派作报告，武汉造反派普通成员都能登上高级别的会议主席台。受伤的武汉造反派成员去上海等地治疗，待若上宾，一律免费。

8月6日，长江日报在第一版发表署名“钢二司新武大农奴戟兵团”的文章《全国支持武汉 武汉怎么办？》，同时配发社论《这个问题提得好！》。这篇文章及社论，集中反映了武汉造反派的感激之情，但并没有号召到全国各地去支持左派。8月18日，长江日报编辑部在该报刊登公告：“从本周起，每星期六下午七点在红旗大楼前召开群众性形势分析辩论大会，本周举行‘全国支持武汉，武汉怎么办？’的讨论。”

8月10日晚，钢工总五湖四海兵团和水院二司井冈山兵团在水院体育场召开“全国支持武汉，武汉怎么办？”讨论大会，本地和全国各地在汉的造反派上万人参加。会上的倾向性意见是武汉的造反派翻身以后，应该到全国各地去支持那些仍然受到压迫的造反派战友。

^①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16—117页。

^② 汪洋《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31页。

军队介入文革运动，正如毛泽东1967年8月4日致江青信所说，全国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军分区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刚从武汉军区及其操控的百万雄师的高压下解脱出来的武汉造反派，认为文革当前要解决军内走资派问题了，同时有感于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对一些地区造反派依然受压制的境遇感同身受，纷纷自发跑到各地“支左”“揪军内一小撮”。

三中红岩“赴东北支左小分队”在沈阳支持辽联。他们参加辽联“打倒李伯秋（沈阳军区副政委），火烧陈锡联（沈阳军区司令员）”的大游行，打着“武汉钢二司”旗帜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谢保安应邀到东北局干部学习班作报告。谢保安回忆：“我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介绍武汉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对抗‘带枪的刘邓路线’、英勇抗暴的情况。联系自身实际讲得声情并茂，在东北局老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我那时才刚满18岁，毫无政治经验和阅历，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社会氛围和自己的切身感受，让我口无遮拦，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得台上台下群情激动，多次被掌声打断。讲完后，多名老干部找我了解湖北文革的情况。”离开沈阳后，他们还去了丹东、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等地，对当地造反派表示支持^①。

至今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武汉造反派组织的总部有过动员和号召赴外地“支左”的文件。8月中旬召开的钢二司第二届红代会《关于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现在武汉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因此，目前仍以搞好武汉为主，兼顾（本省）专县农村。全国在支援武汉，我们要虚心地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彻底地搞好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七二〇事件后，杨道远在北京与蒯大富、韩爱晶等座谈，“谈到七二〇以后的全国形势时，蒯大富说，下一步是不是转向军内，揪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中央是不是有这个意思，要我们搞第二次大串联？蒯大富的想法得到与会者认同，运动的下一步就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②

7月27日陈伯达、谢富治等接见武汉造反派，有个军内造反派拿了个本子要谢富治题字，谢富治把本子推给了杨道远，杨写：“把军内无产

^① 参见《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②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78—179页。

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受谢副总理之意题。杨道远”。那人把本子递给谢富治看，谢笑而不言。

在全国“支左”的武汉造反派成员，更多的是七二〇前跑出去避难的学生和工人，他们在各地支持“反军”的一派，所起作用不小，使得中央多次批评武汉造反派这一行为。1967年8月26日周恩来等接见武汉造反派在京代表时，谢富治说：你们不要到全国去，不要把香牌子搞臭了。江青在1967年9月5日讲话中说：武汉有个钢二司，一翻身就到处跑。

二司司令杨道远回忆：

在中央批评以后，钢二司司令部向到全国各地串联的钢二司战士发出了命令，要求他们限期回武汉，从组织上结束了“全国支左”的活动。

1967年11月，武汉钢工总举行武汉毛泽东思想工人总部成立一周年庆祝活动，全国各地有名的造反派组织差不多都派人来了武汉，其间我参加过几次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就是交流革命造反派与走资派斗争的经验。外地的特别是还在受压的组织，发言激动，言词激烈，控诉走资派对他们的迫害。他们往往对武汉的造反派说：你们解放了，日子好过了，不要忘记我们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要帮帮我们。胜利冲昏头脑的武汉造反派，到全国支左何止钢二司一家^①。

当时在各地“支左”的主要是学生，也有少数工人。武汉国棉一厂工总负责人王屏回忆：厂里面有人要拿10支枪（保卫科有枪）到黄石去搞武装支左，我坚决不同意，结果被堵在厂俱乐部里一天一夜。我坚决不让步，说只有解放军支左，没有工人支左。

武汉造反派并不是全体被“胜利冲昏头脑”。在“武汉支持全国”的高潮中，8月14日，长江日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集中主要力量搞好武汉革命大批判——钢二司革命小将建议加强组织纪律不要随便外出串联”。

此时在湖北主政的曾思玉和刘丰对此没讲过一句话，听之任之。谢保安和三中红岩一批人去东北“支左”，二司政参部给他们出具了介绍信，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员刘海江带谢保安去军区支左办公室，在介绍信上加盖了公章^②。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199页。

^② 参见《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第三节 “武装左派”

1967年8月，中央部署“武装左派”。8月4日毛泽东致江青信中说“应大量武装左派”。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同日中共中央《关于江西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八八纪要》里中央领导明确对武汉造反派头头说：“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来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首先是武装工人，学校里应该搞军训。”8月9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时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①8月14日，曾思玉在二司第三届红代会上致辞说：一定要贯彻中央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使枪杆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8月19日，在有造反派头头参加的武汉警备区成立大会上方铭表示：“坚决支持造反派，武装造反派。”

武汉造反派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得到枪支的。其途径有三个，一是发给的，二是受到指示去拿的，三是自行去拿的。从1969年“两清一批”直到文革后，此事一直受到严厉追究。多位以“抢夺枪支”作为罪名之一被判刑的武汉造反派头头说：所谓抢枪，一是发的，二是允许我们拿的，真要是去抢解放军的枪，抢得到吗？毛泽东主席早在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时多次说：抢枪，我看大多数是发的。1974年4月武汉军区三办徐健揭发：“六七年的所谓抢枪，方铭有电话指示，给造反派发枪，要我们订计划，发三万条枪，后来没有直接发，派人引着到纸坊仓库去搞，两清中又说造反派抢枪乱军。”^②

发枪之一例：

1967年8月，经武汉军区、武汉警备区批准，武汉锅炉厂民兵师成立，厂工总头头王光照任师长，发下厂武装部的二百余支步枪和几挺机枪。成立大会上，武汉军区、武汉警备区、武汉军区各级支左办公室送贺信，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张绪、8199部队师长赵奋、武汉军区代表刘海江、军区三办成员邵宏基、驻厂部队邓副营长出席。张绪、赵奋讲话，对武锅民兵师成立表示祝贺。张绪代表上级机关向王光照授旗、授枪。

^①《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1967年8月9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②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成员徐健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受到指示去拿枪的几例：

1. 杨道远回忆二司得到枪支的经过：

钢二司司令部的一班人，根据中央文件和《红旗》杂志社论精神，去了部队设在武汉测绘学院图书馆的支左办公室。我和方保林、丁家显等人，找到了支左办公室负责人、7252 部队政委康星火，说明了来意。我们问，钢二司是不是左派，武装左派钢二司该不该武装？既然中央已经发了文，有了精神，就应该紧跟照办，立即行动，要武装我们，要求给我们发枪。康星火说，我们支持钢二司，武装左派肯定应该武装钢二司，但是发枪是件大事，我们做不了主，要请示上级领导，没有指示，不能发枪。

最后，要钢二司的人先回去，等他们请示后再答复。

隔了一天，他们就答复了。支左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孙树仁）来到了钢二司司令部找到我。他首先做自我批评，说，我们还是没有小将们政治敏感，形势跟得不紧。武装左派，钢二司肯定是应该武装的，但是不能直接发枪给你们，因为武汉群众组织比较多，给钢二司发了枪，别的组织要是也来要枪，就很难办，要钢二司体谅部队的难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孙树仁说，最好是你们自己去仓库里搞，我们支持你们。这是他们代表“上级”给我们的指示。

守卫仓库的解放军看到钢二司的人来了，就立即开门表示热烈欢迎，后面的车子就紧跟着开了进去。在我们的要求下，值勤的解放军把各个库门都为我们打开了，……。守卫部队看到钢二司搞枪，当即给上面打电话，8199 部队去了很多人，他们到达的时候，我们装着枪的第一辆汽车已经出来了，正好拦住，我就在这辆车上。我下了车，同前来的解放军讲明了情况，他们认准是钢二司之后就放行了。部队还派战士持枪封锁路口，保证钢二司的车辆通行^①。

2. 工总二七办事处去总参 127 部队搞枪，是二七区支左办公室主任余耀东带他们去的。参与者说，余主任表现得很积极^②。

3. 水院二司到市人武部搞枪，人武部的干部讲，人武部的武器早给人拿走了，你们可以到汉阳赫山武器库看看。驻水院部队的岳团长派一个班的武装解放军同车前往，赫山武器库管仓库的人指引搬运。一千多枝枪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 201—202 页。

^②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 126 页。

和很多子弹运回水院，都放入院人武部武器库，由解放军把守^①。

王光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军区三办成员朱章与我们朝夕相处，有一天他的工作手册掉在工总总部办公室。我好心地帮他收起来，随便翻了一下，上面记满了什么地方、什么仓库有多少枪。这很可能是故意把点（告诉门径）。我将本子锁在抽屉里，然后向朱鸿霞汇报。老朱嘱咐我注意保密，不要到处乱讲，以免惹起不必要的麻烦。”^②

二司得到支左办公室同意可以去拿枪，其他组织纷纷效仿，自行探寻目标，自行前往搬取，基本没有受到阻拦。

各组织得到枪械，部队到大中学校组织军事训练。

杨道远回忆：

枪运回武测以后，钢二司成立了“军政训练办公室”，由方保林直接负责，军政训练都是请部队帮助搞的。这个办公室的技术指导都是部队派来的。清理枪支、配枪栓、校正、试射，都是部队干部帮助完成。钢二司组织民兵队伍，发放枪支、组织训练、打靶，都是部队干部领着干的。红武测成立了钢一连、钢二连，8199部队派了两个编制连驻进武测，同民兵连搞“一帮一、一对红”，一起训练，一起打靶。当时《解放军报》还报道过^③。

二司红水院总部头头张建成回忆当时“军训”：

枪支经解放军检验维护后，组织全院师生进行军训，由部队组织实施，教官认真负责，学员严守纪律，刻苦训练。……新华社记者来院采访，拍了师生军训的照片，并发了通讯，在《人民日报》头版进行了专题报导。军训的最后一个训练科目是实弹射击，我们组织师生进行实弹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④……

1967年9月5日中央发布“九五命令”，武汉所有造反派组织都执行了。

二司在部队的参与下，封存枪械库，发下去的枪支收上来，由钢二司军政训练办公室按发枪时所造账册核对无误后上交。

张建成称水院是全市第一个全数上交武器的单位：“我们组织队伍，敲锣打鼓，一路步行到警备区。张绪副司令员对此十分满意，表扬红水院

①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02页。

②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26页。

③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02页。

④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02—203页。

关于枪枝彈藥問題的 緊急命令

战字003号

为了更好地开展“拥军爱民”活动，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促进革命的大联合，根据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精神：“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邀请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不符合这样条件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又根据中央首长八月二十六日接见三钢、新华工、新湖大代表时的指示精神，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毛主席批发的指示，我钢二司坚决照办！为此，我钢二司司令部特发出命令：

一、各总（分）部所有枪枝，除当地驻军同志军训借用外，必须立即清点数目，就地封存，交司令部军调办公室备案。弹药应立即集中，专人保管，任何人不得动用。（特殊情况必须由当地驻军与司令部批准）如有私自分散、隐藏枪枝弹药者，一经查出，严肃处理。

二、除值班人员（持有证件）外，任何人不得随意携带武器外出。否则，值班人员有权清查、没收，并严加追究。

三、除军训打靶（经解放军批准）外，任何人不得乱放枪。

四、任何人都不得用任何借口冲击军事指挥机关、军事驻地、军事仓库，不得侵犯人民解放军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等。不准乱抢枪支、弹药、军事装备。

五、以上各条，如有违者，严加处理。

以上各条，希各总（分）部广泛宣传，认真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汇报司令部军调办公室。

此 令

武汉钢二司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载9月14日《武汉钢二司通讯》

的革命师生最听毛主席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贡献，这次执行中央‘九五’命令又带了好头。”^①

王光照回忆：

我厂做出决定，坚决执行命令，委托何华清负责收回下发的武器，集中存放在办公大楼地下室，择日敲锣打鼓送到了汉口万松园路武汉警备司令部。由于我们行动迅速，坚决执行中央命令，警备区领导多次在会上表扬我们，肯定我们在全市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体现了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干革命的本色，不愧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②。

1970年在北京办学习班期间，张昭剑指责杨道远搞“反革命武装”，杨道远回答：“你们派人帮助组织训练，是你（张昭剑是8199部队政委）派部队去同我们搞‘一帮一、一对红’，我们怎么成了反革命武装了呢？”

^①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03页。

^②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27页。

那你们算什么呢？”^①

1983年1月，武汉市武昌区法院审理杨道远抢夺枪支弹药、抢夺公文一案，杨道远在法庭上说：“抢是要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我们赤手空拳，仓库有一个排还是全副武装的战士守卫着，我们如何抢得了？更何况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何以定我抢夺枪支罪！”^②1月18日法院判决：“判处被告人杨道远抢夺枪支弹药罪有期徒刑十年；判处抢夺公文罪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有期徒刑十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04页。

②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04页。

第十八章 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

第一节 造反派的大联合

一、周恩来指示武汉造反派大联合的道路

七二〇事件后，中央关于武汉文革运动的部署，就是在钢新两派联合的基础上，成立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然后建立三结合的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文革时期的中国，省级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规定必须以群众组织的联合为基础，群众组织代表在政权中占有相当比例（1968年2月5日成立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37人，群众组织代表15人、农民代表2人；主任、副主任9人，群众组织代表3人、农民代表1人）。

从7月23日到整个8月，中央对武汉问题的一系列报刊文章、文件、讲话，反复提到武汉钢新两派的大联合问题。特别是1967年8月《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八八纪要》）对这个问题讲得更加明确细致：

武汉的右派势力还很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三钢、三新一定要加强团结，武汉对长江两岸，对全国影响都很大。大家都是从小白色恐怖中杀出来的，过去并肩战斗，共过患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千万不可打内战。彼此多看对方的长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多作自我批评。中央首长一再指出，不要因为内战辜负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期望，要站得高、看得远，看到全省，还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你们要对武汉负责，对湖北一共三千二百万人负责。国际上如援越抗美，武汉铁路不通，物资就过不去了。人家越南三千万人浴血抗战对付一个美帝国主义，如果你们三千万人打起内战来，跟人家比一比！

而“七二〇”事件是个最重要的考验，主要看“七二〇”。过去的账不要算了，对待“二八声明”应当批评支流，支持主流，光说“香花”、“毒草”这两个绝对概念是不行的。

革命派一定要实行大联合。至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研究了一下。不是上海道路，也不是北京道路，应当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北京、上海只是一种方式。武汉有武汉自己的特点嘛！应当创造自己的经验，回去后，先搞个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把文化革命领导起来。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一三，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他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

武汉不是有个联合指挥部吗？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嘛，当然有的大组织也才有一个委员，但是在革委会建立以前，还应当起过渡的作用，将来要取消，由革筹小组代替。

《纪要》所谓“联合指挥部”，是指1967年6月22日成立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前身是1967年5月16日成立的“武汉市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联合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大联指”是由5月5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和5月8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工矿企业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合并而成），设在湖北大学，总指挥是新湖大的张维荣。这个总指挥部包括了钢新两派所有组织，



签署八八纪要的各组织代表合影

在与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对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对七二〇事件表态后，钢新两派没人再提这个总指挥部，都是以各个组织的名义活动。七二〇后大联指在北京办《武汉烈火》报，不久工造总司龙梅生等退出另办《新武汉》。《八八纪要》要求以联合指挥部作为成立革筹小组的过渡，这个精神后来没有落实，新武汉军区没有进行这样的推动工作，钢派也没有拿联合指挥部当一回事。

钢工总五湖四海兵团北农机东方红支队写于1967年8月的一张大字报说：联合指挥部“压制工总翻案，企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①。8月中旬吴焱金向朱鸿霞提出以“大联指”作为“大联合的基础”，“可由钢工总处在主导地位”。朱鸿霞说：“‘大联指’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在钢工总的旗帜下统一起来。”^②

二八声明问题是钢新两派的宿怨，它导致武汉造反派公开分裂。《八八纪要》对二八声明作了一个结论：

“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一·二六夺权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一个革命的夺权演习，大方向是对的，要支持。“二八声明”还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大方向还是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它虽然存在着有缺点有错误的口号，如反托派（而且这些口号不是武汉的特产，是从北京传去的），但都是夺权时期的新生胎儿，毛里毛糙、并不漂亮，却富有生命力。陈再道抓住这个声明的非本质的方面，作为镇压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三二一通告”就是他对待“二八声明”的反革命行为的继续。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镇压革命，在这样的问题上，应当立场鲜明，支持革命的。“二八声明”把一些造反派同志当作成托派，所以，三新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如果这个批评的限度是“反托派”不对，但支持它要革命的大方向，就对了。然而，你们（指三新）的错误是超出了这个限度，客观上支持了军区的“二一八严正声明”，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对三新同志这个认识的错误，三钢的同志应当谅解，不能与陈再道的问题混淆起来。

事实上，三新的同志很快发觉不对头了，在大风大浪中站在了革命方面，在对待军区的“三二一通告”及工总的问题上，你们（指三新）也还是一个思想支配的。小将在复杂的情况下，把形势看错了，这没有关系。

^① 参见武汉钢二司新华农总部主编《新华农战报》第四期（1967年9月8日）。

^②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72页。

而“七二〇”事件是个最重要的考验，主要看“七二〇”。过去的账不要算了，对待“二八声明”应当批评支流，支持主流，光说“香花”、“毒草”这两个绝对概念是不行的。

中央首长关于二八声明的这一结论，新派很多人是不能全部接受的，只是不便公开表露。

这次中央首长接见，王力在周恩来到场前批评新派说：“二八声明的大方向是对的。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你们三新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要深刻检讨的，要向二司道歉的。”周恩来到场后批评王力：“你们懂得什么叫机会主义，历史上毛主席有几次都被打成机会主义，结果还是毛主席挽救了革命。说好要一起谈的，不要单独讲嘛。”^①此后开始的钢新之争中，钢派主要攻击新派是“机会主义”，一些新派头头被称为“×老机”，二司一些中学生写得最多的标语是“杀鸡（机）喝汤”。

《八八纪要》提到的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新武汉军区没有着手进行组建，倒是孟夫唐、刘真、毛远耀等支持钢派的老干部搞了一个“省革筹”，并且开展了工作，曾经通知省内各地市群众组织头头来汉开会，商讨筹备省革委会事宜。对这个“省革筹”，新派是反对的，三钢也不热心。1968年6月周恩来、陈伯达点名批评孟夫唐后，钢新两派都指责孟夫唐是对方的“黑手”，指责对方参与了“伪省革筹”。

周恩来1967年10月来武汉期间，对大联合、三结合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部署。他没有再提成立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要求武汉地区各造反组织实现大联合，进而分别成立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然后议定省市革委会组成人员，成立省市革委会。周恩来1967年10月8日对造反派头头说：不以钢派为主成立钢工代会，也不以新派为主成立新工代会，不要钢，不要新，成立一个革命的工代会。武汉后来的大联合、成立省市革委会，大致是按这条路线实施。

周恩来10月8日在武汉说12月前或次年春节前全国省级革委会要全部建立，于是湖北省革委会赶在1968年2月5日成立，武汉市革委会于1968年1月20日成立。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于分别于1968年1月15日、17日成立，与市革委会成立日期相距5天、3天。如果没有这个时间限制，钢新两派的争

^① 郭保安《文革中的我》（2009年）。

吵还会继续。工代会、红代会成立时，国务院、中央文革都发来贺电。

二、周恩来说：“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

7月27日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对“武汉市的一系列革命组织”是这样表述的：“工总、二司、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群众组织”。8月《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提到：“中央对武汉造反派的组织不能个个都点名，点名只能是一些出名的组织，不能说未点名就不是造反派组织。”

武汉地区众多造反派组织中没有被这封信提到的组织，自称“等”派。吴焱金说“对（中央）这一提法，当时新派的人普遍有意见”。他回忆：意见较大的是工造总司、中学红联和省、市机关红司。因为揪武老谭、抗暴都是这些组织顶着风险干的，新派组织对中央点名三钢、三新没有意见，但对三司革联被点名意见很大，因为未被点名的几家新派组织都是坚定的老造反派，其中任何一个群众组织的造反资历、影响、人数都是三司革联所无法比拟的。当时大家议论，中央是否只肯定工人总部一派，其他的群众组织就不用点名了，有工人总部作代表就行了，不需再点工造总司及众多工人造反组织革司、联司的名。还有一种议论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中央代表团中有几名北航红旗的成员，北航红旗是在《二八声明》中签字的仅有的3个外地大专院校之一，一直是支持钢派的。新派组织与来汉的北航红旗及中央文革没有什么联系，仅仅只是和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人有联系，而南下革命造反大队主要成员是北京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的，在一·二六夺权的讨论会上，北京矿院的张立三公开指责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因为这些+历史的原因，中央代表团中真正了解武汉文革运动历史的人就是北航红旗的几个人，而他们从来不跟新派打交道，估计中央最后点武汉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名，北航红旗的几个人起了关键作用^①。

当时被较多议论的还有“新华农”。这些议论当时被称为“中央点名”问题。

新派中的工人组织除了工造总司是全市性组织外，大多是立足本单位、实现本单位造反派联合的组织，遵照1967年3月中央提倡的贵阳棉纺厂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71页。

按行政部门实行大联合的经验，在“反逆流”中成立，名称多为某单位“革司”“联司”，多能控制本单位局势。中学红联下属各中学革司都是这样的情况。这些“革司”“联司”如新一冶革代会、长办联司、武船联司、新汽配联司、公安联司、新一中革司，在1967年4—7月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组织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时工总已被军区解散，二司受压，这些单位里坚持造反的工总、二司成员参加了本单位的“革司”“联司”。

七二〇事件后，钢派一些人指责“革司联司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在“反逆流”中分散了工总、二司的力量，应该“一律解散”。

1967年8月8日，中央召集七大组织头头进京座谈大联合等问题。参加座谈的新湖大临委会一号头头谢邦柱回忆：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时，我看着与会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代表，对彭勋说，我觉得这些组织还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如果有工造总司、中学红联等组织的代表参加就更好了。但当时中央“点名”已成定局，我也没有那个胆量在会上跟中央首长讲^①。

新华工的张立国回忆：1967年8月在北京时，总理对我有交代，有问题找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我向周荣鑫反映：武汉有一批群众组织在抗暴斗争中立了大功，比如中学红联、工造总司、新一冶、长办联司、省直红司、公安联司、武船联司等等。10月中央对武汉群众组织重新“点名”，实际上是更正以前“点名”的失误^②。

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来武汉访问。此时“钢风”刮得正猛，满街都是“钢化江城”“不锈钢康”一类的大字报、大标语。周恩来在汉三天，就大联合问题多次与武汉地区各群众组织头头谈话。参加谈话的除七大组织头头外，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组织的头头也参加了。

杨道远回忆：10月8日，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七个组织的七个代表奉命前往机场欢迎。周恩来先期到达，在休息室等待谢胡专机的时间里，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中心就是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周恩来问曾思玉、刘丰，晚宴准备了几桌？刘丰说，准备了两桌。周恩来说，范围要扩大，各组织都要多来些人^③。

^① 2019年10月杜先荣电话采访谢邦柱的记录。

^② 2016年11月杜先荣、田力为采访张立国的记录。

^③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14页。

临时找人不是容易的事。因周恩来决定座谈会、宴会范围扩大才得以出席的各组织头头都成为“迟到者”。吴焱金回忆：“据说周总理下飞机以后，问工造总司的吴焱金同志来了没有，武汉警备区派人在武汉三镇大街上找了几个小时才把我找到。”^①

有代表出席在东湖长天楼举行的座谈会和宴会的组织，除七大组织外，增加了工造总司、中学红联、新一冶、省直红司、市机关红司、新中原、公安联司、交通联司、湖北日报捍总等二十多个组织。

座谈会上，朱鸿霞、李想玉发言后，周恩来说“请工造的同志发言”。吴焱金发言后，周恩来说：“你们三个组织可以搞个工代会。”^②

曹承义回忆：总理对新一冶也有了解。宴会进行中，“我大胆走到主宾席的周总理身边……说：‘总理，我是新一冶的。’总理用手摸了一下我佩戴的红袖章，说：‘哦，新一冶，我知道。’我接着汇报：‘在这一次揪陈抗暴中，我们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周总理连连点头，无比关怀地说：‘知道，知道。’”“周总理还到每张桌子前向到会的每一个人碰杯敬酒。周总理双手握住我的手，无比关怀地问：‘你们和九一三联合得怎么样了？’我回答说：‘我们联合得不好，我们有缺点。’周总理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这个，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我们多做九一三的工作。’”^③

周恩来对作为国务院直属单位的长办的文革情况有所了解。1966年12月他在一次群众大会讲话，称赞长办造反派“造反精神很强”，“把林一山揪出来了”；1967年6月，他对长办联司准备动用枪支的要求亲自作出指示。顾建棠在这次宴会上与周恩来有过接触，他回忆：“总理与我碰杯时问：‘你的名字……’，我说：‘报告总理，我叫顾建棠。’总理说：‘我记起来了，你是长办的。国庆十周年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见过面，你还是我的小老乡。林一山现在怎么样？’我回答：‘靠边站，在作检讨。’总理点点头，说：‘好。’”^④

市机关红司一号头头、机关红司下属市委机关“人民勤务员”总部一号头头魏绳武，也是按周恩来指示，临时被接去参加座谈会的。去接他的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78页。

② 《中央首长及阿尔巴尼亚谢胡同志与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纪要》（1967年10月8日），载1967年10月17日《新武重》《新一冶战报》合刊。

③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96页。

④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50—51、106、146页。

司机告诉他：“大概是首长们向总理汇报时，说到你们市委机关造反组织与众不同，叫‘人民勤务员’。总理一听很高兴：人民勤务员好啊！就是要当人民的勤务员。他们的头头来了没有？这样，首长就派我来接你。”魏绳武回忆：宴会开始已是凌晨一点多了。宴会厅摆了约二十席，周总理来到我所在的第十七席敬酒，“我首先站起身，端起酒杯，恭恭敬敬地对总理说：‘我是市委机关的，叫魏绳武。’总理马上说：‘哦，你们就是“人民勤务员”？’我连忙回答：‘是！是！’”^①

顾建棠认为：总理说晚宴“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也就是“弥补了七二〇后中央只点出七个武汉造反组织的不足，同时示意曾思玉、刘丰和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的头头，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中‘范围要扩大，各个组织都要有代表参加’^②。

10月9日上午，周恩来陪同谢胡等访问了武汉锅炉厂后，来到设在武测的二司司令部。杨道远回忆：“周恩来总理在钢二司司令部同我们进



10月9日上午，周恩来等访问二司司令部。右一为谢胡，右二为杨道远

^① 参见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27—128页。

^②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46页。

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总理说要克服派性。还批评说各组织的头头派性都比较大，头头要带头克服派性，要做大联合的带头人。组织不分大小，平等联合，承认山头，尊重山头，联合起来了，最后达到消灭山头。”^①柳英发回忆：总理当时问我对武汉实现大联合的方式有什么想法，我说：“工人参加工总，学生参加二司，实现大联合。”总理说：“你年纪小，派性大。”



10月9日下午，周恩来等访问新湖大



10月9日晚，周恩来等访问新华社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17—218页。

访问二司司令部后，周恩来陪同谢胡等又访问了新湖大、新华工。在湖北大学，周恩来戴上了“新湖大”袖章。当年八月底另树一帜的新湖大红八月公社二号头头贾培培向周恩来献上“红八月公社”的袖章，周恩来指了指左臂上戴着的袖章，没有接受。目睹这一情景的红八月公社骨干杨胜利说：“我知道周总理的意思，一定是让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指示，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①

10月10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到机场送行的群众组织代表除七大组织代表外，还有工造总司、中学红联、公安联司、省直红司等组织的代表。周恩来讲完后，与送行者合影。



11日，人民日报及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刊登大标题为“周总理在汉接见武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新华社武汉十日讯”：

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在武汉接见了“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工造总司”、“中学红联”、“公安联司”等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接见时，周恩来总理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接见后，周总理和大家在一起合影留念。

就这样，为中央所正式“点名”的群众组织由七个扩大到十个。

时任工总组织部长的李承弘回忆：“周总理对武汉大联合作了重要指示，最实质的就是在原来中央点名的七个组织外又增加了二十多个组织参

^① 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第五章在“红八月”的日子里。

加大联合，如工造总司和很多单位的联司。这样，中央原点名的工人组织只有钢派一派，这次重新点名就增加了新派。周总理走后，曾、刘就以总理具体指示指导武汉地区的大联合。”^①

吴焱金说：“这些中央表态时没有被点名的造反派组织，通过周总理的接见得到了肯定，为这些新派组织在湖北、武汉参加大联合、三结合打下了基础。”^②

在武汉军区主持下，10月13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大中学校代表大会筹备小组”成立，由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的代表组成；24日“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筹备小组”成立，由钢工总、钢九一三、工造总司各派代表三名组成。此后，十个组织以外的重要群众组织的头头，在工代会和省市革委会中都得到安排。

还是有一些组织没能参与大联合和三结合，例如赤总工二司。这个组织主要由临时工、合同工等组成，反对政治上歧视、反对同工不同酬是它的宗旨之一。按照中央精神，这类问题应该放在运动后期处理，文革进行中提出来就是“搞经济主义”。早在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就规定：“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后来又多次重申这一规定，而1966年11月成立的赤总工二司一直没有解散。虽然他们造反很早，为工总翻案表现得非常坚决，从一号头头薛海澄到基层成员都戴上工总的袖章显示决心，而1967年一月夺权、1968年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他们都被当局排除在外，没有一个造反派组织表示异议。商议大联合时，薛海澄和朱鸿霞发生过肢体冲突^③。

赤总工二司的头头和很多骨干，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三、大联合中的工总

《纪要》所谓“上海道路”，就是上海全市所有工人造反派统一于工总司，这是工总二号头头胡厚民极力鼓吹并全力推进的武汉大联合之路。他的思路是“三个一”——一个有权威的领导干部（如上海的张春桥），

^①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19页。

^②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78页。

^③ 2014年8月杜先荣访谈文行礼、郑汉卿、黄银苟、彭云汉的记录。

统一的组织（如上海工总司），一张报纸（如《文汇报》），统一组织的名称就是钢工总。省市革委会成立前，“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不钢则康”一类的大字报、文章和标语口号，贴满街头，占据工总总部及其基层组织的报纸传单。街头还出现这样的标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钢工总，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二八声明”。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在二司司令部批评“工人参加工总，学生参加二司”的联合方式是“派性大”，指出“组织不分大小，平等联合”；10日，对各群众组织头头明确指示：不是钢工代会，不是新工代会，而是革命的工代会。11日《武汉钢工总》报评论员文章《武汉钢工总战旗林立，威震大江南北》依然说：“‘钢工总’是属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指引下，以左派为核心，在市内以‘钢工总’为基础，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地联合起来，建立全市性统一的革命工人组织，实现最广泛的革命工人大联合。这是革命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七二〇前站在造反派一边的干部组织——武汉市“革干联”也于1967年9月1日分裂出一个“毛泽东思想武汉市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左翼）”（简称“左翼革干联”），勤务组组长杨友山（市电信局副局长），副组长屠公博（市文化局副局长）、宋洛（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处长）。9月4日，钢派成立“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总指挥部”，实际是湖北省革干联和大专院校革干联部分人主导的，主要成员有孟夫唐、刘真、张华、毛远耀等。湖北省副省长孟夫唐说：“在武汉应以‘钢工总’为核心，中央在点名次序上是树立‘工总’的威信”。省委副秘书长刘真说：“大联合必须以‘三钢’为核心”，“‘三钢’是柱子，顶住了。没有‘三钢’，天就塌下来了”。武汉测绘学院党委书记毛远耀说：“不钢则康，树不树‘工总’的威信，是承不承认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问题”。“三新的概念要变了，新华工就是指‘新华工敢死队’，新湖大是指‘红八月公社’，新华农是钢二司（华农总部）”。

胡厚民是“钢化江城”最有力的鼓吹者和推动者。新派力量比较强的二七区（江岸区）造反派实现大联合，军区、警司给予肯定，本地报纸、电台作了报道。工总二七区办事处一号头头胡巍去征求胡厚民的意见，胡厚民说：你这个联合没有以我们钢工总为核心，你出卖了工总，你是工总

的叛徒。此后，工总二七区办事处二号头头武齐骅为首的一些人在办事处内外贴满大字报，要求“右倾头头滚出工总”“滚出办事处”，胡巍“怕当右倾头头”，联合失败^①。当时有消息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决定9月25日播送武汉二七区革命组织实现大联合的报道，后来取消^②。

10月，阿尔巴尼亚谢胡一行访汉，街头出现了大量“热烈欢迎钢阿尔巴尼亚战友”之类的大标语；电影院放映阿尔巴尼亚影片，银幕显示“新阿尔巴尼亚电影制片厂出品”字样时，观众中就会发出一阵叫好声。

钢派控制的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各单位的大联合，标题用语与街头标语完全一致：8月12日，社论标题是《大树特树钢工总的大旗》，四篇报道的标题分别是《新武机五个革命组织破私立公统一认识团结对敌 树钢工总大旗实现大联合》《新武锅各革命组织参加钢工总》《三五一〇厂“红司”加入钢工总》《三六〇四厂树钢工总大旗》。8月19日两篇报道的标题分别是《武汉冷冻机厂等四厂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分别建立了钢工总战斗兵团》《新电车红司等革命派组织破“私”立“公”，加入钢工总》。8月21日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新省船实现以钢工总为核心的大联合》。8月27日刊登首都红代会赴宜学习队、钢二司驻宜联络站文章《祝贺宜昌钢工联加入武汉钢工总》。进入9月，这类用语渐渐减少。

新派控制的湖北日报同期也有这类报道，但只提各组织联合，不提某某组织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表明了新派的态度。

1967年8月15日，钢工总邀请钢二司、钢九一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代表举行大团结座谈会，并于16、17、19日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同时发表三个公报，一致认为武汉造反派大联合“要以钢工总和钢九一三为核心”。新派是承认工总地位的，但不同意大联合以后的组织名称叫“钢工总”，认为那不是平等的联合，是“收编”“吞并”。

钢新两派在大联合问题上争斗不已之际，基层却出现不少顺利实现联合的事例。

武汉锅炉厂工总一家独大，工总外还有老工人战斗队、红学员、红卫军等五个小组织。七二〇后工总武锅分部勤务组认为大家在反逆流斗争中历尽艰辛，并肩战斗，胜利了不能分开，更应该尽可能团结更多的力量，

^① 参见《胡巍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17日）》。

^② 参见钢工总武重战斗兵团《钢武重》报、新华师一附中钢革司钢四连合办《扬子江》报第二期（1967年10月5日）。

共同奋斗。各组织加入工总后，红卫军成员何华清、杨心培被安排为作战部长、生产委员会委员，成立厂革委会时，都被选为委员。红卫军成员桂美和被推荐出任工总洪山办事处一把手，1968年结合为武昌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联合搞得好，革命、生产都有成绩，多次得到军区、警备区表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屡有报道。

一冶工业安装公司两千多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是新一冶工安分部，七二〇后出现的钢工总、钢九一三总共只有几十人。工安分部一号头头徐正全认为三家造反派组织之间无任何利害冲突，也无任何恶感，只要我们姿态稍微高一点，联合不是问题。他在勤务组会上提出公司工代会设九名委员，新一冶五名，他们两个组织共四名；工代会设主任一人，由新一冶担任；副主任两人，由工总和九一三各出一人。有人不同意，说他们两个组织才那一点人，给四个委员就可以了，他们的头头还没有我们的一般成员造反早，凭什么当副主任。徐正全说：你甭管别人组织人多人少，作为一个群众组织，人家跟我们是平等的。不这样也得这样，否则整死个人也搞不到一块。最后大家算是同意了。徐正全同时提出候选人各组织提名，但要经过职代会投票选举，不过半数不能当选，由该组织另提候选人。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不分观点，按一个生产班组选两名代表参加公司职代会。又有人提出参加过百万雄师的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徐正全说，如果那样，你选出来的人包括工代会的主任就不能代表他，所以，只要是工安公司的职工，一律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会后与工总和九一三的头头就此方案一谈，就联合了。长江日报12月23日对一冶工安公司的大联合作了报道。

胡厚民四处奔走，动员三司革联加入二司，动员新一冶加入九一三，动员九一三加入工总，曾经亲自去武汉一中，动员新一中革司加入工总。笔者听见他对新一中头头说：你们是新派的观点，钢派的风格。加入二司你们肯定不愿意，那就加入工总。事后大家议论：这个胡厚民被“钢风”刮昏了头，要学生参加工人组织，亏他想得出来。

早在8月9日谢富治、王力在京接见武汉造反派负责人时，李想玉就表过态：“我们为了大联合，‘913’都准备加入‘工总’，成立一个工人组织”。王力当场给予肯定^①。9月24日九一三加入工总庆祝大会在汉

^① 《谢富治、王力接见武汉造反派负责人的讲话》（1967年8月9日凌晨），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口新华路体育场举行。《武汉钢工总、钢九·一三实现大联合公告》说：“钢工总不是哪一个组织的钢工总，而是武汉地区工人阶级的钢工总，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钢工总，联合起来的统一革命组织的名称还是叫钢工总好！”“经过商议，一致决定，统一革命组织的名称为‘武汉钢工总’，武钢和一冶分别成立钢工总武钢九·一三兵团和一冶九·一三兵团，在武钢一冶的钢工总基层组织分别无条件地并入武钢和一冶的九·一三兵团。”^①武汉警备司令部不认可这个“联合”，政委张纯青说，对于钢九一三加入工总我们欢迎，但是这不能解决武汉的大联合问题。毛主席指出的两大派，在武汉就是钢派和新派。钢、新两派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上联合起来^②。此后这个“联合”就无声无息了。

九一三加入工总一事周恩来都知道了。他在10月8日与武汉造反派头头的座谈会上问李想玉：“你们不是参加工总？”李回答“是的”。周再问：“为什么戴九一三袖章？”李想玉“说不出话了”^③。

朱鸿霞、李想玉曾策划联合工造总司的“钢工联”。

李想玉1969年10月19日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说：“当时我和朱鸿霞、吴焱金都说好了，要成立工联，就是工人联合司令部，搞钢工联意见也不大，基本上可以说得通。赵梗同志主持会议，当天我们谈得蛮好，结果第二天朱鸿霞来谈的时候，他说胡厚民和工总的一些头头不赞成，说钢工总一个字不能掉，有的把钢工总袖章带着，说把它烧成灰也要喝了它，他说都不愿意取掉这个名字，结果还是没搞成。”

朱鸿霞在省革委会这次会议上的发言也证实，成立“钢工联”是他提出来的，不但付诸行动，而且在社会上造成影响。朱鸿霞说：“我们准备把所有工人组织都联合起来，提出成立钢工联。后来工造等提出，只要没有这个钢字，基本上可以成功的。就是一个钢字加不加的问题，基本上问题不大了，加也好，不加也好，就这么回事情。胡厚民说：钢工总一个字不能丢。人家中学红联还帮着我们造舆论，“钢工联好哇”，猛些造，结果呢，造个鬼，我们自己提出来的，自己推翻啦！”

^① 武汉钢工总印刷分部、武汉钢二司新水运联络组合办《长江（通讯）》第9期（1967年10月1日）。

^② 参见《沈复礼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16日）》。

^③ 《中央首长及阿尔巴尼亚谢胡同志与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纪要》（1967年10月8日），载1967年10月17日《新武重》报、《新一冶战报》合刊。

《工造总司》报第21期（1967年10月20日出版）《本报编辑部就目前武汉有关问题走访工造总司勤务组》一文也谈到：9月19日朱鸿霞、李想玉来工造司令部提议成立“钢工联”；9月22日就此进行商讨，工造方面提出“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工人联合司令部”不应简称“钢工联”，因为全称里并没有“钢”字，简称加“钢”字带有派性。就因为简称加不加“钢”字，此事未谈成。

工总在要求新派工人组织加入自身的同时，在各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新派占主导地位的单位大力发展组织。

四、大联合中的工总和九一三

联合新派的问题没有解决，工总和九一三发生冲突了。

当时九一三的头头李想玉、钟锡钢、曹佩贤、杨玉珍，都是工总的早期成员，参加了1966年11月工总上京告状。12月初，工总组织部长李承弘应杨玉珍要求出具雕刻武汉工总九一三兵团公章的介绍信。12月12日，九一三兵团在武钢剧院成立，李承弘作为总部代表参加大会并致贺词。几天后胡启生、杨玉珍在红楼找到李承弘，说武钢、一冶单位大，离市区太远，交通又不方便，很多事不好办，希望独立。李承弘同意，当时形成口头协定：工总不介入武钢、一冶，但青山区其他单位仍属总部，461、471等大厂直属总部，小单位、区属企业归工总青山区办事处，九一三不在市区其他单位发展组织。但七二〇前九一三就在武钢、一冶之外发展组织。七二〇后，工总一方面动员九一三加入工总，胡厚民和二司头头方保林出面做工作，开大会，游行，大造声势；另一方面在武钢、一冶成立工总分部。李承弘在《百年寻梦》一书中说：“对此我是不赞成的，这类‘钢工总’我清楚，除了几个头面人物是造反派外，下面基本是百万雄师转过来的。但李洪荣、郭洪斌等不听我的，所以工总、九一三联合不起来，这也是原因之一。”^①

钢派内部，工总、九一三联合不起来；在武钢，占绝对优势的九一三和第二大组织红旗总部联合不起来；九一三自身还发生了内部分裂。

与武汉市造反派的“大联指”一样，七二〇前武钢也有一个九一三、红旗等29个组织大联合的“新武钢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主要负责

^①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180—181页。

人是九一三的邓金福。七二〇后，“新武钢”的命运和“大联指”相同，被九一三一些人指责为“出卖了九一三”，“是新派”^①。

尽管“新武钢”消失，但武钢造反派大联合的进展应该是最顺利的，因为《八八纪要》明确说：“在武钢，不支持九一三就是不支持革命。武钢树九一三，这是革命的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当然，九一三也要团结联合其他革命组织，不要歧视人家。”8月12日，以陈祖坤为首的武钢东方红公社宣告不附加任何条件，集体加入九一三。公告发表后，东方红革联和红卫军革联响应，一时间加入九一三在武钢成为风潮。

九一三各级部分头头如何对待此事？运输部九一三纵队有人说：陈祖坤加入九一三是一个阴谋，是为了吃掉运输部九一三纵队。抱有这类想法的基层头头去总团找李想玉造反。总团召开了总团勤务组成员，武钢分团、一冶分团和六十多个纵队头头参加的会议，李想玉提出：为了搞好武钢的大联合，要让集体参加九一三的各组织头头进入总团勤务组。话音未落，不知从哪里砸过来一只杯子，没打到李想玉，将站在李想玉身后的张光坤（矿石厂工人）左脸砸开，缝了十多针。参会的陈祖坤立即退出会场。后来陈祖坤被任命为九一三总团生产部长，他自称一天也未到任。此后李想玉和总团勤务组再也没人提过此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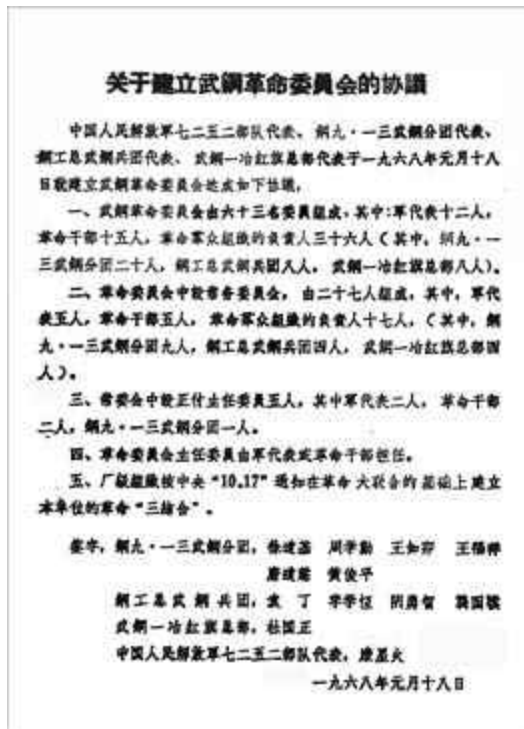
在陈祖坤退出会场的这次会上，刘真说：“你们发展组织要注意，小心失了权，红旗这些人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不好对付，小心他们夺了权。工总的头头也是工人，问题不大，但是工总里面没有几个造反派”。“要工总的头头，不要工总的战士，要红旗的战士，不要红旗的头头，要解散组织，一个一个写申请参加，不写申请就不收。”^③李想玉1969年10月19日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说：“那时候只要开大联合大团结的会，就有人在会上骂人、打人，我就挨过几次打。”

东方红公社等加入九一三后，武钢还有三个组织：九一三武钢分团、武钢一冶红旗总部、工总武钢兵团。这三个组织不但没能实现联合，反而分裂为六个组织，起因是1968年元月18日武钢支左办公室主任康星火（7252部队副政委）和三个组织代表达成的《关于建立武钢革命委员会的协议》（简称《一·一八协议》）。协议第二条说：“革命委员会中

^① 参见《曹佩贤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1日）》。

^② 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64页。

^③ 参见《曹佩贤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1日）》。



设常务委员会，由二十七人组成，其中军代表五人，革命干部五人，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十七人，（其中，钢九一三武钢分团九人，钢工总武钢兵团四人，武钢一冶红旗总部四人）。”协议一出台就遭到激烈反对，认为是康星火策划的分裂造反派的阴谋。九一三总团和武钢分团有人认为，九一三名额太少，比另两个组织仅多一人。总团头头杨连成说：这样很危险，如果我们九一三的人有一个叛变了，就完了，就失权了。还有人认为工总武钢兵团贡献小，不能占

据四个名额。红旗总部、工总武钢兵团有人认为代表本组织在协议上签字的代表没有资格。于是三个组织都有人分出来，还是打原来的旗号，合称“新三家”，另一边则称“老三家”，开始激烈争斗，并发生持枪武斗^①。

五、大联合中的新派

新派力量比钢派弱，但认为自己同样是老造反派，队伍纯洁，注意政策，在高压下发起“反逆流”，为工总翻案，与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抗争，作出重大贡献，付出重大牺牲。钢派应该尊重历史，以平等的姿态实现联合，联合不是“加入”“钢化”。

新派也有自我批评。1967年7月28日，新华工头头聂年生当着陈伯达、谢富治等对过去随同军区压制工总做检讨。1967年8月9日湖北日报刊登《向三钢学习——新一中革司核心组的检查》和《新一中》报短评《自我批评精神好》，检查在为工总彻底翻案问题上的不坚决态度，湖北日报配发社论《学习新一中革命小将自我批评精神》。8月28日出版的《新华工》

^① 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73—74页。

新中原革命造反总部控制的中原机械厂出现工总组织。新一中内部分原二司成员于9月上旬成立二司新一中总部，立即被二司司令部委以常委。8月23日，以聂年生为首的红反团、以鲁礼安为首的敢死队在早就实现大联合的新华工重新树旗，在华工举行“树工总权威，纪念8·23造反精神大会”，工总三千多人参会，朱鸿霞、丁家显出席。当晚，聂年生被打。8月，梅子惠重新拉起原红八月战斗队的人马，成立红八月公社，宣布脱离新湖大，28日在湖大举行成立大会，朱鸿霞、李想玉、杨道远和孟夫唐、毛远耀出席并发言表示祝贺。梅子惠的开幕词说：“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的诞生使‘三新’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的诞生，新华工敢死队、红反团的英勇无畏的战斗，就是大好形势的具体表现。”他表示红八月公社要“为实现武汉地区以钢工总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重建新功”。二司代表发言说：“有人骂你们是‘夺权队’，‘分裂主义者’。我们说：对！就是要夺权！新湖大的大权就是要掌握在你们这些与陈钟之流英勇搏斗、与机会主义者坚决斗争的抗暴英雄、真正的革命左派手中。真正的革命左派与机会主义者分裂又有什么不好呢！”^①。

对同意加入工总的新派组织，工总方面的条件一般是不接受成建制加入，原头头不能再当。省交通系统造反派以新派“交通联司”为主，一号头头傅廉倾向加入工总并说服了勤务组。他设想交通联司成建制地参加工总，新的勤务组通过选举产生。与系统内的工总谈判时，工总一人“跳起来说‘你们是名义上参加，实际上是想要把我们吃掉’”。因为在省交通系统工总的人少，不到500人。对此，在工总总部工作的胡秀娟（胡厚民的姐姐）说：不是参加不参加的问题，是收编，人事由我们安排指定，勤务组不能够选。省交通系统的联合无果而终^②。

9月22日下午，有水院二司成员游行到华工，呼喊的口号是：“解散钢二司，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总司令部！”^③24日，二司红水院总部发出“最最紧急呼吁”，提出四点声明：全市学生组织立即无条件联合起来，成立全市统一组织；各革命组织负责人要带头“破私立公”，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带头大联合，做大联合的促进派，反对“小脚女人”的作风；全市学生铲平山头，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总司令部”；

^① 参见武汉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编辑部《红八月公社》报（专刊）（1967年9月7日）。

^② 老田2004年采访傅廉的记录。

^③ 参见《新华工》报第五十六期（1967年9月27日）。

总司令部领导班子选派常委学校担任，常委学校由各校代表大会协商产生。当晚在水院运动场举行大型辩论会，主题是武汉地区工人、学生组织大联合的道路。水院丁家显、雷志茂发言，主张解散钢二司，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总司令部，遭到其他学校二司学生的反对。辩论没有结果。

24日深夜至次日，一些以中学生为主的二司成员破坏了全市数以千计的大批判专栏，刷上“三钢是大联合的当然核心”“省市大权老子三钢拿定了”“不钢则康，破新立钢”“钢二司永立江城”“欢迎三新归队”之类的标语^①。9月25日晚，新华工等十个新派组织设在南洋大楼的大批判联合广播站被砸。

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在回忆录中概括了大联合中新派的想法和钢新两派联合的大致过程：

（《八八纪要》）回汉传达以后，我立即给钢工总负责人朱鸿霞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这样的：武汉的革命造反派在抗暴和为工总翻案的斗争中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遵照《八八纪要》精神，我们要“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1967年5月武汉造反派在抗暴并肩战斗中成立的“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应成为大联合的基础。工人总部当时被取缔，朱鸿霞、胡厚民等钢工总领导人被关押，“大联指”当时不可能以钢工总为核心，钢工总翻案后可由钢工总处在主导地位，使“大联指”更加完善。朱鸿霞对此如有意，请来工造总司商谈。过了几天，朱鸿霞和杨逢春（武锅工人）来到汉口友谊街16号，我和龙梅生等人接待了朱鸿霞、杨逢春。朱鸿霞首先说：“七二〇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钢工总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是中央点名的响当当的造反派，以钢工总的旗号联合所有造反派比较有利，‘大联指’已经过时了，是不是在钢工总的旗帜下统一起来。”朱鸿霞此议遭到龙梅生、潘宏斌、王锦铭等人的激烈反对，认为钢工总应当尊重历史，我们提着脑袋为工总翻案，牺牲了那么多人，朱鸿霞没有半句感谢的话，还要收编我们，这办不到。我个人倒是有不同的看法。经过一番协商，我现场起草了一个协议，即以钢工总为首，在“大联指”的基础上实现造反派的全面联合。朱鸿霞、杨逢春表示拿回去研究研究再说。

^① 参见钢工总武重战斗兵团《钢武重》报、新华师一附中钢革司钢四连合办《扬子江》报第二期（1967年10月5日）。

据说朱鸿霞、杨逢春把协议草案拿回去，胡厚民一看就否定了，并且说：“工造总司加入钢工总是可以的，但吴焱金必须排除在外。”此话真假无从查考，但当时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传闻。当时，我对朱鸿霞看法较好，觉得他是有口无心，挺随和的一个人，觉得胡厚民深不可测，挺难打交道的。尽管如此，我当时觉得我个人的退出，如果有利于造反派的大联合，我可以马上退出，我当即写了一份声明寄给《湖北日报》社，表达以上想法。《湖北日报》的造反派看到声明大吃一惊，派三个人到汉口福建街胡瑞玲家找到我，批评我做事太欠考虑：你不是一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对你领导的组织和群众负责，“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这种以我为核心的做法显然是不对的。经过与《湖北日报》同志的长谈，大家认为还是在“大联指”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是我们应有的主张。于是《湖北日报》扣下了我写的声明，……我的这个建议一直未被接受，武汉三镇满街的大标语：“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钢、新之争愈演愈烈，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据《武汉大典》第一卷上刊登的多幅文革照片，早在七二〇事件以前就有人在北京打出“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估计是工造总司驻京联络站负责人龙梅生联合其他新派组织搞的。但与后来的“新武汉”没有关系。

成立“新武汉”的设想是工造总司政参部长龙梅生在1967年七二〇事件以后提出的。龙梅生分析：从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来看，新派的组织应该是有相当实力的。可是组织很多，山头林立，没有一个统一的旗号，也没有统一的行动，各自为政，很容易被人家一口一口吃掉。现在钢派借中央点名之机，钢风刮得很厉害。大街上贴满了“钢化江城”、“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标语，意图已昭告天下，用心非常明确。因此，我建议新派工人组织建立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各自的原组织名称不变，集合在“新武汉”的大旗下，便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1967年8月，工造总司出面召集部分新派工人组织开会提出这个设想，记得当时比较积极支持的有市安装公司“红色革命敢死队”孙厚智、黄金善，没有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只是有的热情不是十分高涨。筹备“新武汉”的办公地点设在汉口南京路的武汉图书馆。后来，分别在新湖大和武汉图书馆开了几次会，50多个新派组织原则上同意成立“新武汉无产阶级

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经过推选，吴焱金为新武汉总指挥，顾建棠、曹承义、傅廉、孙厚智等为副总指挥。商定在武汉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龙梅生当时还印了毛体字的“新武汉”袖章，申请成立的报告送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后，迟迟没有得到答复。也许是由于钢派的强烈反对，警司终于没有批准，于是“新武汉”尚未出生就胎死腹中，是一朵未现的昙花。（按：“新武汉”8月17日在武汉体育馆举行了成立大会。）8月26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京接见武汉三钢和新华工、新湖大在京代表时，对武汉成立“新武汉”的行动进行了批评，《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革命派在京代表谈话纪要》传到武汉，“新武汉”立即偃旗息鼓。

这件事主要反映当时大家对“钢化江城”和“加入钢工总实现大联合”的抵制，也是对中央表态许多新派组织未被点名的一种情绪表达。其结果是“新武汉”流产，“钢化江城”也难遂其愿^①。

六、大联合中的当权派

文革后钢新两派部分头头都谈到1967年七二〇后大联合出现问题，背后一定有走资派操纵，因为群众组织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符合官僚阶层的利益。

顾建棠说：七二〇后在长办的堤角修配厂，长办党委第二书记、副主任李庭序指示百万雄师长办造委成员恢复工总长办工人分部的旗号，这些成员马上行动，长办水利工会副主席董玉堂、长办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刘贺春积极参与^②。

当时持钢派观点的武汉市机关红司一号头头魏绳武说：“钢新分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刘方张等部队首长有意无意扩大、制造矛盾，有人明显倾向新派，有人做得太过而被称为‘钢司令’、‘钢政委’；地方干部钢新倾向则更为显著，一位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私下找新派头头谈话，封官许愿，唆使攻击对方。”^③

新湖大头头谢邦柱回忆：“当时曾刘多次分别召集钢新两派头头开会，搞挑拨离间。对新派说，新派的政策水平高，顾全大局，善于团结，队伍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72—75页。

②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39—141页。

③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32页。

纯洁，钢派是大杂烩。对钢派说，钢派革命性强，新派是小资产阶级。”^①

新派给刘丰、张昭剑起的绰号都是“钢政委”，警司参谋长赵梗被人称为“钢参谋长”。彭勋回忆：赵梗在武船两次讲话都讲到“就是要支钢”。彭勋把收集到的两个讲话稿交给曾、刘，曾、刘当着群众组织头头的面将赵梗狠批一顿^②。

吴焱金写了一首打油诗指责军方，说“陶氏人物”“忽从极右到极左，有意支钢不支新”，被人抄去张贴于闹市。因这首打油诗吴焱金与刘丰、方铭发生激烈冲突。他回忆：

（打油诗）被至今不知名的好事者抄写两份，一份贴在汉口水塔下的大字报墙，另一份贴在警司大门口。贴出两天后，刘丰把我叫到省革委会一间大办公室。我去，见张体学也在场，刘丰阴沉着脸，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刘丰把我写的打油诗的抄件向桌上一扔，问道：“这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我写的。”刘丰问：“什么意思？”我答道：“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反映一下我的心情而已。”刘丰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反映心情为什么贴在警备区门口？谁抄的？谁贴的？谁指使的？”我说：“不晓得。”刘丰说：“你当面撒谎！这样的事你会不晓得？”我说：“我写了这首打油诗放在桌子上，不知是谁拿走的。”刘丰气急败坏地说：“你说，你的矛头究竟指向谁？你含沙射影骂的是哪一个？”我说：“矛头没有指向谁，哪个支一派压一派我就指向哪一个。”刘丰说：“你的诗贴在警备区的门口，你的矛头就是指向警备区的负责人。”我说：“不是我指向谁的问题，社会上群众都在说钢政委、钢参谋长，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刘丰问：“你说的钢政委是谁？”我回答：“谁支派就是谁。”刘丰发火了：“你敢说钢政委不是指我？”我说：“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刘丰把桌子一拍：“你还狡辩！”我也把桌子一拍说：“你莫以势压人！”刘丰的脸色更难看了，正准备发更大的火，这时坐在旁边一直不做声的张体学笑着说：“我说刘政委呀，莫跟年轻人一般见识，年轻人不懂事，不知天高地厚，你犯不着跟小将生气。”张体学示意刘丰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让刘政委休息一会儿。”刘丰的工作人员把余怒未消的刘丰劝到其他房间去了。

^① 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谢邦柱的记录。

^② 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彭勋的记录。

打油诗被刘丰批评以后，我回到市革委会，参加市革委会正、副主任碰头会。会议休息时吃西瓜，方铭一边吃西瓜，一边问我：“前几天刘政委跟你谈得怎样？”我说：“不怎么样。”他说：“你的诗贴在警备区门口，是不是也有说我们警司支一派、压一派的意思？”我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以后在工作中一碗水端平就行了。”方铭火了：“我们怎么一碗水没有端平呀？”他把正在吃的西瓜往地上一摔，我也把西瓜往地上一摔，我说：“一碗水端没端平自己心里有数。”这时开会的人都来扯劝^①……

曹承义回忆：

张昭剑在七二〇事件后，在有新派和我们“等派”组织参加活动的各种场合，开口闭口就是“钢工总”，他见了钢工总的头头就眉飞色舞，见了新派和“等派”的头头就很冷落。一冶有几个钢派的头头主动去巴结他，他对这些人也说说笑笑。见了我就像不认识似的^②。

1969年10月19日吴焱金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说到胡厚民曾经对他转述刘丰的一段话，“刘政委”说：“我见了新派就头痛，他们是什么造反派，他们是老机，你们钢工总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见你们感到亲切，他们都是民主人士，把他们结合进来，不过是当傅作义，是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张体学当场插话：那是造谣的，刘政委怎么会这样说！刘丰是否说过这一段话找不到旁证，但他多处表现出来的倾向钢派贬低新派的态度，激起新派愤怒，以致1968年春发起揪“武老杨”（即“武汉的杨成武”——刘丰）运动。

第二节 成立三代会

七二〇事件后，周恩来对武汉文革的部署是：钢新两派联合，然后成立三代会（主要是工代会、红代会），继而在1968年春节前成立省市革委会。

1967年9月19日至21日，毛泽东在武汉。《毛泽东年谱》记载，9月20日晨毛泽东“乘吉普车到武汉街上看大字报”。当时街上贴满“以钢工总为核心实现大联合”“钢化江城”的大字报、大标语，毛泽东应该看到了。在汉期间接见曾思玉，听取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直接批评了‘以我为核心’大联合思想，指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91、92页。

^②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98页。

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①

钢新两派迟迟不能联合为统一的群众组织，成立省市革委会的期限将至，在湖北主政的曾思玉、刘丰召集两派代表直接进入筹建工代会、红代会的谈判。

一、成立工代会

10月24日，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筹备小组成立，由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各派代表三名组成，代表武汉地区十余个工人组织。筹备小组一致通过了武汉市革命工代会筹备小组成立公告。工总代表是李承弘（武昌铸钢厂）、杨宝林（武锅）、王庆庭（武锅），九一三是胡启生（武钢机总厂）、但功荣（武钢职校）、杨连成（一冶一公司加工厂技术员），工造是龙梅生（武汉胶管厂）、孙建春（湖北省水利厅修造厂）、陈海波（武汉仪表机床厂），工总李承弘被推选为召集人。

李承弘回忆：

工代筹开过三四次会，地点和时间也不固定，我算临时召集人，具体怎么搞我心里没底，每次开会都是扯皮，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论不休。给胡厚民说，他只是笑，没有明确意见。工代筹就一个“拖”。有一次对表决权上产生实质性争吵，工总一向以老来自居，按过去常规，其比例起码是5：4：3，九一三当然没意见，工造坚持平等，双方争了一个下午没结果。我当时想，开会应有个结果，工代筹只是个临时机构，作用不大，再说九一三是老战友胡启生等，都相当熟了，就是三家平均，但总的结果是二比一，所以我最后表态同意工造意见，三一三十一，三方平等，各执三票表决票。杨宝林、王庆庭本想力争多得几张票，见我表态了又不好在会上说，只是担心回去交不了差。我有点倚老卖老，想既然要我当首席，就有权决定拍板，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嘛。

回到工总，向核心组汇报，朱、胡等人不但没责怪我，反夸我大人有大量。胡讲，你们有气量，说明我们工总姿态高，以后舆论就占了主动，曾、刘也不能说我们派性十足吧^②！

工代筹迟迟谈不出结果，与胡厚民的态度有很大关联。朱鸿霞说，胡

^①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532页。

^②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19—220页。

厚民认为工代会就是个统战协商机构，但总理讲过要走工代会的道路，这个帽子不能丢^①。胡厚民说，当时他就派几个无关紧要的人去工代筹搞马拉松会谈，自己到各系统全力搞以工总为核心的联合、成立革委会，吃掉工造后，再到工代筹高姿态地给工造几个名额^②。

10月29日，工造铁军一成员为一件与工代会不相干的小事，打了朱鸿霞一拳，工总调动人马把工造各分部砸光。本来就困难的谈判更困难了。

曾思玉、刘丰为了赶进度，干脆撇开工代筹，于11月底制定了一个领导小组成员构成方案，在空军雷达学校开办学习班，直接与两派头头谈。李承弘回忆：

工代筹成立月余，一直没进展，为此曾思玉还亲临了一次会议现场。曾讲话没有直接批评，但是埋怨我们进展太慢，拖了大联合后腿，要我们快谈出结果来。曾走后，可能知道我们工代筹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所以此后甩掉了这一环节，直接与朱、胡等人谈实质性问题，具体分配工代会委员、常委名单，“工代筹”就这样自行消亡了。

到底是跟主要头头谈容易解决问题，很快工代会各组织分配名额就定下了，具体是谁当，上面基本不管，由各组织自定，省市领导只管名额。工总分配委员是多少不记得了，总部全分给了各基层单位，由各基层单位自行决定人选。工总总部主要分配二十一位常委名额^③……

12月中旬，达成协议。17日，新华社发表了“在武汉已形成了革命大联合”的消息。23日，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临）成立。

1968年1月7日，市工代会临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尽快建立省市革委会。1月10日，武汉地区三十万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举行集会游行，庆祝武汉地区工人实现大联合。

武汉工代会（临）与各工人组织协商，于1968年1月16日确定武汉工代会委员、常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名单，共117名。主任委员朱鸿霞（工总），副主任委员王锦铭（工造）、李想玉（九一三）、吴焱金（工造）、胡厚民（工总）、夏邦银（工总）、杨连成（九一三）。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组成核心小组。

1968年1月17日，武汉地区首届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国务院、

① 《朱鸿霞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0日）》。

② 《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③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20页。



1968年1月17日，武汉地区首届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召开（载次日长江日报）

中央文革小组发来贺电。大会由李想玉致开幕词，朱鸿霞作政治工作报告，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讲话。大会通过了政治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通过了《为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而斗争》的大会决议，发出《第一号公告》。



《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以“武工（68）第二号”文件的形式发布。“条例”第一条“性质”中说：武汉工代会“是省、市革命委员会的牢固的基础，并对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各级领导实行监督”。1969

年武汉造反派自行发动的反复旧运动中，武汉工代会根据上述“条例”实施“监督”权，组织“毛泽东思想工人调查团”进驻省市革委会调查“复旧”情况。中央处理武汉反复旧问题时，对此予以批评，湖北当局也将此举斥为“工联主义”。

二、成立红代会、农代会

1967年10月13日，在武汉军区主持下，武汉地区大中学校六个红卫兵组织——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的代表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大中学校代表大会筹备小组”（武汉



1968年1月15日，武汉地区首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载次日长江日报红代筹）。筹建过程中，为席位始终激烈争吵。二司虽只是一个组织，但涉及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众多；三新只是三所大学的组织，却是与二司这一个组织并列的三个组织，所以二司主张“学校常委制”，三新主张“组织常委制”。12月中旬，武汉军区就成立正式红代会事宜举办六个红卫兵组织头头参加的学习班，最后达成席位分配的协议，近似于组织常委制，同时对二司略加照顾。其间，12月13日，周恩来秘书周家鼎给曾思玉打电话，传达周对武汉红代会问题的指示：“目前各学校尚未联合起来，还是搞红代会。上面联合起来，促进和推动各校大联合，不要急于开红代会，看来不能超越红代会这一步。至于常委的问题，还是由大家（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中学红联）出，上次都讲了嘛。二司提出的学校出常委的意见是不适当，是不行的。”^①次年1月15日“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中学校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召开。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来贺电。

红代会主任为杨道远（二司），副主任张立国（新华工）、龙铭鑫（新湖大）、高玉泽（新华农）、谢华之（三司革联）、柳英发（二司）、史灼华（中学红联），常委有方保林（二司）、丁家显（二司）、谢保安（二司）、董学精（二司）、陈文汉（中学红联）、杨铭（二司）、雪湘明（三司革联）、刘汉武（二司）、陈大川（二司）、周孔信（二司）、张良栋（二司）、徐宏彩（二司）、王彩珠（二司）、徐筱芳（三司革联）、潘金珍（三

^① 见1967年12月2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73期。

新中学总部）等。

红代会副主任、常委名单资料缺乏，上列名单主要根据杨道远的回忆。

农民造反派影响不大，武汉地区革命农代会1968年4月1日成立，主任叶敦藻（武汉钢农总一号头头），此时省革委会已经成立近两个月了。

三代会都驻有军代表，初期军代表都是军事院校的造反派。

三代会成立，应该是标志着大联合实现，各群众组织应该解散。但在1968年4月至8月的钢新之争中，两派都以原组织名义活动。直到1968年9月16日二司才在新华路体育场开会宣布解散，会后二司中学生写出大标语：“倒旗散伙，上山下乡，旗手江青，语重心长。”在此前后，各组织纷纷宣布“倒旗”。

工代会成立后，工总勤务组多数人认为工总要做解散跨行业组织的榜样，加强工代会。胡厚民不同意，说有个战斗队员每天晚上睡觉要戴两个工总袖章。他还拿上海工总司和武汉工总比较，说人家有个一月风暴，我们有个七二〇，都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都有历史功绩。工总司没有倒旗，工总为什么一定要倒旗？曾刘对我们不放心才是根源^①。经劝说胡厚民勉强同意，工总解散大会召开前夕他去了外地。

各组织“倒旗”后直至1976年10月，造反派虽然还有活动，但都不用原组织名称了。

第三节 成立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工代会、红代会负责人的安排，即是群众组织代表进入省市革委会的基本框架，具体人员名单由各组织自行讨论决定上报。在筹建省市革委会的过程中，钢新两派对此争论不大。市革委会副主任中没有工总的人（工总希望胡厚民出任），中学红联一号头头史灼华没能进入省革委会常委（二号头头陈文汉安排为市革委会常委），工总、中学红联的人在社会上呼喊了一阵，没有结果。

此段时间一直在半公开活动的百万雄师成员，把省市革委会直至基层的所有革委会都称为“派委会”。几乎没有一个革委会在筹备的时候考虑到结合百万雄师的代表，几乎所有革委会的成立宣言都说到本革委会的成立，是战胜包括“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在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成果。

^① 王光照2017年3月4日致作者的微信。

对于省市革委会的地方干部人选，造反派有一定的发言权，钢新两派对此早就各有准备。1967年12月3日，朱鸿霞、胡厚民在洪山宾馆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刘真、张华、卜盛光、谢甫生、许金彪等一批支持钢派，文革前或文革初期遭王任重、张体学排斥的老干部参加。刘真对省市革委会的干部人选提出一套方案：省里干部可以到市里结合，市里的干部也可以到省里，要通盘考虑。杨春亭到市里当一把手，杨友山、谢定杰、吴允恭做左右手。任爱生可以担任省一把手，张华当助手，卜盛光搞政法，杨锐管工业。新派那边干部不多，但要认真对付。一二三把手和主要部门一定要掌握在钢派干部手里。省里新派可能提出孙德枢，市里抬出薛朴若。我们钢派干部多，新派少，采取硬拼的办法一个拼一个，拖住不让，任爱生拼孙德枢，杨春亭拼薛朴若，不拼掉至少拼成个次要地位^①。尽管会后工总勤务组里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但在两派协商中钢派实际上是按刘真的策划进行的。

1967年11至12月，新华工三办对省、地、县主要领导干部全面摸底，全省副省级以下、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派人做调查，为解放干部、结合干部做准备。

1968年1月，武汉军区召集两派头头商谈省市革委会地方干部人选。两派头头都带去了收集研究干部材料的班子，钢派是工总、二司干部联合专案组，新派的班子以新华工三办为主。

商谈市革委会干部人选，钢新两派分别提出21人、19人，有3人重合；对于省革委会干部人选，钢新两派分别提出18人、14人，有6人重合。重合以外的人选，无一不发生争论。

讨论市革委会干部人选，为杨春亭和薛朴若谈了八天八晚，武汉警备区司令方铭和副政委张昭剑反复调和，才勉强达成协议，杨为副主任，薛为常委。按钢派本来的意见，薛当委员都不够格。

1月下旬，讨论省革委会干部人选之一的孙德枢，历时十天十晚。两派冲突延伸到滨江饭店的会场之外，钢派发表打倒孙德枢的“严正声明”，新派把支持孙的大标语贴遍三镇。

武汉军区眼看中央规定的时限将至，15军党委兼武汉警备区党委自行拟订市革委会成员名单，强行由群众组织通过，《关于建立武汉市革命

^① 参见《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载1968年1月21日湖北日报）

委员会的请示报告》1月18日由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复。李承弘参加了筹备市革委会最后一次会议，两派还在争论不休，他听到方铭说：“就这样定了，散会！”^①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以同样的方式形成《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于2月1日批复。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于1月20日正式成立；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1968年元月22日，人民日报就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发表评论员文章《向英雄的武汉人民热烈祝贺》。对于一个非省、市、自治区级别的市革委会来说，人民日报这个举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省市革委会结合地方干部，还是考虑了群众组织的推举。新派为省革委会推荐的19个干部，13人被结合；为市革委会推荐的14个干部，11人被结合。钢派的成功率比较低，在省革委会是21比5，在市革委会是18比10^②。

对于省市革委会“三结合”的三个组成部分，造反派不是都有话语权、参与权、决定权的。军队干部这一块，他们铁定担任革委会一二把手、各职能部门一把手，造反派无可置喙。1967年9月5日，胡厚民、梅子惠等发起，致电中央要求王力来湖北当省革委会主任，当时无声无息，后来作为他们的罪状遭到清算。地方干部的结合虽与造反派协商，但决定权在当政者手里。钢派力挺的、坚决支持造反派的孟夫唐、刘真、张华、毛远耀连委员都没当上，而钢新两派都没有提名的干部被结合且担任重要职位，如张体学，据曾思玉说是毛主席的决定（丁家显回忆，1967年10月8日在东湖长天楼，周恩来在晚宴前听取他汇报干部结合问题时说，张体学只要认识，站过来了，也要结合）。当政者提出姜一，造反派特别是姜一工作过的黄冈地区的造反派激烈反对，省直红司、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组织的“姜一问题调查组”10月7日公布题为《坚决打倒王任重的心腹——姜一》的材料，列举姜一不能结合的证据，反对无效，姜一仍然当上省革委会常委。还有饶兴礼，劳动模范，文革前任省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七二〇事件前支持百万雄师，被安排为省革委会副主任。

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回顾这一段历史后说：“我们是在如来佛手

^①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22页。

^② 参见1968年6月26日《新湖大》报第82期。



1968年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湖北省党史办公室资料）

心里翻跟头”^①。

市革委会常委 36 人，其中群众组织代表 19 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有杨春亭、李长根（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薛朴若（武汉市副市长）、张珉（武汉市人委副秘书长）、王敏青（武钢党委组织部长）、杨友山（武汉电信局局长）6 人。省革委会常委 37 人，其中群众组织代表 15 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有任爱生、赵文华（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省粮食厅厅长）、李周仕（省气象局局长）、王舜（省地质局处长）、孙德枢等。造反派的力量看起来很强，但省市一把手曾思玉、方铭极其强势，各职能部门都为军队干部掌控，群众组织代表很难有所作为。

1974 年省委编印的材料揭发：刘丰“大讲‘只能军干群，不能干群军，更不能群干军’，并造谣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欺骗群众，流毒很广。当时湖北省县委书记中担任第一把手的地方干部，只有三个人，他还准备再换掉一人。”^②

就市革委会职能部门来说，无论是成立时设立的办公室、政治部、生产指挥组、文革领导小组，还是 3 月 22 日重新设立的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后改称政法组），一把手都是军人。以 3 月设立的“四大组”为例：办事组组长刘海江（武汉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办事组下辖行政小组、秘书小组，行政小组组长焦光寿（军队干部）；政工组组长阎超山（15 军 45 师副政委），同年 10 月由张景禄（15 军 45 师副政委）接任，下辖政法小组、机要小组、宣传小组、机关小组等，宣传小组组长为车成德（军队干部），机关小组组长为任善纪（军队干部）；生产指挥组组长李全智（15 军后勤部长）；政法组组长刘文科（湖北省军区干部）。省革委会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等的组长也都是军人。

省市革委会的委员，造反派所占比例更大。造反派推出的市革委会委员得到承认，参加过市革委会的全体委员会议。省革委会内武汉地区的委员不被承认，理由是两派相争错过了上报中央审批的时间，中央没有批就不承认。造反派一直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

曾思玉、刘丰排斥群众组织代表，对地方干部、尤其是支持造反派的地方干部也是排斥的。1970 年 9 月，刘丰在省革委会政工组说：“湖北这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 222 页。

^② 中共湖北省委《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材料》（1974 年 3 月 28 日印发）。



个地方，在干部中有些人就是宗派、山头厉害，你们不了解呀！我知道点历史的。老干部中，一些是太行区的南下干部，一些从冀南来的，是随王任重一起来的，再是跟张体学来的五师的干部。有些人就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宗

派主义作怪。”^①张体学1968年4月中旬曾对省革委会常委、长办联司头头顾建棠说：“我的秘书和警卫员都是人家给我配的。”

省革委会副主任、二司头头杨道远回忆：

任爱生算是最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结合之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这个人很硬气，能力也行，但当时在湖北主政的曾思玉、刘丰和张体学就是不想让（甚至是害怕）他起作用，重要的事情不分给他管。重大的事情往往就是曾思玉、刘丰和张体学这三个人在背后商量好，任爱生和其他副主任根本不能与闻。1968年夏，任爱生就社会议论较大的干部问题，给常委和正副主任写了一封信，要求印发常委们讨论。办事组就是拖着不印发，任爱生问丁力（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原省委干部），丁力说信已经转到军区党办去了。实际上是军区党办压了任爱生的信。在贯彻九二七指示的大会上，任爱生写了个东西，革委会办事组的丁力不给印，丁说，是军区不让印。

我们提任何建议都是没有用的。对于当时中央的一些政策精神，革委会从不去讨论应该如何贯彻执行，他们也根本无心讨论这些问题，确切的说是不给群众代表讨论，不让群众代表与闻，不让群众代表参与；他们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安排，满心想的是如何限制造反派，如何恢复旧班底，如何对造反派进行清算。从1968年年底开始，省革委会完全是按照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这三个人的意志运作，“三结合”已变成“二结合”，群众代表已名存实亡^②。

^①中共湖北省委《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材料》（1974年3月28日印发）。

^②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29、241页。

顾建棠说：

（曾思玉）只记恨造反派不听话，由此，对三结合中的群众代表心存芥蒂，另眼侧目；对“解放”后结合的地方领导干部也不甚放心；对结合为副主任、常委的“亮相”领导干部，更是政治上不信任，工作上不分配，只安排日常值班。他大权独揽，中权不放，小权全由各职能小组军代表组长掌控，形成了省革委会由军方独统的局面。

省革委会的一切工作，全由曾思玉掌控的武汉军区党委决策审定，冠以副主任、常委头衔的群众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不得与闻，比如以省革委会名义组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派驻各单位，由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于1970年10月30日共同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事前全然不知，只有事后听个传达的份儿。省革命委员会变成了“军管会”，“群干军”三结合只剩“军人”一结合了，省革委成了“曾家店”，开会也是一言堂。这就造成了地方干部和群众代表的不满和愤慨^①。

群众组织代表成批进入权力机构，是新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之举。他们中的工人拿着原工资，学生还是学生的待遇。他们满怀激情，意识到“建国以来，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第一次有了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半官半民、亦官亦民、‘升官不发财’的群众组织代表”，他们将“反映群众呼声、帮助和监督革命干部代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②。

但他们很快就感到失落，感到地方当局糊弄中央有的是办法。

胡厚民说：“群众代表是‘招之能来，来之能听，听之就走’”。朱鸿霞说：“我们这个副主任愿意和军区三办换一个小小的办事员当一当，或省革委会的工作人员，三办可以经常见首长，我这个副主任见不到首长。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群众组织代表编出这样的顺口溜：“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一打电话汽车来，重要议事就踢开。”1972年8月夏邦银在会上对省委负责人说：“群众代表在革委会只是接喜报的”，“开会时是召之即来，来之能坐，坐之能听，听之能走”；“曾思玉同志、体学同志，对造反派没有感情，我非常羡慕山东省革委会从下至上都是青年

^①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63—164页。

^②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61页。

班子，像山东造反派掌权很值得，联系湖北武汉的造反派，一年香二年臭，三年四年在挨斗，结合头头‘锅边’嗅”^①。

即便如此，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组织代表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角色定位，还是努力工作，对军队干部、地方老干部的特权意识开展批评。

1969年长江大水，洪湖大堤溃口，杨道远、张立国、顾建棠参加堵口抢险、抗洪救灾。顾建棠冒着生命危险，坐镇长办水文船，在溃口处弄清流速流量等水文数据，并从溃口进入堤内查看灾情。张立国是自己要求去洪湖抢险的，在堵口现场坚持三个月，国务院通报表扬的人员中有张立国。姜一说：造反派都像张立国这样是吃苦耐劳的好青年就好了。

省革委会成立后，张立国协助张体学到各专区“解放”了一批地级干部。张立国主要做当地造反派的工作，比较顺利，最大阻力来自军队。张立国以群众组织代表的特殊身份，协助张体学说服军方，起了很大作用。

张立国协助韩宁夫抓六七、六八届大学生毕业生分配，以华工革委会副主任王富山主动要求去新疆塔城为典型，带动了一大批大学生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协助赵修建立生产录音机的无线电二厂，组织班子，先在华工找到空教室做厂房。1969年10月接手主管杂交水稻研究，与武汉大学生物系两位年青老师一起去海南农村工作两个半月^②。

杨道远为知青口粮、女知青遭强奸等问题下乡调查，向曾刘张提出自己的看法，为军转干部、分配来湖北的大学生排忧解难。曾思玉批准省革委会机关做五六米高的围墙，杨道远逢会必讲，这个围墙用了多少砖头，花了多少钱，这够给农民盖多少房子。王任重那时都没有修这个围墙，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连过去的走资派都不如。曾思玉在场听着不吭声。有一次省革委会在当时武汉最高档的东湖客舍开会，代表们睡的是钢丝床，杨道远反对在那里开会，认为这里是接待外宾的，为什么不能在招待所开会？他坚持不要钢丝床，最后只好给他换棕床。一次开省革委会常委会，晚上十点钟会议结束，有车送回家，但与会人闲聊不动身，等着吃点心。那天杨道远值班，计划拿给他批，杨说不要搞，工作人员说是首长叫搞的，不搞不好。杨批：“夜餐照发，我不要。”杨道远回忆说：“这件事后来整我的时候，被说成：因为一个饼子两个点心，就说张体学又犯了走资派错误，

^① 中共湖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秘书处编《中共湖北省委批林整风会议简报》（二十七），1972年8月10日。

^② 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张立国的记录。

说我打击老干部。当时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他们没有办法解答，也不理你，心底下就认定你老是跟我们过不去。”^①

第四节 造反派掌权的基层革委会

在武汉地区，基层单位建立革委会最早的是华工，1967年8月4日成立，曾思玉前往祝贺并讲话。武昌区革委会的建立迟至1968年8月29日才最后达成协议。大致是一派独大（如水院、武测、长办、武锅、一中）或两派联合得比较好的单位（如一冶工安公司）能够迅速建立革委会，两派势均力敌或主流派优势不大的单位（如钢院）就比较困难。也有稍强的一派强行成立革委会的，另一派会称之为“派委会”（如武钢动力部），然后就是“内战”不休。

进入革命委员会这种全新的权力机构的普通工人、普通学生，有着全新的感受。

1967年11月10日武汉锅炉厂革委会成立，王光照任委员、生产指挥组副组长。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每当我值班，一个人深夜在厂前广场巡视时，抬头看厂办公大楼顶上“毛主席万岁”的霓虹灯红光闪闪，心中油然而升起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毛主席和党中央把这么大一个工厂交给我们，这是一种信任，也是我们的责任，这副担子实在太重太重。尽管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只要努力学毛选，



1967年8月4日，湖北省第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新华工革命委员会成立（载次日湖北日报）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30—237页。

团结全厂职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总会取得进步和成绩的。我们一定要给毛主席争气，绝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①。

新华工革命委员会由中央文革批准成立。华工二年级学生、23岁的张建华被选为新华工革委会委员，任宣传部副部长一职两年零四个月，即1967年8月至1969年底。他在回忆录中对文革中的革委会这样评价：

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好”。

通过比较文革前和改开后我国政权组织的状况，我认为“革命委员会”确实是好。比文革前的好，比改开后的好，比一些人企望的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还要好。

但今天的一些年轻人在三十多年来主流媒体和不良文人的长期误导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他们看来，文革时期的革委会无非就是造反派掌权，尽干坏事。

其实，真实的革委会确实是好的，完全不是他们在影视节目中看到的那个样子。……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革委会的成员是真正按巴黎公社的形式即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的，这些人一般都是经过实践证明的德才兼备并为公众信任的。

我们都知道，文革前和改开后，我国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由上级指定或委派的，这种任用和选拔干部的制度，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正因为革委会的成员都是群众直接选举的，革委会就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因而也就真正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革委会在行使权力时真正地实行了民主，真正实行了“集体领导”。

在革委会内部讨论问题、作出决策时，委员和革委会主任、常委之间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发表，都可以争论。通过决议时每个人都可以表示不同意或保留自己的意见。从而避免了第一把手个人说了算，其他常委、委员只是摆设的弊端。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56页。

革委会好在哪里？好在机构精简，党政合一，精英荟萃，令出一门。我院革委会成员共45人，是原院党政干部的三分之一（可能还不到三分之一）。机构精简了，人员精干了，办事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教学、教改、科研、落实政策等各项工作都有声有色、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并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华工在院革委会治理期间没有出现任何人整人的现象。总体来说，华工当时的干群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是积极的和谐的。

对此，我院原院党委第一书记、教育家朱九思在评价文革十年的华工时，也肯定了华工的文革是文明的。……

在我写这本回忆录时，我总觉得我在华工任职的两年多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虽然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23、24岁的毛头青年。

我之所以说在院革委会任职的两年多是最值得我骄傲的，一是因为我所做的事都是给学校、给社会输送“正能量”；二是我认为当时我的思想是最开放、最自由的，身心是最放松、最畅快的，精神生活是最丰富的。我们不但有理想，有激情，而且有浓厚的友情和烂漫的爱情^①。

王光照当上厂革委会委员后，不论是在宿舍区还是在食堂，在车间还是在科室，经常有工人、技术人员、职工家属、技校学生拦住他，向他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指出应该注意的苗头和倾向。最后一句话总是：革委会好好讨论和安排一下吧。作为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他“不分时间和地点，尽量到各部门了解各种纷杂的情况，帮助解决、协调处理各种问题”。革委会解决了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夜班职工下班回家的交通问题，每天由值班的革委会成员跟车。王光照回忆：“一天深夜，天气恶劣，动力车间一位黄姓女工因参加抢修设备而误了交通车，找我反映。我当即通知小车司机韩师傅出车送她回汉口头道街。一路上我与他们谈这谈那，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况反映。回厂已是天将晓。韩师傅很感动地说：开了多年的小车，革委会的头头们这样关心职工，以前想都不敢想，到底是文化革命培养出的新干部，就是不一样。”老八路、厂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赵秀岳对王光照说：整个形势太好了，真是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建厂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好的精神面貌，没有这么好的形势^②！

^①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319—320页。

^② 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54—157页。

长办联司1967年1月24日夺取长办的党政财文权（1967年12月20日成立长办联司主导的革委会），到1968年12月8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历时近两年。两年间除1967年6月底至7月底躲避百万雄师围攻撤离长办大院一个月，一直主导着长办的文革运动和业务工作，所有在建工程和设计任务如期完成。丹江、陆水、乌江渡等直接由长办负责设计的在建工程均按计划进行，湖北蒲圻陆水水电工程于1967年7月下闸蓄水，丹江口水利枢纽第一台机组于1968年国庆节启动发电（朱鸿霞和顾建棠代表省革委会参加庆祝大会），贵州乌江渡水电站等工程都随后相继建成运营。关系到我国国际信誉的阿富汗援外工程、下荆江中洲子裁弯工程顺利进行。

长办革委会成立后，在原总工程师室的基础上组建了生产指挥组，由革委会常委、规划处长王有秋任组长，革委会委员、总工程师李镇南和委员、技术员徐炳华任副组长。他们在抓紧丹江等在建工程的同时，积极研究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可行性，起草了《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968年3月8日，由革委会主任郭志伟带领李镇南、徐炳华、邱中恩和顾建棠上京，向水电部钱正英部长汇报，并递呈《请示报告》。两三天后周恩来总理指示：“设想很好，实现主席‘高峡出平湖’的理想，是大家的心愿。备战备荒为人民，要有战争观念。万里长江第一坝，要审慎筹划，兼顾各方，有利无弊，万无一失，准备打仗，确保武汉。请长办的同志抓紧研究，继续论证。”返汉后，长办革委会加强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组，全面展开设计论证工作。

顾建棠在京起草《关于葛洲坝工程以毛主席3月30日视察三峡之日命名为‘三三〇’工程代码的请示报告》报送国务院，当年5月周恩来总理批准并复示长办革委会，葛洲坝水利枢纽设计组改为“三三〇”设计组。这个“三三〇”一直沿用到1980年才改为“葛洲坝工程”。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1971年葛洲坝工程开工。顾建棠说：“如果工宣队进驻后诚心帮助而不是捅垮长办革委会，我可以断定我们会比他们搞得更快更好。”^①

^①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十二章“文革硕果长办革委会 新生事物显生机活力”。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适逢武汉地区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退潮，各大学在刚成立的革委会领导下开始复课，开展教育革命。



1967年12月25日，在武汉警备区召开的中等学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交流了市二十九中的经验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革委会成立斗批改办公室，领导复课闹革命和教学改革。《红水院》报发表社论《大破大立，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斗批改办公室组织多次关于教学改革的辩论会，师生踊跃参加；组织师生代表讨论教学改革方案，编写“体现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新教材”。一系62级的农田水利专业课由揭曾佑教授尝试用新教学方法授课，与学生互动，效果较好。6221班翻印了水电站等教材，编印了周恩来论水利、黄淮海会战等实用材料。农水教研室五位教师共同研究，复课后首先讲农水战线十七年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受到学生欢迎。

一系同学提出专业不要分得那么细，水利不分系，电力也应该融合进来，砸烂专业界限。这些自称“砸派”的同学还在全院游行，质问革委会负责人。二系对于把农水和水工完全揉在一起有保留。

全院成立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串连会，天天有激烈的讨论会，讨论教学改革问题。外出进行教学改革的社会调查，编写新教材，组织上课、实习，

很多教师、系领导干部也积极参加。还有师生主张把学校搬到工地和农村去，进一步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一些青年教师认为，这些问题在1958年教育革命时期就已经提出了。

1967年底，二系组织三、四年级同学去丹江口水电建设工地现场教学，并参与丹江口工程局的“斗批改”，同学们认为受益匪浅。1967年12月，一、二系14人组成“水利专业大联合拼命向前串联会农业水电公社教改探索队”，去咸宁地区各县乡和水利工地做教改调查。12天徒步五百余里，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开了三十多次调查会。在蒲圻山区一个地方他们了解到，这里水源丰富，但地形复杂，灌溉田地要从六里外取水。请一个技术员来修水锤泵，每天工资4元、一只老母鸡，没能修好。他们参加劳动，帮助农民设计小渡槽、小水轮泵站等。整个活动只花费二十余元。回校后写出调查报告《要普通劳动者，不要特权阶层》，《红水院》报用两个版面全文刊登。

在斗批改办公室指导下，出现了几个教育革命的典型：教师吴朴三带队到光化进行的电网设计施工，教师吴甲铨领队的小洪山小电站设计小分队，恩施水利工程教学基地。著名水利专家张瑞谨副院长也参加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武汉机械学院机653班教育革命调查组师生在武汉柴油机厂（载11月17日湖北日报）

活动，并率先提出斗批改要打破系和专业的界限、建立专业连队的意见。

这一段时间，对十七年教育的总体评价争论十分激烈，有些同学认为教学改革只能是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局部地、阶段性地做一些修改；有些同学认为必须彻底砸烂旧的教育体制，然后才能建立新的教育体制。

水院这个由院革委会主导的教学改革高潮期，因1968年春开展的“三反一粉碎”运动而搁置。其间北京电视台派来采访车，拍摄了水院教学改革的专题纪录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到水院采访^①。

1967年11月4日，新湖大革委会成立。计统系一年级学生、革委会委员、教务部副部长杨闯起草了《湖北大学1968年教育改革计划提纲（草案）》，涉及各系课程设置、三结合（校外实际工作人员、教师、学生）教学班子、各专业到对口行业参加实际工作、抓教改试点等。杨闯带队考察了实行或探索不同办学模式的江西共大、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并进行了总结研讨，还提出如何办研究性质的大学这一课题^②。

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新华工革委会撤回所有在外联络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回到学校，边复课边搞教改。全院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教改小组”、“教改探索队”，去工厂、工程工地实习，参加筹建院无线电元件厂。11月19日，湖北日报刊载《新华工》报编辑部、新华工《教育革命》编辑部的文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情况的初步调查》。1968年1月，院革委会举办的“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展览”开展。按革委会主任张立国的说法，“决心在全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中搞个第一”。新华工革委会主导的复课闹革命、解放干部、整党等工作，新华社、人民日报多次报道^③。

① 参见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九章“革命委员会”之第二节“复课闹革命和教学改革”。

② 参见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九章“湖北大学革命委员会工作记（一）”之“一、当教务部副部长，潜心抓教育改革”。

③ 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张立国的记录。

第十九章 “三反一粉碎”中的钢新之争

1968年3月27日下午，北京召开“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周恩来宣布中央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和对黄永胜、温玉成的任命的命令。江青在会上号召反击“右倾翻案风”，说“目前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在反动的方面占主要。要坚决击溃他们！”5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说：“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从1968年3月底到8月的这一段武汉地区文革运动被称为“三反一粉碎”时期。

这一时期钢新两派的剧烈冲突，并没有发展到如同造反派与百万雄师生死相搏那种程度，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担心对方压倒己方而使文革归入失败，而文革失败是钢新两派都不能接受的。

第一节 钢新两派和军区提出不同斗争目标

好不容易翻身的造反派最警惕的就是“右倾翻案”。3月27日下午，与北京十万人大会同时，武汉工代会召集十万工人参加的大会，“欢呼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接见军队干部”，表示“誓死捍卫红色政权，粉碎翻案复辟的黑风”，会上揪斗了“‘百万雄师’地下黑司令部坏头头”夏少卿、余少卿。此后，钢新两派关于“三反一粉碎”的所有宣传都会提到，要警惕并打击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百万雄师的翻案活动。工总组织调查组，到武汉市各区、基层单位调查百万雄师成员和支持他们的干部“搞翻案”的情况。

3月底4月初，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常委孟运通因百万雄师成员陈明清在外串连从事翻案活动，约他谈话，陈害怕被批斗，在家自杀。

这一时期，造反派对百万雄师成员保持着高压态势。将“搞翻案”的百万雄师成员挂黑牌游街一度成风，以致湖北日报4月28日发表署名“卫



造反派对两位百万雄师骨干发出的“通缉令”（章迪杰提供）

思达”的文章《刹住游街风》。文章说：“当前在武汉地区盛行的一股挂牌游街之风，是打击敌人的主要方法吗？用这种方法能最有效地打击敌人吗？不能。”

“三反一粉碎”运动开始，工代会、红代会成立后本应“倒旗”的各群众组织纷纷打出原旗号，当局似乎默认。6月6日工总举行各级勤务员万人大会，警司副司令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张绪出席并发表讲话。各组织改换名称开办报纸，工总有“钢工总保卫组”办的《江城前哨》，工造有“武汉工造总司不忘六·二四兵团”办的《不忘六·二四》，九一三有“无产阶级革命派进驻红旗大楼‘四反’‘卫三红’指挥部”办的《缚苍龙》，二司有“武汉钢二司《三反一粉碎》编辑部”办的《三反一粉碎》。

7月23日，造反派召开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一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批斗了一批百万雄师头头和支持百万雄师的干部辛甫、林立等。

当时百万雄师和“公检法”的主要头头入狱，公开的组织已经不存在，偶尔出现的翻案标语没能造成影响。钢新两派未能实现真正的联合，外侮暂时看不见，于是“兄弟阋于墙”。



新派认为，当前武汉问题的根子，是当政的军队干部，以武汉军区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为代表，把持省市革委会，视群众代表如无物（吴焱金说“革委会是军政府”），而且支一派压一派，分裂造反派，助长钢派的错误，于是发动“揪武汉变色龙”“揪武老杨”。刘丰对此的回应是：“有人要揪变色龙……现在我还没有成龙，我要是成了龙，就要呼风唤雨，把这些牛鬼蛇神统统淹死。”^①

刘丰曾说：“××（工总）组织过去是受压的，产业工人多，×（新）派是小知识分子，××（工造）组织都是民办工厂，卖油条的人，临时工、合同工多，成分不纯。×（钢）派比较直爽，×（新）派比较滑”^②。

张立国说刘丰在新派头头面前毫不掩饰地偏袒钢派，他举了一个例子：1968年国庆前夕，张立国从华工去省革委会开会，途径省电力学校，遭该校二司学生枪击，所乘华沙牌小车轮胎被打坏。张立国向刘丰反映，刘丰说：你不挑衅他，他无缘无故来打你？你还跑来闹，不检讨自己^③。

钢派认为，武汉地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风的主要危险，来自于一贯右倾的新派头头和省市革委会中支持新派的干部，他们是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的阻力，因而提出“拥护曾（思玉）刘（丰）方（铭）张（昭剑），打倒薛（朴若）李（长根）孙（德枢）”

^① 参见湖北省柴油机厂张立国、湖北沙市棉纺织印染厂谢邦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载1974年3月21日湖北日报。

^② 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室印《市委常委揭批的刘丰反革命罪行材料》（1974年7月2日印发）。

^③ 2016年11月杜先荣访谈张立国的记录。

揪“武老杨”者的阴脸谱示众

·革命风雷·

【本报编者按】下面是最近湖北华中师范学院武大的革命风雷社，在“武老杨”的“革命”中，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提出了“揪斗武老杨”的口号，而且采取的是“两面派”的手法，与那些搞阴谋的阳谋党加奸细，他们五虎八门的阴谋手法，我们也在最近，搞成一派“阳加阴”嘴，双管齐下，从他们那些阴谋诡计，堂而皇之的阳谋大文章，《新华报》的《武大反右斗争的斗争》等，明眼人就可以透过种种的阴谋诡计，再把他那“阳加阴”嘴的“真心话”，加以揭露，且不说一语他妙计的“阳加阴”嘴吧！

“阳加阴”嘴的，伪装应当剥去。”他们把那些人的言行，都暴露出来，让他们在阳光下，可以以一手遮天，掩人耳目，用心太狠地为其罪恶斗争。可笑，我们为那些阴谋在他们头上搞的假面具上顶一个小丑，让他们当众解开了他们的假面具，无足碍人。

现在，随着这个右派头头来京的丑闻而革命风雷社已活跃起来了，他们的表现也活跃了，心虚了，在武汉，在湖北，我们想他们“阳加阴”嘴，为右派“反加”，让江城革命风雷社把右派机会主义头头看穿看透，以免他们再在搞革命风雷社。

一、散布反动的“形势悲观论”，为阶级敌人反革命武装夺权制造混乱

【编者按】毛主席说：“全国的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要小好，整个形势比任何时候都大好。”可是那些集团中的几个右派头头的阳谋大文章，等等说一些，自是，在那些里，却把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搞成一片漆黑，并鼓吹“左”的路线的总路线。他们是别有目的的，就是要把新派和武大的火药，为阶级敌人右派头头制造混乱，让阶级敌人从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夺权，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

二、宣扬反动的“暴力主义”，成立“暴力集团”，妄图以暴力颠覆红色政权，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

【编者按】武汉地区在武大反右斗争中搞起来的，如那一小撮右派头头在公开的文章里，总想早三朝闹事的，实际上，而是他们在那些集团的阳谋下，大喊大叫搞“搞武派”，而“成为暴力集团”，他们那所谓所谓人的美谈正是他们想搞而且正在搞的。两面派是台后戏的，他们想把自己装扮成正面角色，他们搞了强盗，搞了命案捉妖。在武大的问题上，知道他们那两派的阳谋还是算得不清算明！

阳	阴	阳	阴
<p>△武大反右斗争：武大反右斗争，从来没有一些政治领导人，看不到这一大革命革命形势，他们看到了武大反右斗争出现的一些表面现象，就在那里说一些不要听他这说，制造反革命风雷，把那些话给得一团漆黑，把武大反革命风雷的一团漆黑。</p> <p>——新华社于×××</p>	<p>△全国的四派大斗争，武大却冷冷清清，没有革命。……</p> <p>——新华社于×××在武昌葛家巷党的阳谋假话</p> <p>△7.28的阳谋斗争党字还送没有搞开，……</p> <p>——新华社于×××在武昌区区委阳谋假话</p> <p>△武汉地区有二种前途，一种是党字之下，总是一团漆黑向人，一种是党字之下，总是一团漆黑向人，一种是党字之下，总是一团漆黑向人，一种是党字之下，总是一团漆黑向人。</p> <p>——新华社于×××在武昌区区委阳谋假话</p>	<p>△目前，我们党的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反右斗争的形势，而解了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武大斗争”的阳谋阶段，并以此第五个阳谋就是全面的“武大斗争”了。显而易见，这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超越其错误的，在实际上也是错误的。</p>	<p>△对于政权，心要硬，革要猛，……中共在反右斗争中搞阳谋，我们不要受其迷惑，我们不要受其迷惑。</p> <p>——新华社于×××在武昌葛家巷党的阳谋假话</p> <p>△核的派党字阳谋，我们不能再也不能看错了，我们不要，要这样了。</p> <p>——新华社于×××在武昌葛家巷党的阳谋假话</p> <p>△反右斗争阳谋，我们不能再也不能看错了，我们不要，要这样了。</p> <p>——新华社于×××在武昌葛家巷党的阳谋假话</p> <p>△反右斗争阳谋，我们不能再也不能看错了，我们不要，要这样了。</p> <p>——新华社于×××在武昌葛家巷党的阳谋假话</p>

载 1968 年 6 月 26 日武汉钢二司《三反一粉碎》报

姜（一）”。其实他们对曾、刘也不满，提出“拥护曾刘方张”，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是要把新派打成“反军派”，他们分析全国形势后认为，反军派没有不垮台的。

当年 6 月 15 日曾、刘从北京回武汉，18 日在省市革委会委员、三代会常委联席会议上传达中央首长指示：揪武老杨错了。钢派极为兴奋。但曾思玉在这个会议上讲：“看到拥护曾刘方张的标语啊，我就头痛。”^① 工总勤务组极为愤怒，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曾刘利用钢派压新派，新派压下去了再整钢派。1969 年反复旧时胡厚民对吴焱金说：你们当时揪武老杨是正确的，我们不揪是错误的，我们当时不揪，现在很不好说话，反而被动。

3 月 28 日，工总发表“三二八声明”，号召开展“四反”——反对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反对破坏拥军爱民，反对王任重的第四套班子，反对机会主义者保护走资派。这个“声明”部分矛头对准新派。4 月 8 日工总举行大规模的乘卡车“火把游行”，将一些百万雄师成员拉出来，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并呼喊“杀‘鸡’（机会主义）喝汤”等口号。武钢、

①《新华工》报 1968 年 6 月 20 日第 98 期。

汉纸、肉联、武船、武重等单位钢新之争又起。

工总、二司成立专案组，对要打倒的干部进行专门调查。4月初，工总、二司、三司革联绑架姜一，成立“揪姜战团”，造舆论，开批斗会。同时提出“打倒姜一，揪出姜二”，“姜二”是指偏向新派的张体学。黄冈地区钢派整张体学材料送给胡厚民，胡在工总勤务组透露了材料内容，最后没有公布。新派认为揪薛李孙姜就是要搞垮省市革委会，提出“卫三红，救姜一”。

3月底，湖大出现矛头指向刘丰的大字报。4月5日，新一中旌旗奋兵团贴出大字报《二十二问》。第12问说：“在省市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代表被置于何地？到底是几结合？”第13问说：“为什么百匪、三字兵、康三婊子大吵大闹，猖獗翻案？后台安在？”第12问认为这些问题的源头就是刘丰：“七二〇前后，武空由支保突变支左，而空司某人则由余立金的点拨，连升数级。这里面必有鬼。某人是否变色龙，阴谋篡权？”此后，新派以“武老杨”“变色龙”指称刘丰。

武汉地区的“三反一粉碎”开始，钢新两派各有斗争目标。曾、刘也确定了打击对象——一批地方老干部。这批老干部有共同的特点：与王任重、张体学有宿怨，有“历史问题”，坚决支持造反派特别是钢派。

谢华之1969年10月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1968年4月6日晚，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张纯青、张昭剑在8199部队师部，对朱鸿霞、张立国、杨道远、谢华之说，武汉的阶级斗争出现新形势、新动向，在这里面煽阴风点鬼火的就是卜盛光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把它们抓起来。布置工总抓李守宪，二司抓石寿堂，三司革联抓卜盛光，华工抓王盛荣。7号晚8点一起行动，10点送警司。第二天卜盛光、王盛荣没抓到。

王光照回忆：4月6日夜，在汉口上海路市邮局三楼礼堂舞台上，曾思玉及军区三办马兆昆、徐健等，召集工总朱鸿霞、胡厚民、沈复礼等约四十人开会。曾思玉讲：我省同全国一样，也存在着严重的右倾翻案风，卜盛光、李守宪、王盛荣、石寿堂是武汉文革的黑手，应当把他们这些小爬虫揪出来。我们军队出面不方便。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你们钢工总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在群众专政的问题上，应当走在前面，在当前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你们出面抓黑手比较方便。相信你们一定会打一个漂亮仗。王盛荣一贯追随王明路线，是二十八个半的成员。据我们

掌握的情况，他已经跑到东北去了，妄想投靠苏修。曾思玉一行大概八点多来，不到十分钟就走了。工总的人到了哈尔滨，得知曾思玉通过陈锡联将王从黑龙江他儿子当兵处抓回了^①。

从目前收集到的材料看，曾思玉同一天夜晚在不同地点布置抓人是确实的；不能确切知道的是，为什么给四个组织分了工，又要工总一家去抓四个人。

此后，湖北当局又发动批判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批判“黑手”孟夫唐、刘真、张华，说湖北右倾翻案风的根子是这一批支持造反派、对当时湖北政局无甚影响、一直被他们压制的干部。

新派受到巨大压力，以张立国为首的新派头头从4月7日起多次开会，商议成立统一的新派组织“卫三红指挥部”。5月1日在华工正式决定成立，领导小组由张立国、吴焱金、龙铭鑫、高玉泽、曹承义、潘洪斌、陈茂祥、顾建棠、傅廉组成，张立国为组长，吴焱金、顾建棠为副组长，彭勋、严常任参谋组正副组长，参谋组下设《卫三红》报编辑部、动态组、专县联络组、文卫组。6月16日，新潮大头头从北京回来，在新派头头会议上传达了聂元梓的意见：“新派不能反军队。全国凡是搞军队的，都垮了台。新派对形势估计错误，帮了倒忙。”经讨论，一致同意停止“卫三红、揪变色龙”活动。17日继续开会，决定撤销卫三红指挥部。张立国说，我们都要向曾刘承认错误^②。



①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46—148页。

② 详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66—174页。

新派还策划组建一支武装，由工造、新一冶、市安装公司红色革命敢死队出人，华工、湖大、长办出钱。已经安排了集训地点，准备好一二百床被子。计划没能实现^①。

彭勋是新派“揪武老杨”最积极的鼓动者，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作了十多场“形势报告”。5月15日他在华工电影场说：“要有倾家荡产的思想准备，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②他还即兴以几句顺口溜（一片和平景象，一片琅琅的读书声，窗户擦得很干净，桌子椅子摆得很整齐）揶揄华工复课。他提议并参与集训一百多名学生，派到省内各专县，动员新派组织统一行动，揪武老杨。他主持整刘丰的材料，未成系统，6月15日曾、



1968年4月，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新派举办“卫三红”专刊（载1968年4月7日湖北日报）

^① 参见《彭勋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② 参见《新湖大（红八月）》报红字〇〇一号（1967年7月29日）。

刘从北京回武汉后就终止了^①。

5月15日，彭祖龙以工造总司的名义通知专县二十多个新派组织到华工开会，商讨成立全省统一的新派组织，张立国、龙铭鑫、曹承义、陈茂祥等新派头头出席，会期三天。会后“新湖北无产阶级革命派捍卫三红总指挥部”的牌子挂在工造总司门口。这个“新湖北”没有造成多大影响就无声无息了。彭祖龙回忆：当时专县新派一些头头（有孝感的沈良军等）为了联合起来对抗钢派，找到我，约定到华工开会商议。那个牌子是专县的人挂的^②。

彭勋4月27日在湖大召开的新派头头会上讲“我们和钢派的斗争是国共两党的斗争”^③，对将去专县的集训人员讲：“我们已经掌握了工总二司在水运开会的情况，他们打的方针已经定了。”^④胡厚民6月6日在工总各级勤务员万人大会上讲话说，新派“有个组织开了三次会，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了些什么话，我们都知道，他们策划了一个秘密暗杀计划说要把朱鸿霞、夏邦银、姜诗存杀掉”^⑤。传言越传越离奇，两派敌对情绪越来越深。

第二节 钢新之争达到顶点

5月3日，中原机械厂爆发了最激烈的两派武斗，双方都动用了枪支。此前该厂新派组织“新中原”抓了本厂工总的几个头头，说他们是百万雄师的变种。工总二七区办事处头头胡巍前去交涉被打。工总作战部调集人马攻打中原厂，工总死一人、伤数人。警司派部队制止，事态才没有扩大。官方资料说，中原机械厂武斗事件死2人，伤57人^⑥。

关于武汉警司在新中原事件中的作为，新派另有说法。曹承义回忆：“‘新中原’的头头在五三武斗事件后告诉我，他们在武斗时使用厂里生产的军用无线电步话机监听到武汉警司支左军人在武斗现场使用步话机交谈，并说武汉警司是支持钢工总攻打新中原的。使新派进一步觉得军区、

^① 参见《彭勋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② 2017年3月4日彭祖龙致笔者的邮件。

^③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169页。

^④ 《彭勋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⑤ 钢工总保卫组《江城前哨》编辑部主编《江城前哨》第8期（1968年6月9日）。

^⑥ 中共湖北省委运动办公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材料》第35—36页。

警司有人即‘变色龙’在挑动钢、新两派武斗。这时新派揪‘武老杨’的大字报开始上街。”^①

4日，肉联厂工总、工造发生武斗，双方用步枪、迫击炮互相射击，工造死一人。

26日，工造铁军袭击工总头头夏邦银、张耀忠乘坐的汽车，开枪打伤司机。27日江城前哨拦路殴打工造头头闫志斌。8月中旬，新华工头头郭保安被工总绑架十天。

在武钢，钢派围攻红旗总部所属新动力的据点，死二人，伤多人；抓住红旗头头叶美堂等六人，用枪将五人打成重伤，打死一人。钢派长时间将老九一三分团徐道基等人围困在钢研所，双方开枪互射。

两派都在准备大打，都宣称要“走四川道路”，以武力决胜负。工总继在武汉体育馆设立“群众专政”机构“江城前哨”后，在全市组织联防，以情报组所在的市电信局为据点，集中人枪。新派各组织加强戒备，工造铁军占领景明大楼（武汉市各民主党派办公地）、井冈山大楼（市机械工业局）作武斗据点。

所谓“群众专政”，是当局倡导支持的，“江城前哨”就有军人参与^②。4月23日，市工代会在武汉体育馆召开“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誓死捍卫‘三红’誓师大会”，宣布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长江日报24日报道：“群众专政指挥部负责人宣读一批犯罪分子的罪行”，“一批流氓集团首犯、投机倒把惯犯、现行反革命以及‘百万雄师’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坏头头被揪到会场示众”。警司副参谋长赵梗参会并讲话，“对大会表示坚决的支持”，支持对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

此后大大小小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三红保卫队”纷纷自行成立，大多成为各派的武斗组织，抓流氓，抓百万雄师翻案人员，也抓对立派的人，打人的事不可避免。

5月26日至28日，武汉市突然爆发钢新两派抢枪风潮。“被抢的枪支达10万支，子弹约1000万发。”^③

抢枪风怎么刮起来的？两派头头晚年回忆，大都说听说有人去抢自己

^①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99页。

^② 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徐健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33页。

才去。新一冶头曹承义回忆：5月27日他在湖大听说省公安厅有人抢枪，新一冶去人时仓库已空。28日在长办听彭祖龙说工总在127部队抢枪，他立即带人去抢到了枪。

武大二司的人去武昌县金口抢枪，是从机械学院得到消息的。

武锅王光照说是警司要他们去弄枪的：

1968年4月底的某天深夜，武汉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张昭剑突然单人匹马来厂，……到二楼亮着灯的办公室找到我……讲：今天有些事应该向你讲一讲，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张政委大约同我讲了四十多分钟。……整个讲话中再三强调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复杂，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决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你们钢工总是坚定的左派，不武装起来是不行的。这个问题要高度地重视。比如去年为工总翻案、抗暴过程中，你们是吃了大亏的，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新华工很注重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已经走到你们前面去了。张立国他们已经掌握了不少的武器，你们已经落后了，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困难是会有有的，只要开动脑筋，总会有成效的。你们旁边公安厅仓库里就有很多武器。

张昭剑深夜来访的一番谈话，当时心里有过嘀咕：是个人意见还是警司集体看法？是路过还是专程来厂？深夜单独来有什么避讳？我不在办公大楼又会找谁呢？怎么找呢？嘀咕归嘀咕，另外一种意识占了主导：这是首长对我厂的信任和关爱、支持，也是对整个工总的偏爱。……（我）将全过程及谈话完整地写成大字报，连夜张贴在厂前广场大字报栏里。大字报的标题极富吸引力：《张昭剑夜访新武锅》^①。

大字报引起很大的轰动。第二天上午王光照在厂革委会临时会议上报告了张昭剑来厂详情，会议决定执行张昭剑的意见，并指定专人负责。5月26日，武锅造反派去省公安厅抢了枪。1968年12月14日武锅革委会副主任、原厂党委书记赵秀岳做检查时说：“我们厂的这次行动（抢枪），在全市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②。

1968年5月所谓抢枪和1967年8月那一次一样顺利，造反派进入的武器仓库基本无人阻拦，省公安厅武器库、武昌县金口武器库等处都是这样。1967年那次几乎都是群众组织有组织地去抢，1968年这次很多社会

①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49—150页。

②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68页。

上的人取得枪支弹药，以致武汉市内连续数月枪声日夜不断，流弹打伤打死市民的事时有发生。曾思玉1968年6月18日在一次大会上说：“流弹打伤327人，打死50多人，飞机打坏8架。”^①

28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来电，要求两派立即停止抢枪，并要求武汉军区坚决制止这种违法行为。此后市内抢枪基本停止，武汉两派就跑到专县去抢。

这次很多抢来的枪没有枪栓，当时造反派大惑不解：又让人去拿，又事先取下枪栓，他们这是干什么？

“三反一粉碎”中，钢九一三特立独行。

1968年4月26日，长江日报第一版头条刊登关于武钢（报道中称“一个大型企业”）的报道：“在火热阶级斗争中办好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七二五二部队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基本经验”。以九一三武钢分团为首的“新三家”4月27日向长江日报发出“照会”说，这个报道是该报刮右倾翻案风的表现，对武钢形势的判断完全错误，“三个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是“伪造事实”，报道指责“一些人几次冲击部队”是“压制群众运动”。“照会”要求该报4月28日公开答复未果，5月5日，“新三家”连同公安联司武钢总部封闭长江日报达4个月，9月8日长江日报恢复出报。

封长报出面的是九一三新武钢分团，实际指挥的是九一三总团。

九一三封报后，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老大（工总）办报、老二（二司）卖报、老三封报”。封闭长江日报使工总与九一三一直就存在的矛盾加深。1968年6月5日九一三发表《给钢工总勤务组及广大战斗队员的一封信》，一开头就列举工总制造的针对九一三的“严重政治事件”：1968年4月28日“绑架”邓金福，6月4日“绑架”杨连成、殴打总团常委余东久等多人。这封信表示“对你们的‘三·二八’声明、‘五条命令’、‘特大喜讯’以及你们的负责人在形势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我们不能接受”，表示反对“以我为核心”。公开信还说九一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了‘五·一八’社论”。新派控制的湖北日报5月18日社论《奋力越过六盘山》说：“我们队伍中为数不多的一些同志正陷在右倾思想的

^① 新华工革命委员会、红代会红司（新华工）《新华工》编辑部《新华工》报第98期（1968年6月20日）。

泥坑里不能自拔，而右倾机会主义者正通过这样一些人，披着‘革命’‘造反’的画皮，放肆地腐蚀着我们的同志，削弱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

这篇社论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九一三的宣传品中又称为“变色龙”，指的就是刘丰；而“我们队伍中为数不多的一些同志”，指的是刘丰支持的工总头头。

九一三封长江日报，工总、二司和新派都很尴尬。钢老三封钢派的报纸，钢老大、钢老二不好出声。钢派控制的报纸被自家人封了，九一三要揪的对象和新派一致，新派本应表态支持，但武钢的“老三家”是新派，他们是反对封报的，新派对此事也只能闭嘴。

第三节 批判李迎希

1968年5月，中央召集武汉军区领导人在北京开会，会上批判军区副司令员李迎希。6月12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接见武汉军区曾、刘等人，说李迎希1967年2月“夺军权”是错误的，不能平反；李迎希是“黑手”，和军区机关造反派“互相利用”，与地方造反派“挂上钩”，“破坏军队稳定，破坏文化大革命”；“李迎希的错误，不仅是过去夺权错误，而且现在有问题，他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组织，分裂革命委员会”，“他是反党夺权”，“先在这里批判，以后再到处批判”。6月13日林彪对曾、刘说：“李迎希这种人是好的，这次弄清楚了，很好。”“要维护武汉军区的新领导，不要动摇这个领导。”14日周恩来对曾思玉说：“对于李迎希的处理问题，毛主席知道了，同意这样处理。”方铭传达了曾思玉关于李迎希的讲话：七二〇以后“李迎希以造反派自居，以一贯反对陈再道自居，以胜利者自居，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要夺曾、刘的权”。“抢枪是他搞起来的”，“挑拨空军与陆军的关系，抓武老杨都是他搞的”^①。6月18日刘丰在武汉传达中央首长讲话时，插了一句他自己的话：“李迎希在钢、新两边跳。”^②

李迎希与地方造反派“挂上钩”并成为操纵他们的“黑手”，是“莫须有”

^① 参见钢工总保卫组《江城前哨》编辑部主编《江城前哨》报第9期（1968年6月19日）。

^② 参见新华工革命委员会、红代会红司（新华工）《新华工》编辑部《新华工》报第98期（1968年6月20日）。

的事。但李迎希倾向于军区机关造反派，是武汉造反派在1967年2月就知道的。中央作出批判李迎希的决定，曾思玉在6月18日传达会上说：“李迎希问题，群众组织不要插手，军内问题军内解决。”钢新两派还是立即在社会上造舆论，表态拥护中央决定，一方面表明自己紧跟中央，另一方面把李迎希问题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

相当于工总总部喉舌的《江城前哨》第9期刊登中央首长6月12日讲话，同时以粗大字体刊出口号“打倒篡军野心家李迎希”。这期报纸发表的社论《把揪“武老杨”的黑后台李迎希之流抓出来示众》，按照曾思玉的结论，牵强地把李迎希说成新派揪武老杨的操纵者，说李迎希“把整曾、刘的黑材料一套又一套地向混进某些组织的别有用心分子透露，制造假象，设下圈套，掀起了揪武老杨的一股反动逆流，妄图毁我钢铁长城”，说李迎希“操纵那么几个钻进革命组织的别有用心分子和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头头，散布大量流言蜚语，制造武斗紧张空气，叫嚣走什么‘四川道路’”。大帽子下面没有一事实支撑。这也难怪，曾思玉6月18日关于批判李迎希的长篇讲话也没有举出确凿的具体事实。实际上，七二〇事件以后钢派是主张为李迎希平反的。《新华工》报第98期转载了三钢驻军区大院联络站1967年8月《坚决为李迎希平反》的声明，“声明”说：“李迎希同志与陈再道、钟汉华、徐向前之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受到陈再道、钟汉华残酷的迫害，但他仍然坚持斗争”。“李迎希同志的案我们翻定了！”

新华工革委会1967年9月8日给中央的报告说到，军区机关造反组织“大多数都倾向于三钢的观点”，二司驻军区联络站和这些组织一起，“集中于为李迎希、张广才翻案”，新华工怀疑他们“想把军区进行‘钢化’”。《新华工》报第98期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打倒反党篡军野心家李迎希——兼斥〈江城前哨〉“鸭子死了嘴巴硬”的怪论》，说李迎希、孟夫唐与钢派“某些头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钢派曾经为李迎希“狂热翻案”。新派也喊叫“打倒李迎希”，他们举出李迎希一个儿子是二司成员等事例，说李迎希是钢派的后台。

孟夫唐是湖北最早、最坚决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后来也最坚决地支持钢派，贬低新派，张体学、陈再道和保守派都曾经对他极力打压。周恩来、陈伯达接见时简略地提到“孟夫唐是典型的两面派”，钢派闻风而动，高

喊“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孟夫唐”。6月29日出版的《江城前哨》第11期发表长篇文章《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孟夫唐》，从孟夫唐的祖父一直批到他本人在文革中的表现，说他七二〇前被新华工保护，新湖大称他为“我们的老好校长”，七二〇后“他一方面公开宣扬‘不钢则康’论，挑起钢新之争，分裂革命群众组织；另一方面却暗地同新派头面人物一起，背着军区和三钢等革命群众组织成立了‘省革（临）筹’”。

新派早就对热烈“支钢”的孟夫唐不满，此时也和百万雄师一样把72岁的他称为“孟老狗”。

中央处理了李迎希、张广才，孔庆德、叶明等人做了检查，曾、刘在武汉军区的地位得到巩固。当时钢新两派忙于互斗，且不认为李、孟二人有多大能量，对李迎希的问题又知之甚少，加上曾思玉明确表示群众组织不要插手军内问题，两派表过态，互相攻击一阵就不了了之。

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发布，8月工军宣队进驻学校、军宣队进驻工厂，群众组织手里的枪支全部被收缴，武汉官方文献记载：“共收缴各派抢夺的枪支7.5万支，炮447门，子弹920万发”^①。“三反一粉碎”运动就此偃旗息鼓。

^①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537页。

第四编

从“清队”到“两清一批”

(1968年8月—1971年10月)

第二十章 清理阶级队伍与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

1968年6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下简称清队）开展；8月底开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军宣队或工宣队）陆续进驻大中学校及文化、卫生、新闻出版、科研设计等事业单位，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军宣队）进驻工矿企业，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转折。

清理阶级队伍的目的，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1968年5月15日）所言，是为了建立“以无产阶级左翼为骨干的无产阶级队伍”（所谓“无产阶级左翼”，在当时的语境中就是指造反派），“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也说：“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中发〔68〕74号），“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陆续开展。全国各单位在军管会和军宣队、工宣队主导下，清查“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又称“八种人”）。“八种人”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

武汉地区的清队在曾思玉、刘丰的主持下，基本上是整群众、特别是整造反派，基本上没有实现中央的部署。对于运动矛头向下整群众，各级当权者思想上认同，技术上熟练，清队运动由缺乏政府管理经验且敌视造反派的军队干部掌控，更加不注意政策，扩大化更加严重。

1968年12月汉阳区公安分局预审员对武汉三中教师、造反派成员夏家宝说，三中工宣队的专案材料说你上大学时用酒把女友灌醉，强奸了她。夏家宝问有没有证据，预审员说，上面说“提高妇女地位”，女方的话不需证据。夏家宝问三中送来的专案材料去不去找当事人核实，预审员说：“我

们没有功夫，上面也有指示，以单位专案材料为唯一依据。”^①1969年9月调任水院工宣队指挥长的武空师级干部樊马义经常说“马列主义教研室没有一个人好人”“院党委只有一个半好人”“水院的人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水院不枪毙几个是不行的”“对知识分子要改造、改造、再改造”。有人与他辩论，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应该是“团结、教育、改造”，他说你们懂个屁。九一三事件后，受刘丰牵连，樊马义被审查，他不服气，说：“我（在水院）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上级指示办的，错了首先由上级负责。”“按你们（上级）的要求，造反派会一个不剩，我在水院还留了几个。”^②

武汉锅炉厂军宣队“把历次运动中以各种方式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右、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又来一次大清查。他们把职工划分为几类：一种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一种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或者直系亲属有‘关、管、杀’的，再者是所谓本人犯有严重错误的。动辄批判这个，斗争那个，还私设公堂，隔离看守。霎时间全厂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人心惶惶。在这种高压、紧张、恐怖的态势下，武锅又死人了！”两名工人自杀，一名工人失踪，三人都不属“八种人”^③。

湖北大学工军宣队在清队中把凡是在1949年前有职业的党内外教工、干部都作为怀疑对象，军人统一指挥，组织若干大型专案班子逐一排队，搞内查外调专案。每个专班有军人亲自掌控，要求专班人员政治上必须可靠，办事能力强，互相间不得交流专案对象情况，对外绝对保密等等。清队中副校长林山卧轨自杀，驻校工宣队竟无一字交待^④。

1968年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数万人开进清华大学，宣传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中发[68]135号）。文件开头引用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是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战略意义”。文件指出，首先需要进行的工作是促进两派群众组织联合，制止武斗。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说：“工人宣传队要有

① 夏家保《蝉鸣录——八十回眸》第274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507—508、548页。

③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62—163页。

④ 参见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

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此后，各上层建筑单位也派驻了工军宣队。

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中央的这两个举措很快为湖北当权者用作清算造反派组织的利器，造反派受到几乎是摧毁性的打击。

在武汉地区，清队始于1968年6月，工宣队产生于当年8月，清队早于工军宣队进驻。但从实际进展来看，清队的主导者是进驻学校及事业单位的工军宣队和进驻工厂的军宣队、军代表，在工宣队、军宣队进校进厂后，清队才得以按湖北当局的意旨全面推行。

第一节 工宣队进校，学生退出文革舞台

8月27日，武汉地区第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千多人进驻武汉钢铁学院。9月7日，省、市革委会举行工宣队授旗大会，第二批工宣队陆续进驻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农学院等大专院校。至年底，工宣队进驻了全市23所大专院校，80所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所有的小学。1968年全市中学在校教师8万余人，工宣队员达5万余人，占中学教师总数的70%^①。同期，市郊各公社派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农村学校。至1969年3月，共5批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湖北省直和武汉市直机关，中央在汉单位，各工矿和文艺、新闻出版、科研设计、卫生等上层建筑各单位^②。1969年3月11日开始，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省、市财贸系统^③。

工宣队由省市革委会派出，省市革委会掌权的是军方。在省市革委会任职的群众组织代表没有获得实际权力，包括话语权，重大举措出台前毫不知情，在组建、派出、指挥工宣队上同样如此。

当时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杨道远说：在“省革委会工作的那段时间，

^①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35页。

^② 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58页。

^③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38页。



1968年9月7日，省市革委会为武汉工人宣传队授旗（载次日湖北日报）；1968年11月18日，省市革委会及武汉部队负责人欢送武汉第三批工宣队（载次日湖北日报）

明显感到那里的工作模式，都是由曾思玉、刘丰、张体学这三个人在背后决定的。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通过我们，但是我们做一点小事则一定得通过他们。比如，往学校和工厂派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已经私下决定了，而且工宣队都训练了很长时间，马上就要派下去了，才在省革委会开会宣布。请注意，是宣布，不是讨论。这样的重大事情都是他们预先设计好了的，人也训练好了，我们根本参与不了意见。而且，所有参加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人选，都不征求我们的意见。直到这些工宣队、军宣队下去之后，按照他们的意旨干的许多事都没有向我们通报，我们只是从基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那里听到一些反映。”^①

学校工宣队的上级领导机构为省文教战线工宣队指挥部，正副指挥长均为军方人员，各工宣队的指挥长没有一个是工人，都是军人。（工宣队虽然由军人主导，一般还是自称和被称为“工宣队”。）初期的工宣队员多为造反派工人，逐渐被保守派成员或有保守倾向的人员取代。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宣队9月23日进驻，队员来自武昌铸钢厂、武昌车辆厂，多是造反派工人，任副指挥长的夏胜阶是铸钢厂的造反派，另一副指挥长葛台鑫是武昌车辆厂的中层干部，同情造反派。1969年9月，反复旧运动遭中央批评后，水院工宣队队员全部换成了来自国棉三厂、青山热电厂的保守派工人。

9月6日，湖北省革委会作出《关于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组织问题的决议》，规定所有群众组织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40页。



1968年9月23日，华工师生欢迎军工宣队进驻（刘俭提供）

要立即铲平“山头”，实现归口大联合，所有群众组织的总部、分部应立即撤销，停止活动，所属人员应立即返回单位生产或上课。二司、三新、三司革联、中学红联等学生组织纷纷“倒旗”，造反派学生同时被工宣队严格管控，进入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学生代表失去了支撑的力量。随着1967年底、1968年6月六一级和六二、六三级大学生分别开始毕业分配，1968年11月中学生开始上山下乡，学生运动彻底退出了武汉文革舞台。

对于工宣队起的作用，杨道远认为“工宣队实际上成了当权派对付造反派最方便的工具”^①。全过程见证了本校工宣队始末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干部张建成归纳为：“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谓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东西，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教育干部等等。”^②

军宣队、军代表1974年上半年全部撤离。根据邓小平1977年9月“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的指示，同年11月6日中共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49页。

^②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28页。

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宏大目标之一，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在湖北由反对文化革命的当权者主导，其工作方向背离了毛泽东、党中央的初衷。

一、工宣队在大专院校

工军宣队进校后普遍使用的口号是：捅“马蜂窝”^①，捉“马蜂王”。“马蜂窝”指造反派占优势的革委会，“马蜂王”指三结合的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马蜂王”失去在革委会中的权力，和造反派的骨干分子——“马蜂”一起，进入各类学习班受审查，很多学校把这些造反派和“八种人”关在一起。学习班里受审查者被称为“对象”，学习班的工作人员称为“动力”^②，“动力”一般由保守派成员担任。大专院校的师生一般是拉到农村搞“斗批改”，结合清队、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一打三反，天天开会学习，造反派成员几乎是人人过关作检讨，“错误严重”“态度不好”的则被单独关押。

工宣队进校立即改变了原有的组织系统，实行军事化编制和半军事化管理。在大专院校，一般是系改称大队，系下面的年级、班级改称连、排，一切权力归工宣队，此前造反派占主导地位的院校革委会成了工宣队指挥下的办事机构。

9月23日，工军宣队进驻湖北大学，指挥长在当晚的大会上宣布：“今后革委会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开展事务性的工作”^③。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宣队取代革委会行使权力，革委会学生委员一律回班，原不是机关人员的教职工工委员一律回原单位。

“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忠字舞”、“语录操”是军宣队带进校园的，同时社会上也开始形成风气。

^①“马蜂窝”一词出自1968年8月29日人民日报转载的上海《工人造反派》第155期社论《马蜂窝就是要捅》，这篇社论将不搞斗批改搞武斗的“老大难”单位称为“马蜂窝”。

^②对象、动力：1968年下半年以后，当局以各种名目给造反派办学习班（实为变相监狱），进入学习班受审查的造反派称之为“对象”，学习班的工作人员称“动力”。这两个称呼出自当时流传的林彪的一段话：“把自己既看作是革命的动力，又看作是革命的对象”。九一三事件后“动力”改称“骨干”，“对象”的称呼不变，一直沿用到1976年10月后的“揭批查”运动。

^③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25页。

湖北大学财会系六五级学生彭明诚回忆：

瞬时之间，大礼堂各个进出口贴上了毛泽东各种姿势的画像，画像正下端剪一个大大的红色“忠”字，围绕画像两边贴满黄纸绿纸做的葵花。各学生宿舍也无不按此形式布置。与此同时，全校开始搞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跳“忠字舞”、做“语录操”活动。

“早请示、晚汇报”……我们学校是这样落实的：早饭时各班排队上食堂，在食堂门口，在驻班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齐刷刷地把随身携带的“语录本”举过头顶，先敬祝“四个伟大”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高喊“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工宣队员根据形势需要，指定几段语录大家齐声朗读，然后解散、吃饭。“晚汇报”是睡觉前男、女生各自在自己寝室进行。我们班四个寝室的男生集合在“头”所在的寝室，“头”带着大家例行一套早上的举动，然后解散。开始我们搞时还十分慎重，时间一长，也就松懈了，甚至变味了。有一次，李祥瑞同学因上厕所迟到了，“头”正儿八经地叫他“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李祥瑞规规矩矩地正对着毛画像作低头认罪状时，“头”竟和几个同学一拥而上，要解他的裤子叫他“脱裤子割尾巴”。“忠字舞”是以李劫夫创作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为伴奏曲，编排出舞蹈动作，要求师生员工都要跳。我们年轻人学得快一点，年龄大的老师教授可就惨了。有一次我和李玉华远远观看他们手忙脚乱、狼狈不堪练习舞蹈的样子，忍不住说了句“群魔乱舞”，李玉华作势要去“举报”我。“语录操”是把毛的若干条语录比如“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依照神似或形似，编成一套八节的广播体操每天做^①。

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六四级学生陈厚燃、夏宜凉回忆：1968年9月工宣队进校后，校、系主要领导都由军官担任，他们把“三忠于四无限”的种种形式带进华工：

“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绣毛主席像，在教室、教研室、办公楼的玻璃窗或墙壁上贴满剪纸的“忠字”，绘满了毛主席像或以向日葵作为衬底书写的“最高指示”。

工宣队政工组印发的“早请示晚汇报程序”中的“早请示程序”回忆

^①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

如下：

“领：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众：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领：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

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齐唱《东方红》。

领：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

众：“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您，永远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永远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辈子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坚决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领：下面学习最高指示。

选读毛主席语录。

领：最高指示暂时学到这里。

众：牢记毛主席教导，坚决照办^①。

二、老五届大学生的毕业分配

1967年底六一级大学生毕业分配，1968年6月至11月六二、六三级大学生毕业分配，少数直接分配到工作单位，大多数安排到农场、农村锻炼，一两年后再到单位。当时各高校革委会中的造反派成员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他们中很多人带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水院六一级学生王文忠时为院革委会常委、院毕业生分配办公室主任，武汉市人，他主动要求去新疆，带动了一批人去新疆工作。华中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六二级学生王富山，1967年8月结婚，爱人在老家河南镇平农村卫生所工作，1968年5月儿子出生。1968年7月王富山任院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组长，当时曾、刘已同意他留校工作。王富山主动要求去新疆塔城，张体学得知后说这是一个好典型，并在华工举行的一个大会上，讲话赞扬王富山的举动。因王富山带头，“全校难以落实的到新疆、内蒙去的近20个名额，很快就落实了。”^②

^① 陈厚燃、夏宜凉《回忆华工文革》（未刊稿，2019年）。

^② 王富山《我的简历》（2016年，未刊稿）。



《新华工》报编辑部成员学习1968年8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纪念毛主席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刘俭提供）

华工无线电系革委会委员、六二级学生朱启贵主持本大班学生的毕业分配，他和女朋友（同班同学）主动要求去内蒙古，“受到同学们的赞扬”，“直到2010年，几十年没有见面的二班同学还念念不忘，说我们选择去内蒙是如何成全了他，非常感谢。”^①

1970年7月六四、六五级的分配，是直接分到工作单位。湖北省委决定将华工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六四级学生郭保安留在武汉，郭保安对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信俊杰说：“我在总理面前保证毕业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留在武汉我有何面目再见总理？”工宣队把他分到新乡飞机发动机制造厂，他也拒绝，要求去新疆、西藏。他说，王富山已经去了新疆，我最好去西藏。最后郭保安去了安徽铜陵农村的一个农机修配站。华工革委会常委、六四级学生刘玉民对工宣队说，哪个地方偏远，你就把我分到那个地方。后来刘玉民分配到甘肃天水。张立国说，1970年这次分配，华工造反派学生分到云贵川偏远山区的超过800人。

^① 朱启贵《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电子版，2009年）。

1970年武汉地区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就完全由工宣队掌控了。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军、工宣队决定四十个学生留校，至于条件，按樊马义指挥长的说法就是：绝对听话、绝对服从、绝对驯服，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造反派。……关于学生的毕业鉴定，军、工宣队有统一的安排，分为九等标准：1. 对毛主席有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2. 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3. 对毛主席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4. 对毛主席有无产阶级感情；5. 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6. 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7.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8.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政治错误；9.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政治错误。”^①后三等标准是针对造反派学生的。

“老五届”（六一届至六五届）大学生的分配原则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工厂、边疆、基层），无数县、乡的小工厂、学校、医院、其他事业单位，第一次出现大学生，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老五届”大学生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武汉地区造反派大学生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材料，随报到的学生一起进入工作单位，学校工宣队和工宣队撤离后的学校当局获得的新材料也会及时寄去。在新单位，其数量难以统计的造反派大学生继续在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被整治；1977年开始的“揭批查”、1982年“清理三种人”、1983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记录在案”，这些材料都起到重要作用。分配到单位不久，水院工宣队寄去有关五一六、北决扬材料，六三级学生萧名珍被判刑入狱，六一级学生陆植钧不堪逼供批斗，跳楼自杀。1971年，华工革委会委员、六四级学生张建华分配到云南已经一年，华工工宣队给云南省委组织部寄去张的材料，张建华被打成了“云南省四个五一六分子之一”。1983年至1986年张建华多次调动、提拔，都因“记录在案”受阻。1986年6月，云南铁路建设公司党委书记周学诗对张建华说：“中央最近有文件，凡是‘记录在案’的人和‘三种人’一样，一律不能进领导班子。”同年11月张建华不得不调离^②。八十年代末，水院还在给六五级学生伍必慧所在单位送材料。

^① 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第555—556页。

^② 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三十章“魔咒‘记录在案’”。

三、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

1968年10月15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武汉地区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早在1968年初，很多中学都有学生（基本是造反派）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新农村突击队”之类的组织，开座谈会，写大字报，表示与工农相结合的决心，表达对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理解。3月，三十三中高中生肖铁人改名肖务农，和多所学校的几十名中学生组成“五七共大武汉工程队”（简称“五七工程队”），他拖着一条因小儿麻痹症而残疾的腿，到武汉三镇各中学串连志同道合者，共同向省市革委会要求下农村干革命。3月，武汉一中“神农架突击队”十余人（包



括十二中二人、墨水湖中学二人）到神农架林区调查，打算了解情况后提出方案，向市革委会写报告，要求到艰苦的神农架务农。他们沿着刚开始修建的公路，从房县步行到兴山县，沿途走访农户和筑路工程队，历时近一月。一中有学生提出到农村后如何继续学习、提高文化水平的问题，他们在3月份组织了调查组，带着这个问题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调查。其后不久，一中“新农村突击队”成立，成员分赴神农架、襄阳地区调查。赴襄阳地区调查组公布了题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的调查报告。10月18日一中“新农村突击队”贴出“决心书”，申请上山下乡，有几十人签名。10月底来自一中、二十中、汉阳铁中、六角亭中

学的4个学生，自发聚在一起商量，打算调查此前下乡知识青年安置情况，“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提供决策依据”。征得武汉红代会负责人同意，四人组成调查组，持省革委会介绍信，往襄阳县、房县调查。这次调查，他们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心情沉重，“一致认为中央和各地应该重视解决这些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知青也应该有上山下乡以后过艰苦生活的精神准备”^①。

11月25日，武汉市首批万余名中学毕业生离开武汉，上山下乡。12月22日，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学校工宣队、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加大了动员力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高潮。到1969年上半年，中学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高、初中生绝大部分去农村插队落户，这6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

中学生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踊跃报名下乡，其中有市革委会两名中学生常委——省实验中学的柳英发和市一中的陈文汉。当时市革委会主任方铭主动提出安排柳英发参军，柳英发拒绝了，坚决要求下农村^②。省实验中学革委会副主任王某患小儿麻痹症，市一中肖某大腿因枪伤粉碎性骨折，按政策可以留城，仍然坚决要求，下到农村。首先报名下乡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工宣队认为问题基本搞清楚才被允许离校，下乡后经历一波又一波的审查，长期被排除在招工招生之外，在农村的时间大多超过6年，有的达8年。武汉三中造反派头头谢保安接受工宣队近半年的审查才被允许下乡，谢在农村一直通不过招工的政治审查，7年后转至其他地区的农村生产队才辗转回城。

省委、市委、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领导干部的“老三届”子女很多没有下乡。据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简报第九期（军队干部子女上山下乡情况反映）》：“湖北省军区机关干部子女，应下一百八十一人，实下四人，到农村不久，两人参军，一人进厂。该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以上干部子女共五十九人，无一人下乡。”1969年5月在北京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时，群众代表向周恩来反映，领导干部子女不下农村，开后门去当兵，我们有统计表。周恩来说：参军也不是什么坏事。

^① 钟逸《一篇迟到四十年的知青安置情况调查访问记》（网文，2008年）。

^②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30页。



文革期间，湖北省有九十余万知青上山下乡（湖北省委党史办公室资料）

杨道远 1968年2月至1969年9月在省革委会工作，接触过知青工作。他回忆：

那些身居高位的当权派对知青不是从政治上关心，从生活上照顾，相反在招工的时候，他们对一些出身不好、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尤其文革中当过造反派的知青带有明显的歧视；而他们自己的子女都不下乡，都是通过不同的渠道直接去参军，去招工。到了后来他们干脆改变选拔人才的标准，根本不考虑什么得到工人农民拥护，也不需要什么实践经验了，他们从根本上颠覆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这样一来，下乡的知青就很难再有什么热情了，他们的崇高理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被打得粉碎，一种幻灭感、受骗感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这种被扭曲了的感情完全是由那些高官们一手造成的。据我所知曾思玉、张体学、韩宁夫、夏世厚这些人的孩子都没有下过乡，都是直接去参军或招工。既然你

们的孩子都不去下乡，你还有什么资格去侈谈下乡光荣，侈谈什么扎根农村干革命？下乡知青怎么还会相信这种虚假的说教呢！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就这样毁在这层人的手里^①。

“老三届”在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努力改造思想感情，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完全融入农村的经济生活。同时在文体活动、小学教育、合作医疗等方面，发挥特长，为农民服务。下乡期间，大多数人消磨了政治热情，脱离了文革运动。

1974年6月，武汉市委决定从本年秋季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行按父母所在系统下放、厂社挂钩方式^②。此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父母单位派出的带队干部管理，有父母单位的人力财力支持，他们在农村的经历与老三届知青大不一样。

1980年8月，武汉市委发出《全市知识青年工作会议纪要》，决定“从今年起，原则上以区、局和大型厂矿企业为单位，凡有安排能力的，不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③1976年10月以后，知识青年下乡被当局视为就业安置问题，城市具备了“安排能力”，知识青年下乡就没有必要了。

第二节 清理阶级队伍：清算造反派

1968年6月10日至21日，湖北省革委会召开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座谈会，6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和武汉警备区召开“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现场会议，7月1日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座谈会^④。此后，“清理阶级队伍”在武汉市所有单位开展。

整党建党和清理阶级队伍一样，也是“斗、批、改”的内容之一。1967年10月毛泽东提出整党建党的纲领。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中说：整党建党应该“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其后，中央文件和两报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37页。

②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71页。

③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96页。

④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57页。

一刊社论多次明确说到要发展优秀的造反派入党^①。武汉市的整党建党工作于1968年10月开始，在全市原有的6766个党支部中选择382个进行试点。1969年10月，市革委会和警备区制定了《关于全市整党建党工作规划》，“安排尚未开展整党建党的单位大体分三批交叉进行，至次年5月底基本完成。这一规划实际拖延至1971年底才基本完成。”^②1968年10月至1971年底，正值造反派遭受严厉整肃期间，在曾、刘主导下，整党建党的基本内容——在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基层支部，吸收“新鲜血液”、发展新党员，基本上将造反派排除在外。对很多造反派中的党员以不予恢复组织生活、预备党员不予转正作为惩治手段，新华工成员陈定方1966年1月入党，1974年才得以转正。造反派中的党员进入各级党的领导机构，造反派入党，更是没有可能。

杨道远回忆：

1968年12月湖北省召开党代会，会议期间任爱生写了个报告，内容分为二十一条，着重阐述正确对待造反派的问题，造反派的纳新问题，特别是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任爱生的意见就是要党代会首先解决，以便造反派能够参加整党建党工作。任爱生的二十一条给我看过，我当然很支持，可是曾思玉、张体学反对，不但不能够作为省党代会的决定写入文件，而且把任的意见看作错误思想代表来批判，结果不但造反派党员参加不了党委，任爱生这个老红军也被排斥在党委会之外^③。

顾建党的组织生活，是经周恩来亲自过问，1973年9月底才得以恢复^④，此时距官方宣布整党建党基本完成，已经过去近两年了。九大期间毛泽东问曾思玉：朱鸿霞来了没有？曾答：他不是党员，他入党群众通不过^⑤。直到文革结束，朱鸿霞也没能入党。

武汉地区的清队持续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了了之，“九

①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的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1968年9月29日）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第一批党员，一定要坚持高标准，必须是真正过得硬的、革命群众信得过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贡献的优秀的造反派。”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68年10月14日）说：“‘吸收新鲜血液’，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任务：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②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41页。

③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29页。

④ 参见顾建党《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86节“总理关注我的组织生活”。

⑤ 九大代表沈复礼生前多次对柳英发等谈及此事。

大”后清队的口号还是提，但都是结合解决反复旧问题、一打三反、两清一批进行，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就基本不提了。

按中央的政策规定，“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斗批改”阶段中的一项工作，清查对象为全社会中的“八种人”，并没有特指造反派中的“八种人”，也不是要整肃造反派。但在这个过程中造反派成为主要清查、清洗对象。1968年12月，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化民根据曾思玉的指示，布置军区三办整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彭勋、郭保安的材料^①。

与派驻学校的工宣队相同，派驻工矿企业的军宣队（军代表）进驻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迅速剥夺已经建立的各级革委会的权力，捅“马蜂窝”捉“马蜂王”，斗争矛头直指曾短暂获得权力的以造反派为主体的革委会，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首当其冲。

铁道部汉阳枕木防腐厂工总负责人吴元么是全市第一个被捉的“马蜂王”，依据是未经查实的绯闻。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工总负责人杨继高的主要罪名是“利用职务之便，大量印刷派性报纸，丧心病狂地冲击印刷毛主席红宝书的任务”。湖北省柴油机厂工总负责人陈汉寿的罪名是“纵容手下对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武汉重型机床厂工总负责人祝孝先的罪名是“挑动武斗，坏人当道，好人受气，人称祝霸天”。武汉电信局工总负责人方景清、刘闯的罪名是“私设电台，窃取国家机密，破坏通讯”^②。

造反派的一般成员也被清理。湖北柴油机厂女工、工总小头头熊彩凤，生活困难，用群众组织的袖章做内裤，袖章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油漆刮掉印迹还在，洗澡时被专案组成员注意到了，开全厂大会宣布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反复旧时经张立国与警司交涉被释放，但还是被开除厂籍，其丈夫精神失常^③。

1968年8月15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冶金工作会议，9月5日有大会发言批判武钢造反派主要头头破坏大联合、搞武斗等“恶行”，会后九一三头头张克勤、胡启生、杨连成三人即被逮捕。这是七二〇后第一次逮捕武汉造反派头头。在同时召开的全国国防工业工作会议上，“孔庆德在会上告了胡厚民一状，说武船革委会迟迟不能成立与他插手有关”。于是“胡

^① 参见1974年春湖北当局主办的造反派头头座谈会上武汉军区三办负责人马兆昆的发言，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②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65页。

^③ 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张立国的记录。

厚民从武汉被押至八一五会议作为批斗的靶子”^①。这是七二〇事件后胡厚民长期、多次被整肃的开始。

武钢工人陈祖坤在回忆录中写道：军代表控制的武钢革委会一成立，就开始整造反派和同情造反派的干部群众，致死六十二条人命。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在他们眼里手下，就是清理造反派。耐火材料厂工人诸少武被当作“阶级敌人”打死。武钢业大有一个烧锅炉的老工人说了一句“林彪家里是地主”，被关押批斗，上吊自杀。大冶铁矿一造反派头头被打死在井下。乌龙泉矿一位刚转业的军人因支持造反派被打死^②。

以军代表为首的工作组进驻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后，排挤和打击造反组织“新一冶”负责人，其头号领导人曹承义被定性为“坏头头”“反革命”，强制送往湖北应山的部队营房办“五不准学习班”。曹承义在回忆录中写道：“军代表把我和所谓的汉奸、特务、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编进了一个班，关押起来，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③

军宣队、军代表进驻工人总部“四大金刚”之一的武汉锅炉厂，“帮助”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据厂革委会成员王光照回忆：他们一进厂就掌控了厂革委会。为首的军代表任厂革委会主任，各职能部门一把手全换成军人。表面上革委会在正常运转，实际上是军宣队在操作。群众代表被架空了，干部也没多大发言权，举凡大小厂务及运动，全由军宣队说了算。清理阶级队伍，首先整治造反派^④。

清队的方式是办学习班、设立专案组，搞“逼、供、信”，审讯人员对被审人施以肉刑、变相肉刑或其他威胁手段，逼取口供，受审人经不起肉刑或精神折磨而随意乱供，而审讯人则据以定案。

大中学校中的清队主要在教职员中进行，造反派是清队的重点对象。工宣队采取查三代的做法，凡出身、个人历史、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就会被戴上“×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残渣余孽”“漏网右派”之类的帽子，让造反派群众抬不起头来，“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武汉三中教师夏家宝，造反派普通成员，工宣队指挥长对他说：“‘文化革命’与当初‘反右’一样，先让你们牛鬼蛇神表演，然后一个个收拾，只

①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37页。

② 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55页。

③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15页。

④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57—158、164页。

是这次‘表演’时间长，‘清队’只是收网的第一回合，还有第二、第三回合，想溜是溜不掉的。”“（汉阳区）‘支左’（办公室）交给任务，一定要清查出你们想篡夺汉阳党、政、财、文大权的后台，这后台与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关系。”^①夏家宝交不出“后台”，又不认罪，1968年12月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公开拘捕，判刑三年，刑满后不许回城，在劳改农场一直待到1979年。

武汉市直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清队，主要是在干部下放劳动的“斗批改大队”（后更名为“五七干校”）里进行的。1968年10月21日，市直机关干部4500人（约占市直机关干部总数的75%）按班、排、连组成6个大队到几个农场和郊区搞“斗、批、改”，开始了在机关干部中“全面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至12月止，全市城区又有2492人下农场搞“斗、批、改”。市革委会在12月26日写给省革委会的报告中，赞扬机关干部“下去便打响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在短短的一个月，便清出了所谓“坏人”700多人，占下放干部总数的13.5%^②。1969年春节后，军宣队进入斗批改大队，市直机关造反派一号头头魏绳武的感觉是——“此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被改造者”。“我在‘牛棚’的处境，大概与社会上三钢、三新、三司革联头头们的遭遇，是芦席滚到垫子上——相差不多，正应了社会上流传的那几句话：‘新生的红色政权是穿新鞋，走老路’，‘结合到新政权的新生力量是案头上的花瓶——摆设’。”

1969年2月22日，原武汉市直机关、各区（局）、公司“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召开有2万余人参加的“清理阶级队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进一步施加政治压力，使“逼、供、信”升级^③。

1968年12月8日，武汉军区、省革委会派出上百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省革委会常委、长办革委会副主任顾建棠事前一无所知。他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工军宣队进驻后的所作所为：

工（军）宣队根本不把新生红色政权——长办革委会放在眼里，就像全国解放之初接管敌伪机关那样。郭指挥长不听我们半点汇报，12月9日，气势汹汹地召集长办革委会及在汉院、校、处、所、室、站、队革委会成

^① 夏家宝《蝉鸣录——八十回眸》第274页。

^②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36页。

^③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59页。

员开会宣布：1.革委会成员都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革委会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原单位，接受再教育。就这样，经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的三结合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革命委员会，按当时他们的说法，已经“一锅端”了。

12月10日，长办革委会（除郭志伟外）全体成员和二、三级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长办革委会各职能部门负责人，都被送到武昌宝通寺内洪山宝塔下的高炮团驻地，集中办学习班，不准回家。如家有要事，经请假批准方可回去，但必须按时归队。同时还在长江科学院、长江工程大学、勘测水文处和规划设计处等二级单位开办学习班。在学习班内，各级革委会成员、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和造反派骨干都成为清队运动的对象，工（军）宣队队员是“动力”。采取小会揭，大会批的方式，什么武斗打人，什么抢枪乱军，什么揪“武老杨”就是反解放军……在学习班外，工（军）宣队以派划线，以原百万雄师成员以及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为“动力”，控诉文化大革命，把各级革委会打成大大小小的“马蜂窝”，把革委会的主要成员打成“马蜂王”，并号召狠捅“马蜂窝”，活捉“马蜂王”。

在学习班里搞人人过关，郭指挥长要我们全体学员“批派性、斗私心、挖野心”，搞背靠背揭发，搞斗私批修、活学活用讲用会，总之要我们自己把自己搞臭、搞垮。

工（军）宣队的种种作为，把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各级革委会搞垮，各级革委会成员被诬陷，职权全被夺走，文革积极分子全被整肃，而原先已经解体的反文革保守派被重新集结，借尸还魂，重新掀起反文革恶浪。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对工军宣队由相信到怀疑、反感、埋怨，再到愤怒，甚至有些原站错队的人也不甚赞同工军宣队这种做法。

1969年3月27日下午，我和张炳华、王志鹤、郑成炎三人到军区三办反映长办的情况，徐健接待了我们。我向他讲了工（军）宣队进驻长办后，出现了叫人想不通的几个问题：

1.为什么对革委会不是补台，而是拆台？长办革委会是国务院授权武汉军区党委批准的新生红色政权，成立后的工作多次得到省革委会领导的肯定。工（军）宣队一进长办大门，不作任何调查研究，把我们三级革委会成员和职能部门负责人都弄到洪山上办学习班，将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都赶回原单位，革委会剩下的只有一块牌子，名存实亡。

2. 为什么不领导学习班搞“斗、批、改”？在学习班里，工（军）宣队不引导学员们去斗走资派、批刘邓修正主义路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要学员批自己的所谓派性，斗自己的所谓私心，挖自己的所谓野心。许多人按要求认了错，作了深刻检讨，还是不能过关，硬是要学员们承认“造反为当官”、“夺权有野心”，硬是要你自己把自己搞臭。

3. 为什么纵容支持别有用心的人造谣？在学习班外的长办大院内，原百万雄师的人造谣：“长办革委会是没有批准的冒牌货”，“是一派掌权”，“是法西斯专政”等，进而诬陷革委会主任郭志伟是叛徒，常委王秀林是叛徒，常委王有秋是假党员、特嫌，委员李镇南是潜伏特务。工（军）宣队明知这是造谣诬陷，却不表态而默认。

4. 为什么把革委会打成“马蜂窝”？在工（军）宣队支持下，大会批，小会揭，大字报、大喇叭一起上，把三级革委会都打成“马蜂窝”，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都成了“马蜂王”。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头，都被炮轰、被批判、被贴大字报，在名字上打红叉叉，搞得造反派人人自危。只要造反派之间一接触，就扣上“搞派性”、“搞小动作”、“反清队”等帽子。

5. 为什么以派划线搞“清队”？工（军）宣队进来之前，长办革委会已有专案组，其成员70%是造反派，30%是原保守派。工（军）宣队一进来就接管了专案组，把造反派全部换成铁杆保守派。对专案组里的保守派，他们认为不可信的也换了下来。长办的造反派一下都成了清队对象。同时，不知奉何人之命，让林一山历史调查组停摆了。“清队”本应当让95%以上的人高兴，而工（军）宣队使长办70%以上的人不高兴。

6. 为什么对我们七二〇后所犯错误揪住不放？七二〇后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参加了“揪变色龙”的活动，早在1968年6月下旬，我们先后向曾、刘首长和张体学作了检讨认了错，后来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张立国和我等都作了检查，在工（军）宣队办的洪山学习班上我一而再、再而三检查认错。长办内的武斗无论是长办联司还是别的什么人搞的，长办革委会从未支持或庇护过。在社会上，我们从未打过别人，只有别人打我们，而且我们从没有以牙还牙。我们从未指挥或唆使抢枪，向人家要枪是有的，但尽管如此，我们革委会还是承担了执行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不力的责任。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工（军）宣队为何穷追不舍^①？

^①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02—205页。

与此同时，“解放干部”加速进行，至1968年12月底，49.8%的副局级干部已恢复职位^①。至1972年9月，全市原副处长以上干部1055名，已解放1021名，占96.8%；其中除因病和年老体弱不能分配工作外，已分配工作的有788名，占应分配工作91.3%。原副局长以上干部315名，已解放298名，占94.7%；已分配工作的232名，占已解放人数的77.9%；其他年老多病的52人，待分配和进一步审查的14名。市区干部学校原有14220人，已分配工作的11376人，占原有学员总数的80%。全市24645名技术干部，1609人尚未使用。市委、市革委会表示要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②。

1968年11月召开的全省县级以上党的干部会，主题是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本应批判刘少奇，批判“二月逆流”，实际上是批斗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省革委会副主任任爱生和市革委会副主任杨春亭。

1969年1—2月，省、市委举办市三代会常委学习班，学习班以揭批胡厚民为主要内容，同时宣布“解放”辛甫。辛甫是市委组织部部长，陈再道时期任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政委，七二〇前公开“亮相”支持百万雄师，为其出谋划策，被造反派称为“百万雄师黑高参”，魏绳武称其“双手沾满武汉造反派鲜血”^③。除了献计献策，辛甫还身先士卒，“在市委上班时”“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动员市委干部为百万雄师捐款、搬石头修工事^④。他被“解放”，激起造反派群众的极大反感。

工军宣队进驻上层建筑、主持清理阶级队伍，在武汉地区最直接、最显著的效果，就是造反派遭到清算，队伍基本被摧毁，在单位革委会中的权力被剥夺。除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少数造反派头头外，各厂矿、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中的造反派头头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审查、追究，被批斗甚至被抓捕，造反组织中的群众也多受打压。在省市革委会任职的造反派头头本就处于权力核心之外，造反派基层权力丧失和群众基础解体，这些头头更加陷入无所作为任人摆布的境地。

以清队名义清算造反派，在这个群体中激发出强烈的愤怒，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

^① 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335页。

^②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1978）》第569—570页。

^③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37页。

^④ 参见《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载红司（新华工）报“批陈专刊”（1967年8月1日）。

第二十一章 “反复旧”——最后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第一节 反复旧运动的兴起

从1969年3月16日武汉锅炉厂贴出第一张反复旧大字报，到同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否定武汉反复旧的28号文件，武汉地区大规模的反复旧群众运动历时两个月。

所谓“反复旧”，是造反派力图遏止“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不利趋势，他们经历过1966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五十天”和1967年“二月逆流”，亲身体会到只有自己起来抗争才能解放自己。而在武汉反复旧期间，正值中共“九大”于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这个运动被中央批评为不顾大局，干扰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反复旧以失败告终。

武汉地区的文革运动，以造反派的工人和学生紧密结合著称于全国，曾经受到周恩来的赞扬。这次反复旧，是工人造反派第一次单独面对强大的当权派。反复旧是武汉文革期间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此后以工人造反派为主的群众运动也退出了文革舞台。

1969年3月16日深夜，武汉锅炉厂造反派头头王光照在厂前广场贴出大字报《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标题是引用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里的一句话。王光照在回忆录中叙述了这张三千多字的大字报内容：概述了清队以来，军代表、军宣队大捅马蜂窝、更新革委会、打压造反派的严峻事实，进而指出他们这种压一派、拉一派，重新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对立和分裂，就是“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的翻版，就是资反路线死灰复燃。呼吁造反派振奋精神，发扬“最能战斗”的传统，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王光照强调说他写这份大字报，纯属有感于两年前3月17日工总各级头头被逮捕，没有同人商量，没有“阴谋策划”，更扯不上“有组织的预谋”^①。

大字报引起全厂轰动，议论纷纷，厂前广场随着出现大标语：武锅文革成果不容诋毁；坚持“十六条”大方向，以战斗成果向党的九大献礼。

^①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190—191页。

外单位很多人来到武锅观看、抄录大字报，围成一团团交流、议论、辩论。这张大字报迅速向街头、各单位扩散，遍布全市、酝酿已久的愤怒情绪瞬间爆发。武重造反派随即在街头贴出反复旧的大标语、口号报。

武汉反复旧运动兴起并不偶然，“反复旧”也不是武汉首倡。1968年10月14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一大段关于“反对复旧”的论述；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王效禹1968年底在山东发动反复旧运动，其依据就是这段论述^①。1968年8、9月，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有关反对复旧的一个讲话，经吴焱金推荐、批准，刊登在市工代会主办的《武汉工人》报上，很快在造反派中流传并引起共鸣。

胡厚民是武汉反复旧运动的推手和主要组织者。1969年1月底武昌造船厂保守派和武汉警司军人来胡厚民家抓胡，胡脱逃外出，其间去了山东，没能找到王效禹，见到了紧跟王效禹的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了解了山东反复旧的过程。当年2月20日，胡厚民回到武汉，即与夏邦银、朱鸿霞、郭洪斌、田国汉等工人总部头头串连，决定联合新派一起发动反复旧。胡厚民回汉不久住进医院，他委托夏邦银、朱鸿霞等多次看望吴焱金，转达他的问候，对钢派搞“以我为核心”、伤害新派同志的感情表示歉意，希望两派联合起来搞反复旧。3月中下旬，胡厚民约见吴焱金，说反复旧不搞不行，两派应该联合起来搞，提出由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三人出面牵头，以显示武汉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吴焱金先是犹豫，担心九大前搞反复旧会有风险，经夏、朱、胡反复做工作，吴焱金“想到造反派毕竟是命运相连的”，于是答应了。

群众组织已经解散，胡厚民等打算以市工代会的名义开展反复旧。胡厚民以武汉地区工代会主任的身份，在武汉化工厂召集了有工代会常委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参加的武汉市工代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②，统一认识，决定发动反复旧运动，由工代会出面领导。在会上胡厚民说：“武汉的造反派有一个特点，要就不动，一动就大动，动起来就势不可挡。”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18—119页：“我们（按：吴焱金、胡厚民）问王效禹：‘您是济南军区政委、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你们在山东搞反复旧，中央到底给您交过什么底？’王效禹说：‘没得底，就是看到《红旗》杂志第四期上面有一句话。’”

^② 1968年3月11日武汉工代会第三次核心组扩大会议决定：免去朱鸿霞工代会主任职务，任由副主任胡厚民担任，朱鸿霞任常委；免去李想玉、吴焱金副主任职务，二人均任常委。

这次会议后，武汉三镇街头出现大量反复旧的大字报、大标语。

4月1日九大开幕，九大期间是否继续进行反复旧，造反派头头有不同意见。省革委会副主任杨道远明确反对在此期间“大张旗鼓”地搞，他主张在省市革委会中“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①。市革委会常委郭保安“认为反复旧没有道理，从开始就反对”。他认为：“市革委会常委是有一定权力的，凡值班时间内发生的事情都由值班常委处理（按：省市革委会常委值班制1969年6月撤销）。我值班期间（就）处理过几件事。”“你既然在红色政权里面做事，你就要把事情做好。你不做，你出去搞派性，又说自己没权，这不好。”^②省革委会常委、长办革委会副主任顾建棠“同意反复旧，但不同意上大街搞，不同意公开搞”，“主张在内部协商解决”^③。4月5日，胡厚民召开工代会常委会议，胡厚民认为“反复旧”不仅不影响“九大”，恰恰是对九大的最好献礼。朱鸿霞、吴焱金等赞同。与会者们希望通过反复旧引起中央对武汉问题的重视，从而解决“复旧”问题。胡、朱、吴等表示作好了失败被再次打成反革命的思想准备，胡厚民说，要准备失败，争取胜利。会上决定，由朱鸿霞起草朱、李、吴三人联名的大字报。

4月8日市工代会发表宣言称：“复旧和反复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宣言提出，“基层工代会必须服从同级革委会和上级工代会的双重领导”。此后，市工代会的报纸《武汉工人》发表大量鼓动反复旧的文章。

4月10日大字报完稿，朱鸿霞没有写标题，吴焱金将文章里的一句话摘出来做标题：“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

10日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在汉口水塔贴出，钢新两派代表性人物的这篇宣言立即震动武汉三镇，转抄不计其数，很短的时间里，武汉三镇随处可见这张大字报。各企业、单位造反派群起响应，很多单位内和大街上贴出反复旧的大标语、大字报，一些单位的造反派抢了学习班整理的“黑材料”，白天上班的工人晚上举着火把走上街头游行。

吴焱金和田国汉把刊有这张大字报的《武汉工人》报拿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去印被拒绝，说是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的指示。吴焱金说：“张景禄只是个市革委会常委，我和李想玉两个市革委会副主

^①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57页。

^② 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郭保安的记录。

^③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06—207页。

任出面还不行吗？”结果还是不行。朱鸿霞对张景禄说：你不给我印，也不要紧，我嘴还可以讲。吴焱金说：你今天下午不答复，我晚上就上街讲话。吴焱金当晚果然在汉口六渡桥闹市讲演，听众数千人^①。

不同意反复旧的杨道远认为造反派走上街头是被逼出来的：“遗憾的是造反派和当权派都不接受我的意见。特别是当权派，他们大权在握，一意孤行，一心要把造反派手上的那点权力夺回去。捅马蜂窝，清理阶级队伍，加紧进行；造反派无依无靠，无路可走，只能诉诸大众了。”^②

胡厚民主张“声势还要搞大，越大越好”。朱、李、吴与丁家显、王光照等连续在武汉三镇街头和一些单位举行反复旧报告会。王光照记忆中他参加并发言的报告会超过60场。

陈祖坤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与周岳来、王秀章、郑汉琛等人投入武钢反复旧，……我们夜以继日收集材料，写了许多大字报，每周两次在红钢城举行报告会。重新走上红钢城这片昔日的战场，心情和1967年6月17日那个夜晚一样悲壮，我们知道造反派大势已去，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干的下场。”“当时武钢下属六十多个二级单位都成立了反复旧组织，我们



① 以上6个自然段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08—111页。

②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57页。

被分头邀请到各单位如炼铁、炼钢、焦化、耐火、三轧作报告。我们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武钢的走资派重新上台后如何大整造反派，他们心不死，二月逆流还在流。”“在武钢反复旧的岁月里，同志们不分钢派新派，患难与共，不畏被开除和扣工资的威胁，日夜坚守在业大反复旧指挥部。”^①

胡厚民有个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由武锅、武重出面点火，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二步群众起来了，工代会对运动进行领导；第三步由省、市革委会领导“反复旧”。

此时龙梅生和张耀忠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计划：“现在，反复旧的火已经点了起来，群众也基本上发动起来，我们应该冷静下来，把群众运动引导到各个单位去，不提反复旧的口号，在各个单位落实政策，把失去的权夺回来，清队搞错了的要纠正。落实政策，名义上由各单位自己搞，实际由工代会统一安排。省、市革委会，工代会的常委们不要到社会上去搞，要到基层去。”胡厚民召集了一次工代会正、副主任扩大会议讨论这个计划，扩大到朱、李、吴和张耀忠、龙梅生。胡厚民说：“这个方案是右倾的，要害是要不要群众运动的问题，是支持还是否定群众运动的问题，是将反复旧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问题。造反派本来在各单位就是少数派，清理阶级队伍有的挨了整，你叫他回单位搞，根本就搞不动，其结果只能是被各个击破。”朱、李、吴等参会人员一致同意胡厚民的意见，张耀忠、龙梅生的计划被否定。胡厚民提议开一个“争取更大胜利”誓师大会，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同时显示一下造反派的力量。对胡厚民的这个提议争论了很久，不同意者认为九大期间开这样的群众大会不合适。胡厚民说：“只要群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

4月27日，反复旧誓师大会在汉口中山大道工艺大楼门前召开，十几万人到会，吴焱金主持，朱鸿霞讲话，李想玉宣读大会公告，胡厚民宣读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武汉中山大道最繁华的一段交通断绝，人山人海^②。

同日，吴焱金、李想玉等十几名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委员发表“严正声明”，不承认市革委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出的036号文件，这个文件的内容是禁止抢夺清队的专案材料。“严正声明”被大量翻印、张贴。

同日出版的《武汉工人》报刊登文章《复旧倾向的十种表现》，文章指出，复旧倾向表现为：省、市两级革委会中一大批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

^① 陈祖坤《吹尽黄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55页。

^②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14—115页。

部被打成“幕后操纵者”或“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赶出了决策层；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许多造反派被打成“阴谋家”、“野心家”、“牛鬼蛇神”；许多单位的造反派被禁止在革委会中担任职务；解放了许多“资产阶级的当权派”；那些造反派组成的有广泛影响的革委会常常受到怀疑，并且被“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或“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所取代。文章号召“颠倒被颠倒了的历史”，夺回被“资产阶级当权派篡夺了的权力”。

在胡厚民主持下，市工代会副主任胡崇元、常委杜向东等组织了“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工人宣传队总指挥部”，印制了旗帜和袖章。他们计划由这个指挥部派出并领导工宣队。



5月6日长办工宣队一位副指挥长带着一卡车工宣队员喊着“反复旧”的口号游行去省委。驻华工宣队一部分队员成立工宣队反复旧指挥部，5月15日发出请柬，邀请市工代会等单位参加17日举行的反复旧指挥部成立大会。

武汉市官方资料称，其时全市成立了反复旧组织736个，180个单位的造反派夺回了权力^①，但“三步走”计划未能继续走下去，“九大”闭幕后中央立即着手解决武汉问题了。

第二节 中央五二七指示的形成

4月29日，中央指示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组织代表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杨道远、张立国五人到北京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胡厚民主张武汉的反复旧要继续进行，动静搞得越大越是对赴京代表的支持。5月2日，中央通知胡厚民等省市革委会中常委以上的群众组织代表17人到京，胡

^①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40页。

厚民行前指派郭洪斌和方斌在汉继续指挥反复旧。胡厚民说：“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你们搞得越大，我们到中央说话越有分量。”^①

先期到达北京的五位省市革委会副主任给武汉多次发电报、写信，支持继续反复旧。杨道远把在北京收集到的毛泽东在九大上的一些讲话传回武汉，如清队有“扩大化的倾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压服一切”。胡厚民等人来京后，22人都被隔离在京西宾馆，胡厚民、吴焱金等想方设法给武汉打电话，在宾馆僻静处隔着院墙与武汉来人互通消息，递送材料。

在近一个月内，周恩来、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数次接见武汉代表，三次通宵达旦地长谈。他们听取群众组织代表发言并做记录，杨道远记得第一次接见，周恩来的记录有18页。

武汉方面：5月7日工代会、红代会联合召开纪念毛主席作出五七指示三周年群众大会，会上发表致省市革委会公开信，指责“某些主要领导人”排斥群众代表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省市革委会机构急剧膨胀，增加的人员多为保守派；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成为污蔑造反派的工具。公开信提出七项要求：所有党政干部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监督，不许打击造反派，省市主要领导应就几个月来所犯错误检讨，工代会、红代会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恢复清队中革委会里的群众代表被剥夺的权力，省市革委会必须站在反复旧的前列，工宣队必须由工代会领导。

5月11日武汉工代会召开会议，通过《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委员扩大会议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由原水院学生雷志茂起草。这个决议历数“张体学等少数同志”的复旧行为：转移斗争方向，批斗革命干部任爱生、造反派头头胡厚民；扶植保守势力；解放干部“不通过群众”；工宣队镇压造反派，夺革委会的权等。中心意思是号召各级工代会发动群众，“更深入、更广阔”地开展反复旧运动。决定“派遣‘毛泽东思想工人调查团’到省、市革命委员会和各级革命委员会，调查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的情况，审查干部和工作人员队伍，了解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并将有关情况上报中央。派遣真正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政策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上层建筑领域，加快斗、批、改的步伐。”（后来实际上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16—117页。

只向市革委会派出调查团)16日,“工人调查团”发出公告,指责市革委会“破坏一元化领导”,“搞复旧”。17日,市工代会常委、肉联工人谭光前带领“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调查市革委会的工作和干部情况,要求批斗上台后搞“复旧”的干部。5月18日武汉市革委会向市工代会发出通知,指出工代会的“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并发表公告和声明是错误的。



武汉工代会派出“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是依据1968年1月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的《武汉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条例(草案)》第一条“性质”中说:武汉工代会“是省、市革命委员会的牢固的基础,并对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各级领导实行监督”。武汉工代会筹备包括制定文件的全过程,曾、刘都是密切关注并派军人主导,最后由曾、刘批准成立。

北京方面:杨道远回忆:“5月12日晚九时,中央政治局的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接见了我们武汉来的造反派。……这次接见的时候,曾思玉、刘丰都不在

场,光是造反派。……本来我们商定了一个汇报计划,但就是不让人按计划讲,特别不让系统地长篇发言。周恩来说,我们都是会打仗的,就是要打乱你们的部署。由此想见,这些领导人心里早就已经有底了,我们的汇报已经不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依据了。参加接见的有康生、陈伯达、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没有四人帮中间的任何人。”^①杨道远、吴焱金都记得这次接见周恩来单独点了胡厚民的名,要他坐过来,并说要“向你请教”(“领教你”)。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60—261页。

吴焱金回忆说，“胡厚民拿出材料开始汇报武汉的‘复旧’情况，我现在能记得的就是他提到了湖北省新华印刷厂杨继高、湖北省柴油机厂陈汉寿、湖北印刷厂田国汉的情况，总之列举了不少复旧的实例。周总理静静地听着”。“康生说：‘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康生谈到……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这次接见后，吴焱金回忆：“胡厚民要我写信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我。”^①他们告诉武汉方面，再提“反复旧”“不太策略”，改提要求“落实政策”^②。

武汉方面：郭洪斌、方斌等指挥的反复旧活动，在社会上的声势越来越大，群众集会频繁举行，并向各单位内部蔓延。

5月14日，郭洪斌在武汉医学院运动场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作报告，继续鼓动反复旧。在王光照等人讲演的鼓动下，蒲圻县羊楼洞茶场市公检法斗批改大队、武昌县金口市直机关文教卫斗批改大队回到市内参加反复旧。

5月6日正在沔阳县政治野营的湖大学生返回学校。13日正在黄冈政治野营的华工学生返回学校，商议恢复“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15日武汉红代会召开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形成两项决议：1. 反复旧是工人阶级自发组织和领导的，作为革命的学生青年应义无反顾地予以坚决支持；2. 还没有成立“工宣队反复旧指挥部”的院校应尽快成立，以领导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21页。

^② 参见《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意思大同小异：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①

5月19日晚九点半开始的接见历时九个多小时。杨道远回忆：“到会首长都讲了话，对我们的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从正面、反面、多方面批讲，打通我们的思想。中央首长批评说：武汉反复旧，大规模上街，混淆了矛盾性质，在全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你们这样做只有敌人高兴。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你们有意见，但有意见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系统、正常的渠道向上反映，九大召开了，不应该再搞那么大动作。”^②周恩来表态：“5月11日武汉工代会《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形势估计错了”，“17日工代会进驻市革委会是错误的”^③。



5月27日中共中央(69)28号文件批示同意的湖北省革委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是经过群众代表讨论的。杨道远认为曾、刘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做了手脚：“后来以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起草汇报材料，我们又吃亏了，有些话说过了火，没有原则性，有几个地方提得太没有政策水平，他们不提意见，也不修改，故意让你往前多迈半步，这样在中央就通不过了。湖北给中央的报告送上去后，吴法宪下来传达总理的意见，说山东、贵州、湖北几个省，

数湖北的报告起草得最差。我们挨了训就不好再坚持什么了，重新起草的报告，就由他们主导了，中间有很多话一解释就对我们很不利了，这些文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21—122页。

②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61—262页。

③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40页。

字上的游戏他们玩起来得心应手，而我们的确显得火候不够了！”^①5月19日中央首长接见，这个报告最后一稿连同中央批示还是征求了群众代表的意见。吴焱金回忆：周恩来将中央的批示和省革委会报告“发给我们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

《毛泽东年谱》记载：

5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当周恩来谈到现在武汉在“反复旧”时，毛泽东说：个别的复旧是有的，但提“反复旧”的口号是错误的。谈到军宣队、工宣队时，毛泽东说：军队里头也有派性，有些军宣队、工宣队不那么公平，没有很好地执行政策。军宣队不要在所驻单位包办代替，你是帮助人家，这一点要特别清醒^②。

5月27日的接见，正式传达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要求代表们对中央文件认真讨论，坚决贯彻执行。朱鸿霞、吴焱金、胡厚民等承认了错误，表示承担责任，同时要求武汉军区、省革委会领导人回去后不要整群众。周恩来当场指示曾思玉等回去后要做细致的工作，不能压群众。曾思玉表态：坚决按中央指示办事，坚决按总理意见办事。

武汉地区群众代表在京期间，5月19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李作鹏等曾单独接见三新头头张立国、郭保安、龙铭鑫、张维荣、高玉泽，历时两小时。其原因郭保安认为可能是三新头头在前几次接见时没有发言，中央首长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三新头头都表示拥护中央对反复旧的处理意见^③。一份未署名的关于这次接见的传单显示，接见时“气氛和谐”，中央首长批评武汉反复旧的错误，对三新头头基本没有批评。只有周恩来讲到与这次单独接见新派头头相关的话：“你们钢新两派要团结。有的左一点，有的右一点，那没有什么关系。你们的观点有点差别。无论如何不要影响你们的团结。”“现在本来不分钢、新派，你们要向他们作工作”。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6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252—253页。

^③ 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郭保安的记录。

第三节 贯彻五二七指示

6月1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五二七指示。会后，各区、各单位开始传达中央文件，处理反复旧问题。

五二七指示的关键是这一段：“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1、2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省革委会报告也说到：反复旧运动“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参加这次‘反复旧’的群众是属于认识问题，要历史地看，全面地看，要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成绩和贡献。要说服，不要压服，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要歧视他们、排斥他们。对参加‘反复旧’的革命群众组织头头，也不要歧视他们，认识了错误，接受了教训，改了就好。”

造反派的感觉是输得不是太惨，“中央并没有讲武汉不存在复旧的问题，只是强调要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反映。”^①我们错了，当权派也有“缺点、错误应该纠正”嘛，而且我们的错是你们的“缺点、错误”引起的，顶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湖北当权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自身“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湖北当权者实际上如何贯彻五二七指示？

刘丰1969年10月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说反复旧是北决扬策划搞起来的，“他们上台，就是牛鬼蛇神上台，反革命复辟”。1970年3月12日曾思玉在湖北省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说：“他们秉

^①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05页。

承其主子刘少奇、王任重的死党和王、关、戚，吴传启、宋洛的意旨，网罗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和美帝、苏修派进来和潜伏下来的特务分子组织了一支帝、修、反的别动队，大搞所谓‘反复旧’运动”。“‘北、决、扬’和工代会一同拉屎，一起睡觉，一起吃饭，他们吃共产党的饭，干反革命的勾当。”曾思玉1971年3月在省第三次党代会上说：“一小撮阶级敌人垂死挣扎，与帝、修、反遥相呼应，发动了一个所谓‘反复旧’运动。”^①

杨道远回忆：“对于五二七指示中有关妥善解决引发反复旧的那些原因，他们避而不谈，在实践中根本就不去贯彻执行。五二七指示是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的整体文件，而湖北省在贯彻这个文件时只偏重于其中一个方面，越往后走偏重越明显，最后就不是偏重了，而是只讲一个方面——就是清算反复旧的错误。复旧的问题合法化了，从此以后不再是我们在革委会里面与曾、刘、张个人层面上的矛盾了，参加‘三结合’的所有的群众代表，按照他们对文件的解释都是犯了错误的，造反派剩下的只有作检讨一途了。”^②

清队以来造反派获得的罪名原封不动，又增加一项——参加反复旧。参加各级“三结合”的所有群众代表都因反复旧问题检讨，有的被隔离审查。不参加社会上反复旧的顾建棠，得到北京的消息，5月22日召开长办革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长办停止反复旧。6月1日，长办军代表、工军宣队王副指挥长向他宣布：“从现在起你就在这里学习，好好地交代你搞反复旧的阴谋诡计。”^③吴焱金说：“当权派的一切作为都免于追究，实现‘团结、胜利’的唯一的调整方式是压制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抗。”^④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反复旧运动中成立的群众组织全部解散，成规模的群众行动不再出现，但造反派群体中对当权派的抵触情绪依然普遍存在，他们依据五二七指示中对湖北当局缺点错误的批评、对反复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界定，以各种形式对抗当局的整肃。胡厚民提出十六字方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坚持胜利。6月，造反派群众在武汉街

^① 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7、4条。

^②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64页。

^③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16—217页。

^④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23页。

头到处张贴大标语：“顾全大局向前看，总结经验继续干”“曾、刘首长：我们这里一碗水没有端平”^①。胡厚民与朱鸿霞、夏邦银、吴焱金、李想玉商量，根据五二七指示和周恩来讲话的相关精神，安排在省市革委会任常委的群众组织代表组成“落实政策调查组”（后据张体学意见改为“情况反映调查组”）到武汉市各区调查，发挥八区工代会的作用，将调查结果报给曾、刘，如果“他们不按政策办事”，就“向中央反映”。这个计划写成书面报告报给曾、刘，被否定^②。造反派的这些举动被曾、刘称为“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

① 参见《张立国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19日）。

② 参见《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第二十二章 “两清一批”

第一节 疑点重重的中央九二七指示

中共中央继1968年发出《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1969年又发出《七二三布告》，提出严厉措施，坚决制止武斗。湖北当局据以强化整肃造反派群体的力度。1969年8月1日，方铭向武汉市基层革委会干部作关于贯彻中央《七二三布告》的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武汉虽然没有出现武斗，但无政府主义，无故旷工、旷职，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的现象比较严重，必须加以解决。8月5日，武汉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落实〈七二三布告〉的通知》，要求把贯彻《七二三布告》同贯彻“九大”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反复旧”问题的文件结合起来，同加强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结合起来^①。

造反派认为湖北当局没有全面贯彻五二七指示，对自己业已承认的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没有纠正的举措，一味追究造反派的责任，因而“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仍在进行。

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军区党委就北决扬问题向中央写出请示报告，中央九二七指示出台了。

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69）67号文件，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二）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

^①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40页。

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本件作为内部文件，不抄印，不广播，不登报）

这就是在武汉文革史中注定要留下深重痕迹的著名的“九二七指示”。

九二七指示的重点是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简称“北决扬”）问题。时任工总组织部长的李承弘回忆：“开始，我和很多人一样，对此文件不以为然，认为与己无多大关系。”^①更多的武汉造反派是大吃一惊，不能理解，因为两年以前开始出现的北决扬，其核心成员从未超过三十人，影响不是很大，而且1968年底已在社会上基本销声匿迹。武汉

^①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40页。

机关红司一号头头、市革委会常委魏绳武在听到九二七指示传达前，“还不知道北决扬为何物”^①。

北、决、扬都以华工六五级学生鲁礼安为首。1967年11月7日，目的在于“学习马列，探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的“北斗星学会”举行成立仪式，发起时成员十儿人，以鲁礼安等大学生为主，还有几个中学生。开会时武汉警司一位军人不请自来，来宾中一位工人批判鲁礼安撰写的学会宣言，仪式结束多人退出，剩下六七人。同年12月4日曾思玉在军区办的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上说北斗星学会是个“离奇古怪的组织”，这个宣言要“一字一字地批判”。不久新湖大前进兵团发表文章批判“北斗星学会宣言”。此后，北斗星学会除在湖大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澄清流言”外，在社会上再无公开活动。只有那份宣言，因其颇有文采，在学生中流传，有中学生把某些句子谱上曲传唱。

鲁礼安打算“以群众组织的合法身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经与江岸区手工业管理局职工业余学校代课教师周凝淳商讨，决定组织“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联络站”、“决联站”、“决派”）。11月12日湖北浠水县巴河一司抗议湖北日报的“歪曲报道”，在头头王仁舟带领下进驻该报社（12月12日冲击报社印刷厂，致使湖北日报停刊至次年1月6日）。鲁礼安认为这预示着“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在红旗大楼与王仁舟共同建立“湖北省决派联络站”，一些中学生报名参加。不久鲁、王发生矛盾，鲁礼安退出红旗大楼，王仁舟以省决联站名义贴出“公告”，开除鲁礼安。此后鲁礼安等在湖北大学筹建“武汉决派联络站”，12月10日《决派宣言》发表，12月30日“武汉决派联络站”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鲁礼安撰写的《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久鲁礼安打算解散决派，中学生和青年工人不同意，重新选举领导人，鲁礼安落选，水果湖中学学生李西九、无机盐化工厂工人蔡万宝分任一、二号头头。在鲁礼安的坚持下，鼓吹“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十二中学生李建生被开除。决派的社会活动，除张贴大字报、编印《扬子江评论》小报，就是在鲁礼安离开后，到黄梅县农村搞过一次极小规模失败的武斗。决派骨干以及报名参加者，绝大多数是中学生。这些中学生1968年底下乡后，决派的活动基本停止。1969

^①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47页。



载《扬子江评论》创刊号（1967年12月25日）

年反复旧有少数决派成员如蔡万宝等参与，冯天艾从关押处设法送出三篇文章抄成大字报公布，对反复旧运动的影响都不大。反复旧时三十三中肖铁人（肖务农）办的油印刊物《百舸争流》（部分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应当表明的观点》《关于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口号报》的“曹思欣”（意即“新思潮”，武汉师范学院附中学生肖帆、鲁萌的笔名），都被曾思玉、刘丰划入“北决扬一类反动组织”。他们没有加入过北决扬，只是与鲁礼安相识，北决扬活动期间与鲁礼安并无往来，也不同意鲁的观点^①。

决派较之北斗星学会，闹腾的动静大一些。但鲁礼安等从未像一般群众组织那样建立领导层——所谓“勤务组”，从未设立组织部、作战部、宣传部等机构。1968年下半年最盛的时候，前来看热闹的人不少，绝大多数是中学生，也有人填了表。不少人填表后第二天就不来了。决派从未组织过百人以上的活动，骨干始终在二十人左右。

^① 参见华盖阁主（肖帆）《萌萌在文革中》（网文，2016年）。萌萌即鲁萌。

《扬子江评论》报酝酿于1967年11月北斗星学会成立前后，创刊号（实际是复刊，此前断续出过几期）印制于1968年5月16日，到7月16日共出4期。《扬子江评论》所载文章的激烈观点被称为“极左思潮”。当时钢新两派冲突激烈，这份小报没能形成舆论的焦点。

鲁礼安1968年5月17日被黄石铁山新派抓住关押，两个月后被武汉警司带走^①，外界传说是新华工将其“扭送”公安机关。6月，钢工总的一些基层组织发起“营救鲁礼安”活动，带有钢新之争的色彩，游行、刷大标语、发声明，矛头指向新华工和黄石铁山新派。这些举动基本不涉及鲁礼安的那些“异议”，也就是念及他七二〇前为工总翻案出力不小，又是新派之首新华工里难得的钢派。

对北决扬，三钢的领导层没有一个人支持。鲁礼安在他的《仰天长啸》一书中说：北斗星学会的成立仪式，“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夏邦银以及二司的杨道远、丁家显这几位我们特别邀请的‘首脑级’人物，一个也没有来”^②。曾任工总组织部长的李承弘回忆：“‘北斗星学会’，一个小小学生团体，几十个人，我们工总根本没放在眼里，……总的看法，比聂年生的红反团还左，近似湖南、四川中央点名的极左组织，工总的态度一直是不支持的。……田国汉及基层个别人都只能代表个人。”“工总头头一直以工人造反派正统自居，对工总内抗暴派及后来的反潮流派都不容，哪会容得小小的‘北决扬’。后来说工总都加入了‘北决扬’，岂不是天方夜谭？至于所谓‘三个幕后黑手’，我们知之更少，不要说组织联系，就是人名也是从中央九二七文件中得知。”^③另一支“新派中的钢派”、新湖大红八月公社的一号头头梅子惠，受邀参加了鲁礼安等筹建学会的东湖聚会。“回来后梅子惠讲了会议内容，并将北斗星学会宣言在会上宣读，当即遭到了公社全体成员的反对，并告诫梅子惠不要和鲁礼安这样的人来往，败坏红八月公社的声誉。由此可见鲁礼安在造反派中的形象。”^④当时没有看到、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份钢派呼应北决扬观点的材料。

^① 参见2016年11月杜先荣等采访郭保安的记录。

^② 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第210页。本节关于北决扬的叙述，参考了鲁著第199—297页，陈瑞文的未刊稿《往事非梦亦非烟——“决派”名单失踪之谜与我的母亲彭保真》（2016年10月）。陈的未刊稿相关部分题名《决派“组织部长”的回忆》，刊于电子杂志《史实与求索》第二期。

^③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40页。

^④ 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186页。

新派各组织对决派及《扬子江评论》展开的批判，与北决扬活动期相始终，以新华工、新湖大、新一中最为突出。1968年6月15日出版的《新华工》报以四个版的篇幅发表新华工报编辑部文章《评反革命跳梁小丑鲁礼安》，文章分五个部分：一、吠日的狂犬；二、毁我长城的小丑；三、新生红色政权的死敌；四、这是哪个阶级的“造反闯将”？！五、反右必须防“左”。8月8日，决派在汉口工艺大楼前贴出大字报《评×氏人物的第二中心——一评反动的“多中心论”》，不点名地攻击周恩来。新一中当即贴出口号报、大标语反击，继而新一中许多战斗队在离工艺大楼不远的水塔大字报墙贴出《从〈扬子江评论〉看决派的反动思潮》《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专批〈扬子江评论〉》等大字报。8月25日出版的《狂妄报》、《新一中》报、《新湖大》报联合版为“批判《扬子江评论》专号”，载有《新湖大》报编辑部、《新湖大》杂志编辑部批判决派“三个重建（重建党、军队、国家）”论的文章，还有《狂妄报》编辑部、《新一中》报编辑部的长篇文章《评资产阶级反动流派——“决派”》。8月，新一中



关押决派骨干蔡万宝十余天，收集决派材料。8月23日新华工革委会开除鲁礼安、冯天艾的学籍和团籍。

九二七后湖北当局发动的批判，单就理论问题而言，没有超出新派文章的范围。

鲁礼安1968年8月被正式逮捕，九二七指示下达之前，武汉市公安机关1969年9月19日逮捕了王盛荣、干毅、周岳森，9月21日逮捕了冯天艾、蔡万宝、甘勇、周凝淳、张志扬、童丹、马业成、田国汉、严琳。

回顾北决扬问题，顾建棠这样认为：

曾、刘为什么要把早已囚禁的“死老虎”又翻出来当“活老虎”打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寻找置造反派于死地的突破口。原以为借“清理阶级队伍”可一网打尽造反派，出乎意料被反复旧运动所阻挡；曾、刘又企图利用五二七指示彻底否定反复旧、加害造反派，但五二七指示明确说反复旧“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令曾、刘无可奈何。因此，曾、刘挖空心思把小小的北决扬无限放大，把造反派与北决扬捆绑在一起，往死里整。北决扬不过是一个道具，即使武汉文革中没有北决扬，他们一定会弄一个别的道具出来。

就北决扬这个道具本身而言，曾、刘选择和使用的水平也太低太烂，没有一点技术含量^①。

九二七文件的形成过程，武汉造反派直到现在都认为有很多疑点。

当时就有人议论，这个中央文件毛主席没有按惯例批示“照办”^②。王光照回忆，工总头头刘兴隆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这样的质疑。刘丰1969年10月3日在这次会议上说：“据我们知道这个文件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曾思玉对这个质疑不解释，报以痛骂和威胁，他1969年10月27日在这次会议上说：“现在，又有人说：‘这个文件，毛主席没有批示照办，是假的。’这些家伙真是混账透顶。老实告诉这些反动透顶的家伙，你们如果继续顽抗，革命人民决不会让你们长期逍遥法外的。”

^①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23—224页。

^② 关于九二七指示，《毛泽东年谱》中不见记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内，仅“1969年9月27日”条记有九二七指示摘要。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1969年10月15日到达武汉，1970年4月11日离开，到达当晚接见曾、刘，没有谈到北决扬问题的记载。在汉6个月，再无接见曾、刘，涉及武汉问题的记载。

当时传说九二七指示是根据武汉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作出的，对此当局没有回应。文革后得到证实：1979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鄂文1979第70号文件，同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1979年10月19日“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说：“1968年由省革委会政法组立案审查，经调查后作出审查报告。1969年8月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于1969年9月27日发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的文件”。

问题是：四个月前的五二七指示和所附省革委会报告一再强调“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造反派头头因违背“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遭到中央严厉批评。而省革委会政法组立案审查的结果（即九二七指示所说“现在看到的材料”），不用省革委会的名义，却“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这就不是“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了。

还有几个问题：

五二七指示附有省革委会的报告，九二七指示没有附上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

九二七指示根据武汉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作出，却是批给“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1974年4月，时任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曾任军区曾刘首长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主任的马兆昆（马1968年8月至1969年11月在三办工作）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说：九二七文件草稿是冶金部军管会副主任朱互宁带到武汉军区，曾思玉、刘丰、张玉华看后说对文件没意见^①。在场的王光照回忆：马兆昆当时还说“张副政委在这里可以作证”，张玉华“未置可否”^②。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文件，让一个不相干的人往来于京汉之间上传下达，征求意见避开省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和地方干部，与五二七指示的形成过程大相径庭。

1982年8月胡厚民在法庭陈述时他说有证据证明九二七指示是康生搞的，朱鸿霞生前说过这个文件是黄永胜批的，但他们都没有公布证据。

有一个事实造反派很清楚，不以省革委会的名义而以武汉军区党委的名义给中央写报告，可以绕开省革委会里的群众代表。中共中央（69）28

^① 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②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91页。

号文件（五二七指示）批示同意的湖北省革委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就是经过群众代表多次讨论的，甚至五二七指示本身，周恩来也征求过群众代表的意见。曾思玉在九二七指示下达后讲的一段话，反映了他给中央写报告时的心态：“革委会内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十分尖锐、激烈的。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钻进革委会千方百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①。所谓“革委会内部”“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指胡厚民等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的地方干部任爱生等人。

使湖北造反派陷入劫难的“两清一批”（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批判极左思潮）从当权者执行和贯彻九二七指示开始。两清一批与此前的清队、工军宣队进驻、贯彻五二七指示不同的是，湖北当局将矛头直截了当地对准造反派是名正言顺的。

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曾、刘是要用北决扬这个箩筐把造反派全部装进去。”

第二节 省革委会扩大会议：造反派头头唯求自保

贯彻九二七指示的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1969年10月1日报到，开预备会，3日正式开会。参会人员多达2000人，地市以上群众组织的头头全部被扩大到会，27日结束。

这是一次没有会前通知的会议。10月1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前举行国庆庆祝活动刚结束，刚才还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省、市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和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常委，被通知不得回家，一律到洪山宾馆报到，参加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参会者被编成小组。魏绳武后来感叹：“中午还是省、市领导人，此刻已是变相的阶下囚。”^②

会议由曾、刘主持，曾思玉传达九二七指示后，刘丰做了长篇发言。至今保存这份讲话记录的湖北大学学生杨闯评论为：“讲话的核心就是把造反派的活动都归到北决扬的活动”，“他所列举的三个时期北决扬的十大反革命罪行实际上都是造反派当时开展的活动。”^③

刘丰还说：“我们逮捕的仅仅是浮在水面上的一些人，而且这只是一

^① 《曾思玉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10月27日）。

^②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44页。

^③ 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64、269页。

部分，还不是全部，有些人我们还要看一看”。此后，会议先学文件，对与北决扬直接有关的事和人作了揭发，很快就把矛头对准参会的所有群众组织头头，特别是曾、刘最忌恨的任爱生、胡厚民、杨道远。

会上有70位参会人员被安排在大会上相继发言。因反复旧问题失去底气的造反派头头们，在政治高压下大多放弃了抵抗和抵制。根据现在能看到的会议发言记录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可以明显地看出，自诬诬人是他们发言的共同之处。所谓自诬，就是把自己的“错误”“罪行”都冠以北决扬的大帽子，同时竭力洗刷自己与北决扬的关系，以示“区别”；所谓诬人，就是为了过关，上纲上线地揭发批判别人，特别是曾、刘重点打击的胡厚民等造反派头头和任爱生、刘真、张华等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

会议之前就已经将胡厚民定为标靶，顾建棠回忆：“10月3日，方铭拿着九二七指示对市革委会常委张维荣说：‘指示中讲，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你看胡厚民是不是这号人物？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给他戴是合适的。你要第一个上台发言，说胡厚民是现行反革命。’张维荣被迫上台发言，给胡厚民扣上了北决扬总后台、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张维荣由此深受刺激，患上精神病。”^①

参加会议的魏绳武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曾、刘、方、张首长的威逼利诱下，人们争着过关，争着在大会发言，批准你在大会上发言，就意味着过了关。一个月的大会，……群众组织被结合的头头，绝大多数都发了言，表示与胡厚民等人划清界限。我发言……有许多是违心之言。前一天还不知道北决扬为何物的我，也要按大会的要求深刻反省，检查北决扬对自己的影响，深挖细找自己周围与北决扬有牵连的人和事。”^②

吴焱金在回忆录中写道：“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曾思玉、刘丰以贯彻中央《九二七指示》为名，对全省造反派大兴挞伐，公开点了我的名，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在全省造反派头头纷纷上纲上线、自我批判、和北决扬划清界限时，我也违心地作了批判北决扬的发言。”^③众多发言的造反派头头把自己与北决扬生拉硬扯为“一路货”，吴不算最突出最激烈的，但作为新派的领袖人物，吴的发言很有代表性。吴的发言，揭发胡厚民等抵制批判《扬子江评论》；指控武汉工代会有《扬评》的代理人，

^①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20页。

^②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46—147页。

^③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26页。

武汉工代会成了《扬评》的合法司令部；反复旧是北决扬在工代会和省、市革委会的代理人策划下进行的反革命夺权。

对胡厚民的揭发批判是曾、刘通过这次会议彻底压垮武汉造反派的主要突破口。

重磅炸弹由朱鸿霞点燃，他说胡厚民“确实是一个反革命的‘决派’分子”“反革命的‘决派’头头”，他的揭发，核心内容是胡厚民所主张的“反动理论”——“三个长期斗争”，即“新干部（按：指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与老干部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派与新派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对朱的发言，曾、刘带头热烈鼓掌，而让在场的造反派头头们大为震惊，因为此前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听到胡厚民说过“三个长期斗争”，包括与胡过从甚密的夏邦银。

朱鸿霞发言后两天，22日，胡厚民在会上发言，对朱鸿霞揭发的“三个长期斗争”，没有一句话的回应。他只是“把过去作的错事、坏事、错误思想讲出来”，同时声明自己“还没有批判的能力”。凡是涉及他人的事，他都说是自己的主意、自己的责任^①。吴焱金说：“在这次大会上唯一不做检查的就是胡厚民。他一贯认为：‘违心地作检查就是上走资派的当，是授人以柄，自己搞垮自己，脱离群众’。”^②

朱鸿霞为什么在扩大会议上态度急转弯，“三个长期斗争论”是怎么来的，此后他没有作过解释。杨道远在回忆录中写道：“念了文件（九二七指示）后，中间空了几天要大家自己准备发言稿子。我们（省革委会的常委们）都住在省委13号楼，我跟夏邦银交换看了发言稿，但那几天就是找不到朱鸿霞的人，夏邦银说不用找了，朱的发言稿内容都还不是差不多的。后来等到朱发言的时候，才听到他带头全面批判胡厚民，这当中估计是张体学做了朱鸿霞的工作。国庆节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蛮硬的，回来怎么变化那么大？如今，朱鸿霞已经去世多年，我不知道他这个讲话当时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③所谓“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蛮硬的”，指的是朱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期间已看到九二七指示，对促使这份文件出台的曾、刘非常不满，对曾、刘整胡厚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怒^④。

^① 参见《胡厚民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22日）。

^②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30页。

^③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72页。

^④ 参见《张立国同志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上的发言》（1969年10月19日）。。

曾、刘通过省革委会扩大会议，迫使造反派头头们承认北决扬是“反革命地下组织”，武汉地区最大的造反组织的领袖人物是北决扬的总后台和反革命，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在造反派中深挖北决扬反革命分子。

杨道远在《奉献》一书中说：“在这个学习班里，大家都没有领会到这是一个要把我们一网打尽的阴谋。大家在发言中都只想为自己作点辩解，都急于和‘有问题’的人划清界限，都没有看出这场斗争实质上是冲着整个造反派来的。以为他们只不过是打击北决扬，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去为北决扬辩护，去澄清北决扬到底是怎么回事。发言中上纲很高都是为了把自己洗刷清白。”^①

实际上会议中还是有人“为北决扬辩护”。曾思玉27日在总结时说：“有的人至今还为反革命地下组织‘北斗星学会’、‘决派’和反动刊物《扬评》辩护，态度十分恶劣，……昨天晚上，还有人在小组会上公开为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

还有人消极对抗，不按曾、刘定下的调子发言。杨道远是21日发言的，他回忆：“在九二七学习班上，我是在很多人发言之后才发言的，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全然没有顾及，依然按我事先准备的稿子来念，检查自己的错误：一是全国支左抓军内一小撮；二是抢枪，武装左派；三是参加反复旧。对北决扬是笼统地做些批判，组织上不沾边，洗刷自己，划清界限，对别人也揭发不出来，听者不满意，给我的讲桌上递了一大堆条子（提问题），我知道回答不完他们的问题，也就不回答，发言完了，把那一堆条子搂起来就下去了。我还没有坐下，曾思玉急不可待地开了腔：杨道远啊，看那一堆条子我都替你着急。听你的发言，同志们感到不过瘾，……避重就轻，不痛不痒……你和胡厚民为什么抱得紧紧的，死不放？”^②

这次会议以揭批北决扬为主题，令人奇怪的是，已经在押的北决扬的骨干和所谓“幕后操纵者”没有按惯例押到会场开展批斗。

造反派头头们已经被压制住，但是，除胡厚民被批判为“决派头子”，绝大多数头头仅限于承认“受北决扬极左思潮影响”，不承认与北决扬有任何形式的组织联系。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72—273页。

^②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73页。

贯彻九二七指示的省革委会扩大会结束了，清查北决扬远没有结束，所有的造反派头头都记得，九二七指示第七条说：“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27日的总结大会上，刘丰又一次强调：“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没有呢？现在还不能说没有了”。曾思玉插话说：“可以肯定说有一窝子”。

第三节 北京学习班：从“一清”到“两清”

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是中央在北京举办的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湖北班的“学前班”，后者是前者的延伸。

1969年11月5日，第一批进京参加中央学习班的一千三百多人，多为刚刚结束的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参加者，11月底武汉大专院校造反派头头和“动力”共三百多人进京，参加中央学习班人数达一千六百多人，地点在空军学院。中央学习班是统称，当时全国有多省在北京办学习班，同时在空军学院的还有内蒙班、四川班。中央学习班领导小组由第一副组长陈伯达、常务副组长黄永胜负责日常工作。陈伯达四次来湖北班。湖北班也建立了领导小组，负责人为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张昭剑，成员有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王步青、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刘海江、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扶生、原工总头头胡崇元、原工造成员平毅。湖北班每天出简报，简报也送在武汉的曾、刘。

学习班有“五不准”的规定，人员按单位、系统组成班、排、连，从班长到连长，大部分由军人担任。

学习班大部分时间是开小组会。领导方面要求按陈伯达的指示，“上挂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烧头”，意思是把自己摆进去，彻底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 error 和罪行，同时要承认这些罪错往上说是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往下说是代表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利益。杨道远在回忆录里写道：“当权派把我说成是地富反坏右、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总保护伞，学习班把我定成刘少奇与牛鬼蛇神联系的中间人：上联刘——下联牛——（上下中间）自己火烧头。”^①

中央学习班一直持续到1970年6月初结束，长达7个月的“学习”过程除穿插参观、听时事报告、看演出等活动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82页。

最初阶段，学员吃、住都不错，在小组会上学习有关文件，端正态度，忆苦思甜调动阶级感情，人人“洗手洗澡”自我检查。和之后的暴风骤雨相比，这是造反派头头们在北京过了一小段相对平和的日子。魏绳武回忆：“我们玩得很轻松，张昭剑和骨干们却很紧张。……动力每天要向连首长汇报对象一天的表现，连首长再去班部参加碰头会，向张昭剑们汇报各连的情况，听取班领导布置第二天的活动内容。他们再综合写成简报分送中央和湖北的曾、刘、方、张。所以，他们内部的工作是相当紧张的。”^①

这个阶段的后期，斗争指向逐渐明朗，在学生连队重点批杨道远，其他连队批胡厚民、李想玉、吴焱金等。

1970年春节前为第二阶段，在学习班成员中抓“现行反革命”。结果是武汉三大工人造反组织一家被抓出一个，即工人总部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1月中旬，陈伯达亲临批斗大会现场，刘、张、王在现场被逮捕，押回武汉。吴焱金回忆：“刘万泰在大会上不肯低头，上来两个人也按不住，刘万泰强头捩颈高喊：‘我不是反革命，只要朱、李、吴的大旗一摇，我照样打头阵！’”^② 顾建棠回忆，在会上“陈伯达讲话：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把五一六一抓，就都跑到武汉去了，武汉成了五一六的根据地、仓库和保险柜。武汉的北决扬是五一六的变种，是武汉的土特产。现在是到了全面清查的时候了。从此，北京学习班掀起了狠抓五一六分子的狂风恶浪。”^③

1969年10月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并没有涉及五一六问题。骨干仅几十、影响不甚大的北决扬这只筐子太小，要把庞大的武汉造反派队伍（包括比较温和、一直反北决扬的新派）全装进去，于情于理说不周全，难以服人。在湖北当局看来，1967年9月中央就提出的五一六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是一只更合适的筐子。正好湖北学习班举行期间，1970年1月24日，周恩来、江青在接见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军宣队代表时号召清查五一六，周恩来在讲话中点了学部吴传启、潘梓年和王、关、戚的名，而吴传启、王力都和武汉造反派有牵连。就这样，湖北的“两清”（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在北京正式开始。中共中央3月27日发出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即《三二七通知》）说，

①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57页。

②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34页。

③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28页。

反革命秘密组织并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湖北班领导“定的基本调子是：‘北决扬’、‘五一六’两个反革命组织是一回事，目的相同，手法相同，人员交叉；他们的目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文革中他们始终把矛头指向军队，搞乱军队，抢枪乱军，妄图建立反革命武装”^①。

逮捕刘、张、王的大会前后，武汉市直机关红司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常委魏绳武，支持造反派的市电信局局长杨友山被单独隔离，逼迫魏承认参加并在武汉发展五一六。二八声明起草者雷志茂“按照学习班临时党委的‘诱供’内容承认水院闯派学习班‘集体加入五一六’，并在揭批杨道远大会发言中，诬指杨道远把他引向五一六的罪恶深渊，为杨道远被打成湖北省‘五一六总头目’立了大功。”^②大批造反派头头们在高压下陆续被迫低头认罪。

春节后第三阶段开始，即揭开湖北武汉北决扬、五一六的盖子，抓出幕后操纵者。这是湖北省当政者要达到的主要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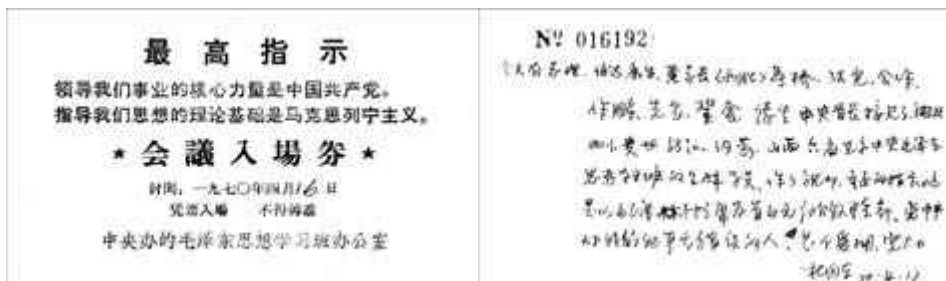
1967年2月，魏绳武曾和武汉市委宣传部干部宋洛一起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见过吴传启，宋洛是吴传启的入党介绍人，吴讲了他对武汉文革形势的看法。魏绳武属钢派，因而魏绳武必定向杨道远、胡厚民通报过资讯，这是曾、刘的逻辑依据。曾、刘等以此为突破口，即通过吴传启——宋洛——魏绳武这一条线，把杨道远、胡厚民与五一六联在一起，武汉市直机关红司被诬为“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的“仓库”、“保险柜”，“钥匙就在柜长魏绳武手里”。魏绳武是钢派基层头头，这样，武汉钢派的领袖胡厚民、杨道远就成了武汉五一六的总头目。

造反派头头又一次阵脚大乱，在张昭剑等的导演下纷纷上台，先是自诬一番，然后重点揭批胡厚民。揭批胡厚民的重磅炸弹又是由朱鸿霞扔出，他在全体学员大会上把胡的“反动思想”总结为三句话：“隐蔽精干、保存骨干、长期干”。湖北班立刻将这“三干”宣布为武汉五一六、北决扬及胡厚民的“反革命纲领和策略”，立为批判的靶子。

胡厚民对朱的揭发仍然不做任何分辩，还把“长期干”量化为“二十年后大干”。在有吴焱金参加的揭批胡厚民小组会上，胡借交待的名义，阐述为什么要“二十年后大干”。他说：“二十年后，老红军不多了，抗

^①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43页。

^② 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509页。



日干部掌权的也不多了。那时造反派已是久经考验的真正掌握了毛泽东思想锐利武器的战士，将是战无不胜的！”在场的军代表指责他放毒，他照说不误，直到军代表阻止他讲话为止^①。

武钢工人陈祖坤是不认错的人中的一个。他回忆说：“在学习班里我始终坚持反复旧没有错，我一再声称希望就这个问题，还有文革是否搞错了，和武钢当权派辩论。开会时动力们一再启发我认识错误，可惜他们说赢不了我。经过几次较量，我们班的骨干周××再也不提要我承认错误。……以后除了湖北班的大会，连里没开过几次会，因为连里一开会我就跟他们辩论，他们都不惹我”^②。

在湖北班上，少数几个支持造反派的地方老干部抵抗住高压，拒不认罪，始终拒绝揭发批判胡、杨。原武汉市副市长、市革委会常委薛朴若在学习班的7个月里，在各种会议上始终一句话不说，交待、揭发一个字不写。任爱生、闻立清（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在会场上强硬顶撞陈伯达和张昭剑。“陈伯达先点任爱生：你造反有野心，想当大官。任爱生反驳：我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支持造反派，出于公心。你不要以势压人，乱扣帽子，我不怕你。陈伯达又点闻立清的名，问：‘士可杀不可辱’，这话是你讲的吗？闻立清昂首直视陈伯达：是我说的，么样？陈伯达提高嗓门：我要杀你的头。闻立清说：你敢！”^③ 吴焱金回忆：“和我同班的老干部崔放鸣对付审查很有经验，他一点也不紧张，字斟句酌地写好三张材料纸的检查交待，除了自己给自己扣大帽子外，一点实际内容也没有。每次都是念完三张材料纸就开始接受批判，无论你怎么样批判，他总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每次照念不误。后来军代表恼火了，把

^①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34页。

^② 陈祖坤《吹尽黄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57页。

^③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28页。

他的三张材料纸收去，但他对检查交代的内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又一字不差地再写三张。七个月的时间他就是这样念下去，软磨硬抗，军代表居然到最后也没能把他怎么样。”^①

杨道远在湖北班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武汉的代理人，当时张建成在湖北班材料组整理杨道远的材料，他回忆：

我在材料组的主要任务是了解、熟悉、整理杨道远的材料，不管哪个连、哪个人，凡是揭发、批判杨道远的材料，我都要了解。

后来王步青副参谋长告诉我，党委决定让我做批判杨道远的系统发言，所以要了解、熟悉杨道远的材料。

这也说明在学习班整杨道远是早就决定了的，并不是因为杨道老是“北决扬”、“五一六”才整他，而是因为要整他，才把他打成“北决扬”、“五一六”。

我懂得这个道理是在一年之后，那时我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并且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五一六”的组织者。我这才懂得了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无时无刻不在做镇压造反派的美梦。他们利用中央学习班这个平台，用捏造的事实欺骗中央的某些领导，也利用人们相信中央及对中央的敬畏心理，以清查“北决扬”、“五一六”为名，把造反派一网打尽^②。

张昭剑给张建成系统揭批杨道远的发言定了基调：“杨道老是湖北‘北决扬’、‘五一六’的总负责，他通过两条线与王、关、戚联系，一条是魏绳武（武汉市委机关造反派头头）——宋洛（武汉市委宣传干部，吴传启好友）——吴传启——王、关、戚，另一条线是二司驻京联络站——林杰——王、关、戚；杨道远的理论基础是‘二论’，即‘阶级斗争演戏论’、‘路线斗争循环论’。结论是：必须对杨道远揭深揭透，批倒批臭，肃清流毒，把湖北的‘北决扬’、‘五一六’两个反革命组织彻底清除。”^③

按照湖北当政者的意旨和学习班中的揭发材料，张建成做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批判发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领导很满意，后来把我的发言录音在湖北全省播放，通过我的口，告诉人们杨道老是湖北‘北决扬’、‘五一六’的总负责人，他参加文革的目的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32页。

^②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42—243页。

^③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43页。

证据充分。”^①

朱鸿霞、杨道远、吴焱金等在学习班大会上检讨的录音，雷志茂等承认加入五一六的录音，作为攻心利器，也在湖北各地同时举办的学习班上播放。

北京学习班的学员认为，学习班主事人张昭剑等不讲原则，不讲政策，也不讲常识，还搞了许多为人所不齿的小伎俩。张昭剑要求，检讨时必须痛哭流涕，否则不能过关^②。王步青指派学生连指导员找杨道远谈话，要他揭批新派的彭勋、郭保安，表明学习态度好，对解决自己的问题有好处。杨说不了解他们，学生连指导员就把郭保安的问题讲给他，杨道远还是拒绝了^③。1970年1月，在陈伯达指使下，张昭剑要朱鸿霞、胡厚民等人供出反复旧的后台。他说：“这个人不是王、关、戚，也不是孟、刘、张，此人在中央，比曾、刘大，你们联系反复旧来讲嘛！不是王效禹”。“联系上海嘛”，“你们不要有顾虑，你们是不是看这个人没有倒，你不敢讲，不要怕，我们也有后台嘛！曾、刘也有后台嘛，你们要跟曾、刘”^④。

1970年5月底，北京学习班结束。在总结大会上，王步青宣布：“经伯达同志批准，黄总长签署，决定将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押回湖北继续批斗，彭勋送农场劳动改造，魏绳武实行专案审查”。1974年4月，造反派从市委运出一批两清材料。武船联司头头林子忠回忆：“大家在清理材料时把中央学习班结束时黄永胜对彭勋的批示清出来了，黄永胜批示：‘罪行实属严重，不予分配工作，送农场劳动改造，以观后效。’”^⑤

杨道远后来写下的当时的心态，在造反派头头中有代表性：“在北京学习班初期，我是很认真地写检讨批判自己，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承认错误，当我意识到他们不是要我们检查错误、改正错误再回到革命队伍里来，而是把我们当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我们永世不得翻身时，我也就和他们对立起来了。”^⑥

通过北京学习班，湖北当政者曾、刘等人达到了预定目标，成功地将

①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44页。

②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32页。

③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82—283页。

④ 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8条。

⑤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64页。

⑥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80—281页。



胡厚民、杨道远打成了五一六、北决扬在湖北武汉地区的总头目，一些造反派头头如工总的张耀忠、胡崇元承认参加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有参加学习班的造反派头头们都承认有资产阶级派性。这样，“两清一批”就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在全省开展了。

6月6日至13日，省革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主题是按照陈伯达、黄永胜的指示，批判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包括刚回汉的北京学习班全体人员在内的三千多人参加，三百多万人收听会议实况。刘丰首先作报告，他说：“胡、任、李本来就不是好人，不是好人犯错误。胡厚民是‘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任爱生是地地道道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李想玉是混入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在文革中坐车到他老家为地主父亲翻案。他们勾结叛徒、特务和一小撮牛鬼蛇神大刮妖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破坏，湖北两次反复的根子都在这里，干了大量的坏事。我们多次挽救，他们拒不接受，在这次贯彻‘9·27’指示时也挽救，在北京学习班态度也不好。任爱生在北京还准备告状，现在不把他们交给群众批斗不足以平民愤。”

安排在会上发言的有48人，其中三人给参加会议的造反派留下最深的印象。一个是天门县农村某大队妇联主任金琼娟（九十年代任省政协委员），三个月前她在省首届积代会上控诉造反派，说她拒不交出造反派认定的“黑材料”，被造反派“一脚踢破了她三层裤子”。这次她又在会上控诉胡、任、李。另一个是罗田县革委会副主任丁凤英，她是张体学从大队妇联主任一手培养起来的，1971年当上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她在会上说：对他们（指造反派）就是要压，压得对，压得好。我们要压到底，压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①。再一个是市电信局工总头头××。

××的揭发耸动听闻。他说：胡厚民是“五一六在汉的前台指挥”，1967年1月至3月就指使电信局某人和其姐胡秀娟组织五一六××兵团，在电信局发展组织；七二〇后指使胡秀娟发展了我。胡厚民还是北决扬的主要幕后操纵者，北斗星学会成立胡是点了头的，决派的名字是胡取的，

^①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49页。

扬子江评论的文章是胡修改的，胡想什么“扬评”就评什么，“扬评”什么时候出也由胡决定^①。

正在受审查的柳英发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回忆：××揭发胡厚民私设电台，当时台上就放着一部电台。

这次会议宣布撤销胡、任、李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会后三人被关押。

第四节 武汉地区的“两清一批”

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召开的同时，1969年10月4日，武汉市革委会召开有线广播大会，传达中央九二七指示。会后，全市开始大规模清查北决扬。10月25日，武汉军区副政委张玉华在军区支左大单位负责人会上布置把批北决扬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思玉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结束时说：“这次会议结束后，各地区、武汉、黄石市，也要召开会议，认真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刘丰说：“这次去北京办学习班，要把各个难点的难点弄到北京去，让家里发展大好形势。”^②所谓“难点的难点”，指的是各造反组织的主要头头和骨干；所谓“让家里发展大好形势”，就是排除主要头头的干扰，在省、市、区、地、县和各单位普遍举办“两清一批”学习班，省学习班有对象一千五百余人，武汉市学习班有对象一千三百余人。1974年时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揭发：刘丰在两清时说“凡是到北京串连过的人，都要当作‘5·16’清查”^③。

从北京学习班回到武汉的造反派头头陆续被关入各类五不准学习班，继续交待问题，接受批判。省、市革委会中常委以上的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基本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总头目”、“重要骨干”、“黑手”、“幕后操纵者”，占常委总数的62%^④。

杨道远回汉后被分配到江西部队农场劳动，1971年2月被秘密强制

① 关于湖北省革委会这次扩大会议的记述，参考了刘德光《回眸——我经历的宜昌文化大革命》（自印本，2015年）“第十章 清查‘5·16’、‘北、决、扬’，再整造反派”中“批判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的省扩大会”一节。

②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24页。

③ 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徐健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④ 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条。



1971年初，前往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外调的单位介绍信（许东杰提供）

带回武汉，关押审查。6月10日召开全省广播大会批斗，至8月17日在武汉市批斗18场，后又在全省巡回批斗。此后一直关押到1983年2月判刑。北京学习班结束后，胡厚民、李想玉、魏绳武被关押至1974年3月，任爱生被关押至1979年。

九二七指示下达后，由省、市公安机关分别组成省、市的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1971年3月1日，根据中央13号文件，武汉军区党委、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建立湖北省驻军和地方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由马兆昆、田文等11人组成；4月1日，武汉市委决定成立武汉市五一六、北决专案联合小组，由田文（任组长）、孙济云、李元义（任副组长）等6人组成。省、市联合小组都以省、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原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为办事机构^①。

湖北当局制定了两清的总体规划和详尽的实施方案。1974年3月底武汉造反派从省清查办公室找到一批“两清”材料，其中有：“彻底清查林陈死党，深挖五一六、北决扬的规划”“关于‘新派’中五一六反革命

^① 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1976）》第865页。

阴谋集团的报告”“五一六、北决扬分布图、系统图”；大会、小会批斗方案，重点人员突破计划。如《关于批斗汤玉莲方案的报告》，会场怎样布置，批斗人员站在什么地方，写什么标语，喊什么口号，都有预案^①。

耗费巨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清查开始了。“五不准”学习班、“走读”学习班遍布全省上下，清查对象达六十几万（1972年张体学所言），“动力”为对象的数倍，无数外调人员奔忙于途。鲁礼安后来回忆：“一拨一拨的外调人员走马灯似的转着，一拨子走过去，一拨子又走过来。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焚膏继晷，不舍昼夜。清查到最高潮的那一阵，各单位的外调人员要排队登记提前预约，才能约到我这个‘一号头头’。外调的人多得炸了窝”^②。

1974年4月6日武汉市委书记王克文接见聂年生等造反派成员时说：全省被当作五一六、北决扬批斗的有5万多人，被审查的40多万人^③。

湖北的“两清”规模太大，开始不久就引起中央一些领导人的忧虑。1970年3月16日谢富治说：“北、决、扬与‘三钢’挂钩是不行的，一联系就不得了。”4月6日纪登奎说：“七百多人的一个工厂，有155个决派，这样的材料要打个问号，搞上四、五百人，你们骑在老虎上。”曾思玉的回答是：“我骑在水牛上，愿意上就上，愿意下来就下来。”^④

1970年2月，毛泽东在武昌谈到清查五一六问题：“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得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⑤中共中央1972年9月7日发出的33号文件载有毛泽东的这段话。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20号文件《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① 参见武汉市针棉织公司机关造反派1974年4月22日刻印的传单《武汉地区批林批孔联合大批判小组第一次情况汇报》，另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48—149页。

② 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第477页。

③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1974年4月7日，武重批林批孔办公室翻印）。

④ 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马兆昆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282页。

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刘丰在这个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①。当时湖北省正在召开地市领导干部会议，“曾刘在会上讲：‘湖北不存在扩大化的问题。’”^②“1970年7月29日，张玉华讲‘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失败，当前要注意动向，注意搞反复，他们攻击我们扩大化了。’”^③

很多造反派群众意识到，这一次和清算反复旧不同，被打成北决扬就是敌我问题了。巨大的压力加上头头们放弃抵抗，他们能做的就是竭力洗清自己，甚至一死了之。工总粮食系统兵团头头黄礼寿回忆，他在审查期间碰到武汉卷烟厂工总头头李光武，李光武说：“我已经承认了自己是北决扬，你也赶快承认吧！上头都顶不住，你硬顶个么事啦！”^④省长途汽车客运站杨爱国、省轻工业机械厂造反派头头凡运国、市电信局支持造反派的局长杨友山、市电信局工人汤玉莲、长办秘书长孔晓春、长江水利水电科学院院长何之泰、长江工程大学戴树德和郝梦奎、3506工厂吴连生和童幼珍、省科委戴海州、武汉锅炉厂桂美和、长江航运公司陈腊福、武汉橡胶厂团委书记童启俊、水院六一级学生陆植钧、湖大经济系学生孙长治等都受逼自杀。

1969年底，华工全院师生到咸宁“搞斗批改”，三位造反派学生死于清查。船舶系六四级学生、原红反团成员潘根生，“承受不住高压，上吊自杀了，工宣队不让家属来收尸体，秘密地草草埋葬后马上召开全系批判大会，宣布潘根生是反革命，自绝于人民”。机二系六四级学生王振贵“患有神经官能症，1969年冬至1970年初在家休病假。清查‘五一六’时，工宣队要求他返校参加运动和毕业分配。1970年5月初的一个夜晚，王振贵不知是因为病得难受，还是害怕被清查，或者两者皆有之，服下大量的安眠药自杀了。工宣队领导对其死因尽量掩盖，没有通知家人，就地将其草草埋葬。一位当年在咸宁和工宣队领导一起去过王振贵家的同学，应王振贵妹妹托付，前几年曾经去咸宁寻找王振贵遗体安葬之处。当年的

①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75页。

② 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马兆昆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 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刘志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④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30页。

村干部告诉这位同学，王的遗体当时应该是工宣队拉到外地处理了，没有在我们这儿埋葬。该同学在咸宁多番查询，终未能够打听到王振贵同学的葬身之地。”华工无线电系六三级学生赵延昌，原新华工红反团头头、新华工三办负责人，1968年底已毕业分配到宜昌工作。1969年底被揭发参加北决扬，军工宣队将材料送到赵延昌所在单位，单位立即将赵延昌关进五不准学习班。赵延昌“性格刚强”，“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一概不承认”，受逼不过，于1970年2月上吊自杀，时年25岁。单位宣布“赵延昌是反革命，自绝于人民”，华工军工宣队在无线电系召开大会批判已离世的赵延昌^①。

华中工学院的两清中，军工宣队发起对一张大字报的批判。华工六四级学生江重初、陈定方回忆：1969年春，江重初、陈定方等“面临毕业的学子在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指示感召下，结合武汉、华工文革运动的



实际，写出自身体会性质的总结，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八周年，向党敬献一份特殊而朴实的礼物。”这份五万字的总结标题为“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署名“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武汉红代会新华工总部‘恰同学少年’战斗队”，于7月1日在华工校园张贴，随后做成油印小册子散发，“得到一片叫好声”。张建华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华中工学院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最高水准”。两清中，华工军工宣队说这张大字报是“反

^① 参见陈厚燃、夏宜凉《回忆华工文革》（未刊稿，2019年）。

革命的大毒草”，“他们在前言中写道‘斗争在继续’，就是要与工宣队、军宣队斗！”“他们批判三种思潮（指湖南‘省无联’、武汉决派等的极左思潮，‘四一四思潮’，‘看穿派’思潮），其实他们比决派更决派！”当时几位主要作者、参与讨论者被隔离审查，十多年后作为主要罪行被“记录在案”^①。

1970年12月26日，张玉华在驻汉三支两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即使出现个别自杀的也不要怕，搞斗争嘛，他自杀是他的事，自绝于人民。”^②两清中被整死的人数无法查实，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条记载，武钢死58人，长航死68人。

长办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被圈定进北京学习班的有顾建棠、王秀林等7人，三级革委会中其他群众代表及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千余人被关进了长办工军宣队办的学习班，其中251人作为敌我矛盾立案。至1973年这类学习班先后解散，仍保留顾建棠等4个专案学习班^③。

1969年底，第一冶金公司将没有去北京的造反派大小头头三百多人，关进在一冶第三子弟中学办的学习班，军代表逼迫头头们承认参加了五一六、北决扬^④。

1969年底起，武钢各厂矿、武汉钢铁设计院、武汉冶金勘探公司等单位的所有造反派骨干，被集中在武汉钢铁学院办五不准学习班，清查五一六、北决扬^⑤。武钢厂矿一级立案二千八百多人，其中干部六百五十多人，技术人员近三百人，工人一千九百多人^⑥。

写出反复旧第一张大字报的王光照从10月4日起，在东西湖吴家山空军某部大院被单独办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要求揭批北决扬及其幕后操纵者，“要把自己摆进去”。当年底被关进武锅在水院举办的一百多人的五不准学习班。1970年初“一打三反”开始，王光照被押回厂办“一个人

^① 参见江重初、陈定方《关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2019年）。

^② 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刘志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33页。

^④ 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27页。

^⑤ 参见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个草民的故事》第68页。

^⑥ 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条。

的学习班”，这一次直接要求他承认参加了决派。其间，2月某日，在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受到曾、刘表扬的桂美和，在武锅五不准学习班上吊自杀。王光照回忆：“作为全市深挖决派、批判扬评的一个活靶子，无论与我有关无关，各单位都要‘请’我去当批判大会的‘嘉宾’。”^①

1969年10月18日，湖北大学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改为贯彻九二七指示、揭批北决扬材料组。从11月5日开始，湖北大学军宣队举办了16天的九二七学习班，校、系革委会全体成员参加，学习班批判与鲁礼安有交往的梅子惠，也批判反决派的彭勋^②。

很多造反派成员坚决不承认参加过决派。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刘丰声色俱厉地问（吴焱金）：‘严琳是你的部下，工造总司和北决扬是什么关系，你和严琳是什么关系？你要交待清楚。’”吴焱金回答：“我堂堂武汉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不当，去参加十几个人的小团体北决扬，除非是神经病！”“你们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因为没有就是没有！”^③王光照从1969年10月起，在五不准学习班和监督劳动中度过四年。曾思玉点过他的名，说王光照就是决派分子。王光照在回忆录里说：“我自育主意：不能无中生有，我没有参加决派是事实。任你如何强按牛头，我就是不喝水。不顾事实、胡编瞎款（说）做不得。我就算独自承认参加了决派，那么追下去，谁发展我的？上面是谁？我又发展了谁？厂内厂外，那要害多少人啊。显而易见，一个假话，得一百个假话来圆场，圆得了吗？那才是陷进去，出不来，丢人现眼掉得大。所谓有材料，有鼻子有眼，那就亮出来。要杀要剐由他来吧。”^④

华工在军工宣队领导下清查北决扬，有学生把《新华工》报上批判北决扬的文章拿出来念，“工宣队就很恼火，说我们要抓北决扬，你们还自认为是反北决扬的功臣，为自己评功摆好，你们连这个学习班的性质都没搞清楚。”^⑤

华工动力系六三级学生李显利，文革期间曾是新华工三办（负责干部专案）成员。三办曾经怀疑宋洛是“破坏武汉文革运动的黑手”，“成立

①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14、223、229、231页。

② 参见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73、275—276页。

③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24、125页。

④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237—238页。

⑤ 参见杜先荣2016年11月访谈刘玉民的记录。

过宋洛专案组”。李显利分配到辽宁葫芦岛制造核潜艇的401厂。李显利回忆，两清中华工工宣队“追到我们厂里，逼我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北决扬，还要我揭发同伙。我跟他们大吵大闹，最后甚至动手打架。为此我被开除厂籍”^①。

据陈瑞文说，“参加了决派活动的骨干，也有很多人坚决不认可把决派打成反革命组织，并采取各种各样的抵制方式。”^②陈瑞文本人冒死通知家人将随意放在家里的几千张决派表销毁。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这三个文件所要打击和反对的对象，和中央提出的清队对象一样，是对全社会而言，并不特指造反派群体。

湖北曾、刘迅速将“一打三反”纳入到“两清一批”中，武汉市提出“以两清为中心的一打三反运动”^③、“以清查‘五·一六’、‘北、决、扬’为重点的‘一打三反’运动”^④。“一打三反”的主要对象在曾、刘那里被定为造反派。

1970年2月18日湖北大学军宣队在校革委会全会上传达省革委会召开的一打三反会议精神，根据这个会议精神，湖大军宣队作出部署：贯彻九二七指示与贯彻一·三一文件同时进行，贯彻一·三一文件是贯彻九二七指示的深入，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是在学校造反派里挖决派^⑤。

武汉市和湖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分别于1970年1月20日和2月28日召开，控诉造反派成为两个积代会的主要内容。曾、刘分别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号召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一场深挖决派的人民战争。

一打三反期间，湖大的五不准学习班多达三十多个，对象和动力的比例有的高达1比7。通过逼供、诱供和施加各种压力，红八月公社近三百名学生被打成决派分子，红八月公社成员登记表被认定为决派登记表，红八月公社组织的活动都被定性为决派活动。两个红八月公社成员在全校“宽

① 2015年4月杜先荣采访李显利的记录。

② 2017年11月29日陈瑞文致笔者微信。

③ 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马兆昆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④ 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1976）》第940页。

⑤ 参见杨闻《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93页。

严大会”上分别交待自己填表参加决派的经过，分别承认担任决派的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军宣队指挥部当即宣读了对二人免于处分的决定。随后红八月公社作战部长杨闯被迫承认参加决派，军宣队指挥部立即恢复他校革委会委员、教务部副部长职务。经济系六五级学生、红八月公社骨干孙长治在学习班中上吊自杀；计统系六五级学生，参与筹建工人总部、在造反派工人中享有极高威信的陈春茂，已毕业分配到宜昌县，一打三反中先被办五不准学习班，随后被逮捕，在狱中精神失常，出狱后坠长江身亡。曾经大力批判北决扬的新湖大成员也难逃罗网，彭勋被批为“决派思潮在我校代表人物之一”，成为“重点对象”；政治系教师、校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革委会常委张维荣被整成精神病，后坠珠江而死^①。“搞彭勋，是刘丰亲自到湖大给工宣队布置的，他说，‘这个人很坏’，所以，湖大一直抓住彭勋不放。”^②湖大六五级学生胡开友从1970年1月20日开始，被办学习班155天，动力们告诉他，学习班开会“帮助”他近五百次，为“挽救”他内查外调花费四五千元^③。

两清中，武重是曾思玉亲自抓的点，由刘志坐镇。1974年4月1日武重党委在《关于‘两清’工作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认识》一文中说：该厂518名造反派被“称为‘518’尖子，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锅端’、大办‘五不准’学习班，颠倒黑白，捏造罪名，小会批判，大会批斗，撤职调离，逮捕法办等恶劣手段，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疯狂地对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

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四百多名师生员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占全院总人数的8%左右。已分配的学生也受到牵连，有的进了监狱，有的被逼死^④。

华工六五级学生、红反团成员肖佑祥，在他的回忆录《花甲里程》中讲述了他成为“决派”的经过：

（1970年3月13日，工宣队）宣布我的学习班正式开始。（工宣队员）袁要我交代文革中的所有活动，特别是和“北、决、扬”的关系。我每天

① 参见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第273、292—307页。

② 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徐健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 胡开友读《我的文革经历》后给作者的信，见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

④ 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60—261页。

写十几张的交代，没有自由，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晚上和他们睡通铺。过了几天，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袁一脸阴沉，（学习班“动力”）谢的大手把桌子拍得震天响，要我端正态度，老实交代。

3月25日，他们开始诱供，要我交代参加“北、决、扬”时间、地点和过程。我百般辩解，冷笑以对。袁恼羞成怒，拍桌子打椅子，学习班充满了火药味。他们对我采用了车轮战，大灯泡照着，三天三夜不让我睡觉。28日，我晕了，脑子里产生了幻觉，顺着他们的提示，像挤牙膏似的交代了如何填表、如何发证、证件式样、发展了几个人、决派证由我父亲带回去藏在家里等等，在一张纸上签了五次名字（写一句签一次名字）。袁如获至宝，马上让同学拉我到外面“清醒清醒”。

第二天，我清醒过来，感到像吃了苍蝇似的难受，谴责自己对党说了假话，破坏了运动的开展，也害了我的同学。等他们对我的态度稍有好转，我天真地递交了翻供材料。可翻供给我带来更严厉的惩罚。他们威胁我说：“把你的问题挂起来，不解决问题你就不能参加毕业分配。”

不久，我父亲来信说，工宣队派人到我老家（湖北天门）查抄决派证，闹得满乡风雨。

到了7月，我们两届学生即将分配。工宣队材料组和我谈话，并拿出一个同学的结案材料给我参考。为了能够分配，我只好按照他们提供的“标准答案”交代参加了“北、决、扬”组织，对文革中的一系列活动都冠以“决派”行为，包括为“决派”组织网罗干部，做了牛鬼蛇神的黑保护伞。其中有院长朱九思，省里市里有黎智、骆文、程云还有梅白等等。当时王克文已任武汉市委书记，成了革命干部，不算我的罪行，很滑稽的不再要求我写进交待材料。7月12日，我的“文化革命中我所犯严重罪行的彻底交待”写成，计三十页，每页都按了手印。就这样，我成了“决派”分子，而且是骨干成员。

一治的两清学习班办了十几个，每班二三十人，全部由军代表管理。新一治成员方德纾回忆：“学习班前，我们并没有听说过‘五一六’、‘北决扬’这两个名字，但是进了学习班之后，就都成了五一六、北决扬分子了。”^①

省直机关造反组织10名头头全部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头目进行批

^①方德纾《倾诉》第111页。

斗，省直二级单位的320名头头都被批斗^①。

湖北日报社军代表说：报社里五一六、北决扬分子“一抓一把，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浮一层”。报社被定为“文、刘（按：文林、刘素珍均为报社造反派头头）反党集团”成员，五一六、北决扬分子的百余人，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报社印刷厂职工一百八十多人，进过五不准学习班的有六十多人。印刷厂造反派头头、女工辛惠元进学习班时，带着出生不足四个月的孩子^②。

一些造反派成员在高压下违心承认自己参加了五一六、北决扬，同时向上向下攀扯。杨道远回忆：

在造反派中间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是当权派对造反派进行秋后算账的主要方式。在对我的批斗会上，他们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让一些原钢二司的人来揭发我。因为有人说过“北京抓了五一六之后，材料都转移到武汉来了”，于是沿着他们描画的这个“路线图”，逼迫原二司驻北京联络站的松涛一口咬定，是他在1967年8月把材料从北京带回来亲自交给我的，并说得有鼻子有眼睛，说是在武测的大字报栏底下交给我的，然后我把一大包材料揣在衣服里带走的。我反驳说，那个时候武测都是我们的天下，用得着象这样偷偷摸摸吗？而且这个话也只能骗骗外地人，武汉8月是什么天气？穿什么衣服？那么一大包材料在三伏天，单衣薄衫，有可能揣在身上吗？经我这么反驳后，再发言时就没有这些细节了。另外一次是李苏明发言，揭发我某日和他一起去见王力，拿了十二个五一六发起人的名单交给王力。在当权派眼里，这是李苏明揭发中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内容。可是，恰好这一天我被天津警备区接去参加天津的一个大会，这是有案可查的事实。那一天我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的，哪里腾得出时间去见王力？李苏明在专案组的唆使下胡编乱造的谎言不攻自破，结果在后来的揭发中也只好不提日期了。李苏明的发言制成了录音，每次批斗我的会上必放，只有在水运开批斗会时是让李苏明上台发言的。我本想上前打李苏明两个耳光，吐李苏明一脸唾沫，可是那样做会激怒台下的听众，增加他们批斗会的气氛。看在台下几千人的份上，我忍耐了。

^① 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条。

^② 参见湖北日报社革命群众《彻底清算林彪死党刘丰在湖北日报犯下的罪行》（1974年3月，铅印传单）。

另外一次是王彩珠的揭发，她说是我和方保林在钢二司司令部介绍她加入五一六这个组织的，填了表，宣了誓，我就是她的直接上级。专案组很高兴，下来跟我对材料，说王彩珠的这个发言是个原子弹。我说终究不过是肥皂泡，一根针刺下去就泄了气。我做了两点声明：1. 我不是五一六，更不是她的上级；2. 既然她自己承认是五一六，也肯定是有上级的，她揭发我的都是假的，说明她在掩护她真正的上级，你们去找她继续交待吧，可不要放掉了真正的五一六。专案组拿我没有办法，很不满意的说：谁揭发你，你都说人家在说假话，只有你一个人在说真话。我说，假的终究是假的，如果我要是编假话的话，你们连材料都没处核对。我不说假话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戳穿王彩珠编造的谎言，对专案组是个很大的打击，从这以后，他们就不再找我对材料了。我告诉他们，一生只参加过两次群众性的组织，一次是在1958年参加了民兵，第二次是参加了钢二司。钢二司是几十万人的组织，又是得到党中央、毛主席支持的，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革命群众组织，我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主要负责人，跑去参加那个几十个人的小组织北决扬算怎么回事？还有一个钢二司的头头承认自己参加了“决派”，没有承认参加五一六。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肯定有不得已的原因，才这么说的，……

二十五中的一个女同学在听了水院张建成、雷志茂的讲话（录音）之后，也是招架不住，当时就想着过关，承认参加了五一六，还咬了她们学校一大批人，连她妹妹也被咬进去了，害得她妹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她自己这一辈子都觉得抬不起头来^①……

在北京学习班里，张昭剑确定了将钢派与五一六联系起来的两条线：一条线是魏绳武—宋洛—吴传启—五一六的后台王、关、戚，另一条是钢二司驻京联络站—林杰—王、关、戚^②。

直到两清结束，新派头头和骨干中“挖出”的五一六分子远较钢派为少。王锦铭、彭勋在北京学习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时候，张昭剑没有宣布挖出新派与王、关、戚有联系的线索。北京学习班结束后，当局在新派中挖五一六取得进展。两个新派主要头头承认参加了五一六^③。1970年上半年，新湖大革委会委员、武装部长陈步东在批斗彭勋大会上揭发：新湖

^①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第307—309页。

^②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80页。

^③ 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原新湖大某头头的记录。

大有五一六，1967年5月16日成立于31号楼，到会二三十人，陈步东主持会议，彭勋宣布新潮大五一六组织正式成立^①。华工在咸宁搞斗批改期间，新华工革委会宣传部副部长、红反团成员柳书伦承认自己参加了北决扬，并供认了一批人，无线电系一陈姓同学因此推迟四年才得以分配^②。约在1970年3月前，三新驻京联络站某负责人揭发，数十名新派头头和骨干在北京填表参加了“新武汉五一六兵团”。新华工驻京联络站成员梁前文被迫承认他参加了“新武汉五一六兵团”，1971年10月8日他写下《关于杜先荣的证明材料》^③再次证实此事：1967年7月13日晚，在京的新派头头在北京矿业学院（三新、中学红联联络站驻此）主楼平台召开会议，新派主要组织都有人参加。主持人宣布成立“新武汉五一六兵团”，“暂不公开，对外就叫新武汉”。在场的四五十人当即都填了表。会上“选出了王锦铭（工造总司头头）、张汉卿（新华工头头）、谢建生（新一冶头头）、叶妙元（新华工成员）、傅廉（省交通联司头头）、陈螺钉（新潮大驻京联络站负责人）、孙光泰（新华农驻京联络站负责人）及长办一人担任勤务组工作。”新潮大头头谢邦柱也参加了这个会并填了表。

王锦铭1970年1月在北京学习班上被逮捕，是否与这个“新武汉五一六兵团”有关，尚未得到证实。

据武汉市官方统计，武汉市的一打三反运动从1970年2月中旬到11月底止，共立案35461人，其中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革命、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等“十种人”3428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3336人^④。

且不论已立案的“十种人”和“贪污盗窃”者、“投机倒把”者中有多少被诬陷的造反派。立案总数减去上述人等，下余28697人，占立案总数的80.9%，属于什么性质没有交待。“十种人”和“贪污盗窃”者、“投机倒把”者就是一打三反的全部对象，很明显，其余二万多人是无法安上罪名的被打成决派、五一六的造反派群众。没有立案而受到迫害的造反派

^① 2019年11月杜先荣访谈彭勋的记录。

^② 2019年12月杜先荣访谈陈定方的记录。

^③ 这份材料现存杜先荣处，材料上盖有“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第二团外调专用章”。杜先荣为武汉一中六七届初中生、中学红联驻京联络站负责人，在北京与梁前文相识。由于三新驻京联络站某负责人的揭发，1970年3月在农村插队的杜先荣被省市县专案组认定为五一六分子。一年半以后梁为杜先荣专案组出具证明杜先荣参加五一六的材料。

^④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43页。

群众有多少，至今查不到具体数字。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13号文件《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决定》说：“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

中央规定此文件发至地、师级，曾、刘不予传达。因为文件说“要防止扩大化”，而曾、刘从来不承认湖北两清存在扩大化。但文件说的“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集中力量落实罪行，曾、刘都照办了，因为经过一年多的清查，他们深知，根本不存在的决派“组织关系”实在难以落实，威逼利诱下画出来的决派“表格”五花八门。而在决派中设计、油印、保管“决联站登记表”的陈瑞文在学习班里承认确实存在“决派表”，只是从这个决派“组织部长”手里一张也找不到了。

于是曾、刘开始“查大事件”，只要坐实“大事件”，不管你交不交待组织关系、是否填了表格，你就是五一六、北决扬。于是，从省、市、地区、县、公社到每个单位都列出“大事件”，省委列了十五个，“武船有二十八大事，武锅有十大事件，长办有十六大事，国棉一厂有六大事件等等。有的甚至在车间也列什么‘大事件’。”^①曾思玉指示：“查三怪（怪人、怪事、怪现象）嘛，怪现象多得很，文化大革命搞无政府主义，一万人，一个人身上找一件，就是一万件。”^②

两清一批中这一策略的转变，使得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北决扬更为便捷快当。中南汽车制造厂20名群众组织头头被定为决派骨干分子，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第三制药厂70%的职工被打成北决扬分子^③。新华瓦楞厂、武汉机床厂、武汉汽车配件厂分别有职工240、1700、2800人，造反派成员分别为60、800、2000人，分别挖出决派分子34、600、1600人^④。

不重组织关系和表格而重“罪行”，这样来进行两清的成果，在《武

^① 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75条。

^② 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刘志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 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75条。

^④ 参见杜则进《我们怎么办？——兼评“六条”》（1974年3月20日，大字报）。

汉大典》里有所记载：

武汉市的“两清”工作，主要是从抓大事入手，省、市专案联合小组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列出大事件，收集材料，共获各种物证 28666 份，到 1972 年初，市专案联合小组掌握大事 26 件，各区、局及大单位掌握大事 238 件，省专案联合小组也掌握数十件大事。为查清各种大事件，还组织了许多协作小组，如省里交办的“反党乱军”事件，市专案联合小组就组织了 4 个协作小组进行调查取证。到 1972 年初，全市有专案计 144 起，其中认定属于“五·一六”70 起，占 48%；认定属于“北、决、扬”74 起，占 52%。市专案联合小组直接掌握 42 起重点专案，认定多数应交专政机关处理，少数不属于“五·一六”和“北、决、扬”。……全市被定性为“五·一六”、“北、决、扬”多达数万人^①。

比起官方统计的 1970 年以两清为重点的一打三反运动 80% 的差错率，1971 年以“查大事件”为主的两清，官方公布的成绩近乎完美：全市专案准确率 100%，重点专案多数准确。

第五节 林彪事件后“两清一批”继续

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两清一批持续 4 年。1971 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刘丰倒台后仍在继续，直到 1973 年底曾思玉调离后才基本结束。

“九一三事件”后，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军代表在全厂大会上说：“吴焱金，你要放老实点，你的后台林彪倒了，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揭发林彪，争取从宽处理。”吴焱金莫名其妙：“林彪什么时候变成我的后台了，他不是你们解放军的副统帅吗？”吴焱金在回忆录里感叹：“不论中央有谁倒台，必定是造反派的后台，我们就是这样不断地被掌权的当权派反复折磨，颠倒黑白，任意打击。”^②

这个军代表的话不是他个人的发明，将林彪路线与造反派强行捏合、继续整造反派是湖北当局的宗旨。1972 年 4 月开始举办的造反派头头学习班就要求“上联林彪、陈伯达”，“敢于与林贼靠线，挂在一起”。

1971 年 11 月 20 日毛泽东主席对曾思玉说：“你那里有北、决、扬，要注意政策，我跟你讲过，你不相信，你又搞过了一点。还是宽大为怀嘛”。

^① 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1976）》第 865 页。

^②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 139、142 页。

1972年4、5月间，省革委会政工组调查“搞过了一点”的情况，刘志参加，调查了水院、武汉机床厂、化工部第四设计院、孝感柴油机厂，结论是“打击面太宽了”。曾思玉在政工组给省委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据刘志揭发，曾的批示“第一个意思是，你们挑选的单位不典型，不能代表湖北的情况；还有一个意思，不同意打击面宽了。”^①

1972年4月11日至1973年1月底，省委在武昌首义路省委第二招待所举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由省清查办公室和省公安厅直接控制，武汉军区副政委张玉华、政治部副主任刘志负责，三办徐健等为工作人员。参加这个学习班的83人名单，将武汉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全部包括在内，其中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23人，领导干部16人。据刘志揭发，毛泽东批评曾思玉“搞过了一点”后，“曾指示要重点清查”，“他说有些单位该清查的还没有查出来，要继续清查，清查其幕后指挥者和操纵者。”“首义路的学习班，就是省里办的重点清查的学习班。”这个学习班的目的，是挖“武汉五一六分团”。3月1日省委常委会定名单，胡厚民、任爱生、杨道远、孟夫唐在内，曾思玉亲自加进一批人，其他（省委）常委“也加了名单”，共83人。学习班开始前，在汉口红旗饭店举办学习班骨干培训班^②。1974年3月批林批孔时造反派编的材料揭发：1972年3月26日，刘志在红旗饭店骨干学习班上说：“这些人都是湖北地区多次反复的制造者。这次是一场硬仗，他们有反革命经验，破坏我们几年了，我们为什么不攻他们呢？”“这次学习班对象的政治性很强，他们是林、陈死党，‘5·16’、‘北、决、扬’的骨干，有的是幕后指挥，这种人是重大政治问题。”“这些人见过世面，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中央的、地方的学习班，有很多反革命经验来对付我们，不能拿过去那种不好的方法来对付他们。要研究他们每个人的特点，要各个击破，我们要有信心，不怕困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③1974年4月2日刘志承认：“在红旗饭店办了骨干培训班，同志们的《一百条》材料属实，只有一句话有点出入”。

1974年3月31日，造反派从省一招5号楼运出一批省两清办公室整

^① 1974年4月2日军区三办刘志对造反派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的谈话，见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② 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1974年4月2日）。

^③ 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89条。这个材料是湖北省委决定编写并提供材料、由省市总工会发送的。



上图为夏朱胡专案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1977年4月)第97页

的五人是杨道远、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柳英发，囊括了整个二司勤务组；另一个是1972年11月拟定的“18名特别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名单”，柳英发记得的有十人：朱鸿霞、胡厚民、李想玉、刘闯、魏绳武、杨道远、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柳英发。名单下方有曾思玉的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①丁家显也知道有这样一份“要处以极刑”的名单，他本人名列其中^②。柳英发回忆：朱鸿霞生前说过，1974年造反派抄出曾思玉下的密令，要把我们置于死地。

从省委5号楼运出的两清材料中有一张“武汉地区5·16阴谋集团联络图”，“写字桌桌面大小”，“把原来各群众组织的一些头头几乎全部框进去了”，“下到一些基层的头头，比方说江岸区环卫所是个小小的单位，

^① 参见柳英发《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一个真实的杨道远》，此文是为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一书写的序。

^② 参见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605页。

理的专案材料。这批材料中有一份“人头名单(268)”，据1974年4月杜则进文章记载，这批专案材料里还有一箱关于这268人的“重点人物立案材料”，其中竟然有为长办联司头头严常事先准备好的“死刑判决书”。

柳英发当时看到这批材料中的一份，标题为“268名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名单”。柳英发还看到1972年省学习班的两个材料，一个是“关于对柳英发的突破方案”，“方案”中说柳是“武汉五一六分团核心班子成员、二司‘五一六’五人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二司‘五一六’五人领导小组”

就有五个工人名列此表！甚至李衍授、陈克东等省委领导干部，也成了省委内部潜伏的‘5·16’骨干。”^①

首义路学习班还设有若干小班，有胡厚民、李想玉、杨道远、胡启生、方保林、丁家显、张涛和孟夫唐、任爱生、刘真、张华等十几人。他们都是单个“监护”，不住首义路招待所内，仅与大班一起开会，且有专人押送，不准与大班的人接触。孟夫唐“一直是陈再道、百万雄师重点打击对象，他是全省造反干部的总目标，‘打倒孟老狗’的大标语在荆楚大地铺天盖地，一次一次被批斗。在学习班因年老体衰，行动迟缓，据说挨过一年轻军人一耳光。”^②

1974年3月邵正茂编《一百条》记录了首义路学习班的一些情况：

(88) 在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而且每个同志都要带上2~8个不等的专案人员跟着。连中央委员夏邦银同志也不例外。在学习班里还有带枪的解放军“保护”着，甚至来学习班放电影的也是公安人员。在七二年八月份，由于朱鸿霞、吴焱金等同志感到这个学习班不对头，想冲破曾思玉的控制，上访中央，事情被刘志发觉后，在八月六日晚上，出动了很多武装的解放军，岗哨密布，如临大敌，马兆昆和刘志亲自出马，搜腰包，缴本子，一片白色恐怖。

(90) 在省学习班上，不批林，更不批刘丰，而是借批极“左”，专批胡厚民和杨道远、李想玉、任爱生等同志。学习班提出了所谓：“上联林彪、陈伯达，下联武汉地区历次反复，中间把自己摆进去”的口号。1972年6月7日，学习班负责人刘志在全体大会上说：“林、陈的幽灵在首义路上空盘旋。”刘志把学习班学员分为三类：一是联系自己联得好的，即敢于与林贼靠线，挂在一起的；二是尚有些顾虑的；三是不与林贼挂在一起的，就是负隅顽抗的。

(91) 省学习班后期，对绝大多数学员都做了所谓的“结论”，装入档案，具体分四种情况：

- 一是与核心有联系，犯有严重罪行的，定为反革命分子；
- 二是与黑线有联系，犯有一般罪行的，也定为反革命分子；
- 三是与黑线有联系，有严重错误的，定为严重政治错误；

^① 参见杜则进《极右不批 是非不明——兼展望湖北问题的前景》（1974年5月）。

^②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49页

四是有一般错误的，定为一般问题。

首义路学习班结束后，按照曾思玉的指示，胡厚民、任爱生、杨道远定为“敌我矛盾的性质”，“继续审查”。

1972年6月，首义路学习班正在进行中，中旬，武汉市委召开政工会议，会议文件《关于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意见》说：“有的单位对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工作抓得不够很紧，决心不是很大，也有的‘五一六’、‘北决扬’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还没有挖出来”。“要上挂下联，……狠批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狠批‘五一六’、‘北决扬’的反革命罪行和极‘左’思潮，狠批边反边犯的行为”。“对已经批准的批斗对象，要充分准备，组织好批斗，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鼓舞群众斗志，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气焰”。“认真贯彻执行省委（1972）35号文件，继续重点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骨干和幕后操纵者”。“凡属‘五一六’、‘北决扬’的重大事件，都定为重大案件，报上级批准。”^①

1972年9月11日，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上报《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的问题的试点工作报告》。《报告》说：“在11个试点单位中，被审查的对象448人，其中有91.8%不属于‘五·一六’、‘北、决、扬’问题，9个单位没有‘五·一六’、‘北、决、扬’组织。试点工作结束后，全市解决‘搞过了一点’问题的的工作全面展开。至翌年2月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五·一六’、‘北、决、扬’问题进行审查的共33659人，经查证落实参加‘北、决、扬’组织的177人。其他人都作了否定的结论。”^②

这个报告所言“作为‘五一六’、‘北决扬’问题进行审查的共33659人”，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但无中生有地审查三万多人（市“清办”统计，立案41104人^③），也反映出两清的残酷与荒谬。11个试点单位共审查448人，错搞了91.8%；全市审查33659人，落实177人，仅占0.5%，这显然不是“搞过了一点”。这个报告上报省委的时候，“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两清”在武汉已进行3年之久，规模空前，结果当局自己承认：

① 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86条。

②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55页。

③ 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23条。

五一六分子一个都没有，北决扬只有区区百余人！

1972年9月武汉市委的报告已经提出两清严重扩大化的现象，湖北当局不为所动，11月23日，省、市召开的专案会议仍布置继续“深挖”，要“明年解决敌我问题”。1973年5月14日还在公开下文要求“深挖”。1973年7月，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在专案人员汇报会上说：“我们搞清查工作，查出了五一六是成绩，查清了不是五一六也是成绩，这个工作还要继续搞，这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能半途而废。……至少还要准备搞一两年。”^①

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对原武汉机械学院学生刘汉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搞了六十几万人^②。

1973年12月26日，曾思玉在其调离湖北前举行告别会见，他说：“湖北清查五一六、北决扬，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同志道歉。”^③

1974年5月21日，湖北省委办公厅所发《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说，湖北省的“两清”工作发生了严重错误，刘丰是林彪死党，曾思玉同志是好人犯错误。

两清中的北决扬问题原本有清晰的来龙去脉。曾被学习班说成是决派“组织部长”的武汉六中高中六六届学生陈瑞文，在《决派“组织部长”的回忆》一文中，对决派的始末有详细的表述。他写道：“说决派是个组织混乱、结构松散、人员复杂、进出自由、无组织、无纪律、无约束、无奖罚、无政府主义的大杂烩，那倒是名副其实。”“决派没有任何阴谋，而当年的当权派出于政治需要而密谋策划、捏造罪名、编造事实，才是真正的阴谋。”据陈瑞文所言，决派这个所谓“地下组织”是这样登记加入的——“（我）设计了‘决联站登记表’，有单人的、有多人的（由单位负责人填写）、组织的三种，用油印机印了很多，堆在桌子上面，供需要者取用。”

决派登记表确实存在，填过表的人估计有上万人。陈瑞文的文章说：“陆陆续续填好的表格有一尺多高。因决派地址经常变动，我担心遗失，故统统拿回家中。”一尺多高的当时常用纸张，约有五千张，即约有五千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49—150页。

^② 田力为2002年采访刘汉武的记录。

^③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52页。

人填过表。实际上人数应该超过五千，因为一个组织集体加入只需填一张表，陈瑞文说，记得有洪山区青菱公社红旗大队、武汉低压锅炉厂等单位的群众组织集体填表加入决派。

王仁舟离开武汉、鲁礼安的武汉决联站成立后，原来跟王仁舟联系的一些中学生，以航空路中学（隶属武汉地质学校的普通高中）学生为主，在汉口省交通厅楼内成立“决派汉口联络站”，与鲁礼安的那个武汉决联站不相统属，往来也不多。航空路中学学生袁建疆拿来决派表格，很多中学生填表参加。地质学校约两千人，90%参加决派，包括一些三字兵。市果品公司工总集体加入，由蔡姓头头填表^①。

奇怪的是，曾、刘及省、市清办对上述两条重要的决派线索并不重视。陈瑞文在他的文章里说：“工宣队知道，所有的决派名单在我手里。”陈瑞文的两清学习班只办到区一级，不是单独关押，同一学习班里还有很多其他单位的造反派。他的家也没有被抄过。航空路中学的决派骨干只是在学校里办学习班，反决派的一中学生受到的惩治比他们重得多。

对北决扬这个组织本身，1979年湖北当局给出一个说法：

1979年10月，湖北省高级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中写明：“‘北、决、扬’不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因此，此案不作反革命组织处理”。“对鲁礼安、冯天艾、蔡万宝、严琳免于刑事处分，对甘勇、童丹、马业成不以反革命论处，予以释放。”

至于在全国牵涉到上千万人的“五一六”案，至今是个没有解开的谜团。被打成五一六在湖北总代理的杨道远2010年写道：“张昭剑在湖北班抓五一六重点整我，说五一六的后台是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到今天为止，我一直没看到王关戚是五一六的后台的证据。王力在《反思录》中说：他被关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人找他问过五一六问题。王力说他出狱后才听说世上还有个王关戚、五一六问题。你看可笑不可笑。可见逼我们承认跟着王力组织五一六，是何等别有用心，是何等荒谬！”^②

“北决扬”案多多少少有迹可寻，武汉的“五一六”案绝对属于无中生有。张建成说：“这么大一个冤案、假案、错案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为

^① 2010年钟逸采访原航空路中学季彪、朱汉平等的记录。

^②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280—281页。

什么最后不了了之？在为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成风的年代，唯独对‘五一六’的冤、假、错案置若罔闻，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到底是什么原因？”^①

^①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61页。

第五编

批林批孔—全面治理整顿—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1年10月—1976年9月)

第二十三章 “批林整风”：相对平静的两年

武汉地区造反派因五一六、北决扬案全体坠入深渊之际，“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集团覆灭，中央开始强调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批林”逐渐从批极左思潮转向批破坏文化革命的“极右实质”，军队逐渐撤出“三支两军”，当政湖北的军队干部粗暴的执政方式有所收敛。除胡厚民、任爱生、李想玉、杨道远、魏绳武等少数人被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被清查的造反派压力有所减轻，从而对夺回文革成果产生新的希冀。



“工农兵学员在工厂实习期间，举办批判林彪的黑板报”（湖北省党史办资料）

第一节 曾、刘失势

九一三事件后，“批修整风”由批判陈伯达转为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公开提法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直到1973年初，批林就是批他的极左，批社会上的极左思潮——“空头政治”“无政府主义”“精神万能论”等。

“王洪文事后点破：‘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①

1972年12月4日，人民日报社业务领导小组内分管理论部的成员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说：“现在报纸宣传面临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反‘左’还是反右，我想向您汇报并请示。”“总理在八月一日的讲话中，说到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并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八月八日，春桥、文元同志对报社领导小组讲话。在谈到宣传上批‘左’的问题时，春桥同志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由于林彪利用批判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批林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复过去批刘的错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批过了头，还是没有批透？”^②

17日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③

1973年元旦两报一刊《新年献词》提出：“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批修整风，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风”。

批林整风的方向从批极左思潮转到批极右实质，省市市委在对待七年来文革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这个转变，也与曾思玉、刘丰分别被中央定性为林彪“活党”、林彪“死党”相关。

《毛泽东年谱》记载：

（1971年）10月29日（毛泽东）阅周恩来本日晚七时报送的关于二十七日政治局议事报告。报告说：政治局会议讨论各地揭发批判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情况，一致认为，武汉、成都两个军区问题较大，需要中央给予帮助。根据会前与毛泽东商定的设想，中央政治局准备在北京召开武汉、成都两地区党政军负责人座谈会。会议提出中央帮助解决问题的总的方针是：“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毛泽东批示：“可以。”^④

①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电子版2017.2版）第637页。

② 王若水《就批林是反“左”还是反右给毛泽东的信》（1972年12月4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③ 王年一《大动乱年代》第45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13页。

10月30日，曾思玉、刘丰、方铭、张体学等奉命进京，清查、揭发林彪集团插手武汉的罪行，重点解决曾、刘与林彪及其死党的关系问题^①。

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时说：我看你们比武汉爽快，武汉的报告还未写出来，他们有点顶牛。顶牛也好，不做墙头草^②。

11月17日，曾思玉等10人向毛泽东、党中央写出《学习汇报》说：“来京学习，经中央领导同志帮助，曾思玉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检查自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刘丰却躲躲闪闪，避重就轻，态度十分恶劣”^③。

11月18日，刘丰服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未遂^④。

11月20日，毛泽东接见武汉地区曾思玉等9个领导人，教育曾思玉等“要跟党，跟路线，不要跟人，人是会变的”；“对人民不利的东西不要办，要保持晚节，继续革命”。曾思玉等表示：“一定坚决、彻底改正错误。用实际行动，永远跟毛主席，跟党走，跟路线，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⑤。毛泽东还说：“你们回去开个扩大会，要讲一遍，无非是北京这一遍，检讨我看可以了，允许人家讲。要注意政策，还是宽大为怀嘛。整人要素少，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大，只要坚持这个倒不了的。”^⑥

北京座谈会结束，曾思玉回汉，不同意省、市革委会内的群众代表参加省委扩大会，听取传达北京座谈会精神。他说“群众一听就要崩了”。张体学说：“毛主席叫传达，就传达；毛主席叫传达到什么范围，就传达到什么范围。”张体学在滨江饭店向58名群众代表作了传达^⑦。

以曾思玉为首的湖北当局不愿意在否定文化革命、镇压造反派这一点上批判刘丰，连“搞过了一点”的“最高指示”都不接受，更不愿意动员群众来批判，因为这会牵涉自身，更因为他们认为把造反派当敌人整没错。到1972年7月，孔庆德还公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抓牛鬼蛇神抓早了，

①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5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17—418页。

③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51页。

④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51页。

⑤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51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20页。

⑦ 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77条。

现在抓就好了。”“林彪是你们（造反派）的老祖宗，不批你们批谁？批极‘左’就是批林彪。”^①

直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不管造反派以何种方式呼吁，湖北当局对待批刘丰和两清扩大化问题，基本是这种态度，造反派称之为“捂盖子”。

第二节 从五不准学习班到座谈会

1972年4月开始、历时九个月的首义路学习班，虽然挖“武汉五一六分团”的声势很大，计划周全，但毕竟处在批林整风的大环境下，且刘丰倒台，曾、方、张受批判，造反派头头开始对抗了。

李承弘回忆：“管理比北京（学习班）松，周六晚放假，周一上午早餐前赶回就行，虽说每人配有专案人员，但没有监视任务，应该说人身、言论还是自由的。”^②

当时中央有人强调批林整风就是批极左思潮，曾思玉和这个学习班的主持人张玉华、刘志也不例外。顾建棠回忆：他所在班的杨世华班长反复向他们宣讲：“学习班的任务是批林整风，批林彪的罪行，整自己的风，所以要把自己摆进去。”“武汉有个北决扬，曾司令员讲了，北决扬就是五一六的变种。”“五一六的后台是陈伯达，陈伯达的后台是林彪，林彪才是五一六的总后台。”顾建棠发言说：“经班长多次开导，我懂了，参加批林整风，我们应当将自己与五一六联系起来，再与陈伯达联系起来，然后与林彪挂钩，把自己摆进去，我们的风就整好了。是这样吧？”他和湖大的梅子惠、华工的赵文成商定，“要控诉自己多年挨林彪集团的整，戳穿他们借批林为名把我们打成五一六的鬼把戏。”他们发言说：“陈再道对我们武力镇压，死的死，伤的伤，有厂难回，有家难归。”“林彪死党刘丰借清队狠捅革委会的马蜂窝，死整所谓马蜂王，批的批，斗的斗。”“刘丰以贯彻九二七指示为名把我们打成北决扬分子，两清一批又把我们打成五一六分子。”“先说刘少奇是我们的后台；陈伯达一垮，又说陈伯达是我们的后台；林彪倒了，又说林彪是我们的总后台。将来还有没有人又会成为我们的后台？我们到底有多少后台？”赵文成说：“毛主席说刘丰是

^① 参见“杜则进”写作组大字报《省市委怎么办？》（1974年3月13—14日凌晨）。

^②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49页。



原新华农头头谢文照的首义路学习班出入证（谢文照提供）

林彪死党，没有说造反派是林彪死党，怎么不整刘丰要整我们？”^①

在学习班里，传达了毛泽东两年半前（1970年2月）在武昌关于五一六的那一段话。大家闲谈时说到两清从抓组织关系改为抓大事件，“一些承认了的头头就背了思想包袱，在主流造反派看来，凡承认了的完全不可原谅宽恕，下场应与内奸叛徒一样。”^②

学习班的学员们抓住一个把柄，大闹一场。李承弘回忆：

一次偶然机会（李苏民）偷看了管他的专案人员的一本工作笔记，本子上记录了在学习班正式举办前专案人员骨干会议上，专案组刘志讲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参加学习班的人，成分出身大都不好，这批头头在武汉湖北的文革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反革命经验，对他们不能轻视小看，他们是湖北的祸根，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等。

刘志的内部讲话与对我们的公开讲话，完全是两面派，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李苏民把偷看内容先向组内透露了，接着全学习班就闹开了锅，要求刘志澄清这份讲话，搞得刘志下不了台，最后只得搬出很多造反派信任的张体学出来救场。张体学在一个晚上召开大班全体会议，要灭灭学习班的怒火，张体学首先不承认有刘志的讲话，他装得极为诚恳，以老朋友口吻说：“怎么会呢？我们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你们的方针始终是治病救人。”

随后拉关系，与各派套近乎，诉说他与造反派文革中的交情，把错的都推给部队，最后劝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并威胁对挑拨离间分子要严厉查办。在大会上李苏民不知是受到警告，还是他的手段拿不上台面，反正李

^①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47—248页。

^②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52页。

没反驳证实。

……会后张体学连夜找几个挑头人个别谈话，又许愿，又威胁，张体学使出了十八般武器，终于在学习班把此事压下来了^①。

参加了这个学习班的柳英发回忆：当时张体学还对我们说，在湖北武汉，胡厚民、杨道远若不是五一六，那就没有五一六了。

1974年4月刘志承认他确实有这样一个讲话。

历经九个月的学习、批判和自我批判，“武汉五一六分团”没能挖出来，学习班前定下的罪名仍在，学习班结束时对学员又分四类作了“结论”，但造反派头头们已经不当回事了。

1972年春季基层造反派群众就自发开始抗争，1973年春季逐渐走向社会。

1973年3月，武汉市委在汉口六合路市一招待所召集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聂年生和部分企业造反派头头座谈，加上“陪同人员”（不称“动力”“骨干”了）约四十多人，历时一周。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讲话说：“围绕林彪死党刘丰的罪行，结合我市的具体情况，抓住那条路线的极右实质进行揭发批判。……毫无疑问，我市的两清一批尽管方向对头，很有必要，但是由于受林彪、刘丰他们的干扰，也存在很多问题。大家也知道，我和市委的一些同志也是刚刚站出来工作，有很多事情也不清楚，这就需要同志们帮助，也要给我们时间。……把大家请来，就是要听大家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有事摆在当面，敞开来谈，光明正大嘛。各单位组织上都派人来了，确实有问题，合理的要求，回去向领导上通气，尽快解决。一时有困难的，也应该好好地当面跟人家讲个清楚，回避、拖拉都是错误的。请大家放心，我们不会打棍子、抓辫子的，那不是无产阶级政策。”

王光照这样评价这个座谈会：“短短的几天，一混就过去了，除了诉苦宣泄一番，没实质上的什么结果。官方应该有收获，摸到了我们这些人的活思想，从而可以想办法对付这些打不死的程咬金。我们这些人也认识到，批林彪、揭刘丰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利益纠葛在一起，阻力依然很大。归结到一点，是揭还是捂，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艰巨的大问题。”^②

^①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53页。

^②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15—317页。

两清以来，造反派头头被当局召去，都是关进准监狱式的五不准学习班。这次六合路座谈会与两个月前结束的首义路学习班不同，没有军人参加，造反派不再是整肃对象，而且允许造反派说话。此后多次座谈会都是如此。这种变化，与中央1972年12月后公开宣布批林要批他的极右实质相关。

六合路座谈会后直至批林批孔运动中，省市委召开了多次人数有多有少、时间长短不一的造反派头头座谈会，希望用这种方式，把批刘丰、解决两清扩大化等问题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里。

7月中旬，王克文召集肉联厂的谢妙福、武汉锅炉厂的王光照、省石油公司的詹仕金、汉光印刷厂的高远飞、武汉绒布厂的吴立春、市邮局的刘玉泉，代表市委宣布，给这六位“在各自单位都是很有影响的”人“办一次党校性质的学习班”，“统一认识，提高觉悟，总结出一些新经验，促进全市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个学习班在王光照他们看来，“完全是在‘闹眼子’（搞花架子），所谓学习是假，预防性的隔离是真。”省市委是希望他们特别是在社会上活动的谢妙福、詹仕金，在当局允许的范围内搞批林整风。王克文对他们说：“我市的‘两清一批’方向是对头的，是很有必要的”；这六人认为：“‘两清一批’是当年王任重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抛出的‘秋后算账’的血腥实践”。六个人“从清队、捅马蜂窝、一打三反、清查、深挖等切肤之痛中，大揭、大批，矛头指向省、市委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郭义富（主持学习班的江汉区委书记）和那些应声虫被追问得理屈词穷，只能拿‘要相信省、市委’、‘事情总是有个过程’、‘这些问题提出来就好’等不疼不痒的鬼话应付”。王光照认为这个学习班是几年来“环境最宽松”的，“一日三餐，吃了吹，吹了玩，晚上我们可以顺着公路东逛逛，西走走，到田间地头同农工们侃大山”。“最有兴趣的是几个人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家。我们用鱼刺、肉骨头放在树根洞口处挑起两群蚂蚁争抢、打架，冲着它们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无聊之极，可见一斑。”学习班历时五十多天，双方认识没有统一，也不知道当局是否“总结出一些新经验”^①。

10月，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省委书记、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时称两赵一王）在首义路省二招召开造反派头头座谈会，历时四个多月。赵

^①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19—324页。

辛初在座谈会开始时讲话说：“把批林揭刘的斗争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讲错了也不要紧，我们一不打棍子，二不戴帽子。总之，真心诚意地欢迎大家提出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加以克服，从而解决我省存在的问题。”座谈会上，造反派头头主要针对两清一批严重扩大化问题，摆出大量事实，当局的回复一律是“一步一步来”“急不得”^①。

这次座谈会未结束，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

第三节 造反派开始又一次抗争

中共中央1972年11月4日下发了关于解决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问题的42号文件。文件指出，河南当政者王新上了林彪的贼船，陷得很深，决定令其离职反省。文件所附中央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说到，王新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他扭转批林整风的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乘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湖北省委召开了贯彻42号文件的省委扩大会议，中央首长对这次会议作出指示：“要广借42号文件的东风，联系湖北的实际，解决好湖北的问题。”张体学签发了省委72号文件（12月18日发出），文件引用了中央首长上述指示，并说中央首长的指示完全正确，要坚决执行。文件附刘丰的罪状十条。文件下发几天后，曾思玉从河南回汉，以此件未经他签发为由将其收回，改发“刘丰罪行材料（15条）”。这个15条，后来造反派认为是“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②。

当时首义路学习班还在举办中，张体学等来学习班传达了42号文件并中央首长的那一段讲话。王光照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潘振武副政委在那里对群众代表尽力淡化事态，他讲：刘丰不送情报，还不是跟大家一起回武汉了。孔庆德副司令更是话中有话地讲：刘丰送情报，省委没有送情报嘛。省委是正确的。出了刘丰，无损于省委的一根毫毛。你们（群众

^①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40、343页。

^② 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93条。

代表）不要头脑发胀，我是个老粗，讲话直来直去，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在新形势下犯新的错误。”^①

基层造反派风闻有这么一个对造反派非常有利的中央文件，苦于看不到全文。武汉肉联厂谢妙福、武汉制药厂丁元芳通过各种途径从河南造反派那里抄来了这个毛泽东批示“同意”的文件。

谢妙福“同时也把河南造反派进行斗争的情况做了调查，带回了一些他们的小报、传单。读后有一个总的印象，河南形势大好，受整的造反派得到平反、赔礼道歉，落实政策进展很快。……这些信息很快在武汉传得沸沸扬扬，武汉受压、受整的造反派由此受到极大的鼓舞。”^②

1972年春，一些造反派普通成员就开始串连^③。他们分析两清一批以来造反派面临的局势，同时对头们放弃抵抗、一心走“合法道路”极度不满，决心“自己解放自己”，“把颠倒的武汉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从1973年初开始，这一类人逐渐增多，分成几个“摊子”聚集，大字报、街头讲演、街头集会越来越多，中共十大后达到高潮，形成了声势颇大、延续到1975年春的“反潮流”运动。

1972年3月5日至4月4日武汉市委召开工作会议，认为市委工作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两清“搞过了一点”^④。会议揭发批判市委书记张昭剑的问题，对市委第一书记方铭所犯严重错误进行批评^⑤。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此后，三支两军人员除少数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外，大部分陆续撤回部队。

1973年1月6日，武汉市575名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至7月底，全市陆续撤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共1232人。年底，部队人员基本归队。翌年2月，武汉警备区三支两军办公室撤销^⑥。

1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通知：王克文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免去方铭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⑦。赵辛初1973年6月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4页。

②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1页。

③ 武汉地区反潮流战士窦则胜编辑部主编《武汉的反潮流》（1974年4月21日，铅印传单）。

④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52—353页。

⑤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66页。

⑥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57页。

⑦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68页。

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2月底曾思玉离任后任省革委会主任。

此时，矛头指向以曾、刘为首的各级掌权军人的大字报出现，主要批判他们极其粗暴地对造反派群众实行反攻倒算，还涉及一些军人化公为私搞特权，比地方干部更为明目张胆。

武钢造反派工人陈祖坤在回忆录里写道：“武钢革委会成立后，权力由军人掌握，解放出来的干部只能过问生产、技术问题。康星火来武钢，将大量军队干部带进武钢及下属六十多个厂矿部所，把持了各级革委会的主要部门，如政工组、生产组、办事组、后勤组的组长基本都是军人。他们一朝权在手，就为自己谋取私利，很快将自己的老婆孩子、亲戚六眷从四面八方迁来武钢，安排在最好的岗位上。他们把冶金部拨给武钢的家属工转正指标，厚颜无耻地给自己的老婆。他们到处强占住房，捞取各种利益，一个个捞得盆满钵满。武钢十万职工看在眼里，只能恨在心里。把造反派这伙‘不安定分子’打下去了，谁还敢对他们的这种无耻行径站出来说话？我总想再发动一次反复旧。”^①

武汉锅炉厂的大字报揭发，刘丰来厂视察，与工人握手后当即用酒精棉球擦手，与周恩来来厂时的举止形成鲜明对比。军代表在招工、提干等方面违规安排家属子女，甚至把农村的小脚女人弄进厂当正式工。让工人做几套家具拉回家，分文不付。“还有的人跟军宣队走得近，甚至深夜与军宣队的人在车间办公室伏案贴面‘研究案情’，用尊严和肉体换来提干、纳新。”军代表的这些作为，保守派的工人同样看下去，主动找到王光照，要求和造反派一起行动起来，“把在我厂蹲点的林彪死党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扭转我厂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按兵不动的局面”^②。

一些大中型企业的造反派头头也在酝酿向省市委提出要求，揭开刘丰在湖北推行林彪路线的盖子，解决两清一批严重扩大化的问题。王光照回忆：“当时我们这些所谓的造反派主流经常以各种形式在一起讨论、交流，以求统一认识”。“虽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愿意以社会公众为受众，在街头大闹，认为容易产生负面效果，甚至授人以柄，达不到解决问题的预期目的。怎么办？我力主解铃还需系铃人：直接同省、市委领导人

^① 陈祖坤《吹尽黄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64页。

^② 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2—337页。

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争取直接而迅速地解决问题。”他们认为，赵辛初文革开始以后不在湖北，“比较超脱”；王克文“同情造反派”，对刘丰、方铭“满腹怨气”，“对我们揭批两清的问题，都是有利的因素”^①。

1973年9月3日，张体学在北京逝世。12月，曾思玉调离武汉军区，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王六生1971年11月已就任武汉军区政委。

中共十大后，除胡厚民、杨道远，造反派头头基本恢复了在省市革委会的工作。吴焱金还被任命为武汉无线电元件厂革委会主任，武汉工人造反派头头中在本厂任革委会正职主任，唯此一例。1973年6月召开的湖北省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董明会、夏邦银、朱鸿霞、平毅被安排为副主任。5月26日至31日召开的武汉市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安排董明会为市总工会主任，吴焱金为副主任。5月4日至9日召开的共青团湖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高玉泽、张立国为团省委书记。7月5日至11日召开的湖北省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谢望春、王彩珠为省妇联副主任。9月，经周恩来过问，省委指示长办恢复顾建棠党的组织生活，当年国庆节与曾思玉等一起出席庆祝活动^②。

文革开始后，共青团、妇联都停止活动，工会不一样。1967、1968年各地由造反派组织组成的工代会，作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届工会中特殊的一届，得到中央承认。1973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17号文件《转发北京市委、上海市委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的批示》。这个文件所附北京市委的报告写道：“一九五〇年以来，北京市先后开过四次工会代表大会，一九六七年开过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因此，这一次定名为北京市第六次工会代表大会”。上海市委的报告写道：“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召开了上海市革命工人造反派代表会议，一九七二年初，上海市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改名为上海市工代会……这就为召开上海市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创造了有利条件”。文革前，武汉市开过四次工会代表大会，而1973年6月召开的武汉市工会代表大会，定名为“武汉市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与中央肯定的北京市委、上海市委的做法不同，1968年1月成立的“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这个历史事实被曾、刘抹去。

激起造反派特别是“街头派”起来抗争的不仅仅是武汉工会代表大会

^①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9、338页。

^②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249—250页。



1973年6月23日，湖北省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载次日湖北日报）

的序号。原市工代会只有 18.6% 的常委进入省、市总工会任常委，占省、市总工会常委总数的 17.4%。这种情况在基层工会的整建中普遍存在^①。批林批孔运动中，颇有影响的“杜则进”写作组在大字报《省市委怎么办？》中说：曾刘方张“四条汉子”对市工代会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恨之入骨，务砍掉而后快”，现今的省市总工会，没有以市工代会为基础，没有贯彻中央 1973 年 17 号文件精神，“必须予以调整改组，不是一个小修小补的问题”。

尽管如此，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总算暂时得到安抚，几十万被整治的群众虽然压力减轻，但当局对残酷的两清没有正式的否定性的表态，也没有善后的举措。王光照在他的回忆录中回顾这两年时写道：“毛泽东曾经讲过：闹事、闹事，有事才闹。民间俚语说：有事总会闹起来。”^②最先“闹起来”的是造反派里的一般成员，当局也一直把他们的行为称为“闹事”。

^① 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97条。

^②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1页。

第四节 原百万雄师成员开始公开活动

1971年底，已关押四年的“百万雄师”和“公检法”头头，处境得到改善，8个人搬到一个监号。1972年春节后，从监狱移到市公安局疗养院“监护”，行动基本自由，至3月21日释放。

湖北当局意图彻底整垮造反派，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七二〇事件是难以绕过的坎。九一三事件后，省市一些领导人开始造舆论，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王、关、戚和林彪集团制造的，开脱陈再道等一批当权派的责任。1972年3月22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审批组组长冯行慎、群工组组长刘华阶、预审组组长舒福元等人会见头一天释放的俞文斌等8人时说：“毛主席指示，七二〇是王力他们搞的。江青同志说，当时他们想一箭双雕，我们受了他们的骗，上了他们的当。”3月26日，军区三办主任刘志在红旗饭店骨干培训班上说：“湖北是林陈反党集团，用派进来、拉出去的办法，苦心经营，下了本钱的借用力量，组织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们要清算，他们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六七年七月，他们搞打倒陈再道，又谋害毛主席，一箭双雕。”4月11日，刘志在首义路学习班全体大会上说：“对七二〇的问题要重新认识，林彪死党三次阴谋谋害毛主席，第一次就在武汉哪，就是七二〇，他们想搞一箭双雕，既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又要打倒陈再道。”11月2日，在六合路市委招待所的“百万雄师”和“公检法”头头座谈会上，省委书记韩宁夫说：“毛主席说了，七二〇是王力他们搞的。”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副主任曹正科接着说：“王力是前台，根子是林彪，他们想在武汉搞一箭双雕，他们想在武汉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然后说是你们搞的，你们现在想起来不怕吗？”^①

此时，百万雄师成员为七二〇翻案的大标语和传单出现在街头，“社会上广泛地流传着省委韩宁夫给‘百兄弟’们传达的江青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毛主席说七二〇事件是王力搞的，目的是谋害毛主席，进而嫁祸给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1974年春，在省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当着两赵一王的面，王光照、丁元芳、吴焱金等当面质问韩宁夫，韩宁夫一言不发^②。

^① 参见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1974年3月）第79—82条。

^②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51—355页。

1973年6月湖北省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遭到百万雄师成员的激烈反对。汪扬回忆：

我召开了主要头头有关会议，发动群众，反对帮派上台，……在省总工会开会期间，我们被打死（者）家属高举血衣，我们伤残的群众数百人捧着药罐，涌到会场高喊：不允许屠杀工人的刽子手当工会头头，向朱鸿霞讨还血债！并在洪山省委礼堂门口贴了“成立控诉大会筹备处”公告。省总工会会议白天不敢开，改换会场，在深夜开^①……。

笔者就汪扬所言求证于参加湖北工会四大的省总工会老同志，老同志说：四大会期六天，没人闹事。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原百万雄师总站、分站一些头头在各区、各系统开大会成立组织，统一打出“工农兵”旗号，目标之一就是捍卫两清成果，提出两清“不能全盘否定、大搞一风吹”^②。

^① 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69—170页。

^②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37页。

第二十四章 武汉地区的“反潮流”运动

第一节 “小人物”·“街头派”

1972年春，武汉地区的两清一批还在进行，抵制两清一批的“街头派”（1973年中共十大后称“反潮流派”，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也称“革命群众”）就开始酝酿。这个活动到1976年的派别的特点是，以造反派中基层头头和一般成员为主体，造反派各组织的主要头头无人介入，他们以“街头”为主要活动场所，以要求纠正“两清一批”错误为切入点，“把颠倒了的文化大革命再颠倒过来”。他们对省市频繁组织的座谈会不感兴趣。省委1973年10月至1974年2月举行造反派头头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王光照回忆：座谈会开始没几天，“谢妙福、王华珍那些街头派的人也没什么兴趣，认为光清谈，不过瘾，他们又去街头进行活动，也不来了。”^①

“反潮流派”是一个比几年前的群众组织更松散的派别，武汉肉联厂工人、原厂工总头头、厂革委会副主任谢妙福是这个派别实际上的一号人物。被武汉造反派称为“湖北太上皇”的李先念，在1974年前后多次斥责谢妙福。1975年6月谢妙福被判刑七年，1976年10月8日，抓捕四人帮的第三天，日理万机的李先念没有忘记谢妙福，他在中央会议上说：“武汉谢妙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意即敌我矛盾问题），恐怕谢妙福的后台也是四人帮，有些是组织上的联系，有些是思想的联系”^②。李先念应该知道王洪文对谢妙福的态度：1974年4月21日王洪文在京西宾馆，指着聚集门前的武汉“反潮流”派上访团对湖北省委书记赵修说：“这些人不听话，中央斗争这么激烈，还上京干扰中央部署，要把他们管起来。”^③“这些人”的头头就是谢妙福。这是谢妙福与王洪文、也是与四人帮唯一一次“组织上的联系”。至于“思想的联系”，那就与1983年清理“三种人”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9页。

^② 中央领导人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讲话（1976年10月8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③ 陈端武《再审申请书》（2012年11月）。

时提出的“帮派思想严重”一样，有无这种联系，严重与否，由当权者判定。

“街头派”的大字报、标语、传单，初期多署名为“小人物”或由“小人物”的谐音而来的“筱能屋”“吴仁筱”等，后多署名“革命群众”。

除了要求当局解决两清一批问题，他们更进一步的诉求，在谢妙福的大字报中有清楚的表达。谢妙福在写于1974年5月的《认真总结经验，更坚定地前进》等大字报中说：“调整后的‘工宣队’和‘更新’后的革委会，‘军起来’的党委，（被）霸占的工会，架空革委会的班、排、连、营等等，都是他们集结、复活的合法组织！”“武汉地区五百多个单位的革委会，没有一个能够体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各级领导班子倒退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样子”，“湖北省、武汉市的‘总工会’、‘共青团’、‘妇联’这些群众组织，确实实是受错误路线干扰的产物”。“斗争焦点仍然是一个路线、一个权字”，“要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小修小补是不行的”，必须“把颠倒了湖北、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①。

造反派内的所谓“主流派”——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头头和各大单位造反派头头，不参与“反潮流派”的活动并与他们保持距离。

1973年9月6日，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第一休息室，接见赴京参加张体学葬礼的王超柱（中铁大桥局工人、十届中央委员）、董明会、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张立国、毛菊元（团省委书记）、马学礼，曾思玉、姜一、赵修陪同接见。李德生说：武汉有大字报上街吧？你们回去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搞了。用你们犯错误的经验去帮助他们。纪登奎说：你们回去一定要做工作，不能搞了。李德生问：有人骂你们吧？朱鸿霞、张立国回答：有人骂我们“老机”、“右倾”、“修了”。纪登奎说：骂有什么要紧，干革命还怕挨骂^②？

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回汉后，将与“反潮流派”多有来往的王光照找去“做工作”，希望“光照同志要起好作用”。朱鸿霞说：“我们要过五关——相信省委、相信曾思玉同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审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大好形势。为什么要人家退材料？硬是要人家退材料、平反，势必挫伤另一部分群众，刺激人家，把自己摆在与群

^① 转引自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室《谢妙福等人罪行材料》（1975年3月29日）。

^②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69页。

众对立的位置上，这有什么好处呢？符合十大精神吗？文化大革命前，你要人家来审查你，人家还不干。人家是受党委托，才来审查你。”“为什么要上街闹呢？你们自己总要拿出好的表现和行动，我才好反映与要求。”“我是绝不支持也不带头搞派性活动的，我过去带错了队，害了大家，以后不能再害大家了。”夏邦银说：“我与谢妙福谈了，谈通了。出去又搞”。

王光照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谈话后的想法：“当时我就体会到他们这是在奉命当说客，传达而已，用来说服我的理由恐怕连自己都不信。……特别是老朱，挨的整不比别人少，不比别人轻，我不相信是他自己的心里话，所以只听只记不反驳。我从来没有认为他是所谓的投降派，在与‘反潮流派’那些同志交流时，多次向他们澄清这一点。”“我被找去听他们谈了那么多的话，概而言之都是要顾全大局的一些说教。是的，一个执政党有它的‘大局’，然而湖北被清查了六十多万人，‘又搞过了一点’，这在根本上就破坏了党中央的‘大局’……翻遍了当时中国的全部文件、法规，也找不到一条说为了党的‘大局’可以无视那些含冤负屈的人。”^①

朱、夏、张的这些观点传出去，“反潮流派”对他们更加反感，认为他们首先被“落实政策”、官复原职后，就站在官方立场上讲话。1974年4月初，王华珍在武昌红楼对宜昌造反派头头刘德光等人说：“现在是第十次路线斗争，原来第九次路线斗争的头头现在不能胜任，我们现在要走自己的路。”释放胡厚民、李想玉后，省委决定4月4日在武汉剧院召开为胡、李平反大会。“反潮流派”的贾培培（原新湖大红八月头头）等人在剧院门前贴出“造反公告”，要造朱鸿霞、胡厚民的反，大会未能举行^②。

李承弘回忆：胡厚民1974年3月2日解除四年监禁后，“已成为‘反潮流’派、钢新两派共同推崇的领袖式人物，地位影响超过了工总时期。当时‘反潮流’派势力很大，胡厚民能出狱，‘反潮流’派功不可没。但胡厚民有天生的造反派正统观点，不屑与他们为伍，所以他依然依靠工总的四大金刚。”^③

夏、朱、胡、吴等或主动或按照省委指示去做“反潮流派”的工作，要求他们放弃在街头开展“四大”的方式。

^①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68—372页。

^② 参见刘德光《回眸——我经历的宜昌文化大革命》（2015年自印本）第228页。

^③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57页。

当时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头头好像都不太注意“反潮流”上街这件事，认为他们不能代表造反派，只能代表他们的小团体。“反潮流”的勇士们也认为夏邦银、朱鸿霞和我们这些已经进入省、市革委会的头头修了，想保官，对立情绪很大^①。

王光照当时主张“直接同省、市委领导人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但他与“反潮流派”联系较多。他回忆：

武汉地区造反派捧读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联系本地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结合自身遭受的磨难，针对曾思玉、刘丰所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尤其针对两清一批中他们所犯下的方向、路线错误，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署名“小人物”的一小批老造反派率先揭开“反潮流”运动的序幕，点燃了积聚已久的那堆干柴，火势越烧越旺。

我与原钢工总的一些人，主要是大中型骨干企业的造反派头头们，虽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不愿意以社会公众为受众，在街头大闹，认为容易产生负面效果，甚至授人以柄，达不到解决问题的预期目的。怎么办？我力主解铃还需系铃人：直接同省、市委领导人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争取直接而迅速地解决问题。……直接谈判的社会代价和成本最小，再大再难的事总可以谈出成果。……赵辛初奉中央之命回湖北主政，他比较超脱，没有“身在此山中”的纠结，没有欠债还钱的根根纠缠。文革之前他去了文化部，远离了湖北的是非漩涡。后又长期待在五七干校，这种经历使他更容易理解造反派所遭受的不白之冤。他本来是湖北佬，深知湖北官场那些人的德性和根底，做起工作来更容易，更有针对性。王克文是南下来武汉的，1967年夏天因同情造反派，也在陈再道的高压下跑起反来，在新华工校园躲难，对军人的那种跋扈、专横深有体会。刘丰得势之际，鼓吹过“南下干部特务多”，王克文他们也是怨气满腹。支左的方铭那些军人撤出市委时，没有鲜花和掌声欢送，地方干部受够了压抑、排斥，鬼也不去抬桩应酬，这就反映出他们的情感。这些事实对我们揭批两清的问题，都是有利的因素。对此我们应当化消极为积极，充分调动和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当时我们这些所谓的造反派主流经常以各种形式在一起讨论、交流，以求统一认识，这些人多是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有武汉钢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57—158页。

铁公司李想玉、邓金福，武汉重型机床厂陈长庚、姚光盛，武汉锅炉厂杨逢春、王庆庭、王光照，武昌造船厂李承弘、彭万年、萧新茂，武汉市电信局方景清、刘闯，武汉青山热电厂陈长洋，汉阳轧钢厂程天琦，武汉卷烟厂李光武、刘汉香，武汉制药厂丁远芳、徐大胜，武汉制氮厂沈明栋，湖北省新华印刷厂杨继高、罗鞠华，第一冶金建设公司黄家祥、徐彪，武汉冶金勘测公司吴传友，湖北省电力局邱瑞，武汉市人民银行王小青、孙天寿^①。

1973年10月省二招座谈会开始后，通过谈判解决两清问题进一步成为“主流派”的共识。王光照回忆：“我主张充分利用这个管道，尽量表达我们的诉求。这种认识得到很多人的赞同。武汉烟厂的李光武说：街头闹得再欢，掌印的在水果湖和花桥（省市委所在地），解决问题下结论还得靠掌印的。在外面闹得吼，一些偷扒盗的麻纱经（麻烦事），可能又会扣在我们身上。绒布厂的吴立春讲得更直白：坐在这里有吃有喝岔着谈，跑到外面闹个鬼。邮局的刘玉泉讲：把我们请来，动员我们大胆地讲，面对面有几好啊，到外面闹是舍近求远划不来。认真地、耐心地坐下来，深入地谈问题，揭刘丰，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②

同时，王光照也不认为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头头成了“投降派”：

街头派眼里还有一个投降派的概念，那就是指参加三结合到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像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等这些人。说他们被招安了，只顾自己的席位，不管下面的战友，向当权派投降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误解。凭我的认识、了解，以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他们有自己的消息管道和行为方式，能够合理、合法地在省、市革委会的平台上对曾、刘进行揭露和批判。尤其是老夏，刚在北京开完十大，连任中央委员，怎么可以指望他也来武胜路、六渡桥进行街头集会呢？党的纪律不允许嘛。再者老夏、老朱他们掌握全省各地的一些材料，同曾、刘共事的情况，不方便在大街上放炮。那样做了，往后一些会议，还能叫他们参加吗？所谓被招安了、投降了，纯属瞎说，无凭无据。我以为他们在省、市革委会里，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积极稳妥地展开揭与批，我们进行呼应，内科、外科一起来治疗，效果肯定好过大轰大嗡，也能避免许多负面的东

^①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7—339页。

^②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41页。

西。在北京解决反复旧问题时，周总理再三劝导，要把自己摆到革委会的位置上，按程序可以直接反映到中央去。有路不走，非要到街上去告地状，何苦呢？尽管我经常受到老夏、老朱的批评，认识上、做法上有差异，我却不会怀疑他们投降了、被招安了。两清一批以来，夏、朱并不比我们轻松。特别是胡厚民还在“吃九两”（坐牢），老胡不是被打成北决扬的幕后总指挥、被打成五一六在湖北的总头目吗？何来投降之举呢^①？

“主流派”后来也承认，没有持续不断、不屈不挠的街头游行、集会、贴大字报、在省委开会处示威，被监禁四年的胡厚民不可能放出来；没有三厂一局的工总成员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攻三办、促省委”，赵辛初等人也下不了“真刀真枪”“揭盖子”的决心。“攻三办、促省委”的方式与“街头派”毫无二致，这个行动本身也是违背夏邦银、朱鸿霞等头头的意愿的。而三厂一局“攻三办、促省委”代表团的主要头头之一，就是期盼以谈判、座谈解决两清问题，并能说出一番道道的王光照。

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武汉颇有影响的杜则进写作组，被认为是“主流派”的喉舌之一。它在1974年3月20日贴出的大字报《我们怎么办？——兼评“六条”》里这样评价“反潮流派”：1973年初，“一批反潮流的战士，发扬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造反精神，冲破了曾思玉等的高压政策，砸烂了那些阻挡革命的条条框框，再一次地杀了出来，锋芒所向，直指林彪在湖北代理人刘丰等四条汉子”。“这一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冲破了当时湖北武汉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引起了曾思玉之流的惊恐和反扑，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斗志。这个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武汉地区造反派1976年10月后被大规模逮捕，1982年前后被大规模判刑，而“反潮流派”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5年，就有数十名头头和骨干被施以刑罚或送劳动教养。“反潮流派”一直谴责王洪文参与了对他们的打压，说“为人不当官，当官都一般”。

第二节 1973年的“反潮流派”

武汉地区造反派主要头头在省市县委举办的学习班、座谈会里度过了1973年。这些学习班、座谈会参加人数多少不一，多则二百多人，少则几个人；时间长短不一，长则九个月，短则一周。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44—345页。

2月22日，在武汉市委召开的市直部、室、委，各区、局、大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市委负责人宣讲社会动态时说：少数帮派思想比较严重的人，趁市委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的问题之机，否定武汉批林整风的方向。他们以朱鸿霞、吴焱金等人为首，提出“走河南道路，达上海目的”的口号，即组织大字报上街，组织队伍游行，迫使省、市委承认犯方向、路线错误；要求省、市委有造反派席位，像上海造反派一样有政权、有党权；还收集材料，准备进京上访。经过省、市委耐心的工作，特别是中央的指示，制止了这次企图制造大反复的错误行为^①。

事实上，“组织大字报上街，组织队伍游行”要求省市委解决两清错误问题的一批造反派群众，并不“以朱鸿霞、吴焱金等人为首”，朱鸿霞、吴焱金等人也不愿为首。

1972年春，造反派普通成员陈贻新（武汉钢锯厂工人）、詹仕金（省石油公司职工）、唐前坤（武汉城市规划设计院职工）等开始串连。他们分析两清一批以来造反派面临的局势，同时对头头们放弃抵抗极度不满，他们觉得当权派靠不住，造反派头头也靠不住，决心“自己解放自己”，“把颠倒的武汉文革历史再颠倒过来”。从1973年初开始，这一类人逐渐增多，分成几个“摊子”聚集，大字报、街头讲演、街头集会越来越多，中共十大后达到高潮。当局不断抓人，依然遏制不住街头活动的声势^②。1973年5月6日，抓刘祖平（武汉铁路公安处干部、原公安联司成员、武铁分局革委会常委）；同年5月26日、7月16日、8月28日三次抓谢妙福；同年11月9日抓王华珍；同年11月抓何天泽。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召开。周恩来所作政治报告和王洪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报告，都引用了毛泽东“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句话，并强调这个原则；十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武汉地区的“街头派”自此称为“反潮流派”。

王光照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十大后“反潮流派”的街头活动：

尽管没有统一的领导，然而步伐和口径极其统一。在武汉三镇，大字

^①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57—358页。

^② 参见武汉地区反潮流战士窦则胜编辑部主编《武汉的反潮流》（1974年4月21日，铅印传单）。

报、标语、街头演讲等各种形式的“反潮流”活动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汉口江汉路水塔、工艺大楼、六渡桥中南旅社、武胜路新华书店等地最为集中，汉阳钟家村、武昌司门口那些地方也不逊色。各种大字报似雨后春笋，各种标语口号众口一词，尖锐而深刻地揭露湖北两清一批中的严重问题。所谓“反潮流”街头派应运而生，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原新华工红反团的聂年生、水运工程学院原钢二司的刘汉武、电车公司原钢工总的王华珍、国家物资部武汉储运公司原钢工总的武齐骅、原新湖大的程辉、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原钢工总的谢妙福、原钢工总江汉区办事处的朱汉清等人。他们发动和团结一些小企业、小单位，特别是硚口区一些基层单位的造反派，四处点火，八方冒烟，闹得水响，蔚为壮观^①。

原武汉第十中学六七届初中生、二司成员王兵回忆：1973年底，武汉“反潮流派”逐渐形成四个摊子：谢妙福（其中有原新湖大程辉、武汉电池厂工总头头陈端武、武汉机床厂工人周敏、武汉锅厂工人宫风雨等人），武齐骅（其中有黄浦路兵站职工潘道明、国棉六厂工人陈光远等人），聂年生、王华珍（其中有王华珍丈夫、电车公司工人周志刚等人），王兵（其中有硚口某厂李麻子、原某中学学生刘造禄、原利济路中学学生小廖、二轻刻字社汤良润、原七中学生夏垦、原三十七中学生曾宪斌等人）。当时，我们大字报、大标语的落款是“武汉市革命群众”。在此期间，原二司成员丁家显、方保林、张良栋、樊信成、徐宏彩、谢保安等参与了“反潮流派”的活动。这些人中间，大学生多已分配到外地，中学生很多受“两清”影响还留在农村。他们先集中在长江日报招待所，后转到华师，1974年5月中央“七条”下来以后都走了^②。王光照看过王兵关于“反潮流派”四个摊子的回忆后说：武昌还有一个摊子，以卢开方（国棉六厂工人、原工总成员）、郭秉纲（武昌区委干部，两清中调到武汉锉刀厂）为首，在武昌闹市司门口一带很有影响。

当时在枣阳二中当教师、老家在武汉的王仁昌，与“反潮流派”多有来往。他回忆：“（反）潮流派多为小单位头头。他们按住处远近，在某家集会，则称为某某‘班子’或‘摊子’。著名的班子有：熊玉珍班子、朱裁缝（朱汉清）班子、汤良润班子、唐恒山班子等。各班子人员是流动的，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7—338页。

^② 杜先荣2014年4月访谈王兵的记录。

既参加王华珍组织的行动，也参加谢妙福或武齐骅组织的行动。按各班子计算，表面上人数不少，声势浩大。实则，十八罗汉打转，全市就那么一两百人。（1975年春）‘六渡桥事件’后，各班子全都偃旗息鼓。”^①

“杜则进”的大字报《炮打曾思玉》说：“为了对付‘反潮流’的群众，曾思玉指使王杰动员了市公安局五个处的全部干部、警察和特技人员，手段有查户口、跟踪、绑架、传讯等名堂，完全是用专政工具来对付人民群众。‘反潮流’群众上街是省市委领导不力的结果。”

武汉钢锯厂工人、原工造总司成员程贻兴，1972年春就参与“街头派”活动的酝酿，1973年底曾被跟踪、盯梢。1974年3月，郑汉卿（湖北省电力制杆厂合同工，原赤总工二司头头）等“反潮流派”去市委找王克文要求“落实政策”，在一间堆废纸的房间内发现关于“街头派”群众的情况反映》，经当时任市委书记的董明会同意，拿走几份作为上京反映情况的“证据”。其中一份《情况反映》显示当局密切监视程贻兴的举动：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情况反映（第四十二期）

注意保密

武汉钢锯厂工人程贻兴（国民党党员，市工代会工作人员，有罪恶民愤）。

程贻兴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日，在烟盒纸写了大字报底稿，并扬言说：厂里若不为他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反革命平反和退还材料，就要贴大字报。后经区工办马主任等人做工作，才未敢写出。

程贻兴还说：毛主席说：大字报万岁，四大自由等等。

程贻兴经常到武汉剧院附近活动，有天上班之后有一个穿咖啡色上衣的人，来找程贻兴谈了几句话就走了，内容未详。

有一次王××在大会上读文件，误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念成以毛主席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程当即说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王××就是现行反革命等等。程贻兴在开大会时坐在书记后面，脚都快翘到曹书记头上了。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日

在这一期《情况反映》上，市委书记田文批示：“这样的嚣张，是办学习班还是怎样，请何政委处理。”那位何政委批道：“已告。目前有所

^① 任常（王仁昌笔名）《抱膝时为梁父吟》（网文，2011年）。

5月上旬抓邓世普，5月26日抓谢妙福、严仲题。曾思玉抓“反潮流”的人，似乎没有一定之规。抓了人，群众一闹就放，有的放有的不放，同一个人多次放了抓抓了又放。

9月6日开始连续数日，全市街头的大标语、大字报都被清除。

8月中旬谢妙福妻子吴桂兰在汉口闹市的工艺大楼，贴出1969年“反复旧”以后造反派较早的一张大字报，聂年生随即在此处发表以“四大自由”为主题的演讲。9月中旬开始，武齐骅、雷维红（武汉皮革联合公司工人）、陈贻新等以武胜路新华书店为中心举行多次集会。

王仁昌的回忆录记述了1973年10月中旬武胜路新华书店旁大字报墙的情景：

书店长长的拐角墙面贴满大字报。全是对两清中遭受迫害的控诉。有被逼自杀的，有打伤致残的，有家破人亡的，真是“字字血，声声泪”。看大字报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个个义愤填膺。想到1967年7月15日在这里观看欢迎中央代表的盛大游行，恍如隔世，惆怅不已。

蓦地，我发现一张用工整颜体写的大字报，署名“革命工人陈宝卿”，指斥街头大字报是“牛鬼蛇神翻天”“妄图恢复7·20后法西斯专政局面”云云。满纸胡言，卖弄文骚。好些人倒是颇为欣赏。我小学同学刘暑樵说：虽说观点不对，但字写得好，文笔也老到。这令我十分悲愤。回到家里，想起陈宝卿其人其文，意气难平。想着想着，愤然提笔，一气呵成，写首长诗。诗前，我加了一段文字：

1973年9月，在党的十大精神鼓舞下，武汉广大革命群众冲破层层阻力，运用“四大”作武器杀向街头。这一革命行动吓坏一部分人，也惹恼一部分人。时有自称革命工人陈宝卿者说，贴大字报是牛鬼蛇神翻天，想恢复七二〇后法西斯专政局面云云，卖弄文骚。我的一位朋友不分路线，赞扬他的所谓“文章”。悲愤之余，写了首诗贴在革命大字报旁，兼答陈宝卿同志。

题大字报

——兼答陈宝卿同志

每当看见街头的大字报，
眼里禁不住涌起滚烫的泪花。
这些正义的呼声，

说出多少人心里话！
看大字报的人们啊，
我们感情是这样融洽：
在六渡桥血腥的日子，
横眉怒对野蛮的屠杀；
在民众乐园艰难的时刻，
将身上仅有的几角钱捐它。
无论腥风血雨多么急骤，
满怀信心，从未跪下！
北京电波划破7·20浓重黑暗，
革命造反派迎来灿烂早霞。
我们含泪怀念牺牲的战友，
悼惜他们不能分戴胜利的红花。
忽然，一朵乌云从强盗船吹来，
向江城施加层层重压：
一顶顶5·16、北决扬帽子飞来，
无数种莫须有罪名横加。
多少人把满腔悲愤系给一根麻绳，
将白发苍苍老母孤凄撇下；
多少人把含冤身子付给滔滔江水，
落得娃子改姓，妻子改嫁！
多少人在寒风烈日下煎熬，
多少人不明不白遭铁窗关押；
多少人被逼得精神失常，疯疯癫癫，
带着伤残，流落街头，披头散发……
甚至，父子兄弟、亲戚朋友
也受株连，遭到各种形式惩罚！
江城啊，江城，躺在寒夜里
浸透血泪，痛苦地呻吟挣扎！
这时，又是北京宏亮电波，
激励我们开始新的征伐。

批林批陈大字报越撕越多，
反潮流烈火越扑越大！
同志们冲呀，我们已失去可失去的一切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惧怕！
他们要撤职吗？
我们业已无限期地挂、挂、挂，
他们要开除吗？
组织生活停止多年，与开除何差？
怕什么坐牢！
我们不是两次三番被抓？
怕什么杀头！
按他们捏造的罪名，早该宣判可杀！
谈什么离婚，
妻子受胁迫，早已呜咽着离开了家……
我们已失去可失去的一切，
只剩下颗赤心向着太阳绽放！
啊，也许不少人心潮激荡，
却暂时谨慎地沉默无话。
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灭亡，
就是在沉默中爆发。
与其在沉默中灭亡，
毋宁作次冲决罗网的拼杀！
快发扬“十大”战斗精神，
把湖北林陈死党深挖。
只有摧毁资产阶级专政，
才是真正的无产者天下！

73·10·19 于武胜路前

第二天早上，我拿了半瓶浆糊，揣上用练习本纸页抄好的诗歌，急步走到武胜路书店；老远，先在纸背面涂上浆糊。而后，装作看大字报靠近墙壁，瞅见没有可疑人，双手一按，将诗歌贴在陈宝卿那张大字报下面。贴好所写小字报，兴冲冲去过早。

这天早上，我胃口特好，一口气吃了碗热干面、两个欢喜碗。吃罢早点转来，瞧见我的诗歌前围满人，还有两个人一字不苟地抄写着^①。

“反潮流派”的女青年小溪也抄下这首诗拿给唐恒山看。唐恒山后来对王仁昌说：“我觉得真说出大伙心里的话，当即抄了几份，贴满江城。”唐恒山把标题改作“反潮流之歌”，当时他们都不认识王仁昌^②。

11月某日，“反潮流”群众举行“反复旧”以来第一次示威游行。从武胜路新华书店出发后，游行队伍“越走越多，越走越长，人们自愿参加行列中来，当游行队伍走到六渡桥时，老苏区的群众放鞭炮夹道欢迎”。

11月20日，薛海澄（省建筑机械厂合同工，原赤总工二司一号头头）、吴东生赴京送材料、反映情况^③。

第三节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反潮流派”^④

1974年1月底，批林批孔运动开始。

2月8日下午，“反潮流派”在中山公园门口举行了万人批林批孔誓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2月10日再次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在市公安局门前集会，要求释放詹仕金、熊旭东、何天泽、吴方义（市银行系统职工）等四人。2月17日，谢妙福、武齐骅等往市公安局面见局长王杰，要求释放詹仕金等四人。市公安局门前道路狭窄，聚集人多，致使交通受阻。历时七天，四人被放出。中南旅社革委会主任张爱兰因参加“反潮流派”，1973年9月8日被判刑八年，经“反潮流派”不断呼吁，省高法于1974年3月13日撤销原判，张爱兰被释放。

4月初，“反潮流派”在市委封存了一批两清材料，同时抢走一些材料。4月5日，“反潮流派”冲进市中级法院，抓走副院长等数人，要求释放两清中入狱的造反派。省委4月6日发出鄂发（1974）24号文件说，“抢

^① 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十三、漫漫上访路”。

^② 参见任常《抱膝时为梁父吟》（网文，2011年）。

^③ 参见窦则胜《武汉的反潮流》（1974年4月21日，铅印传单）。

^④ 本节及下一节的撰写，参考了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室《谢妙福等人罪行材料》（1975年3月29日），2016年1月杜先荣访谈“反潮流派”成员王兵、李锋的记录，湖北、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汇报团谢妙福等408人《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汇报材料——关于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武汉地区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行材料》（1974年4月4日），谢妙福《认真总结经验，更坚定地前进——向江城人民汇报若干问题》（1974年5月10日），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刘祖平）》（2003年），谢妙福、陈端武、刘祖平、何天泽、熊玉珍等人的判决书和申诉书。

档案、揪走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六人，是违反公安六条的，所抢档案要立即追回，人要立即放”。

“反潮流派”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就要求释放从1970年6月开始关押的胡厚民。他们认为，在两清一批中胡厚民被诬陷为“湖北五一六总头目、北决扬幕后总指挥”，全省上下到处抓“小胡厚民”“女胡厚民”；省委如果有纠正两清错误的诚意，就应该首先释放胡厚民。

1974年1月，郑汉卿、孟强良、戴州（孟、戴二人均为湖北省电力制杆厂工人、原工总成员）三人将“为胡厚民翻案”“强烈要求公审胡厚民”的大幅标语，在武汉三镇到处张贴。郑汉卿1月30号贴出给省市市委的一封公开信，要求释放胡厚民；2月16日写大字报《胡厚民们又上战场》。春节后不久，“反潮流派”不断游行到省委示威，要求释放胡厚民、李想玉、杨道远、任爱生、魏绳武等人。

3月2日，赵辛初等省委领导召集造反派头头在洪山宾馆举行座谈会，据王光照回忆，这是1974年2月省二招大型座谈会结束后，省委召集的第三次小型座谈会，主要谈胡厚民问题。聂年生、朱鸿霞、王光照在会上就释放胡厚民讲了几个小时，谢妙福、武齐骅率领的“反潮流派”人马已经聚集在宾馆门外准备往里冲。王克文让聂年生、王光照去“做做工作”，聂、王二人让“反潮流派”安静下来等待消息。二人返回会议室，省委已作出决定，立即释放胡厚民。当夜夏邦银、朱鸿霞等将胡厚民接到洪山宾馆，“胡厚民从车里出来，站在花坛的高处，伸出双手，朝等候在那里的人群高声致谢：谢谢同志们的关心！谢谢同志们的爱护！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①

3月3日，造反派乘着数百辆卡车，举行大规模游行，庆祝胡厚民、李想玉获得释放，要求进一步释放任爱生、杨道远。

胡厚民、李想玉、魏绳武释放后，“主流派”、“反潮流派”一致要求省委释放杨道远、任爱生，不同的省委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一致回复：杨、任的案子是中央定的。

杨道远1971年2月被关押到1978年12月7日逮捕，1983年1月判刑12年，1985年9月再次判刑15年，无数次批斗，两次审判，从来没有人向他举出中央关于杨道远案指示的具体内容。

^①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56—359页。

3月，何天泽收集材料、王明华执笔写出《曾、刘、方、张否定湖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况和经过》一文，于6月贴在水塔下，此后又印成小册子散发。

释放胡厚民后，对于造反派释放任爱生、杨道远的要求，省市县委仍以“由中央决定”拒绝。3月15日，“反潮流派”组成赴省委代表团，向省委提出五点要求：“强烈要求省、市委站在运动的前列，要求省委立即释放革命干部任爱生，红卫兵优秀代表杨道远，为胡、任、李、杨在全省公开平反”。十天后省委领导人接见代表团，“对代表团提出的一系列实质问题，避而不答，甚至把矛盾推向中央”。

谢妙福等认为继续向省委提出要求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在水塔等处张贴公告，号召造反派上京向中央反映情况；同时在水塔内设立联络点，由程辉等负责接受报名。他们不顾省、市委劝阻，3月26日，“反潮流派”408人组成“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控告团”，乘12辆交通车、一辆宣传车，在谢妙福等人带领下赴京，要求中央促使省委解决两清问题，同意释放任爱生、杨道远^①。在1974年，数百人集体赴京请愿，这是全国少有的举动。

这些车辆有些是借的，有些是抢的。在胜利饭店抢车过程中发生事故，致一人重伤，参与抢车的王友运死亡。

3月30日车队到达北京。车辆只准停在丰台，数百人步行，傍晚到陶然亭中央接待站，工作人员已经下班。陈端武看到接待站窗台上放着一把钥匙，用钥匙打开门，让老弱者进去避寒。这一行为，后来在陈端武等人的判决书里成为罪行：“未经中央接待站负责人的允许，便打开门锁占用房间，扰乱首都秩序。”第二天，中央接待站为他们在丰台南苑旅社安排了住处。

4月4日，“控告团”向中央接待站递交了《关于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武汉地区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行材料》，并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不久中央接待站传达中央领导人指示：“中央领导同志不接见，有问题可以写材料交中央接待站转报中央。”这份材料是由陈端武、曹义、陈竞、何青政编写的，署名为“湖北、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汇报团谢妙福、刘祖平、程辉、周敏、陈端武、胡忠庭、李金祥（女）、周德清、何天泽、吴绪文、宫风雨、王登富、夏光明、陈俊、龚忠义、张记生、白世

^① 2016年1月杜先荣访谈王兵、李锋的记录。

友^①等408人”。

在京期间，赵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明确告诉他（谢妙福）‘任爱生、杨道远有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不能放，不能平反，还要处理’。“反潮流派”不能接受，他们认为“这完全是个幌子，是企图嫁祸于中央的阴谋”。谢妙福5月10日文章坚持认为：这是“右倾复辟势力在背后搞鬼”，“我们还是奉劝省委某些人对任、杨两同志，早放早主动，晚放就被动”。

4月10日，中共中央12号文件发布。文件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京的赵修派人向谢妙福等人作了传达，谢妙福对大家说：“坚持就是胜利”。后来谢妙福在5月10日文章中说：“（74）12号文件下来以后，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及时地带领大家回来”，这样做是错误的。

为了壮大北京请愿的声势，刘祖平、程辉、陈端武从北京回到武汉，召开上访汇报会，动员第二批上京。14日，陈端武、程辉带领一百多人，经在铁路工作的刘祖平安排，乘火车到达郑州，换乘河南铁路造反派在62次列车尾部加挂的一节车厢。行至石家庄被阻止，要求下车。陈端武说，“我们上访人员不到两个小时就疏散完了”，根本没有发生后来判决书所说的“无理纠缠，拒不下车”的情况。至于指控陈端武等造成两列客车分别受阻17小时和5小时，陈端武说责任完全在车站。陈端武等下车后，在石家庄铁路造反派的帮助下，另乘货车到北京与第一批人员汇合。

4月21日，“反潮流派”数十人在京西宾馆门前聚集三个多小时，要求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接见，反映问题。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动员他们离开未果，被首都民兵强行用汽车送到丰台区党校“进行教育”。赵修派秘书金辉将谢妙福、刘祖平找去谈话，晚上，三千首都民兵包围了“反潮流派”住地，说“这么多人在北京有碍首都安全”，要求他们立即返回武汉。夏邦银前来传达了王洪文的指示：“这些人就是不听招呼，上访帮了倒忙，中央现在斗争很激烈，干扰了中央的部署。”首都民兵要把

^① 龚忠义为一冶工人，原九一三成员；白世友为硚口区艺华小刀厂工人，原工总成员；周德清为长航武汉港机厂工人，原工总成员。

陈端武带到一边去做他的工作，其他人担心他一人前去会有不测，于是发生拉扯，陈端武夹在中间“气都喘不过来”，最终没去。当夜两点，陈端武等关窗时不慎损坏一块玻璃。四点，丰台公安分局来人向陈端武宣读治安裁决书，说陈端武“未经（中央接待站）允许打开门锁，踢打首都民兵，打破房屋门窗玻璃”，予以拘留。七天后陈端武被释放，首都民兵和公安人员已将其他人从丰台火车站送上火车返回武汉。丰台公安分局领导对陈端武说：为了顺利将他们疏散回去，对你实行治安裁决是非常必要的。

1974年4月6日夜，王克文在省二招接见未去北京的“反潮流派”聂年生、王华珍、武齐骅、刘汉武、杨尚玖（武汉瓷厂职工、原工总成员）、周志刚、姚启发、周东元、江芹荪（汉口工艺大楼职工，原工总工艺兵团头头）、曹义（东风造纸厂工人，原工造成员）、吴方义、余平、包俊良（武昌区房地局职工，原红工兵成员）、黎雄等，吴焱金、李德裕陪同接见。王克文告诉聂年生等，王六生、赵修、信俊杰6日上午来电话给“得志、辛初并省委、武汉军区党委、省革委会”说，“抢档案、揪走武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六人，是违反公安六条的，所抢档案要立即追回，人要立即放，请认真办理。”（这个电话的内容，省委4月6日以鄂发[1974]24号文件发出）王克文还说：“任（爰生）杨（道远）要由中央决定，中央未批示之前，不要动。”并告诉他们，“中央对湖北要发一个正式指示”。王克文说，今天中央派赵修去做在京的谢妙福等人的工作，中央领导不会接见他们。两清“整了那么多人，怎么没有错哇！”“补台是要补的，什么时候补，恐怕现在还不适宜。”“去年开始写大字报时，我们对待这个问题上有错误，我本人也有错误。……当然是曾思玉布置的，我自己也有责任。”“对待反潮流问题，开始是有错误的。”^①

这次接见表明，两赵一王没有忽视“反潮流派”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行为给予肯定。

针对“工农兵”和造反派内部的一些人批判“反潮流派”是“冲派”、“推（推倒重来）派”，4月6日，在汉的“反潮流派”发表《严正声明》，“反对冲击军事机关，反对乱揪军代表，反对经济主义，反对停工停产中断交通，不赞成车队游行成风，不赞成抢档案和乱放人”。17日，在人民饭店举行

^①“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1974年4月7日，武重批林批孔办公室翻印）。

的串连会上，武齐骅提出中央12号文件下达后“反潮流派”的活动方式：“在单位、系统要加温”，“打系统战，打巷战”。

4月15日左右，“反潮流派”组织数十辆汽车，一千多人游行到省委。要求释放任爱生、杨道远。省委将他们二三百人安排住进省一招13号楼。赵修、王克文在建展馆接见，重申抓人（任爱生、杨道远）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放人。

谢妙福5月10日文章坚持1973年以来“反潮流派”的基本观点，同时强调：“以赵辛初为首的湖北省委前段批林批孔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省委存在着的缺点错误也进行过坦率的批评，……批评一下总不能算作是所谓‘推派’吧！”谢妙福在文章中检讨了“反潮流派”和他本人的错误：在造反派内部，“看人家缺点多，加上自己方法简单、主动交心谈心少。特别是对我们的老头头、老战友联系不够”；对待“工农兵”，谢妙福说：“要把做好那些思想还转不过弯来的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行动上避免对立，思想上要亲近他们，舆论上要坚持弄清路线是非，团结同志，共同对敌”。谢妙福提出执行中央12号文件，改变“反潮流派”的运动方式：“我建议所有的同志都要回去，按单位、按系统联系湖北武汉的斗争实际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谢妙福提到孔庆德4月17日的讲话，他说这个讲话“通篇都是‘骂’和‘压’”、“扬言要动用专政工具”，“我和我的同志们准备再次领教孔大人物的‘压’，干革命岂怕坐牢杀头！”

此后一直到1975年“反潮流”运动退潮，谢妙福、武齐骅等“反潮流派”改变活动方式，回到本单位、本系统开展运动的打算没有能够实行。谢妙福等人也做过这样的努力，努力一番后还是回到街头。

3月4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几点意见》（“七条”），承认省委在两清中出现错误。3月16日，湖北省委发出《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征求意见稿）》（“六条”），承认湖北的两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点名批评曾思玉。

5月26日，省委向全省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1974年5月21日）。“指示要点”说：“批林批孔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要立即撤销一切山头，说服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回本单位搞好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反潮流派”将这个

文件称为“红七条”，表示拥护。

6月3日，武汉市委发出《通知》（武发[1974]35号文件）说：“根据中共中央[1974]12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的精神，为了保证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得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不得离开本单位的生产、工作岗位，不得抢占办公室、进驻各级机关、饭店、招待所，已成立的各种类似战斗队、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代表团等组织，应立即撤销、所有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都应立即回到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5月以来中央、省市的这些文件，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取消街头活动，“反潮流派”以各种理由不执行。他们认为：个人的两清问题，还有任爱生、杨道远的问题，各级革委会中群众代表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回到单位势单力孤，除了抱成团走上街头、诉诸社会，促使省市委从上至下地解决问题，没有别的路可走。

6月12日晚，“反潮流派”在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召开“拥护红七条，揭批刘丰，迎头痛击右倾翻案妖风誓师大会”，会后报道说有三万人参加。程辉主持大会，陈俊、夏光明（某校代课教师）、刘祖平、杨全顺（武铁分局原工总头头、革委会副主任）、杨尚玖在会上发言。刘祖平说：“红七条下达后，省委一直没有采取积极措施进行认真贯彻，我们已经耐心地等待了二十多天了”。“我们的态度是：省委不揭我们揭，省委不批我们批。”会后游行，游行队伍经过设有“工农兵”广播站的工艺大楼时，宣传车喊口号：“七二〇是铁案，永世翻不了！”^①

7月1日，谢妙福、刘祖平、何天泽等三十多人去省委递交关于两清问题的材料，被哨兵阻拦，发生冲突。省委办公室人员口头传达省委通知，说冲击省委是错误的，何天泽等当即表示反对。这件事在1975年6月谢妙福、刘祖平的判决书和1975年11月何天泽的判决书中，都列为他们的罪行。

“反潮流派”比以前的群众组织更加松散，但毕竟是一个“跨行业、跨地区”的山头，是中央、省市委三番五次明令要撤销的。1974年10月11日，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

^①常思《披荆斩棘 高歌猛进——“拥护红七条，揭批刘丰，迎头痛击右倾翻案妖风誓师大会”纪实》（1974年6月25日，铅印传单）。

党全军要团结。”正式公布，省市委大力宣传，并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更加强硬的措施。

此时，“反潮流派”正在准备按谢妙福的布置，“按系统、按单位进驻”，一个一个单位地去解决问题，街头活动有所减少。但他们没有宣布解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熊玉珍所说，他们中间很多人在两清中遭打击，一声道歉都没有得到。

10月，何天泽等二十多人组织了“业余学习小组”。学习小组编写了《现阶段批林批孔的作战计划》，提出以“平反”问题为突破口，选择有利的战机，注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第四节 1975年至1976年的“反潮流派”

1975年1月上旬，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否定文化革命、再一次打压造反派的“全面整顿”开始了。

“反潮流派”毫不收敛。郭洪斌在1月上旬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先行组织多个“控诉团”来发动群众，同时串连专县，成立要求落实政策的“万人代表团”。他和谢妙福、武齐骅等多次开会商量，讨论“万人代表团”指挥部组成、办公地点、总团长和五十个副总团长人选等具体事宜。他们将成立“万人代表团”的通知和登记表发到各专县，决定郭洪斌负责武汉各大单位的串连发动工作。1月25日，“中央领导同志与湖北同志谈话记录”传达，郭洪斌等人取消了这一计划。

1975年1月初，武齐骅干了一件更激进的事——组织“革造民兵”。根据196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民兵工作条例》，脱离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武装部、群众自行组织民兵是非法的。

1月4日，“武汉地区革造民兵总指挥部”在汉口六渡桥小学举行成立大会，会后游行，熊玉珍举旗。10日、14日“武昌区革造民兵指挥部”“汉阳区革造民兵指挥部”分别举行成立大会，周德清、熊玉珍分别代表总指挥部表示祝贺并授旗。

武汉市委办公室1975年3月29日公布的《谢妙福等人罪行材料》说：
在他（武齐骅）的策划下，于一九七五年元月上旬，非法成立了所谓“武汉革造民兵”，以及武昌指挥部、汉阳指挥部、直属八连等分支机构。

元月中旬，他们发表了“武汉地区革命派民兵指挥部”的《第一号通令》、《组织工作暂行条例》和《严正声明》等等，恶毒攻击省、市领导，叫嚷要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专政”。“革造民兵”成立之后，多次制造事端，抢夺国家财物，抢驻饭店，殴打革命群众。元月十日，武齐骅带人抢走武汉储运公司“跃进”牌汽车一辆。元月十五日，武齐骅带领三十余名“革造民兵”，打着旗帜，吹着口哨，冲进中南旅社，殴打前来劝阻的干部和服务员十一人，并到市公安局门口“游行示威”。当晚十点多钟，又抢驻外事部门的海陆饭店。元月十六日，武齐骅又组织四十余名“革造民兵”，抢驻人民饭店，影响该店营业四十五天。新宪法公布以后，他们还多次戴着“革造民兵”袖章，以所谓“维持秩序”为名，在闹市区寻衅肇事，欺压群众，破坏安定团结。

武齐骅之弟武齐元说，按照这份“材料”的说法，武齐骅成立“革造民兵”就是为了干坏事，实际上不是这样。他说：“武齐骅、周德清等为什么要成立‘革造民兵’？1974年7、8月份，潘道明、陈光远等在水塔贴大字报被‘工农兵’殴打，辛辛苦苦抄写、张贴好的大字报被涂毁，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成立革造民兵就是为了保护‘反潮流派’的大字报，保护贴大字报的人的人身安全，保护造反派的‘四大’民主权利。”

2月27日武齐骅被拘留后，“革造民兵”基本停止了活动。

1月25日，谢妙福、谭光前带四十余人进驻肉联厂的主管机关市二商业局，要求落实政策，同时成立接待班子，接待二商系统两清中“受迫害的人”。谢妙福等人“确定以二商业局为起点”，“春节前拿下八个局”。

1975年1月20日，四届人大开会期间，李先念等接见了朱鸿霞等四位湖北人大代表，点名批评了谢妙福、武齐骅等人闹事，为杨道远、任爱生翻案，不批林，不批孔，不安定，不团结，不生产，不劳动，闹派性，搞串连，拉山头，进驻饭店，扰乱秩序，希望他们立即改正错误。

1月25日和26日，市委、市二商业局分别派人向谢妙福传达中央首长谈话记录，没有正式文件。谢妙福问“是哪个中央”，并把谈话记录称为“便谈纪要”。这一行为后来成为他的罪状写入判决书。

谢妙福问“是哪个中央”，事出有因。因为这次与“湖北同志”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以武汉造反派反感已久的李先念为首，武汉造反派从来不认为李先念能够代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1月26日至2月6日，谢妙福先后在长航、市二商业局等处召开九次会议，批判“谈话记录”。谢妙福与武齐骅、郭洪斌商定“边学、边摸（摸中央领导同志点他们名字的详细情况）、边串（继续串连）、边干，确定谢、武二人少出面，公开活动由郭洪斌负责”。26日，谢妙福起草的口号报写道：“执行新宪法规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反对《便谈纪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省委不贯彻四届人大，不宣传新宪法，不执行总理的报告，大传《便谈纪要》，究竟执行什么路线！”

1月29日，谢妙福、郭洪斌等召集一百多人开会，会上介绍了在二商业局“和当权派面对面交锋”的情况，“确定以市二商业局的行动为榜样，各系统都照这样去办，行动要快，有困难要相互支持”，“按系统、按单位进驻”，“一个一个系统打开缺口”，促使领导解决两清问题。

1975年2月发生“中南旅社事件”。中央、省市委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使“反潮流派”遭受沉重的打击。

中南旅社位于汉口闹市六渡桥，旅社革委会主任张爱兰是原工造总公司成员。2月13日，经张爱兰和旅社革委会另两位成员同意，“反潮流派”



中南旅社所在的汉口六渡桥（上世纪八十年代照片）

熊玉珍（硃口益民造纸厂工人）、丁小幺（江汉区房地局职工）、施汉生（江汉区房地局修缮队工人）、韩彩（汉口黄石路副食品商店职工、原工总成员）、李家骥（硃口铝制品厂工人）、芦小明（武汉磁电机厂工人）、李华强等人打着“革造民兵”

旗帜进入旅社，设立了广播站。广播站影响很大，四周日夜围着听广播的人。2月16日深夜，百余名公安人员来到旅社，宣称对进驻旅社时的打人凶手实行治安裁决，同时收缴了广播器材。双方发生冲突，在场的“反潮流派”十余人被打得躺在地上，熊玉珍伤得较重，芦小明眉骨处被打破，缝两针，陈端武、王兵、丁小幺当场被抓走。当时在现场听广播的有数百群众，有人喊“反对警察打人”，有人将横停在马路中间的一辆公安用车的轮胎放气，并下走一个车轮。

武汉市委办公室于1975年3月29日整理印发的《关于谢妙福等人罪行材料》说：“从（二月）十七日起，他们在中山大道要道上，用被拦劫的汽车和旅社的床铺、桌椅板凳，作为障碍物，断绝交通。从马路左侧到右侧拉上铁丝，上挂标语，并在路口上树起‘禁止车辆通行’的牌子，每天在这里召开广播大会，造谣惑众。市革委会多次说服警告，他们拒不退出旅社和撤除路障，阻断交通要道长达十一天之久，给革命和生产造成重大损失。二月十八日，武齐骅亲自到中南旅社进行策划，说要‘写文章在舆论上配合’。当晚又与郭洪斌等研究，确定由郭洪斌去煽动和组织枣阳县杨岗区的农民来汉闹事。二月十九日武齐骅又对参与断绝交通事件的×××等人说：‘口号报要多点几个名，……让他们（指省、市委）顾了头顾不了脚，叫他们多背些包袱，不能集中精力对付我们’”。

2月17日晚，熊玉珍等在中南旅社门前召开控诉大会。刘祖平回忆：他在会上讲了话，“我说毛主席指示以安定团结为好，占据旅社的事情我不支持，但是用武力打伤群众，把群众打伤打残，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我最后说代表反潮流的战士，强烈要求省市委追查凶手和幕后指挥者。因为我是穿着公安人员的白制服和大檐帽讲话的，所以非常受群众欢迎。”

断绝六渡桥交通后，熊玉珍、芦小明、李华祥、韩彩、施汉生、丁小么、李家骥七人组成“二·一七事件火线指挥部”。2月20日、24日，刘祖平、何天泽等两次将熊玉珍、芦小明、李华祥、韩彩四人请到朱汉清家，给他们做工作，要求他们撤除路障恢复交通。两次都是指挥部七人中的韩彩、施汉生、丁小么、李家骥四人反对，熊玉珍、芦小明、李华祥三人赞成，刘祖平等人的工作没有做成。韩彩等四人反对的理由是：“撤与不撤，当权派都是要整我们的。”^①

1975年11月对何天泽的判决书认为，何对熊玉珍等断绝交通“表示支持和慰问”并“协助工作”。这与施汉生作伪证有关。施汉生当时是中南旅社广播站负责人，他在2006年写的《证明》中说，1975年2月被拘留时，“预审员说只要你施汉生说出和写出是何天泽支持断绝交通的，你施汉生就不负刑事责任，马上放你，不给你任何处分。”施汉生“违心写出了何天泽的伪证”，关押七个多月后放了他，1975年底还是把他送去劳教三年。

2月27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通告》发布，这个“通告”2月25

^① 参见施汉生《证明》（2006年8月8日）。

日经中共中央批复同意：“湖北省委：同意你们由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并按照通告精神严肃处理汉口发生的破坏交通事件。”“通告”全文如下：

从本月十三日起，武汉市少数人，在个别坏人操纵下，抢驻旅社，在中山大道设置路障，断绝交通，拦截汽车，抢劫公共财物，打伤公安干部、民警和旅社服务人员，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为此，特通告如下：

一、限通告下达的当天内，立即撤除路障，恢复交通，退出旅社，交出抢走的一切公共财物。

二、策划和指挥这次事件的为首分子，应立即到武汉市公安部门检查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

三、这次事件的参与者，多数是上当受骗，应积极检举揭发为首分子的罪行，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四、违反上述通告的，由武汉市公安部门拘留审查，根据其情节轻重，依法惩处。

这个通告当日八时许贴出，大批公安人员来到六渡桥，撤除路障，驱散人员，对不服从者采取强制措施。

王克文 1993 年 1 月的谈话透露了这个通告的来由：1974 年 3 月“省委提出了一个适合造反派口味的‘六条’（草稿），我同意并支持了这个草稿。这个草稿未正式下发，便被中央批评制止了。‘造反派’一部分人气急败坏，竟要进驻中南旅社，并在六渡桥繁华地带制造了断绝交通事件。我和赵辛初同志等商量好，亲自到北京，请求中央批准用严厉手段打击这批闹事者，拘捕了 30 余人，从此武汉平静了一些。”^①

多名在现场的“反潮流派”成员文革后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当局在张贴、广播这个通告的时候，并没有提到通告是中央批准的。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八天后，3 月 7 日市委发出 1975 年 9 号文件，“印发中共中央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通告》的批复”，文件要求“各区委，各大型工厂企业党委，武汉警备区党委，各部、委、办和各局党委”“即向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传达”。这些“反潮流派”成员说：如果当时知道这是中央的精神，现场的对抗和事后几天以游行、大字报抗议，就可能不会出现；那么当局要把我们这些人抓进去，需要费神寻找别的罪名。

^① 吴仲炎主编《丹心照玉宇——王克文纪念文集》第 809—810 页。

这个通告在六渡桥张贴前约两个小时，武齐骅被逮捕。武齐元回忆：

当时我家住汉口贤乐巷6号4楼。27日晨六点，江汉公安分局警察敲开家门，对武齐骅说“你被捕了”，武齐骅说“拿逮捕证来”，有人拿出一张纸晃了一下。几个人上来抓住武齐骅，武齐骅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下楼时一直喊，直到押上车。武齐骅被直接带到市公安局七处一所。3月某一天写信回来要衣服、毛主席著作。4月22日晚，公安机关来人说武齐骅今天凌晨在狱中撕下工作服下摆上吊自杀了。

我们不相信，武齐骅满腔热血，此前多次被当局抓捕坐牢，从来没有低过头，他不可能自杀。1967年4月5日，担任工总二七区办事处二号头头的武齐骅被抓进市公安局七处一所，同年7月31日释放。出狱后他照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武齐骅，左臂上戴着工总、二司的两个袖章，拿着毛主席语录；照片两边写着“坐牢算什么，只要主义真”，照片中间写着“心中想念毛主席”。1973年至1974年，他被当局多次抓了放了抓，每一次出来，马上投入运动，从不垂头丧气。这样的人怎么会自杀？



武齐骅摄于1967年7月31日（武齐元提供）

家里人除嫂子外，父母、兄弟都没看到遗体。我们要求将遗体交家人处理，希望公安机关和家人一起请法医鉴定武齐骅死因，遭到拒绝。武齐骅遗体由公安机关单方面火化。

武齐骅1939年生，广州某学院肄业，1957年获中长跑国家三级运动员称号。他是武汉储运公司团委委员，1964、1965年被评为公司优秀团员。去世时有两个孩子，大的5岁，小的3岁不到。

2014年5月21日王光照对笔者说：武齐骅死后，市革委会请沈复礼、李洪荣等市革委会常委去停尸房看尸体。沈复礼回来说，尸体上伤痕累累，他要自杀

不可能先把自己打伤再自杀。

刘祖平 2003 年回忆：武齐骅在监狱里，在铝饭碗上刻下“武齐骅在此”几个字，“因为饭碗是流通的，其他人就知道了他的情况”。

1976 年 2 月 4 日，武齐骅离世九个多月，武齐骅生前所在单位国家物资总局武汉储运公司的政治处下了一个文件《关于开除武齐骅团籍的批复》（武储政字 [1976]2 号），说武齐骅是“畏罪自杀”（公安机关的认定是“自杀死亡”），同意武齐骅生前所在团支部开除武齐骅的团籍。

武齐元一直要求公安机关复查其兄武齐骅的死因，2007 年公安机关答复：“武齐骅死亡后，公安机关及时开展调查取证，根据调查笔录、法医鉴定等证据材料，认定武齐骅系自杀死亡的结论正确。”武齐骅的父母、兄弟从来没有看到这些“证据材料”。

市委办公室《谢妙福等人罪行材料》所说武齐骅、郭洪斌等“煽动和组织枣阳县杨岗区的农民来汉闹事”，与此前湖北省枣阳县杨岗区发生“杨岗事件”相关。“杨岗事件”发生的背景，当事人王仁昌写道：1974 年 10 月，毛泽东“现在，以安定为好”的指示公布，批林批孔运动不宣而止。枣阳县的当权派“开始使用‘蘑菇’战术，拖拉推诿，让我和那些困顿的人们又陷入生计无着的绝望境地，焦躁万分。……这样，大伙当然不会因一句‘安定团结’就此作罢，大字报依旧铺天盖地。官官们乘机抓住把柄，指斥我们闹‘派性’，破坏安定团结，发动他们的打手，在各单位予以反击，进行批斗。杨岗区农民抗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1974 年 11 月，枣阳县原副县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孙某指责杨岗公社革委会某副主任所办黑板报宣传派性、破坏安定团结，命令民兵将他绑起来在水利工地游斗，杨岗区革委会主任赵根连前去解释遭拒绝。于是杨岗农民殴打县里来的民兵，抢下那位副主任。农民们去水利工地指挥部找孙副县长评理，孙副县长命令民兵关上大门，在墙头鸣枪示警。农民翻墙夺枪，将孙副县长打得“跪地求饶”后放走。县委书记王金欣向襄阳地委报告说“杨岗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搞武装暴动”，请求派兵镇压。襄阳军分区政委、襄阳地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李俊决定调集襄阳、随县、枣阳和襄樊三县一市的民兵，加上军分区摘了领章帽徽的正规部队对杨岗镇进行合围。枣阳县成立民兵总指挥部，发布公告，宣称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县委任命副书记陈世章为总指挥长，县公安局长王槐青任副总指挥长，指

挥数万民兵、警察、部队，乘汽车、拖拉机、摩托车开往杨岗。

杨岗农民的行动得到附近两个区农民的支持。赵根连带领万余名农民拿起汉阳造、三八大盖、猎枪、土铳抵抗。赵根连下令不打第一枪，只用石块、砖头抵御。王槐青指挥民兵使用火焰喷射器，杨岗镇燃起大火，杨岗农民多人受伤。赵根连抵敌不住，带领二百余人乘坐拖拉机退到毗邻的河南南阳境内。起事的杨岗农民多为造反派，与南阳造反派素有联系。原为南阳高中造反派头头的南阳军分区第一政委命令部队阻止尾追而来的枣阳民兵进入南阳。枣阳民兵在杨岗镇大肆抓人，学校、粮管所、仓库等处关满了“反革命骨干分子”。枣阳县委同时在全县抓捕与“杨岗事件”无关的造反派骨干，如枣阳县革委会副主任、原枣阳一中造反派头头孙长学，中学教师王仁昌等。

赵根连等住进南阳军分区招待所，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杨岗区武装部长的远房伯父、七十多岁的老农民刘秀安受派回镇探查，遭那位武装部长率数十名民兵围攻，开枪打伤后用刺刀刺死，就地掩埋即在坟前开批斗会。杨岗农民数十人跑出南阳，一部分上京，一部分由襄阳地区革委会常委、造反派头头张永善带领去武汉“告状”。

不久，南阳军分区司令员向赵根连传达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指示：把赵根连交枣阳处理。随即赵根连被押回枣阳县民兵指挥部。“杨岗事件”结束。

1975年2月初，杨岗来汉农民在刘祖平、郭洪斌的安排下住进中南旅社，插上“襄阳地区赴省控告团”的旗帜。2月16日，张永善在施汉生家介绍“杨岗事件”情况，何天泽说：“杨岗事件是湖北的大事，要造舆论，要把杨岗的人弄来，人来多了好办。”郭洪斌当即派人去杨岗调查、写材料，郭洪斌本人18日晚动身去南阳组织杨岗农民来汉，前后三批共九十多人。

王仁昌回忆：“听了杨岗农民声泪俱下控诉，武齐骅等人义愤填膺，决定在汉口六渡桥中南旅社架上广播进行声讨和控诉。”“2月18日，武齐骅在中南旅社开会，号召大家写文章在舆论上配合。并要郭洪斌去枣阳杨岗组织惨案目击者和死伤者家属到武汉现身说法，壮大声势。六渡桥的广播和大字报揭露枣阳走资派动用正规部队，一晚上屠杀杨岗近千名老百姓，连八十岁老人和几个月婴儿也不放过。还纵火焚烧了百年古镇，冲天大火至今尚在燃烧！绘声绘色描述的情景比日寇扫荡还毒辣！极大震撼武

汉三镇。”^①。

省革委会二二七通告下达、武齐骅被拘留的当天下午，刘祖平、何天泽等四十余人在武汉港25码头集会，何天泽说：“通告是镇压群众的信号弹”。会议决定立即举行营救武齐骅的示威游行。会后数十人分散前往六渡桥，正在举旗整队时被公安人员包围驱散，刘德镜等多人被抓。

刘祖平回忆他组织抗议游行的原因说：

1975年2月27日早晨六时，武齐骅被武汉市公安局拘留，理由是武对抗2·27通告，这是通告中所说的，凡对抗者由武汉市公安机关拘留审查。通告是八点以后张贴出来公布于众的，而六点钟就将武拘留了（杨祖富、周德清与武在一起睡觉可以证实）。武尚未见到通告，怎么能说他对抗？我们认为这是欺人的。这是我组织集会游行的第一原因。

谢妙福2月28日被拘留，3月3日，何天泽写《谢妙福的斗争事迹提纲》送中央。

3月2日，陈端武在六渡桥贴出大字报《2·27事件说明了什么？！》大字报说：“为什么在（通告）贴出之后，墨迹还未干的时候，就动用上千名民警围攻殴打革命群众？”这就充分显示了湖北不能安定的原因。

“警车拖走了革命群众，不到二十分钟的恐怖时间中，为什么六渡桥的人群中突然飘起了数十面鲜红的红旗！响起了‘要新宪法，不要二·二七通告！’‘要无产阶级专政，要四大，要落实政策！’等等气壮山河的口号！”大字报说：“红七条已成泡影”，“湖北省委(74)46号文件空喊一阵”。“2·27事件说明了对谁恨，对谁亲”，“2·27事件说明湖北是怎么能够团结安定”。3月1日，“反潮流派”在水塔及江汉路一带，贴出署名“武汉革命群众”的口号报和大标语：“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资产阶级专政！要武齐骅，不要‘二·二七’通告！”“‘二·二七’通告是镇压革命群众的黑色信号弹！”“省、市委个别领导人非法抓捕武齐骅等同志是公然破坏新宪法的具体表现！”“‘二·二七’通告是（1967）三·二一通告、六·四公告的翻版，不许刘丰反动路线在湖北泛滥，还我战友郭洪斌、武齐骅！”3日中午，江岸区出现以武船、武重、武钢等单位名义贴出的口号报和“紧急呼吁”；下午，武昌区委门口出现署名“武汉革命群众”的口号报，内容都是抵制二·二七通告，表示“反迫害，反镇压，革命人民抓不完，打

^①“杨岗事件”的记述，参考了任常《血溅杨岗镇》（网文，2015年）。

不尽，杀不绝”，“丢头颅，洒热血，奋战到底”^①。

二·二七事件当天及其后，“反潮流派”三十多人被以“破坏安定团结、危害社会治安”，“盗抢汽车、危害社会治安”，“为坏人翻案”，“打砸抢”，“反革命宣传煽动”等罪名被拘留，后判刑或送劳动教养。

“中南旅社事件”部分受处罚人员名单如下：

谢妙福，武汉肉联厂工人，1975年2月28日从河南抓回拘留，1975年6月14日判刑七年。

武齐骅，武汉储运公司工人，1975年2月27日拘留，4月22日死于狱中。

刘祖平，武汉铁路公安分处干部，1975年4月6日拘留，1975年6月14日判刑五年。

熊玉珍，硚口区益民造纸合作工厂工人，1975年2月27日拘留，1975年6月14日判刑四年。1976年10月后在劳改队说“江青不会篡党夺权”，改判无期徒刑（无判决书），1983年释放（无判决书）。

郭洪斌，武汉市房地局一公司工人，1975年6月14日判刑五年。

李家骥，硚口精艺五金合作工厂会计，1975年6月14日判刑四年。

陈端武，武汉电池厂工人，1977年3月拘留，1980年10月31日判刑四年。

程贻兴，武汉钢锯厂工人，1977年8月12日拘留，1978年12月1日判刑十年，1980年10月14日改判五年。

何天泽，汉口自来水公司职工，1975年5月22日拘留，1975年11月10日判刑七年。

周德清，长航武汉港机厂工人，1975年6月14日拘留，1976年9月4日判刑三年。

芦小明，武汉磁电机厂工人，1975年4月2日拘留，1977年6月判刑六年。

刘德镜，武汉第三机床厂工人，1975年2月27日拘留，同年6月19日判刑四年。

陈道明，武汉第三机床厂工人，1975年5月19日拘留，同年6月19日判刑四年。

^①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陈端武的反动大字报及其一类口号报》（1975年3月11日）。

李远广，硚口刻字社工人，1977年6月14日判刑四年。

曾学成，武昌区粮食局工人，1975年5月20日拘留，同年9月26日判刑五年。

潘道明，武汉黄浦路兵站职工，1975年12月15日逮捕，1976年5月判刑十年。

黄银苟，武汉灯泡厂工人，1975年6月判刑五年。

彭云汉，1975年8月判刑五年。

蔡文焕，武汉市第二住宅修建公司工人，1975年2月19日拘留，1975年5月19日送劳教三年。

瞿林昌，汉口白云服装店工人，1978年1月27日送劳教三年。

汪嘉川，武汉农业药械厂工人，1977年4月8日送劳教三年。

朱汉清，武汉长江服装厂工人，1977年9月23日逮捕，关押三年后释放，免于起诉。

施汉生，江汉区房地局修缮队工人，1975年2月27日拘留，关押七个月释放。1975年底送劳教三年。

郑汉卿，湖北电力制杆厂工人，1975年9月送劳教三年。

3月2日上午，刘祖平等人在街头集会，2月27日下午参加游行被抓、“教育后释放”的数人在集会上发言“控诉”。会后在街上刷写大标语，晚上三百余人举行游行示威，呼喊“还我武齐骅，还我郭洪斌”。

关于“中南旅社事件”，一些造反派成员认为：“反潮流派”要求解决两清问题，要求平反、落实政策，都是正义的。但是断绝交通十一天，太过激，这是武汉文革八年来从未有过的不得人心的举动。

1975年2月27日以后，“反潮流派”主要头头和骨干基本被捕入狱，“反潮流”运动失去了原有的规模，硚口地区“反潮流派”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976年10月。

朱汉清、汤良润（硚口刻字社工人，工总发起人之一）、李远广、李锋、王兵等一批人，经常在位于汉正街的汤良润家聚集，开会，写大字报。他们以武胜路新华书店为主要活动地点，贴大字报、大标语，发表演讲。

位于硚口居仁门的唐恒山（武汉童车厂工人）家也是一个聚集点，以他为首组织了“劲松”写作组，其成员有杨尚玖、夏桂兰、王洁平、文行礼、白雉山（高中语文教师）、刘兴隆等，他们经常写大字报贴在武胜路

新华书店、水塔，从1974年6月开始，延续到1976年10月。1975年中南旅社事件后，“劲松”写作组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赵高复辟》、《看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反革命政变演习》、《光荣作楚囚》、《武汉市公安局在七五年翻案妖风期间非法逮捕武齐骅同志的情况反映》、《战友们，拿起枪》、《江城通讯：倒海翻江卷巨澜——记六·一四游行》、《追查——谈专案》等。1976年5月，由唐恒山主持，王仁昌写出二百多行的长诗《造反派的盛大节日——纪念5·16通知发表十周年》，唐恒山抄录后贴在水塔下。唐恒山1977年4月11日被拘留，同年7月25日被逮捕，罪名只有一条：“积极伙同他人策划，并亲自书写、修改整理、张贴蛊惑群众，破坏安定团结，危害社会秩序的大字报”。唐恒山于1980年2月11日释放，“免于起诉”^①。1989年春夏之交唐恒山去北京后失踪。

中南旅社事件后，“反潮流派”和“主流派”仍然有隔阂，互相保持距离。

王仁昌回忆：1976年春，省新华印刷厂原工总头头“杨继高有次到汉正街找‘汉华钟表社’的一位朋友。路过汤良润家，我说，晓能屋（李远广的笔名）在里面呢。他轻蔑地一笑，说，不就是那个刻章子的徒弟嘛！刻章子比之正规单位，有三教九流之嫌，加上‘徒弟’二字，更具江湖气息。其藐视之意溢于言表。他的回答让我笑了：莫说，他们斗争还是蛮有效果的。七四年，胡厚民……没等我说完，杨继高诶诶连声：你想说，是反潮流派闹去闹来，才把老胡闹出来的？莫见鬼哟！”^②

李锋原是武汉一中六六届高中生，1973年初就参加了“反潮流派”的活动。1976年“批邓”时刘传福带李锋去见朱鸿霞，朱鸿霞说李锋署名“吴仁筱”的大字报点韩宁夫的名，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李锋说：我认为韩宁夫是走资派，这是我的看法，为什么要给你打招呼？

王仁昌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毛泽东逝世当天，唐恒山等“反潮流派”的举止：

唐家小屋里坐满人。个个悲戚无言，两眼红肿。唐太婆边用胳膊抹眼睛，边在灶前忙活着。老人虽然做了满桌菜肴，谁也不愿走近桌前，一个个拉去坐了，谁也提不起筷子。唐恒山强打精神，清清嗓子：同志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完成主席的遗志！小奚忽然叹口气说：

^① 参见关于唐恒山的《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免于起诉决定书（阳检二字[79]第79号）》。

^② 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要是死能代替，我真愿拿自己的命换来主席心脏重新跳动！她这一说，人们纷纷响应：拿我们所有人的命都成！唐太婆哭了：拿我一家四口性命我都愿干啊！

结果，满满一桌饭菜，直到大伙散去，动也未动。

1986年，王仁昌弄到中办发（1986）6号文件，据此申诉，要求落实政策，被判刑四年的他获得平反。王仁昌兴奋地告诉唐恒山，让他照样办理，唐恒山说：我要他们平反，岂不是承认他们的合法性？

1988年冬，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做个体户做得风生水起的王仁昌，写成长篇小说《风流巨贾》，出版前就被各路媒体以“个体户写个体户”、“体现改革开放伟大成果”为新闻眼大力宣传。唐恒山说：“你写的是真话吗，这不是浪费笔墨？”“真是存在决定意识。”误信王仁昌判死刑而另嫁的小奚对此书的看法，唐恒山转告给王仁昌：“她说了八个字：歌功颂德，变节求荣！她现在再也对你没有内疚了。”^①

2003年开始，刑满释放、生活无着的造反派向省委要求落实中共中央1982年9号文件，“反潮流派”和“主流派”的历史矛盾依然带到这个漫长的上访申诉过程中。

文革后，“反潮流派”一些人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每周学习一次，坚持至今。

^① 任常《抱膝时为梁父吟》（网文，2011年）。

第二十五章 武汉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第一节 省市县委对待群众运动的新姿态

1974年两报一刊《元旦献词》对当时运动的提法还是“批林整风”，再次强调“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指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月18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批林批孔”，同时发出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共中央通知》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的帮助”。

1月24日，中央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干部会议召开，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召开。各地组织干部、群众收听了两个大会的录音。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在全国展开。

很多干部、群众感到批林批孔运动突如其来。1973年10月开始的造反派头头座谈会还在进行，关心局势的人纷纷前往省二招打探动向。正在负责人防工程的水院革委会副主任张建成，受“摸不着头脑”的院党委一位副书记指派，前去二招了解情况。张建成看到：“各地、县、武汉很多单位一些原造反派头头，也拥·到这里探听消息，像现场探访的新闻记者，看到里面出来一个人就围上去，探问座谈会内容，什么领导参加了，讲了什么，什么时候放胡厚民、杨道远等等。大家最关心的是省委领导对解决‘两清’问题的态度。”^①

197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作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报告，参加读书班的工农出身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听了这个报告。

王洪文说：“有些省老大难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嘛，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

^①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75页。

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有些地方的问题应当解决了。要能解决问题，首先要把原因找对头，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是错误的；这本来是修正主义的后遗症，怎么能说成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些问题恰恰说明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把小兵全打下去。……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线，小兵提升’。”“有些人‘称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其实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个胜利。”“毛主席最近指示：‘牛为什么要长两支角？就是要斗争’；这句话在一九五五年就讲过了。”“有些单位对‘十大’报告要用‘四大’，怕得要命，到现在还不敢组织群众学习，群众起来搞‘四大’反潮流，我们应该赞成，为什么要害怕呢？只有搞修正主义的人才害怕搞‘四大’，凡是搞马列主义的，就应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起老百姓了呢？怕老百姓，认为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的人对毛主席的这句话是听不进去的，他们就喜欢压，压不服就抓。”有些干部“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要向这样的同志大喝一声，太危险了，人民群众欠了你什么账呢？……要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讨账的话，群众就有权再把你的权夺回来。”“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某些人来说，批极‘左’、批林彪是假的，批文化大革命才是真的。”“现在有些地方，老干部犯错误，可以一看二帮允

许改正，但新干部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为什么老干部犯错误可以教育，新干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这不公平嘛！”“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这话那有一点共产党员的韵味呢？……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造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这有什么不好？文化大革命我们造了资产阶级的反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有什么不好？”“甚至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大误会，非常反动。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这是思想问题，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①

原九一三成员，九大、十大中央委员董明会参加了王洪文主持的这个中央读书班，回到武汉，他在全市各区、局和大单位负责人会上传达了王洪文的这个报告，在省二招造反派头头座谈会，在会见聂年生、王华珍、谢妙福等人时，都讲了王洪文报告的内容。王洪文的报告通过各种形式为造反派知晓，由于多处切合造反派的切身经历，造反派希望解决的问题几乎都说到了，因而受到热烈欢迎。此后，报告中的一些句子、段落经常被造反派的大字报、讲演所引用，有的成为游行时的口号。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造反派加大了活动声势，要求省市县委纠正两清一批的错误，进而恢复和发展文化革命的成果——各级革命委员会。

此时湖北省、武汉市是两赵一王当政，他们没有七年多本地文革的历史包袱，面对新的群众运动，采取了和王任重、陈再道、曾思玉不一样的政策和策略，一直与造反派包括“反潮流派”保持着沟通、对话。1973年9月15日赵辛初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就说过：“我们必须看到工作中还存在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例如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代表的问题，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还没有很好地安排，没有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历次运动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和处理……对待群众代表的问题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说的‘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就打’的情况，虽然是少数，但值得高度重视。”“关于四大，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教导。敢不敢运用四大武器，是一个相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依

^① 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1974年1月14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接不接受群众监督的问题。”^①

顾建棠甚至认为，湖北形成了“军地干群联手、上下呼应、相互支持的‘批林批孔’统一战线”^②。顾建棠所说的“军”，是指取代曾、刘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王六生。

李承弘批林批孔时一直与胡厚民在一起，他的感觉与顾建棠相同：“此时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与省市的赵辛初、赵修、王克文达成共识，共同对付省市革委会中的军方代表。省革委会中，以张玉华、孔庆德为首的部队成员，不承认‘两清’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地方干部及造反派代表以各自利害关系，结成暂时同盟对付军方代表，虽然是二比一，但在省革委会内阻力仍然很大，决议通不过，夏朱胡、二赵一王共同认为要上促下攻，要发动群众以外力对军方施加政治压力。”^③

1月28日省委、军区党委召开10万军民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后，2月10日，省、市总工会召开“武汉工人批林批孔大会”，省总工会副主任朱鸿霞、市总工会副主任吴焱金被安排在会上发言，原百万雄师二号头头杨道安以“七〇一一厂老工人”身份在会上发言。



载 1974 年 2 月 11 日长江日报

从2月上旬开始，长江日报连续发表署名常江的评论文章，提出“只有紧密联系实际，才能深入批林批孔，才能清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① 王光照听传达的记录，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62—363页。

②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09—312页。

③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57—258页。



1974年2月13日长江日报第4版

的流毒。而联系实际就是要紧密结合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从3月21日起，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开始发表多篇造反派头头的文章：湖北省柴油机厂张立国、湖北沙市棉纺织印染厂谢邦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湖北日报3月21日），张立国、龙铭鑫、高玉泽、谢邦柱、庞道铭、谈志发、黄牛《攻击和诬蔑红卫兵就是攻击文化大革命》（湖北日报3月31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深入批林批孔 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而斗争》（湖北日报4月30日）；梅子惠、龚飏、黄运武、李金枝、李辉耀、孙长松《还尔庐山真面目——揭发批判林彪在湖北的死党的反革命罪行》（湖北日报5月8日），武昌造船厂李承弘、李文鼎《“倒过来”是“复礼”的反革命哲学——痛斥林彪及其死党宣扬办事情“从主观到客观”，妄图开历史倒车的罪行》（长江日报4月6日），武汉锅炉厂王光照《让革命造反精神百代传扬》（长江日报4月24日）。王光照说这篇文章是王克文亲自布置他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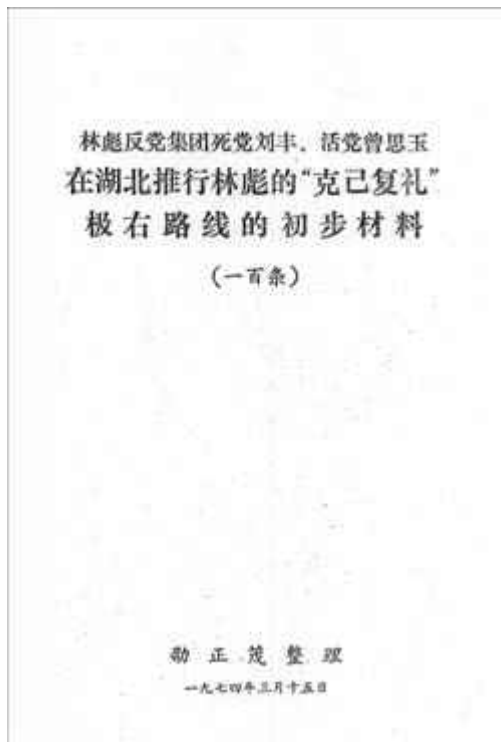
张立国、谢邦柱的文章写道：“林彪在湖北的那个死党”“诬蔑革命委员会是‘牛鬼蛇神的防空洞’，‘阶级敌人的马蜂窝’，是‘坏人掌权，好人受气’”。“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视若寇仇，捏造种种罪名，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统统‘打扫’‘回营’，把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干部打成‘黑手’，‘黑后台’；把地方领导干部打成‘地头蛇’，排斥一边。”

2月14日至17日，武汉市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研究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整风等问题。会后，市委发出《关于深入批林整风的意见》，要求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指出林彪推行的路线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是什么极左，而是“右得不可再右了”。自此，全市对林彪路线“极右实质”的批判全面铺开^①。市委文件中林彪路线“右得不可再右了”这一句，出自王洪文的报告。

2月上旬，湖北省委召集省革委会常委（包括群众代表）举行批林批孔座谈会，“商讨如何开展这场运动”。顾建棠回忆：省革委会常委会多年没有召开了；“大家肯定省委的积极态度，希望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紧密联系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所犯下的罪行和错误，开展批林批孔，并一致要求尽快释放被长期关押的胡厚民、杨道远和任爱生。”

^①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57页。

赵辛初在会上表示：“省委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联系湖北实际，同广大群众一起开展批林批孔。关于解除胡厚民等人的监护问题，省委一定认真研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顾建棠回忆：他在会上要求省委责令长办为涉及三十多人的“反革命杀人集团”冤案平反、释放被关押的三人，并“建议组建批林批孔材料组，尽快向群众提供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极右路线的具体材料，同时成立宣传组和联络组，他们的工作一



定要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会后有人不赞成提‘争取省委的领导和支持’，我解释说，要汲取反复旧的教训，何况‘两赵一王’不同于曾思玉和刘丰。”

顾建棠关于建立材料组的建议马上得到落实，赵修亲自抓，省委副秘书长陈克东负责具体事宜。赵修指示成立全部由造反派组成的材料组，省委提供材料和工作条件。3月15日，顾建棠、沈复礼、丁元芳（武汉制药厂原工总头头、厂革委会副主任）、李宝善（国棉三厂工人，原工造成员）等完成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

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材料组提出用“中共湖北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署名，赵修说省委意见还是用群众组织的名义为好。材料组最后商定用“少正卯”的谐音“邵正茂”署名，材料由省、市总工会发送^①。这份材料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

3月2日，胡厚民被释放；不久，长办被关押五年的三人被释放。

2月中旬，1973年10月上旬开始的首义路二招座谈会已开了四个多月，赵修、王克文来座谈会造反派头头们讲了一次话。参加这次座谈会的王光照记录了两人的讲话大意：“同志们反映了很多重要的情况，从揭露出来

^①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54—257页。

的很多事实看，我们过去被蒙在鼓里。曾、刘的所作所为，原来我们并不清楚，湖北的问题应当说是很严重的。省委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准备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辛初同志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打算。”^①

省市委不断顺应形势表态，在重大问题上迟迟不“着手”，造反派非常不满。早在1973年夏天，造反派就有议论：“当年九二七指示下来的时候，他们动作多快呀，真的是‘阎王叫你三更死，决不留你到五更’。现在轮到他们头上了，一拖几年，隔靴搔痒”。1974年3月聂年生在省委与造反派头头的座谈会说：“软磨是不行的，硬扛更是办不到。再说了，联系实际总得拿出点行动吧。”不久造反派发动“三厂一局攻三办、促省委”，理由就是：“几个月来省委的行动迟缓，各单位是能推就推，能赖就赖，大打太极推手。”^②

省市委“行动迟缓”有它的苦衷，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咄咄逼人的造反派，还有已在社会上高喊“捍卫两清一批成果”的“工农兵”，以及他们背后更巨大的一个群体——执行两清的各级当权派和专案人员。1974年3月初赵辛初对夏、朱、吴、聂等人说：批判林彪、刘丰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牵涉到过去另一派的那些群众，还有那些参加办专案的积极分子，都需要做很多耐心、细致的工作，不容易呀。”^③

批林批孔座谈会这种形式是湖北省委首创。座谈会不同于上级指示、下级聆听的工作会，不同于对象受审查的学习班，也不同于当权派和造反派都擅长的批判会。顾建棠回忆1974年2月省委召开的省革委会常委批林批孔座谈会时，说开会的方式是“商讨”。这次“商讨”在顾建棠看来是有成果的，一是省委接受他的要求，责成长办党委释放了三位造反派成员，二是接受他的建议，编出了影响很大的批判曾刘“一百条”。

省市委随后多次召开了参加人数不同、时间长短不一的造反派头头座谈会。各单位当权派纷纷仿照省委的方式，请来造反派开座谈会，商讨如何开展运动。有的单位的座谈会，是造反派要求召开的。

武汉市委机关的批林批孔座谈会，是在市直机关原造反组织“机关红司”成员曾繁斌、杨精业、王火臣等多次要求下召开的。座谈会上，造反派要求对两清错整的造反派落实政策，要求参加魏绳武专案组，要求市委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47页。

②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22、357、376页。

③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56—357页。

领导释放魏绳武，作出结论，安排工作。

这个座谈会的作用之一，就是释放了关押四年的魏绳武。3月9日，座谈会决定10日下午在市公安学校召开大会，与市委副书记王哲南辩论魏绳武问题。3月9日夜，魏绳武“不明不白地”被强行送回家。事后他才知道：“（市委书记）田文等人怕把事情闹大了，就来个釜底抽薪，先把我送回家，让大会开不成。”^①

批林批孔办公室是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机构，从省委到基层党委一体设立。基层的批林批孔办公室一般都有造反派参加。

1974年4月，刘祖平正带人在北京上访，武汉铁路局党委派人到北京，要刘祖平回去担任批林批孔办公室主任。

张建成回忆：水院的批林批孔办公室是院党委主动成立的，我被任命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总支书记任组长，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师为组员。主要任务就是为‘两清’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处理黑材料。”“这是党委的决定与安排，事前也没有和我商量过。一九七七年整我的时候，硬说是在我们的压力下才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篡夺批林批孔的领导权，逼迫党委按我们的要求进行批林批孔。”^②

李承弘是被武昌造船厂党委主动推上领导全厂批林批孔运动这一位置的。1973年下半年被任命为不脱产的武船总工会常委，他“对这种挂名安排‘民主人士’的做法”“不屑一顾”。他回忆：1974年2月，“武船党委见运动来了，一批人以林甫为首，以养病为由住进了东湖疗养院，工会主任请了病假。党委抓全面，推出工会领导全厂运动，把我一下推到前台，将我从分厂调到总厂，脱产参与领导全厂批林批孔”^③。

王克文5月29日说：“关于批林批孔办公室问题，前段有的起了作用，做了些工作，有的作用不大。现在根据12号文件的精神，批林批孔办公室不宜存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职能部门做具体工作。群众代表就是群众代表，开会请来，不开会回去”^④。

造反派为恢复工代会作了一番努力。

^① 参见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46—247、263页。

^② 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77、280页。

^③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56页。

^④ 武汉汽车配件厂革命工人翻印《市委王克文等领导同志在区、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5月29日）》（1974年6月12日，油印传单）。

省市总工会成立后，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已不存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造反派打算恢复工代会，以此名义开展活动。1974年3月，原市工代会副主任彭祖龙、常委郭洪斌租用汉口的人民饭店和海陆饭店，作为工代会接待处。彭祖龙回忆：我们是按两赵一王的要求，在这里设立接待站，接待原基层工代会成员来反映两清问题。因为当时要求落实政策的造反派“到省委上访的是人山人海，两赵一王希望我们帮助做工作”。“我们在人民饭店工作了三十五天左右，共接待2300多人，向省交了近七十多个材料，其中急件五十三件”^①。1974年4月27日出版的《武汉工人》报说，“目前各级工代会，近七百多个单位正式行使工作”^②。“工农兵”在4月赴京上访递送的材料中，对恢复“被中央五二七指示抛进了历史垃圾堆”的工代会表示反对。

各级工会业已建立，省市总工会领导班子给造反派“补台”的力度比较大，省委始终没有同意恢复工代会。

第二节 “放、平、补、提、纳”

1974年3月，武汉地区造反派头头借鉴“河南经验”，提出“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吴焱金回忆，胡厚民被释放后提出对当前运动的想法，朱鸿霞将胡厚民的想法“总结归纳”为这五个字。吴焱金解释：“‘放’，就是放人，将关押在监狱里的造反派头头一律释放……。‘平’，就是要对被打成五一六、北决扬、坏头头的造反派平反。‘补’，就是要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补台，要把撵走的群众组织代表请回来，发挥群众组织代表在各级新生红色政权中的作用。‘提’，指提干、提职，即指在恢复的各级党委、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中要有造反派的代表。‘纳’，指纳新，即吸收造反派入党，来源于毛主席1968年关于整党的指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③1982年7月武汉中院对朱鸿霞的刑事判决书，说到朱鸿霞对“五字方针”的解释：朱鸿霞“宣扬‘河南问题归纳起来是“放、平、补、提、纳”五个字’。叫嚷‘把关

^① 2019年5月余德亨访谈彭祖龙的记录。

^② 参见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把林彪死党刘丰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载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武汉工人》报第49期（1974年4月27日）。这一期《武汉工人》报是停刊四年后复刊的第一期。

^③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63页。

进监狱的造反派放出来’，‘要彻底平反’，‘补进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大幅度地、质量性质的补台’，‘破格地提，大胆地提’，‘吸收进来，甚至于进党委’”。

关于“放人”，造反派头头向省委多次力争，“反潮流派”不停顿地呼吁，首先要释放胡厚民、李想玉、杨道远、任爱生。2月28日，新派主要头头、一向温和稳重的张立国在省二招对随县造反派头头说：“任爱生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干部，对造反派有感情。胡厚民真算得上我们造反派中的闯将。他们扼杀，我们不斗行吗？不斗则要掉脑袋”。4月5日，已任团省委书记的张立国对进驻团省委的造反派说：“杨道远是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定要翻案”^①。

3月2日，“湖北五一六、北决扬总头目”胡厚民被释放，不久李想玉被释放，他们都恢复了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释放杨道远、任爱生的要求被拒绝。

顾建棠回忆：“释放了胡厚民。这一举措震动全省，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的各种形式的五不准学习班顷刻瓦解，被关押人员获得自由。”^②

原二司一批人聚集起来要求释放杨道远。分配到长江日报社的王军（华农原二司成员）在报社招待所安排了一个房间，作为联络地点。他们组成方保林领头的为杨道远翻案的专门班子，刘汉武负责材料汇总编写，张涛、徐宏彩、李莉负责材料收集，谢保安负责联络和行动。

3月24日，经王军等反复交涉，省委组织部长薛坦与王军、刘汉武、吴恒春、徐宏彩（华农原二司成员）、谢保安等人座谈。薛坦说：“今天请大家来是谈谈你们所关心的杨道远的情况，省委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看法和想法。”王军等一一陈述了要求释放杨道远的理由，薛坦说：“你们所关心的杨道远同志，我们对他也很有关心，现在正在重新准备他的材料。请你们给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能作些安排。”薛坦称杨道远为“同志”，且没有像省委主要领导那样一口回绝，吴恒春觉得“这就够了”。谢保安回忆薛坦讲了这样一番话：“1. 杨道远同志的专案是由曾思玉、刘丰领导的老省委班子办理的。我们刚刚接手，情况不甚明了，解决问题更需要时间。2. 从接手的专案情况来看，杨道远的问题比较复杂，有些甚至涉及

^① 中共湖北省委运动办公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材料》第56页。

^②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57页。

刑事犯罪。（他一共罗列了十个问题，如抢劫国家机密文件和档案，抢夺枪支弹药，里通外国造成犯罪分子、华侨学校吴涂塔潜逃海外等。）3. 关于杨道远同志的专案审查，周总理是有过专门批示的。现在我们要解决杨道远同志的问题，必须向周总理请示汇报，必须征求他的同意。这就需要时间和一定的程序。”谢保安说：“薛坦的通报令我们心情沉重，也更坚定了我们为杨道远讨还清白、为杨道远翻案的决心。”

他们为推翻杨道远的罪名，自费到外地找王彩珠（华师原二司头头）、余松樵（原二司情报组内武大“三涛”之一的松涛）等人调查，王、余等曾承认自己参加五一六，并揭发杨道远是武汉地区五一六总头目。这些人有的避而不见，有的写了澄清材料。谢保安说：“这些澄清材料极具说服力和震撼力，触目惊心还原了曾思玉、刘丰一伙人不择手段地整治文革造反派，把杨道远往死处整的事实。”

方保林、刘汉武、徐宏彩、李莉等人日夜不停地赶写出《为杨道远翻案》的材料。材料完成后，谢保安组织原武汉三中的同学宋德大等，在汉口江汉路中国银行将这份材料抄成大字报，贴了一整天，贴满水塔下一面墙。长篇大字报的刊头和插图，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原二司成员、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施江城所画。参加张贴的还有杜良怀、张涛、袁长宏等人。

4月，谢保安补台到团市委任职的消息已向部分基层单位传达。中旬，应团市委书记汤有元邀请，谢保安到团市委与团市委中的学生委员座谈，主题是“高举造反有理大旗，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谢保安联系武汉文革历史，做了长篇发言，着重讲述“还我杨道远”问题。此后，谢保安应邀去一中、三中、六中、三十九中、武昌实验中学作报告，反复宣讲“还我杨道远”。一中的李钢和三中的刘钢等同学组织了全市中学生万人大游行，游行口号之一就是“还我杨道远”。这次游行惊动了省市领导，省委书记宋侃夫将谢保安叫到家里对他说：“此事到此为止，不要过头了。”

4月下旬，为杨道远翻案的一班人在长江日报招待所存身不住，转移到华中师范学院招待所。除原班人马外，新增了原华师革委会副主任刘闯、原体院革委会主任赵子强等人。这时《关于杨道远蒙冤受屈真相材料》完稿。由华师图书馆的原二司成员打字，三中教师王明毅（后任中国法律出版社社长）油印装订，共500份。谢保安交给省委秘书长陈克东10份，托他转交省委各位书记，余下的请办公厅和省档案馆留存。方保林、张良

栋、胡卫平（原四中二司成员）北上河南、北京，找胡卫平的二舅（时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大舅（时任新华社总社国内部负责人），希望通过他们把材料转交给党中央、毛泽东。

谢保安回忆：“直到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我和柳英发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这份材料能上达天听，能感动上帝。所有能想到的，能做到的，我们都去争取了，都去做过了。余下的材料，我让三中的董柏华老师拖回他的单身宿舍。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这成为董老师无法辩驳的罪名，因此被判劳教三年。”^①

1974年4月5日，市委批转市中级人民法院临时党委《关于复查处理运动案件意见的报告》。“报告”说：“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市、区人民法院军管以来所判处的运动案件处理申诉的任务剧增，要求很急”。为了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加速进行复查处理，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要求在市委领导下，组成复查处理案件小组；各区在区委领导下，同时组成领导小组或相应的专门班子^②。此后，法院释放了一些两清中被抓的造反派成员，造反派认为做得远远不够。

被打成“小胡厚民”“女胡厚民”的基层造反派有的放有的不放，省委似乎没有一定之规。一般来说，经在任中央领导过问的，涉及刑事、“恶攻”一类的，即使属明显的冤案，也不予释放。

魏绳武1970年1月在北京被隔离，罪名是“五一六在武汉的关键人物，藏有五一六的保险柜”，同年5月经陈伯达、黄永胜指示押回武汉隔离审查。1974年3月9日监禁四年的魏绳武被释放时，他的感觉是突如其来，没有一点先兆。市委书记田文、市委组织部长惠锡礼找他谈话，他要求得到关于五一六问题的书面结论，田文说“这个问题由中央决定”。市委派车送魏绳武回家，他的妻子拒绝开门，不接受他“这样不明不白地回家”^③。

吴焱金多次要求释放工造头头、市革委会常委王锦铭，没有结果，只破例允许他在看守所见了王锦铭一面。王锦铭1970年在北京学习班被逮捕，罪名之一是攻击江青、叶群。他私下说“男人当道，女人得势”，被

^① 以上“为杨道远翻案”的记述，参考了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莫安德《“还我杨道远”活动情况回顾》（网文，2017年）、《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②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64页。

^③ 参见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61—166、189—192页。

潘宏斌揭发^①。

对造反派的平反的要求，武汉市委做出了回应。

7月17日，市委上报《关于继续纠正“两清”扩大化错误落实政策的几个问题请示报告》。“报告”说，对“两清”中确实作为“五·一六”、“北、决、扬”审查，现在查清否定其问题的，单位领导人要与本人谈话，代表组织表示赔礼道歉，要认真退还和销毁有关材料，原则上应恢复其职务^②。这个工作有些单位做了，如水院；大量的单位或拒绝或推诿或拖延。拖到下半年，批林批孔不宣而止，平反一事同样不宣而止。“有关材料”得以保存，两年多以后又派上用场。

经新一冶头头曹承义、黄家祥等呼吁奔走，一冶设备处造反派头头李开键获得平反。3月上旬，一冶设备处开大会，青山区公安分局人员宣布：“1970年2月3日将李开键拘留入狱关押、释放后又戴上坏分子帽子劳动改造，属于错案，现予以平反。”设备处补发了李开键坐牢和劳动改造期间扣发的工资，批准他去上海治病^③。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临时党委在丁家显、张建成、王新民、李鸿杰、徐海亮等造反派的促动下，彻底、细致地完成了数百人的平反工作。这一工作全市少见。

水院的两清远远不是“搞过了一点”的问题。文革开始时，全院师生员工近五千人，其中学生三千多人；1974年3月20日有人在行政大楼前的布告栏公布了水院五一六分子名单，人数为446名，其中学生205人，教师130人，工人53人，干部53人，家属5人。《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一书写道：“文革初期刘邓路线的执行人内定水院“右派”的比例为10%，而水院“五一六”分子占水院师生总数的9.9%，何其相似的数字！这绝不只是历史的巧合！”^④。

张建成回忆：

我们在批林批孔中希望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为“两清”中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师生员工平反，上送材料，与院党委领导谈话，向省委反映情况，都是为了这个问题。

^①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62、134—135页。

^②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66—367页。

^③ 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7页。

^④ 参见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553、540页。

我们的态度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很多学生都背了这包袱，伤心地离开学校，有的学生因此而坐牢，如分到江苏的肖名珍同学；有的被逼致死，如分配到云南的陆植钧同学。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省委、院党委，现在形势不一样了，省委、院党委都恢复了，不能再用文革初期的办法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安定团结，矛头不要针对专案组人员。

水院党委的领导，除张蒹承外，都是外面调来的，对“两清”问题是超脱的。张蒹承也没有参与“两清”的工作，也是超脱的。因此我们认为存在着解决“两清”问题的有利因素。

对领导不能攻，而是反映、汇报情况，让他们了解“两清”中的问题，取得他们的支持。以上这些是我的观点，也是水院在校造反派头头的共识。

我到省委宣传部反映水院“两清”中的问题及我们的态度，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焦德秀亲自听取了汇报，他对此给予肯定，并要我做好被整的人的工作，相信省委会解决“两清”中的问题。我把这些情况通报给了在云南的丁家显。……

我们的这些观点，党委副书记魏承厚、崔连贵等都是肯定的，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坚持这样的认识。

为了领导好批林批孔运动，党委决定成立院批林批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长常树荫任主任，任命我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总支书记任组长，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师为组员。主要任务就是为“两清”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处理黑材料。

学生中的重点人物，派专人去平反，处理材料。一般人员去函平反，请单位帮助处理。一些原专案人员也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原保卫科长李喜尔到江苏处理肖名珍同学的问题，组织部的韩德勇到云、贵、川历时1个多月处理学生中的平反问题，都卓有成效。被平反的学生，多数对学校很感激。

学校教职工中的问题，由各总支负责处理。总的来说，处理得比较顺利^①。

4月，原二司头头、省革委会常委方保林从哈尔滨回到武汉，5月，他在武大图书馆召集各校原二司头头开座谈会。张建成回忆：“他了解到

^①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76—277页。

我院把批林批孔运动与解决‘两清’问题密切联系起来，而且依靠党委解决问题，效果较好，要我在会上谈谈情况。我把我们的指导思想与做法作了介绍。”^①

华中工学院对两清错案进行了平反。李定初回忆：1974年8月他为两清事去华中工学院，军宣队副指挥长、院临时党委副书记程远对他说，两清的材料我们都销毁了。已分配的学生“凡是搞错了的，我们都统一发了函，大意是：××同志在两清中受过审查，现经查证，××同志在两清中不是‘5·16’‘北、决、扬’。属于本人交待的（材料）退还本人，属别人揭发的和学校转去的材料请当地组织代为销毁。此函请装入档案。”^②

关于“补台”，4月7日王克文接见“反潮流派”时说：“补台是要补的，什么时候补，恐怕现在还不适宜。”^③5月29日王克文在区、局书记会上说：“补台问题，按中央文件，按中央政治局接见讲话精神，不是在哪一派里面找，一定要打破框框，不能在一派内面挑选，按接班人条件挑选。代表性不足，就是把各种不同观点代表人物补台，但现在一律不补，条件不成熟。”^④

批林批孔期间，群众代表补台进入省市革委会的只有聂年生一人。省市总工会补台的动作很大，3月，胡厚民、潘洪斌、邓金福、杨连成增补为省总工会副主任，李想玉、彭祖龙增补为市总工会副主任。杨、彭二人可以说是补台，对于已恢复省革委会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另四人来说，只能算增加一项兼职。

1974年3月，赵修、姜一、王克文、陈克东与朱鸿霞、胡厚民、吴焱金、李想玉、张立国等研究“补台”问题，有人提议增补聂年生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有人不同意。据聂年生事后讲，“因为张立国反对，朱鸿霞不同意，胡厚民不表态，吴焱金是坚决赞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搞成常委的”^⑤。4月7日王克文接见“反潮流派”时谈到聂年生补台一事，原水运学院二司头头刘汉武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怎样对待反潮流斗争的

①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78页。

② 李定初《关于我在七〇年后办学习班的情况及专案人员的情况》（手稿，1977年10月17日）。

③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1974年4月7日，武重批林批孔办公室翻印）。

④ 武汉汽车配件厂革命工人翻印《市委王克文等领导同志在区、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5月29日）》（1974年6月12日，油印传单）。

⑤ 聂年生1974年6月14日致肖佑祥（红反团成员）的信。

看法和评价问题。”“现在补台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有拉私人势力，搞宗派主义的倾向，有搞裙带关系的倾向。对此，群众的意见很大，反映很强烈。”^①

吴焱金了解聂年生增补为市革委会常委的经过：

王克文找我谈话，要我去做聂年生的工作。我不去，我说去了也是自取其辱，除非同意增补聂年生为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我就去做工作。王克文说：“增补市革委会副主任是不可能的，增补个常委可以考虑。”我说：“常委就常委，您说话要算数。”王克文说：“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我说：“那好，一言为定！”我立即赶到电车公司，聂年生、王华珍等人正在那里开会。我叫聂年生出来讲话，与会者一起喊：“不能单独谈，要谈公开谈。”我说：“我找他纯属私事，顶多耽搁三分钟，请多包涵。”我把聂年生叫到一边，转达了王克文的意见，聂年生略一思索，回答说：“可以考虑。”我说：“你干不干？我现在就去回话。”聂年生果断地说：“那你回话吧！”说完他赶紧开会去了。我向王克文报告了和聂年生谈话的经过，王克文笑了。增补聂年生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任命文件很快发下来了，聂年生从此进了市革委会。他进入市革委会比其他造反派头头晚了将近六年。他也没有去做“反潮流”同伙的工作，去了还会遭到痛骂，那些人仍在社会上继续闹。聂年生在市革委会同老干部王克文、伍能光、文祥、黎智等关系都非常好，尤其是和伍能光经常在一起。伍能光后来在一元路给聂年生解决了一套住房，许多人笑称聂年生是伍能光的干儿子^②。

聂年生被“补台”后，王华珍所在单位市电车公司给她落实政策，补发了两清时扣发的工资，分配了住房。“反潮流派”里很多人认为，聂、王被“落实政策”，是二人此后逐渐淡出“反潮流派”行列的主要原因。

关于聂年生的“补台”，市委考虑的不是王克文强调的“接班人条件”，而是聂年生在“反潮流派”中的“代表性”。聂年生增补为市革委会常委、退出街头活动后，他就不能“代表”“反潮流派”了。

省委也曾将谢妙福列为“补台”对象，被谢妙福拒绝。

谢妙福1974年5月10日文章讲到他对“补台”问题的看法：“主张

^① 参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1974年4月7日，武重批林批孔办公室翻印）。

^②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59页。

凡符合党员、接班人条件的，应该成批地进行‘补、提、纳’”，“反对搞少数人的封官许愿”。谢妙福说有省委领导给他“封官”，拿来表让他填，被他“理所当然地拒绝”。刘祖平2003年接受老田的访谈时也讲到这件事：“因为我们起来反抗，省委就想着要收买为首的谢妙福，当权派自己不出面，却要胡秀娟拿着表格，来找谢妙福填，说是要给他补台。谢妙福当场就把表格撕了，提出口号‘反对封官许愿’，并说这样搞法是对他的侮辱。”

各单位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在两清“捅马蜂窝”时基本上被清除。1973年8月底王光照向武锅党委书记提出应该恢复自己在厂革委会的职务——生产指挥组副组长，书记回答：“由于形势的变化，生产指挥组已撤销，所以该职务不好恢复。”^①批林批孔运动高潮时，武锅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也没能回到原岗位。各级革委会中群众代表问题1974年没有解决，以致1976年5月武重发生厂革委会重新“树旗”事件。

3月，已任团省委书记的张立国在团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团省委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非改组不可。”“团省委要补七个正副书记，十名工作人员，这样造反派就占优势了。”^②张立国和时任团省委书记的高玉泽经过努力，只将原新湖大周强兵、彭××、罗思凡，原新华农谈志发，原新武重联司张运生等人作为工作人员调进。张立国要求调原新一中头头、江汉区革委会常委陈德胜任团省委书记，被省委组织部长薛坦拒绝。张立国还打算调原新一中几位学生来团省委下属湖北青年报社、湖北青年杂志社，改变团省委报刊“不正面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局面”，还是因为薛坦，“没有搞成”^③。

谢保安回忆：4月初，姜一对我说将安排我到团省委任副书记。我说我连团员都不是，姜一说他知道，并用战争年代火线入党的事鼓励我。他说已和团省委排名第一的书记毛菊元说好，由她安排我入团的事。姜一还说省委将以七四年九号文件宣布对你们的任命。当时很多干部听了这个文件的传达，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正式文件。不久高玉泽带车接我去团省委填写入团申请书，毛菊元和张立国做我的介绍人。办完手续，毛菊元对我说，张立国、高玉泽年纪都大了，他们也不安心在这里工作。今后我们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68页。

② 中共湖北省委运动办公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材料》第57页。

③ 2016年杜先荣、田力为访谈张立国的记录。

一起共事。姜一和我谈话时也讲到张、高二人早就超龄了，不安心在团省委工作，要求换岗，团省委需要补充新鲜血液。4月中旬，团市委书记汤有元邀请我去与团市委中的学生委员座谈，座谈会的主题是“高举造反有理大旗，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我联系武汉文革的实际，做了长篇发言。这一段时间内，夏邦银曾告诉我，陈文汉（新一中头头）、董学精（东湖中学二司成员）、庞道铭（邮电学院二司头头）补台到团市委^①。

柳英发2019年对笔者说：省委组织部通过潜江县委通知还在农村的我去省委组织部报到。4月8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唐蔚生对我说，安排我到团省委任书记。离开组织部碰到张立国，他很高兴，带我去了团省委，与毛菊元等几个书记和一些工作人员见了面。张立国对我说，团省委以后就交给你们了，我们是要去省委的。之后我见到赵辛初、姜一，我说团省委要增加新人，条件是坚定的造反派、出身好，还要有女同志。姜一明确表示支持。于是我到武汉市各区开中学生座谈会，收集材料，准备补台新人的名单。当时传说对我的任命已经印好了。5月4日，团省委在洪山礼堂召开纪念五四大会，省委组织部安排我和谢保安参加，我和谢保安坐在主席台上，还安排我在大会上发言。会前姜一审看我的发言稿，我点名批判曾思玉，极力为杨道远翻案，姜一说这些话先不说，中央表态后再说。我妥协了，事后方保林批评我右倾。

柳英发、谢保安、庞道铭等人的补台后来都没能成为事实。

省总工会副主任朱鸿霞、胡厚民准备安排李承弘、杨业龙去省总工会宣传部，已经通知二人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②。

华工临时党委对造反派头头“补台”一事采取了行动。王富山回忆：1974年夏季，华中工学院临时党委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去一封商调函，详细介绍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和自愿要求到新疆工作的情况，要求把我从新疆调回华中工学院，进入学院领导班子，进行“补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负责科技干部工作的司马义·艾买提书记看到这封商调函后，当即批示：“像这样的同志，边疆也很需要，不同意调回武汉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把商调函及司马义·艾买提书记的批示发给塔城地委组织部。在这种情况下，塔城地委组织部才决定任命我担任地区农机厂副厂长。

^① 参见《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②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61页。

这些情况我事前一无所知^①。

批林批孔运动处于高潮时，王克文等省委领导说补台“条件不成熟”，1974年8月中央开始强调“安定团结”，在省市市委看来，条件就更不成熟了。

造反派提出“补台”，意思是承认两清时驱逐了群众代表的现有各级革委会，不推倒重来，不“拆台”，只要求恢复原革委会中群众代表的职位；而“提干”是要求将合乎条件的造反派工人提拔为干部、将合乎条件的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升职。革委会恢复原状都做不到，毛泽东说的“小兵提升”就更难以实现了。

1968年9月中央在整党中提出吸收“优秀的造反派入党”，同年10月毛泽东说“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1974年造反派再次提出“纳新”，依然没有效果，只有武船林子忠、武钢钟锡钢等少数几个人入了党。张立国1976年7月对新华社记者说：“六九年以来发展（党员）十万多人，造反派占百分之一。”^②1982年对朱鸿霞的判决书说他“叫嚷”各级党组织要把造反派“吸收进来，甚至于进党委”，事实证明朱鸿霞等人在“纳新”这件事上的作用仅限于“叫嚷”。1969年九大期间毛泽东亲自过问朱鸿霞入党问题，武重党委说支部通不过他们也没办法，直到1977年朱鸿霞入狱也没能入党。

对朱鸿霞的判决书长达四千多字，所“查明”1974年的“罪行”就是“宣扬”“叫嚷”“五字方针”，仅二百多字。可见“五字方针”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效果。

一治造反派推动“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的情形，曹承义回顾说：1974年下半年，我们要求的“放、平、补、提、纳”五字中的“放”字在一治还未落实，“平”字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补”、“提”、“纳”还未起步，刚刚热闹了一阵，批林批孔运动转入“深入持久”发展以后，运动就很快冷了下来。这一回合的斗争，我们在大好形势下又失败了。湖北省委又搞了一个新的花招，将省、市一部分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进行工作调离。不仅不搞“补”、“提”、“纳”，而是叫造反派“滚”^③。

武汉地区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

^① 王富山《我的简历》（2016年，未刊稿）。

^② 中共湖北省委运动办公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材料》第64页。

^③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42—143页。

第三节 从省委“七条”到省委“六条”

在批林批孔运动的大形势下，在造反派的不断促动下，省委于1974年3月4日发布《关于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几点意见》（征求意见稿，简称“七条”）。摘要如下：

一、要结合湖北实际，彻底揭发和批判林彪死党刘丰的反革命罪行。

二、要组织群众和干部学文件、学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学有关社论和短评。

三、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发挥各级革委会和工农青妇组织的作用。

四、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在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应由刘丰负责，干部和专案人员没有责任，群众更没有责任。群众之间不要互相攻击，不要纠缠某些问题冲淡批林批孔。

五、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阴谋活动，公安部门要认真维持社会秩序，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六、抢占办公室，冲击和进驻各级领导机关是错误的。

七、省委不赞成组织战斗队、联络站，搞广播车、街头广播站等，不准冲击机要室。

“七条”中造反派最关注的是涉及“两清”问题的第四条。造反派认为：省委总算承认两清中出现错误，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对错误轻描淡写，不敢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把两清中所有错误归于刘丰一人，免除当时省委中曾思玉、张玉华、孔庆德、韩宁夫等人的责任，免除肆意整人的各级领导人的责任，这都是不能接受的。造反派中大多数人特别是“反潮流派”说这个“七条”是“大毒草”。

“工农兵”对“七条”表示了谨慎的拥护，因为“七条”说两清中的错误“干部和专案人员没有责任，群众更没有责任”，如果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他们难逃干系。3月14日，“武汉地区工农兵”发布《第三号公告——关于揭刘丰之流的阴谋诡计、破坏团结的公告》，“我们都是无辜者、受害者，不能纠缠于历史旧账”。“两派群众团结紧，无产阶级专政最要紧！”“公告”中的这些说法，与“七条”所说“群众之间不要互相攻击，不要纠缠某些问题冲淡批林批孔”，意思是一样的。

赵辛初、王克文之流借揭露刘丰干扰‘两清’运动，搞扩大化的罪行，不是正确解决‘两清’过了一点的问题，而搞一风吹，妄图全盘否定‘两清’运动的伟大成果，实行其为‘五·一六’、‘北、决、扬’翻案的罪恶目的，这是炮打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最大右倾翻案风，必须迎头痛击！坚决捍卫‘两清’运动的伟大成果。”4月20日发表的《武汉工农兵第六号公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将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进行到底》说：造反派大喊“两清方向错了”，赵辛初、王克文表示支持，这是“妄图为反革命阴谋集团‘5·16’、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章迪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省、市委屈于压力，放弃正确的‘省委七条意见’，去迎合一部分人的要求，提出否定‘两清’的‘六条草案’，实质上是说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大方向错了，打开牢房找左派，把在押的五一六、北决扬嫌疑人统统放了出来，这些人受到了凯旋般的欢迎。”^①

大多数造反派肯定“六条”。3月20日“杜则进”发表文章《我们怎么办？——兼评“六条”》说：“省委的‘六条’总的来看，前进了一大步，主流是好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六条’的产生，是广大革命群众对省委不断促进和推动的结果，是赵辛初、姜一、赵修、王克文等革命领导干部，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作耐心细致的工作，坚持原则，坚持斗争，所取得的一个初步成果。”

“杜则进”文章对“六条”也有批判：“站得不高，没有充分面对湖北‘两清一批’恶果严重的基本事实，不敢承认绝大多数都整错了，不敢指明湖北‘两清一批’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六条’应立在事实之上，附列材料，有上述那种全省性的统计一般材料，也有电信局汤玉莲之死那样典型的材料，这样作将使得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明确起来。”“‘六条’只提‘两清’不提‘一批’。采取了回避问题的态度。‘两清’与‘一批’不可分割，湖北的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面更大，包括几乎所有的革命造反派群众。‘一批’是‘两清’的基础，这个账不算不行。”“既承认‘两清’方向路线错了，又讲什么决不能一风吹、‘翻烧饼’，这是什么意思？……搞错了的东西必须一风吹！颠倒了的历史必须翻过来！”“‘六条’不加分析地提发挥革委会的作用，发挥工、青、

^①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31页。

妇作用，实质上维护了‘两清一批’搞的权力再分配。”

“杜则进”文章批评了把“六条”称为“黑六条”的造反派：“有极少数长期受林彪死党迫害较深的同志……他们在对‘六条’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修改意见的同时，也不自觉地用感情代替了政策，把‘六条’的缺点、错误看过了头”。

“六条”公布的第二天，张立国和顾建棠商量，我们支持钢派攻三办，新派也要行动起来。3月22日，新派头头在湖大开会，决定“搞两清黑材料”。后来他们从省市委运出省市“五一六、北决扬专案办公室”的大批材料^①。

文革后武汉官方的党史大事记认为，省委六条是引发武汉地区“党委造反”的直接原因：六条“传达到武汉市县、团级党委，许多基层党委怕再犯‘文革’初期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纷纷发表《造反公告》表示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革命的新生力量’，‘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②

王克文1993年1月回忆：“省委提出了一个适合造反派口味的‘六条’（草稿），我同意并支持了这个草稿。这个草稿未正式下发，便被中央批评制止了。”^③

1974年5月29日王克文谈到中央批评省委用“六条”代替“七条”：“中央表扬七条内容、产生办法、群众代表的态度，中央非常满意。”中央还表扬省委通过“七条”的会议，“你们那次会议那样好，为什么后来又要搞个六条，并且限定中央三天答复”？王克文说：“我们承认错误，不该搞六条的，我们顶不住。”^④

4月1日，赵修、信俊杰、王六生、刘建勋四人按中央要求进京，初步汇报湖北的问题。后杨得志、赵辛初、张玉华、孔庆德、韩宁夫、王克文、张震也到北京，开会五十多天。5月20日，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邓小平等15位中央领导接见湖北领导人。赵修检讨说：“我们不应该把两清扩大化说成是方向路线错误”。中央首

①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60—272页。

②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63页。

③ 吴仲炎主编《丹心照玉宇——王克文纪念文集》第809—810页。

④ 武汉汽车配件厂革命工人翻印《市委王克文等领导同志在区、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5月29日）》（1974年6月12日，油印传单）。

长指出：“‘两清一批’的错误虽然不是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不能说轻了，你们对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主席指示搞过了一点就是说扩大化了嘛。错误还是严重的。‘一点’是个形容词，就是说的扩大化，总不能说过了‘十点’嘛。”“张玉华同志，群众对你的意见不少，你回去作一个好的检讨，对马兆昆的意见也不少，给他带个信，两清扩大化的错误责任不要往下推”^①。

这次接见前，经几位中央领导人反复修改的《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文件已经形成，接见后正式定下来。

从中央首长这次讲话可以看出，湖北领导人在北京就两清一批的性质争论很久，两赵一王的意见亦即“六条”的提法——“省委在两清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被否定。被“六条”删除的“七条”中的条款——“在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应由刘丰负责，干部和专案人员没有责任，群众更没有责任”，在《指示要点》中重新提出。

5月26日，湖北省委、武汉部队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和全省有线广播大会，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1974年5月21日）。《指示要点》主要内容是：对林彪反党刘丰的罪行，是捂还是揭，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刘丰是林彪反党集团在湖北的代理人，那种刘丰“影响不大”或“流毒已经肃清”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为“捂盖子”作辩护的错误言论。曾思玉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是好人犯错误，对曾思玉提出批评意见是完全可以的。湖北省的“两清”工作发生了严重错误，错误的根子在刘丰，省委也有责任，下面的同志是认识问题，执行问题，不能责怪他们；在纠正扩大化错误时，也要防止“一风吹”。在不同观点的群众之间，要提倡“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各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互相攻击；革委会以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代表性不足的今后应当在思想上真正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充分协商，进行补台，不能拆台；“七·二〇”事件不能翻案，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各级党委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整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要立即撤销一切山头，说服离开生产、工作岗位的人员回本单位搞好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①《湖北省委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会议记录稿，1974年5月25日）。

赵辛初、赵修、王克文、王六生、张玉华“在大会上都作了自我批评”^①。张玉华的自我批评是讲自己在两清中所犯严重扩大化错误。

会后，赵修安排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任省落实政策办公室副主任，要求他们按照《指示要点》做群众的工作。

6月4日，省委办公厅发出《湖北省委关于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的几点意见》，就造反派提出并争取了近三个月的“五字方针”，还有批林批孔办公室的问题，正式表明了态度：“补台的问题，还是老、中、青三结合这个原则。要讲代表性不足嘛，还是年青的代表少了一点。不是那个派这个派的代表，也不是这个观点那个观点的代表，而是要思想上的大团结”。“平反、补台、纳新、提干不能混为一谈。平反，错了的当然平，你过去是啥职务就是啥职务。至于提干、纳新要按五条，不能混为一谈。”“批林批孔办公室的问题，成立这个办公室容易引起两种不同观点群众的对立，已经搞了的要说服，做好工作取消，要弄通思想，方针是缓和矛盾，不要使矛盾激化。”

省委“几点意见”实际上否定了造反派提出的“五字方针”的实质——要求省委正确对待文化革命，正确对待文化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造反派，也否定了批林批孔办公室——这个造反派与当权派协商解决各单位两清问题的新型机构。

6月5日，杜则进发表长篇文章《争取更大的胜利——学习中央指示要点》说：“《要点》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湖北、武汉全体军民的最大关心和爱护”。

两派群众都表示拥护《指示要点》，都将它称为“红七条”。

此后街头活动减少，两派逐步撤除街头广播站。

第四节 “党委造反”

1974年3月下旬，武汉地区兴起基层单位“党委造反”风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全国罕见。

文革后武汉官修党史认为，省委六条是引发武汉地区“党委造反”的直接原因。

^① 参见省委办公厅《湖北省委关于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的几点意见》（1974年6月4日）。

最先“造反”的基层党委是一冶党委。

王绍光在《超凡领袖的挫败》一书中，将一冶党委在全市率先“造反”继而引起风潮的原因归结为省委书记赵修的“强迫”：

3月末，他在第一冶金公司发表了一个强烈支持造反派的讲话。这个讲话强迫公司党委做出特别的姿态来证明其对造反派的支持：公司宣布它要成为一个“造反党委”。没人知道“造反党委”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其他单位困惑而焦虑的领导干部则把这件事看成一个不祥之兆。他们对1966年发生的事仍然记忆犹新。如果他们不表现出支持造反派的姿态，就可能在第二次文革当中再次被打倒。他们认为，要想平安度过危机，除了仿效第一冶金公司之外别无他法。因此，4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几百个单位的党委纷纷发表“造反宣言”。因为这些事不过是象征性的表态，所以那些政府组织都极力扩大其影响。接连几天，武汉的主要街道挤满了他们的游行卡车。生产和交通陷入瘫痪状态^①。

一冶党委发表《造反公告》，一冶造反派头头曹承义认为这件事所以出现，有“赵修的支持”，有一冶造反派的促动，更主要的原因是一冶党委主动的理性的考虑：

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运动中，三位一冶造反派头头——我和一冶革委会副主任王雨波、工会副主任李诗波同心协力，在一冶掀起新的运动高潮。党委书记徐扬见运动来临，就住进了医院。文革中的当权派很多人都是以这种方式逃避运动。由我们带头做林维、董书立、胡德安等一冶主要党委成员的工作，他们在省委书记赵修的支持下，陪着我们三人，参加一冶及各基层单位党委组织的批林批孔报告会，由我在各级会议上进行批林批孔的发动工作。我和王雨波、李诗波晚上还经常到红钢城百货大楼前街头的广场进行公开演讲，武钢和青山地区的干部、工人群众都自发前来听演讲报告，点燃了整个青山地区批林批孔运动的烈火。

一冶党委还让我们参加一冶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我们用毛主席文革以来一贯的教导，启发一冶两级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路线斗争觉悟：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造反；地方出了修正主义，基层党委造反；基层党组织出了修正主义，党员、群众造反。在省委赵修书记的影响下，一冶党委走上街头造反游行。几十辆高举“一冶党委造反”大旗

^①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第21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的汽车冲向武汉三镇街头、冲向省委，向省委发出了造反信，创造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新气象。连续几天，带动武汉三镇许多单位的党委先后上了街，纷纷表态，否定前几年打击、压制革命造反派的错误路线，支持造反派提出的河南经验：“放、平、补、提、纳”。

一治党委成员为什么要走向街头造反呢？他们当时是这样想的：一是省委主要领导的思想已经在转变，形势是大势所趋，不会犯很大的错误。二是想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争取主动，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要求解决的问题，都是在文革运动搞“三支两军”的军代表当政时期干的，与刚恢复成立的党委无关；再说这次运动造反派的矛头也不是对着党委来的，如果坚持与之对立，这把火就会烧到自己身上。三是批林批孔运动与1967年的“一月夺权”不同，造反派头头无非是想要“放、平、补、提、纳”，而这一切的主导权还在党委领导下，并不是要把党委推倒重来^①。

举着“××党委造反了”之类的横幅和旗帜，组织车队上街游行造声势，到省委递交“造反信”，成为武汉地区各单位党委宣布“造反”的通行模式。这一模式的开创者也是一治党委。

继一治党委之后，武汉地区有影响的武钢、武重、武锅、长航等大单位的党委都宣布“造反”。吴焱金记得的宣布“党委造反”的单位还有市燃化局、市建工局、市财政局和市二医院。向省市委递交的“造反信”的重点，一般都是要求省委、军区迅速彻底纠正两清错误，正确对待造反派。

彭绍鹏认为各级党委“造反”有一个内在原因：1968年至1973年全省上下军代表当政，他们压制造反派群众，也压制地方干部，批林批孔给了这些干部一个出气的机会。彭绍鹏回忆：“武钢党委书记李振江在武钢工人剧院召开了批林批孔大会，对以康星火为首的一些军代表提出很强烈的批评。因为他们好几年来，在康星火等人的控制下，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个人方面，同样受到很大的压抑，憋了不少的气，使他们对造反派的遭遇感同身受，在对待造反派的感情上有了很大的转变。”^②

武钢机械总厂党委3月29日对省委、武钢党委发出《造反公告》，语气与造反派的大字报相似：

我们武钢机械总厂党委严正声明：我们再决不当你们推行修正主义路

①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39—140页。

② 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第72—73页。

线的驯服工具，再决不当散布你们黑指示的传话筒，我们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决站在批林批孔第一线，对你们所犯的严重错误，坚决揭发，彻底批判，对于你们的复辟行为，我们就是要造反，大反特反，一反到底！为此，我们强烈要求：

一、湖北省委、武钢党委必须立即召开省委、公司党委扩大会议，深刻检查、彻底交待在“两清一批”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坚决炸开湖北、武钢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闷盖子！

二、坚决揪出林彪在湖北、武汉的死党刘丰及其同伙曾思玉、方铭、张昭剑，深入批判他们的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

三、军区“三办”是残酷镇压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搞反攻倒算的黑指挥部和黑参谋部，我们坚决支持革命群众进驻“三办”、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并勒令“三办”妥善保存镇压革命群众的黑材料，不准私自处理，不准转移，更不允许烧毁，否则后果自负！

四、彻底揭开方铭在我厂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的黑幕！

五、强烈要求湖北省将刘丰的黑干将方铭、阎超山、马兆昆、刘志交给武钢机械总厂广大革命群众揭发批判！

六、省委必须加速落实政策，对受林彪反革命路线迫害的胡厚民、李想玉等同志公开平反，行文全省恢复名誉。大胆启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中涌现的新生力量，并吸收他们参加对运动的领导。江涛、王敏青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武钢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对任爱生、杨道远同志的问题，必须迅速作出答复！

七、目前，湖北、武钢刮起的右倾翻案、经济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妖风，严重地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给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这正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变换手法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强烈要求省委、公司党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扭转这种局面。

造反派对本单位党委“造反”都持欢迎态度，但对一窝蜂似的拥上社会，或迷惑或警惕或反感，有的甚至表示反对。

张建成回忆：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以张蒹承副书记、侯发亮常委为首，也组织一些人，乘大卡车到党、政、军首脑机关去造反”，张建成对此“是坚决反对的”。水院造反派当时的口号是“立足基层，关心社会”。

1976年10月以后清算文革，“那些所谓的主流派到军区、省委造反的行为，却什么事都没有”。“在整我时，说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制定了‘立足基层，关心社会’等反革命策略，说我是反革命两面派！”^①

王光照回忆：“这些大单位不惜工本，大量印发“造反公告”，唯恐知道的人不多，还组织几十辆、上百辆汽车上街游行。时间集中，步伐统一，口径一致，开创了有党以来下级向上级造反的先例。荒唐事？新事物？福耶？祸耶？连造反派也感到茫然，搞不懂，更不必说不同观点的群众了。我始终觉得蹊跷，又找不到这事发生的来龙去脉，成了一个谜。”^②

“反潮流派”的王华珍4月7日对王克文说：“现在很多党委飞车跑步亮相，宣传车几十辆、上百辆的汽车在大街上成天游转，以这种方式表示他们造反了，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省委要制止。”^③

“工农兵”反对“党委造反”，因为这些造反的党委无一不表示要正确对待造反派，要纠正两清一批中的错误。他们认为：“‘党委造反’是绝对错误的，党应该站在运动的前列，领导批林批孔，不能放弃原则，支一派、压一派，继续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章迪杰这样评论“党委造反”：“一时间，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大有倒转乾坤之势。”^④汪扬说：“党委造反的把戏，我们早已识破，造反是假，保自己是真”^⑤。

王克文5月29日在武汉市的区、局书记会上的讲话，可以看作省市市委对“党委造反”的态度。他说：“对党委造反问题，不要表态，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大家非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欢迎批评。”^⑥

文革后，武汉地区的“党委造反”被主流舆论说成史无前例的闹剧，其实当时在大多数群众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毛泽东1965年10月以来多次说过的“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为人们熟知，基层党委对“两清中犯错误”的曾刘、省委造反，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指示。造反派当时的疑惑、反感，不是针对下级造上级的反这种方式。文革已经八年，造反派从自己的切身遭遇中体会到，对当权派的所有作为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① 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79—280页。

②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96页。

③ “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1974年4月7日，武重批林批孔办公室翻印）。

④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34页，

⑤ 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62页。

⑥ 武汉汽车配件厂革命工人翻印《市委王克文等领导同志在区、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74年5月29日）》（1974年6月12日，油印传单）。

第五节 “攻三办，促省委”^①

1974年3月初，造反派内的所谓“主流派”——“三厂一局”（武重、武船、武锅和市电信局）的原工总成员发起了“攻三办，促省委”行动。

由武锅的王光照、孟运通、杨逢春、王庆庭等人发起，邀请了武重的刘传福、纪星民、陈长庚，武船的李承弘、贾传亨、彭万年，电信局的方景清、刘闯等，二十余人商量如何揭开湖北两清一批“这个沉重的大盖子”。

大家认为，批林批孔运动联系湖北的实际，首先应该深入、彻底地揭发批判刘丰利用两清一批否定文化革命、镇压造反派的罪行，具体、细致地纠正两清中的冤假错案，“平反、道歉、做结论”。“突破口就是曾、刘麾下大整革命造反派的御用工具——两清办公室也就是军区三办。”

会前朱鸿霞得知此事，训斥他们说：“又在标新立异、瞎胡闹，惹出什么纰漏后果自负。”参会者表示：“我们知道朱的处境，从爱护他的角度出发，哪会请他点头呢。群众运动，我们这些无官一身轻的群众自主地运动起来，天塌下来我们自己扛。”

次日下午，三厂一局的人马在武锅厂前广场集合，来到军区门前静坐，要求军区首长接见，要求三办负责人出来讲清问题。不多时，消息传出，军区门前人山人海。等待时，王光照等不断以“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名义写出简报，送到武锅印成传单向全市散发。在“攻三办，促省委”过程中，代表团随时以简报的方式将新动态向社会传播。

第二天上午，冒着风雨、忍着饥寒等待一夜的工人冲开哨兵把守的大门进入军区大院，找到副参谋长郑志士。郑答应向首长汇报，安排时间接见。

3月27日下午，军区副司令员吴瑞山、郑志士等会见了“攻曾刘办代表团”。工人们要求弄清与三办有关联的五个问题：为什么“暂不传达”中央1970年20号文件？社会上为七二〇事件翻案的根子何在？刘志在红旗饭店的讲话是谁指使？1972年5月马兆昆还在全省政工会上说要“有组织、有步骤”地继续搞两清，是不是对抗毛主席指示？北决扬问题，“究竟是谁搞了假情况欺骗中央”？工人们“强烈要求军区党委同意把原‘曾刘办’的主要负责人马兆昆、刘志等人和我们^①一起座谈，弄清一些极端重

^①本节的撰写，参考了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五十九、攻‘三办’，促省委”，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十八、1974年促省委、攻三办”，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91节省市委同意查两清材料”。

德裕一起走了。”

王光照回忆：工人们在三招等了几天，省委不再理睬，军区主要领导人却接见了我们。杨得志表示：林彪路线对支左工作的影响，刘丰的罪行，“请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地、无保留地提出来，我们不护短，是部队的问题，该检查的一定检查，该改正的一定改正。”王光照揭发刘丰扣押中央1970年20号文件，批示“暂不传达”，“杨得志严厉地转身问旁边的副政委张玉华：怎么一回事？有没有这回事！”“张玉华终于嗫嚅着承认有其事”。“杨指着张狠狠地训了起来：竟然有这样的事，太胆大妄为了。……你在这个问题上，结合地方上同志们提的问题，要好好检查，绝不能含糊敷衍。张玉华在杨司令的震怒下，颜面尽失。马兆昆、刘志、徐健等人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往日打压造反派的那种淫威消失得无影无踪。”工人们针对三办提出一系列问题：如“九二七指示是怎么出来的”，1972年“刘志在汉口红旗饭店动力培训班上明确地说我们这些人是武汉的祸根，积累了丰富的反革命经验”，1972年首义路学习班“把我们这些八杆子够不上的群众代表当林彪死党来整”。马兆昆、刘志、徐健等一一回答，揭出很多“骇人听闻的内情”。杨得志、王六生最后说：“大家反映的情况很重要，部队里有些人当然也受到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死党刘丰的干扰破坏也是严重的。我们会严肃认真地对待，欢迎大家本着爱护子弟兵的立场，热情地提出批评和帮助”。“以后有些情况我们会主动地找同志们做进一步的了解，一起努力，联系实际，深入地把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下去。”

李承弘说：军区群工部魏部长通知攻三办代表团这一天去军区，是去参加军区决定给原三办主要成员办的三天学习班。学习班在武汉军区炮兵司令部大院举行，还有新派的龙梅生等人参加。

李承弘回忆：这一天“上午主要是群众代表发言，控诉三办镇压造反派罪行，以李向阳、龙梅生发言较为突出。三办的人在造反派发言中也当场回答对他们的责问。”刘志再次承认1972年在骨干培训班上的那一段讲话，“刘志话一出口，我头皮一炸，张体学真说谎了，而且说得那么自然，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张体学在首义路学习班上“对刘志讲话一口否认，说根本不会说那种话，张体学为了证明他说的不错，大谈文革中与造反派的友好经历。当时我是相信张体学的，认为他这样的党内高级干部、

我省两清问题，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曾思玉、刘丰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表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还受害者一个公道，还造反派一个清白”。王光照回忆：“省委还是派李德裕出来敷衍、搪塞”，“劝我们再回三招等待，大伙拒绝了他的建议，齐声大喊：上北京，告御状！”“我们按计划，集合人员从洪山礼堂广场出发，徒步开始了北上告状的征程。”“告御状”这个词是从李庆霖1972年给毛泽东的信里学来的。

下午五点二百多人到达黄陂县城关，县委书记按照省委要求拦下这支队伍并安排食宿。当夜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赶来请工人们回去，朱鸿霞说：“行，真的行，甘拜下风，回去吧。省委的确被触动了，从来没这么爽快，今天紧急地主动地四处把我们找到省委，决定接受大家的意见，要揭盖子了。”胡厚民说：“你们这一军将得好，辛初同志赶忙找我们商量，省委决定揭盖子，真刀真枪地把湖北的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是省委派我们来接大家回去。”这支队伍随即回到三招。

王光照回忆：

促省委的队伍自行解散后，我在三招同承弘、姚光盛、杨逢春、王庆庭等人留下一段时间。我个人把“攻三办、促省委”以及首义路座谈会期间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汇集一起，写了两篇比较长的大字报，一篇是《放心与满意》，一篇是《爱人还是害人》，矛头直指曾思玉、刘丰、张玉华，用武汉造反派邵正茂（少正卯的谐音）写作小组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由写作组成员、武汉制药厂工总成员丁远芳和徐大胜安排人力，工整地抄成大字报，张贴在文革中武汉最著名的水塔大字报墙上，一时引起轰动。

没料到在水塔贴出的两张大字报刺痛了张玉华，连同在杨得志面前对他的揭发，造成极大的后患。在1976年十月事变后“揭、批、查”的日子里，张玉华到武锅，气势汹汹地点名要把我“丢进去”（关进监狱）。

“攻三办、促省委”代表团解散后，李承弘等一部分人认为曾刘是死老虎，而张玉华是在省委任职的活老虎，“以他为首不承认两清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补台、入党纳新他更是拦路虎，张玉华等不下台或退出地方，其后患无穷。”李承弘回忆：“为此我在‘邵正茂’提供的一些材料的基础上，重组了一个材料组，转战在武大图书馆、印刷厂等单位。为了动员全市力量，我在市房地产局作了一个动员报告，提出了一整套攻打张玉华的方案，得到与会者响应，武汉街头巷尾也出现了批斗张玉华的大

标语。”

“攻三办、促省委”行动是由钢派成员进行的，新派头头闻讯也行动起来。

顾建棠回忆：

3月17日或18日，我见到张立国，问他知不知道“三厂一局”攻三办的事，他说：听说了，我们也要搞。我说：钢派“三厂一局”攻三办，方向对头，我们要支持。张立国说：那当然。

3月22日，张立国在湖北大学31号楼召集新派头头开会，到会的有张立国、吴焱金、顾建棠、张维荣、严常、林子忠、于昌禄（市机关红司成员）、傅廉、曹承义、彭勋、薛存元（新武重联司头头）等。会议主要内容，一是商讨对“三厂一局”攻三办的态度，二是商讨我们如何搞两清黑材料。大家议论，都认为对攻三办要肯定，要支持，要和他们并肩战斗。钢派行动得快，要向他们学习。

关于我们怎么行动，市档案馆于昌禄说：市委有一批两清一批的材料，是十五军留下来的，放在市委机要室代管，可能还没转走，这事是确实的。多数人认为可以搞。最后张立国拍板：就搞这批材料，明天就去。并决定由林子忠当总指挥，彭勋当顾问，严常当秘书，薛存元任副总指挥。

3月23日，林子忠带着武船、武重的工人来到市委向市委副秘书长赵铁夫说明来意，赵铁夫请示后传达市委常委意见：封查两清一批材料是革命行动，同意查封。林子忠等随即进入机要室，将方铭等撤走时留下的两清一批材料贴上封条。下午王克文接见，“在与大家谈话中，王克文主要批评了军队在支左中所出现的问题，曾、刘在湖北打击地方干部的行为，并说刘丰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解放军。他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听毛主席的话，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林子忠、彭勋要求查看这批材料，王克文同意办好交接手续后运出查看。3月24日，双方共同清理出两清一批材料两千多份共三万多页。林子忠给机要处长写借条后运到长办南京路招待所，组织人力查看抄录。

4月4日凌晨一点，市委秘书长栗栖向林子忠传达周恩来电话指示：把抢走和运走的档案材料立即送回。林子忠等“很不理解”，经商讨，同意了王克文的决定：“先把原件全部送回，手抄件下一步再讲。”上午九点交接完成，机要处长开具收条，机要处工作人员清点时说：真没想到，

两千多份、三万多页，没少一页。

从市委运出的两清材料还在清理抄录中，3月31日，余明生（原交通联司二号头头）、黄金善（市工业安装公司原红工头头）、罗世栋（原政法尖兵头头）、李苏民等，从省委五号楼运出了一批无人看管的两清材料。

余明生回忆：此前“省委书记姜一、赵修等领导答应我们，将武汉军区三办转来的两清办公室的‘两清’运动中整干部、整群众的专案材料给我们作大批判用，并同意群众组织派代表（要求是党、团员）参加整理。我们等了好几天了，未见领导来找我们，打电话秘书挡了驾。我们到存放材料的省委五号楼观察，发现原先的岗哨没有了。为此，30日晚上我们在交通厅楼上开会，商讨要不要我们自己去搞出来。当时有支持的也有不同意的，会上听了顾建棠和林子忠的意见，基本同意不去搞。”据顾建棠回忆，他和林子忠的意见是应该像到市委要材料一样，争取领导支持，不要自己去冲省委机要处。

余明生回忆：

31日上午9点左右，我和黄金善、罗世栋、李苏民等先去省委五号楼，一瞧，里面没有人，门也没有锁，有几个办公室都放着箱子、麻袋等，还有些材料散放在地上，也有红头文件。我告诉大家不要动，等我打电话给省委领导后再说。

于是我先后打电话给姜一书记、赵修书记和组织部长薛坦，都是秘书接的。我在电话里讲：关于两清材料问题，请领导来五号楼商量。但没有回音。我最后电话里讲：如果再不来，我们就把材料运走了。

同时又打电话给新华社武汉分社，请他们报告周总理：关于两清材料问题，我多次打电话给省委领导，他们不理，材料我们运走了。

随即我要黄金善、李苏民通知车辆来五号楼，将材料装车。当时没有人干涉、阻拦，顺利离开五号楼。车开出后，往武钢方向开，再经汉沙公路到仙桃停下。我通知大家休息，找黄金善等商量后，让黄去仙桃船厂把厂长张国平（交通联司船厂一号头头）、党委书记陈光清找来了。在公路上商定，派鄂25号船转运材料。当时在仙桃将材料装上船开往武汉，汽车上的人员全回汉口，等候通知。

4月1日，我告诉傅廉关于材料的情况，并要他去找省委领导商量：材料仍运回省委，找个地方由我们派代表参加整理。

后来傅廉告诉我姜一等领导的意见：

第一、省委没有地方，就在船上整理。

第二、省委派省检察长房肇义同志（省两清办副主任）负责，并带两清办的两个人员一齐上船。你们也派代表（党团员）参加。

第三、船上工作人员生活补助按省委会议标准。

后来我到船上开了个小会，按省委意见，房肇义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杨玉珍为副组长，余明生负责生活。

5日凌晨傅廉对我说，中央电话指示：抢走、运走的两清专案材料一律全部运还省委，不得复制、转移、销毁。当即我们传达指示，落实行动，把全部材料运还省委了。

但李苏明说他经房肇义检察长同意，留下了张体学、朱鸿霞等人的部分材料。我和李苏明将这部分材料送往北京，交中央未果，后来交给了武汉军区在京开会的信俊杰。

这两批材料在造反派手里分别留置十天、四天，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两清材料流传出来，如曾思玉批示“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的“18名特别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名单”，“把原来各群众组织的一些头头几乎全部框进去”的“武汉地区5·16阴谋集团联络图”。杜则进的多篇大字报披露了部分材料，引起很大震动。顾建棠的回忆录“第92节 湖北两清冤案部分材料”，用近四千字的篇幅，摘要介绍了这两批两清材料的部分内容。

4月8日（或9日），朱鸿霞、张立国、顾建棠、沈复礼乘火车上京，打算将复制的两清材料送中央。到北京后见到赵修，朱鸿霞等应赵修的要求将材料交给了他。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从省市委运出两清材料，事前都得到省市委领导人同意，省委还派人共同清理。八十年代当局将参与其事的多人以“抢档案”的罪名判刑。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下达，造反派彻底否认两清的目的没有达到。中央从8月开始强调“安定团结”，尽管一再号召“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群众性的运动还是逐渐趋于平缓。

武汉地区投身于批林批孔运动的人，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比起1966至1967年都要少得多。“攻三办、促省委”历时十几天，号称工总“四大金刚”的三厂一局所能聚集的人马，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二百余人。

王光照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了当时他和一般群众的心态：“那年月，很多人都在私底下议论，一场抗日战争也只打了八年，那可是同外来侵略者打仗。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内的两个司令部也打了八年，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这种社会思潮，在我思想上产生了影响。……我现在历经八年文革风雨坎坷，身体有病，也期盼过平静安定的生活。……再说了，时过境迁，群众也厌烦了，再集合队伍也没多少人。这种社会动态，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再大的能耐，又能有多少凝聚力呢？毛主席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正是顺应人们普遍祈望安定的愿望”。“我那时认为，这是毛主席的一个新战略决策，作为追随他的一个文革老兵，毫无疑问，应该自觉地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坚决贯彻这个新的战略部署。我回到厂里设备科电气技术组，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翻资料，查图纸，跑车间，修设备，按部就班，一如往常。党中央要求回本单位搞好批林批孔，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了中央的要求，同时等着厂党委按中央要求坚决纠正错误，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王光照每天上班，下班后喂鸡养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没能等来厂党委对他落实政策，等来的是新的工作队把他“当成不安定因素”找他谈话，“党委宣传部的那帮老对手”“放出风来：王光照就是我厂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王光照“终于被激怒了”，贴出大字报，“用确凿的真人真事揭露和鞭挞了（军代表、军宣队的）这些资产阶级作风，质疑工厂当局和那些专门整人的走卒：刘丰这个林彪集团的死党，追随那条反革命的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干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勾当，完全堕落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你们不揭不批，你们的大方向在哪里？你们不抓大事，不抓路线，一个劲地在群众中播弄是非，又是安的什么心？”王光照说，自己“自动跳出来，他们正张网以待”，1975年3月，工厂领导在大会上指责他“有组织、有计划地干扰厂里安定团结的形势，纠缠历史旧账”，王光照成为全厂“批派性”的“主要目标”。同年6月被调到十堰二汽^①。

李承弘回忆：“1974年下半年，我们还想继续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下去，我在武大整理张玉华的材料，在下面发动群众，邵正茂仍在水塔贴整墙的大字报，但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毛泽东、中央政策又有新变化，杨得志

^①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402—413页。

等上京回汉后就开始降温了，省里答应补台纳新的事上下相当统一，就是拖着不办不理。”

与批林批孔同时开始的批“走后门”，一个月后就被制止了。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号召“批林批孔”的一号文件。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南京大学政治系二年级工农兵学员钟志民写于1973年9月28日的“退学申请报告”。钟志民原为部队战士，是他的父亲、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打招呼帮他上大学的。钟志民当兵也是“走后门”进去的，退学后他直接回到原插队的农村当知青。

此后全国各地“走后门”当兵，上大学、中专的很多干部子弟纷纷申请退伍、退学。湖北日报2月6日、7日报道：2月1日，武汉医学院医疗系二年级学生、湖北军区副司令员杜恒荣之子杜卫华递交“退学申请报告”。此前，湖北省军区领导已决定将“走后门”入学的学员全部退回部队。

2月15日，毛泽东批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①

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这个文件下达前，不少“走后门”参军、上学的干部子女主动退出了部队和学校。这个文件让他们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

李承弘说：“原本广大群众对干部开后门搞特权深恶痛绝，在全国已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这一大盆冷水不知浇凉了多少人的心”。“既然开后门没事，干部更放肆了”^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20页。

^②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75页。

第六节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写作组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造反派的大字报呈现新的特点。

这一时期出现“杜则进”、“邵正茂”、“杜则强”等多个写作小组。当时群众组织早就撤销，各级工代会在工会恢复后自行消亡，造反派的大字报于是采取了这样的署名方式。这些写作组主要以水塔大字报墙为大字报张贴之处，形成了1974年到1976年间三镇闻名的大字报“水塔版”。

汉口中山大道上的水塔地处闹市，大门两边各有长数十米的围墙，是贴大字报的好地方，文革期间一直是武汉地区的舆论中心。大门东边的一面墙稍大，贴满需二百多张全开纸。1973年底，“杜则进”开始在水塔下发表长篇大字报，称为“水塔版”，动辄贴满一面墙甚至两面墙。随之“邵正茂”、“杜则强”等造反派的写作组也在这里出版“水塔版”。1974年6月，“工农兵”也来这里“争夺宣传阵地”，出过几期“水塔版”。他们往往不顾在先贴出者所声明的“保留期限”，径直将自己的大字报覆盖上去，或者深夜在造反派的“水塔版”上用大号排笔蘸墨汁刷上大标语。武齐骅等组织“革造民兵”，就是为了“保卫大字报”。当时造反派的写作组众多，“水塔版”出得勤，被覆盖马上就有新的贴上。

“杜则进”写作组成立于1973年底，吴焱金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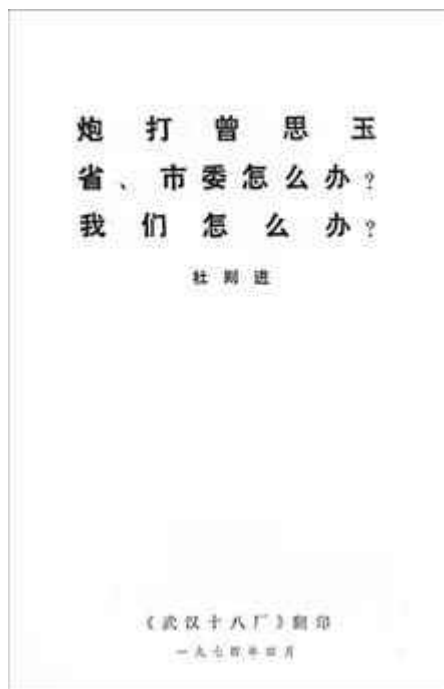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在“批”字上做足了文章。首先是工造总司



汉口水塔下东边的大字报墙

政参部长龙梅生提出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认真批林批孔。龙梅生这个人有头脑,文章写得好。1967年初参加《湖北日报》夺权时,钢工总李向阳是新生《湖北日报》社长,龙梅生是新生《湖北日报》总编辑。我立即采纳他的建议,由他组织人去具体实施,我和他共同给写作班子起了一个笔名:“杜则进”。湖北方言“杜”和“斗”同音,“杜则进”就是“斗则进”的谐音,因为当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由龙梅生负责,组织马车(原名郑需龙,湖北省地质局干部,原工造总司办报人员)、杨业龙(武汉橡胶厂工人,原工造总司宣传部工作人员)、唐济源(江岸区建筑公司技术员,该公司工总一号头头)等二十多人夜以继日地写批判文章,每隔一周就在汉口水塔民主墙出一个整版。……“杜则进”的系列文章相当轰动。执笔人主要是龙梅生、郑需龙、杨业龙,当时的说法,办“杜则进”的是工造总司三条龙。钢工总的唐济源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提供纸笔、墨水、浆糊,组织大量人员抄写、张贴,工作量很大,十分辛苦^①。

“杜则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表近二十篇文章,影响比较大的“水塔版”大字报有:《炮打曾思玉》(1973年9月初稿,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62—163页。

1974年2月27日修正稿），《省、市委怎么办？》（1974年3月13—14日凌晨），《我们怎么办？——兼评“六条”》（1974年3月20日），《极右不批 是非不明——兼展望湖北问题的前景》（1974年4月23日—25日），《刘丰罪行录（之一）》（1974年4月），《争取更大的胜利——学习中央指示要点》（1974年5月28日至6月3日初稿，6月5日至10日修正稿）。

“邵正茂”写作组成立于1974年2月初，是武汉制药厂的造反派为投入批林批孔运动自发成立的，厂内钢新两派都有人参加。

这个写作组几个成员2016年回忆：“取名‘邵正茂’除与‘少正卯’谐音外，还寓意我们这些从1966年起，二十上下的热血青年到1974年都已30岁左右了，仍青春未老，虽历经磨难，忠于毛主席革命理想的青春之火仍在燃烧，风华正茂，故名‘邵（美好之意）正茂’。”“邵正茂”水塔版第一期《孔孟语录今译》发表于1974年2月中旬，“引起轰动”。孔孟语录“译得通俗易懂，文笔流畅，符合各类关注批林批孔运动的普通干部群众的需要”，“大字报书写工整，版面排列清新悦目，邵正茂三个魏碑大字，雄浑奇峻，引人注目”。

1974年6月，省委办公厅秘书李德裕对武药造反派头头丁元芳说：“赵修、王克文书记认为你们硚口古田（造反派）掌握大方向较好，现在社会上标语、大字报贴得乱七八糟，书记们的意见想要你们硚口古田把水塔这块舆论阵地占下来，把大字报集中批林揭刘，搞正规些、整齐些，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丁表示赞同，此后，省汽修、国棉三厂、武汉卷烟厂、武汉机床厂等工厂的造反派也参加进来，“邵正茂”的撰稿、编辑工作仍以武药人员为主。“邵正茂”刊出的文章，百分之八十来自厂外，武汉制药厂的“邵正茂”写作组就这样成为全市造反派的“邵正茂”写作组。

“‘邵正茂’写作组自1974年2月上、中旬开始出刊，大约出了二十多期，一直到1974年10月中旬暂时停刊。”

“邵正茂”影响比较大的“水塔版”大字报有：《孔孟语录今译》，《曾、刘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①，特约评论员（王光照）的《放心与满意》和《爱人还是害人》^①。

“反潮流派”有一个“劲松”写作组，其成员有唐恒山、杨尚玖、夏桂兰、

^①原“邵正茂”写作组成员《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网文，2016年）。

王洁平等。他们的“水塔版”，从1974年6月开始，延续到1976年4月。

造反派个人也有写长篇大字报的，如武钢工人陈祖坤。他回忆：

1974年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大字报，题目是“孔子杀少正卯，林彪杀造反派”，贴在红钢城，很有反响。2月26日武钢党委在工人剧院召开副科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党委书记李振江主持，请我作报告。我讲了两个小时，就是大字报的内容。剧院座无虚席，掌声不断。会后《武钢工人报》记者要走了我的讲稿。28日《武钢工人报》第三版以“孔子杀少正卯，林彪镇压革命群众”的通栏标题刊登了我的文章^①。

批林批孔期间造反派大字报的另一个特点是比较理性，这与造反派当时的行为方式相关。

尽管造反派在两清中受打击的程度远远超出“五十天”，不亚于陈再道主政时期，但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当权派、保守派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的现象基本没有出现；与另一派“工农兵”基本没有武斗，甚至“文斗”也不以他们为对手。王光照回忆：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不久，对于百万雄师成员为七二〇事件翻案、保卫两清成果等举动，夏邦银、朱鸿霞和他有过交谈，他们共同认为：“估计背后有人出馊主意，趁机节外生枝，妨碍省委落实政策，拖后腿，不让‘又搞过了一点’的问题顺利解决。朝严重的方面想，是要制造事端，挑起冲突，造成混乱。用这种‘围魏救赵’伎俩，阻碍对刘丰的揭批，完全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干扰批林批孔运动深入进行。要给下面的同志做工作，不要吃这个亏、上这个当，不要同‘老百’们发生纠缠和冲突，这案不是他们翻得了的，让他们去空喊。”^②

造反派的这种理性反映在大字报上，不再把所有的当权派都当成走资派来批判，对其认为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敢于支持，对其所批判的领导干部，不再扣一堆空洞无物的大帽子，不再热衷于披露其生活作风等隐私，而是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讲道理。“水塔版”大字报动辄万言、数万言，造反派写作组连篇累牍地写，也有不少群众耐心地看，反映了人民运用“四大”权利的方式也在不断演变。

写作组、水塔版、长篇大字报，这些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造反派的大字报的新特点，一直延续到1976年10月。

^① 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63页。

^②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52页。

第七节 沿袭“百万雄师”而来的“工农兵”^①

1974年初，造反派加大力度，要求省委揭开刘丰镇压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盖子。原百万雄师成员聚集起来，按章迪杰的说法，是“易名为‘工农兵’”，“重上战场”。

文革期间在枣阳当教师的王仁昌说，他在武汉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造反派一闹，保守派就闹。造反派被当权派镇压下去，他们当即收兵回营。仿佛当权派的别动队，十分默契。”^②

与“百万雄师”一样，这个“工农兵”有没有总部、总部由哪些人组成，都不为社会所知。他们一般以“武汉工农兵”、“××区工农兵”的名义活动。文革后汪扬说，全市“工农兵”有“常务负责人”，他举出了汪扬（原百万雄师硚口分站宣传部副部长）、沈浩然（原百万雄师江汉分站一号头头）、夏少卿（原纺织系统百万雄师头头）、吴时元（原百万雄师汉阳分



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江岸区“工农兵”成立大会在武汉皮联厂举行，俞文斌（右一）、章迪杰（右二）出席（载章迪杰《峥嵘岁月》）

^① 本节的撰写，参考了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二十八、批林批孔”“二十九、上京告状”，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武汉冷冻机厂批林批孔批判组整理《武汉工农兵上京汇报材料》（1974年4月4日）。

^② 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站头头)、刘长安(原百万雄师硚口分站骨干)。原百万雄师总站头头都不在常务负责人之列,各区、局“工农兵”成立时,他们都会出现在成立大会的主席台上,重要行动如到北京送材料,他们也会参加,亲自带队。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的时候,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有过联合起来投入运动的想法。主要原因是两派虽然立场不同,但都对主政湖北多年的曾、刘及各级军代表怀有各自的愤恨和不满。

武汉地区工农兵3月14日发表《第三号公告》,明确表示要与造反派联合。“公告”说:“我们两派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上了他们的当,受了他们的骗,挨了林彪、刘丰的整。现在决不能再上赵辛初、王克文的当。”刘丰借七二〇事件上台后,“残酷镇压我工农兵群众”,“借清‘五一六’‘北决扬’又把矛头指向另一派群众”。“我们都是无辜者、受害者,不能纠缠于历史旧账”。“我们提出战斗口号:革命群众要革命,工农兵要革命,大家一起闹革命!”

吴焱金回忆:胡厚民1974年3月2日解除四年监禁后,就提出联合“工农兵”一起批林批孔,遭到几乎所有造反派头头的反对。但在一些单位,还是出现了两派群众联合投入运动的事例。

李承弘回忆:武船铸钢分厂(原武昌铸钢厂)有一位徐师傅,“他是总厂百万雄师头头,跳得很高,七二〇后被总厂工总武装部的头头打伤,腰部终年被不锈钢护架托着。……1974年我与他交过心,准备联合起来批林批孔,还一起开过座谈会。1976年批邓,双方也有过合作愿望。”^①

王光照回忆:1973年底,武锅原百万雄师成员熊汉卿、夏汉清等主动找王光照交谈,“要求我再次站出来,同他们一起联系厂里的实际,积极认真地进行批林整风,把在我厂蹲点的林彪死党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扭转我厂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按兵不动的局面。他们像劝寡妇嫁人似的说:你受刘丰迫害最深,不站出来揭批,无论怎么说不过去,别说造反派瞧你不起,连我们都为你报账不出。”王光照也主动去找厂百万雄师一号头头王道义交换意见。王光照和他们一起用“一伙人”名义,写大字报、大标语。熊汉卿等人投入运动,是不满武锅以宣传部为主的一些机关干部以正统左派自居,“在刘丰蹲点期间,卖力地吹喇叭、抬轿子,紧跟军宣队、军代表的屁股后面打转,鞍前马后,讨好卖乖,终于弄到一

^①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380—381页。

把把椅子坐上了。老熊他们出生入死只落得一身伤。”另一个原因是，来自刘丰原任副司令的武汉空军的军宣队在工厂损害工人利益，搞特权，饥不择食，比老当权派更厉害。王光照说：“厂内一些造反派的人见我公然跟老保们搅在一起，深怕我吃亏上当，……我却认为，既然有共识，为何不能结成统一战线？人多力气大，众人拾柴火焰高。面对重重阻力，两派联手，不是更有战斗力吗？”“一场群众性的批林彪、揭刘丰罪行的斗争，在‘一伙人’的推动下，终于在厂内开展起来了，毋庸置疑，也汇入了全市造反派的反潮流斗争。”^①

章迪杰回忆：“不少单位的造反派还主动找对立派的头头开团结座谈会，我就接到了本系统——武汉市硚口区房地产公司造反派的邀请，参加了座谈会。然而他们的这种团结是有条件的，必须承认原有的‘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成员，这是一种招安式的团结，当然不能接受。我以对原有‘革委会’情况不了解为由，当即退出会场。”^②

造反派绝大部分头头和群众没有忘记保守派在七二〇事件前后和两清一批中的作为，不能接受与保守派联合。

“杜则强”写作小组1974年11月发表长篇文章《分歧在哪里？》，其中“‘百万雄师’可以大联合吗？”一节，代表了大多数造反派的看法。文章引用毛泽东关于大联合的一个指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然后指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只有“革命的群众组织”，才有参加大联合的资格；而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这是毛主席给它下的结论。毛主席说过：“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一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所以，革命的大联合“根本就不能有‘百万雄师’的代表，包括它过去、现在、将来的各种变种”。

学者老田在201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1974年，“开放给造反派去顺利团结保守派的机会之窗已经关闭了。机会之窗的开放时间很短，必须在第一个有利时机就迅速完成，而武汉因为经历过1967年夏天百万雄师围剿造反派的武斗，以及1969—1972年的‘两清一批’运动，保守派对镇压造反派事务的参与程度过深，双方结下的仇怨极大，都已经很难跨越对

^① 参见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32—337页。

^②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30页，

立的鸿沟了。”^①

老田所言“机会之窗的开放时间”，应该是指1967年一月夺权前后两三个月，那时保守组织已经或正在解散，支撑他们的外在的政治权力和内在的政治信条已经或正在崩塌。造反派以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关闭了团结大多数的“机会之窗”。到了1974年，由于“工农兵”坚持为几乎给造反派带来灭顶之灾的七二〇事件翻案、坚决捍卫整得造反派死去活来的两清一批的成果，他们即使主动向造反派释放团结、联合的诚意，大多数造反派也难以接受。

批林批孔运动中，造反派的所有要求都遭到“工农兵”的反对。造反派要求省委承认两清一批犯了方向错误，这个要求涉及“工农兵”的一贯立场，也涉及他们自身在两清中的作为，他们表示坚决反对。《武汉工农兵第六号公告》说：这是“妄图为反革命阴谋集团‘5·16’、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造反派提出“放、平、补、提、纳”，他们到北京上访说造反派这是要“篡党夺权”。

“工农兵”也有自己的诉求，主要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和逻辑批刘丰，为七二〇事件翻案、进入各级革委会等。

“工农兵”希望像其他省的保守派如辽宁的辽联、辽革站一样，获得革命群众组织的身份，并以此身份与造反派平等地结合进各级革委会。要达到这个目的，前提是必须和造反派实现联合。但是中央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七二〇事件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工农兵”从来没有放弃为七二〇事件翻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来，中央和省委一再强调七二〇事件不能翻案，“工农兵”按照1972年以来刘志、韩宁夫等为他们定下的口径，以另一种形式进行翻案。他们宣称：他们不为七二〇翻案，因为这一事件的制造者不是陈再道、牛怀龙等和百万雄师头头，而是林彪、王力、刘丰；林彪等人的目的是搞“一箭双雕”，既要谋害毛主席，又要嫁祸于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当前正在进行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刘丰制造七二〇事件，完全符合运动的大方向^②。

“工农兵”认为：百万雄师未能平等地与造反派实现大联合，未能参加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是刘丰搞的；1968年“三反一粉碎”中他们

^①老田《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之四：造反派对政治异化的批判及其效果》（网文，2017年）。

^②参见武汉建筑工人成洪群《〈长江日报〉在“击退”什么？——评三月二十四日〈长江日报〉评论员文章》（1974年4月5日，铅印传单）。

再遭厄运，作为搞右倾翻案的坏头头，被“江城前哨”等群众专政组织关押，被游街、开会批斗，也是刘丰搞的。“汉阳工农兵”的“战斗口号报”写道：“刘丰一伙搞的‘三反一粉碎’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刘丰一伙破坏湖北大联合、三结合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工农兵”这样批刘丰，被造反派认为是搞右倾翻案，省委也不认可。1974年3月省委自编的《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材料》，省委提供材料、委托造反派编写的“一百条”，都没有“工农兵”列举的刘丰“罪行”。

“工农兵”反复表达他们这一派也要进入各级革委会的要求，如肉联厂“工农兵”“用大字报向厂党委要八个革委会的常委，五个委员的席位”^①。

1974年1月16日，省市党委集中“工农兵”头头俞文斌等二十余人在市一招办学习班。对省委的这一举动，参加学习班的汪扬的理解是：通过两派头头分别办学习班，“两派合二为一，沟通思想，加强团结，然后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局面”。章迪杰理解为：湖北省、武汉市的革命委员会没有他们的代表，是“派委会”，是“一派掌权，一派受压”，“这次省市领导想通过办学习班解决这一问题”。这两种想法都是百万雄师头头的一厢情愿，自我安慰。

2月18日，两赵一王等领导人在洪山宾馆与俞文斌等人座谈，从晚八时到次日凌晨三时。王绍光在他关于武汉文革的一本专著中记述：“‘工农兵’开始要求政府为武汉事件平反，对他们在武汉事件之后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并任命保守派要人到省市级政府机关的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省领导和‘工农兵’头头进行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谈判。但是，保守派从省领导那里除了得到严厉批评之外一无所获。”^②章迪杰在他的回忆录里讲到他参加了这次座谈（谈判），他称之为“接见”，没有说他们提出要在“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也没有说他们“得到严厉批评”。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赵辛初等频繁地召集造反派头头开规模不一的座谈会，从来没有表露过让保守派代表进入省市革委会的想法。如果省委表露过这种想法，绝大部分造反派头头和群众绝对不能接受，而且会采取

^① 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把林彪死党刘丰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载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武汉工人》报第49期（1974年4月27日）。这一期《武汉工人》报是停刊四年后复刊的第一期。

^② 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第217页。

激烈的举动表示反对。

1974年2月，历时近半年的首义路座谈会结束后十几天内，赵辛初等召集夏邦银、朱鸿霞、吴焱金、聂年生、方景清、丁远芳、邱瑞、王小青、徐彪、王光照等十人开了三次小型座谈会。第二次座谈会上赵辛初说：“眼下武汉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有人鼓吹为七二〇翻案，这是打横炮，是不能允许的。中央早有结论，那么多文件讲得清楚明白，没有中央的指示，怎么能够翻案呢？对那些人，我们有责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是个教育问题。教育他们端正心态，坚持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按中央的指示，不纠缠历史旧账，要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刘丰身上。你们这些同志也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记取历史的教训，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毛主席反复强调抓大事，抓路线，当前全国的头等大事就是深入地开展批林批孔。”^①批林批孔运动中，“两赵一王”对“工农兵”始终就是这种态度。

3月19日，“工农兵”抓走在武钢作报告的赵辛初、赵修、武钢党委书记李振江，“要求他们作出解释：为什么省政府对造反派作出那么多让步，保守派却什么都得不到”^②。几个小时后他们放掉了赵辛初等三人，他们的要求无一得到满足，他们得到的是3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湖北省委、武汉军区党委三点电话指示：“一、随便捉走赵辛初、赵修、李振江等人，是错误的。二、‘七·二〇’事件不能翻案。三、流氓在街上污辱妇女，要认真严肃处理。”22日省委立即将“三点电话指示”以鄂发（1974）16号文件转发各级党委。

文革后出版的武汉官方党史写道：3月下旬，造反派“强行抓走正在武钢作报告的湖北省委书记”^③。这样写能够体现“文革中一切坏事归造反派”的政治正确，而抓走赵辛初等人是“工农兵”自己也承认的。4月初“工农兵”在给中央的汇报材料里写道：“中央办公厅三点电话指示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和保护”。文革后汪扬写道：“以张立华、刘长安、李承忠和刘继先等为首的同志，搞了一次‘犯上作乱’的行动，把帮四人的赵王爷请到了‘工农兵’的汽车上对话评理。”

“工农兵”认为，两赵一王把持的省市党委完全不可信任。1974年，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352页。

② 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第217页。

③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585页。

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持久地去北京上访。

多次访谈百万雄师头头，感觉他们对得到中央、省市承认并具有畅通的联系渠道一类的事，文革中一直非常在意。1967年百万雄师气势最盛的时候，他们最大的遗憾和不安是没有得到“中央首长接见”，没有“和中央联系的渠道”，在这两个问题上远不如造反派。他们一般只能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站中南组联系，向该组反映情况。七二〇事件中，刘敬胜就给中南组余志祥打过电话。1967年6月7日，百万雄师赴京汇报团向中南组协理员谢谦提出，“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以及和中央的联系”，当场遭到婉拒。百万雄师联络部长章迪杰说：“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是联系不上的，他们也根本不听我们的反映。”“在七二〇事件发生以前，百万雄师联络站以联络部为主，每日或隔日向中央联合接待站中南组反映一次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这种反映渠道窄，北京知道真实情况的人也很少，在大街上看不到百万雄师的舆论宣传。由于造反派在北京造谣诬蔑，北京城的老百姓只知道百万雄师杀人如麻，武汉大街上血流成河，要穿胶鞋走路，百万雄师被描述成青面獠牙的魔鬼。”^①

1974年他们汲取了教训，不担任“工农兵”“常务负责人”的多名原百万雄师头头亲自带队赴京上访。

第一波上访开始于3月29日，七十多人分五批赴京，孙德洲和杨道安、俞文斌、廖勇（铁路职工）、张立华、刘长安分别带队。

他们向接待站分几批送了大量材料，反映的问题主要有：

一、赵辛初说“湖北的问题主要是刘丰、曾思玉的问题”，这是捂盖子，保林彪死党、活党，保自己。

二、赵辛初对两清问题搞一风吹，说“两清不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是反攻倒算”。现在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大搞右倾翻案，比如要求释放江岸车辆厂造反派头头罗小毛、武汉油脂化学厂造反派头头汤礼胜。两清不能全盘否定。

三、赵辛初、赵修挑动两派群众互相斗。赵修公开讲“要吸取教训，过去对我们亲一些的现在要疏一些”。于是“革命群众”在市内建立三十

^① 参见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第127—128页，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63、64、135页。



1974年4月17日，谢敏华（左一）、章迪杰（左二）、俞文斌（右二）等在天安门合影（载章迪杰《峥嵘岁月》）

多个据点，设广播站，集中大量人员、车辆，准备武斗。各级党委纷纷表态“造反”，支持造反派，公开把矛头指向“工农兵”，大有灭绝“工农兵”之势。“党委造反”出动大量车辆、人员上街游行，严重破坏生产。武汉冷冻机厂党委书记批给上京造反派18人路费1700元、粮票600斤、汽车两辆、汽油1吨。

四、“工农兵”是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的真正主力军，看不到“革命群众”一张真正批林批孔的大字报。

五、大搞复辟回潮，否定新生事物。将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一律平反释放，恢复在各级革委会的职务。那个在反复旧中搞“三指向一凌驾”的工代会，早被中央五二七指示抛进了历史垃圾堆，现在又公开发号召要求恢复，否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成立的工会。

六、造反派在省委个别人支持下，否定军区三支两军的功勋，以搞两清问题为名进驻军区，查封三办，揪军代表。这是妄图搞乱军队，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七、慷国家之慨，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电车公司王华珍在低工资调整时没有升级，以生活有压力为名到处演讲，两年多不上班，搞所谓“反潮流”。市委书记王克文大笔一挥，给她补发工资一千多元。随后闹进级、闹转正、闹福利成风。

八、大搞阴谋诡计，对抗中央指示。中央同意省委七条，指示很多问题按七条办理，王克文对造反派头头说“七条要是下在六条之后就好了”。六条出来后，致使各级党委处于瘫痪状态，少数人乘机搞起“敦促小组”、“批林批孔宣传站”、“批林批孔办公室”等山头，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中央指示任爱生、杨道远不能放，王克文说“不放任爱生、杨道远，就是压我们造反派”。提干、纳新不按接班人五个条件。现在很多单位拿出了提干、纳新计划，如省直机关造反派头头郑军准备提为团省委副书记，武汉汽车配件厂一次提拔23名干部，其中厂工会副主任陈大华是一个劳改犯。省委某些人大造朱鸿霞火线入党的舆论，其目的就是要大大小小的朱鸿霞入党。“打开监狱找左派”，仅杀人犯就释放了二百多个，并都送到东湖疗养院疗养，如杀害汤忠云的凶手彭海如、刘祖清，武汉柴油机厂工总头头、杀人凶手戴能治。大搞“放、平、补、提、纳”，就是某些人要篡党夺权。

“工农兵”这一批上访人员在北京与谢妙福带领的“控告团”有所接触。《武汉工农兵上京汇报材料》讲到他们通过接触形成的印象：对方在北京汇报，第一就是要求释放任爱生、杨道远，任、杨释放了，大大小小的任、杨都可以释放；要求为胡厚民、李想玉公开平反，胡、李平反了，大大小小的胡、李都可以平反。第二就是把矛头主要对着我们“工农兵”，对方公开说，省市等各级领导都不怕，就是怕“工农兵”，所以要在政治上翻烧饼，要把“工农兵”的思想斗过来。

4月23日，“工农兵”第一波上访人员返回武汉。此后“工农兵”于1974年7月、同年9月、1975年1月赴京上访三次，都是俞文斌责成章迪杰带队。

章迪杰在回忆录里讲述了批林批孔运动中几次去北京上访的大致情况，对上访的效果自我评价很高：“第一次上访材料的搜集和整理，都是由原百万雄师江汉分站沈浩然负责。赴京汇报代表团把1974年1至3月份湖北武汉地区批林批孔的情况，向中央作了全面、系统、详细的汇报，使中央直接了解了湖北的真实情况，并根据湖北的情况，结合全国各地的

实际，及时地发出指示，纠正批林批孔中出现的问题。此后的几次上访，都是阶段性的，武汉一出现重大问题，我们就及时带着材料上京汇报。”“及时的上访，不仅变七二〇前的被动为主动，而且有效地控制了武汉的局势。”

197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21号文件《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因上半年“大量减产”被这个文件点名批评的企业中有武钢、武重；文件再次强调不许“搞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要求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的，要迅速赶上来”。

汪扬回忆：“7月2日在江汉区党校由俞文斌等同志召集了全市（“工农兵”）各山头负责人会议，他动员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撤销山头回厂抓革命促生产，并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认为文革已搞了七年，中央文件的迹象是在准备收尾结束文革，所以撤山头这是党心民心盼望已久的大好事。首先决定十大局带头撤，这是武汉实力最强的山头。我们主动先撤作表率，再看造反派撤不撤。”“不少的同志有疑虑，认为我们撤了……怕无力与对方抗衡”，“经讨论……大家表示同意坚决撤”。会后成立撤山头大会领导班子，推选汪扬为大会秘书长，每个局指派两人参加大会筹备。

7月13日晚，“武汉市属各局系统‘工农兵’撤销山头誓师大会”在中山公园大门前举行。俞文斌、杨道安、刘敬胜、孙德洲、谢敏华、章迪杰、蔡俊善、汪仕奇、李树春及各系统“工农兵”头头登上门楼，这是原百万雄师和“公检法”头头少有的集体在公开场合亮相，大会主持人汪扬介绍他们的身份时称为“武汉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会前邀请的省市、各局领导没有与会。俞文斌、刘敬胜讲了话，会上宣读了撤山头倡议书。不久，汉阳区“工农兵”也召开了撤山头大会。

第二十六章 1975年的全面治理整顿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讲话说：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碍我们的大局。

3月5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与邓小平上述讲话精神一致，特别强调：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要及时处理。

全国的“全面整顿”开始了。邓小平后来说得很明确：“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①

第一节 “同资产阶级派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5年1月20日，四届人大开会期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接见了朱鸿霞、张立国、马学礼、杨道安四位湖北的人大代表，谈话中点名批评了谢妙福、武齐骅等人闹事，为杨道远、任爱生翻案，要他们“立即改正这些错误”。李先念等要求朱鸿霞等人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在省委领导下多做团结工作，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回去后，要公开发表个声明，和原来的派一刀两断，免得和武汉少数还在闹事的人有牵连的嫌疑；要带头下去，到基层锻炼，学一点真才实学。还说：武汉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批刘丰，把矛头指向省委；还有几个人不批林，不批孔，不安定，不团结，不生产，不劳动，闹派性，搞串连，拉山头，进驻饭店，扰乱秩序，希望他们立即改正错误。1月24日市委召开各战线、各城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这次谈话的纪要，并决定尽快传达到机关党员干部和基层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负责干部^①。

1975年3月17日，市委发出10号文件《关于认真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搞好当前各项工作的通知》，贯彻“全面整顿”，提出“整顿交通秩序，整顿社会秩序”；“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对于那些还在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在三月份内”，“要求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派性活动”，“再闹资产阶级派性，问题的性质就要起变化了；只要改正，就既往不咎。抢占办公室的要立即退出，抢走广播器材和公共财物的要如数退还。对于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应根据中央的指示，采取坚决措施，严肃处理。该调离者坚决调离，决不能拖延不决，妨碍大局。”

2月底，经中央同意，湖北省委强力处理了“反潮流派”在六渡桥阻塞交通的行为。“反潮流派”头头和骨干三十多人被捕，街头活动的声势大为减弱。“主流派”的境况，据李承弘回忆：批林批孔中重回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成员“大批被干部与保守派代替，就是留下的几个也被批得灰溜溜的。我们厂革委会也早已改朝换代了，空降了一位主任，改任而不是选举了新的革委会。好在我这人能上能下，……夏朱胡下了乡，我就回厂里生产。”^②

1975年“治理整顿”的主要措施是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王光照对再次提出批派性的感受是：“自从有了‘派性’这个词，就为造反派所独享，中央一提克服、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各级当权派一定会把矛头指向造反派，无一例外。”^③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从中央到湖北的官方宣传工具反复说资产阶级派性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种表现^④。很多人表示搞不懂：派性是个政治问题，怎么变成了“生活作风”问题？

省市委会的文件、领导讲话及报纸、刊物、电台连篇累牍地批判造反派的一系列“谬论”，如“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只要矛头向上，大方向就正确”等等。这些“谬论”出处不明，有的经过掐头去尾的加工，头脑

^①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369页。

^②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63页。

^③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409页。

^④ 参见1975年6月28日湖北日报社论《加强安定团结 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正常的人不会公开提出这样的政治口号。

6月4日赵辛初、赵修在全省广播大会上的讲话，贯彻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方针，对前一段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作了全面总结和部署，重点之一是“同资产阶级派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针对批林批孔运动中各级党委的表现，赵修提出领导班子不能“软、懒、散”，不能“‘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必须“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搞就要坚决地搞”。

为了表示省委同造反派的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的坚决性，赵辛初点出多个受到处理的造反派成员：“像王志良（按：原省直红司头头），长期坚持资产阶级派性活动，散布了大量的谬论，特别是中央九号文件下达以后，仍然坚持不改。省委常委决定免去他省物资局副局长的职务。还有武汉市武昌区原革委会副主任张庆祥，不服从党的领导，长期闹资产阶级派性，屡教不改。应给予党的纪律处分。”“还有那么一些人，在那里妄想‘乱’，鼓动‘乱’，制造‘乱’。……就是妄想乱中国共产党，乱中华人民共和国，乱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要擦亮眼睛，发动群众，同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谢妙福、武齐骅、郭洪斌、刘祖平等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

对于造反派一再呼吁、两赵曾经一再表示同意的落实政策问题，两赵有了新说法。赵修说：“我们讲的落实政策，是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他们的政策。你要官，不给。”赵辛初说：“还有的人讲‘我们闹是因为没落实政策’、‘不安定不团结的根子在你们那里’，我们说，党的政策是有明确界限的，不容你无理取闹，也不容你倒打一耙。对于任何无理取闹、破坏安定团结的行为，我们就是要斗。”“我们讲的落实政策，是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决不能满足他们违背党的原则的无理要求。对于那些抗拒中央指示，搞破坏活动的人，也要落实政策。比如何天泽现在把他逮捕法办，就是落实了他的政策。”

赵修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提出也要给受到伤害的保守派落实政策：“落实政策，特别是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要注意落实那些老工人、有经验的干部、技术骨干、老劳模的政策，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的位置上。”

第二节 安排造反派头头下放“挂职锻炼”

3月5日，中共中央9号文件《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发出，第四条说：“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碍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3月初，在省革委会任职的几个造反派头头被安排去农村“挂职锻炼”，潘洪斌、邓金福、钟锡钢、杨玉珍、王屏等常委回到本厂原车间原班组上班。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被安排带一支农机修理小分队到沔阳县支农一年。同时，没有参加过群众组织的武重党委副书记马学礼被安排为保康县委副书记、清溪河公社党委书记。



马学礼（队列最前一人）挂职锻炼期间参加抗洪救灾

顾建棠回忆：3月初，省委与朱鸿霞、张立国、胡厚民、顾建棠谈话，让他们到挂职下到农村锻炼，没有提到9号文件所说对派性严重的头头要

调离的问题。“赵辛初说：你们都是省革委会的新干部，遵照中央关于对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省委研究决定让你们到基层锻炼，你们都要作好准备。下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实践中增强才干。其他书记都表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新干部的关怀，并寄予厚望。你们一定要好好干，干出个好成绩来。”

早在1月20日李先念就要朱鸿霞、张立国等带头“到基层锻炼”，所以他们“对省委的这一决定都深信不疑，对邓小平整顿的真正目的一无所知，纷纷表示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①。

3月4日至5日，省委通知：夏邦银去通城，挂职县委副书记、清水公社党委书记；朱鸿霞去大悟，挂职县革委会副主任、某公社革委会主任；胡厚民去罗田，挂职县委委员、县革委会副主任、平湖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张立国去麻城，挂职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乘马公社党委书记。

3月6日，姜一通知顾建棠，安排他去随县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到随县后，被安排到一个生产小队“蹲点”。

省委同时安排俞文斌、杨道安也“下去挂职锻炼”，俞文斌任当阳县革委会副主任、官垵公社党委书记，杨道安任京山县革委会副主任、京山县机械厂厂长。

与造反派头头平静地接受“中央关于新干部下放培养”的安排不同，百万雄师一些头头极为兴奋，他们认为俞、杨二人不但获得“新干部”资格，而且“下去锻炼”所挂职务的级别，与中央委员夏邦银，省革委会副主任、常委朱、张、胡、顾等人一样，这就意味着“挂职锻炼”结束后，二人将进入他们称之为“派委会”的省革委会。

章迪杰在回忆录中写道：“两派主要头头分别下放农村锻炼，当时称为‘牵牛政策’。简单地讲，就是两头牛在一起就要打架，把牛牵开，就打不成架了。”^②当时湖北省、武汉市官方文件、讲话不见所谓“牵牛政策”一词，这一说法是急于得到官方承认、急于与造反派平起平坐的百万雄师一些头头的自我激励。

汪扬对这个问题的记述与章迪杰不同，他在回忆录中说，“‘牵牛下乡’政策”是百万雄师的人自己叫起来的，所谓“牛”仅指百万雄师一方的俞

^①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75—276页。

^②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40页。

文斌等人，他们把朱鸿霞等人称为“猪”。汪扬说：“（两赵一王）对造反派头头夏、朱、胡等人则捧上省市总工会的宝座，当时我们叫‘扶猪上台’政策。这两种一上一下的行为，充分表现领导人的亲与疏政策。”^①

3月7日，刘敬胜、章迪杰和原百万雄师各区站头头一百余人，在东湖长天楼为俞文斌举行“欢送酒会”并合影留念。章迪杰回忆：“他们二人直到粉碎四人帮的一年后，才结束锻炼，回到武汉。”^②而“下放锻炼”的造反派头头，在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开始就自行返回武汉。



汪扬回忆：与安排俞文斌“下去挂职锻炼”同时，刘长安也被安排到汉川马口的3509厂，并担任汉川县革委会副主任。3月15日，汪扬邀请了张立华、吴时元等十余人来家为俞文斌、刘长安饯行^③。

俞文斌下到公社工作，一周后他给汪扬写信说：“这个公社是新成立的，住的位置也没有，工作环境较差，没有汽车，自行车也很少，一出门就要跑路。今天上午我就跑了五十多里路，伙食比（武汉的）机关还贵……不来客人不吃肉，住的地方潮湿，两肩关节疼得抬不起来，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艰苦，因为我时时刻刻在想一定要为党、为毛主席、为工人阶级争

① 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69页。

②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41页。

③ 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69—170页。

气，所以请同志们放心”^①。

顾建棠“下乡锻炼”期间一直在生产小队“蹲点”。他回忆：“我蹲点期间，长驻双河公社的工作队长是随县商业局副局长，他原是武汉的下放知青，经常来看望我，还多次同桌吃饭同睡一床，实际上是受命观察监控我。时间长了，他了解了我的为人，渐渐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1975年9月中旬的一天，他问我：顾副主任，我想问问你，你知道为什么下到这里来吗？我说：省委领导说，遵照中央关于新干部下放培养的指示精神，到基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到这里来是为了锻炼培养我们。他淡淡一笑，摇着头说：不是的，你下到这里的内情只有三个人知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怀念、组织部长陈运铁和我。你下放这里，对外讲是省委对我们随县的关怀，特派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同志来我县指导工作，并担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对内讲顾是派性头头，是武汉的不安定因素，下放到边远山区长期监控。”“难怪我在随县将近一年，而且还挂了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可是我从未见到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张怀念，没有参加一次县革委会会议，没有看到从中央、省到地、县的任何一份文件，这叫锻炼培养吗？这叫政治欺骗，把我们当政治奴隶。”得知内情后，“我的蹲点工作一如既往，未受影响，因为我是为广大社员工作。”“平心而论，叫我们‘滚’下去，不是省委的本意，源头在邓小平那里。当时老邓大权在握，谁能对抗，谁敢对抗？邓小平是为了打击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要我们‘滚’；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也了解了农村和农民。”^②

李承弘回忆：“夏朱胡下去干得都不错，多次受到省委表扬。”^③顾建棠说：“凭良心讲，我在红星大队十二小队下放锻炼期间，做到了对党的承诺，没有给省委丢脸。”^④

1975年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13号文件《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其附件《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又提出调离派性头头的问题。附件第三条说：“根据中央9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

^① 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0—171页。

^②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78、291—292、278页。

^③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62页。

^④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278页。

的领导干部和头头，要坚决调离。”赵辛初6月4日讲道：“坚持闹资产阶级派性不改的，要调离；调离过后，还闹，再调。”约从6月开始，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被调离，给出的理由一般是“革命工作需要”。

湖大彭勋被省委安排到湖大的校办农场，武锅王光照调到十堰二汽，武汉制药厂丁元芳调到十堰东风轮胎厂，省交通厅傅廉调到宜昌港务局。顾建棠走后，长办党委将长办革委会常委王志鹤调到四川奉节水文站，将长办革委会组保部长张贤良调到江西湖口水文站。省委组织部下文，将非党员曹承义调到黄石的一个冶金建设公司。

第三节 基层单位的“治理整顿”

武钢搞整顿的一个大举动，是将“不安定分子”集中起来，于3月开赴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开滦煤矿办学习班，历时半年。“不安定分子”主要是各级造反派头头如李想玉、周岳来、陈祖坤等，还有主张家属工、“老单身”、复退军人权利的“闹事”头头。学习班正式名称是“武钢学开滦代表团”，加上带队领导、骨干共168人。

陈祖坤回忆：“1975年全国工业战线开展‘学大庆，赶开滦’活动，中央同意武钢在开滦煤矿举办学习班。这次学习班，主要是贯彻邓小平3月5日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整造反派，反造反派的所谓派性。武钢当权派认为，武钢生产长期上不去，主要是因为周岳来等人闹派性。沈因洛在向中央首长汇报时也提到这一点，李先念还点了周岳来的名，说他做了很多坏事。周岳来就成了这次学习班的主要对象。其实武钢工人不这么认为，在炼钢厂老工人座谈会上，工人们认为，武钢生产上不去，不是因为有人闹派性，而是经过文革，工人的很多切身利益未能解决，例如家属工问题、老单身问题、复员军人问题。”“学习班打的旗号是促进安定团结，所以武钢当权派将他们心目中的‘不安定分子’集中关进开滦学习班。我们离开武钢当天下午，沈因洛在风雷激剧场召开万人大会，把武钢生产长期上不去的责任一口气加在去开滦的这些‘不安定分子’身上，还特别点了我和高仕超（原运输部火车头战斗队成员）、黄友英（‘家属工造反’头头）的名。”学习班主要学习内容是“批派性”。半年后回到武钢，开大会宣布学习班人员去向，陈祖坤、张振华（原火车头战斗队成员）

和两名处级干部“在家听候处理”^①。

1975年，各单位的主要任务是批派性，调整批派性不力的领导班子，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王光照回忆：6月中旬，市委向武锅派出工作队，分管工业的市委书记文祥为队长，市科委主任吴官正为副队长。“它宣称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整顿和调整软、懒、散的领导班子，二是要组织职工同资产阶级派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进厂后，层层发动群众，举办各种学习班，组织学理论的工人宣讲队，摆情况，揭矛盾，查危害，讲理论，批派性，我又一次成了全厂主攻的目标。”“工作队、厂党委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大会讲，小会批。以大批判开路，整版整版的大字报由党委宣传部那些整人的老手们制作张贴在厂前广场，厂广播站一日几次地播报反派性的稿件。一个口径，一个腔调，对我和沈复礼大加痛斥和指控，诬称沈复礼、王光照之流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魁祸首，是文化大革命的捣乱派。吴官正两次单独把我找到厂办公大楼党委政治部去谈话，要我端正态度，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深刻检讨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错误。”“工作队根据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示，没日没夜地努力着，把文革前的那套管、卡、压的旧东西全都复活了。”1976年1月初，王光照在武锅工人“反击右倾翻案风座谈会”上说：“去年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文祥带队进驻武锅，秉承‘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治理整顿，调整所谓‘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大批造反派的‘资产阶级派性’，恢复旧的规章制度，一句话，武锅又回到文革前的那种旧秩序中，广大职工又回到了过去那种‘管、卡、压’的境况下，凡属文革的痕迹，都竭尽全力清除。他们以贯彻中央文件做幌子，全方位地恢复早已被批判过的那些东西。”^②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评《水浒》批判“投降派”，评法批儒在坚持革新、反对复辟倒退的意义上肯定法家，1975年的这些学习活动，都得到造反派的拥护，不少人认真读书学习。王光照回忆：当时造反派已失去话语权，报刊上尽是官办理论小组那些不着边际的文章，“竭力淡化评《水浒》的现实指导意义，恰恰印证了他们的痛处被击中了。什么‘三项指示为纲’，这就是当今的宋江把聚义厅改

^① 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66—169页。

^②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410—412、446页。



“车间工人学理论”（载《大武汉新影》）

为忠义堂。”^①

王仁昌回忆：

几乎所有造反者通过儒法斗争史学习，时常议论、思索商鞅车裂、吴起遭戮的悲惨命运。有天，唐恒山画好一张《谭嗣同菜市口就义图》，让我评论一番。谭嗣同浓眉如剑，怒目似火，昂首挺立，正气凛然……我赞赏道，好！老头子问：‘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关键时刻你能这么大义凛然，镇定自若吗？简直是腐儒之见！我才不会坐以待毙，必定回枣阳举行武装起义。……因此，笑而不答。唐恒山大有深意地一笑，嘴角疤痕如半撇胡子一翘一翘质问道：你不敢回答？我走近案桌，提起毛笔，在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443页。

画上题下四句诗：

笔舞龙蛇走千家，江城重炮震中华。

头颅愿酬革新志，书生热血岂矜夸！

唐恒山看罢连声叫好，吟哦再三，又细加评论：好一个‘头颅愿酬革新志，书生热血岂矜夸’！有气魄！你那篇《在炮声中进击》影响的确大，称得上声震中华。老实说，我对省市革委会里大朱二胡那些投降派并不看好，希望就在你这样年轻人身上。能文能武，有胆有识。主席百年之后，一旦中央出修正主义，我看许世友不见得靠得住，倒是你可以回枣阳号令万众，传檄讨伐！听老头子讲得悲壮，我含泪而笑，握着老人的手久久不放^①。

^① 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一、闰七不闰八”。

第二十七章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①

第一节 造反派的“帮促班子”

1975年11月中旬，清华、北大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文件《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文件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1976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社论说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1月底《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到基层。此后，全国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2月4日，一冶曹承义、柳汉昌等人在三镇闹市，以“一冶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口号报，有“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长江万古流，百折不回头”“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七八条口号。曹承义回忆：“次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我立即打电话给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告诉他们：‘湖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枪我们已经打响了！’”

2月初，回武汉过春节的夏邦银、胡厚民、顾建棠与潘洪斌、傅廉、曹承义等人开始串连，“都表示，决心紧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积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家劲头大得很。”胡厚民激动地说：现在钢新两派大团结，不要再分钢派新派，团结起来，都是革命造反派^②。胡厚民提出这次一定要两个中央委员夏邦银、谢望春牵头，其他人都同意。谈

^① 本章的撰写，参考了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十九章邓小平否文革搞翻案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记事》第六十五—七十节，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45—168页，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十九、难忘的1976年（上）”。

^② 2019年12月杜先荣访谈曹承义的记录。



“人们在街头观看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载《大武汉新影》）

到“如何争取省委积极领导的问题”，顾建棠回忆：“夏邦银说：对，我们要像批林批孔那样，争取省委领导，我们紧跟。我说了我的意见：同意老夏的看法，应该尽可能地争取省委的领导。但要看到批林批孔批刘丰，实际上是批曾、刘支保吃左、乱抓五一六制造大冤案、欺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运动一来，饱受迫害的造反派有冤要伸，曾受欺压而重掌大权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有气要出，就是这种伸冤与出气的共同要求，才出现省委积极领导、支持群众，群众相信、拥护省委的局面，这种干群联手的情况从未有过。但目前情况不同了，自从邓小平复出推行‘三项指示为纲’、大搞右倾翻案以来，省委不是抵制而是紧跟，屁股上有了屎。如若省委敢于反戈，放下包袱，我们又工作得当，争取省委再度率领群众批邓是有可能的。倘若省委阳奉阴违放空炮，争取工作的难度将大大增加。胡厚民说，两种可能，两手准备，先帮后促。最后商定眼下对省委一看二等三沟通，在造反派内部一学习二通气三搞好团结四准备材料。”

2月中旬，夏邦银、谢望春召集通气会。与会者都认为，“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发表到今天，已一个半月了，可是省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一点实际行动”，决定以夏、谢和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信，而且要公开发表这封信，这对省委是个促进，还能起到发动

群众的作用。”

《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由彭勋、严常、丁元芳、郑需龙（马车）起草，2月24日在水塔下贴出。签名的18人中只有一人不是造反派头头，她是省地质局处长、省革委会常委、老干部王舜。“这封信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群众蜂拥而至，水塔下人群水泄不通。这封信被转抄、翻印，连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大字报贴满武汉三镇，充分反映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得人心。2月29日，武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尽管是闭门批判，也算是一种姿态。省委依然纹丝不动。”

从2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又称“转弯子会议”），“继续打招呼”。会议传达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毛主席重要指示》汇集了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要点。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还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重申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是“三七开”，认为“三分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3月3日，中共中央4号文件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

3月2日，湖北省参加“打招呼”会议的领导人回到武汉。夏邦银、谢望春没能听到传达，向参会的董明会了解，董明会说“不能讲”。12日，夏邦银去郑州找到唐岐山，唐告诉他：“这次你们湖北的问题要解决了。那天晚上我和你们省的董明会在一起，江青指着董明会说，他是三钢三新的，是造反派，我是老造反派。这是说给杨得志、赵辛初听的。江青还说要快转弯，转好弯，痛痛快快向造反派承认错误。”

3月8日晚，夏、谢召集造反派头头会议。夏邦银说：“找大家来，就是商议如何帮助省委领导转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争取省委积极领导我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要像批林批孔那样争取省委领导，而不是取代，这一点大家要明确。”顾建棠说：我们帮助省委、促进省委转弯子、

领导运动，不是“拉山头”，“革委会中群众代表是干什么的？我以为首要的是监督各级领导干部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部署，这是我们群众代表的天职，帮促省委的行动就是在履行天职。但要吸取反复旧的教训，力避‘三指向’、‘一凌驾’的错误。”与会者一致同意对省委“争取而决不是取代”的原则，“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的“十六字”行动口号，以批判赵辛初“六四讲话”为突破口的策略。会议决定成立“帮促班子”：

由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七人组成帮促指挥班子。夏邦银、谢望春牵头，但不公开出面，重大事情由夏邦银、谢望春召集七人小组讨论决定。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公开出面指挥。胡厚民、顾建棠、彭勋、曹承义、聂年生（不久自动退出）组成参谋班子。

内部分工：朱鸿霞、彭勋、严常负责宣传舆论，曹佩贤、孙厚智搞简报，龙梅生、马车、丁元芳搞水塔版，顾建棠、沈复礼负责材料，曹承义、林子忠等为社会活动一线总指挥，田学群、李少斌（公安联司成员）、何永清（工总成员）、吴正彪（工总建工系统头头）负责安全，丁喆生（红工成员）、李洪荣负责后勤。

地区、系统分工：武昌区朱鸿霞，江汉区顾建棠，江岸区潘洪斌，长航、铁路聂年生，交通傅廉，市直郑峰，城建吴正彪。

宣传车：由武钢、一冶、汉轧、武重、财贸、武船负责。

后来彭勋把这个班子概括为“夏、谢的旗子，朱、李、吴的牌子，胡、顾、彭的点子”。

曹承义回忆：

胡厚民在主持我们参谋班子会议时说：“我们促省委转弯子，就是要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转弯子。那就是毛主席说的，他们认为文革搞错了，搞过了头，他们应该从反对文革的立场上转到拥护文革的立场上来。”“我们促省委转弯子，就是要他们听毛主席的话，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什么是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毛泽东思想，‘走资派还在走’就是毛泽东思想。”“抓坏人、抓坏头头，大方向完全错了。抓‘走资派’，抓‘就在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大方向就对了。这就叫‘转弯子’。”这些讲话内容，也是我们几个人在街头向群众反复宣传、演讲的内容。

3月1日，朱鸿霞、张立国、吴焱金、李想玉、胡厚民等省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加上王舜）向省委发出公开信，“批判赵辛初1975年的六四讲话，揭露省委把各级革委会中几乎所有的群众代表打成不安定分子，让他们‘滚’到偏远地区并实行长期监控，敦促省委承认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积极领导群众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搞好。”张立国当晚后悔了，让人从张贴出去的公开信上把自己的名字挖掉。当天曹承义带人将这封公开信送到正在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

曹承义回忆：两封公开信“迅速地传遍全省、全市，广大群众应声而起，武汉三镇的造反派又发动起来了。当时我们还组织了武汉三镇几个重大行动，由胡厚民、吴焱金、彭勋和我等人先后在建工局礼堂、红钢城、武昌中华路、汉口武胜路等地集会演说。我在一冶发动群众，很快得到大量产业工人的支持”。

3月11日，夏邦银、谢望春参加研究当前运动的省委常委，中途往外打电话，“说会上阻力很大，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造反派的数辆广播车和一批人来到东湖省委第五招待所外呼口号，朱鸿霞带领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步行前来，“支持群众要求，要求省委接见”。赵辛初等在五所门口接见，朱鸿霞等“向赵辛初、姜一等书记提出两个问题：湖北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还是派性？湖北的主要革命对象是党内走资派还是造反派？”^①同时要求省委传达“打招呼”会议精神，“要求开展群众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希望省委带头转好弯子”。赵辛初答应三五天内答复，此后没有音信。

第二天，夏邦银对李承弘、林子忠说：“你们昨天的行动很好呀，对省委内部震动很大。……大家都在准备批判邓小平的发言。”

14日，“帮促班子”开会，夏邦银介绍了从唐岐山处获知的江青讲话。与会者认为江青讲话符合“毛主席重要指示”，赵辛初在省委常委会上都不传达，“这是对批邓阳奉阴违”。这次会议决定：提出“要转弯，快转弯，转好弯，迟转弯不如早转弯，痛痛快快转好弯”的口号（彭勋提议）；要在“滚”字上做文章，促使省委把从各级革委会“滚”出去的造反派代表都“请”回来（胡厚民提议）；适当加温，大力发动群众用大字报搞大

^① 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部分成员《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地作检讨——再致省、市委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兼告全省人民书》（1976年4月2日，铅印传单）。

批判，同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情况，送材料（朱鸿霞提议）；当前斗争策略是“目的不变，决心不变，基调不变，突破口不变，方法要善变，以不变应万变”（严常提议）。

3月20日，朱鸿霞以省革委会副主任名义签字同意，“帮促班子”进驻省一招十三号楼，“从此帮促活动有序进行，大字报、大标语、公开信都在这里成文发出，会议在这里召开，材料在这里汇集上送。”

“帮促班子”所造的舆论、向中央报送的材料，集中反映如下问题：
“1. 武汉地区右倾翻案的基本情况。2. 省委对待这场批邓运动的态度很不端正，封锁中央对湖北的具体指示，批邓空对空，软拖硬抗不转弯。3. 省、市委消极对抗的主要原因，是主要负责同志犯了走资派错误，对文革仍不理解不满意。4. 邓小平否定文革、打击造反派很合省委领导的心意，他们实际上是文革的反对派。5. 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李先念是总后台，湖北的班底基本上都是他的人。6. 现在我们要帮促省委转弯子、揭盖子、批邓、反翻案、保卫文革成果。我们是帮促决不是取代，是要求省委积极领导我们。”

4月4日，夏、谢召集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三十余人一冶招待所开“两委会议”，商量如何促省委联系实际开展运动。王光照回忆：“会上老夏介绍了省委在东湖第五招待所召开的常委会议的情况。……省委常委们口头上都拥护开展批邓的决策，一联系实际就卡了壳，尤其在去年我省是否紧跟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问题上更是卡得死死的，会上争论激烈，摇摆不定。韩宁夫态度很顽固，抵触情绪最大。所以我们就要花力气去促他们转弯子。老夏说那次大家到省委五招去促了一下，效果蛮好，触动很大，常委中有人讲，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跟上中央部署，记取文革之初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那个教训。一冶两委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要把各单位、各地区刮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弄清楚，整理成文字材料，以便向省委、中央反映。都说刮了右倾翻案风，空口无凭，要有材料。批邓运动下一步怎么办，经过热烈地讨论，一致决定，就从省委一把手赵辛初去年6月4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入手，把这个讲话作为突破口，在‘滚’字上做文章。至于具体办法，依然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那个老办法：上促下攻，内紧外松，立足基层，统一行动。”

柳英发回忆：7日上午，胡厚民在会上讲述了他与夏邦银等人商定的

4月7日，中共中央在处理后天安门事件后，发出9号文件《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10号文件《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当晚“两委会议”与会者收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广播，决定8日中午在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举行群众大会，请省委领导参加。同时组织人立即上街写大标语表态，大标语写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湖北有位赵辛初，扩大会上作讲话，挥舞邓记尚方剑，六月四日大砍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敦促省委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作检讨！”“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武锅造反派写了两条后来成为“要案”的标语：“李木匠是湖北问题的总根子！”“李木匠不检讨，我们就打倒！”

4月8日上午，省委召开全省广播大会，表示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声讨邓小平。十点多，朱鸿霞、胡厚民带人进入省委大院，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强行带到武胜路会场。

武胜路新华书店坐落在汉口武胜路和中山大道交汇点上，是汉口与汉阳、武昌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处。武汉市民所谓武胜路新华书店“大阳台”，文革中造反派经常用作开街头群众大会的“主席台”，实际上是书店大门



汉口武胜路新华书店（1991年）

上方一块巨大的钢筋水泥雨阳棚，没有护栏也没有楼梯供上下。赵辛初、赵修、韩宁夫按职务高低，依次沿着一架长长的竹梯爬上大阳台。王仁昌在现场看到：“又胖又高的韩宁夫颤颤巍巍，几乎是被人连抬带拽上去的；嘴里不住唠叨：我是六十岁的人，有什么闪失，看你们如何向中央交待？上去了，又嘀咕：其实，我比你们还恨邓小平。这样搞，我心里就不舒服！”^①

大会由吴焱金主持，赵辛初讲了话。王光照“站在主席台上的人群里，认真地听了他的讲话。感觉到他今天的发言旗帜鲜明，底气十足，不像过去温吞水那样”。赵修、韩宁夫也讲了话。会上“并没有安排他们发言，是赵辛初、赵修自己要求发言的”^②。两赵的发言受到热烈欢迎，韩宁夫发言对“我省、我市右倾翻案风的实际情况，他一字不提，惹得大家起哄，与会听众有人高呼：不要放空炮，反对空对空！”

会后三位书记被安全送回，中央来电话批评了造反派的这一行为。

第二天，省市市委又召开十万军民参加的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声讨邓小平罪行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董明会、夏邦银在会上发言，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悉数参会，他们的名字第二天全部见报。

经夏邦银等要求，省委于4月13日召集任省革委会常委、副主任的群众代表开座谈会。群众代表们讲述了一年来在基层的工作情况，对省委将这批人作为“不安定因素”赶下去提出质问。赵辛初说：“我们省委没有认识到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搞翻案，借搞整顿打击新生力量，我们没有看清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韩宁夫说：“我们都上了邓小平这家伙的当，你们恨邓小平，我们比你们还要恨得狠一些。”

鉴于“书记们没有讲自己跟着邓小平跑的内在原因，更没有讲省委如何转好弯子的具体措施”，4月15日夏邦银、谢望春和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16人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信，信件开头完整地写上所谓“基调”的那一段话，“希望中央能够从上面促省委转弯”。随信附送了一批材料：《省、市领导人刮右倾翻案风的言论》《传播政治谣言，大造复辟舆论》《湖北、武汉地区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关于湖北省委在组织路线上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武汉地区文艺战线右倾翻案情况》。

“帮促班子”4月23日撤出省一招13号楼后，5月2日在一冶招待

^① 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② “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一：朱鸿霞《关于赵修是如何幕后操纵运动的》（1976年12月7日）。

所开会，顾建棠传达“帮促指挥小组”会议精神：“省委开了十万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拉开了转弯子的序幕，‘上促’初见成效。现在我们要在中央两个决议指引下，‘上促’不放松，重点搞‘下攻’，就是回到各单位去促基层党委转弯子，大战红五月，夺取新胜利，进一步帮助省委转好弯。怎么攻？1. 依靠群众，坚持方向，独立自主各自为战。2. 据理力争，要他们恢复基层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的活动，但不夺权。要批推行邓小平路线的当权派，要他们好好工作；又要促他们，要他们解决问题。5月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单位搞起来。3. 抓重点，抓武重、武钢、一冶、武船、武锅、交通、财贸、省体委。”胡厚民补充说：“还要把‘滚’出去的请回来，要打革委会的旗帜。抓好四件事，一学习，二批判，三调查，四请回。”

朱鸿霞说：“不只就掺沙子，而是要建班子，按单位、系统打革委会的牌子。革委会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要扎扎实实地搞。”胡厚民说：“下一步就是把新生的革委会成立起来。有的同志说，这不成了两套了？两套就两套，这没有关系，可以分一分真假美猴王。”^①“要正儿八经地、理直气壮地把‘革委会’的牌子挂起来”，“原来的工作人员要进领导班子，原来不是工作人员的，可以组织理论小组，作为‘革委会’的理论小组。”“这样一来，我们自上而下的体系就形成了。”^②

5月，在朱鸿霞策动下，武重原工总头头、厂革委会成员戴行江等人召开了厂革委会“树旗”大会^③。这一举动被一些企业的造反派仿效。省市很多厅局的造反派将1967年成立的“革命领导小组”的牌子重新挂出来。6月7日，原公安联司头头李天荣带62人进驻市公安局，要求恢复局革命领导小组。谢望春、顾建棠促成市一轻局、二轻局重新挂出“革命领导小组”牌子。6月20日，姜一向顾建棠传达省委意见：“省、市厅局的革命领导小组不要恢复了，原来的成员都在厅局领导班子中安排。”“帮促班子”认为这是“省委转弯子又迈出第二步”，同意停止这一行动。

武汉官方1976年12月编制的材料写道：“今年六月份，他们公开提

① 中共武汉市委材料组《“四人帮”指使和支持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在湖北武汉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材料》（1976年12月）。

② 中共湖北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1977年12月）第12页。

③ 参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朱鸿霞的刑事判决书，市法（82）刑初字第30号。

出：“向湖北武汉的走资派、翻案派、算账派、复辟派，讨还一月风暴的革委会！”“曾一度有的单位被夺了权。有九个区、局被抢占了办公室。有十四个局强行恢复了斗批改中已取消了的‘革命领导小组’、有四个局强行挂出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的牌子。有三十一一个基层单位挂出了他们的所谓厂革委会的牌子。”^①

从5月底开始，长江日报像批林批孔高潮时一样，发表了多篇造反派头头的文章：夏邦银《认清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同走资派斗争到底》（5月31日），朱鸿霞《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6月4日），谢望春《依靠群众，深入批邓》（6月12日），胡厚民《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批判邓小平反对工会抓阶级斗争的反动谬论》（8月4日），柳英发《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永不丢》（8月18日）。

7月上旬，省委、省革委会召开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验交流会”在襄樊市举行，到会的有省委和各地市主要领导人，武汉市及省内其他地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还有因支持造反派被逐出省革委会的常委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常委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顾建棠回忆：“经验交流会主题是学习、推广襄樊市委的经验，他们在中央两个决议公布后，端正思想，积极领导群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肯定文化大革命及其胜利成果，并且从组织上落实，新干部是党员的进党委领导班子，党外的吸收入党，从而改善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会上还介绍了襄樊棉织厂的典型经验，该厂领导讲了他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怎样转好弯子，首先要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造反派、正确对待自己，其次带头联系实际批邓，第三对群众代表要在组织上作出安排，解决补台问题。”赵辛初在会上说：“襄樊市的经验给我们上了一课，是个好经验，省委希望大家把襄樊市的好经验学到手，带回去参照办，把我们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好，我们要认认真真地快转弯、转好弯。”

造反派认为，襄樊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对推动全省的批邓运动，加快各级党委转弯子，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是省委真心实意转弯子的体现。”

襄樊会议后，省委就着手安排一批造反派头头进入省委及各部、委、

^①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材料组《“四人帮”指使和支持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在湖北武汉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材料》（1976年12月）。

办，省革委会各厅、局。

6、7月，省委主动下文，将调往外地的造反派头头王光照、丁远芳等调回原单位。

襄樊会议前后，各级当权派普遍进行“正确对待造反派”、吸收造反派进入领导班子的工作。4月，武钢党委书记李振江找陈祖坤谈话，要他出任武钢〇七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①。武汉制药厂党委向上级党委写报告，拟任命厂造反派头头徐大胜为厂党委副书记^②。7月初，一冶设备处处长吕成利对刚平反的李开键“明确表示”，要将他“‘补台’进设备处领导班子”^③。7月下旬，省委决定任命张建成成为水院党委副书记^④。赵修亲自到武钢抓“转弯子”、“补台”，电修厂被列为重点单位，三位造反派头头被任命为厂革委会副主任（副处级），其中一位被任命为厂党委副书记^⑤。

从农村招工到铁路工作不到一年的谢保安，赵修曾考虑将他“补台”为武汉铁路局革委会副主任。他回忆：8月初，“赵修当着我和武汉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郭坦的面，谈起省委有意让我进入武汉铁路局领导班子。郭坦表示怕基层党委不好通过，赵修当即表态说，如果基层党委需要做工作，我随时可以去。果然，在9月某一天，赵修亲自去我所在的单位江岸车辆段，召开党委会，为我担任路局革委会副主任一职，向基层领导做工作。这件事在铁路系统反响强烈，特别是引起了那些从铁道兵八师转业下来的老干部们的愤愤不平。”^⑥

长办造反派的“帮促”活动基本失败。

3月上旬，顾建棠召集造反派骨干开会，“确定了各单位发动群众的联络人名单”，“开列了收集翻案风材料的提要”。4月中旬开始用大字报、传单“造声势”，分派专人做两级党委成员的工作，“交心谈心、批评批判，不搞批斗，更不提什么打倒，目的是促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6月初，顾建棠等给长办党委成员做工作，提出长办三级革委会恢复工作、“滚”出去的人员调回等问题。此时长办临时党委第一书记林一山在北京住院，“遥控”长办，三位副书记住进医院。新上任的第二书记黄友若给

① 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70页。

② 参见原“邵正茂”写作组成员《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网文，2016年）。

③ 参见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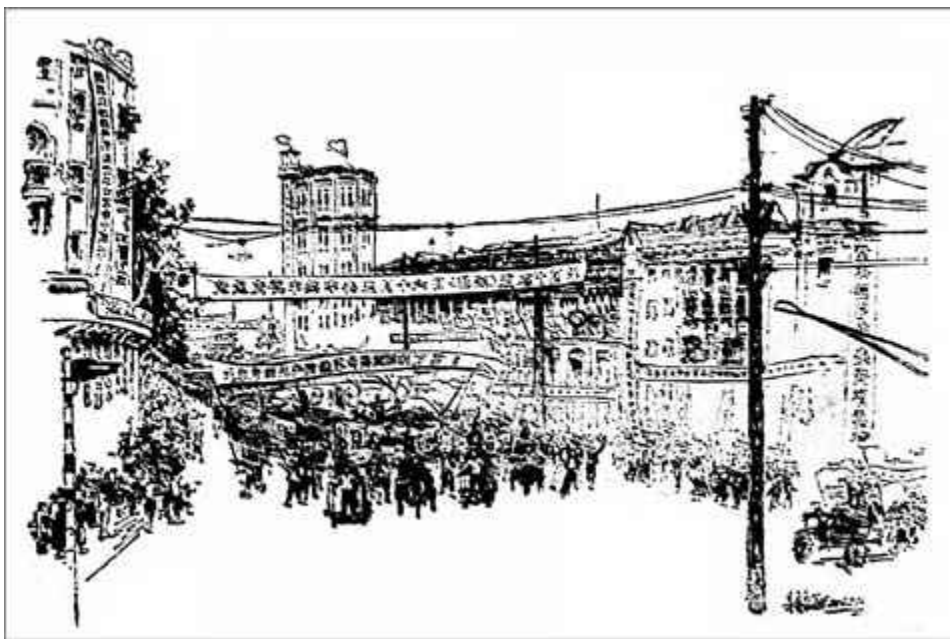
④ 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99页。

⑤ 参见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第74页。

⑥ 《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滚”出去的革委会主任郭志伟、副主任顾建棠安排了办公室，机要员不给他们送文件。黄友若多次提议郭、顾二人进党委，都被林一山否定。顾建棠回忆：“为此，黄书记亲赴北京找林一山商量，他回来后对我说：林一山说如果党委都同意的话，我保留。我与他争辩，你保留总要有个理由吧，他说不要理由。我说你这是故设障碍。我离开时说还是请林主任回长办主持为好。你要不回来，那请不要再遥控了。全因林一山的作梗，不仅战功累累的老红军、原党委委员、监委书记郭志伟和我进不了党委，黄书记也因此在1976年10月后被林一山逼出长办。”

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之际，武锅造反派举行学习会，王光照作了中心发言。他“不厌其烦，按照历史顺序，把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同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斗争的史实向厂里的同志做了一次回顾。通过对党内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脉络的梳理，诠释了毛主席所说的发动文革的必要性”。



“湖北省暨武汉市 70 万军民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 10 周年集会游行活动速写”（载 1976 年 5 月 17 日湖北日报）

3 月 8 日造反派头头会议上决定“龙梅生、马车、丁元芳搞水塔版”，“邵正茂”、“杜则进”写作组又开始在水塔下出刊。“杜则进”成员杨业龙得知王光照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有一个发言，请他整理出来，加

上“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标题，抄好贴在水塔下。丁元芳回厂传达后，武药“邵正茂”写作组立即行动，刊出两篇文章，一篇是联系实际评《水浒》的《砍倒杏黄旗，再斗走资派》，另一篇是《万里长征人未还》。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徐大胜还记得开篇第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不会像武汉解放大道一样平直广阔。”^①

文革中武汉造反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一直以未能与中央、中央文革建立固定、畅通的联系为憾事。天安门事件后，“帮促班子”与省委交涉处于胶着状态，李承弘形容是“马拉松，搞得你没脾气，夏朱胡一时也不知如何办”。李承弘记述了造反派头头为建立这种联系的一次努力：

这时林子忠提出，现在中央有很多提上去的各地造反派，特别是上海工总司上去的较多，是否与他们联系一下，搞清中央下一步的部署。文革中胡厚民经常讲，湖北武汉的造反派是没娘的孩子，在中央没有人。上海、辽宁不用说，河南有纪登奎刘建勋，四川还有“两挺”，湖北武汉造反派全凭对中央文件及两报一刊的领会开展运动，对上面深层次情况完全两眼一抹黑。到了1976年才睡醒，想到要在中央找个娘。我们大家对胡的话深有同感，所以决定派一个人先去探探路，这样，首先想到朱鸿霞，朱在国内外都有名气，毛主席多次点名，在全国有知名度，况且在上海工总司老乡多，能套近乎，朱鸿霞也答应去^②。

于是决定李承弘、林子忠、张有汉（原马房山中学二司成员）先去郑州打印送中央的材料，朱鸿霞再去郑州会合一起上京，后朱鸿霞因事未去郑州。李承弘说：在北京递交了材料，“按理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但我们四人不满意，特别是他们三人总想干点什么，不然就白跑一趟北京了。当时，大家就想办法出主意，我们认为找中央首长级人物难，找一个容易见的，……相对办得到。最后想到了金祖敏，听夏邦银讲，他与金有过一些交往，金原是上海工总司的组织部长，现调任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通过他看能否有突破。于是，我们决定去总工会。”经夏邦银同意，李承弘以他的名义写了致金祖敏的便条。总工会接待他们的一位干部认出便条的笔迹与在传达室登记的笔迹一样，金祖敏没有见他们。

武汉造反派头头与中央建立“组织联系”的企图未能实现。文革后的“揭

^① 参见原“邵正茂”写作组成员《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网文,2016年)。

^②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69—270页。

批查”中，这件事被当成“大案”。李承弘的专案组一成员告诉他，要不是全总那位干部实事求是地出具了证明材料，你就会“被抓进牢房”^①。

在1976年的批邓运动中，省市委主要领导人对于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的肯定，达到了1968年清队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造反派头头们为实现造反派“坐江山”满怀信心，日夜奔忙，参加实际行动的造反派群众却越来越少。

王仁昌回忆他在“帮促班子”进驻后的省一招13号楼所看到的情景：“有天，杨继高约我去13号楼。我俩转了一圈，楼上楼下，房门洞开，空空如也，一片狼藉。我说，完全不见人嘛。杨继高说，开始人蛮多。旷日持久，待不住，都回去了。如有活动，一通知就来了。”^②

王光照说，1976年4月他“再也不是‘反复旧’和‘攻三办、促省委’那些战役中遇事强出头、冲在最前面的角色了”。同时他感觉到“人都搞疲了”：

别的不说，就拿在十三号楼（造反派1976年3月20日至4月23日聚集在省革委会第一招待所十三号楼）看到的情况来讲，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人，仍然是造反初期的那些老面孔，就这些老面孔也比过去少了好多。我们这些各单位的造反派头头，成了夏、朱、胡的群众，我们背后又能有多少群众呢？文革这场斗争太长了，人都搞疲了，其中太多的反复，太多的吊诡，人们思想上越来越胡涂了。一些人为文革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积极性受了挫伤。我常常听到有人讲，要是早知道代价这么高，才不参加哩。这不是那几个头头本事大小的问题，而是国家当局的问题。另外，文革中一些头头成了新贵，被结合到省、市革委会了，他们有些做法也脱离了基本的造反派群体。这些基本群体也产生了离心力，再跟你们闹得黑汗水流，你们身价抬高了，我们能落到什么呢？弄不好，省、市委派你们来收拾我们，挨你们的熊，划不来。这种思潮在十大后武汉出现反潮流的街头派时就产生了。一句话，新贵们已经不完全是造反派群众利益诉求的代言人了，反倒成了这些群众的管家婆。有人离心离德了，街头派自己上街闹，争得直接同省、市委对话的机会。他们认为干革命不一定非要跟你们一起干，从来没有这样硬性的规定呀。这样的社会思潮不是那几个头头鼓舌如簧能够

^①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71—273页。

^② 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解决的。在我看来，文革经过十年的风雨坎坷走到今天，已是强弩之末了。大家玩厌了，不愿意再玩下去了。

……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这不是强弩之末又是什么呢？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全社会对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已经滋生了逆反心态和厌战情绪，人们渴求休养生息，过安稳的小日子。人们从各自酸甜苦辣的体味出发，自主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关心和参与政治运动的人越来越少就成了一种必然，正所谓革命靠自觉哩^①。

9月8日，省委常委会通过了赵辛初次日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关于“转弯子”的讲话。9月9日上午赵辛初的这个讲话将布置全省的“转弯子”工作，并宣布对湖北造反派头头的各项安排。因毛泽东9日零时十分去世取消了这次会议^②。

第二节 “寒城牛”、“工农兵”

1976年3月初，批邓开始两个月了，“工农兵”还没有动静，武汉地区出现了一个由原百万雄师成员组成的很有影响的组织“寒城牛”^③。章迪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突然，一个响亮的名字——‘寒城牛’，像巨大的闪电，撕开了笼罩武汉的乌云，横空出世。”

3月2日上午，三十多人聚集在陈世清家，“面对武汉那几个黑干将向党向人民的猖狂进攻，他们感到再也不能沉默了。大家主张写标语用实际行动进行回击，把心里的话公诸（之）于世。”当晚，韩喜明（洪山区委机关炊事员）、刘仲余（武重职工）、陈世清“在毛泽东画像下，每人喝一碗酒宣誓：三个人不管在什么复杂环境下，战斗在一起，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又商定以三人姓氏的谐音组成“寒城牛”，用作标语署名。2000年刘仲余回忆是他提出取这样一个名称：“用我们三人的姓组织成一起，字不同音同，同时可以代表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心意，以‘寒’对‘夏’（夏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459、461、462页。

② 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65—166页。

③ 本节关于“寒城牛”的记述，参考了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三十一、‘寒城牛’”；湖北日报记者周端珍、王善春《访‘寒城牛’》，载1978年11月22日湖北日报；陈世清《怀念韩喜明同志》（1998年8月20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

邦银）、以‘城’围‘湖’（胡厚民）、以‘牛’斗‘猪’（朱鸿霞）”^①。陈世清的回忆文章重复了刘仲余的说法。2002年汪扬说：“寒城牛”的这个“政治意义”，是他提出来的，是他“上升到斗争的理论上去”的^②。

当天深夜，三人开始写标语，“夏、朱、胡对抗党中央，破坏大联合的指示，妄图钢化江城，罪责难逃！”“想念毛主席，怀念周恩来，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化！”“打倒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张立国、谢望春，不许蒯氏人物夏、朱、胡之流篡权！”从武昌阅马场写到中南路，直到天明。

王仁昌记得“寒城牛”刚“亮相”时写过这样一条标语：“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将反革命分子胡厚民予以收监！”^③

1976年原百万雄师成员第一次亮相，章迪杰给予高度评价：“‘寒城牛’说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话，武汉人民拍手叫好，奔走相告。这一革命行动使得四人帮在湖北的代理人坐立不安。”

文革后陈世清等对记者说：“‘寒城牛’是一个战斗的集体，除了我们几个人以外，还有胡绪龙、胡仲华等同志，经常参加的共有三十多个单位的三十多人，公开支持他们的有好几百人，其中有工人、干部、教师、医生，还有一些领导干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寒城牛”等原百万雄师成员以悼念周恩来的名义开始活动，表达他们对批邓运动的观点。他们的所有观点和以前一样，与造反派针锋相对。

1976年“2月，市内就盛传《总理遗言》、《三首长讲话》和《毛主席对七同志的谈话》等各种传抄本，其主要内容是称颂周恩来的伟大功绩、赞扬和肯定邓小平的人品和他重新工作以后所取得的成绩，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罪行，渴望安定团结、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④

3月25日，“寒城牛”散发的油印传单写道：“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坚决反对武汉蒯大富、聂元梓式的人物继续混水摸鱼！”26日，“寒城牛”在武锅召开了二百多人的会议，陈世清主持，詹才扬（武昌区委机关干部）、梁书金（市建筑公司干部）、刘天喜（市电

^① 刘仲余《记一次写大标语口号》，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

^② 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57页。

^③ 参见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④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606页。



“武汉大学师生悼念周恩来总理”（载《大武汉新影》）

车公司工人）、刘长安等发言。会议“愤怒声讨《文汇报》，指名道姓地批判江青、张春桥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机会，继续排斥异己，打击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反革命罪行，提出‘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化’的口号，表示要同资产阶级野心家血战到底”^①。

4月初，“寒城牛”和一些单位的职工将自己制作的悼念周恩来的花圈送到洪山施洋烈士墓、汉口解放公园、大桥武昌桥头。4月3日陈世清署上自己的名字贴出自己写的诗：“仰望天安看武汉，群魔乱舞恶浪翻，京都江城心连心，善恶人民看得清，衷心怀念周总理，痛骂蒯聩害人精。”陈世清回忆：4月2日至6日，各单位和个人“送了花圈，武昌桥头下面有200多个，还有不少诗词挽联。詹才扬同志画的周总理大幅画像挂在大桥墙上”。

王仁昌曾经目睹当时的情景：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463页。

4月3日至5日，武昌长江大桥桥头江堤上，“寒城牛”刷出署名文章和大标语：“我们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呀，邓副总理为您提倡的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罪在哪里？！”……

江堤邻近汉阳门、中华路两个轮渡码头，是汉阳、汉口两处职工到武昌上下班必经之地，每天围观者达万人以上。三镇轰动了。好多人特意乘车搭船前来观看大字报和大标语。还有人签上支持的意见。名不见经传的“寒城牛”一夜间家喻户晓^①。

造反派的“帮促班子”送给中央的材料里写进了“寒城牛”的这些活动。

顾建棠2010年回答笔者询问时说：文革后当局指责造反派“反对、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是不顾事实和逻辑的瞎说。造反派对周恩来怀有的深厚的感情，是“工农兵”不能比拟的。早在1967年1月，周恩来就态度鲜明地支持武汉造反派，批评职工联合会。特别是他按照毛泽东的既定原则，果断地处理了七二〇事件，拯救了将陷入灭顶之灾的武汉造反派。七二〇事件后他亲自领导武汉的大联合、三结合，8月召集武汉造反派头头进京，形成了武汉造反派大联合的纲领性文件“八八纪要”；10月又来到武汉，多次与造反派头头座谈，亲临武测、华工、湖大、武锅等造反派重要单位看望群众；在成立红代会谈判的关键时刻给予电话指示。1968年下半年全国掀起一阵反周风潮，武汉的北决扬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尽管他们都是一些老造反派，还是遭到武汉造反派自发的坚决批判。《周总理接见亚非作家协会外宾的讲话（1967年12月22日）》^②1968年初在造反派中广泛流传，大家觉得，对毛主席关于文化革命理论的理解和阐述，没有一个人比他讲得更好，包括中央文革那帮秀才。

顾建棠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周恩来去世时他的心情，写到周恩来与长办文革运动的关系：

惊闻周恩来总理逝世，我痛哭失声。回想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长办和长办造反派的深切关怀，不禁泪流满面。1966年到1973年，周总理先后对长办的工作和文革运动作出八次指示：1966年12月21日支持长办群众造省委的反；1967年6月25日指示我们长办民兵武器“不能动”；1967年10月8日在东湖长天楼宴会上与我交谈，称我是他的“小老乡”，

^① 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年）之“二十、笔舞龙蛇走千家”。

^② 武汉新华工革委会材料组印《学习材料（第89期）》（1968年3月）载有这个讲话。

并询问林一山的情况；1968年1月28日在长办红楼二楼会议室，曾思玉传达总理提名顾建棠结合为省革委会常委；1968年3月钱正英部长传达总理支持长办革委会兴建长江第一坝即葛州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968年5月总理批复同意由我起草并署名的《关于葛洲坝工程以毛主席3月30日视察三峡之日命名为“三三〇”工程代码的请示报告》；1970年2月总理指示我在林一山的书面检查上签署意见；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期间总理指示省委领导恢复我的党的组织生活。我内心把总理当亲人，而今总理归天，怎不叫我痛心疾首，泪如泉涌。我常想要是周总理再活五年，包括我在内的武汉造反派决不会是现在的下场。

对于“寒城牛”纪念周恩来，造反派认为他们和天安门事件中的那帮干部子弟一样，以悼念周恩来为借口，别有用心地塑造一个反文革、与毛泽东对立的周恩来。造反派根本不相信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周恩来有什么怀念、崇敬之情。王光照回忆：

我也听到造反派对于武汉寒城牛（百万雄师的变种）的一些议论：他们当年满街刷写大标语，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钦差大臣，下车伊始乱哇哇”，荷枪实弹在全市武装游行示威，冲击东湖客舍，揪斗周恩来亲率的中央代表团成员，公然挑战毛泽东、周恩来的革命权威。周恩来陪同谢胡访问武汉，他们又图谋“拦车告状”，蓄意制造涉外事件。今天缅怀周总理，他们应该自责和反省，反省长久以来背离文革斗争的大方向，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想一想长期与同走资派斗争的造反派对着干，究竟是把矛头指向哪里，符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周总理代表党中央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工人总部平反、翻案，他们却大唱“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一句话，凡是周总理在文革中关心、爱护、支持的，他们总是抵制、反对、打压。对于这些事难道不应该自责和反省吗？倘若仍然坚持过去的那些错误立场，总理九泉有知，也一定会批评他们是“诸葛亮吊孝，别有他图”。

造反派忙着“促省委”，和批林批孔时一样，不以保守派为主要对手。“帮促班子”住在省一招13号楼期间，双方发生过一次小型武斗。造反派负责保卫的人发现刘天喜带一帮人在楼外窥探，抓了几人问明情况，留下刘天喜，放了其他人。不多时一伙人手持木棒冲进13号楼要抢出刘天喜，没找到，将门窗、桌椅等一阵打砸就撤走了。当晚夏邦银等头头知道后，

为避免引起大规模武斗，就让马上放走刘天喜。事后朱鸿霞派人向刘天喜赔礼道歉，并送上补品^①。

王光照当时在“各种场合反复向大家宣讲”：“今天斗争的大方向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的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抓住主要矛盾，不能让一些打横炮的事情牵着鼻子走，迷失了批邓的大方向。”^②

吴焱金回忆：批邓运动开始后，胡厚民两次去找俞文斌，说服他一起参加运动，团结起来对付当权派。胡厚民的这个愿望再次受到很多造反派头头的批评，说他是“投降派”。

中央处理了天安门事件后，“寒城牛”的公开活动减少了。

1976年5月，批邓运动开始四个月了，“工农兵”才重新打出旗号。

5月初，原百万雄师头头打算再次拉起队伍，还是用“工农兵”的名称，统一行动。俞文斌要求陈世清出来组织“工农兵”的活动，不再打“寒城牛”的旗号。陈世清同意不打“寒城牛”旗号，说自己号召力不大，还是你老俞来领导。俞文斌说他不出面为好，有事可以一起商量。

此后不久俞文斌在工艺大楼召开形势报告会，詹才扬作形势报告，陈世清宣布今后“以‘工农兵’名义开展活动”，俞文斌再次提出请陈世清出面。陈世清再三推辞，说你老俞不出面，就请刘天喜、刘长安领头，1974年“工农兵”在社会上活动，这两人比较有影响。俞文斌同意了，并要陈世清讲一讲以后怎样开展活动。陈世清提出：我们的口号是：“百氏兄弟一条心，往事纠纷少议论，团结起来，立足于斗”。对待内部各个山头的态度是：“八路军，新四军，独立大队，都是革命队伍”。大方向，名义上是“针对两赵一王”，“实际上还是针对夏、朱、胡他们这部分人”。陈世清的意见，俞文斌“认为可以”，并决定最近召集各厂、各区原百万雄师头头开会，进一步商议。

一周后，所谓“船上会议”于下午两点召开，原百万雄师骨干八十多人参加。按照俞文斌的布置，陈世清首先发言。他总结了批林批孔时，“工农兵”在两清问题、贯彻中央七条问题上进行斗争的经验，介绍了省委对俞文斌、杨道安的安排，强调省委对七二〇后被打死打伤人员未能落实政

^①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66—267页。

^②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第464页。

策，要求各单位“必须要统一思想，统一口号，统一行动”。陈世清通报组成“工农兵”三人领导班子后说，刘天喜被抓了，刘长安负责；刘长安被抓了，陈世清负责；陈世清被抓了，“那就看我们各厂矿企业、各区的头头们了”。与会者同意陈世清的讲话，“发言激烈”。俞文斌最后讲话，说基本同意陈世清的意见，要求大家支持三人领导班子，同时要求三人立即开会商量，将班子组织起来并作出分工。

第二天，三人班子在黄诚昌家开会，参加者还有汪扬、詹才扬、熊汉卿等。陈世清回忆：会议决定的“第一个活动是在水塔与夏、朱、胡争夺宣传阵地，打了一仗，我们夺过来了，接着追查类似天安门事件问题，我们又分散活动，各自为政。直到‘四人帮’垮台，又组合起来在武汉体育馆，组织批判‘四人帮’在湖北武汉的代理人夏、朱、胡大会”^①。

1976年5月原百万雄师成员重新打出“工农兵”旗号后，最主要的行动就是在水塔大字报墙贴长篇大字报；以“工农兵评报”的名义进驻长江日报社，致使长江日报停刊四天。

批邓运动中，“工农兵”的声势及影响不及只有几十人的“寒城牛”。当时社会上不清楚“寒城牛”与“工农兵”的关系，在人们的印象中，“寒城牛”就是“工农兵”的新旗号。

陈世清说水塔“宣传阵地”“夺过来了”，言过其实。但百万雄师的人居然写大字报而且篇幅很长，引起不少市民关注。

“工农兵”认为，“《长江日报》已成为一张地地道道的造反派的大传单”。6月26日，汪扬、刘仲余、刘长安、王延安（长江仪表厂工人）等二十余人前往长江日报社开展“工农兵评报”。他们强使报社副总编辑邓国栋、副社长黄炳麟站到桌子上，历数该报发表“大量反动文章的罪行”，要二人检讨。邓、黄“拒不答复认错，态度极为嚣张”。此后长江日报停刊四天，“工农兵”宣传说是邓、黄“制造停刊事件，扩大事态，挑起两派斗争”。8月1日，刘长安、王延安被江汉区公安分局带走，分别被拘留15天、10天^②。

6月28日，陈世清等贴出长篇大字报《向何处去？》，说长江日报已不是无产阶级党报，而成了某些野心家的喉舌，要求省市委改组长江日

^① 参见陈世清《“文革”中一次船上会议》，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

^② 参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50—151页。

报社。6月30日，“工农兵”贴出大字报《以革命的名义纪念党的生日》，说长江日报停刊是夏、朱、胡、张及长江日报社个别人借机扩大事端、自己导演的一幕丑剧，是向中央告黑状，向省、市委施加压力的阴谋。

7月14日，“工农兵”头头与新华社记者谈话，申述去长江日报社造反的理由。8月2日，“工农兵”给省、市委写信，抗议长江日报为林彪、王力翻案。

批邓运动开始不久，省委就将朱鸿霞、张立国分别安排到省工办、省农办任副主任，赋予一定权力。襄樊会议以后，大面积安排造反派进领导班子的工作正在筹划，一些单位已开始实施。“工农兵”没有得到他们的头头被安排的消息，于是对襄樊会议展开攻击。

武汉市燃化局党委书记王瑞杰在襄樊会议上介绍经验，会后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文章《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取得运动的主动权》。陈世清等三人以燃化医药系统职工的名义贴出大字报说燃化局经验是“假典型、真骗局”，燃化系统各厂革委会是造反派“一派的革委会”，燃化系统不存在“团结战斗的大好形势”，这个“假经验”必须彻底批判^①。

1976年10月以前，“工农兵”的活动没能够阻止省委“转弯子”的决心。

1976年10月以后，“工农兵”以胜利者的姿态，对造反派大小头头痛下杀手，入室抓人，开会批斗，游街示众，办学习班，整材料上送。所抓之人被省委要过去以后，“工农兵”作为群众组织的使命结束了。再后来，上面传来令他们至今无比愤怒的一句话：“两派都错了”。

^①参见陈世清、舒志发、王声佩《假典型 真骗局——评市燃化局在襄樊会议上介绍的经验》，载湖北文史研究会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

第六编
文革被彻底否定
(1976年9月—)

第二十八章 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捕

第一节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武汉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布毛泽东主席“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整个武汉市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部队党委当即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军民继承毛主席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化悲痛为力量，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胜利，做好各项工作。

11日，湖北省暨武汉市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群众4万多人集会吊唁毛泽东主席，全市开始了为期7天的吊唁活动。18日，省、市委在中山公园门前广场举行“湖北、武汉地区党政军民极其悲痛地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大会”，80万工农兵群众参加大会。



湖北、武汉党政军民悼念毛泽东大会（载《大武汉新影》）

文革已进行了十年，仍置身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执着于文革信念的造反派，视毛泽东为靠山和希望，回顾十年里毛泽东几次拯救造反派于水火之中，虽然林彪事件后就一直传说毛泽东患重病，但他们对毛泽东逝世还是切身切肤地感到悲痛。

魏绳武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撤销五一六专案，当时按市委要求在家“休息”，他的感受是：“噩耗传来，我真是如丧考妣，有天塌地陷之感。报纸、广播虽有‘按既定方针办’等毛主席临终嘱咐，但心总是像悬在半空中一样，寝食难安。”^①

曾任工总组织部长、当时正忙于“批邓”的李承弘，他的感受是：“广播员一开口，‘轰’的一声，我头脑像挨了一重棍，脑子一片空白，好一会才缓过气来。”“第一感觉就是大事不好，毛主席这棵大树倒了”^②。

毛泽东逝世时，杨道远正在部队监督劳动。他说：“我也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那时心里明白，更大的风雨就要来了。我在那段日子里，给党中央写了几封悼念毛主席的信，抬头是写给中央政治局领导的。信里头对江青同志表示了慰问，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即便死去的不是毛主席，换成普通老百姓，在治丧期间向死者遗属表示慰问也是人之常情啊！当然，我在信中也说了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下去，还说如果是修正主义者掌了权，我如果在这样人的领导下还当党员，那就是对毛主席的背叛。”^③

毛泽东逝世几天后，支持造反派的省委书记赵修对已在省工办、省农办工作的朱鸿霞和张立国说：“现在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更加艰苦了，有的人思想又回潮，你们要注意，你们之间要团结，对省里你们要有数，我和宋侃夫是下定决心，坚决和你们一起干到底，你们完了，我们也完了，你们要坚持斗争。”^④

丁家显 1968 年 12 月分配到云南省电力局。1976 年 9 月中旬，他应邀在省电力局水电三处团委扩大会议讲话。他说：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来看，当革命导师离世时，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1. 出现公开的叛徒、修正主义者。领袖在世时，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十分忠于领袖的样

①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 197 页。

②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 275 页。

③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 317—318 页。

④ “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五：朱鸿霞《关于赵修的一个补充情况》（1976 年 12 月 8 日）。

子（像赫鲁晓夫、林彪）；一旦领袖去世，他们就露出公开的叛徒嘴脸，咒骂起领袖来。2. 为了反革命的需要，修正主义者还可以打着拥护领袖的旗号，把领袖偶像化，修正、阉割领袖的学说、思想，复辟资本主义。第二种情况是常见的，我们要特别警惕。在我们国家，如果出现修正主义的话，那么可以肯定：他们必然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贩卖“落后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一类谬论，推行阶级斗争熄灭论。1. 否认修正主义的存在，甚至否定文化革命的必要性。2. 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或者不承认党内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或者公开从政治上、经济上强化这个阶级，从而否定革命造反派作为新兴力量的存在和它的革命性。3. 他们必然搞分裂主义，当前，分裂党中央，将来分裂国家。4. 他们必然要贩卖“枪指挥党”的资产阶级口号。5. 他们必然要崇洋卖国，向苏修投降。6. 他们必然要继续贩卖邓小平的帝国主义的“四个现代化”。7. 他们甚至还会公开为邓小平翻案^①。

造反派中下层中很多人也对毛泽东逝世后的形势感到悲观。当时各单位都举行了追悼会。王光照“被党委工作人员领到前排，同党委和厂革委会的成员并排肃立”。他觉得：“十年文革的风雨坎坷路算是走完了，这应该是我以正面身份上台的最后一次亮相。几度风雨几度秋，秋风秋雨几多愁。我累了，我明白，我该下场了。”^②武钢运输部造反派头头陈祖坤回忆：武钢的追悼会“会场设在厂前高大的毛主席塑像前，甚是隆重，就像一些人父母身在不孝，死后讲排场。有人将我安排在会场最前面，我当时就像一具木偶，随人摆布，远远不像文革中在群众会上大声呼喊、慷慨激昂”^③。

武汉大学六三级学生、当过二司宣传部长的吴恒春当时在湖北化工厂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九月九日，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时间百感交集。毛主席的逝世意味着文革派和老将派在文革上的争斗从此落下了帷幕，意味着造反派的冤案从此就冤沉海底，意味着我从此就再也没有了能找回我的清白的机会了。”^④

^① 丁家显保存着手写的这次讲话的提纲，见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610—612页。

^②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546页。

^③ 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72页。

^④ 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年）。

一冶设备处造反派头头李开键当时做了一个梦：

9月9日毛主席去世，对于我们是晴天霹雳。悲痛之余，我有极强烈的预感：“要变天了。”

毛主席去世没多久的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满天阴霾，我独自一人大走在大街上，街上了无人迹。数百条黑狗汇集于大街的十字路口，其中领头的两条狗居然互相以人的语言问好。我忽然从梦中惊醒，思索梦中荒诞之事，突然醒悟到：二犬对言这不是“狱”字吗？当然这只是梦境，但这梦境后来居然应验了^①。

继1970年“两清”中入狱七个多月，李开键1977年9月再次入狱两年零五个月。

一冶工安公司造反派头头、革委会主任徐正全当时正在监狱服刑。他回忆：

记得1976年9月9号下午四点钟，厂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平日这个时段是不播音的。连忙跑出办公室去听，才知道主席逝世了。刚开始心里一惊，听完什么都没想，脑袋一片空白，很麻木的一种感觉。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突然无声地泪流满面，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好像从1968年底进牛棚直到如今，我从没有哭过。据说一个人无声地流泪，比放声大哭更悲伤，一个男人更是如此。是为主席逝世悲伤吗？有这个因素，但说句良心话，更多的是为自己哭，为造反派哭。他老人家生前支持过造反派，像批资反路线，像处理七二〇事件。但他也放任过一些人对造反派残酷镇压，虽说是他有难处，政治是需要平衡、需要妥协，但也不能以牺牲整个造反派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平衡吧。他老人家这一撒手西去，造反派完全没指望了，而且还将承担他留下的所有后果。一面想一面就忍不住泪往下流，一个多小时以后哭够了，心情平静下来。我不怪他老人家，有些事恐怕是他也没想到的，总之死心吧，熬到哪天是哪天，安下心来服刑^②。

陈祖坤1975年秋从整治造反派的武钢开滦学习班回来后，一直在家等待分配工作。他早就感到“文革气数将尽”，“从上到下的保守势力默不作声，笑在心里，只等毛主席西去的消息传来，十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

① 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8页。

② 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188页。

愿望就会开始实现了。特别是邓小平，那一天一到，他首先会和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公开决裂，再也不会说‘永不翻案’了。”他回忆：

噩耗传来，……我跑到工人村后面的长江边，在那里独自一人站了一天一夜。这时每个中国人都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各人的今后，别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是怎怎么想的。第一，虽然毛主席生前有交代，要求对造反派“高抬贵手”，就凭叶剑英、李先念这帮人，会听毛主席的话吗？他们绝不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君子琢磨事，小人琢磨人，十年来这些小人不知琢磨我们多少遍了，不让我们从地球上消失就是万幸。我还在等待分配工作，想到逃走又实在无处可逃，只得静观其变。第二，走资派会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毋庸置疑的。毛主席健在，二月逆流、七二〇事件照样发生，邓小平一上台照样骄横跋扈。毛主席不在了，谁能阻止？第三，他们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疾速地推向资本主义，造成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因为他们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的灵魂深处、骨子里头就是要坚守并且扩大自身的既得利益。毛主席正是看透了他们的本质，才毅然发动文革。第四，毛主席去世后，他们一定会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拿什么做自己的精神支柱？靠孔孟之道^①？

夏、朱、胡等人对形势的看法比较乐观。8月底9月初，省市的“二赵一王”按中央的要求“转弯子”转得正好，正在与夏邦银、谢望春及在省市革委会任职的造反派头头商讨造反派“补台、提干、纳新”之事，甚至谈到进入省市核心部门的具体人选。

吴焱金回忆：1976年7月，“省委决定夏邦银、谢望春进省委常委，并考虑尽快解决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等人的入党问题。夏邦银在省委常委会上还提出要胡厚民进省委组织部、沈复礼进市委组织部。王克文书记还专门找彭勋谈过话，有意让彭勋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水电部长钱正英到湖北省委要人，准备提拔顾建棠到水电部当副部长。”^②

李承弘回忆：“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胡厚民对我们讲，他们正同省市，主要是二赵一王、姜一，讨论造反派‘补提纳’的事，第一步是未批的省革委会委员补正。我初步安排到省委组织部，要我赶快争取入党，现在补台的人根本不够，原则上原来在工总总部任副部长之职的，不管任

^① 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第171—172页。

^②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83页。

何时期，时间长短不论，都统计上来。我们分厂萧兴懋七二〇前在宣传部工作过一段，任过几天副部长，他也登记在册。下面各级单位都要准备人员，安排名单。这是在省市领导下的补台”^①。

一些机关、高校的“补台”，已经由省委直接完成了。

1976年7月下旬，省委宣传部长焦德秀找水院造反派头头、院团委副书记张建成谈话，告诉他省委决定任命他为水院党委副书记、二把手。张建成说“我不想干”。此前张建成两次拒绝了省委的安排，一次是任省体委党委书记兼主任，另一次是任武汉化工学院党委书记。焦德秀说：“几次要安排你的工作，你都不同意，以为你不想离开学校，所以省委决定让你留在学校工作。你又推辞，到底是什么原因？”张建成说自己打算调走，焦德秀说：“省委已经讨论决定了，不要再推辞了，调动的问题暂时也不要考虑。”张建成说：“既然省委已经决定，我服从，干两年，两年中我会全力以赴把学校工作做好，两年后请组织上考虑放我走。”9月21日，在水院全院大会上宣布了省委鄂发（1976）20号文件对张建成的任命。这个文件任命了一批干部，其中新干部两位，一位是张建成，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党委副书记，另一位是被称为“中国赤脚医生之父”的覃祥官，任省卫生厅副厅长^②。

原定9月9日上午赵辛初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布置全省的“转弯子”工作，并宣布对造反派头头的各项安排。这次会议因毛泽东去世而取消^③。

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晚上，李承弘与曾任工总宣传部长的田国汉分析形势认为：“赞同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局成员要占三分之二，绝对是多数，从人数更多的中央委员来分析，各地造反派中央委员不少，其形势更为乐观”，不会出现“宫廷政变”；军权掌握在“毛主席亲信之人”手里，不会出现“军事政变”。“形势很乐观”，“变天的可能性不大”。二人“与夏朱胡后来的交流，双方看法相当一致”^④。

夏邦银去北京参加毛泽东的治丧活动回来后，对王光照说：“毛主席对身后事作了安排，他老人家跟杨成武都交待好了。大家应当相信毛主席

①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74页。

② 参见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第299—301页。

③ 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65—166页。

④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75—276页。

不会撒手不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肯定会坚持下去。只能跟你们讲到这个程度，不要听社会上的一些流言蜚语，搞不好会犯错误的。知道就行了，不要到处传。”王光照说：“我对老夏不得要领的这几句话是很失望的，对于他的乐观态度也有很大的保留。”^①

汪扬当过百万雄师硃口分站宣传部副部长，1974年成为“工农兵”的头头。2002年自印分发的回忆录《波澜岁月》，三十多万字，“文革旧事”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从1966年职工联合会成立写到1978年中共中央为七二〇事件平反。其中“牵牛下乡和扶造上台”一节写1975年省委安排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等“下放挂职锻炼”，紧接着的一节“最早传递‘四人帮’倒台信息的人”，第一句话就是“一朝东风起，云散长空碧”。全书无一句涉及毛泽东逝世。

“寒城牛”是一些百万雄师成员1976年3月为悼念周恩来去世顶着压力成立的一个组织，1978年作为“反四人帮的英雄”被省市委及其宣传工具大力表彰。“寒城牛”中的“牛”就是刘仲余。刘仲余与刘松余兄弟合著的《坚苦人生》一书10万字，2009年5月由华龄出版社出版。书中记录了从周恩来逝世到四人帮垮台后“寒城牛”的活动，没有讲“寒城牛”成员在毛泽东逝世时的反应及作为。

2015年12月，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了百万雄师联络部部长章迪杰的回忆录《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15.6万字。从书名可以看出，这本书和汪扬、刘仲余的书不同，不讲家事只讲文革。第三十一节讲“寒城牛”一方面悼念周恩来一方面与夏、朱、胡斗争，第三十二节一开始就详细复述华国锋、叶剑英“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关于毛泽东逝世，书中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分别于1976年1月8日、7月6日和9月9日逝世，是为巨星陨落。”

詹学元主编《风雨历程——记文化大革命始末》一书2017年11月出现，自印自销。据书中所载，这本书有个由百万雄师大小头头组成的编委会，主任为汤忠云之弟汤伟杰，委员有蔡俊善、谢敏华、孙德洲、张立华、陈世清、汪仕奇等。这本书仅有第六章“‘四人帮’覆灭记”中第一节“毛

^① 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544页。

泽东的追悼会”，涉及毛泽东逝世，全是以地摊文学风格写高层秘闻，如“华国锋一看这个架势，就知道他们事先已经通气商量好了”“王洪文赶紧接着说”“张春桥板着脸孔，不冷不热地说”。这一节完全没有提到毛泽东逝世后武汉的情况和百万雄师成员的反应。

毛泽东逝世后百万雄师成员的所思所为，在上列四本书和其他相关资料中遍寻无着。在编辑章迪杰书的过程中，责任编辑曾向章提出补充这一段，章含混答应。取回修改稿，一字无增。不记录所思所为也是一种所思所为。

第二节 “四人帮”被捕的消息传到武汉

10月6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以中共中央名义，秘密逮捕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宣布对四人“实行隔离审查”。中央政治局7日至14日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中央于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书记赵修参加这个会议的时间是8日晚到9日凌晨。

两赵赴京前的10月4日上午，湖北省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在东湖五所召开。

有资料显示，赵辛初等人尚未返回，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已在武汉传开。2006年10月24日北京日报刊登的《“四人帮”垮台消息如何由官方传到民间？》一文说：“武汉是较早知道的城市”，作家周而复8日黄昏时分“走到武汉市委附近的丁字形马路上，看到一条从未见过的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

刘仲余说他7日下午两点多钟就得到这一消息。其过程他在《坚苦人生》一书中有详细叙述：

我正在家里起草“寒城牛”文稿。武汉大学后勤热能中心主任吴金城（曾任武汉重型机床厂运输车间团支部书记），喜气洋洋，骑着自行车直奔我家而来。他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上楼进门就说：“江青昨天被

抓了！”我们当时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两人抱在床上打了几个滚，然后说，特大喜事，快买鞭来放。鞭炮一响，招来许多同事和朋友，聚集到我的家里。吴金城向大家讲：江青他们被关押起来了，消息来源可靠，崔建瑞（原武汉大学校长，吴金城的邻居，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刘道玉^①（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刚刚透露的。我们商量决定，要把大快人心的喜讯，趁早向江城人民传递。当晚，我和我们武重厂的蔡正厚、周柏金、陈炎臣，以及陈东、李建华、余开芳、谢大雄等同志，从我们武重宿舍出发，沿路在江城墙上、车上书写大标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四人帮”！深夜，公安的吉普车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我们通宵未眠。天亮后，我照常到岗上班，武重子弟中学林六十校长对我说：跑月票的老师早上上班看到满街有打倒江青的标语，问是怎么回事？我把真相告诉了他。他说，咱武重人真有胆量，写刷这个标语。十年“文革”的怨气久久积蓄在人们心中，那时的内心喜悦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我们感到扬眉吐气，精神焕发。不少亲朋好友不敢相信这个消息，从三镇前来交流情况，我又把钱益民同志（钱老是老红军，曾在湖北任职，“文革”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赴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告诉我的情况转告大家^②。

刘仲余说他们7日下午得到消息并于当晚在街头写出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奇怪的是与刘仲余联系密切的“工农兵”头头汪扬却是11日下午两点才得知，是湖北电影制片厂厂长张文甲去他家告知的。他当即组织“工农兵”成员“一夜未眠”地在三镇街头写标语。2002年他在回忆录中说：11日“造反派中极反动的先生们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也上街大喊大叫，为他们的主子呐喊招魂”。这可能是二十多年后“想当然”。汪扬上街写标语的行动比刘仲余晚了四天，约一个月后他举办的“一次奇特的家宴”，让省委书记韩宁夫“开心地笑了”，韩宁夫对俞文斌说“汪扬的家宴”“很有意思”。家宴邀请了俞文斌、杨道安等二十多人，开席时汪扬致辞：“菜肴有点政治意义……三只大脚鱼（甲鱼）是王张姚，母鸡是江青。……有三只大狗腿子，即是武汉造反派头目夏、朱、胡，他们是‘四人帮’的狗腿子，我们现在开始吃他们的肉解恨”^③。

① 崔建瑞、刘道玉当时都是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② 刘仲余、刘松余《坚苦人生》第82—83页，华龄出版社2009年版。

③ 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2、174—175页。

如果刘仲余等确实于7日晚在武汉街头写了大标语，周而复确实没有记错是8日黄昏看到那条标语，时刻关注形势变化的造反派头头不会10日深夜才得到消息，汪扬也不会于11日前一无所知。

顾建棠回忆：我、胡厚民、潘洪斌这三位省革委会常委及市革委会常委田学群都是10日深夜才知道“出了大事”。前一天，10月9日，湖北省革委会1968年8月以来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结束，历时6天。会议主题仍然是省委“转弯子”问题，在省革委会任职的群众组织代表，因支持造反派被排斥多年的老干部孙德枢（省革委会常委、原黄石市市委书记）、赵文华（省革委会常委、原恩施地委书记）和江涛（省革委会委员、武钢政治部主任）在会上发言。江涛说：“要把颠倒的阶级关系颠倒过来，把颠倒了的革命对象颠倒过来，把错误的组织路线纠正过来。省委要采取措施，一句话，从口头到实际真正地转（弯子）。”会议期间，姜一对顾建棠说：潘洪斌准备安排到省冶金局当副局长；郑军吸收入党后当团省委副书记；彭勋到省委宣传部或省教育厅，或任湖大党委副书记；夏邦银、谢望春进省革委会。胡厚民也有安排，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向大家通气的^①。（9月30日，宋侃夫对夏邦银、谢望春说，省委决定把“你们两个就安排在市里当副书记，过一段时间再说，因在省里要中央批。”^②）在这次全委会上，自批林批孔以来一直与两赵持不同意见的韩宁夫开始“转弯子”了。参加这次全委会的宜昌地区造反派头头、省革委会委员刘德光回忆：负责省革委会工作的韩宁夫首先检讨，他说：“我们在三个正确对待上是有问题有差距的，欢迎和接受同志们的批评、监督、帮助”^③。9日两赵从北京回汉，下午三时许，韩宁夫草草宣布全委会结束，他的“转弯子”也戛然而止。

当时对造反派头头的安排，并不是这些头头在自说自话、“阴谋策划”。赵辛初1976年11月9日在省直机关大会上说：“省委今年九月对省革委会部分常委作了安排决定，这个决定是有缺点有错误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现在宣布不算数。”^④王克文1993年1月证实：“省、市委曾答应给省、市革委会的几个常委安排实质性的工作”^⑤。

① 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08—309页。

② “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九：《谢望春的揭发、交待》（1976年12月11日）。

③ 刘德光《回眸——我经历的宜昌文化大革命》（2015年自印本）第255页。

④ 《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愤怒声讨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11月9日）。

⑤ 吴仲炎主编《丹心照玉宇——王克文纪念文集》第810页。

顾建棠回忆他10日深夜获知“出大事”的情况：

10月10日晚大约11点多钟，有人“咚、咚、咚”连连敲打我家窗户，开门只听一个神情激愤的年轻人说：不得了了，北京出了大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抓起来了。我说：不可能！毛主席才逝世，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谁敢下此毒手？你从哪里听来的马路消息？年轻人说：武汉军区都传开了，军区大院里像炸开了锅，小卖部的酒快卖完了，他们拍手叫好。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确实被抓了，是华国锋下的手。说完转身而去。

我当即骑自行车到省委党校找到在那里学习的胡厚民，宿舍里只有他一个人。胡厚民说：我还没有听到这个情况，但极有可能是真的。你看我这个房间里住四个人，他们三人都是省直机关的，今天晚上同时回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可能他们回去听传达。我与胡厚民商定：他先到潘洪斌家，我到市委党校找到田学群后一起去潘洪斌家再议。我到市委党校向田学群说明来意，田学群跟我一面走一面说：今晚奇怪，我这个宿舍里四个人，他们三个同时回家了，这三个人都是市直机关的老保，看来有问题。

在潘洪斌家我们四个人作了短暂的议论。我介绍了有人给我送消息的情况后说：事情不用怀疑了，这是右派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年后，蒋介石搞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斯大林1953年逝世，赫鲁晓夫1956年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隔三年。可毛主席逝世还不到三十天，尸骨未寒啊，华国锋就发动了政变。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就是打倒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是华国锋上台的基石，你华国锋打倒了文化大革命，你那个第一副主席还能站得住吗？可以断定他是短命的，螳螂捕蝉在前，还有黄雀在后等着你呢。田学群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他们怎么没有一点防备？华国锋这样搞，是对毛主席的背叛。胡厚民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应在毛主席追悼会后立即召开三中全会，右派想搞政变也难得逞，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华国锋突然把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两个政治局委员抓起来就是反党，实质是右派政变，是背叛毛主席。潘洪斌说：这是反革命右派政变，抓江青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党反革命。今后怎么办？胡厚民说：少说话，少出门，不接触，作最坏的准备。我补充：要讲话，就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调子讲。

这是一次特殊情况下的紧急碰头会，大家一致认为，反革命修正主

义集团必将彻底否定文革，对造反派必将血腥镇压，我们无力回击，只好各自善处。第二天即11日清早，我又向郭志伟、严常通报了这个消息。1976年11月后我们都先后被捕入狱。1983年我出狱时，郭志伟、田学群已不在人世了。

10月12日得到确实消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违纪违宪、叛党窃国的严重事件，是阴谋家、野心家发动的右派政变^①。

原二司武汉三中头头谢保安说，他是10月9日下午从李江处得知王张江姚被抓捕的消息，当晚就告诉了胡厚民。这个时间点得到多位当事人证实。10日深夜胡厚民对顾建棠说“我还没有听到这个情况，但极有可能是真的”，如果不是顾建棠记忆有误，极有可能是胡厚民不愿透露他前一天就得到消息，而消息来源于谢保安、李江和李迎希。

谢保安回忆：

1976年10月9日下午，一些原钢二司的老朋友在我家聚会，商讨为杨道远平反一事致党中央的信。李江突然来访，他带来了王张江姚被抓捕的消息。李江的父亲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没有谁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于是大家中断了原先的话题，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这个消息可以说如石破天惊，实在是太震撼了。有人脱口说出这是“右派政变”，还有人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所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去打游击。我当时感觉到，这是时局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性质和文革以来的历次挫折和反复是完全不同的，简单地说文革已经失败了。这是自毛主席去世以来在我心中隐约担忧的最坏结局，今后的路崎岖漫长，苦日子即将到来。我当时就感觉到不宜再说下去了，于是大家赶紧散了，并嘱咐大家回去以后也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

大家走后，我急忙赶到汉口洞庭街长江日报社邓国栋家，邓时任长江日报副总编辑，是武汉造反派高层的智囊人物，与我过从甚密，交往颇深。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后，他也非常震惊，但他还是怀疑这个消息的可靠性。邓作为一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对时局的变幻是非常敏感的，或许是他从个人感情上一时还难以接受这种巨变，他对我说：从这段时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口径还看不出来发生了这种事情，也许是政治谣言。他叮嘱

^①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09—312页。

我：不要信谣、不要传谣。邓说当下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联系夏邦银、胡厚民，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能尽快与他们见一面。

于是我赶到夏邦银家，向他讲述了李江传来的消息。老夏听后一脸惊愕，露出苦笑，摇头说不可能。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毛主席去世才几天，他老人家生前已经对后事做了周密安排，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党心、军心、民心摆在那里，华国锋毕竟是毛主席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他怎么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为了印证自己的话，他又一次对我讲起他在为毛主席治丧守灵期间，与杨成武相处交谈的情景（杨对夏说了许多忠于毛主席文革路线、拥护江青的话）。现在回想起来老夏真是个厚道人，都大难临头了，还不敢去相信政治野心家一旦疯狂起来会干出的那些丧心病狂的事。老夏对我告知的消息虽说是将信将疑，还是要我去胡厚民家通报一下这个天大新闻。

我赶到胡厚民的玉带村老屋时天已煞黑。他刚参加完省革委会全体会议回来。他原以为我是来打听会议消息的，没想到我一进门就急不可耐地把王张江姚被抓捕的消息告诉了他。老胡听得很认真，反复问我，李江是道听途说的，还是亲耳听他父亲说的？我只能如实地说，李江没有具体说消息的来源。老胡轻轻地念着四个人的名字，沉吟片刻之后，嘘了一口长气说，“终于来了”。我把去邓国栋和老夏家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对此消息真伪判断告诉了他，意在说明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权威印证。但老胡却说这恐怕不是谣言，他分析最近人民日报上不同寻常地提到“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杀气腾腾。还有这次省革委会全体会议热闹开场，草草收场，两个赵书记几天不打照面，连今天会议结束都没有出来应个景。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我那段时间和老胡接触频繁，主要是谈论落实“襄樊会议”精神，从组织上解决铁路系统对新干部（造反派）长期打击、压制、排斥的局面。几乎天天都要去向他汇报情况。但今天我们的谈话一句都没有涉及这方面的事。也许是胡厚民已经预感到天地翻覆、乾坤倒转，文革这一页即将成为历史。昨天我们还在抗争、还在争取的东西已经变得遥不可及，连谈论的必要都没有了。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没想到老胡突然转移话题，问我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27岁了。他接着问我谈了朋友没有，我告诉他没有。他不无感慨地说，是该谈婚论嫁、娶妻生子了。老胡还对我说，你要赶快回铁山列检所去上班，今后杜绝一切与人

的不必要来往，对人不谈前尘往事。他还要我带信给庞道铭（邮电学院二司头头），莫做冲动事，最好是能调回广西博白老家去。（庞道明的妻子是博白县的劳动模范、县妇联主任、县革委会常委。庞调回去有可能得到一些奥援）。老胡还要我见到黄石的柯林（黄石市造反派头头）向他问好。感谢他在“九大”时联络湖北各地的“九大”代表，仗义执言，为夏邦银、谢望春进入大会主席团、继而入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了大力。眼下大局已经改变，修正主义上台后，文革必将被彻底否定，造反派必将遭受残酷的镇压。今后要善自珍摄，多多保重，不要再“仗义执言”了。胡厚民最后还意味深长地交给我：自己身体不好，记忆力衰退得厉害，好多昨天的事今天就忘记了。今后如遇到专案审查，凡是涉及到和我在一起的事，不必躲躲藏藏，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只管如实交代，否则你也难得过关，所有责任都由我来负。

在后来漫长严酷的“揭批查”中，我接待了几百次外调，没有一次是胡厚民的主动交代给我带来的麻烦，包括这次我向他报告王张江姚被抓捕的经过。我这才理解了他为什么说自己记忆力不好。在这次见面中，我没有听到胡厚民慷慨激昂的话语，他对文革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而且，他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实事求是地鼓励战友们去勇敢地面对即将到来的艰难岁月^①。

10月12日晚，胡厚民在家里对肉联厂造反派头头谭光前等人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事情很清楚，实际上这是一场右派政变”。“以后你们再不要到处乱跑了，现在没有什么消息听，你们没有事，就坐在家里好好学习，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今后，你们在单位讲话，要表示坚决拥护，正面讲话。”“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难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13日，胡厚民在省委党校对省革委会常委邓金福等人说：“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说，右派可能利用我的一些话高举黑旗，左派可能利用我的另外一些话组织起来把他们打倒，右派政变长不了，赫鲁晓夫就没有好下场。路线斗争还有十次、二十次，我们年轻、看得出来。”^②

王光照大约是11号从谢保安处得到消息。他当时的心情是：

^①《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②夏朱胡专案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1977年4月）第84、88、90页。

整肃和清洗正等着我们这批投身文革、跟走资派斗了十年的造反派，那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压制不同意见的白色恐怖随时都会卷土重来，“二月逆流”的镇压，“两清”的“五不准”，随时都会变本加厉地重演，不晓得又该有几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面对可以预料的严酷清洗、整肃，“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怎么也提不起兴趣随大流朝那新庙顶礼膜拜。设若下作犯贱地去改换门庭，匍匐在地装孙子，新庙的方丈也不会“高抬贵手”为我剃度，到头来只会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那种“信庙不信神”的钻营投机勾当我做不来，也不愿做。我要坚守“信神不信庙”的立场，认得鼓眼的金刚，更认得坐地的如来。毛泽东尽管去世了，仍然是令人仰止的高山，任何人在他面前都会相形见绌，不说是一抔浮土，也总是等而下之。因此，我没有理由不信仰毛泽东而去信别的什么庙。

你们要打倒四人帮，要打倒文化革命和造反派，那是你们的立场和信念，你们“堂堂正正地”打出旗号来呀，给毛主席栽赃，编造“毛主席遗志”，这算什么本事，这种手法太过下流了吧？

信神不信庙，哪怕你这座庙金碧辉煌，哪怕那尊神被你们抹得再黑。这是对光明正大、实事求是的政治伦理起码的道德守望和精神继承^①。

一治的李开键“十分认真地向母亲、爱人、孩子说：‘我一定会二次入狱，可能被判刑。这是政变，不是反覆。’母亲听了十分伤心。”^②

在长江日报副总编辑邓国栋处，邓请夏邦银念了省委传达四人帮问题的记录后说：“我还以为听完传达后，就再也见不到‘夏委员’了啊！”夏邦银说：“不会，不会，‘四人帮’就是‘四人帮’嘛！华主席讲了的。我们又不是‘四人帮’。”“当然，思想准备总是要有的。”10月底、11月初，“工农兵”的广播车开到夏邦银所在的汉阳轧钢厂，夏听说朱鸿霞的办公室被砸，拿走一些信件，于是夏销毁了一些材料^③。

湖北省交通系统造反派头头、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傅廉回忆：“一粉碎四人帮，就有感觉，邓小平肯定要上台，我说华国锋是个华大茗，说他将来的下场还抵不上我们。这是开始宣布逮捕我的一大罪状，说这是

①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551—552页。

② 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8页。

③ 夏朱胡专案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1977年4月）第94、95页。

反革命言论。”^①

吴焱金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温和”态度，他回忆说：

我实在是一个在政治上太不敏感、反映太迟钝的人，我以为只要自己和中央那几个人毫无来往，文革中既无现实的犯罪问题，又无刑事问题，当局对我的处理充其量不过撤职受批判而已。和1967年6月24日被武装的百万雄师无端杀戮一样，这次我也没有做好挨整的精神准备。倒是一些经常挨整的同志事后告诉我，应该把他们想象得坏一些，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不管把他们想象得多么坏都毫不过分^②。

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说：10月8日中央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两项决定，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还提到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特别是“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这一句，明显有所指，引起敏感的人注意，觉得中央可能“出事了”。

13日，武汉市委将四人帮事件传达到全体党员。这一天，全市人民都知道了这一消息。这一天前后，无数个造反派的小型聚谈在举行，都认为“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华国锋是“叛徒”，都议论过“上山打游击”。在不久后开始的“揭批查”运动中，这些聚谈都被说成“黑会”。所谓“上山打游击”无一不是激愤之言，每一个“揭批查”专案组都心知肚明，却郑重其事地去调查“对象”做了哪些打游击的准备，策划上哪座山。1968年3月一中十几个同学去神农架搞上山下乡调查，被说成是为以后打游击“看地形”。

18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发[1976]16号）。通知说：他们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① 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傅廉）》，2009年。

^②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83页。

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斗争中，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等，要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

21日从北京开始，全国举行庆祝游行。10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29个大城市“几天来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数，就达五千万人”。“这几天武汉地区有二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庆祝游行。”22日这一天武汉地区集会游行的人数达130万。



“武汉市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湖北省委党史办资料）

张建华认为：“当时全国人民虽然感到震惊，但总的说来多数人还是拥护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华国锋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而且有毛主席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证据，人们因相信毛主席而拥护华国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大多数人确实对长时期的政治运动已经感到厌倦，希望和平与安定了。”^①

尽管当局一再宣称“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造反派都明白，他们的文化革命已经结束了。他们只希望1966年6至7月、1967年3月至7月、1969年至1973年的痛苦经历不被重复，只希望华国锋10月8日“无论如何不能打击一大片”的诺言能够兑现，得以逃过此劫。

^①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449页。

第三节 “工农兵”先行出手抓人

夏邦银对邓国栋所说的“‘四人帮’就是‘四人帮’嘛！华主席讲了”，应该就是省委传达的华国锋的讲话。华国锋10月8日晚是这样说的：“四人帮，就是四人帮，我们的广大干部、工人是好的，无论如何不能打击一大片，就是给他们办点坏事，说过错话，一律不追究。”同时他还说：“要讲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解决正确对待的问题，不要因为四人帮揭露了，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搞到一起，搞四人帮不是因为他们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是篡党夺权。”“出林彪，就抓小林彪。出邓小平，就抓小邓小平。浙江为什么出问题？就是层层抓小陈励耘，我们不能学他们。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思想路线来办，要历史的辩证的看问题。这一次也不能层层揪，你揪过去，他揪过来，人都揪完了。”^①华国锋这个讲话10月18日后传达到群众，影响很大。夏邦银就相信，认为情况不是很坏，不少造反派也是这样想，所以基本没有出现激烈的对抗行为。也有人不相信华国锋的话，比如胡厚民，但造反派组织早已解散，也不可能重新组织起来，对即将来临的“最艰难的风浪”无法抗拒也无法躲避，只能“迎接”，经受“考验”。

得知四人帮被逮捕，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头头在被“工农兵”绑架前，无数造反派成员在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前，除了小范围议论外，基本没有对抗当局的行动。李开键回忆：“由于我早有‘二进宫’的思想准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几个月中，我不是紧张，只是等待，等待他们自上而下地动手。”^②

1968年底分配到云南省电力局水电三处的丁家显，把造反派普遍议论的“上山打游击”付诸行动，为此事还来过武汉：

丁家显在云南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断定这是一场反革命的右派政变，并且决意要奋起号召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与之抗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捍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因为当时云南的革命造反派还处于掌权状态，于是，他就到罗平县公安局找局长，到县里找县委书记，动员他们组织武装进行对抗，必要时上山打

^① 《中央领导人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讲话（1976年10月8日晚）》，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10年第三版。

^② 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9页。

游击，先保住一个地方也好。星星之火，必将燎原。他还特地到曲靖军分区动员军队一起参与，但他没有找到人，只得作罢。

1976年10月，他到武汉，想在那里组织力量进行斗争，只要上海有行动，武汉就跟进。但他在武汉得知上海的革命派已经覆灭，感到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于是就回到了河南邓县老家，静观其变^①。

如汪扬所说，“‘四人帮’倒台后一个多月，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对造反派头头未采取任何法律行动”^②。

10月14日，赵辛初在对全省人民的广播讲话中说：据我们了解，湖北的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在政治思想方面受的影响可能要比我们大些。

22日，在湖北省、武汉部队、武汉市“欢呼粉碎‘四人帮’”的集会上，赵辛初发表讲话：

我们在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一切行动要听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我们要把仇恨集中到“四人帮”身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在“四人帮”的欺骗和影响下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尽快觉悟过来，同“四人帮”划清界线，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自己的立场，迅速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在揭发“四人帮”的斗争中要认真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切实执行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的方针，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③。

10月30日至31日，武汉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强调：

要坚决遵照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一切运动听从党中央指挥，整个运动一律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采取有力的措施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要注意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提高警惕，坚决打击阶级

^① 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612—613页。

^② 汪洋《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9页。

^③ 1976年10月23日《长江日报》第4版。

敌人的破坏活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①。

“工农兵”及“寒城牛”等对省市市委还在作一般号召，迟迟不对造反派采取“法律行动”极为不满。

陈世清所在单位党委在一份表彰他的材料中写道：四人帮被抓不久，陈世清“整理了‘四人帮’在湖北、武汉的黑干将夏、朱、胡、张……和公司系统帮派骨干刘祖富等人的大量材料，不顾家里平均只有十四元钱的生活水平，自筹路费，强扛病体，不远千里，两次上北京向无产阶级司令部送材料”。不久，“眼见反革命分子夏、朱、胡、张等人的反革命罪行没有被立即清算，‘四人帮’在湖北、武汉的流毒没有得到彻底肃清，他心急火燎，他又汇集战友，上北京，到省委，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省委汇报湖北、武汉地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的新情况。”^②

“工农兵”、“寒城牛”一方面大量张贴要求清算造反派头头的大标语、大字报，一方面自行抓人。汪扬回忆：

“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武昌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对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办学习班。董明会由市建工局为主抓起来办学习班，交待问题。其目的有三点：1. 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牵连的人和事；2. 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 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不久他们纷纷落网^③。

李承弘回忆：“工农兵”抓的第一个造反派头头是沈复礼，其原因是沈复礼所在的武汉锅炉厂的造反派1976年10月初在武昌主要路段写了几条大标语，矛头指向“湖北复辟总根子、老后台李先念”^④。实际上攻击李先念的舆论1976年10月前就出现，参与者也不限于武锅的造反派。武汉市委1976年12月公布的一份材料中说：“（1976年）三月三日，夏邦

① 1976年11月4日长江日报第1版。

② 中共湖北省武汉市医药工业公司委员会《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陈世清同志》（1977年12月29日），载湖北文革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三辑）》（2002年）。

③ 汪洋《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9页。

④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95页。

银就布置武锅的人，写攻击李先念副总理的大字报。三月八日，朱鸿霞在武重搞了一个二十条的‘口号报’，恶毒诬蔑李副总理。三月十一日，沈复礼等人在武昌中南路刷出了攻击李副总理的大标语。自此以后，什么‘擒贼先擒王’、打倒湖北的‘太上皇’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标语充斥武汉三镇，……三月三十一日胡厚民在市建设局三公司礼堂召开的集会上进一步狂叫，大肆攻击李副总理。吴正斌、聂年生等也跟着鼓噪……他们还狂吠，要揪湖北的‘总后台’”^①王光照说到：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武锅造反派在武昌傅家坡刷写了两条大标语：“李木匠是湖北问题的总根子！”“李木匠不检讨，我们就打倒！”^②赵辛初1976年11月9日的大会讲话也提到：“沈（复礼）在今年四月间公开贴李先念副总理的大字报，那时候武汉这类大字报满天飞。”^③

王光照2019年回忆，沈复礼并没有参与写攻击李先念的标语，事前也不知道，是武锅写标语的人在标语落款处自行加上沈复礼的名字。受审查时沈复礼一力承当此事。后来他对王光照说：“我是武锅造反派挑头的，理应承担后果而保护同志。”

汪扬分工抓董明会并给董办学习班，他回忆：

1967（应为1976）年冬夜，……建工局陈昌文、占耀球、张子华为首带领20余名同志，乘一辆中型汽车，开到市委对面的书记大院门口停下，我和张厚德、周德昌参加了这次行动。进门时被部队警卫人员阻止，我们说明情况后，他们还帮助我们并介绍董明会住的这栋楼的结构，一楼是地下室车库，二楼是会议室，三楼为卧室。……小张爬上屋顶，董就藏在气窗檐下缩成一团。我们对他讲明情况交待政策，他顺从地从家出来上了车，到了建工局把他交到保卫处。

我们押董明会的汽车到市建工局不久，警司开来了两部小车，要求我们把董交他们。经我们说明情况，车开走了。

（董）交待问题比较实际，不转弯磨（抹）角，由于文化低写字有困难，就采取他交待问题，我作记录，我记下来的草稿交他抄写出来，成为他交

^①中共武汉市委材料组《“四人帮”指使和支持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在湖北武汉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材料》（1976年12月）第5页。

^②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475—476页。

^③《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愤怒声讨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11月9日）。

待的笔迹。他交待的问题有：1.有“四人帮”插手操纵湖北武汉的问题；2.有造反派在武汉打、砸、抢、抓、抄干坏事的真相；3.有省市个别领导支造的一些事实。

董明会在学习班交待有二本材料，后来复印装订成册，我亲手交到省委办公厅。

我们办的造反派主要头头学习班结束前，对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董明会、李湘玉等在全市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辆车，大长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后把他们移交专政机关^①。

“移交专政机关”前，“工农兵”在武汉体育馆“召开斗争这些黑干将的大会”^②。

1976年11月19日，“工农兵”冲进一冶党委办的“五不准”学习班，殴打这一天进学习班的曹承义，逼迫他“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并准备第二天把他拉出去在全市游街。曹承义半夜乘乱逃走^③。

11月19日凌晨，原百万雄师总站常委、汉口铁路医院职工孙德洲带人将谢保安从家中抓走，关进人防工程地下室。谢保安在这个他所称的“民办学习班”里被关了48天后，转到武汉铁路局党委开办的“官办学习班”。7个月后，转到武汉铁路公安看守所关押两年^④。

省革委会常委、国棉一厂革委会副主任王屏，省航运局革委会副主任傅廉，分别被本单位原百万雄师成员绑架、关押。王屏在关押期间遭到殴打^⑤。

11月19日至12月1日，杨得志、赵辛初、张玉华、姜一、赵修、韩宁夫、王克文、宋侃夫等应召到北京，“汇报‘四人帮’插手湖北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和清查、揭批工作的安排”。湖北省多位负责人这一次赴京汇报、接受指示历时12天，其原因是“湖北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中共中央十分关心湖北的揭批斗争”。“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听取汇报后，要求省委加大领导力度，纠正一些地区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和行动迟缓的现

① 汪洋《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9—181页。

② 参见汪洋《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247页。

③ 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69页。

④ 参见《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年）。

⑤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17页。

北的重要指示，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新高潮的意见》，提出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湖北、武汉地区的实际，对夏、朱、胡等人进行揭发批判。13日，市委召开20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24日，市委召开全市广播大会，“揭批‘四人帮’在武汉的主要骨干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反革命罪行”^①。

至此，“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武汉的帮派体系”的运动展开。

^①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80页。

第二十九章 “揭批查”运动

第一节 “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

10月6日逮捕四人帮后，在西山叶剑英住处连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华国锋的这一号召“已经深入人心”。

1976年底，局势大体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解决问题”的“揭批查”运动在全国展开。所谓“揭批查”，即是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和反革命罪行，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12月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宣布要经过“三个战役”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当前的战役是集中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

中共中央以分三次下发的中央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作为每一战役开始的标志和揭发、批判的内容。

这三个材料分别于1976年12月10日、1977年3月6日、1977年9月23日下发。

《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记载了武汉地区“三个战役”的一些情况：

1977年1月开始，全市打响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一战役，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肃清其流毒。市委……采取了一系列方法措施。第一，广泛召开揭批“四人帮”群众大会，进一步扩大揭批斗争的声势和影响：到4月底，全市共召开揭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大会12万多场次，参加者达843万人次。武昌

区专门组织成立“千人讲师团”，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街道、工厂、学校，讲批850多场，听众达数十万人次。第二，开办各种培训班、学习班、研讨班，学习中央文件，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思想认识水平。市委率先开办全市党员干部学习班，组织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各区、县、局及直属企业纷纷开办各式各样的学习班、培训班。随后，理论学习组、自学组等遍地开花。到3月初，全市有三结合理论学习小组1万多个，自学小组3.3万余个，政治夜校和工人大学政治学习班9600多个，培训了19万多名理论学习骨干。到4月底，各种学习班、培训班达到7万多个，参加学习人数达178万多人次。第三，召开经验交流会，交流揭批的措施方法。1月下旬，市委召开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交流大会，三五〇六工厂、武汉第一皮鞋厂、市公安局等单位在会上作经验交流。第四，组织工作队到基层单位指导揭批工作。截至1977年2月底，市委从各机关中抽调1996名党员干部组成318个工作队，到各工厂、企业、街道、学校指导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市郊区也抽调4264名党员干部组成322个“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到农村组织开展揭批斗争。江汉区抽调218名干部，深入到45个单位驻点，以点带面，指导和帮助揭批斗争。第五，各系统各战线召开群众大会，开展揭批斗争。1月25日召开整顿公共交通大会，3月11日召开工交、城建、计划、科技系统所属的工厂企业干部大会，4月19日召开全市组织工作大会等，这些会议无一例外地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作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5月中旬，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入到第二战役，主要是联系实际，广泛开展“三大讲”活动，大讲“四人帮”横行之时党受其害，国受其害，厂受其害，身受其害的深仇大恨；大讲同“四人帮”针锋相对的经历；大讲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和体会。

根据要求，各单位积极发动职工群众，组织揭批斗争。武汉轧花厂采取一事一诉的方式，人人开口，个个发言，控诉“四人帮”及其干将破坏生产的罪行；葛店化工厂结合实际，列出五个专题，清算江青集团的罪行。为了深入推广“三大讲”经验，7月28日，市委在武汉剧院召开“三大讲”经验交流大会……。

10月6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底》的社论，指出揭批“四人帮”已经打过两大战役，“现在要乘胜前进打好

第三个战役”，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10月7日。市委成立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负责揭批和清查“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帮派体系。随后，市委重点对“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骨干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各级党委组织部门也先后成立了相应的工作小组，对本系统本单位的帮派分子进行系统清查。

10月29日，市委召开有30万人参加和组织收听的“愤怒控诉“四人帮”在湖北武汉地区的黑干将的反革命滔天罪行”的群众大会，进一步动员全市人民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掀起揭批“四人帮”斗争第三战役的高潮。

11月初，市委专门工作会议强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各项工作的纲，各级党委对此一定要明确，要十分坚决。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大学习、大批判、大清查结合起来，继续抓紧清查，清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清查与揭批结合起来，专门班子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强调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揭批斗争当作全党的大事来抓。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斗争中，市委重点从三个方面推进：一是继续开展“三大讲”活动，但内容变为“讲路线、讲党性、讲团结”的新“三大讲”，深入揭批“四人帮”“大搞资产阶级路线，大搞帮派宗派主义，大搞分裂主义”。二是加强媒体舆论宣传作用。11月9日《长江日报》发表《打好第三战役，夺取更大胜利》的社论，提出打好第三战役，必须抓住“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一纲领，狠揭猛批；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狠狠揭批“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干将及其帮派体系的罪行和谬论；继续开展清查工作，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影响，把他们搞乱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以争取第三战役的完全胜利。从11月12日起，《长江日报》连续刊登《一面“改朝换代”的黑旗——“四人帮”及其在湖北黑干将鼓吹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谬论选批》（之一到之四），进一步揭露“四人帮”在湖北武汉地区的帮派分子的罪行。三是逮捕和起诉“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帮派骨干分子。11月下旬，省委决定对“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主要帮派头目实行逮捕，经市公安局侦查预审后，提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同时，发表《不停顿地向资产阶级

帮派体系进攻》等文章，指出第三战役的中心和主题就是不但要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彻底清算“四人帮”的罪行，而且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政治纲领、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号召要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乘胜前进，除恶务尽、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①。



载 1977 年 11 月 30 日长江日报

从 1976 年底到 1979 年初两年多的时间内，“三个战役”各有中央制定的不同目标，有一个目标贯穿“三个战役”始终不变，即清查造反派，中共中央称之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②。早在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在西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就提出：“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③此后，难以胜数的文件、社论、报刊文章号召“彻底摧毁‘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人和事”。

①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 621—627 页。

② 1977 年 7 月 23 日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

③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电子版 2017.2 版）第 790 页。

第二节 遍设“五不准”学习班

1976年11月19日至12月1日湖北省委、武汉军区负责人赴京汇报期间，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指示：“在湖北，联系实际，可以揭发批判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这三个人。你们省委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打人民战争，不要小手小脚。”^①

湖北省委接受批评，大张旗鼓、放开手脚地发动对造反派的清算。

在“两清一批”运动中曾担任全省“两清”领导小组组长的张玉华，回到省委工作，担任全省“揭批查”专案核心领导小组组长。1973年11月撤销的各级“两清”专案组迅速恢复，专案组名称变了，“骨干”、“对象”大体不变，一直保存的大量“两清”专案材料大体可用。曾任省委政法委秘书长的谢杰民“两清”时任省“清查办”工作人员，“负责‘新派’的清查工作”，抓捕四人帮后又成为省“‘两案’（即林彪、江青专案）办公室”成员^②。2000年他对顾建棠说：1969年“两清一批”开始，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湖北省整治反派的专案组从来未撤销过，那些“两清一批”的材料，又成为整治反派的依据^③。

12月2日，夏邦银、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在全市游斗。3日夏邦银、董明会、李想玉在汉阳区游斗。5日，省委在武汉体育馆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夏邦银、董明会、朱鸿霞、李想玉、谢望春。

12月8日，省委决定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实行隔离审查。实际上7日晚朱鸿霞已经被隔离。

此前，11月9日，赵辛初在省直机关揭批四人帮大会上检讨自己10月14日的讲话“有缺点错误，同志们批评，我表示欢迎并决心改进”，同时宣布“省委决定办夏邦银、朱鸿霞、沈复礼三人学习班，要他们彻底交待揭发与‘四人帮’插手湖北的阴谋活动”。11月11日董明会、谢望春、胡厚民、张立国、李想玉、沈复礼关进“五不准”学习班。随后，省委第三次决定进“五不准”学习班的人员，有龙铭鑫、高玉泽、谢华之、方保林、王屏、邓金福、郑军、魏绳武、徐筱芳、田学群、林子忠、潘洪斌、傅廉、赵文成、薛存元、曹承义等60名省、市和企事业单位革委会成员。

^① 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1976年12月4日印《中央领导同志同湖北来京负责同志的谈话》

^② 参见谢杰民《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2000年11月27日），载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87—390页。

^③ 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70页。

11月29日，李想玉被隔离审查^①。

12月12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实行清查与揭批相结合、发动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深入揭批‘四人帮’在湖北的帮派骨干，把他们所犯罪行全部揭露出来，使群众看清他们是如何上挂‘四人帮’、横联‘四人帮’死党、下靠帮中兄弟的，以便彻底铲除其帮派体系”。1977年2月8日，省委“要求全省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把深入开展揭批查作为1977年的中心工作，作为当前统领各项工作的纲。”^②

按照省委要求，各单位清查专班——清查办公室、专案组陆续成立，所谓“帮中兄弟”——各单位造反派头头、骨干分子被关进“五不准”^③学习班。大量原保守派成员、“积极分子”脱离工作岗位，担任学习班“骨干”，进行外调、值班看守、“攻心”、“打态度”、分析“案情”、整理材料等工作。1977年7月调任湖北的陈丕显回忆：“在学习班工作的人员也较多，平均是三四个人对付一个人”^④。

与造反派对立情绪较大的“骨干”认为大局已定，造反派永无再起之日，在学习班里整人毫无忌惮。

这些“五不准”学习班在1978年春节前夕大多改为“走读”学习班，即“对象”们晚上可以回家。“对象”如果后来被判刑，“揭批查”学习班连同“两清”学习班的“五不准”期限，可以一比一折抵刑期。如1990年9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武法[90]刑再字第37号）显示：原审被告胡厚民“1969年10月5日至1970年5月31日办过五不准学习班”，准予折抵刑期。

造反派的罪名从两清时的“五一六分子”“北决扬分子”“帝修反的别动队”“不安定因素”改变成“四人帮死党”“四人帮余党”“四人帮的黑干将”“帮派体系”“帮派骨干”“帮中兄弟”，造反派的“总后台”

①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14页，夏朱胡专案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1977年4月）第99页。

②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第377页。

③ 何为“五不准”，在“两清”时期、“揭批查”时期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陈丕显《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载《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8期）一文，提及他1977年7月来湖北时了解到，“学习班基本上搞的是‘五不准’（即不准回家，不准通电话，不准会客，不准通信，不准互相之间交头接耳）”。

④ 陈丕显《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依次从刘少奇、陈伯达、林彪最后变成四人帮。

“对象”关进学习班后，专案组立即抄家。小报、传单、小册子等文革资料，对象自己写的文字如笔记、日记、底稿等，对象作过批注的书籍、报刊，一律抄走，由专人从中细细搜寻罪证、有利用价值的线索等。

武汉制药厂的“清查对象”、28岁的女工段夙慧被抄家，专案组要她本人领着去。专案组一成员找到一本抄录诗歌的笔记本，发现第一页抄着鲁迅诗《自题小像》，问段夙慧把这首诗写在第一页是什么意思。段夙慧反问“那你说我应该把它放第几页？”专案组成员说：“我不管你放第几页，放在这里，就有问题！”专案组还抄走文章底稿等资料，“以后的清查确实问到了这些资料涉及的所有人”。当时她家板壁的夹层中，还藏着她手抄的鲁迅这首诗，和剪下的一绺头发放在一起，专案组没能抄出来。那是毛泽东去世、大清查开始的时候放进去的。段夙慧在自己的纪实性小说中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没想到这个轩辕不需要我的血。”^①

学习班一开始，主要追查“四人帮被粉碎”后的活动，包括“开黑会”、商量“应变措施”；追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恶毒攻击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言论。如同文革初期“五十天”里当权派热衷在群众中揪“三家村”，这一次喜好到处揪“四人帮”。一治设备处揪出李开键等“四人帮”^②，武汉市公安学校造反派头头、当时在武汉汽车齿轮厂当工人的王登富，名列武汉汽车齿轮厂、武汉汽车工业公司、武汉市机械工业局、武汉市公检法系统的四个“四人帮”之中，“揭批查”时“就在这几个单位、系统轮换着被批斗”^③。

后来中共中央提出“清查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大案要案”，一再强调“除恶务尽”，造反派及其在文革中的所有行为都被说成“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十一大政治报告说清查这些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于是，文革开始以来，抢当权派拒不交出的整群众的材料、按中央“武装左派”指示获得枪弹、抵抗百万雄师的武装进攻、定期一起学马列等，被逼迫按照“抢夺公文、档案”、“抢枪乱军”、“制造武斗”、“组织反革命地下组织”等罪名交代并自我批判。学习班里的“对象”经常被带出去出席

^① 参见夙愿《日记1978—1979》第308—309、208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7年版。

^② 参见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9页。

^③ 王登富《我和武汉新公校》第37页。

各级批判会，低头站在台上接受批斗。声讨、批判四人帮和其他“帮派分子”，“对象”们也要在台上低头站着“受教育”。

关进学习班的造反派都和李开键一样明白，“这是政变，不是反覆”，造反派今生没有了翻过来那一天。像胡厚民那样不认罪、不屈服的人是少数，乱咬乱攀、出卖别人也出卖自己的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希望老老实实“说清楚”后得到“宽大处理”。

与两清时的学习班一样，揭批查学习班屡屡发生自杀事件。原三司革联头头、武汉市精神病院医生徐筱芳，1977年在市卫生学校的学习班里跳楼自杀，当时她的孩子两岁，丈夫林子忠关在看守所里。原二司政参部情报组成员李莉，1978年7月受审查时自杀。支持造反派的市二医院党委书记王某，1977年10月初在东湖疗养院的学习班里用刀片割开大腿动脉血管自杀，当时他的住房里挂满大字报。武钢电修厂检修车间工人胡卜家因议论“宫廷政变”问题被追究，1977年12月9日在学习班跳楼自杀。

1977年7月10日，市委组织部在《长江日报》上发表题为《从组织上彻底摧毁“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一文，文章指出，“四人帮”的帮派分子人数虽然不多，但体系完整，能量不小，形成了“四人帮”在湖北武汉地区的帮派体系，其目的是要篡党夺权；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是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重点内容之一。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穷追深查，不仅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把“四人帮”在湖北武汉地区的帮派体系批倒批臭，而且还必须从组织上彻底摧毁。

1977年11月28日，省委、省革委会召开全省广播大会，宣布将“‘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反革命分子”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撤销朱鸿霞的一切职务。会上陈丕显宣布四人“由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依法逮捕”。

29日，湖北日报发表社论《除恶不尽，绝不休战》说：“要除恶务尽，就要把大批判和大清查有机地结合起来。”“目前，我省的清查工作并没有做完，必须继续抓紧”。

12月20日，武汉市委召开五十万人参加的揭批大会，会上“宣布将‘四人帮’在武汉的重要骨干董明会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撤销吴焱金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并由司法机关将他们逮捕法办。”^①

^①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大事记》第283页。



“1977年11月28日，省市领导参加揭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大会”（载次日长江日报）

文革中进入各级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头头被驱逐的同时，一批从基层提拔起来的非造反派的工人、农民（多为劳模），也被舆论说成“火箭式干部”，也被请出权力机构，或回原单位干老本行，或降职使用，例如著名全国劳模、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马学礼。

马学礼是与“钻头大王”倪志福齐名的“刀具大王”，名副其实的华中工学院本科毕业生。他也不是“火箭式干部”。1957年7月赴苏联学习一年归来，同年10月任武重工段长、技术员；1966年5月任武重工艺科党支部书记兼科长；1971年初任武重一分厂厂长，同年2月任武汉市委常委；1972年5月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总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副总指挥长；1973年2月任武重党委副书记，同年6月任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常委；1976年7月在省委宣传部主持工作。文革中他倾向保守派，从未参加任何群众组织。马学礼1978年4月被降职使用，调到武汉汽轮发电机厂任党委副书记。

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经土崩瓦解。绝大多数地区和部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基本查清”。

“揭批查”运动中被清查、清查后被施以各种处罚的人数，湖北、武

汉官方的相关出版物说法不一，且都有不尽不实之处。

例如《武汉市志》记载：1979年全市性群众揭批“四人帮”运动结束后，全市各级党委、纪委认真贯彻中央对“两案”（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从1980年到1983年，对受审查人员的定性处理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多次复议、平衡，全市拟定性结案处理822人，占运动中立案审查人数的22%”^①。

按照上引《武汉市志》的记载推算，到1979年，武汉市立案审查人数为3736人。区区三千多人，与亲历者的感受相差太远。陈丕显在写于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到1979年底，全省共清查对象27868人，查清26217人，其中80%的人得到解脱。”^②湖北省会武汉市的清查对象仅占全省的13%，这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

以武汉锅炉厂为例：

1986年，武汉锅炉厂党委宣传部编了一本《武锅建厂三十周年纪念》，时任该厂党委书记何汉香撰文说：“揭批查”中，我厂清查对象有四百多人，重点学习班二十多个，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清查对象有四百多人”，占武锅职工总数几近十分之一^③。

湖北全省给予各类处罚的清查对象，按照陈丕显上述说法推算，共有5243人。（陈丕显所言“其中80%”之“其”，不知是指“清查对象27868人”，还是指“查清26217人”。姑且取较小的数字。）这又与官方的另一说法差距甚大：《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说：“八十年代整党前，全省通过‘揭批查’和‘两案’审理，基本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对‘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人处理8000余起。”^④

胡耀邦在“揭批查”高潮时曾表示：全国审查已经关押了上千万人，超过国共内战800万人^⑤。按此做最保守的估算，湖北省被司法拘留、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的人约为三四十万。

2006年9月9日，谢望春、杨道远、顾建棠等人在写给胡锦涛的信中说：“湖北省在‘两案揭、批、查’中严酷惩罚造反派96个月，受害人29127名。”

①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1980—2000）·第五卷政治（上）》第75页，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丕显《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③ 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636页。

④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第378页。

⑤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电子版2017年2月版）第1302页。

下面列举武汉地区几个“揭批查”学习班的情况。

一冶设备处造反派头头李开键的学习班

李开键在回忆录在讲述了他从进学习班到进监狱这一段的经历：

我的学习班以我为“对象”，另有16名精选的“动力”来“挽救”我，白天令我睡觉，晚上8点开始让我交待问题。由于我不“老实”，在夜深人静的办公楼里，很远都会听到他们的吼声、骂声。令我交待的内容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如“交出篡党夺权的人员名单”，“设备处二十几个革命群众被打，其中三人重伤，你是如何策划指挥的？”“四人帮倒台后你是如何策划上山打游击的？”

我的这个“学习班”，……每天从晚8点到次日凌晨4点，由16个人轮番上阵，我根本无法休息。他们把衣袖撸到上臂，手握拳头，在我眼前挥舞着：“李开键，你这个家伙黑心烂肝，从里黑到外，你他妈的压根就不配做人，老子们可以揍得你灵魂出窍，你信不信？”我立即答：“信。”“你个狗日的，这倒答得蛮快。”污言秽语的辱骂，人格的践踏，疲劳战术，几乎可以令人崩溃。我每天无法入睡，他们拿来安眠药，吃了方能入睡。最后只追查我两个问题，一是篡党夺权班子名单，二是上山打游击一事。所谓“班子名单”指的就是朱天榜、吕成利曾向我表示安排我进处领导班子的的问题。我应该保护这两个曾经倾向过造反派的老干部，我讲再多真实的话，这帮人渣仍然会以整死我、再踏上一只脚为快。

后来我出狱后，回武钢设备处工作，吕成利调任一冶党委组织部长。1982年的一天下午，我与吕成利在红钢城九街坊相遇，他热情地与我握手，并拉着我一定要到他家吃饭。我因晚上要去夜校讲课，谢绝了。吕成利诚恳地说：“开键，你是冤枉的，你很正派。”“造反派都是君子，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造反派。”我笑着答道。

1977年9月24日下午1点，在设备处库区可容纳200人的空库房内，一冶公司开大会批斗我，三个选定的发言人先后上台，历数我的罪行：反革命坏头头曹承义的得力干将，破坏设备处文革的首恶；幕后策划打伤革命群众17人，其中3人重伤；配合反革命坏头头曹承义篡夺一冶党政大权；破坏一冶的革命和生产；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要上山打游击……最后结论“将五毒俱全、罪行累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开键交公安机关逮捕法办！”

下午4点，我被押到青山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姓陶的所长打开三监号门。多么熟悉的地方，7年前在这个监号的情景如在眼前。……

1977年9月25日，……我被几名身着警服的人带出看守所，押上囚车，来到厂前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工地剧院后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百万雄师头头陈百桥和一名干警将我反架双臂，推上舞台。台下座无虚席，连走道和大门外都挤满了人。我被人强力压成九十度弯腰。不时有人用力踢我，同台被批斗的还有余金岭。只听到讨伐者们的慷慨发言，内容皆是我多年来听腻了的陈词滥调。我的脚下四周早已被汗水浸染湿透。我的腰已不是自己的了，没有丝毫感觉。台上的我急切盼望尽早收场。3个多小时过去，在“打倒李开键”的口号声中，我被拖到后台，推入吉普车。车内坐定的3人挥舞拳头劈头盖脑地向我袭来，我的口鼻满是鲜血，一路打，一直打到青山公安分局看守所门口。陈百桥令我蹲下，我的手被反铐着，陈百桥穿着皮靴，以正面对准我的胸膛飞起一脚。我被踢了个后滚翻。几乎闭过气去，怎么也立不起身。此时看守所老李所长（一个正直、厚道的老公安，我第一次入狱时遇到的就是这位所长）正好出来接犯人，见我面色苍白，口鼻流血，当即大怒道：“怎么搞的，把人搞成这样？早上我跟你们打过招呼，要照原样把犯人送回。现在我不能收监，你们治好了再送来。省公安厅下的逮捕令，我这儿是代押，谁负得起这样的责任？”陈百桥见状，急忙将老所长推进了办公室，约半小时后，李所长才愤愤地走出来，把我和余金岭送回各自的监号。晚饭时，李所长差人给我送来了一大碗面条和一小瓶红药水、一包棉签。我对这位老公安一直心存感激之情。

1977年的秋天，不同于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个秋天。因为伟人已经逝去。反对派对他的清算是彻底的，继中央夺权之后，矛头直指毛泽东的追随者，酷似解放初期的“镇反”与“肃反”^①。

李开键2009年说：“至今我也不知所谓‘五不准’的具体内容，实际感受到的就是囚禁。”“我的这个‘学习班’，……比后来在监狱的境遇更恶劣，在‘学习班’里人的精神、人格受的摧残是监狱里受到的摧残所无法比拟的。”^②

^① 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9—272页。

^② 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69页。

工造总司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焱金的学习班

吴焱金 1977 年 1 月 5 日进入市革委会办的“学习班”，比夏、朱、胡等人晚。此前他为逃过“工农兵”的绑架、游街，四处“避难”四十多天。

吴焱金的学习班由市委机关一位处长主持，副手及学习班骨干全是“由城建系统抽调的原百万雄师骨干”。

当时，他的父亲已确诊身患癌症，妻子因大量吐血被初步诊断为肺癌（后确诊为大叶性肺炎，吴焱金四个多月后才知道），这些都不能成为免除或推迟隔离审查的理由。

吴焱金和很多“清查对象”一样，从学习班直接进入监狱；不一样的是这期间有半年是在病房里给他办学习班。

吴焱金 2009 年回忆：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并不害怕也毫不回避交待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问题。我跟办学习班的人讲，我一没有现行反革命言行，二同“四人帮”没有交往和组织联系，三没有任何刑事问题，四是我从没有搞过抢枪武斗，五是我十年来没有迫害任何一个老干部，相反很多市里的老干部曾受到过我的保护。因此我自认为这次过关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谁知这些人抓不到令我害怕的问题，便变着法子想要置我于死地。在召开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以后，专案人员就开始从我逃走 40 天外出避难的问题开刀，逼着我交待这些天是和哪些人在一起串连的，是如何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如何恶毒攻击党中央、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本来外出避难 40 天，啥事儿也没有干过，但我不能交待出来，我不能牵连拼命保护过我的无辜的人们，……我以此事与本案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外出避难 40 天的问题。我越不肯交待，专案人员越发认为抓住了要害，认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于是就死死揪住不放，搞车轮战，日夜逼供，直至我失眠，精神崩溃。

由于我失眠，有一天夜间起来上厕所，无意中听到在谢滋群办公室里专案人员在商议：“他的态度如此顽固，干脆把他丢进去算了……”下半夜我一刻未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们要把我丢到哪里去？还有比这里更恐怖的地方吗？”我想起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为营救王锦铭去过的武汉市第一看守所，看到那里的可怕景象，难道是要我也去做丧失自由和尊严的阶下囚吗？士可杀，不可辱。不自由，毋宁死。这些中外名言

在脑中盘旋。想到父亲身患癌症，妻子患绝症正在住院，想到我愧对的六二四死难烈士的冤魂……我决心不惜一死，抗议这非法的所谓学习班的“隔离审查”，保全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将文革的一切留待历史评说。第二天，1977年5月22日午睡时间，我照例睡不着觉，而看守我的人则全部进入了梦乡，我感觉机不可失，起身走出房间，翻爬到楼顶上。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从瓦上一阵助跑，纵身往下一跳，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时已躺在武汉市第二医院的病床上，脚上打了钢钉，上了牵引，腰不能动弹，大、小便失禁，据医生说，晚送来十分钟就完了。

病床立即成了戒备森严的学习班，隔离审查继续进行。因胸椎和腰椎粉碎性骨折，导致尾骶骨以下丧失知觉，大、小便严重障碍，完全吃不下东西，专案组不得已将我大病初愈的妻子叫来病房处理我吃喝拉撒的麻烦事。后来妻子回单位接受审查，专案组又出新招，将我患胃癌的父亲叫来病房处理这些特别护理的杂事。我每天的检查交待、接待外调还需照常进行。……在医院里，专案组的人还经常用“你想不想治病”来对我进行威胁，但我已经到了这种状况还怕什么呢？事实上，由于没有全力进行认真治疗，使我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和严重后遗症，至今头疼、腰疼、膀胱疼，不能正常大、小便，完全不是人过的日子。记得病房当时有位姓喻的女医生是对我十分积极治疗的，但没有几天就不让这位医生在病房出现了。

……1977年11月的一天，我一早便被押送到武汉剧院，里面坐满了人，看守告诉我这是全市的广播大会，听众有百万人之多，你要放老实一些。大会开始，和我同台被批斗的人是市革委会常委、钢工总头头沈复礼。我听到不断有人在台上痛哭流涕地控诉我，说的却是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和事，无非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斗。我当时想，文革十年中，我从没打过人或指使别人打人，如今被当权派指使人控诉，而走资派指使百万雄师无端杀死我的战友28人，他们无罪反而有功，天理何在？更可笑的是夏菊花也上台控诉我，这完全是专案组故意搞的。因为我在学习班说过：当时社会上很多人把夏菊花说成百万雄师头头，到处抓她去批斗，我很反对，认为她不过是一个杂技演员罢了，不能因为王任重的文章说她是“一朵红花”就整她。有一天工造铁军的小青年居然自作主张将夏菊花抓来关在工造总司司令部，我闻讯后立即去和夏菊花谈了话，并当即派人送她回去，

她当时很感激。后来她和我街坊、三轮车工人余宏杞在部队当干部的儿子结婚，我路过她家，她经常在门口和我热情地谈话。

今天专案组特地安排夏菊花上台控诉我，显然是想用事实来反驳我的说法。这些篡改历史的人也是太可笑了。最后，大会宣布我三项罪名：一、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二、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三、充当“四人帮”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会后将我押送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关押^①。

吴焱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们所有因文革坐过牢的人们，经过比较都一致认为，学习班里除了吃饭、睡觉条件好过监狱，其他各方面比在监狱更难受。”^②

武钢运输部火车头战斗队头头陈祖坤的学习班

1977年3月9日，武钢运输部开办陈祖坤的学习班。这是文革中陈祖坤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学习班。与当时普遍开办的学习班相似，据他本人描述，也是“五不准”，也是“24小时不间断监督”，“床顶安一个五百瓦灯泡”，“不算专案组头头和外调人员，每天围着我转的有八名脱产人员”。

和吴焱金相似，他也是自杀未遂。他的自杀方式是自焚。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3月11、12、13日三天，他们在运输部大楼会议室审讯我，要我交待和哪些人一起、怎样策划上大别山打游击。会上发言十分激烈，大有不说清这个问题休想活命之势，第一天从早上9点一直斗到晚上8点，回到住处仍不放过，要我晚上想清楚明天好交代。第二、三天搞了两天还是没有结果，看来不承认这个罪状他们绝不会放过我。14号我静下来想了一天，只有以死相抗，十年来我一直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汽车队下班后无人，徐新春去吃饭未回，我背着看守，偷偷拿个司机用的加油桶，放了些汽油提到我床下。当晚徐新春和看守戒备森严，我无法行动。15日深夜12点后，徐新春睡着，看守外出，我将汽油倒在被子上，然后钻进被子，用火柴点燃，一时房间内火光冲天。徐新春惊醒，立即用他的被子将火扑灭。我的被子没烧透，只是人被烟熏，昏迷过去。他们立即通知保健站来急救，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85—188页。

^②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84页。

不知上帝为何不肯接受我。武钢公司“运动办公室”过问此事，学习班加派看守，加强戒备，黑脸膛的徐新春一脸怒气，一步也不离开我。何功锦仍然每天来收取材料，他丧着脸说：你不想活，不要将我们这些人带进去。明话对你说，你想跑是跑不了的，想死也不行，唯有老老实实将你所做的一切向党和人民说清楚。你现在人虽在学习班，一只脚已经踏进了看守所。白班看守饶少春有天坐在离我两丈远的石头上，朝着运输部大楼大声喊：再这样下去，我干不了！

自杀未遂一周后，我被押到运输部二楼会议室，室内坐满了人，气氛十分紧张。今天要我当众交待策划“武钢七次停产”的问题。我无话可说，会场也长时间沉默。突然运输部党委副书记薄春阳冲到我面前，一手抓住我衣领，吼道：看来你是决心与人民对抗到底，你给我站起来！我坐下说：文革十年我对运输部秋毫无犯，难道你们今天就这样对待我？会场上观望的人多，还是无人发言。一直顶到下午1点，他们要吃饭了，只得让我回到学习班，继续静坐。

……后来停止了会议室里的围攻，改为每周至少一次大型批斗会，冶金剧院、钢铁剧院、厂前剧院，轮换着批斗，说要将我不老实的态度打下来。每次去挨批斗，看守们全部参加，全程监控。紧张极了，我落得走出禁闭室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关久了，总想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可惜一切都是冷冰冰的，包括熟人的面孔。俗话说墙倒众人推，然而推墙的多为熟人。……

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关着，我被他们关苍了，记不得关了多久，也记不得换了几处地方。我在武钢人的心目中是个精明过人的人，血不能白流，罪不能白受，我以后一定要把我的经历记录下来。这一切磨难，更增添了我一定要坚强活下去的决心。我心里很清楚，武钢和运输部的当权派是想通过对我的打击，将我作为活的反面教材，杀一儆百，警告那些不听话的工人：陈祖坤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陈祖坤也认为住学习班不如蹲监狱。他说：“后来在监狱里待了十年，觉得比运输部五不准学习班好多少倍。”他还说：“所谓五不准学习班，是走资派在文革中的一大发明，是主要为镇压造反派而私设的监狱，无须任何法律依据，任何一级当权派想设就设，对造反派想关就关，它就是解放前土豪劣绅、地方民团的土牢。说它是监狱，当局实际上是承认的，

1976年10月后将造反派大量判刑时，关在五不准学习班的时间可以折抵刑期，就是证明。”^①

曾任工总组织部长的武昌造船厂工人李承弘的学习班

武船铸钢分厂造型工李承弘1976年11月初从车间工作岗位直接关进“五不准”学习班，生活用品是工段书记派人去他家取的。

专案组成员是一批刚进厂的复员退伍军人，很少派性，对两位互相争权的总厂领导的看法，与李承弘“观点一致”。李承弘说：“只要不是政治原则问题，他们在其他各方面对我很是照顾。一个一心想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专案组和一个对你同情一心想给你解脱的专案组，他们各自整出的上报材料肯定是不一样的，在武汉市头批大规模捕人之时，我在厂里这种背景下逃过了一劫。”

不久两位互相争权的厂领导中的一位胜出，专案人员全部换成百万雄师的骨干。看报纸、在监视下见家属等“小自由全无”，除了“不用吃牢饭”，“其他与坐牢一样”。但李承弘没有遭到打骂。他说：“说句实话，学习班和隔离审查长达18个月，专案组换了三批，看管人员加起来有几十人之多，侮辱人、不尊重人格、训我的人员只有三人。”他把其原因归结为“在大城市，武船又是个几十年的老厂，相对来讲，人的素质要高些，掌握政策好一点，一句话，人性多些。”多位看过李承弘回忆录的造反派不认同这一说法。李承弘认为他当时的这一看法，是他“后来最终领洗天主教、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李承弘在学习班里反复思考，“得出的中心结论是：‘目前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军事独裁的国家，毛泽东是一个与蒋介石、希特勒类似的当今秦始皇。’”李承弘说：在学习班“主动暴露以上思想，在批斗会上被批了多次”。“奇怪的是，在我的政审结论中，不但没列入罪状，连错误思想也只字没提”。

李承弘当时得知与自己情况相似的胡秀娟、朱光文、林子忠等都已入狱，担心也会被判刑。1978年4月8日宣布对他暂时解除审查时，他“真感激得哭了”。他说：“我对当局、对管我的专案人员是感恩戴德的，我觉得是从宽处理了，坐牢可能性不大了，所以真得好好感谢他们——专案

^① 参见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增订本）》第173—174页。

人员、领导当局。”^①

长办团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的学习班

为了躲过“工农兵”的绑架，1976年10月25日，顾建棠带着省委为其赴沪治病致上海市委的介绍信，乘船离开武汉，后从上海回到老家浙江海门，打算等待局势稍平静再回武汉。

11月上旬，长办党委派人去海门抓顾建棠未果，随即抄了他父母家。11月底，长办党委致函海门县委，要求协助将顾遣回，县委未作答复。12月上旬，长办党委派两名专案组成员到海门县委联系，无果而返。12月下旬，湖北省委行文商请江苏省委责令海门县委交人，县委通知顾建棠的三弟、海门棉纺厂技术负责人顾敬贤：江苏省委下令要我们交人，县委已让长办派人来接，并向省委报告。你叫顾建棠主动与长办联系回汉。顾建棠与长办党委书记通了电话，表示同意回长办。

12月28日顾建棠和两名专案人员乘飞机回到武汉，直接押送至五不准学习班。顾建棠专案领导小组由长办党委副书记丁福五等四人组成，下有骨干近十人。

专案组告诉顾：“全面、彻底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才是出路。”顾建棠回忆：“我问：什么叫全面、彻底？罗光宇答话：从你们那个一月夺权到批邓都要交待。我又问：按你这个说法，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算什么？罗光宇回答：你们是跟着四人帮捣乱，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是紧跟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

顾建棠认为自己以及武汉造反派“原本就和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于是“与四人帮关系问题一字未写”。

专案组对顾建棠说：“你桩桩件件罪行都与四人帮有牵连，必须交代清楚”。顾建棠历数1966年至1973年长办文革的关键时刻，都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他成为省革委会常委、恢复组织生活，也是周恩来亲自过问的结果。专案组成员回答：“我们要你交代问题是我们的权利，你交代问题是你不能推托的责任。”

1977年4月，专案组追问本不存在的顾建棠给江青写“劝进信”一事，对顾说：“你还硬，就是没有这个事你也得死，叶帅说了，对这些造反派，必须除恶务尽，在地球上消灭。”

^①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298—308页。

顾建棠口头的、书面的辩解归于无效。1978年1月8日，长办召开群众大会，长办政治部主任李文光宣布顾建棠的“罪行”，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省革委会常委王步青代表省委宣布撤销顾建棠省革委会常委、长办革委会副主任等一切职务，丁福五宣布开除顾建棠的党籍和公职，公安人员宣布立即逮捕顾建棠。会后顾建棠被戴上手铐，进入位于汉口宝丰路的湖北省第一看守所^①。

12月7日，省市召开“揭发、批判反革命分子杨道远大会”。刘惠农代表省委宣布：取消杨道远预备党员资格。省公安机关宣布将其逮捕法办。

第三节 改组湖北省委

1977年1月，中共中央开始改组“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问题较多”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省委书记赵修、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被湖北人称为“两赵一王”。“两赵一王”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支持造反派。四人帮倒台后，10月14日，赵辛初在对全省广播讲话中说“据我们了解，湖北的造反派与四人帮没有组织上的联系”。11月中旬前，省委未对造反派主要头头采取“隔离审查”一类措施。11月19日至12月1日省委负责人赴京汇报期间，李先念等批评湖北省委对揭批四人帮运动“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和行动迟缓”。

“工农兵”在四人帮被捕后，把“两赵一王”等所谓“支造干部”称为“帮四人”。1977年春节前汪扬贴出大字报《山头书记×××，混过今冬混不过明春》，批判赵辛初“捂盖子、压群众、保自己”。3月19日，汪扬、陈昌文、周德昌等人在水塔下贴出余均才起草的大字报《赵修不倒，鄂愤难平》。“当时，公安机关根据原市委领导同志的指示，以妨碍市容、阻塞交通和影响社会治安为由，出动公安干警进行了干涉和制止，并强行将汪扬、陈昌文、周德昌等三位同志带到江汉公安分局进行讯问，并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指责。当天下午，又出动消防车辆将贴好的大字报全部洗掉”^②。

^①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17—323页。

^②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公安局关于对汪扬等同志的平反决定》（1978年12月16日），载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8页。

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的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夏邦银发言，言辞激烈地谈到两清整造反派问题，“矛头指向曾思玉实际上是搞张玉华”。会后夏对谢望春说，“是赵辛初叫他放炮的”^①。1976年4月8日，造反派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强行“请”到武胜路街头参加声讨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群众大会。赵辛初和赵修主动要求讲话。王光照说赵辛初的讲话“旗帜鲜明，底气十足，不像过去温吞水那样”。

1977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顾大椿为省委书记，7月调陈丕显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2007年俞文斌对顾建棠说，陈丕显一到武汉，会见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还要他当省总工会副主席^②。

不久，赵辛初病休，陈丕显主持省委、省革委会工作。1978年9月赵辛初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赵修支持造反派最力，在“两赵一王”中最为“工农兵”所痛恨。赵修在“批邓”运动中对朱鸿霞等人说：“我和宋书记（宋侃夫）一样是坚决站在你们一边的”。“省委内部一定要进入你们这些新生力量，才有希望。”“我反正和你们一样，复辟了先杀我的头，现在斗争很复杂，我已经上了马，向你们造反派学习，五不怕。”^③夏邦银、朱鸿霞、谢望春刚进省委办的学习班，就揭发了赵修很多类似的激烈言论。

1977年4月，在“两赵一王”中赵修最先离开湖北省委，调到武钢任党委第二书记。

王克文1967年七二〇事件前就同情造反派，百万雄师占据市委大楼后，他也去新华工避难，在华工和黎智、陆天虹等筹备成立“市革干联”^④。王克文1973年1月出任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比较倾向造反派。1977年7月陈丕显调来湖北后，在一次省、市领导干部会上说：造反派没有一个好东西。多年后王克文的秘书高国斌告诉李洪荣，王克文当场顶陈丕显说，陈书记的说法太绝对了，比如武汉锅炉厂李洪荣的情况我就比较清楚，他是老劳模、党员，人品很不错的^⑤。王克文讲这番话的时候，李洪荣正被隔离审查。

① “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九：《谢望春的揭发交待》（1976年12月11日）。

②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15页。。

③ “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一：朱鸿霞《关于赵修是如何幕后操纵运动的》（1976年12月7日）。

④ 参见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115页。

⑤ 参见田力为2006年8月采访李洪荣的记录。

王克文1993年1月对友人说：“1978年，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领导人以不调动工作为条件要我揭发赵辛初，我抵制了”^①。1977年11月顾大椿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离任，1978年1月任山西省委书记。

宋侃夫当时在省市领导人中资格比较老（长征中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部三局局长），学历比较高（浙江大学工学院附属高级工科学学校电机系肄业），行政级别也比较高（六级）。文革初期他是造反派在武汉市的主要冲击对象。陈再道主政湖北期间，在武汉市起用刘惠农、辛甫，让宋侃夫赋闲。对当时的形势宋侃夫没有公开表示态度，曾让他的秘书找市直机关造反派头头魏绳武，想和魏绳武“交换一下意见”^②。1976年“批邓”运动中，宋侃夫和赵修采取相同的态度，在有些问题上比赵修更激进。朱鸿霞1976年12月揭发：1976年“六月份我进入省工办后，我的一切重要活动，都是在赵修、宋侃夫等领导、指示下干的”^③。当时原二司一些成员为杨道远翻案，赵辛初等人以杨案系周恩来所定为由予以拒绝，宋侃夫支持为杨道远翻案。朱鸿霞揭发：1976年“五、六月份，社会上有人组织为杨道远翻案，几个带头的柳英发、谢宝（保）安、董学静（精）、王军等去过宋家，得到宋的支持。”“有一次夏带我和胡（厚民）、谢（望春）等去看宋，宋问起这事，问杨道远的情况，我们说：‘这事不好办，据说总理点过名。’宋当时猖狂地说：‘那也不要紧，总理说错了的，也可以纠正嘛！’他的说话，使我们当时都大吃一惊。”^④朱鸿霞还揭发：“宋是支持潮流派的。”^⑤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宋侃夫说：“宁夫同志我跟你两个人是有错误的，我与你一生都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跟你（带）一批人上北京，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什么支派，派支，路线出感情。”朱鸿霞发言后，宋侃夫说：“我主张开展思想交锋的，……我是不喜欢老爷爷会的（指没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会）”。胡厚民这样评价宋侃夫：“宋书记……路线觉悟高，有老经验，又是老书记，有工作能力，对形势看得很清楚。”对宋的这个评价，夏邦银、谢望春、胡厚民1976年“批邓”

① 吴仲炎主编《丹心照玉宇——王克文纪念文集》第810页，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②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27页。

③ “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一：朱鸿霞《关于赵修是如何幕后操纵运动的》（1976年12月7日）。

④ “批判赵修材料”附件六：朱鸿霞《宋侃夫的材料》（1976年12月8日）。柳英发说他从未去过宋侃夫家，朱鸿霞记错了。

⑤ “批判赵修材料”附件四：《朱鸿霞交待》（1976年12月7日）。

时对人民日报的两个记者谈过^①。

魏绳武回忆：

1974年夏秋之交，机关中许多人到我家，谈到宋侃夫，几乎是一片赞许声。特别是王业志、袁文宗、徐近民等人讲了宋侃夫在蒲圻赵李桥市五七干校与大家“三同”的许多故事，让我逐渐改变了对宋侃夫的印象。后来，梁家发、曾繁斌、刘先华等人几次邀我去看宋侃夫，我都借故谢绝了。最后一次是梁家发对我说：“老头子（宋侃夫）讲了，你再不去他家，他准备到火官庙来看你。”这一“军”将得我无言以对，当时六七个人一同到市内去看宋侃夫，……宋侃夫很愉快地向在座的另三位客人（都是市七医院的医生）介绍：“他就是在文革开始要打倒我的魏绳武，被关了好几年，最近才放出来，是我特意请他来玩的。我没有被打倒，但他们造反派却帮我治好三样病：一是脱离群众的病。解放后，进了城，一切条件好了，就没有到最基本的工农群众中去，老是浮在上面；靠边站以后，我有机会到菜场去买菜，到粮店去买米买面，到煤店去买煤，到商店买副食百货，直接与普通农民、工人、营业员接触，看到了、听到了过去在会议上听汇报时看不见、听不到的事，感到与群众亲近了、自然了。二是治好霸气的病。过去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什么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听不进不同意见，官僚主义、霸气严重，下级敢怒不敢言。文革中，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提出自己的错误，对照毛主席的教导，确实是官做大了，架子也大了，霸气也大了。三是治好了高血压。过去吃住在宾馆，劳动少，血压高，总是头昏脑胀；在干校劳动锻炼，生活正常，血压不吃药也降下来了。你们三位都是医生，过去也给我看过病，开过处方，这三样你们都没有治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最高明的医术，最灵验的药方。”他这一席话，也解开了我来时的一个心结。宋侃夫变了，在我心中他确实是个有所悔改的党内走资派^②。

宋侃夫赋闲一年多后，1978年10月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批林批孔期间姜一与造反派头头特别是新派头头多有接触。他曾对谢望春说：“你们可以到下面去讲一讲道理嘛”。谢望春在交待中认为“党委造反起来那样快”，就是因为姜一等人让造反派头头到基层去讲演^③。

① “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九：《谢望春的揭发交待》（1976年12月11日）。

②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第228—229页。

③ “批判赵修材料”附件九：《谢望春的揭发交待》（1976年12月11日）。

1976年12月朱鸿霞在揭发材料中说：1976年“八月份后姜一书记生怕落在赵修后面，也找我们了，在一次找胡厚民时说：江青曾对他说，要他回汉支持造反派。”

1977年8月，姜一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常务副省长。

到1978年8月，省委主要领导干部除韩宁夫外都调离湖北。

汪扬1977年12月15日在“血泪控诉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大会上说：“这些帮四人，现在已停职交待，调离武汉，这是捂盖子，压群众，反清查的人应得的下场。”^①



1978年2月15日，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新班子成员接见参加省四次文代会的代表（载17日长江日报）

第四节 真理标准讨论^②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说：“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讨论。”

这一场讨论，以哲学问题、理论问题的面目出现，其实质如邓小平在

^①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247页。

^②本节的编写参考了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630—635页。

讨论的高潮中所言：“关于真理检验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①。

从7月底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以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公开表明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

8月7日，武汉市委发出《关于8、9、10三个月在全市开展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的通知》，要求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有关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论述，以及叶剑英、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反党罪行，采取各种方式开展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讨论和学习活动。“通知”发出以后，市委又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进行部署。

8月14日，武汉市委发出《关于在全市开展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的通知》。同日，长江日报开设《关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笔谈》专栏，刊登了《照搬照套还是实事求是？》《真理总是在实践中发展的》《任何真理都要接受实践检验》等3篇文章。此后，“《长江日报》发表和转载了大量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和社论，成为武汉地区真理标准讨论最重要的阵地之一。”

8月下旬，市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会议认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目的是为了澄清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把理论与实践本末倒置，禁锢人们的思想，所造成思想上的极大混乱。

在市委理论研讨会的推动下，全市各区纷纷组织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活动。8月22日至23日，武昌区委召集全区理论宣传干部和部分基层理论辅导员讨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认为当前学习和讨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关系到如何深入批判“四人帮”的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更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政治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不是照抄照搬、“句句照办”。

9月，湖北省委召开了有各地市县宣传部长和党校校长，省直属各单位、各大型厂矿、各大专院校负责人，以及专职理论工作者共一千多人参加的

^①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全省理论宣传工作会议，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并对发动全省干部、群众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作出了安排。会议期间，省委请当时风头正健的“理论家”邢贲思、汪子嵩、马沛文从北京来作报告。陈丕显回忆：“还有的人听了北京理论家的报告很反感，甚至骂那几位理论工作者。个别人甚至把这次省委理论工作会议比作‘苏共二十大’，把几位理论家的报告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79年还有人指责这个“千人理论工作会议”，说“‘湖北的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有的人说：‘什么实践检验真理，检验来，检验去，就是检验毛主席。’有的人甚至说：‘这个讨论是反动的。’”^①

10月17日，武汉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传达贯彻湖北省委理论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动员广大干部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会议决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全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延长到本年底。

8月25日，武汉市委召开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经验交流会，交流了武汉第二皮鞋厂党支部、武汉饭店党支部、洪山区青菱公社长征大队党支部和市二轻局党委的经验。8月27日至9月2日，武汉市委召开区、局以上领导干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市委书记李任之主持会议并讲话，要求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加深对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客观依据的理解，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并对如何将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推广到基层群众中去等作了部署。9月6日至29日，市委党校举办了三期真理标准讨论学习班，全市区、局以上领导干部402人参加了学习^②。

1979年9月15日至23日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回顾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认为：“去年九月，省委召开了规模较大的理论工作会议，有领导地开展了这一讨论。今年一月，省委通过传达三中全会精神，通过召开理论务虚会议，把这个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后来，党内外出现一种反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思潮，对这一讨论非难指责，省委在六月份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通过正确分析形势，批判错误思潮，进一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最近省委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把这一讨论更进一

^① 陈丕显《历史的转折在湖北》第14、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② 详见1979年9月3日、6日《湖北日报》第1版。



载 1979 年 9 月 26 日长江日报

步引向深入”。

这次常委扩大会议总结了全省一年多来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总的情况是好的，成效是很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大大推动了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及其反动思想体系，推动了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以及各项政策的落实，推动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前进。实践证明，真理标准的讨论，确实是党的基本建设，是工作的开路先锋”。会议要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继续深入不可，有的地方，有的单位非补好这一课不可”^①。

武汉地区的“真理标准讨论”延续到 1979 年 9 月逐渐结束。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报刊上不见提出不同意见的文章，一些不同意见作为批判的靶子被简约地提到，然后予以详尽批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最终标准，而非唯一标准；举出何种实践（事实）、如何描述所举出的实践（事实）来检验真理，受阶级立场和思维方法的制约；“实践”这一哲学概念远远不是经验、不是有损或有益于某些个人或某一集团的政策和行动，这些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都论述过的问题，报刊上不见提及。

① 参见 1979 年 9 月 26 日《湖北日报》第 1 版。

第五节 平反“冤假错案”

大规模平反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冤假错案”，是从“落实干部政策”开始的。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有的老同志”在十一大期间提出这一问题，十一大报告写道：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此后“落实干部政策”大力开展起来^①。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主持撰写的中央党校杨逢春等三人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认为这两篇文章“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作了舆论准备”。

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1月20日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证明把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一起重大错案。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推动整个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至1980年，全国共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

1979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说：“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

武汉市委于1978年5月17日至23日，召开了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座谈会，提出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尽快解决审干遗留问题，尚未作出结论的尽快作出结论，已作结论的要全面复查，有错必纠；妥善安排老干部，可以分配工作的分配，安排不当的尽快调整，年老体弱的可以安排担任顾问或荣誉职务，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离休、退休。

1978年9月11日，市委召开大会，宣布市委《关于对程云等同志被定为“反革命黑帮”进行平反的决定》。《决定》说：当时的市委没有识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63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

破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阴谋，1966年6月，错误地把程云、孙川四、于亚声、莎莱等同志定为“反革命黑帮”，强加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并动用舆论工具，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声讨”。在此影响下，还使黄毅和其他一些同志受到株连，不少同志身心受到摧残，造成了严重后果。

9月18日，经市委同意，市文化局、市文联宣布为“受迫害致死”的著名演员高百岁、吴天保等人进行平反昭雪。

10月，省委组织部召开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大造声势，把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做得更好。同月，省委及有关单位，为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的一批老干部昭雪平反。

12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省委作出决定，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和“被错误处理”的曾惇、陈一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9年2月6日，武汉市委在汉阳区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要求加快错划“右派”改正工作的步伐。到1981年6月，全市“改错”工作基本结束，共改正并安置错划“右派”8383人，因“中右”或“错误言论”受到各种错误处分的1928人，以及在工人、营业员、民警中错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945人。

同年2月26日，武汉市委发出通知，对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作出部署。摘帽工作于当年上半年全部结束。

6月22日至30日，武汉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市委书记李任之宣布：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强加在原武汉市委和各级领导干部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过去所有文件、报刊上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应当一律作废；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10月29日，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报告》。《报告》说：自1978年以来，武汉市一直把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已基本完成了复查任务，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共判处刑事案件9770件（反革命案件698件，普通刑事案件9072件）；“文化大革命”前和1977年以后的案件，提出申诉的还有5033件。经过复查，共平反纠正了1927件冤假错案。分别情况，给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安排工作，补发工资和生活补助，做了许多善后工作。

《武汉市志（1980-2000）》详细记载了1979年7月开始的“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

全市干部中列入复查的各类案件14235起，经复查，修改结论或改变处分的5516起。其中错定敌我矛盾、判刑和开除公职、党籍予以平反的案件1068起；受各种处分的1311起，复查后，减轻或不予处分的609起。在已复查的案件中，审干案件11137起，经复查，或修改结论或改变处分的3769起。其中错定敌我矛盾、判刑和开除公职、党籍现予以平反的案件608起；受各种处分的338起，复查后，减轻或不予处分的226起。“三反”恶攻案件702起，经复查，修改结论或改变处分的676起。其中错定敌我矛盾、判刑和开除公职、党籍现予以平反的案件155起；受各种处分的148起，复查后，减轻或不予处分的129起。财贸、文教卫整队案件140起，经复查，修改结论或改变处分的97起。其中错定敌我矛盾、开除公职和党籍现予以平反的案件47起；受各种处分的63起，复查后，减轻或不予处分的46起。违纪案件1069起，经复查，修改结论或改变处分的304起。其中错定敌我矛盾、判刑和开除公职、党籍现予以平反的案件109起；受各种处分的535起，复查后，减轻或不予处分的67起。

“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干部，全部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作好善后工作，包括解决家属、子女、亲友受株连的问题。全市“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中应补发工资的732人，补发金额1395712元。经复查，已补发的728人，金额1384263元；暂未补发的4人，金额11449元（已办审批手续，待上级拨款补发）^①。

此外，还处理了原工商业者的遗留问题。1980年9月29日，武汉市委批转市委区别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工作总结报告》。《报告》说：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要求，市委于1979年12月成立区别工作领导小组，随即开展了工作。由于各级党委重视，行动积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武汉市原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的有10270人，这次区别出来的连同历年区别出来的劳动者共6981人，占68.39%。其中，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期间和以前参加国营、公私合营的原工商业者8818人，从中区别出来的劳动者5844人，占66.27%；“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新划资本家1398人，从中区别

^①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1980—2000）》“第五卷政治（上）”第103页。

出来的劳动者 1137 人，占 81.85%；维持原工商业者成份不变的 3226 人，占 31.1%。（根据中央后来文件的精神，对这部分人的政策也作出相应的改变，其中关于参加工龄、安排使用、生活福利待遇等，都与工人阶级一视同仁）。此外，对“四清”、“文化大革命”中新划为资本家，而手续不完备的 2552 人，作剥削历史处理、定为劳动者成份的 2542 人。

同年 11 月 5 日，武汉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关于处理“四清”遗留问题和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说：自 1977 年 7 月以来，武汉市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了处理“四清”遗留问题和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工作。在“四清”运动中，全市作了组织处理的案件有 12821 起，复查了 12689 起，占 99.04%。其中：纠正了 815 起，占原处理数的 6.4%。在“反右倾”、“整风整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受到组织处理的案件有 1893 起，复查 1786 起，占 94.34%。其中：纠正了 469 起，占原处理数的 24.77%。市委组织部提出，对于少数单位尚未复查的案件，检查验收中发现的不合要求的案件，都要按照“坚持原则，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做到维持原结论有据，纠正原结论有理，全错全改，半错半改，不错不改”的原则办理。

1981 年 8 月 6 日，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作出《关于检查落实政策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全市抽调 1300 余名干部组成检查组，采取上下结合、自查与重点检查结合的方法，着重检查了经复查维持原结论和部分改正的案件共 6800 余起，对错案进行了纠正，继续帮助解决了一批疑难问题。

10 月 15 日，武汉市委办公室转发市委统战部《关于全市落实党对原工商业者政策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工商业者被查抄 3000 元以上存款者，已全部发还；被扣减工资的，已全部补发；作离职处理，应补发退休费的已基本补发；被遣送下放农村的，已妥善安置；应领未领的定息已基本发完；在“神仙会”、“交心会”上的发言受到斗争、处分的均已改正平反。根据中央对原工商业者一视同仁的政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加入了工会，许多人被评为先进工作（生产）者，许多人都作了合理安排。

《中国共产党在湖北 80 年》一书说：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湖北省的历史遗留问题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冤假错案”。

书中举出被平反的两个文革案件，一个是七二〇事件，一个是武大“三家村”，说“这两件事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全省人民奔走相告”。

“五十天”里和“两清”中错整人、逼死人，红卫兵“破四旧”、百万雄师发起武斗打死、打伤人，这些官方直接或间接制造的刑事案件、冤假错案，无一被平反。就在省委处理“总数在几十万件以上”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在无数个“揭批查”学习班里，新的冤假错案正在被成批制造出来。

1978年至1980年，湖北省委发出12个落实政策具体规定的文件，对定性戴帽、冲击遣返、开除公职、退职解职、“恶攻”案件、“四清”问题、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安置等34方面的问题分别制定了处理原则和办法^①。省委将处理这些问题称为“调整社会关系”。因造反而遭遇这“34方面的问题”的人员，基本不在“调整”范围之内。

第六节 为七二〇事件平反

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武汉地区平反文革中“因反对四人帮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刘长安等评报案”是平反得比较早的。此前有过不公开的这一类平反工作，如1977年上半年释放刑期未了的百万雄师成员朱启发。

所谓“刘长安等评报案”发生于1976年6月24日，长江日报刊登一篇文章《我们队里的掌舵人》，“工农兵”的刘长安、王延安、汪扬等人认为这是吹捧造反派的“反动文章”，“《长江日报》已成为一张地地道道的造反派的大传单”。于是二十余人前往该报社进行“工农兵评报”。他们在报社围攻两位副总编辑，要求收回报纸、在报上更正、检讨，遭到拒绝。后长江日报停刊四天，“工农兵”方面说停刊事件是长江日报社自己制造的，是为了“扩大事态，挑起两派斗争”。8月1日，江汉公安分局将刘长安拘留15天、王延安拘留10天，另有十余人被传讯^②。

1978年8月，省市市委为七二〇事件平反正在酝酿之中。中旬，市委

^① 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第403页。

^② 参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50—151页。

常委会议决定对“刘长安等评报案”予以平反，并为此事下发武汉市委（1978）62号文件，陈丕显、韩宁夫和市委书记王群作了批示。8月29日，市委召开平反大会，刘长安、王延安在会上发言。9月1日湖北日报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说：“深入揭批‘四人帮’，彻底揭露《长江日报》一九七六年六月底停刊事件真相，坚决推倒‘四人帮’及其在湖北武汉的黑干将强加在刘长安等同志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词，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为他们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7日，市委在武汉剧院召开大会，坚决支持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决定。省委书记、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顾大椿在大会上说：1976年清明节前后，武汉一些革命同志在大桥桥头送花圈，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代表了全市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对“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斗争。会议宣布“这些同志送花圈悼念周恩来完全是革命行动”，“凡是被‘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强加在送花圈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因这件事受到牵连和打击的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①。顾大椿说到的“武汉一些革命同志”，主要是指“寒城牛”。

11月18日，湖北日报发表韩喜明、陈世清、刘仲余三人的署名文章《人民的心愿，伟大的胜利》，拥护中共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回忆“寒城牛”于1976年3月“开展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革命活动，与‘四人帮’作针锋相对的斗争”。11月22日，湖北日报刊登两位“本报记者”文章《访寒城牛》，赞扬他们“和林彪、‘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

“粉碎四人帮”后，“工农兵”为七二〇事件翻案的行动公开地、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78年，“挂职锻炼”的俞文斌、杨道安回到武汉。9月至11月，“工农兵”组织了一批为七二〇事件翻案的材料，主要有：陈世清等10人《“七·二〇”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为什么要为“七·二〇”事件平反》（1978年9月）、陈世清《向中央、省委反映湖北“七·二〇”问题》（1978年9月）、吴时元《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七·二〇”事件的真相》（1978年9月）、原百万雄师赴京申冤代表团《“七·二〇”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革命风暴》（1978年9月）、俞文斌《“七·二〇”

^① 参阅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635—637页。



配合为七二〇事件平反，湖北日报1978年11月22日刊载赞扬“寒城牛”的文章《事件是一个大冤案》(1978年10月)、陈世清等34人《为什么把“寒城牛”打成反革命组织》(1978年10月)、武汉锅炉厂原百万雄师部分成员《致中央的信——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平反问题》(1978年10月)、黄汝来等19人《坚决要求为被林彪“四人帮”惨(残)酷杀害的李强中、王天武两位同志昭雪》(1978年10月)、刘仲余等《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平反问题致党中央的信》(1978年11月)等。这些材料通过各种渠道送往中共中央以及湖北省委、武汉市委^①。

1978年秋，张体学妻李少南、李先念妻林佳楣、陈再道妻张双琼、李良妻高新华等，通过副总理王震八九岁的孙女，将七二〇事件的申诉材料送给王震。此后，俞文斌赴京到王震家，王震表示已看过申诉材料，会向中央领导汇报，请他们放心。张双琼对俞说：王震非常关心七二〇事件平反问题，“几次到我家和陈商谈平反的问题，态度非常坚决”^②。

陈丕显回忆：王震来湖北视察，对七二〇事件平反“明确表示支持”。他在省直干部大会讲话时说：“我那时候要是在武汉，我也是个‘百万雄师’。”“顿时，全场掌声雷动”^③。

① 参见湖北武汉纪念“七·二〇”三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主编《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一辑)》。
 ② 参见詹学才主编《风雨历程——记文化大革命始末》(2017年自印本)第331—332页。
 ③ 陈丕显《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见《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8期第5页。

1978年9月13日，武汉市委向湖北省委报送《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情况汇报》。24日，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向华国锋、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长期以来，广大群众纷纷向省、市委反映，要求澄清‘七·二〇事件’的性质。省、市委和军区，都作了大量的善后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破坏，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工农兵群众、解放军指战员和干部，要求为‘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①

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七二〇”事件平反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回忆：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李先念同志找我谈话时，我问他们：“湖北省委那个关于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报告，你们看到没有？”他们都说看到了，并说叶剑英元帅也看到了，但是中央政治局还没有讨论。

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会上发言，率先解放思想，冲破了会议原定的框框，提出六条意见，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陈云同志提出的六条意见中，有一条是讲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认为“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陈云同志的发言博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反响，使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就这些问题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有好几位老领导都谈到了武汉“七二〇”事件。

11月14日，北京市委宣布，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7日，在中南组会上，杨得志、李成芳同志说：“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我在发言中，除了介绍湖北省委为“七二〇”事件平反向中央所作报告的内容外，并说，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①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二卷第637—638页。

11月19日晚，华国锋同志找我谈话，主要是谈“七二〇”事件的真相。他说，湖北省委的报告，中央已作了研究，“七二〇”事件是点了名的，“百万雄师”受了压。十几年没有解决，中央准备批准同意湖北省委的报告。他指出报告要作些修改，至于具体工作，可以找有关同志议一议，然后着手布置平反工作。于是，我连夜在北京组织修改报告，代中央起草有关文件。接着，我把在湖北和武汉军区工作过的王任重、赵辛初、杨得志、王平、陈再道等老同志请来商量，研究平反工作。

11月22日，在华北组会上，邓颖超、聂荣臻等同志在发言中说，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陈云同志紧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在另外一个小组会上，陈再道同志也介绍了“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11月26日，中央发了文件，正式批准湖北省委的报告，决定对“七二〇”事件进行公开、彻底平反。但在当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对这一事件的平反不登报、不广播（指无线电广播）^①。

中央文件发出前，省、市委和百万雄师头头已得到消息。陈丕显从北京打电话给省委通报此事，并要求马上听到俞文斌等人的反映。23日下午，长江日报社邀请俞文斌等8人座谈，征求他们对七二〇事件平反舆论报导的意见。25日，省、市委在洪山宾馆召开座谈会，邀请俞文斌等8人参加，通报中央决定为“七二〇”平反，研究召开“七二〇”平反大会的问题。强调平反时不登报、不广播，是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出发。俞文斌代表8个人表态同意，并要求恢复8201部队番号。

省委、省革委会28日上午在洪山礼堂举行“‘七二〇事件’平反大会”，下午在洪山宾馆召开七二〇事件平反座谈会。

陈丕显、杨得志、李成芳专程从北京请假回武汉参加大会。“俞文斌、杨道安、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李树春、汪仕奇在会场右侧第五排就座”。陈丕显宣读中发（1978）71号文件并讲话；省委副书记顾大椿宣读陈再道《给湖北省、武汉市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解放军指战员的一封信》。七二〇事件当事人陈再道在信中说：“十一年前，林彪、‘四人帮’为了破坏毛主席、周总理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国煽动反军乱军，挑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以便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

^① 陈丕显《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载《武汉文史资料》2006年第8期。



罪恶目的，指使谢富治、王力等人，制造了‘七·二〇事件’。”

下午，陈丕显主持七二〇事件平反座谈会。省市委、武汉军区负责人与俞文斌等人“一一亲切握手，互致祝贺”。陈丕显对俞文斌等人说：“上午开了七二〇事件平反大会，全省有一千多万人参加。下午开个座谈会，是大军区党委、省委、省革委会联合召开的。现在把同志们邀请来，有什么意见大家讲。”俞文斌表示了拥护的态度后，讲到原百万雄师成员过去“同生死共患难，现在胜利了，更要加强团结，还要团结不同意见的人”；还讲到一些干部继续“排斥”“打击”“胜利了”的百万雄师成员：“有很多群众要求而且是按政策应该解决的问题，而不解决。这样的人有的还继续当一把手，所以群众反映是‘风派’提拔‘风派’。因此要求省市派出工作组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查调整。”孔庆德在七二〇事件中的22日，曾经按照周恩来指示代替陈、钟主持武汉军区工作。他在座谈会上控诉1967年2月造反派将他挟持到北京，一度哽咽。他说：“当时，我们听党中央的，搞三支两军，我们是支持搞打砸抢呢，还是支持革命群众？我们能支持那些乌龟王八蛋打我们阶级兄弟吗？不能！百万雄师不止百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湖北形势是很好的，就是谢富治、王力这些王八蛋来搞乱



座谈会开始前陈丕显与俞文斌握手，俞文斌左侧依次为章迪杰、李树春、杨道安（载章迪杰《峥嵘岁月》）

了。他们搞什么？他们要夺权！”陈丕显说：“‘七二〇’我不是到湖北来才知道的，他们把我关起来时，我就知道了。……我当时想，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七二〇’事件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说七二〇是叛乱，8201部队是叛军，陈再道是反革命，这个事本来就是错误的，这是四人帮制造的。”^①

省委将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8]71号）印了三十多万份，在全省城乡广为散发和张贴^②。

省委召开大会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三天以后，12月1日，武汉市委在省地质局礼堂召开为七二〇事件平反座谈会。12月2日，武汉市委召开十万人有线广播大会，为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的镇压与迫害”的百万雄师、“公检法”头头平反。大会上市委副书记孟筱澎宣读武汉市委12月1日发出的文件（武发[1978]99号）《关于为俞文斌、李树春、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汪仕奇、汤忠云等同志平反、

^① 参见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154—171页。

^② 参见陈丕显《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

昭雪的决定》。“决定”说：俞文斌等人“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起斗争”。“俞文斌、李树春等同志对林彪、“四人帮”及王力等人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活动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完全是革命行动。”“现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强加于他们的一切罪名统统推倒，所有这方面的材料予以销毁，政治上恢复名誉。”会上，省委书记、代理市委第一书记顾大椿，市委第二书记刘惠农讲话。俞文斌、李树春代表“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及其亲属”讲话。市公安局负责人高珣讲话。

3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分别以“武汉市委召开十万人有线广播大会 为俞文斌李树春等十同志平反昭雪”，“市委召开十万人参加的平反昭雪大会 为一九六七年七月以后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的俞文斌、李树春等十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为题，报道这次大会。长江日报同日刊载了俞文斌等8人的署名文章。

市委予以平反的十人，李树春、汪仕奇是武汉“公检法”头头，其余八人是百万雄师总站常委。除汤忠云1967年8月20日拒捕被枪杀，另九人都坐过牢。纪登清1969年下半年出狱回家养病，1970年3月去世。出席平反活动、在报上发表文章就只有俞文斌等八人。这八人在这一时期经常出头露面，引起百万雄师一些人的不满。俞文斌在省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讲“现在胜利了，更要加强团结”，言出有因。

汪扬接到了出席省委座谈会的通知，因出差未能参加。他回忆：

我从北京回来后，听说会议开得不成功，因事先未组织好，无中心发言，如同自由市场。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推销自己的“功劳”，升（伸）出头来讲话，如同荷叶包钉子，都是头。谁想讲什么毫无原则，有的人在场大哭大闹，有的争功摆好。特别是风派人物，在与“四人帮”生死搏斗之时，未曾亲临战场的人，也伸出头来自封他是“百万雄师”的发起人。那种小丑的面目表演得无余了。一个好端端的拨乱反正，突出正义的大会，却搞得乌烟瘴气。真正有水平的准备发言的人，也无法开口。

汪扬认为“省委的平反座谈会失败”，其原因是“俞文斌的组织能力不高，斗争艺术不成熟”，其后果是“领导们也可能认为‘百万雄师’也是争权夺利之徒”。这个座谈会是省委而不是俞文斌召开的，座谈会真的“失败”了，那应该是陈丕显的“组织能力”问题。从上引汪扬的一段回忆来看，刚得到平反的百万雄师一些人不把省委放在眼里。

汪扬参加了12月1日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他认为“这次平反会，比省委平反会还要糟，再一次证明俞文斌的水平能力”。他回忆：在俞文斌指使下，刘敬胜发言指责“受造反派迫害的”市机械工业局书记魏震，说他“对我们歧视，不安排重用我们”，质问他“你是干什么的”。魏震回答：“我是干革命的。”3506厂原百万雄师成员李子义将魏震的帽子“抓下甩在地上”，“这一举动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会场一阵骚动”。汪扬“立即跑去把帽子捡起来，戴在魏书记的头上”。汪仕奇发言，“揭发了（市公安局局长）王杰支造镇压我们”，“要他站起来认罪”。汪扬说：这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爱憎不分明的行为”，把参加座谈会的“全市领导干部得罪了”，“导致平反不彻底的后遗症”^①。



12月1日，武汉市委为学习、贯彻中央71号文件发出《通知》（武发[1978]98号）。《通知》说：“各单位可在本单位开庆祝会，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召集因‘七·二〇事件’受迫害的同志参加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作好思想工作。”“做好因‘七·二〇事件’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各单位要把平反、昭雪工作落实到事和人，在本单位开好平反、昭雪大会。凡因‘七·二〇事件’被强加的‘反革命分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公检法一小撮’，‘叛军’、‘百匪’以及‘叛徒’、‘特务’、‘坏分子’等等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恢复名誉，对遭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并按照党的政策，认真地妥善地做好善后工作。”

市委98号文件下达后，武汉地区层层召开为七二〇事件和百万雄师

市委98号文件下达后，武汉地区层层召开为七二〇事件和百万雄师

^① 汪扬的回忆，参见其《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84—187页。

平反的群众大会、座谈会。

市机械工业局的平反大会于12月8日召开。鉴于“省、市委的平反大会（按：应为座谈会）不尽人意”，会前该局书记魏震召集俞文斌、张立华、汪扬开预备会，决定安排四人作“中心发言”，“把会场基本垄断了，其他发言微不足道，无关大局，也乱不起来”。会议在东湖宾馆举行。汪扬发言的题目是“为什么对领导干部要‘爱、保、恨’？”他批判了“在高压下”“转弯子”的省市领导人后说：“省委唯有韩宁夫省长是硬骨头，他顶着不转弯子。他说：‘有弯就转，无弯就不转，越转越糊涂’”。汪扬说“会议开得非常成功”^①。

市机械工业局的平反大会后，该局下属的武汉复印机总厂也召开了平反大会。汪扬在该厂百万雄师成员中是头面人物，他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武汉工人阶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按：指百万雄师的头头们）是新社会武汉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七二〇’是武汉工人阶级敢于反潮流，反林彪、‘四人帮’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壮举，它将载入我国历史和武汉工人运动的史册。”^②

很多单位效仿省市委，开过群众大会接着开座谈会。

12月6日湖北省医药工业公司机关的大会叫作“庆祝大会”。“深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陈世清等同志也在庆祝大会上发了言”。该公司所属湖北玻璃仪器厂、湖北药用玻璃厂“也先后召开了庆祝大会”。12月6日、9日，该公司党委“分别召开了公司机关和公司系统在七·二〇事件中，与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惨遭迫害的部分同志座谈会”^③。12月29日，该公司党委召开公司机关职工大会，为在七二〇事件中受迫害的陈世清等24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大会后，该公司党委又召开陈世清等24人参加的座谈会，并“对在‘七二〇’事件中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陈世清等十二名同志，发给了医药费补助”^④。

百万雄师总站常委、政参部长蔡俊善是1979年1月16日市公安局下文平反的。蔡俊善的长子蔡竹云2003年著文说，市公安局的平反通知是“根

① 参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87—192页。

② 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227页。

③ 湖北省医药工业公司《情况简报》第八期（1978年12月19日）。

④ 湖北省医药工业公司《情况简报》第九期（1978年12月30日）。

据父亲的申请”才得到的^①。

七二〇事件后，俞文斌等几名常委忙着请新华工出面“斡旋”，总站的人员、物资转移，去外地重建据点，都是由蔡俊善主持。蔡俊善1967年8月14日在沔阳长埡口被公安机关逮捕。章迪杰说蔡被捕入狱一两个月后被他所在单位要回去了^②。蔡竹云在上述文章中也讲到其父被捕入狱约半年后，被本单位造反派“从监狱里提出来，关进厂里的子弟小学”。百万雄师中有人说，没有上面同意，蔡俊善所在单位怎么可能把他要回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百万雄师常委说：“蔡俊善可能是反戈一击有功。有一次我们八人被押出去批斗，批斗会上看见蔡俊善坐在台下，手里还拿着毛主席语录本。1972年3月我们出狱后，他要求参加原百万雄师成员的一些活动，老俞叫他不要参加。”

蔡俊善的姓名没有出现在市委99号文件里，为他平反的官方机构级别较低，这件事在百万雄师骨干的不同圈子中引起不同议论。汪扬说：有人指蔡俊善出卖汤忠云，汤忠云的家属在蔡俊善单位及住处张贴大字报指责蔡是叛徒，都是冤枉了蔡俊善；汤忠云之弟汤伟杰见我与蔡交往，随之与我绝交，属“是非不分”之举^③。

省市委在平反问题上对蔡俊善的态度，是否与俞文斌等人商量过；是否考虑到百万雄师部分人员的议论；是否考虑到蔡俊善仅被关押约半年或一两个月，而俞文斌等八人被关押四年八个月；是否掌握了蔡俊善“反戈一击”的证据，不得而知。

为百万雄师一“工农兵”成员平反的工作做得十分细致彻底。俞文斌等关押四年零八个月，由市委予以平反；汪扬等三人1976年3月19日在水塔下贴大字报被江汉公安分局传讯约两小时，1978年12月16日由市公安局下文平反。《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公安局关于对汪扬等同志的平反决定》说：“1. 汪扬、陈昌文、周德昌三同志在水塔墙上张贴大字报的行动是正确的，为此公安机关对他们采取压制和强行传讯的作法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2. 对汪扬、陈昌文、周德昌三同志的讯问笔录应全部销毁，

^① 参见蔡竹云《回忆我的父亲蔡俊善》，见詹学才主编《风雨历程——记文化大革命始末》（2017年自印本）第289页。

^② 参见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第96页。

^③ 参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342—343页。

所写的材料应全部退还本人。同时在他们的工作单位宣布平反决定。”^①

官方资料记载：“1979年3月9日至14日，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召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提出‘全党动手，进一步加强对落实政策工作的领导’。会后，全市各级党组织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制造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给受到各种打击迫害的24500余人恢复名誉，并认真进行善后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问题也基本上得到解决。”^②

^① 详见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年）第176—178页。

^②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79）》第394页。

第三十章 “彻底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

第一节 审判“追随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分子”

1981年1月25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经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作出最终判决。此后，全国各地法院陆续对“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审理、判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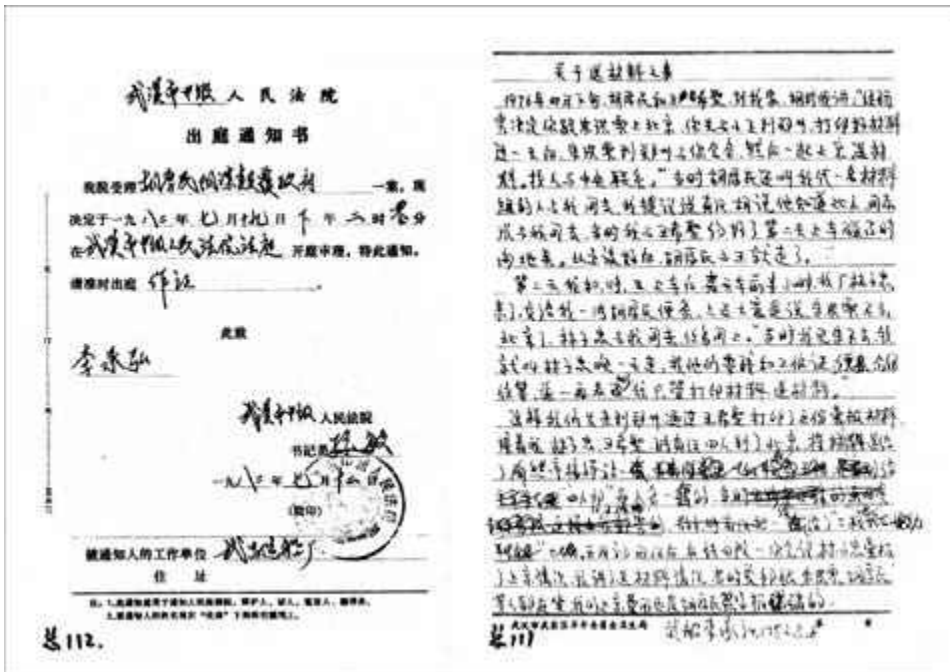
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于1976年12月被省委实施专案审查，1977年11月28日正式逮捕，1981年1月至1982年3月公安机关对四人的“主要罪行进行侦察预审”，1982年4月武汉市公安局将四案移送市检察院。市检察院以“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诬陷迫害干部、群众”三条主要罪状起诉四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7月9日至21日开庭审理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1982年7月28日，中院公开宣判：判处张立国、夏邦银有期徒刑各13年，剥夺政治权利各3年；



1982年7月28日，武汉中院公审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载《大武汉新影》）

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审判时有多位“帮派骨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李承弘当证人的经过是这样的：他所在的武船分厂党委书记要他出庭证实夏、胡的两项“罪行”，李承弘极力推脱，书记说：“审完夏朱胡后，就该处理你们了，……现在就看你态度了。”李承弘同意后，专案人员出题目，李承弘写出稿子，稿



李承弘提供的出庭作证通知书和证词

子审核通过，交待李承弘作证时“照稿子念就行，不要节外生枝”，不要与被告争论，“不做声”^①。

朱鸿霞、张立国上诉被驳回，夏邦银不上诉，胡厚民说：“判我二十年，我六年前（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隔离之时）就知道；把我和姚文元判一样重，从何说起呢？判我二十年是上面定的，有何上诉的必要？”

张立国在宣判后说：“从今天的判决看，态度是重要的，夏邦银态度好，胡厚民态度坏，判的轻重就不一样。”

张立国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并将判决书撕掉^②。

6月底，胡厚民不接受市中院送达的起诉书副本，并表示不请律师，他说：要请，我请联合国的律师。“5日上午，市中级法院再次将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送给胡厚民。胡当即用卫生纸做了一个封面，将两件法律文书包好丢出监号。他在封面上写着：‘尊敬的法官先生，人家不愿意接受起诉书副本和开庭通知单，却硬要塞进人家的“铁屋”，且声称这是依法办事。试问，这是依据什么法律办事？怪哉！先将原物奉还，谢谢！’落款‘铁屋居士’。”

湖北日报记者在該社《内部参考》上写道：

被告胡厚民对法庭调查的问题拒不回答。他回到监所后说：“嗨！还不是那么回事，都是些老掉牙的问题，我听了心里好笑。一月夺权是毛主席肯定的，这算反革命夺权，那全国有多少反革命？”胡还说：“我对法庭没有信任感，我们的案子法院作不了主，他们也没有那个板眼作主。有人会为我们说话的。这不是我看不起他们，今天开庭有那么多小车，还不是头头们在看电视。对我们的处理，态度好坏无关紧要。王洪文的态度还不好？结果判了无期，比姚文元还重。态度越好越有鬼。”

胡回到监所之后怒气冲冲地说：“人生能有几回搏，再不说，以后没有听众了。”“不管朱、夏、张判几年，我不管那些，我反正跟他们拼了。”……当法庭调查他策划一九六七年“一·二六”反革命夺权的犯罪事实时，胡只说了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审判长宣布休庭时，胡又说了一句：“法官先生不让我发言，法庭要讲道理嘛！”胡还在法庭上叫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①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322—323页。

^② 参见杜先荣等2016年11月访谈张立国的记录。

……胡厚民在辩护时全盘否定了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他说自古以来，打官司两方面都可以说。但在整个法庭调查中，法庭只听原告的，不听被告的，很显然，是法官先生偏袒原告，压制被告，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严格地说是违法的。第一，把一·二六夺权说成是反革命夺权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规定要搞“四大”，既然要“四大”，我们搞的那些何罪之有？第三，还有什么诬陷迫害干部，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把赵辛初、韩宁夫等搞到武胜路街头，不是阴谋。喻（俞）文斌等把省里几个领导人藏了几天，为什么不起诉喻文斌，不外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公诉人有理有据有力地批驳了胡厚民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并提请法庭对胡厚民从重判处。

胡厚民在最后陈述中说：“文化大革命大家都错了，我的陈述是对人民法院的口头起诉。”他利用合法机会，再次在被告席上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接着，他背了两首诗作为最后陈述的结尾。现抄录如下：

法庭吟

（一）

身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
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二）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
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
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这两首诗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胡厚民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还可以看出他拒不认罪的反革命骨气。

7月22日至24日进行法庭辩论，夏、朱、张均一庭辩论完毕，对胡厚民连续开庭两次进行辩论。24日胡厚民作最后陈述：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这是不以人们承认与否（为转移）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包括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

们鸣冤叫屈。

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么就不是你非我，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不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没有得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真正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代（贷）的。因此，我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慎重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名，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负，就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的名义抓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一九六九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516，全省上下被打

成北决扬分子、516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是空前的，我个人就打成516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反动组织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516，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要像天津市委那样，没有就敢宣布天津没有一个516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一九七〇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516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个电台来，并声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有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一九七六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批、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应该给上述人员作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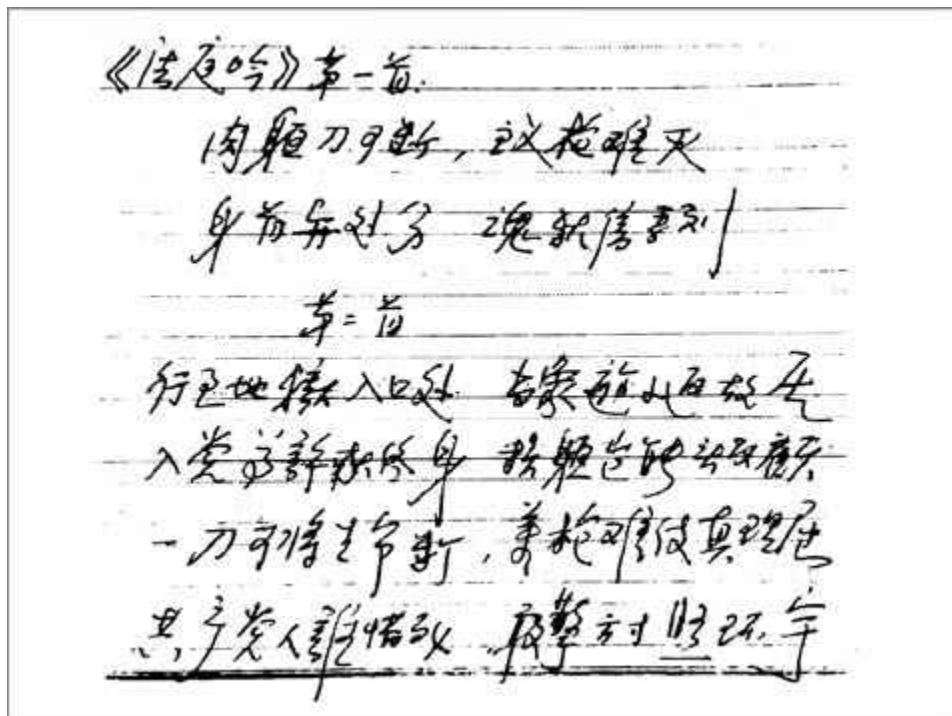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
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
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
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①。



胡厚民手迹

1986年9月胡厚民对来探监的四弟说：“那次在法庭上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向公众演讲的机会了，所以我特意打扮了一番，青裤子、青鞋子、白衬衣，表示我一清二白。”^②

张建国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说：“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应把我和夏朱胡区别开”。他认为作为新派之首的新华工一向注意政策、讲策略，他的刑期应该比激进的钢派头头少。他没能意识到，在当局眼里，“温和的

^① 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上午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没有文字稿，7月底本人在看守所追记陈述内容，标题为《法庭陈述（追录）》，交同狱的沈复礼保存，1983年沈出狱时带出。此稿现存胡厚民家属处，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一书收有此手稿图片，这里引用的是这个稿子。1986年9月，胡厚民将一份抄于1983年1月的《法庭陈述（追录）》交前来探监的四弟暗中带出，《烈火·永生——怀念胡厚民》一书收有此稿的图片。经比较，两份《法庭陈述（追录）》基本一致，仅少数数字词、标点有异。两份追录稿都在末尾注明“事后追录，很难真实，仅供杜干部研究时参考。”“杜干部”是武汉市中级法院负责胡厚民案的法官。

^② 周世明《从监号带出〈法庭陈述〉》，载《烈火·永生——怀念胡厚民》（自印本，2013年清明）。

造反派也是造反派”（陈云语）^①。

胡厚民在造反派头头中的位置，排在夏、朱之后，这次审判量刑最重。1982年9月26日长江日报报道《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受审判刑》对此作了解释：“胡厚民是湖北、武汉地区十年动乱的策划者、组织指挥者，是一九七六年以夏邦银为首阴谋最终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的重要参与者，是夏、朱、胡、张一伙拼凑的夺权参谋班子的头目，罪行严重。从送达《起诉书》副本直至最后对其宣判，他横生枝节破坏法庭秩序，受到了从严惩处。有的被告罪行也相当严重，但能够认罪，并表示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对能够认罪又态度较好的被告，合议庭在量刑幅度内作了从轻判处的考虑。”

参加公审会的武警战士执勤时对杨道远说，佩服胡厚民在法庭上的表现^②。

夏、朱、胡、张被宣判后，省长韩宁夫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说：“人民法院对在湖北武汉地区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进行宣判，是这伙反革命分子应得的下场，也是全省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次审判是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③。

按照中共中央有关规定，湖北省的“帮派分子”受刑事处罚的仅为夏、朱、胡、张四人，四人以下的“顾建棠等人由省下放到各地市、各部门作其他组织处理”。实际上，武汉地区受刑事处罚的“帮派分子”远远不止这四人。李承弘说据他了解有近百人。

197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以胡耀邦为组长的“‘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负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和各省、市、自治区“帮派骨干分子”的审理事宜。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相应成立了“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或办公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审理于1981年1月结束，“两案”审理领导小组于当年11月6日至22日召开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会议内容之一就是“平衡”“省、市、自治区或中央部委一级管理的拟判刑人员”。

2003年10月，顾建棠为向省高法再次申诉自己的被错判问题委托了

^① 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第204页，明镜出版社2017年版。

^②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31—332页。

^③ 以上关于审判夏邦银等四人的记述，参考并引用了记者良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的情况》一文，载湖北日报社编《内部参考》第31期（1982年8月24日）。

律师。律师在省档案馆查阅“两案”审理档案发现：“经省委同意判刑、上报中央审理的人数，第一次上报的是二百六十八名（于1979年9月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之前上报），中央给打回来了，因为拟判刑的太多；第二次上报将第一次上报人数打了10%的折扣，又被中央打回；第三次上报七十四名，经中央1981年11月6日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认定：‘我省的帮派分子应受刑事处罚的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①

这“第一次上报的二百六十八名”拟判刑造反派成员，与两清时省两清办公室制定的“268名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名单”，人数完全相同，不知是不是巧合。但估计“268名五一六重要骨干分子名单”中的造反派各级头头基本出现在拟判刑名单中，出入不会很大。

1981年11月中央认定湖北省仅夏、朱、胡、张四人受刑事处罚后，1982年3月17日湖北省委书记黄知真在第四次全省“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说：“到目前为止，……作敌我矛盾处理的（主要属于打砸抢性质的）依法判刑的一百九十多人”（见鄂发[1982]26号文件）。顾建棠认为“实际不止此数”。黄知真这次讲话近一年后，湖北省还有“帮派骨干”被判刑，如对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的宣判是在1983年1月。

湖北省作刑事处罚的人数远远超过中央审理认定的4人，省委给这些人安上的罪名“主要属于打砸抢性质”。1978年12月在公捕杨道远大会上，省委宣布的罪行是“四人帮在湖北的代理人，篡党夺权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这些罪名在1983年1月的判决书中改成“打砸抢性质”——“抢夺枪支弹药罪”、“抢夺公文罪”。工总早期头头、武汉工艺美术雕刻厂工人胡国基被判刑15年，罪名也是打砸抢。

顾建棠认为：湖北省委此举“显然大大违反了中央‘两案’定性处理政策，其中奥秘就在‘属于打砸抢性质’七个字上面”：

在清查运动中，省委把数以万计的群众和干部打成四人帮的代理人、黑干将、追随者、“三种人”，并把数以百计的造反派定罪判刑，但又把明明是以“四人帮追随者”罪名被判刑的人员（就是1982年1月中央9号文件所说“政治斗争”参与者），异化为打砸抢的刑事犯罪分子。当时的湖北省委这样做可谓“一箭三雕”：一、可摆脱违背中央9号文件明示

^①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465页。

的“两案”审理方针政策、继续搞扩大化的责任；二、可对上应付，万一中央问起，就以不属文革“两案”人员来搪塞应对；三、既将被判刑人员作为“两案”人员判了，又可无视中央9号文件规定的“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生活出路”，因为你“属于打砸抢性质”，置你于死地，你却无话可说^①。

1982年前后武汉地区对造反派头头的集中审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判决书中都没有了“恶毒攻击”的罪名。此前在学习班审查、拘留审查中，追查“恶毒攻击粉碎四人帮”“恶毒攻击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重中之重，1978年及稍后的判决书中还能够看到“恶攻”的罪名。武汉钢锯厂工人、原工造成员程贻兴的刑事判决书（岸法[78]刑字第3号）写道：“‘四人帮’粉碎后，仍散布反动言论，为‘四人帮’鸣冤叫屈。”

湖北省“两案”办公室成员谢杰民参加了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他在2000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明材料《关于顾建棠的有关情况》中说：“我省‘两案’办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经过清查，提出对



夏、朱、胡、张、顾等人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意见，报省委同意后，带到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上进行讨论平衡。经中央审理后，直到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会议认定，我省的帮派分子应受刑事处罚的是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而顾建棠等人由省下放到各地市、各部门作其他组织处理。顾建棠则由武汉市“两案”办（负责人是市纪委的杨世英同志）和“长办”处理。全国“两案”审理的五次工作会议我都陪许道琦、林木森、张思卿等同志参加，会前事和会后精神都向省委作了汇报，

^①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466页。

文件材料都存省纪委。”

1983年1月23日，武汉市中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顾建棠有期徒刑七年。

1月17日看守所副指导员对顾建棠说：上面要求春节前给你结案，“你已被关押6年，这就你的刑期。宣判之时，就是你刑满释放之日。”18日，起诉书送达，顾建棠说：“文化大革命是谁发动领导的？是毛主席、共产党，不是国民党、蒋匪帮。我在文革中是犯有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错误，请问我贪污盗窃了吗？杀人放火了吗？出卖国家情报了吗？投敌叛变了吗？因为我举手高喊过‘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就要起诉我，请问你们喊过没有？”一位检察官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奉命而来，按规定办事。”19日，开庭通知书送达，顾建棠提出：“出庭时不带铐子，囚车不鸣笛，要有医生相随，我无罪所以不脱帽，我陈述时不得阻拦。”法官“全都答应了”。1月20日，顾建棠会见两位律师，要求他们辩护两点，“一是我无罪，不是反革命；二是具体事件的申辩”。律师回答：“第一个问题你自己辩，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承担。”“我们是奉命而为，否则我们还当得成律师吗？你的事天知地知人人皆知，说句实在话，文革中是毛主席保护了你们，毛主席上天了，谁来保护你们呀？”21日上午，在市中院开庭。“检察官起诉，法庭调查，律师辩护，过场走完后”，顾建棠说：“这是政治需要，再有理也没用，但在宣判前要表明我的态度。”“我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共产党的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我与林彪、江青毫无关系，因而是无罪的，是你们把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休庭后开庭，宣布判处顾建棠有期徒刑七年。顾质问：说好的判六年，怎么变成了七年？法官解释：“原定是六年，后来发现你实际羁押六年零二十七天，如果按原定六年判，那等于法院欠了你二十七天，这不行呀，因此改判七年。但还是按刑满释放，明天你就可以回去。”顾建棠后来对友人说：这倒成了我欠法院三百三十八天，或者说法院“优惠”我三百三十八天；提前三百三十八天释放，你给个法律手续啊，没有。这不是儿戏吗？

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认定湖北省“受刑事处罚”的只有夏、朱、胡、张四人，“顾建棠等人由省下放到各地市、各部门作其他

组织处理”。所谓“组织处理”，谢杰民说就是“不判刑”，“回原单位作内部组织处理”。湖北省“两案”办公室按照这个精神，将夏邦银等四人判刑，将顾建棠“下放”，由武汉市“两案”办和长办处理。17年后的2000年顾建棠才从谢杰民处得知这一情况。

顾建棠为什么还是受到刑事处罚，谢杰民和市“两案”办负责人杨世英都不知道。2003年，长办一位被林一山重用的领导干部对顾建棠说：“你被判刑的内情我可以给你讲一下，是林老板给市委领导打了招呼：你给我把姓顾的办了他。市里就把你办了。但我不能为你作证，事情是真的，但我手上没有证据，林是口头打的招呼，没有文字报告，市委领导也没有给林批复。你还要保密，你一旦说出去，我可以不认账，但我说的是真话。我估计你翻不过来，心中有数就行了。”顾建棠“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其理由是：“如说谎不可能如此坦率，另一方面，从林一山对待郭志伟、黄友若、麦汝祥的作为，以及对严常和蔡发奋等的疯狂劲头来看，他如此对我，合乎其仇恨文化大革命、仇恨造反派的一贯思想逻辑”。

2000年11月，审判顾建棠的法官吴仲华对顾建棠说：“判夏、朱、胡、张，省委下了文件，但判你的刑没有听说有省委的文件，当时都是市委决定的，没有市委文件是不敢判你的。要是中央和省委认定不判你的刑，而武汉市委决定判了你的刑，这确实是个问题。我可以肯定市委一定有文件，否则我们不敢判你的。这种文件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当时不知道中央对你认定的文件，很可能是长办的某个领导与市里某个领导说了话，所以就下文判你的刑。”

2003年2月顾建棠到省档案馆查找武汉市委决定对其审判的批文，没能查到。他查到了省委决定审判夏、朱、胡、张的批文，也查到了省委对武汉市委关于追究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刑事责任的报告的批复^①。

顾建棠说，林一山一句话就可以推翻中共中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决定审判我的市委文件竟然在档案馆查不到，这又是一次儿戏。

从谢杰民处得知自己不应被判刑后，2000年3月顾建棠向市中院申诉，同年10月被驳回，承办法官说：“你这个案子肯定搞错了，但我无能为力。”11月顾建棠取得谢杰民的书面证明，2001年3月向省高院提出申诉，

^①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87—390、329—333、400—403页。

立案庭说：“最好你能找到省委哪个领导，在你的申诉状上批示交办，那就一定受理。”顾建棠找到原长办同事、省政协副主席张荣国，张荣国转请省委副书记杨永良批给了省高院。省高院12月23日驳回顾的申诉，理由是“原判认定你犯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你对该案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顾建棠拒绝在驳回申诉通知书上签字，他说：通知驳回的所谓“申诉理由”，我根本没有向高法提出，我的申诉状核心是原判决不符合中央和省委对我的审理认定，而通知书对此有意回避。12月26日，张荣国对顾建棠说：“我问（省高法）吴院长，不是中央审理中只认定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四人应受刑事处罚，顾建棠不在其内，是作其他组织处理的吗？吴院长解释说：是有这回事。但顾建棠是知名人士，武汉中法有权审判。”^①顾建棠历时近两年的申诉失败。

从2002年12月到2007年6月，顾建棠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负责人、人大、政法委、法院、纪委写了204封申诉信。省纪委书记黄远志的秘书告诉他，这些信都转到省高法。顾建棠数十次到省高法上访，陆续得到这样的答复：“你的案子不是市中级人民法院要判决你，而是省、市委决定要判决的。你要省、市委发话，我们马上给你平反。”“像你这样的案子武汉市有很多，如果帮你解决了会产生连锁反应。”“中央没有明确的文件说文革的案件可以重审、平反。”“湖北省平反文革的案件没有先例。你可以找出先例来。”“不管你有多大的理由，多充足的证据，我们就是不立案。”^②

1983年1月，吴焱金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审判前，吴焱金一再要求“在什么范围抓我，就在什么范围公审我。我要求召开百万人公审大会”，当局不予理会。他问法院指定的两位免费律师：“你们能为我作无罪辩护吗？”律师回答：“当然是作有罪辩护。”吴说：“你们连情况问都没问就推定我有罪，我要你们来辩护什么？你们昨天在哪里发财，今天还是去哪里发财。”吴焱金委托妻子做辩护人，为自己作无罪辩护。

吴焱金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自己1983年1月24—25日在法庭上发言、插话、陈述的要点：

^①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86—399页。

^② 钟逸《湖北“文革两案”刑满人员解决生活费问题始末》（网文，2007年）。

(一) 1967年的一·二六夺权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直接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指示。《起诉书》说我是反革命夺权，矛头究竟指向谁？

(二) “反复旧”问题当时已经过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有错无罪。

(三) 批林批孔运动中群众代表的补台符合毛主席要“吐故纳新”的指示精神，省、市委主要领导人当时也认可并积极实施，怎能称为我颠覆政府的罪行？“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不是我总结出来的（其实是朱鸿霞总结的，只是我在法庭上没说而已），但我并不反对这五字方针。至于“你今天放出来，明天就入党，后天就叫你当书记”这样的话是你们编造和强加的，我可没有那么大本事，朱鸿霞、李想玉和我自己文革十年都不能入党，这不是乱扣帽子，胡说八道吗？

(四)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这个口号不仅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一直到1977年宣布逮捕我的时候，你们不是仍然在“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吗”？我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无罪。

(五) 我们拥护中央1976年4月7日处理天安门事件，是因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讨论决定的。我一直对紧跟毛主席的周总理充满崇敬，更没有说过武汉人民给周总理献花圈是反革命，这是你们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

(六) 当时逮捕我时在全市大会上宣布我的三条罪状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充当四人帮、夏、朱、胡在武汉篡党夺权的黑干将。”现在为什么变成了“阴谋颠覆政府罪”？我在看守所大反英明领袖华主席，为什么不公诉我？（这时，公诉人在台上发言，对我在看守所关押期间的胡言乱语不予计较。好高的姿态呀！）

1983年1月25日，市中院当庭宣判：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吴焱金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1977年3月14日（吴焱金关进学习班之日）至1985年3月13日止。法官将判决书递给吴焱金，吴不看，当场撕碎。审判长成厚胜对吴焱金说：“这都是全国统一定，你要想辩明造反派无罪，除非四人帮无罪。”判决当日即以保外就医（吴并未申请）的名义让吴焱金离开看守所。1984年夏，吴焱金为医药费、生

活费一事求见副市长谢滋群遭拒，吴“写了一封措辞不太客气的信”给谢。“就因为这封信”，1984年9月吴焱金被投进武汉第二监狱，服完刑期^①。

曹承义被判刑比夏、朱、胡、张早八个月，他1981年11月3日被市中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这是二审判决，也是终审判决。一审判决还要早，是青山区法院于1980年9月24日作出的，曹承义在判决书上写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违背事实与中央精神的判决与量刑，理当不服，拒绝签字。”于是向市中院提出上诉。市中院二审距一审一年多，对此有关方面没有对曹承义作出任何解释。曹承义在市中院的判决书上签道：“不服，冤案。”他知道，在终审判决书上签“不服”，其作用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态度。

二审判决虽然和一审一样判处曹承义五年徒刑，但两份判决书有数处不同。

第一处，二审判决将曹承义关在五不准学习班的近十个月折抵了刑期，曹承义将少服刑十个月。一审判决的刑期从1977年9月28日起计，那一天曹承义在办学习班十个月后被正式逮捕。那一天，一冶党委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为加快我国钢铁工业建设作出贡献”大会，两万五千人参加，冶金部、省委、省军区、市委多位要员出席。对曹承义进行控诉后，一冶党委书记徐扬宣布：经请示省委批准，撤销曹承义一切职务，建议公安机关对其实行逮捕。会后即被押往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二审判决的刑期从1976年11月19日起计，那一天曹承义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就在那一天，“工农兵”成员冲进学习班驻地殴打曹承义，并要将他第二天拉出去游街，曹承义当夜跳楼逃走。曹承义在外躲避三个月后，“张玉华公开放风：‘只要曹承义在三日内自动回到一冶学习班，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曹承义相信了，回到学习班。曹承义在学习班实际只待了七个月，二审判决还是以十个月折抵刑期，没有扣除曹承义逃在外的三个月。

第二处，二审判决书将一审判决书所言“打砸抢罪”改成“扰乱社会秩序罪”。

第三处，一审判决书中列出的多条罪状：1968年6月给武汉警司贴大字报并“策划企图砸武汉警司”；1976年1月起草传单并散发，请夏、朱、

^①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189、198—199、201—204页。

胡来一治作报告，6月“与同伙策划进一治领导班子的‘五十人名单’”；1976年春节期间参与张贴、散发“大乱湖北、武汉的‘三封信’及口号报”；“粉碎‘四人帮’后，曹多次诽谤说是‘右派政变’”，这些罪状二审判决书中都没有了^①。

傅廉1976年10月27日被关进五不准学习班。一年后在武汉体育馆召开的省交通系统群众大会上，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在看守所关押三年后，判刑四年，宣判后当即释放。傅廉回忆：“法院来与我对了两次案，就开庭审理。我把法官驳得哑口无言，我说我们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没有干过什么坏事，（我们运出的）省市清办的材料都是整群众的黑材料，怎么是省委机要档案呢？要是有问题，那赵修、王克文不是都有问题？他们宣布判决之前，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要求还我清白，不能判刑，审判长名字叫王健，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另外的要求？他们的意思是要我要求回原单位，在宣判那一天单位的组织处长和保卫处长都在那里，他们以前都是铁杆老保，我宁愿出来之后在社会上流浪，也决不在老保面前低头，我说没有什么要求。在判决下来之后，王健对我说很对不起，我们无权判你，这都是执行上面的精神。”“我坚决不肯在判决书上签字，我的罪名就是批斗赖振华（省军区副司令员），再有就是抢材料的事情，当初抓我的时候议论华国锋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现在取消了，这些情况都够不上什么罪责。”傅廉出狱时，距刑满还有一个多月^②。

杨道远1970年8月分配到江西安义的部队农场，1971年2月押回湖北，辗转多地隔离审查，直到1978年11月从襄北部队农场押回武汉。当时他觉得：“从1971年被他们隔离之后，后头的那些运动都牵涉不到我，他们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说是主要清查四届人大以后的事，这样就跟我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我回武汉的时候，心里还存有一份希冀，认为这次真的可能把我的问题彻底搞清楚，还我清白和自由了。万万没有想到监狱的大门已经为我敞开了。”

1978年12月7日，省委在洪山礼堂召开批判大会，会上宣布开除“四人帮在湖北的代理人，篡党夺权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杨道远的党籍，逮捕法办。

^① 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49—253、197—198、168—172页。

^② 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傅廉）》，2009年。

省委、市委召开万人批判大会

彻底清算反革命分子杨道远的罪行

市委第二书记刘惠农主持大会 省委副书记王群讲了话

和影射，煽大局，向前看，加强团结，鼓足干劲，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本报讯 十二月七日上午，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革筹办批判大会，揭发批判反革命分子杨道远。中心会场设在省委中山礼堂，武汉设八个分会场。参加大会的机关干部、工农兵群众共一万多人。

省委书记程大椿、副书记王群，武汉部队副司令员林德先，武汉市第二书记刘惠农，书记李俊，梁晓燕，以及省委其他负责同志参加了大会。省、市、工、农、青、妇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刘惠农同志主持。

四座布景反革命分子杨道远上台会场时，神情傲慢，高呼革命口号。会场始终充满愤怒的斗争气氛。

武汉财经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浙江日报社、塘口区的地产公司、武汉建筑工程学院等单位的代表，怀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在大会上作了揭发、批判。他们列举事实揭发，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革命分子杨道远，由于他对我们伟大的党、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伙同反革命分子夏、朱、胡、宋，上窜下跳，组织“关王庙”搞了个“黑爪手”，“四人帮”的黑爪手，黑手段，疯狂平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一系列滔天罪行。

杨道远恶安道顺和德林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火填“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继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恣意攻击老无产阶级革命家，肆意侮辱革命领导干部，冲击党政军机关，妄图搞垮省委和省委党委，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一九六七年七月，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借批王力等人制造武汉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杨道远恶安道顺、宋、胡、张紧密配合，并以“批军内一小撮”为突破口，掀起了反军乱军的滔天恶浪。杨道远还亲自主持召开反革命会议，策划、组织一些人到我省各专署和全国二十四个省市搞什么“全国大串连”。他们组织的小分队到全国各地，肆意冲击军事机关，围攻部队营长，破坏军事设施，抢夺武器弹药。

载 1978年12月9日 长江日报第1版

1982年下半年，省公安厅政治部三人持两清时的材料，来看守所向杨道远“落实”。他们首先提出五一六问题，杨道远进行了驳斥。1983年1月，杨道远收到起诉书副本，起诉杨道远“抢夺枪支弹药、抢夺公文”两条罪状。

杨道远回忆：1月18日开庭，“庭审过程中念的证明材料都是1971年及以前抓五一六时的逼供材料”。“法庭辩护阶段我的律师几次发言，内容就是一个：‘杨道远应该负他应负的那部分责任。’……杨道远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呢？公诉人所指的责任有哪些是不应由杨道远负的呢？哪些应该减轻的呢？我的辩护律师一句也没说。”针对两条罪状，杨道远在为自己辩护时主要讲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

在作被告陈述时，杨道远说：

现在我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我为什么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党的文件告诉我们，不搞文化大革命，党要变修，国要变色，人民要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我是穷人的孩子，生在旧社会，是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我的家乡，我家和千千万万穷苦人家一样，从此翻了身，我这个穷孩子也有了上学的机会。我深深懂得今天来之不易，我的内心充满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感激。受教育十几年，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干社会主义成了我的准则。旧社会的苦我是记得

的，有人要我们回到旧社会去受罪，我们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我在学校里一贯是党的积极分子，只要是党的号召我没有不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当然要积极参加。我们的目的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反修防修，让工人阶级牢牢掌握政权，使我们的党永不变质，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具体的就是用毛主席的指示去对照一切人和事，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拥护，就支持；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反对，就批判。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听命于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法官打断杨道远的陈述，问他有什么要求，杨道远回答：“我的要求就是给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当庭对杨道远的判决是：“抢夺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抢夺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自1971年2月8日至1983年2月6日。

三天后杨道远决定不上诉，1月24日杨道远被释放。看守所交待他“回家过几天再到公安局办手续，因为还差几天到期”^①。

第二节 “帮派骨干”在狱中

1977年底开始，武汉地区的看守所、监狱关进了大量造反派。他们被其他犯人视为一个群体，称之为“运动犯”。这些“运动犯”在狱中有着与其他犯人不一样的表现。

曹承义说：“运动犯”进来了，不仅不会吃亏，还会受到犯人的尊敬^②。段凤慧在襄北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其他劳教人员经常对她说：“运动案子”“说出去不丢人”，“很多人都说不好意思面对你。”^③吴焱金说：“初进看守所，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大、小便不能自理，看守所派了四个刑事犯照顾我，这四个人居然不嫌脏臭，照顾我一年多。人人都知道牢房里有牢头号霸，但我关押六年多，换过几次监号，我在所有坐过的几个监号里没有发现号霸欺凌弱小的行为。”^④

^① 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20—341页。

^②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82页。

^③ 凤愿《日记1978—1979》第21、314页。

^④ 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89页。

1976年10月底，云南电力局派人将丁家显从河南邓县老家带走，一上火车就将他捆绑起来。当年底召开大会宣布对丁家显正式逮捕，然后批斗、游街。这样的公捕进行过多次。丁家显先被关押在罗平县看守所，几个月后转到曲靖陆东煤矿，和劳改犯一起挖煤，没有经过判决的丁家显成了不在编的劳改犯。丁家显患低血压病，一下井就发病，多次昏厥。“同牢们见此情形，无比同情，向狱方要求不让丁家显下井，可狱方说丁家显属重刑犯人，不能特殊，必须下井。在多次申求无果的情况下，同牢们见狱方不讲人道，一百多人举行罢工游行，向狱方提出要丁家显不下井，如强行要丁下井，他们就都不下井。”“最后，（狱方）作出了妥协，同意丁家显不下井。”丁家显为狱方虐待犯人组织抗议活动被关进禁闭室，于是绝食。犯人再次游行抗议，狱方在丁家显绝食五天后将他放出禁闭室^①。

监狱管教和武警战士中的很多人对“运动犯”另眼相看。

杨道远说：

在看守所值勤的战士对我们是很好的。有一次值勤战士对我说：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好人，背着枪站在这里内心感到惭愧，我们是没有办法呀！我说：革命战士执行任务，我们理解，这不是个人的事，我很感谢你们。战士还说：指导员不准我们和你们说话，说有个战士同你们说话，结果眼睛被犯人用铁丝捅瞎了。我们不相信。战士们经常送吃的，连队大食堂有什么就送什么，油条、馒头、烧鸡，甚至还有买点心送给我的。我要他们不要送，送去了我不肯收。他们就谎称“干部来了！”要我赶快收下，别让干部看见了他们下不了台，他们是真心帮助的。晚上值勤战士总是同我聊天，给我讲故事，为我解闷^②。

吴焱金说：

在牢房里，政治犯（在牢里又称“运动案子”）是受到刑事犯人尊重的，连管教干部在态度上也把我们政治犯和刑事犯区别对待。刑事犯如果有大声喧哗或其他违犯监规的行为，轻则训诫，重则镣铐加身，严重者还会被丢进隔音室。而对政治犯们则要客气得多^③。

曹承义说：

我在第一看守所关押长达4年左右，……这期间受到这些素不相识的

^① 参见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第613—621页。

^②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333页。

^③ 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89页。

看守人员的多方照顾，从未受打骂和加铐之类的虐待。冷天，安排我到办公室去生火炉；夏天，早晨7点多钟就赶早开门给我放风。在专政机关的最底层的看守所，在举国对造反派头头妖魔化、必欲斩尽杀绝的形势下，他们对落难的造反派头头做到了尽可能的照顾。

有一次，我被从看守所押送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批斗，押送人员将我转到青山区公安分局看守所代管一夜。那天天气非常寒冷，看守所一负责人以谈心为名，让我得到力所能及的照顾，和我一起烤了一夜火炉，没将我送进监号。在批斗会召开前，一冶工业安装公司一位炊事员冒险送来了丰盛的饭菜给我吃，在场的看守人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阻拦。我真像回到了自己单位的革命群众之间。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对造反派都是血腥镇压的。造反派怨深似海，有些正直的公安干警是同情造反派的，他们并不认为造反派头头是坏人^①。

吴焱金经常不守监规，他“画上大幅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画像张贴在监号内，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或大声朗读毛主席诗词、革命烈士诗抄，高唱《国际歌》和岳飞的《满江红》等等”，“想唱什么就唱什么”。监号的墙壁上刻满了他写的打油诗，还写在开水桶上。吴焱金说：“从第一看守所的所长到所有干部都给了我极大的宽容。尽管我在看守所里为所欲为，闹得一塌糊涂，他们从没有对我大声训斥，更没有用刑具惩罚，而他们对刑事犯的惩戒我是亲眼目睹的，犯人‘背宝剑’的刑罚是很痛苦的。”“就连人称‘周阎王’的周所长对我也是很客气的”。

一天吴焱金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天深夜，他“以最大的声音作打倒华国锋的讲演，大骂他是叛徒、骗子、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管理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打开牢房”，把他关进隔音室监禁。“隔音室约1.5平方米左右，既无床铺也无被褥。地上有一小洞，是供犯人大、小便用的，洞旁边有固定的脚镣、手铐刑具，隔音室密不透风，只有拇指大的一个小洞透气，既无水又严重缺氧，两道厚厚的门完全隔音，里面闹翻天外面什么也听不见，一副比棺材还要厉害的活棺材！”

吴焱金在隔音室关了半个月，人称“孔铁嘴”的市公安局孔副局长找他去谈话。吴焱金回忆：“我不但绝不承认我在看守所演讲有错，还说关

^① 曹承义《悲欣交集話文革》第176—177页。

押我也是非法的、错误的。我跟毛主席太紧，你们却污蔑说我反对毛主席。我从没有反过华主席，你们非要给我扣上反对华主席的帽子，那我今天就真的反了华主席，让你们按这个罪名给我定罪好了。我多次见过毛主席，我当市革委会副主任还是毛主席批准的，为什么不说是毛主席帮？我多次见过周总理，一块吃饭、喝酒、看电影、照相，为什么不说是周总理帮？我从未见过那四个人，为什么把我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我身体有病为什么不给我治病？你们说我有罪为什么不公审？……我侃侃而谈，谈了两个多小时，孔副局长不耐烦了，一挥手，枪兵不送我回隔音室，却将我送回原监号。我拒不检查，也被强行解放了，以后对我提起公诉时也不提我在看守所公开大反华国锋的事，因为华国锋那时已经被撵下台了，成了又一次宫廷政变的牺牲品。”^①

“运动犯”们造反旧性不改，以各种方式要求改进监狱管理。

顾建棠是“建言”。他回忆：一天看守所孟所长找我谈心，“谈得来”时，“我乘机机会向孟所长反映：煮饭的米要洗；我们都吃不饱饿得很，能否想些办法多搞些瓜菜代；希望把一周放一次风改为每天放一次风。其他人也反映饿肚子的事，后来这些问题都先后得到改善，特别是解决了大家饿肚子问题。孟所长和余指导员在做火柴盒的羁押人员中开展超指标有奖活动，每人每天的定额是1000个，超额有奖。一个月下来，我能得两斤饼干，武重厂的戴行江可得到4斤，有时还分得苹果。在当时饥饿难耐的情况下，确实是一项善举。”^②

曹承义是“闹事”加“走私”。他说：有一年冬天，整个监号几百人有十几天天天吃腌菜，他就带头叫喊起来：“你们喂猪也不能这样喂呀！”全体犯人都闹了起来，中午送来的菜里才增加了一点豆腐。他还说：他在关押期间注意处理与看守的关系，所以时常受到看守的小小关照，比如允许他花钱去买一些饼子、油条、面窝和红糖、白糖。不仅自己享受，还利用外出放风、洗晒衣物、取水取饭等机会，向吴焱金、沈复礼、董明会、罗世栋、傅廉、林子忠等人分送食品，竟然没出过一次事^③。

有条件的“运动犯”们不约而同地在狱中学习英语。

曹承义和水运工程学院教师李苏明约有一年时间关在同一个监号内，

^①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91—195页。

^②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24—325页。

^③ 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77、185页。

每天跟着李苏明学《英语九百句》。李苏明“非常耐心地教”，曹承义“大约在一年时间内就大体能够默写出《英语九百句》了”^①。

顾建棠向同监号的天主教原汉口教区辅理主教刘和德学英语，用管教送来的《英汉小词典》当教材。九个月后顾建棠能够阅读英语短文^②。

1990年2月16日，胡厚民在致姐姐胡秀娟的信中，开了一张书单，让她转求经商的方斌出资购买送来。这些书是：全套二胡曲集，鲁迅全集，简明马克思主义词典，哲学大辞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资治通鉴（包括续资治通鉴），佩文韵府，中国通史（范文澜著），廿四史，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中国人名大辞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当代国际人物辞典，历代名篇赏析集成，周恩来传，金元明词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中国成语大辞典，中国古代名句辞典，外国人名辞典，古文观止新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精装），周恩来书信选集（精装），世界名言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手册，名联鉴赏辞典，世界史手册，陈再道回忆录，杨成武回忆录，徐向前回忆录，叶剑英回忆录，张体学传，世界历史辞典，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红楼梦鉴赏辞典，辞通（上下集），辞源，资本论，书法艺术，中国名胜诗文鉴赏辞典。胡厚民在信中说：这些书“仅是我在这有限条件下所知的，虽是我久想而望而兴叹的”^③。

胡厚民要这些书的时候，距离他刑满只有两年（刑期1992年3月9日止），这是他知道；距离他1990年10月31日突然病故，只有八个多月，这是他不可能知道的。

在狱中爱好写旧体诗的“运动犯”为数不少，他们基本不通格律，他们的诗只能称为“打油诗”。

吴焱金在监号墙上、水桶上、“毛选”空白处、材料纸上写下一千多首打油诗。写回忆录时他记得的有：

监规上书革委会，要我遵守理太亏。

若还承认革委会，你就要听我指挥。

究竟谁夺谁的权，哪个错来哪个对。

除非主席亲口讲，我已不知该听谁。

① 参见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186—187页。

② 参见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326页。

③ 参见《烈火·永生——怀念胡厚民》（2013年清明自印本）第162—166页。

慷慨赴死固可赞，事到临头并不难。
最怕坐牢人有病，不死不活长期关。

我只服从真理，决不屈从压力。

本是平常老百姓，党有号召即响应。
一心紧跟毛主席，十年奔波干革命。
光明磊落心无愧，热血满腔天作证。
忽报“元凶”就是我，冤狱五载何处申？

自遭冤狱愤慨多，无处申诉闹一所。
墙上刻满打油诗，对窗高唱《国际歌》。
吟罢唐诗背宋词，绝食抗议免吃喝。
演讲打倒华国锋，半月隔音室内过。

舍得一身剐，什么都不怕。
无私心自宽，有理走天下。

看破红尘万事休，无私无畏即自由。
粉身碎骨折磨够，不过洒血抛头颅。
要杀要剐宜趁早，从重从快快动手。
纵然有理无处讲，砧板上肉一块肉。

孤身谁惯过佳节，年年难过年年过。
观罢月圆观月缺，看了日出看日落。
背亲离朋千朝少，别妇抛雏三载多。
何以略知人间事，唯有报纸和广播。

铁门铁窗加铁锁，哨兵日夜守卫我。
开水热饭送门口，早晨晚上听广播。

身居闹市未闻闹，人在梟中不知梟。

寂寞冷清谁作伴，睁眼便做火柴盒^①。

有一段时间杨道远、胡厚民两人的监号紧挨着。“这样除了放风说话以外，……还可以扒在风门口谈话，还经常敲墙致意（早上好、晚安……），相互赠诗。”

杨道远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75年，取名“冬梅”，当时他被省委关押在襄北农场。1981年杨道远在看守所看到女儿的照片，写了一首诗：

咏梅

风刀霜剑生存难，钢筋铁骨斗严寒。

根植大地三千尺，一拨冰雪送春还。

杨道远把这首诗和照片送给胡厚民看，胡厚民说写得好，和了一首：

为冬冬赠父之玉影题照

1981.12.1

惊问冬姑娘，蓓蕾何芬芳。

苦雨催先发，母晖促早香。

慕尊爹厚福，嗟愚伯久怆。

人当重兴国，无情非干将。

胡厚民得知杨道远姐姐去世，写了一首诗请哨兵送给杨道远：

哭杨姐

1981除夕至1982年元旦

除夕悲闻晴天雷，鸡报元旦人未寐。

滚滚泪湿西房枕，短短诗吊东屋姐。

往来一墙虽难隔，伤病七尺何禁宣。

强将巨痛藏心底，好让尊弟安过年。

原以弟不知今闻已知，悲勿过甚，请保重。

杨道远出狱时写了一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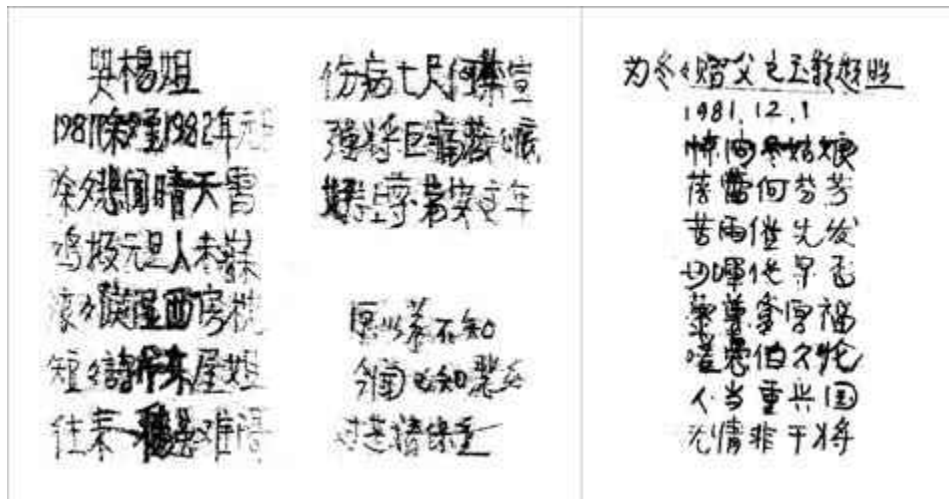
出狱 1983.2.4

为党为民遭禁囚，历尽劫磨方自由；

九死不泯革命志，再踏共产崎岖途^②。

^① 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第191、192、197页。

^②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330—331、342页。



胡厚民手迹

胡厚民在狱中写了大量诗歌。1983年当局在襄北劳改农场梁坡砖瓦厂盖了一排平房，周围建起高墙，屋顶有哨兵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同住，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此处为“胡家大院”。胡厚民在这里可以读书写字。他把练习本拆开，请院内的装订作坊重新装订成几个厚厚的笔记本，将自己的诗文都抄在上面。在第一本的扉页上他写道：“血写的诗，泪谱的歌。献给亲爱的党，狱子丹心一颗。”

胡厚民去世后，这几个笔记本由胡秀娟保存，《烈火·永生——怀念胡厚民》一书的编者从中抄出胡厚民的部分诗作。

1982年7月开庭后，胡厚民接连写下三十多首诗，其中有：

遗臭不由今日定，流芳更待未来评。
是非颠倒史不乏，古今反正例如云。
今日难管未来事，未来不怕今日刑。
他日你我虽成古，稀有子孙报输赢。

自古英雄功无数，却因失节恨难收。
小子不才难成器，惟报党育三十秋。

早知今日事，不悔当年志。
比起伟先烈，不过小意思。

开庭吟

雪衫黛裤上下摆，青鞋白袜穿内外。
尽管污水泼数秋，但见青白依然在。

判归吟

狱中老汉不知悯，一身新穿上法庭。
判罢双十重刑归，依旧轻歌曼舞频。

诸公轻判我高兴，我虽独重友莫惊。
若能一死换全归，我愿乐将一弹吞。

三月预审搞六冬，精益求精下苦功。
奇迹不负有心人，独创法坛马拉松。

拒接所谓起诉书

等得雪染颠，方下邀请柬。
拿去回编导，届时台上见。

答被指派来两位律师

宁搞真独唱，不演假双簧。
留得三十元，孝我苦命娘。

非我眼具特异功，确知编导隔墙控。
不信请到后台看，电视机前话西东。

原告发言从无阻，被告请讲举酸手。
法官不坐天平中，竟与原告站一头。

千对何怕人开口，万错尽出官洋相。
手无寸纸慷慨辩，汗流满面照本宣。
真理谬误谁当是，法庭内外有明鉴。

听罢辩词驳原告，通篇谎言加大帽。

若将语录摘几句，活像当年批判稿。

胡厚民抄在笔记本上的自己写的诗歌有上千首，一部分写于文革中。在他的狱中诗歌开始流传前，熟悉胡厚民的人都不知道他有这一爱好。胡厚民在狱中的诗歌涉及的题材很广泛，选录几首如下：

铁窗戏占

隐居一洞天，快活像神仙。

踱步代耕地，遐思当纺棉。

三餐来伸手，九桩不掏钱。

诸君急何往，此处胜桃源。

（自注：九桩指柴，米，油，盐，酱，醋，茶，房，电）

初会慈母感录

一九八三年二月 日于梁坡

（一）

风吹本末丽旬分，监会却不泪纵横。

不是高堂心不痛，坚信狱子主义真。

四会四弟、六会幺弟感录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于机床厂

（一）

举凡卫党兴国家，必遵师训五不怕。

四不今已成事实，一项尚须待令达。

早知家□破今时，不悔身许济天下。

纵然死神来拜会，昂首不辜导师话。

闲吟诗

乐岂烟生，忧非酒亡。

苦海乐天，唯因信仰。

1985年

第三节 处理未判刑的“帮派骨干”

从1976年底开始陆续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帮派骨干”“帮派分子”，经公安部门和各级专案组审理，没有被判刑的，释放回原单位监督劳动。这批人在监狱里度过数年，有的得到“免于起诉决定书”；有的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组织结论”予以说明，个人档案里也没有记载。董明会（关押六年）、潘洪斌（关押五年）、沈复礼（关押六年）、谢邦柱（关押四年）、林子忠（关押三年）、谢保安（关押两年）、聂年生（关押四年）、庞道铭（关押六年）、梅子惠（关押两年半）等一大批人都属于关押数年免于起诉这种类型。

从1976年底开始一直被关在五不准学习班的“帮派骨干”“帮派分子”，1978年春节前后开始陆续被“解脱”。一部分人仍被办学习班，但改为“走读”；一部分人得以上班，但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无论大小，一律撤销。

这些“帮派骨干”“帮派分子”从看守所释放出来，从学习班解脱出来，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就此了结，他们被告知必须老老实实劳动，等待“结案”。约在1982年下半年，武汉地区开始“清理‘揭批查’运动的遗留问题”，对这批人作出“清查结论”，记入档案。“结论”多是“犯严重政治错误”，并附加“组织处理”。“罪行”较轻的人其“结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政治错误”，如武钢电修厂彭绍鹏。

“组织处理”有：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年；开除厂籍（公职），留厂（单位）察看×年，行政记过、记大过或免于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背负“结论”的“帮派分子”，本人在调薪、调动、求学、评职称、分房等方面，其子女在升学、参军、入党入团、就业等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沈复礼关押六年后“免于起诉”，按当时的政策应该回原单位安排工作，武锅厂党委书记何汉香、副书记李岩坚决不接受。市长吴官正多次来厂交涉也不行，便将他安排到长江锅炉厂。沈复礼在该厂任“没有名分的总工”。后组建武汉锅炉集团，长江锅炉厂并入，沈复礼又成为武锅职工。八十年代初，浙江大学来函商调沈复礼夫妻，百万雄师成员闻讯群集市委上访，说沈复礼没有像夏、朱、胡一样被判刑，群众本来就不服，现在不能便宜了他，不能让他调走，要把他留下来当批判的靶子。沈复礼调动一

事就此作罢。1994年，1963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的沈复礼56岁，经自己要求办理了提前退休，享受工厂最低标准的退休工资^①。

一冶设备处的李开键，1977年9月24日从学习班押到批斗会现场，会上宣布将其“交公安机关逮捕法办”后，直接押往青山区公安分局看守所。1980年1月初，青山分局预审员将李开键从监号提出，一冶专案人员递给他“李开键的见面材料”，让他签字，说签了字就可以出去。材料有六条：“一、邓小平是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二、毛主席百密一疏，选错接班人，华国锋领袖无能；三、汪东兴背叛了毛主席，成全了叶剑英、邓小平；四、毛泽东尸骨未寒就遭无情清算，令全国人民心寒；五、他们沿用了中国封建王朝皇帝驾崩后以“清君侧”之名行政变夺权之实；六、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后，想上山去打游击。”李开键拒绝签字，他说：“三年前在半年多的学习班中，我无数次地否认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三位专案人员“败兴而去”。那位预审员对李开键说：“关了几年还蛮清醒。”“今天如果你签了字，就麻烦了。”1980年2月14日，腊月二十八（除夕前一天），没有在“见面材料”上签字的李开键还是出狱了，宣读免于起诉决定书的还是那位预审员，在场的有那三位专案人员中的两位，还有一位一冶公安处的干警。预审员将李开键送出监狱大门，分别时对他说：“开键，出去以后想心思多赚钱，再莫介入政治。”李开键2009年在回忆录中写道：“听了这句话，我顿时觉得自己好似从国民党监狱被放出来的政治犯。时至今日，这种感觉被现实彰显得愈发真实。”李开键被释放后“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89年3月53岁时经自己申请，得以提前退休^②。

李承弘回忆：1978年4月8日从学习班“解脱时给我宣布了6条纪律：1. 问题是严重的，怎么处理都不为过，但态度是好的，回分厂监督劳动听候处理。2. 随叫随到。3. 随时写材料。4. 不准说学习班审查时情况。5. 不准在社会、厂内进行串联活动。6. 一周口头禀报一次。”1982年，给予李承弘的“清查结论”是“犯严重政治错误”，“行政处理”是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一年。留厂察看期间只拿生活费，没有奖金。一年后李承弘恢复厂籍。1984年全国工资普调，武船百分之九十五的职工上调一级，尽管李承弘努力工作，患肝病不休息，还是未能如愿。厂党委书记林甫说：

^① 2019年4月笔者访谈王光照的记录。

^② 参见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载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第270、279—281、283页。

“这些人升了级，那前几年批四人帮运动不白搞了？”直到1993年退休，工作了35年的李承弘还是三级工^①。

1977年1月省委下文，决定对王光照实行隔离审查。王光照当年2月关进厂党委举办的学习班，地点在东湖疗养院。这所疗养院里还办着其他单位的“重点人头”学习班。其间张玉华一次到武锅，专门问到王光照，得知还在学习班隔离审查，“就批评厂党委右倾”，说“这样的人早就应该进去”。专案组成员说王光照“态度是好的”，张玉华才作罢。1978年8月，厂专案组让王光照在专案材料上签字，他拒绝了。王光照说：“第一，搞了这么长的时间，省、市委把我当成‘四人帮的帮派分子’进行隔离审查，在‘揭、批、查’中我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接受了六十多场批斗，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口咬定我是‘帮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批斗会是党委组织、主持的，也就是说，从省、市委到厂党委早已经对我下了结论，那还要我签名做什么呢？你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还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不调查研究，事先下结论，然后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来解决，这符合毛泽东思想吗？第二，文革中，我奉行的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几乎所有的活动都遵循党中央、毛主席的文件和指示，总体上没有大方向的错误，有理解不深、有片面的地方也只是总结提高的问题。何况全厂从党委书记到普通工人谁又理解得深刻全面呢？是不是都要来个隔离审查、签字画押呢？第三，你们兴师动众、挖地三尺，查到半点我参加‘四人帮’帮派的确凿证据没有？文革中我只参加了革命群众组织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这个组织被毛主席亲自定性为革命左派，怎么同‘帮派’等量齐观呢？据此三点理由，我拒绝签字画押。”王光照认为：“签与不签，强权可以照办不误，可是不签却可以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而且这个东西是要存档的，长远来说不签字有其必要性。”事后武锅支持造反派的老书记赵秀岳告诉王光照：“你攻三办、揭批张玉华，得罪了他，他来厂里专门问到你，批评厂里右倾，怎么不把你送进去”。“算你们几个走运，厂里整了你们四个人的材料，你、李洪荣、王庆庭、杨逢春，

^① 参见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第309、323、325页。

向上打了报告，要抓进去呢。这个报告被市里压下来了，中央有新的精神，人已经抓得够多了，刹车了，你们逃过一劫。”

1978年初夏从学习班解脱后，王光照被安排在铸铁车间型砂班劳动，每月生活费30元。在宣布这个决定的第二天，厂党委一位副书记让他谈谈想法，王光照说：“十年文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也犯了‘方向性’的大错误，‘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造反派内。这不，我厂经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批造反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副书记说“不要这样看问题”，王光照说：“这是事实！但这不是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你也是文革过来的人，当然知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句话，我‘混’进了什么当权的机关了呢？十年文革，我奉行的是五一六通知的方针、方向，是在它设定的范围内造反，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没有依据中央文件和最高指示。请你认真读读‘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炮打司令部’，用它来检验我的文革言行，总体上我在哪里违背了这些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一些人以党的化身自居、同这些文献反其道而行之，声称是准确、全面、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在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你可以相信，我却不信哩。党的九大、十大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对文革有全面的论述，今天却被弄得面目全非。这些都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这样的党我怎么会听它的呢？它把当时党的‘通知’、‘决定’弄得不算数，把我们这些人往死里整，几时高抬过贵手？我再要听它的，保不准再被整，那不是犯贱、找死？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对这些东西要离得远远的。俗话说：不吃他的食，他就割不了我的卵子。”

厂动力科技人员王光照在铸铁车间当配砂工人，决心“以一身汗水洗刷扣在头上的污物秽语，我们就是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直起腰杆，用行动来讨回公道，争口气，证明自己也是堂堂正正的人。”他努力工作，以自己的特长成功地进行技术革新。1982年初夏，王光照的“清查结论”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王光照拒绝签字。对他的“组织处理”是开除厂籍，开除干部队伍，留厂察看两年，监督劳动，以观后效，还是每月给予30元生活费。1984年工资普调，王光照最终榜上无名。从1978年夏交铸铁车间监督劳动到1994年退休，16年来王光照一直领取30元生

活费^①。

武汉仪表机床厂铸造车间工人、武汉一中六八届高中学生、造反派一般成员余德亨，1977年5月关进厂五不准学习班，一年后解脱。1982年以同等学力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人事档案随之由该厂转入武大，9月1日入学。9月10日，该厂对余作出“清查结论”：“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免于处分”，9月25日该厂上级武汉仪表工业公司党委审批同意。该厂与余德亨同时从学习班“解脱”的另两人，原工造总公司司令部工作人员、工人陈海波，原公安联司头头、车间支部书记夏祥杰的“清查结论”，是数月后作出的。10月25日，公司纪检委数人和该厂副书记来武大，向余出示结论及“错误事实”材料，让余签字。余德亨拒绝签字，并写下拒绝理由，要求重新审查。来人表示会考虑余的意见，对有关问题重新审查。实际上他们当即将材料留在武大，武大接受了。武大为此事派专人去教育部请示，研究生司负责人对此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只说让武大按有关文件办。当时武大由刘道玉主政，他被一些人誉为“武大的蔡元培”，本人也一直标榜自己“以人为本”、“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至上”^②的办学理想。11月16日武大校长办公室发出《关于取消余德亨学籍的决定》（武汉大学文件，校行[1982]189号），24日向余德亨宣布，并说取消学籍是因为不符合研究生标准中“德”的方面。当晚余德亨质问分管研究生的副校长童懋林：新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我是不是中国公民？童懋林乱以他语。当年12月初余德亨去教育部研究生司上访，该司负责人告诉余事前武大来人请示的情况，接受了余的申诉，并向武大发函，要求武大重新调查处理，将结果报教育部。后武大方面仍坚持原决定。

武汉一中六七届高中生肖某、六六届高中生潘某，因被所在工厂办“五不准”学习班而错过1977年高考。1978年从学习班“解脱”参加高考，肖某考了380多分，潘某考了360多分，当年的分数线是280分。因所谓“文化革命问题”而“政审不过关”，工人家庭出身的潘某不予录取，肖某经历多种曲折才被一所大专录取。

^① 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624—627、634—637页。

^② 刘道玉《我心中的理想大学》，载《财经》杂志2012年第15期。

第四节 “清理‘三种人’”和“记录在案”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揭、批、查”运动。1979年1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揭批查运动要善始善终》说：“全国大多数地区和单位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基本结束了。”

到1983年初，武汉地区对“帮派分子”进行审判、作“清查结论”的工作基本完成。

在陈云从1982年7月以来的一再倡导下，针对“帮派残余势力”的清理“三种人”工作，1982年底在全国展开。

按照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发[1982]55号）的提法，所谓“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所谓“清理”，是指“必须坚决把‘三种人’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必须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进领导班子”。清理“三种人”，是为了防止这些“不安定的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如有适宜的机会”“出来兴风作浪”。

实际上，武汉地区清理“三种人”（当时称“帮派分子”）从1976年底就开始了，被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革委会、党组织）的造反派，基本被隔离在五不准学习班、羁押在看守所。开始清理“三种人”时，这些人都已判刑或给予“清查结论”。

市机关红司头头曾繁斌2010年说：1983年开始清理“三种人”的时候，各级领导班子里基本没有造反派了。要说有，也是一些造反派一般成员或同情造反派的人，再就是从外地调入、毕业分配来的造反派。把造反派清理干净，这就是他们一再强调的“除恶务尽”，就是要斩草除根。很多单位，清理“三种人”成为内斗的工具，给你戴上一顶“造反派”的帽子，你就完了。

早在1978年1月28日，代理市委第一书记顾大椿在武汉市科学技术大会上说：要加大力度，全面彻底地揭批和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不能让帮派人物仍留在各级领导班子内。到1978年底，区、局、大单位领导班子中清查出身派骨干分子和犯严重错误的41人，县团级领导班子中90人，对少数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首要分子、

反革命分子、打砸抢首恶分子依法惩处，判刑21人，逮捕93人，拘留52人，戴帽18人，送劳动教养69人^①。

武汉市委1981年5月8日向湖北省委呈送的专题报告说：林彪、“四人帮”在武汉的帮派残余势力虽然在组织上被摧毁了，但在思想上并未完全瓦解。他们中的少数人，有的不肯认错服罪；有的向党的组织公开反扑；有的对干部、群众和积极分子反攻倒算，打击报复；有的经常暗地串连；有的与敌特机关联系挂钩，从事反革命活动；有的与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秘密勾搭。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可低估，是危害安定团结的一股潜在势力。

14日，湖北省委批转市委的报告，要求“对于帮派残余势力的活动，绝不可掉以轻心”，“对于拒不悔改并进行破坏活动的帮派骨干分子，必须依法惩处”。

1982年8月13日，武汉市委印发《关于市建工局党委清理基层领导班子中“三种人”情况的调查报告》，市委批评某些单位对中央关于不能重用“三种人”的指示，认识不够，贯彻执行不力，对群众提出的批评置若罔闻。9月1日，市委印发市经委党组《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对清理“三种人”提出了明确要求。

清理“三种人”还在进行中，中共中央1983年10月11日发出《关于整党的决定》。这个文件说：“纯洁组织是这次整党的一个重要目的。‘三种人’反对党、危害党，如不彻底清理，就会成为党的严重隐患。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陈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就整党问题发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浮在面上的‘三种人’，在揭批查中清理了一次。但因为各种原因隐蔽埋伏下来的‘三种人’和他们的‘军师’还不少。‘文革’中各地都有两派，发生了派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用派性对待清理‘三种人’的工作，只清理对立派中的‘三种人’，而对自己支持的那一派中的‘三种人’不积极清理，这是错误的。”“这次整党必须把‘三种人’清除出党。”^②

10月12日，武汉市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的通知》，通知对整党试点单位的总结验收工作作了部署。12月7日至9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1978）》第二卷第626—627页。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整党办公室《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清理“三种人”文件汇编（第一册）》，1986年8月。

日，市级领导干部脱产学习整党文件。

1984年1月13日，湖北省委发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的实施方案》，规定这次整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使党更加纯洁。决定从1984年1月开始，用三年时间分两期进行（后调整为分三期）。参加第一期整党的是省委和省级机关中的党组织，当年年底基本结束。参加第二期整党的是地、县两级中的党组织，从1985年初开始，年底基本结束。省委对此作出专门部署，要求整党各单位特别注意解决好抓紧抓好清理“三种人”的工作等问题。第三期整党主要在农村区、乡、村中进行。

10月8日，武汉市委发出《全面整党的实施方案》。10日，市委召开全市县级以上单位负责干部大会，宣布武汉市全面整党开始。确定全面整党自上而下分三批进行，每批半年左右。市委还成立了整党办公室，各单位也成立了抓整党和抓经济工作的两套班子，提出了坚定慎重地清理“三种人”等要求。次年10月7日至16日，湖北省委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对武汉市委的整党工作进行了检查验收，认为武汉市第一批整党的积极成果主要表现之一是：“通过核查‘三种人’和组织处理，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①

至1987年3月，历经三年零三个月的整党结束。根据湖北省委1987年5月22日向中央的报告中的统计，全省参加整党的党员2122188名，占应参加整党党员数的99.96%；经过整党已登记2017501名，占参加整党的正式党员数的98.98%。不予登记和缓期登记计有104687人。全省清理了“三种人”和其他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其中开除出党的2214人，受到其他党纪处分的16337人，其他不予登记的3354人，缓期登记的11963人，共计33868人^②。

清理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正在进行，1983年5月胡耀邦在六届人大座谈会上提出“下决心搞第三梯队”。6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肯定了“第三梯队”的提法，他说：“只要有了第三梯队，跟随‘四人帮’的三种人就翻不了天，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

^① 参见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第439、446—447页。

^② 梅雪、熊廷华《湖北党组织历史上的五次集中教育活动》，2005年12月16日，载“湖北党史网”。

2号”载陈云批示：“这些红卫兵（按：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一号头头孔丹等人）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①

198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犯过严重错误，但中期或后期确已觉悟，并以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的同志，要给予信任。”这一段话表达的意思与陈云的意见相同，所指的是同一批人。陈云的意见是在内部讲的，无须修饰，他也不认为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犯过严重错误”。

于是，在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初期把自己的同学、老师、同事打成“右派”、“反革命”，逼疯逼死；破四旧搞“打砸抢抄抓”，视人命如草芥；1967年春夏专搞武斗杀人；在五不准学习班当“动力”“骨干”整人，这些行为不被追究，一些人被誉为“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抵制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英雄。

为“防止把‘三种人’作为接班人选拔进领导班子或安排到要害岗位”，1983年4月23日，中组部发出中组发（1983）6号文件《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说：“中央最近指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对错误严重的人要进行处理。这是党中央为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和领导班子的建设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中，已经提出“记录在案”问题，其文字与上引一段基本相同。

中组部文件还说：“本文件下达后，各院校力争在半年内，将经过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党组织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如现在所在单位系基层单位，应将记录材料通知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县、市委组织部。如应该记录在案的学生去向不明，由院校转请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负责查找，查明下落后再转递材料。”

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说：我们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把本范围内高等院校提供的记录在案材料摘要造册，报送中组部、中宣部备案。

随着这个文件发布，全国“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严重

^① 参见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第211、203页。

严重问题的人”，在经历了“揭批查”、“清理三种人”、“整党”后，又一次遭逢厄运。由于文件要求“记录在案”工作“不公开动员，不搞运动”，“少说多做”，如时在中组部青干局任职的阎淮所说，“‘清理（三种人）’是面对面”，“‘记录（在案）’是背靠背”^①，所以当事人在升职、评职称、调动工作、出国学习或工作、考研究生等受阻时，往往莫名其妙。

新华工红反团头头李定初、新华工头头王富山都接触过自己被“记录在案”的材料。

李定初得到了“中共华中工学院临时委员会”《李定初“文化大革命”中在校期间的表现》（1983年8月16日）全文。这份材料记录：“李定初在‘文化革命’中，系‘新华工红反团’和‘新华工’（聂派）的主要头目，曾带领‘红反团’成员抢劫人事档案；参与刑讯无辜群众；煽动搞‘全国支左’揪‘军内一小撮’；策划并参与‘批林批孔’运动，企图篡夺党委的领导权。”这一段概述以下，罗列“具体情况”：1. 1967年5月初，与聂年生等组织和领导“特别行动办公室”（简称‘特办’），“主要任务是搞打、砸、抢和刑讯毒打无辜群众”。2. 1966年11月8日，与聂年生带红反团支援湖北医学院少数派抢走“该院的人事档案材料”。3. 1967年7月31日在院内召开形势分析会，决定到“全国去支左”，揪“军内一小撮”。8月5日派出十余人去北京办联络站，李定初在武汉“遥控”。这批人到北京“一些单位去作乱军报告，受到王、关、戚的赞赏。反革命分子王力亲自批准他们在京印刷出版了《新武汉报》。随后他们分头去沈阳、南京、天津等地‘支左’，……煽动揪‘军内一小撮’。”在此期间，李定初布置调查李先念、王任重、张体学的材料，“这些‘材料’均交李定初掌管。”4.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李定初就从湖北沉湖农场窜回我院”（按：李定初当时在房县九道区高中任教），“策划”“成立批林批孔领导班子”，“并被定为‘领导小组’副组长”。

李定初针对华工临时党委的“记录在案”材料，写下驳斥文字。他说这份材料是“把69年—73年整北决扬时大搞逼供信的材料作为素材进行艺术创作”。他“根本就不知道有‘特别行动办公室’这件事”；湖医抢黑材料时他在北京；他连院革委会委员都不是，决定到“全国去支左”这样的事轮不到他，他从来没有布置整李先念等的材料；所谓策划成立批林

^① 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第199页。

批孔领导小组，他当时人在房县。

1983年下半年，华工临时党委给新疆区委组织部发去《王富山“文化大革命”在校期间的表现》，王富山当年4月已调到位于河南南阳的中原机械工业学校，这份材料又经河南省委转到南阳地委。“新华工四号头头”王富山于是成为南阳地区清理“三种人”运动中的“大鱼”、“重点对象”，南阳地委、校党委文件将王富山称为“‘记录在案’人员”。看到学校“核查办”要求他交待20个问题的调查提纲，王富山知道了华工“记录在案”材料的大致内容。这20个问题是：1. 1967年红司红代会的“政治报告”，是怎么研究的？哪些人参加了会议？谁起草的？谁主持会议？为什么让你作报告？2. 1967年5月，对武汉各军事单位造反派所作的指示，具体内容是什么？作这些指示是谁让搞的？事先是否研究过？后果如何？3. 参与指挥围攻武汉军区，绑架钟汉华，谁派你去的？怎么研究的？谁主持会？你在联络站负责什么？4. 参与策划“全国支左”、“揪军内一小撮”，是什么时间？谁主持会议？哪些人参加？怎么做出的决定？谁负责派全国各地“支左”人员？派往哪些地方？5. 你当上四号勤务员的原因？6. 进驻红旗大楼，你们是怎么研究的？谁主持会议？哪些人参加？为什么让你带领一部分人去直接参与这一事件？7. 省公安厅夺权和省政府1·26夺权，当时是如何研究的？哪些人参加了会议？谁主持会议？为什么分工让你参与这一事件？8. 1967年4月底去北京的任务是什么？什么时间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期间谁接见过等一些情况。9. 1968年4月1日凌晨华工的清队事件，事前是如何研究的？就哪些人参加了会议？研究的具体内容？谁主持会议？10. 对华工的章崇义，于1967年6月11日、8月15日、8月16日、8月27日、8月28日的批斗，你是否在场？为什么要批章崇义？开会研究了没有？谁主持了会议？如何做的决定？11. 对华工的叶龙，在1967年8月24日、8月28日、8月29日、9月4日的批斗折磨，批斗前是怎么研究的？最后如何作出的决定？谁主持会议？哪些人参加的？12. 私设刑堂和地下水牢是如何研究的？刑讯和关押过哪些人？什么原因？你在其中负何责？13. 你校设电台情况，目的是什么？是谁叫搞的？谁负责抓这件事？武斗时用过几次？14. 你校参加过几次武斗？动用过什么武器？是如何研究的？谁指挥的？“7·15”和“7·20”的大武斗是谁的指挥？15. 你们勤务员都有枪是怎么来的？你用枪支干过

什么？后来枪的下落？16. 1967年4月“三新”成立“卫三红指挥部”目的是什么？是谁的总指挥？你具体负何责？都搞过哪些活动？17. 谈谈1968年“5·27”抢枪的情况。18. 1968年3月下旬开会对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抓抄，是谁主持的会议？你在其中负何责？19. “三办”的主要任务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三办”主要是揪军内一小撮？你负责的联络部下设的一办、二办、三办是干什么的？张立国给“三办”传达戚本禹的指示，你听了否？内容是什么？后来有何行动？后果如何？20. “卫三红”和你说的“联络站”是不是一个组织？如果不是，它们是什么关系？

王富山回忆：“中原机械工业学校党委为了查清我的问题，先后派出了数起外调人员，分赴湖北武汉、湖南、河南、新疆等地，仅外调出差费据说就花去了两三万元。”1986年6月，南阳地委整党工作办公室向学校党委发出《核查通知》，说“‘记录在案’人员王富山”“‘文革’中的问题，属于一般错误，不作结论”^①。

新华工革委会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张建华，1970年9月分配到云南铁路建设总公司汽车机械修配厂当工人。1980年9月“揭榜应招”，成为厂务委员会负责人，实行企业改革取得成功，春城晚报、云南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都作过报道。1981年1月张建华被任命为该厂厂长，同年11月公司以“不要党的领导”“家长作风”等理由免去其厂长一职。

1983年7月，华中工学院党委派人来昆明找张建华调查他的文革问题，两年后张建华才知道，这就是在落实自己的“记录在案”材料。张建华问来人：“学校动不动就发‘外调函’或直接派人‘外调’，这不但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会给被调查的人很大的精神压力，难道这是华工党委希望的吗？”来人回答：“学校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是根据中央有关文件要求才来调查的。”也是两年后张建华才知道，来人说的“中央有关文件”就是中组部那份关于“记录在案”的文件。

1983年张建华两次联系调动，都因为调阅档案时看到“记录在案”材料而告吹。1984年昆明日报社主动要求调张建华，也因为同样问题未能实现。

1985年，省委组织部将张建华作为“有特殊贡献的青年知识分子”，

^① 王富山《我的简历》（2016年，未刊稿）。

责成省科干局重新安排他的工作。科干局将他推荐给省科委，省科委组织处负责人在铁路建设公司调查时得知他被“记录在案”，谢绝了省科干局的推荐。科干局又推荐给省乡镇企业局，乡镇企业局开始对他很满意，还是因为“记录在案”问题，调乡镇企业局没有调成。

1985年7月底，云南省委组织部决定任命张建华为铁路建设公司经理，8月2日省建设厅另行任命了一位经理，回复省委组织部说“张建华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11月，公司新任党委书记提议张建华任公司三处处长，一位与会者拿出中组部那份文件，说“‘记录在案’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党委书记的提议只得作罢。

张建华说：1983年以前他“自己的档案是清白的”。1970年华工学习班给他做的结论“文革中犯有政治错误”，1978年铁路建设公司予以推翻，建设厅组织处一位干部对张建华说“档案没有问题”，“原学校的结论已用纸条封掉并加盖了公章”。1983年7月以后张建华五次调动、两次升职不成，都是拜“记录在案”所赐。

张建华回忆：

为了弄清我的“记录在案”到底是怎么回事，从1983年开始我就不断地跑公司，跑建设厅，跑省委组织部，跑省“核查办”，要求落实我的“记录在案”问题。但三年过去了却没有结果。

直到1986年3月底我的“记录在案”问题才有了结果。三处党委经过审核，给我作了“文革中犯有一般错误，免于处分”的结论。但当处理报告报到公司时，公司却迟迟不批，更不将审查结果报省委核查办。我多次去找公司核查办的负责人刘成福，他总是以“公司党委还没有讨论”来搪塞我。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才于1986年4月3日说出了有关情况。

他说：“对于你的‘记录在案’，三处是有了一个处理报告，听说你已原则上同意了。不过，对三处的意见你还是要思想准备。因为公司对三处的意见不一定能通得过。你的问题华中工学院看得是很重的。不严重也不会给你搞‘记录在案’，由中央转到我们这里来。”

我问他我的“记录在案”中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他说：

“‘记录在案’的内容主要是那篇总结文章（《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而要害又是你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要以‘革’‘保’来划分阶级。材料中说华中工学院在文革中是一大派之首，宣传舆论对湖北、武汉的影

响很大，你又是革委会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又管《新华工》报，错误是严重的。材料还说你与‘新华工广播电台’有关，说你还积极参与了‘反复旧运动’。”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知道我的“记录在案”的大致内容。

显然，“记录在案”所记录的“材料”大多数是造谣、诬蔑不实之词。其中说我是院革委会常委，是负责《新华工》报的，还与“新华工广播电台”有关，更是无中生有。

至于说我要“以‘革’‘保’划分阶级”也完全是无中生有，荒唐可笑的。因为“以‘革’‘保’划分阶级”的观点正是我们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中所批判的内容之一，把它作为我的错误，那不是颠倒黑白吗？

张建华彻底死了心：“当权者搞‘记录在案’不就是为了不让我们这些人进领导班子么？我现在已不屑进你们的领导班子了，请我也不干了，你还能怎么着？铁路公司拖着不批审查报告，就让他们拖吧，我不在乎了。”“三年来的事实告诉我：期望依靠共产党的官僚组织解决问题就像要依靠泡沫浮出水面一样不可靠。要开始新生活还必须得靠自己。”

1986年10月，张建华向厂长提出给两个月时间自谋出路，两个月内不能调离，则按自动离职处理，厂长同意了。张建华“相信凭自己的人格和能力，到哪里也能养活自己”。他跑了十几家工厂，去了招聘会，又打算自己办汽修厂，一个月过去没有着落。后来一个朋友带他去见云南毛巾床单厂厂长，两个小时就谈妥调动和调动后的安排。张建华调进该厂，在锅炉工段当工段长^①。

张建华的回忆录记述了“记录在案”给他带来的影响，他保存着这一时间段的日记、手稿及其他资料，所以他的记述详尽而可靠，同时具有代表性。

新华工革委会常委、宣传部长刘玉民1970年分配到甘肃天水长城控制电器厂。1974年该厂党委按照中央指示，经过外调，销毁了1971年华工工宣队寄来的刘玉民的大批两清材料。1983年9月华工党委制作的“记录在案”材料“转递”该厂，工厂党委已报上级的提拔他为该厂副厂长的

^① 参见张建华《风雨七十年》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二章。

决定随之作罢，从厂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调到厂子弟中学当教师^①。

新华工三办成员、六二级学生帅争鸣，1968年8月分配到一冶电装公司，1986年前一直担任公司技术负责人。在武钢一米七轧机、龟山电视塔、全国第一条五十万伏超高压输电线路（平武线）武昌至汉阳段等国家重点工程中，都是该公司的实际技术负责人，但对外只能以助手身份出现。凡与外国专家交流，都要派专人在场监督。帅争鸣一直向上申诉，同时所有工程任务都高质量地完成。1984年电装公司党委决定帅争鸣参加伊拉克40万伏线路投标，行前在冶金部翻译、整理技术资料，历时一个多月。临行前两天一冶来电话不同意帅争鸣出国。其他人带着帅争鸣编好的资料出国。帅争鸣按照公司总工的安排，留在北京负责联络，直到出国人员回国。一位公司负责人对他说：帅工你真了不起，没有出国还拼命干，要是我是坚决不干的^②。

“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该“记录在案”，对高等院校学生中保守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则“给予信任”，成为“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

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总指挥崔建瑞，1975年至1984年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85年1月调任湖北省科委主任、党组书记，1986年3月至1993年9月任湖北省委科教部部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政委、湖北大学红卫兵师司令、湖北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漆林，1971年至1981年任湖北省蕲春县横车区委副书记、县委副书记。1981年至1985年历任湖北省黄冈地区司法局局长、党组书记、地区法律顾问处主任，其间，1983年至1985年在中央党校培训部研究生班学习。1985年至1988年历任湖北省黄冈地区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88年至1993年历任湖北省计委第一副主任、计委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至1996年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其间，1994年9月至11月在中央党校进修一班学习。1996年至2002年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兼移民开发局局长、党组书记。

湖北大学红卫兵师政委、湖北大学文革委员会副主任钱运录，1976

① 《刘玉民的回忆》（2019年），刘玉民提供。

② 《帅争鸣的回忆》（2019年），刘玉民提供。

年至1979年任湖北省汉川县委副书记，1979年至1982年任湖北省大悟县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县长，1982年至1983年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1983年至1991年任湖北省委副书记。1991年至1995年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1995年至1998年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武汉市委书记。1998年至1999年任贵州省委副书记、代省长。1999年至2000年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2000年至2003年任贵州省委书记。2003年至2005年任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5年至2006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2006年至2008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兼秘书长。中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

在武汉地区大有名气的华工保守组织“乌兰牧骑”的头头，一直参与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活动的周德武，1979年3月任武汉市团委书记，1983年任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1988年任该局局长，1998年任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

中组部关于“记录在案”的文件说：“有严重问题的人，主要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拉帮结派，造反夺权，干了坏事，情节严重者；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情节恶劣者；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责任者；策划、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者；泄露党和国家重要机密，造成严重后果者；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煽动派性，在较大范围内造成恶劣影响者；制造其他重大事端，造成严重后果者。只要有上述问题，不论是哪一个组织的，都应记录在案。”

漆林等人都身负文件所指出的多项“严重问题”，如“拉帮结派，造反夺权”——组织红卫兵，成立文革委员会夺了校党委的权；“诬陷迫害干部、群众”——“五十天”里、“两清”中参与把大批学生、教师打成“反革命”；“砸机关”、“破坏公私财物”——“破四旧”时毁坏文物、砸寺庙教堂、砸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抄没私人财物。

按照陈云的指示，这些人“不属于‘三种人’”，而且成为了“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文件所言“只要有上述问题，不论是哪一个组织的，都应记录在案”，成为空话。

阎淮代表中组部主持北京各高校“记录在案座谈会”，有人提出谭力夫、贺鹏飞“是否记录”，阎淮私下交底说：“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

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阎淮回中组部向青干局长李锐汇报，被誉为“两头真”的李锐，此时因是“陈云的人”而被重用，可能正处在“假”或“伪”的中间阶段，他说：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①！

1986年武锅党委宣传部编了一本《武锅建厂三十周年纪念》，时任厂党委书记何汉香撰文说：“‘揭批查’中，我厂清查对象有四百多人，重点学习班二十多个，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何书记的这一段文字，王光照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评论：“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武锅文革从整群众开始，十年里虽经武锅造反派奋起抗争，要整一整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资产阶级，但仍以群众被整告终。‘清查对象有四百多人’，占武锅职工总数几近十分之一，难怪何书记慨叹‘工作量之大’，且似有表功之意。”

武汉地区对“帮派分子”进行大规模审判，大规模给予组织、行政处分，大规模搞“清理‘三种人’”、“记录在案”，都发生在八十年代；何书记上述文章也写于八十年代。王光照这样看八十年代：“那可是既得利益丰厚的精英们无限怀念的年代啊，‘青春不忧伤’，‘阳光很温暖’，‘那时的中国最为理想’。我不知道精英们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类似一个中型工厂就有四百多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被蔑视’的现象，八十年代遍于国中。”^②

^① 参见阎淮《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第199—200页。

^② 参见王光照《这里那时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第636—637页。

第三十一章 文革参加者的晚年

第一节 打击“在经济上搞破坏的帮派残余势力”

1982年9月26日长江日报刊登报道《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受审判刑》，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评论《历史的判决，人民的胜利》。评论说：“‘四人帮’在湖北、武汉地区的帮派体系虽然被我们摧毁了，但是，它的残余势力还在。他们有的利用种种机会发泄不满，反攻倒算；有的至今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伺机进行捣乱；有的公开提出‘我们政治上被搞垮了，要在经济上捞一把’”，企图通过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来瓦解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对在政治上、文化上进行捣乱，在经济上搞破坏的帮派残余势力，必须坚决斗争和打击。”

笔者询问了杨道远、顾建棠、吴焱金、张立国、曹承义等百余位做过生意的造反派大小头头，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曾经“公开提出”这样的话——“我们政治上被搞垮了，要在经济上捞一把”。有人说：我们被逼无奈做点小生意，只是为养家糊口，哪里谈得上“捞一把”？能够从国家那里“捞一把”的，只有当权派和他们的子弟。他们可以承包、租赁企业，可以利用双轨制拿到批条批文发大财。我们这些人即使想这样干也是白想。

八十年代，武汉地区发生多起以“经济犯罪”的罪名，将造反派诬陷入狱的案件。

1983年2月，杨道远刑满出狱，同时被开除公职。当时杨道远有两个女儿，一个7岁多，一个5岁多，一家四口靠妻子孙卫旗几十元工资生活。杨道远贩苹果、摆摊卖啤酒，做各种小生意维持生计。1985年初，杨道远为一笔一百多万的购销业务牵线，从工行武昌县支行知青贸易信托经理部走账，得到两万九千元业务提成。后来购方卖出这批货时发生纠纷，当地法院来武汉调查，要求武汉市法院协助。于是武汉市委得知杨道远与此案相关，有关人员告诉杨道远，市委已指示对杨道远进行调查。此前有人拿市里的一个情况通报给杨道远看，通报上说杨道远出狱后“表现不好”，

对不断来找他的外调人员不配合。

1985年6月28日，杨道远被逮捕。市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杨道远犯投机倒把罪，律师指出国家有关部门有文件规定，此案标的物涤纶长丝不属国家统制物资，不存在投机倒把问题，起诉书随即加上贪污罪。杨道远辩称：我不是知青贸易信托经理部工作人员，不拿经理部的工资，与经理部仅仅是一笔业务的合同关系。这一笔业务差价32500元，经理部扣除税费500元、管理费3000元，其余29000元是我的提成，这都是事前说好的，是正常的经营行为，怎么也够不上贪污。

1985年8月27日开庭公审，杨道远回忆：

我在法庭上对他们说，你们说你们现在是在提倡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怎么法律一碰到姓杨的就变形了呢？在审判我之前，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网罗难兄难弟，在政治上失败之后想要在经济上捞一把，他们就是这样信口开河来执法的。我的案子还没有审，还没有定案就见了报，这是故意制造舆论，形成假相，有意影响司法公正。我在法庭上指出了这个问题。法官说，那是记者写的，与他们无关。我反问他们，记者写文章是什么人提供的素材？谁批准见报的？银行也没有承认聘请我，没人说我是他们贸易货栈成员，怎么能够说我的行为是贪污呢？贪污的前提和事实都不存在，你们就是这样执法的吗？

负责管理经理部的武昌县支行信贷股长金宏泰1985年6月22日的证词说：杨道远不是经理部工作人员，“搞成一笔业务，按利润的三分报酬，但不付工资”，他以经理部名义谈业务，我们都派人“跟着一起活动”。这个证词收录在市中院的“阅卷笔记”里。

9月7日市中院下达判决书：“被告人杨道远曾因抢夺枪支、弹药罪和抢夺公文罪受到刑事处罚，刑满释放后，仍不思悔改，又在受聘从事公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污犯罪活动，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且系累犯，应予从重处罚。”“判处被告人杨道远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杨道远在回忆录中说：

一个正常的贸易过程被他们无中生有地定为贪污罪。而且量刑之重是骇人听闻的，区区三万元提成，居然判了我十五年有期徒刑，另外，还追加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时间动用各种宣传机器大造舆论，说什么杨道远

为代表的四人帮的帮派骨干是破坏改革开放的罪魁祸首，他们在政治上失败了，千方百计要从经济上捞一把。当权派不但整我，并借机株连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这个泼天冤案不是发生在他们所说的“十年浩劫”中，而是发生在文革结束后九年的1985年。而且我这一次锒铛入狱，一坐就是八年。直到1992年底才把我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出来。我的第二次刑期直到2000年才满。至今他们对我所蒙受的冤屈没有任何改正的表示。我也想通了，我作为湖北地区有影响的造反派代表人物，承受否定文革的打击接受他们的秋后算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他们加在我身上的罪名，实在是太经不起推敲了，就像他们强加在造反派身上的其他罪名一样，最终会被历史证明全是阴谋和谎言。

一张关于“经济犯罪”的判决书，两次提及与本案无关的被告文革中的“罪行”，杨道远觉得可笑。杨道远服刑期间的种种遭遇，使得他产生这样的疑问：“我到底是经济犯还是政治思想犯？”

判决后，襄北劳改农场的中队指导员、武警战士带吉普车来看看守所，将“贪污犯”杨道远一人接去服刑。

杨道远没有编入劳改队，让他一人管理一个特意新建的花园，劳动时间如何安排、种什么花，无人过问。农场开始还派一名“表现好的犯人”给他打水端饭，问杨道远生活上适应不适应。杨道远说：“我是来坐牢的，不是来疗养的。”

第二年农场方面说杨道远花种得好，给他报了一年减刑，襄樊市中院批准了。后来省里干预，就不再减刑了。

省委要求“贪污犯”杨道远每个季度给省里写一次思想汇报。六四前夕，省政法委指示“对杨道远要严加管理，有人接见要由省委批准”，农场干部告诉杨道远，这个指示“就装在你的档案袋里”。“天安门事件”、苏联解体发生后，省委都派人找杨道远，让他谈看法。

1992年杨道远申请保外就医获得批准，12月13日回家。2000年9月7日刑期届满，杨道远办理了刑满释放手续^①。

市法院系统造反组织“政法尖兵”一号头头罗世栋在看守所关押3年释放后，和李家华（原钢九一三头头）、李苏民（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教师，判刑7年）、傅廉（交通联司头头、判刑4年）等办了一个钢结构加工厂。

^①参见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五、斩尽杀绝——第二次冤狱”。

1984年在一项业务中，收到预付款未按合同规定期限发货。省委为这一件普通的合同纠纷派出工作组，认定罗世栋等人涉嫌“皮包公司诈骗”。罗世栋、李家华分别被判刑5年、4年，傅廉被关押一年后释放^①。

1984年6月，在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胡德平的策划下，经国务院批准，武汉大专院校联合组建的中国东湖智力开发联合公司成立，湖北省长黄知真兼公司董事长，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叶念国任不脱产的总经理，胡德平推荐原清华四一四成员周泉纓任常务副总经理。经胡德平的北大同学、东湖公司翻译出版部负责人贺绍甲介绍，周泉纓同意，省水利厅机械厂工人、原工造总公司司令部工作人员孙建春和他的两个朋友组建了东湖公司下属的“山友实业有限公司”，“山友”即“三友（三个朋友）”的谐音。公司成立后，陆续接受了一些生活无着或在原单位处境不好的造反派：刘永熹（长办联司成员，开除公职）、严常（长办联司头头、判刑7年）、陈德胜（武汉一中造反派头头）、林子忠（武船联司头头、关押3年）、吴焱金等。

东湖公司众多的下属公司中有造反派，周泉纓本人也是造反派，这一情况引起省委书记关广富的注意。东湖公司成立半年多后，胡德平离开湖北。1985年9月，一百多名省市机关干部组成的省政府检查组进入东湖公司，山友公司问题被当作重点。1986年2月19日，关广富在省直机关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将东湖公司定性为“大案要案单位”。1986年省纪委主办的《湖北党风》杂志第四期发表武汉市纪委文章《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文章说：周泉纓作为清华文革四一四派的头头，与湖北的造反派头头一起，正在东湖公司山友公司集结，“山友”二字的意思就是“梁山的朋友”。1987年武汉市中级法院二审，以犯“经济诈骗罪”，分别判处严常、孙建春、林子忠、陈德胜四人7年、6年、5年、4年徒刑。1992年省高院认为此案“属经济合同纠纷”，“原判以诈骗定罪处刑不当”，撤销原判决，对四人“宣告无罪”。

当时吴焱金也被调查，检查组多次找他。吴焱金只在山友公司投资的一个小煤矿当过半个月的会计，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吴焱金说：“从此以后，我什么也不敢干了。”不久原工总头头郭洪斌邀请他去韶山共同办旅游纪念品商店，吴焱金“考虑到杨道远的前车之鉴和山友公司‘梁山朋友’

^①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245—246页。

们的教训”，拒绝了。此后，他“在自己家门口摆台球桌糊口”。

1985年，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在杨道远第二次入狱后，就此发表长篇文章《秋后蚂蚱的最后一跳》，再次指出“造反派在政治上被打倒了，就想在经济上捞一把，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正在经商的原工总粮食系统兵团头头黄礼寿生意正有起色，看了这篇文章，不敢再做下去了^①。

第二节 争取“生活费”^②

198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转〈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发[1982]9号）。这个“纪要”说：“‘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

有研究者指出，对于在政治斗争失败的“若干阴谋野心家”施以刑罚，这就不是“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了。李立三、王明、张国焘还有刘少奇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他们及其下属的处理，正是“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而且9号文件所言“若干”、“阴谋野心家”，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当时中国人口十亿，几十万、几百万都可以说是“若干”；政治斗争中失败一方的任何政治主张、举措很容易被另一方阐释为“野心”和“阴谋”。

武汉地区大量被判刑，被给予组织、行政处分的造反派，都应属于当局所称“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更应该“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但是没有。

这些问题不是生活无着、处境艰难的造反派可以争辩的，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是这个“纪要”提出的“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案件的处理实行从宽政策”。

“从宽政策”中有：“凡清查运动中罪该判刑的人员，刑满释放后，应由原单位负责，同有关部门商定，安排其生活出路”。“对受审查人员

^① 参见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第246—249页，周泉纁《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第173—176页，银河出版社2006年版。

^② 本节的撰写参考了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二十三章，钟逸《湖北“文革两案”刑满人员解决生活费问题始末》。

的结论，可采取写实的方法。……犯有错误的，是什么错误就写什么错误，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不予起诉人员中适合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除给予降级处分的以外，一般应维持原来工资”。

有人这样看待9号文件：“这个文件对被清查和处罚的人来说，好比打断了你的大腿，又送你一根拐棍。”顾建棠说：湖北一些当权派“却连这样对我们来说聊胜于无的‘拐棍’都舍不得送，百般阻挠”。

在武汉地区，1982年中共中央9号文件发出时，判刑的造反派大多即将或已经刑满，面临安置问题，受审查而未判刑的造反派即将被给予“清查结论”。上述前两条“从宽政策”，在这两种人身上基本没有得到落实，第三条在很多人身上没有得到落实。他们得知有这么一个9号文件，已经是在18年以后。

在看守所、五不准学习班受审查而未判刑的造反派，在作“清查结论”时，结论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犯政治错误”。沈复礼、李洪荣、林子忠、谢华之、王屏、郭保安、龙铭鑫、谢邦柱、谢望春、郑峰（武汉市档案局干部、市机关红司二号头头）、王志良（省燃料总公司干部、省直红司二号头头）、阎志斌（武汉胶管厂职工、工造总司保卫部长）、谢保安、平毅（武汉液压件厂职工，省总工会副主任）、庞道铭、李想玉、曹佩贤（武钢机械总厂工人、九一三头头）的“清查结论”都是“犯严重政治错误”。这类“不予起诉人员”在原单位监督劳动，很多人只发给每月约三十元的生活费，如武昌造船厂的李承弘，武汉锅炉厂的李洪荣、何华清、张桂申，王光照。王光照的三十元生活费拿了十六年，直到他退休。

安置“两案”刑释人员的“从宽政策”，在武汉地区只落实到经“中央审批”判刑的夏、朱、张三位身上（本应享受“从宽政策”的胡厚民出狱前身故）。湖北省劳动厅于1990年2月23日发出鄂劳函字第041号文件说：“根据省政法委员会政法办（90）3号文件和省委领导同志批示意见，现划拨三名全民所有制合同制工人劳动指标给你们，用于安置朱鸿霞、夏邦银、张立国等三人工作”。夏邦银回到汉阳轧钢厂看大门（后调到花房），朱、张二人不接受安置，自谋职业。其他“两案”刑释人员都被所在单位开除。

1981年11月3日，市中院判处曹承义有期徒刑五年。同年11月7日，

第一冶金建设公司下文，“将曹承义从判刑之日起开除厂籍”。武汉地区像曹承义这种情况的人有多少，无法统计，顾建棠、吴焱金、祝孝先、彭祖龙、胡国基、谢妙福、郭洪斌等都是判刑后即被开除公职。2004年武汉地区部分造反派向省委要求落实中央1982年9号文件，这批人中有45人是判刑后被开除公职的。

在武汉地区“两案”刑释人员中，顾建棠最早得到1982年发出的中共中央9号文件全文。1998年6月他偶遇夏邦银，得知有一个应该安排“两案”刑释人员生活出路的中央文件。于是他多方查找，并向中央、省、市各机关发出124件挂号信，要求获知文件内容，没有一处回应。2000年3月他在湖北省档案馆查到这个文件，“如获至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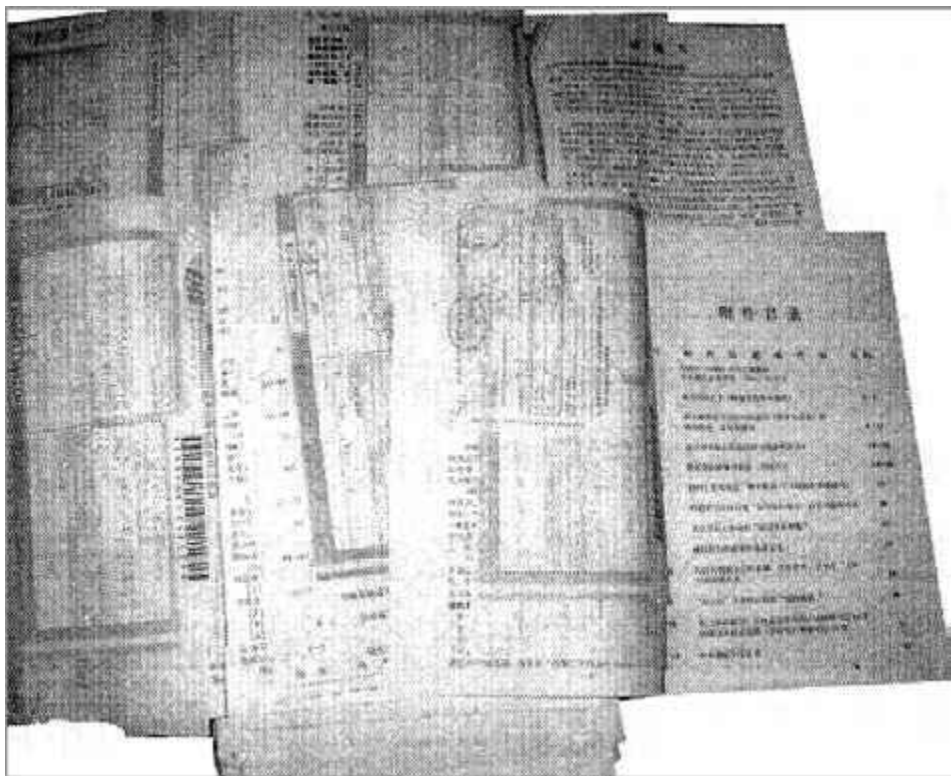
2002年底，顾建棠以这个文件为依据，向长江水利委员会（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要求安排生活出路，长江委人事劳动局专文请示省政法委，2003年1月省政法委综合处魏姓处长口头拒绝。

2003年3月，顾建棠到省人大上访，遇见程贻兴（武汉钢锯厂工人、工造总公司成员，判刑后开除厂籍）、李家骥（武汉铝制品总厂工人、工总成员，判刑后开除厂籍），这二人是代表要求改判、平反的数十人来上访的。顾建棠说：“这次邂逅，竟成了由个人诉求走向集体诉求的起点。”

4月8日，程贻兴邀请顾建棠参加了刘祖平（武汉铁路公安处预审员、公安联司成员，判刑4年）主持的三十多人的聚会。顾建棠说：平反不可能，我搞了将近四年，毫无结果。但要求省委落实中央9号文件，改正违背文件精神错误，安排我们的生活出路，只要大家统一行动，坚持争取，是可以办到的。顾建棠的意见获得一致同意。

4月9日，三十多人到省委上访。消息传开，有类似经历的造反派纷纷前来联系，要求参加。为了统一诉求口径、一致行动，推选顾建棠、刘祖平、胡国基、黄友堂（国棉三厂工造头头，判刑6年）、刘永熹、李家骥为代表。

从2003年4月开始集体上访，到2005年11月第一批42人领到“生活费”，顾建棠说，两年多里“不记得看了多少冷脸白眼，经历多少拒绝和推诿，遭受多少刁难和戏弄”。2004年12月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作出批示：这些人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对待他们，太不公平了。



2003年3月至2012年10月，为解决“生活费”问题，顾建棠向各级机关发出诉求信282件

俞正声批示后，2005年1月5日省政法委发出“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专题会议纪要[2005]001号），说要按照中央1982年9号文件精神，落实“两案”人员上访申诉的“生活费”问题。

省劳社厅传达这个纪要后回答上访者询问说：“‘生活费’不等于退休养老金”，“生活费一直发下去，养老送终”，“可随着退休养老金一样上调”，没有医保、丧葬费。

领到“生活费”的徐正全将它称为“俘虏优待费”。他说：“现在就靠着这一份俘虏优待费聊以度日，不至于吊起锅儿当鼓敲，稀饭钱勉强够了。”^①

“不等于退休养老金”、没有医保和丧葬费的生活费发放到2006年，出问题了。按照省政法委（2005）001号专题会议纪要所言“按照当地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水平，解决生活费”，2006年的生活费应该按照

^① 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第307页。

武汉市退休职工2005年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而2006年1至9月的生活费，却是按照武汉市退休职工2004年养老金平均水平发放的。发放生活费的单位说，这是省政法委综合处魏姓处长的意见：“他们的生活费就是按2004年的标准，是定死了的，不能变。”

2006年10月，顾建棠等人无数次对多个机关的上访、写信、打电话又开始了，各个机关又经过无数次的推诿、会商、函件电话往来，2007年5月17日，魏姓处长所在的湖北省政法委发出《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说：文革“两案”人员生活费标准，每年从元月起，按当地上年度养老金平均水平调整。

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转了一圈，历时七个月，又回到原点。为什么会这样，有关部门关于此事的所有书面文件、口头讲话都不解释。顾建棠说：什么叫无事生非，这就是。吃饱了撑不过，你去干点什么不好。

2009年10月中旬，这些“生活费”领取者又发现一个问题：武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规定，“生活费”按照武汉市中心城区退休职工上年养老金平均数额发放，而2005年至2009年，他们领到的生活费是按全市平均数额发放的。五年中每人少发4776元。

10月23日到12月7日，“生活费”领取者十七次群访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和省、市政法委。12月13日，顾建棠等从市劳社局得知：省市厅局取得共识，同意你们的诉求。市劳社局的报告已于12月10日送交市政法委，报省政法委批准就可以定夺了。此后一个月内，顾建棠等人二十次上访，问询报告是否送达省政法委，省、市劳社厅（局）和省、市政法委“互相推诿，谁也不管”。这件事一直拖到2013年才得以解决。

湖北省给“两案”刑释人员按月发放“生活费”的消息在全国传开。2007年到2008年，江西、湖南、四川、河南、云南等地的一些“两案”刑释人员辗转与顾建棠联系上，顾建棠向他们详细介绍情况，传去相关资料。这些地方的“两案”刑释人员以武汉为例，不断争取，也领到了多少不一的“生活费”。

第三节 文革结束后的百万雄师成员^①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为七二〇事件平反后，俞文斌1983年任武汉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任武汉市政府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杨道安1978年任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谢敏华任武汉市第一轻工业局副局长，沈邦安（原百万雄师联络部副部长）任武汉市第二轻工业局副局长，刘敬胜任武汉市江汉区工业局副局长；李树春任市公安局消防处处长；杨以才（省直联司一号头头）先后任省冶金厅厅长、省司法厅厅长。

百万雄师头头对文化大革命及七二〇事件的看法不尽一致。

俞文斌2007年说：“我认为这件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七·二〇’事件是毛泽东搞的，江青后来又把这件事推给林彪，林彪是听他们指挥的。毛是罪魁祸首，账要记在毛泽东身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害了我们。他们搞权力斗争，我们坐了四年零八个月的牢。”同年他对彭祖龙说：“毛泽东是个疯子。”彭祖龙与俞文斌多有往来，认为他“是个很老实的人，文化不高，没有城府”，听得这话“吓一跳”，因为百万雄师的人一直标榜自己“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谢敏华2015年说：“什么叫文革？最终目的是什么？根本不理解。两派的动机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不变色。方法上有分歧，头脑都发热，发烧。毛主席的意思是放出牛鬼蛇神，后来想收，收不回来了，失控了。文革是内部矛盾，很容易解决，不是阶级斗争。你们（指造反派）要打倒走资派，谁是走资派？我们要保护老干部，保护了哪一个？最后是群众斗群众，都受到伤害。你们吃亏比我们吃得大一点。”

王××（武汉列电基地保卫干事）2007年说：“工人阶级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毛泽东在43年前就有预见的。我是当年的‘四清’工作队员，当年主要是清查走资派，是反修防修，现在看，中共比苏修还修。毛泽东要搞文革，目的是为了工人阶级，为广大劳动人员，但做法是欠妥的。现在的干部一人几套房子，有小车，养二奶，换妻子，而工人下岗的下岗，

^① 本节的撰写参考了钟逸《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老田《七二〇事件四十周年前夕“百万雄师”头头的聚会遭警察成功劝阻》（网文，2007年）、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余德亨2015年访谈谢敏华、章迪杰的记录，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第八章第44节，彭祖龙《让历史告诉你真相——四十年后刘敬胜谈七二〇事件亲历》（网文，2013年）。

买断的买断，贫富差距扩大了。工人心里是不平衡的，群众想念毛主席。”

章迪杰2015年说：“40年后看‘七·二〇’，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壮举，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是我们一生中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从国家的建设遭到破坏，我是同意‘十年动乱，十年浩劫’的提法的。但是从现在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现实来看，我认为文化革命是正确的。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劳动人民免受二茬罪，免吃二遍苦。劳动人民现在是转了一个圈，从零点又回到了零点。现在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得不到保障。毛泽东尽管晚年有错误，他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使全中国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文化革命是对的，但方法是错误的，刘、邓路线在党内就可以解决，组织决定很容易做到。”

章迪杰认为看法分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各人经济地位不同，他说：“造就‘七·二〇’事件的‘百万雄师’兄弟们，除极个别人因提拔到党政部门领导岗位，跻身主流社会外，绝大多数人已经坠入下岗，买断工龄，被边缘化，沦为新的城市贫民。对当今社会的看法，我们‘百万雄师’高层的几个人意见就不能统一。这不奇怪，毛主席说过，人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当了大官，当了老板，有了钱，说法就跟你不一样，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

刘敬胜2013年对彭祖龙说：“文革是党号召搞的，最后要老百姓承担责任。这也是很不合理的。你看党的干部，省长，地委书记，市长、书记，哪个坐牢判刑？我作为胜利者，我就觉得不合理，所以我同情你们。你们不要总认为我们要整你们。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是朋友”。“文革就是一场神经病。什么反修防修，其实就是党中央内部和干部们内部争权分配不均所需。我们两派都是受害者”。“你们是受骗，我们是上当”。

章迪杰的看法在百万雄师骨干分子中比较有代表性。他们坚决不同意邓小平“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一说法。他们认为百万雄师在文革中保护老干部，拥护解放军，坚持生产，就是与四人帮斗争，他们不但没有错误而且有功。所以文革结束后，他们基本上每一年都举行纪念“七二〇事件”的活动。

1996年7月20日，陈世清、汪扬、张立华等人组织了“湖北武汉纪念‘七·二〇’三十周年筹备委员会”，詹才扬任会长。这个委员会计划

成立帮助生活困难同道的“互助资金会”，慰问死者家属，办“难友图片展览”和“书画展览”。后来编成了三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编者署名第一辑为“湖北武汉纪念‘七·二〇’三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后两辑为“湖北省文革史研究会（筹）”。

“七二〇事件”三十周年前夕，陈世清等通知市有关领导，将于7月20日召开纪念会，“并将会议议程和所制定的会议纪律等一并上呈”。19日下午，市政府陈处长、省医药工业局闵局长等5人找陈世清谈话，说中央7月17日让市政府转告，此会议不能开。陈世清力争，陈处长同意开会，并提出会议不要在餐馆开，市政府派人以陈世清朋友身份参会。陈世清答应，并说就在医药工业局内开会。20日上午，省医药工业局内外出现大批警察，并在开会时频繁出入会场，找人谈话，打断发言，将会议主持人之一熊汉卿软禁七小时。会议结束时，警察收走会议的录像带。会后陈世清致信市人大主任李梅芳说：“毛泽东同志说，哪有共产党人怕人民群众”，“我们这一代人”“是共产党的基本队伍”，“人民政府的国家干部，这样不相信老同志是极不正常。”^①

2001年7月19日，一直在社会上活动的原百万雄师骨干家里，都有公安人员“上门做工作”，制止他们第二天出门参加活动^②。

“七二〇事件”四十周年前夕，百万雄师一些骨干商定2007年7月19日在汉口中山公园茶座集会，有人提议会后游行。当局事前得知消息，组织者之一章迪杰估计内部出了“叛徒”。18日章迪杰等组织者被强行带到黄陂木兰山“避暑”。19日仍有不少人来到中山公园茶座，看到座位都被便衣警察占满了。他们转到一片草坪上活动，“茶客”们也来到草坪，有意无意地与百万雄师的人发生冲突后立即报警。大批警察来到现场，几个警察“伺候”一个，将他们分割开来。继而各单位来人将他们领走，没有单位的由所在居委会领人。

百万雄师这个庞大的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企业改制后他们说，我们经受的哪里是什么“阵痛”，是整个后半生的痛，是要我们的命。

^① 参见陈世清《给市人大李梅芳主任的信》（1997年7月30日）、熊汉卿等《给市委、市人大的信》（1997年8月10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2000年7月20日）。

^② 李务金《给各级领导的一封公开信》（2002年2月20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三辑）》（2002年）第243页。

章迪杰 2007 年说：百万雄师成员因无钱看病跳楼上吊自杀身亡的，我知道的就有十几人。武汉轻型汽车制造厂周万清患病需 600 元检查身体，找厂里借，厂里没钱借，第二天找邻居借了条绳子吊死在厂门口。武重一工人吊死在梨园医院，武锅一工程师吊死在本厂职工医院。

从 2002 年开始，百万雄师中的一些工人在章迪杰、孙德洲带领下进行经济维权。他们的诉求，除了住房补贴、医疗费、养老金等普遍问题，最迫切的就是百万雄师伤残人员的就医问题。因为 2000 年各单位实行医改，原来实报实销，改为全部由个人承担。而 1978 年湖北省委 139 号文件有规定：“凡受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迫害或冤、假、错案致死、致伤、致残的，政治上应予平反昭雪，经济上可按因工伤残处理。凡因坚持生产、工作岗位，保护党和国家机密，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而被打死、致伤、致残的，政治上应予记功，经济上按因公死亡、伤残处理。”

百万雄师成员为此事去省市及相关部门上访十年，2009 年 4 月，2011 年 4 至 5 月，章迪杰两次去北京上访，都没有结果。章迪杰说：“后来温家宝有个指示，老工伤没有办手续的都纳入医保统筹。2012 年 3 月，根据温家宝这一指示，市社保局给我们四五十人发了工伤证。”这四五十人都是在文革中搞武斗、七二〇后遭报复而致伤致残的百万雄师成员。

俞文斌认为“提出要解决文革中伤残者的医药费问题已经过时”，是“瞎胡闹”。百万雄师中很多人指责他“享受老干部待遇，看病可以全报”，“是既得利益者”。

上访初期，百万雄师成员的气势比造反派的上访人员壮得多。他们经常对省市负责人大声斥责，拍桌子：“文革中没有老子们保你们，你们哪有今天？”负责人不计较他们的态度，事情还是不办。

章迪杰 1979 年至 1987 年当过第六、七届市人大代表。2004 年章迪杰等向副市长袁善腊反映职工生活困难，袁善腊说增加工资、退休费要经过中央批准。章迪杰拍着桌子说：“你们（指公务员）一次加几百元不要中央批，我们加几十元还要中央批准！”章迪杰曾经到市公安局申请要求提高工人待遇的游行，

老田在《七二〇事件四十周年前夕前“百万雄师”头头的聚会遭警察成功劝阻》一文中说：

在许多百万雄师的高层头头看来，在文革期间保护干部的权力和地位，

他们是付出了相当多的代价的，邓小平说“两派都错了”是抹杀了他们的“功劳”。一九九八年，在湖北省委展开的“纪念百万雄师平反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就曾经有人提出应该给多少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要求。看起来，百万雄师内部始终有些人要把文革期间的“功劳”作为向官方提要求的“资本”，甚至还错误地以为可以借此与“当权派”共享“天下”——分享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解决自身下半生的出路和前途。事实证明，当权派从未做过这个打算，邓小平公开否定了百万雄师“资本”的有效性，实际上是说出了当权派的一贯立场——他们在文革期间对百万雄师的亲近和支持，不过是当权派遭遇到了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临时性”地需要一个百万雄师这样的“群众组织”来镇压造反派而已，时过境迁，当权派原来的需要不存在了，也就不再承认百万雄师的“资本”，所以，在百万雄师的十三个常委中间也只有少数人得到了官方给的好处。经过这么多年来风风雨雨，一些百万雄师的头头已经有了新的认识，确实是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未能“教育好”的工人阶级，最终在邓小平的“事实教育”下有了巨大的进步。

百万雄师中的一些人有着与老田的说法相似的感受。

一位“伤残成废人”的百万雄师成员早在1980年前写了这样一首诗：“不为名利只为真，战友牺牲吾幸存。牺牲不能追英烈，幸存亦不识功臣。”^①

百万雄师骨干、江岸起重站职工李务金2002年给武汉市委等机关写信说：“我党的历次战斗中，哪一次战斗不造就一批英雄人物？而在文革这场特殊战斗中，‘百万雄师’的英雄树在哪里了？”“我们这些没有解决问题的伤残者，只要求过问我们一下，给一个讲话、活动的地方，生活上的困难给予补助，医疗治病免费，和你们的差距适当缩短一点，大家余愿足矣。……就这一应该得到的不过分的要求已等20多年了”^②。

章迪杰2007年对采访者荣根说：“他们把我们当了利用品，当了奴隶。”2007年7月底百万雄师与造反派的部分头头相聚时，吴焱金说“你们百万雄师是傀儡”，汪仕奇说：“我们是‘皮影戏’（意思是被人操纵），用完了就算了。”

^① 转引自汪扬《不能忘却的纪念——纪念“七二〇”大冤案昭雪十三年》（1980年7月20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三辑）》（2002年）。

^② 李务金《给各级领导一封公开信》（2002年2月20日），载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三辑）》（2002年）。

百万雄师一些成员在漫长的上访诉求过程中体会到，相对于其他上访群体，当权派对他们并没有另眼相看；用群众运动、“四大”的方式与当权派对话，甚至以“主人翁”的身份监督他们，用俞文斌的话说，“已经过时”，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引以自豪的“七二〇壮举”，在当权派眼里那也是群众运动，一文不值，因为邓小平说过“两派都错了”。

谢敏华1972年出狱时就有体会，在当权派眼里，他们并不是什么“英雄”，和造反派一样，都是“闹派”。从那以后百万雄师成员的活动他基本不参加，被百万雄师中人称为“投机分子”、“滑头”。

章迪杰说他们在文革中拼死保护过的当权派把他当作“不安定因素”、“维稳对象”：“从2003年开始，市、区公安局、稳定办开始对我的住宅进行监控录像，对我的出行进行跟踪盯梢，社区干部也频频上门找我谈话，说我非法集会，破坏稳定”。

2007年7月6日，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和“公检法”头头汪仕奇接受邀请，与造反派头头谢望春、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彭勋、彭祖龙及朱鸿霞夫人朱爱华、胡厚民姐姐胡秀娟在餐厅相聚。原百万雄师作战部行动组副组长刘天喜闻讯“不请自来”，交谈时他说：“再来文化大革命，我和你们一起造反。”

双方谈到对文革和改革开放的评价，章迪杰当场表示了与俞文斌不同的看法。俞文斌对造反派的境遇表示同情，他说：“要是早几年知道这样的情况，我还有条件帮个忙。”

同年7月29日，俞文斌等回请。百万雄师方面出席的是俞文斌、汪仕奇、章迪杰、沈邦安、叶长鸣（文革中任武汉工学院文革委员会主任，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之子），造反派方面是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柳英发、彭勋、彭祖龙、林子忠、朱爱华、胡秀娟。双方同意合作写一本“实事求是的武汉文革史”。谈到七二〇前的武斗，俞文斌重复他们一贯的说法：“总站勤务组确实没有开过一次会议研究，但事情发生了。”

顾建棠说：“会见中气氛友好融洽，双方都是坦诚相待，没有出现不愉快的事情。临别前合影留念，并交换了各人的电话号码，以便今后随时联系。”

近二十多年，武汉地区的老工人“维权”行动持续不断，出现了一些带头人，这些带头人多为造反派和百万雄师的骨干分子。



7月29日聚餐后合影。前排左起：胡秀娟、汪仕奇、朱爱华、章迪杰、柳英发，后排左起：彭祖龙、沈邦安、彭勋、俞文斌、林子忠、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

武汉锅炉厂原百万雄师头头熊汉卿，以领头人身份出现在武汉地区多个大规模维权行动中。2009年7月，年近八十的熊汉卿等带领数千工人堵路，抗议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低价收购武锅。公安机关传讯熊汉卿，他说：“你们今天把我这个维护工人权利、维护国家利益的工人代表抓进局子，是谁专了谁的政啊？！”^①

百万雄师成员、长江动力公司职工丁振云，顾建棠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他为“武汉地区维权群众的旗手”。

^① 参见丑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网文，2019年）。

参考资料

—
1966年6月15日—10月4日，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书记处会议部分记录

1966年7月3日，王任重给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的一封信

1966年8月29日，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串连部《武汉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介》

1966年8月31日，湖北大学革命师生员工2153人《紧急呼吁》

1966年9月4日，《王树成同志九月四日晚广播讲话稿》

1966年9月6日，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战士宋要武、华小康、刘静梓、朱培、潘小红《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一）（之二）》

1966年9月25日，《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关于继续彻底横扫“四旧”的通令》

1966年10月，华中工学院附属中学红卫兵《撕毁资产阶级狗崽子的护身符——“重在表现”》

1966年10月18日，王任重《我的检讨》

1966年10月21日，湖北省委《关于我们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1966年11月2日，张体学《关于我在陶铸同志指示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检讨》

1966年11月6日，武汉市委《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1966年11月9日，二司武大总部《王任重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

1966年11月上旬，《钱运录同志代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十七个委员在揭发批判湖北省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

1966年11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公告》

1966年11月15日，张维荣《愤怒控诉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武

装镇压湖北大学“六·二〇”革命事件的革命师生的滔天罪行》

1966年11月18日，关锋、戚本禹与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的谈话

1966年11月，北航红旗、哈军工红反团、西军电临委会驻汉联络站，湖北大学、武汉邮电学院、华中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华中农学院红十月红卫兵《事情的由来——我们为什么要封湖北日报编辑部》

1966年12月1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新华社工总部编《撕开王任重的画皮》

1966年12月30日，《陶铸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

1967年1月4日，宋要武《揭发王任重及湖北省委某些人的罪恶勾当》

1967年1月29日，宋要武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三）》

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对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1967年2月8日，工总、二司、九一三等12个组织《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时称“二八声明”）

1967年2月13日，湖北日报社论《打倒分裂主义 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评〈长江日报〉“二·八声明”》

1967年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严正声明》（时称“二一八声明”）

1967年2月20日，联合调查小组《联合会与黑省、市委》

1967年2月22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等四十二个组织署名文章《无产阶级夺权和资产阶级反夺权的生死决战》（时称“二二二文章”）

1967年3月2日、5日、11日，王任重致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的信

1967年3月4日，湖北日报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

1967年3月7日，北京化工学院东方红驻汉联络站等十七个组织编《撕开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画皮》

1967年3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时称“三二一通告”）

1967年3月29日，武汉部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滔天罪行》（图集）

1967年3月4日—21日，王任重《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以来——检查、交代、申辩材料》（之一—之四）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1967年4月14日，孔庆德《答新一中革命小将（革司）》

1967年4月17日，二司《关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调查报告》

1967年5月15日，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座谈纪要

1967年5月16日，《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公告》

1967年5月20日，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与武汉地区大中学校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张维荣《关于新全校“五·十”事件的七项严正声明的协议》

1967年5月21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关于当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问题》

1967年5月23日，《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同志给市武装部并军区的一封信》

1967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时称“六四公告”）

1967年6月8日，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反逆流紧急动员令》

1967年6月11日，湖北日报社论《坚决打退反革命武斗黑风》

1967年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军委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的电报指示（时称“中央六二六来电”）

1967年6月，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造反有理》报编辑部《武大“三家村”案——陶铸、王任重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大阴谋》

1967年7月上旬，专揪陈再道造反团《陈再道与百万雄师》

1967年7月，百万雄师四分部二纵队编《武汉“六·一七”大血案的事实真相》

1967年7月17日，工总、九一三、二司《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严正声明》

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湖北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7月18日，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

1967年7月20日，二司《武汉告急！告急！告急——告全国人民书》

1967年7月23日，三司革联《夺权公告》

1967年7月25日，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接见河南省部队领导干部的讲话

1967年7月26日，《毛泽东主席就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

《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

1967年7月26日，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1967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北京支持你们！》

196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1967年7月29日，红旗杂志1967年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1967年7月30日，《武汉军区公告》

1967年8月9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

1967年8月8日至8月9日，《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时称“八八纪要”）

1967年8月26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革命派在京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8月28日，《新华工》报编辑部，新华工革命造反广播电台、革命造反广播台编辑部《关于目前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

1967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地区军事院校文体单位斗陈筹备处、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武汉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编《武汉事件》

1967年9月，（独立）师机关整训办公室《小字报选》

1967年8月—9月，市机关红司人勤总部编《百万雄师内幕》

1967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校红联总部《陈再道、钟汉华的罪证》

1967年9月14日，《新华工》报社论《中学革命派走自己的路好得很》

1967年9月20日，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公安联司汉阳兵团《“公检法”一小撮坏头头反动罪行录》（第一集）

1967年9月26日，中央首长接见各省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中发[67]310号，1967年10月6日）

1967年10月8日，《中央首长及阿尔巴尼亚谢胡同志与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座谈纪要》

1967年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

1967年10月31日，中央武装干部集训班湖北组军内外造反派返鄂汇报团全体同志《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湖北驻军及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汇报信（草稿）》

1967年11月7日，鲁礼安《北斗星学会宣言》

1967年11月30日，《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1967年12月10日，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

1968年1月15日，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红代会的贺电

1968年1月17日，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工代会的贺电

1968年1月18日，《张体学同志的书面检查》

1968年1月2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向英雄的武汉人民热烈祝贺》

1968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年3月28日，钢工总关于开展“四反”的声明（时称“三二八声明”）

1968年5月23日，红代会武汉钢二司《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关于武汉目前形势的声明》

1968年5月2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湖北省革委会并转三钢、三新的电报

1968年5月29日，《新华工》报编辑部《评武汉目前局势》

1968年5月，武汉公安联司斗批改办公室、新湖大法律系调查组《武汉公安——陈再道镇压革命群众的屠刀》

1968年6月15日，新华工报编辑部《评反革命跳梁小丑鲁礼安》

1968年8月22日，在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及部分专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议上曾思玉的讲话

1968年9月5日，《中央首长接见冶金工业会议部分代表时的重要指示》（关于武钢部分）

1968年9月6日，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大联合，彻底解决跨行业组织问题的决议》

1968年11月，驻华中工学院工人宣传队《对华中工学院的初步调查》

1969年1月18日，《省革委会十一个月工作情况（鄂革[69]第5号文件）

1969年4月10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

1969年5月11日，武汉工代会《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委员扩大会议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决议》

1969年5月22日《华中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扩大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纪要》

1969年5月，中央首长数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在京人员的讲话

196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69）28号文件（“五二七指示”）

196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69）67号文件《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九二七指示”）

1969年10月，70人在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70年1月11日，解放军某部乔左、郑宣《党必须领导一切——驳“造反派坐天下，说啥就是啥”》（载长江日报）

197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武汉军区党委关于抓点情况的报告（中发〔1970〕32号文件）

1970年6月，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批判胡厚民、李想玉、任爱生的多人发言

1970年11月20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武汉地区领导同志座谈会”的曾思玉等九人的讲话

1971年2月25日，驻武汉市农业学校工宣队评论组、武医一院革委会革命大批判组《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是要压——再批“造反派受压论”》（载湖北日报）

1971年3月1日，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中共湖北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关于建立“五·一六”、“北、决、扬”专案联合小组的通知》

1971年12月29日，张昭剑《我的检讨》

1972年9月11日，武汉市委《解决清查“五·一六”、“北、决、扬”工作“搞过了一点”的问题的试点工作报告》

1972年11月4日，中共中央（72）42号文件

1973年2月17日，武汉市委《关于深入批林整风的意见》

1974年2月20日，赵辛初在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

1974年2月—6月，“杜则进”写作组系列文章

1974年3月—6月，“武汉地区工农兵”系列公告

1974年3月1日，夏邦银、朱鸿霞、张立国在湖北省工会常委会上的发言

1974年3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几点意见（征求意见稿）》（时称“七条”）

1974年3月16日，湖北省委《关于湖北“两清”工作中的错误问题（征求意见稿）》（时称“六条”）

1974年3月，邵正茂编《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

1974年3月22日，中共湖北省委鄂发（1974）16号文件（传达3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湖北省委、武汉军区党委三点电话指示）

1974年3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材料》

1974年4月2日，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这也算是揭发？》

1974年4月4日，武汉冷冻机厂批林批孔批判组整理《武汉“工农兵”上京汇报材料》

1974年4月4日，“武汉地区革命群众赴京控告团”向中央接待站递交的《关于刘丰、曾思玉在湖北、武汉地区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罪行材料》

1974年4月6日，湖北省委文件（鄂发[1974]24号）

1974年4月6日，“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印《王克文书记接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部分同志的讲话》

1974年4月10日，湖北省委文件（鄂发[1974]28号）

1974年4月21日，武汉地区反潮流战士窦则胜编辑部主编《武汉的反潮流》

1974年5月10日，谢妙福《认真总结经验，更坚定地前进——向江城人民汇报若干问题》

1974年5月21日，《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

1974年6月4日，湖北省委办公厅印发《湖北省委关于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的几点意见》

1974年7月17日，武汉市委《关于继续纠正“两清”扩大化错误落实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请求报告》（附1974年7月12日《关于继续纠正“两清”扩大化错误落实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意见》）

1974年7月18日，《林彪死党刘丰反革命言行》（鄂发[1974]49号文件）

1975年1月20日，李先念等中央首长接见朱鸿霞等四名四届人大代表的讲话

1975年2月27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通告》

1975年3月7日，中共武汉市委文件（1975）9号（“印发中共中央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通告》的批复”）

1975年3月11日，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关于批判陈端武的反动大字报及其一类口号报的按语》（附“陈端武的反动大字报及其一类口号报”）

1975年3月17日，中共武汉市委《关于认真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搞好当前各项工作的通知》

1975年3月29日，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室《谢妙福等人罪行材料》

1975年6月4日，赵辛初、赵修在全省广播大会上的讲话

1976年2月23日，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张立国、吴焱金、李想玉、胡厚民等18人《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

1976年3月1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部分成员致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公开信

1976年4月2日，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部分成员《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地作检讨——再致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公开信兼告全省人民书》

1976年6月9日，《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76年8月10日，王克文在全市县级以上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进一步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武发[1976]21号文件）

1976年9月23日，中共武汉市委五届第十七次全体（扩大）会议决议《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976年11月9日，《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愤怒声讨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大会上的讲话》

1976年12月1日，赵辛初、姜一、赵修、韩宁夫、王克文、宋侃夫“给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深入揭批“四人帮”，发展湖北大好形势的报告》

1976年12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印《中央领导同志同湖北来京负责同志的谈话》

1977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

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8]71号），附1978年9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

1982年8月24日，湖北日报记者良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反革命案进行公开审判的情况》

1982年9月26日，长江日报评论员文章《历史的判决，人民的胜利》

1982年前后，数十名造反派成员的刑事判决书

2005年1月5日，湖北省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申诉问题的讨论纪要》（专题会议纪要[2005]001号）

2007年5月17日，湖北省政法委《关于妥善处理“文革两案”人员上访有关问题处理意见》（鄂政法办[2007]35号）

2007年，钟逸《湖北“文革两案”刑满人员解决生活费问题始末》

华中工学院无线电系革命到底战斗队《华中工学院文革大事记（1966.5.7—10.8）》

华中工学院革命造反系（原无线电系）红色游击队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支队狂飙编《武汉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湖北大学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编印《湖北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11月）

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新华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展简史》（1966年12月）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赴沪战团等《武汉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7.2—6）》

钢二司新武大“八·三一”红旗战斗队编《武汉军区支保压左大事记》（1967年8月）

钢二司反复辟联络站《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大事记》（1967

年3月)

武汉钢二司红武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1967年8月)

《牛怀龙、蔡炳臣调动部队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1967年10月)

武汉钢二司《武汉武斗及反革命暴乱记实(4月29日—7月20日)》(1967年8月)

武汉测绘学院红旗战团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11月12日)

武汉市机关红司市人委总部办公厅革命造反团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惠农罪行大事记(从二月黑风至七二〇严重政治事件)》(1968年3月10日)

二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1840—1985)》之《社会团体志》、《经济管理志》、《教育志》、《政治志》、《大事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局等编《武汉大典第一卷(1949—1976)》，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1980—2000)》，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著《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陈再道《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载《革命史资料》第1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〇事件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陈丕显《历史的转折在湖北》，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杨成武将军自述》“十六、“七二〇”事件的幕前幕后”，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屈德蹇、郑珠滨《一代将星孔庆德》第 21 章“在动乱的‘文革’中（上）”、第 22 章“在动乱的‘文革’中（下）”，解放军出版社 2001 年版

曾思玉《百年见证》第十二章“武汉七年”，大连出版社 2014 年版

陈丕显《武汉“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的经过》，载《武汉文史资料》2006 年第 8 期

《陈再道回忆录》第四十二章“在‘文革’中沉浮”，解放军出版社 2009 年版

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戴维堤《逝者如斯》（网文，2007 年）

三

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2002—2015 年，访谈六十余人）

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 2005 年版

胡国基《幸存者说》（手稿，2005 年）

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李乾《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自印本，2007 年）

荣根《“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网文，2007 年）

朱启贵《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电子版，2009 年）

吴恒春《人生传奇》（网文，2009 年）

吴焱金《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09 年版

郭保安《文革中的我》（电子版，2009 年）

钟逸《从新一中革司到中学红联》（网文，2009 年）

肖佑祥《花甲里程》（自印本，2009 年）

曹承义《悲欣交集话文革》，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0 年版

李开键《我因文革两次坐牢》（2010 年）

蒋兆庆《红水院文革杂忆》（自印本，2010年）

杨道远《奉献——我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版

魏绳武《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李承弘《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王光照《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实》，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刘中秋《文革轶事——我的一段人生路》（网文，2011年）

杨闯《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王海峰《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一个老三届的回忆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版

方德纾《倾诉》，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2年版

徐正全《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

《烈火·永生——怀念胡厚民》（自印本，2013年清明）

夏家保《蝉鸣录——八十回眸》，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版

顾建棠《生逢其时——文化大革命亲历记》，香港银河出版社2014年版

诚言《我当文革造反派》（网文，2014年）

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

黄载禄《岁月如歌》，中国国际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彭绍鹏《时代与人生——一介草民的故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

刘德光《回眸——我经历的宜昌文化大革命》（自印本，2015年）

王富山《我的简历》（未刊稿，2016年）

杨胜利《我的文革经历》（未刊稿，2016年）

岑颖义《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版

陈祖坤《吹尽狂沙——一个武钢火车司机的文革回忆（修订版）》，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6 年版

彭维俊等《1964—1984 年武汉地区文革资料长编》（电子版，2016 年）

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2017 年修订版）》（电子版）

夙愿《日记 1978—1979》，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7 年版

任常《回首梦魂犹依稀》（未刊稿，2018 年）

张建华《风雨七十年》，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8 年版

王登富《我和武汉新公校》，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8 年版

彭祖龙《武汉文革史稿》（未刊稿，2018 年）

江重初《初心》（自印本，2018 年）

刘玉民等《喻家山风云——华中工学院文革记忆》（待刊稿，2019 年）

高群编著《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纪实》，中国文化传播
出版社 2019 年版

《谢保安文革忆事》（未刊稿，2019 年）

湖北武汉纪念“七二〇”三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主编《湖北武汉文革资
料第一辑》（自印本，1997 年）

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二辑）》（自
印本，2000 年）

湖北文革史研究会（筹）编辑《湖北武汉文革资料（第三辑）》（自
印本，2002 年）

汪扬《波澜岁月》（自印本，2002 年）

刘仲余、刘松余《坚苦人生》，华龄出版社 2009 年版

章迪杰《峥嵘岁月——回忆武汉“百万雄师”》，中国文化传播出版
社 2015 年版

詹学才主编《风雨历程——记文化大革命始末》（自印本，2017 年）

后记

一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席卷无数的普通人，也由此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其深远影响至今未曾断绝。

文革与新中国其他政治运动相区别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存在着一个由民众中间的批判力量自己组织起来的“造反派组织”，这个组织在文革十年期间，始终把批判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权派不便亲自出面或无法调用司法、军队去压制造反派的时候，往往操控或组建反对造反派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去实施压制造反派的各种策略，这样，文革的政治冲突就有了群众组织之间相互对立的外观。这三者的政治博弈形成文革的显著特点。

1967年周恩来在会见武汉造反派头头时，说武汉文革的特点是工人和学生结合得比较好，与北京和上海不同，北京的大学生运动较为突出，而上海的工人运动领先。

除了周恩来指出的武汉文革的这一特点之外，在全国的文革运动中，武汉造反派与反文革派的系列政治博弈，也更具有代表性。在北京和上海的文革运动中，反文革力量特别是保守派1967年初之后就隐而不现了。这两地文革运动，虽然在过去的文革史研究中更受重视，但与全国文革的一般状况有很大不同。

武汉的文革运动，不仅群众运动规模浩大，且文革反对派的力量强大，文革十年间始终在场，还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与全国的一般状况更接近。因此，观察武汉的文革运动，对理解全国文革的帮助更大一些。

就全国的文革状况而言，反文革派的力量——反对文革的当权派与保守派的结合——远大于造反派的力量，从而形成了文革运动起落和结局的一般背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及其后的际遇，就是奠基于反文革派的优势力量及其政治策略。

二

1974年3月胡厚民关押审查四年获释后，曾经对人说过：文革将来肯定会被人遗忘。因为了解情况的人不再有机会说话，有机会说话的人都选择说假话。

进入新世纪之后，后文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巨变接近完成，文革提示过的“变修走资”趋势均已成为现实。在这样的历史时刻，重提文革史反而变得更为困难了，胡厚民曾经预言的“健忘症”，真的在全社会蔓延开来了，有关文革的真实历史事实，再也难以获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的历史不重要了。

在亲历文革并为此付出重大牺牲的一些造反派看来，无论是为了过去，还是为了现在和将来，文革历史都不应该被遗忘。

四十多年来，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垄断话语权，封杀关于文革的不同声音，鼓动人们“不纠缠历史旧账”“向前看”；同时投入了巨量的努力，为全社会塑造了一个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文革场景，诸如“道德沦丧”“文化浩劫”“经济崩溃”之类。实际上真实的文革他们自己从来没有遗忘，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冲击、所失去的利益，他们刻骨铭心。所以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冲动把自己的对手称为“文革余孽”，这样就能够建立起“降魔卫道”的道义地位，就获得了俯视对手的高度差。例如某主流经济学名家说自己的辩论对手“是想要回到文革的美好往日去”；政府某高官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某作家的一部小说，被一些人称为“地主伤痕文学”，她和她的支持者回击说批评者“要搞文革复辟”。这么看来，在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那里，文革依然是活着的，经过他们重塑的文革是他们捍卫权力地位和话语权的最便捷的工具。

在文革史问题上，一方面是高层精英不断在构建一个更加符合自身需要的框架，另外一个方面的去伪存真的努力也日渐鲜明。越是接近暮年，越是有相当多的亲历者被激发起高度的历史自觉，要把自己亲见亲闻的文革史料留给后人。

时间流逝不休，当年深度参加文革的少年和青年，都一步步进入暮年。相当一部分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还没有来得及“回顾当年”写下自己亲见亲闻的事实，就已经作古，很多事情的具体经过就这样湮灭无闻了。因此，

写下自己亲见亲闻的文革，就越来越迫切了。

从2006年开始，顾建棠、杨道远、彭勋、柳英发等先后组织过三个写作组。他们搜集文革资料，访谈亲历者，希望能给后人留下一份尽可能真实的武汉文革史实，帮助人们认识那一段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前两个写作组都未能实现目标，一些写作组成员还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这个愿望只能由生者承继下来。目前这本书，是第三个写作组的努力成果。

三

2014年12月，杨道远邀约了一个座谈会，参加者多为前两个写作组中年纪稍轻的成员。杨道远建议重新成立写作组，打算在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际出书。随后写作组数次开会，确定各成员负责的部分，议定各成员拟出的详细提纲，然后分头去写。

2006年前，写作组成员已经在收集文革资料，访谈文革亲历者；至第三个写作组成立前夕，已收集到的文革原始资料做成电子文件数百G，在此基础上编成1964年至1984年的大事记和若干专题的资料长编，整理、编辑并出版了二十多本关于武汉文革的个人回忆录，为这本书的撰写打下了基础。遗憾的是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是造反派方面的，而文革是造反派、保守派、当权派三方的政治博弈。

写作组在构建本书框架时，就感到保守派和当权派的材料很难搜集到，因而对这两个重要的文革参与群体无法进行比较全面的呈现。在保守派方面，文革中他们的小报、传单本来就比造反派少得多；文革后许多年的接触中间，他们往往心存种种顾忌，拒绝全面讲述自己的经历。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就对采访者说过“因为涉及到很多干部，所以很多事情不能讲”；1967年六一七武斗死者众多，目击者数千人，作为百万雄师现场总指挥的谢敏华说“没有死一个人”。在当权派方面，虽然出了不少回忆录、文集、传记之类的著作，但讲述文革的真实情况是一大共同忌讳，可资参考的真实材料极少。

再者，文革期间的很多官方文件，不对公众开放；明知武汉图书馆藏有大量文革小报，多方努力不得一见。

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放弃搜集保守派、当权派资料和官方文件的努力，没有放弃获得这类资料的任何一次机会。

我们所搜集到的造反派方面的资料很多，多到写作组每一个人都不敢说看过了其中应该看的所有资料，更谈不上对每一份资料都作过仔细研究。即使这样，这些资料仍有很多方面的缺失。究其原因，除继续搜集为时间、精力所限外，一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或已作古或丧失思维能力，二是造反派骨干和头头迭经抄家，日记、笔记和相关资料片纸无存。

好在写作组成员除田力为外，都是文革亲历者，还有多位始终关注本书写作的亲历者参与讨论、审读书稿。有鉴于此，在这本书里，武汉文革的脉络应该是清晰、连贯的，重要事件不会有大的遗漏；面对海量的原始资料、互相矛盾的记载，写作组成员自会谨慎地作出判断。

第三个写作组成立的最初阶段就明确：

1. 本书采取第三人称叙事的客观视角，遣词行文力求不带褒贬色彩，力求真实地反映武汉文革的历史过程，这是我们的初衷和努力方向。由于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资料缺乏，也由于写作组成员造反派的历史身份和现实立场，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很难。如果有读者认为这本书是造反派视角的文革叙事，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只能自责努力不够。

2. 这本书不是“文革史”。所谓“史”，就是史学著作，除“史实”外，还须有“史论”和“史评”。后两者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做好的。更重要的是，就史实而言，材料的选取、叙事的详略，写作组内尚且存在争论；如果写史，对文革事件和文革人物进行评论并作出结论，意见就更难统一。因此这本书名为“文革纪实”。如果这本书能够起到相对集中地保留史料和史实、给后人了解和研究武汉文革提供方便的作用，写作组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3. “文革纪实”中的“文革”一词，如果理解为“文革时期”，那么严格地说，所“纪”之“实”除了文革运动之外，还应该包括文革时期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这也不是我们的能力、精力所能及的。幸而人们看到书名中的“文革”二字，一般都会理解为“文革运动”，同时为了不使书名累赘，故定下现在的书名。

种种原因使得书稿历经五年才初具规模。一个重要原因是写作组不断地听到各种意见，不断地获得新的资料，从而对已完稿的章节不断地进行修改，正式排版时还在改。

这一本《武汉地区文革纪实》，未能达到全景式的武汉文革史的高度，是一个遗憾。但这本书还是相对完整地呈现出作为文革基本特点之一的造

反派组织的状况，及其在各个时期的诉求与行动策略，所始终面对的內部政治整合困境和外部强大反对力量。武汉造反派在文革十年间的不利处境，是反文革优势力量的策略体现，也更符合全国的一般状况。希望这部“纪实”，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回顾那一段政治和历史。

写作组恳切希望读者对本书进行各方面的批评，为本书的完善提供资料。写作组将在合适的时候以电子版的形式发布本书的修订版。

因全书九十余万字（包括插图二百二十余幅），篇幅过大，故不附录文献。武汉地区文革重要文献编成目录附在书后，读者可以此目录为线索自行查阅。

写作组成员分工情况如下：

引子：徐海亮，

第一章至第七章：杨道远，

第八章至第十二章：田力为，

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徐海亮，

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余德亨，

第二十章至第二十三章：杜良怀，

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七章：杜先荣，

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一章：彭维俊，

参考资料：杜先荣，

后记：田力为，

统稿：余德亨，

插图：彭维俊。

本书即将付印之际，写作组衷心感谢以下人士：

感谢李晓航、许东杰、吴正祥、刘德光无私地提供大量资料；

感谢谢敏华、章迪杰等接受我们的采访；

感谢柳英发、王光照数度阅读全稿并提出极为详尽的意见；

感谢丁家显（原二司头头）、张立国（原新华工头头）、谢邦柱（原新湖大头头）、彭勋（原新湖大头头）、刘玉民（原新华工头头）、曹承义（原新一冶头头）、陈定方（原新华工成员）、张建华（原新华工成员）、杜向东（原红工兵头头）、彭祖龙（原工造总司头头）、谢保安（原武汉三中二司头头）、徐大胜（原武汉制药厂造反派头头）、向旺明（原武汉

三中二司成员)、李江(原武汉三中二司成员)、晏胜利(原武测二司成员)、李家沛(原水院二司成员)、胡卫平(原武汉四中二司成员)、岑颖义(原水院二司成员)、刘汉武(原水运工程学院二司头头)、陈昌雄(原工总成员)、李锋(原新一中革司成员)、孟强伟(福建师大教师)、高伐林(独立撰稿人)等以各种方式提供的帮助;

特别感谢已经逝去的武汉文革系列回忆录中的几位作者:魏绳武、李承弘、吴恒春、方德纾、徐正全、蒋兆庆、顾建棠、吴焱金、彭祖龙。本书引用了他们的鲜活的回忆。希望本书得以流传,他们就将永远活在这本书里。

2020年3月